



潢川黄国故城



新密密国故城



新郑郑韩故城



新密王岗郑庄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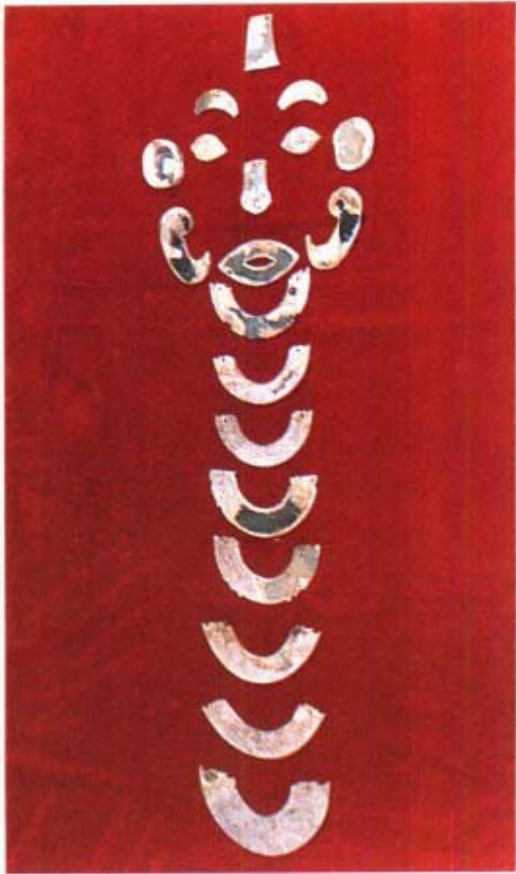
上蔡蔡国故城烽火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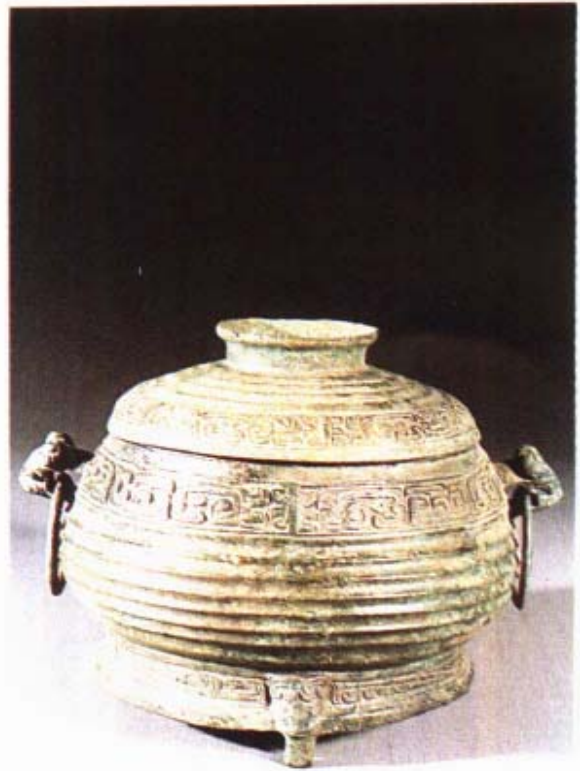
淮阳马鞍南冢——楚顷襄王墓



新密补国故城



缀玉面罩（西周）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第 2009 号墓出土



邓公簋（西周）  
平顶山滢阳岭出土



玉鹰（春秋）  
平顶山滢阳岭应国墓地 1 号墓出土



中再父簋（西周）  
南阳北郊出土



应侯卣（西周）  
平顶山滢阳岭应国墓地 84 号墓出土



昶伯墉盘（春秋）  
桐柏左庄村出土



宋公彘簠（春秋）  
固始侯古堆 1 号墓出土



黄夫人豆（春秋）  
光山宝相寺出土



黄君鼎（春秋）  
光山宝相寺出土



蔡公子义工武簠（春秋）  
潢川高稻场出土



曾子甗（春秋）  
新野小西关村出土



樊夫人匜（春秋）  
信阳平桥南山嘴1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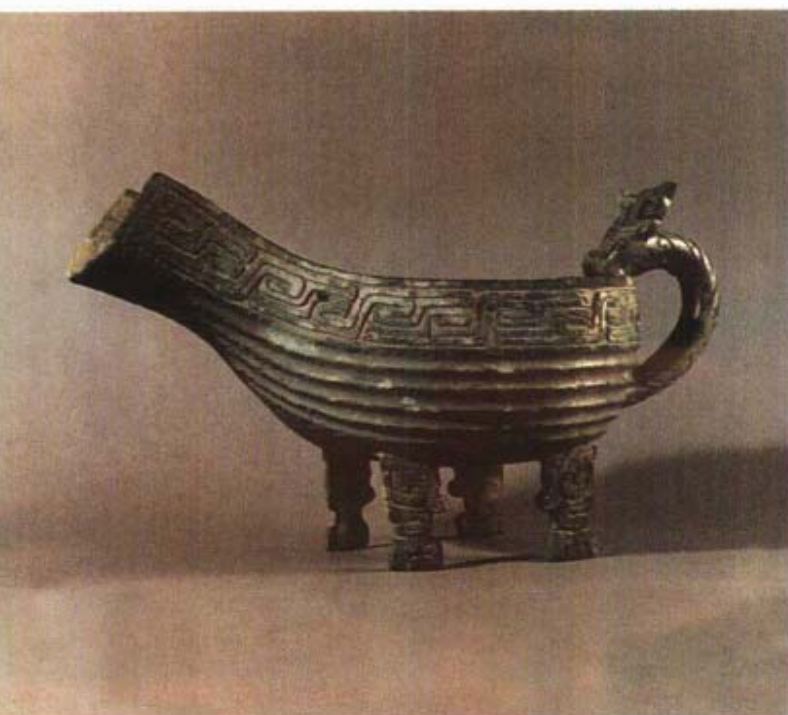


樊夫人鬲（春秋）  
信阳平桥南山嘴1号墓出土



铜壶（西周）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2006 号墓出土



番伯匜（春秋）  
信阳甘岸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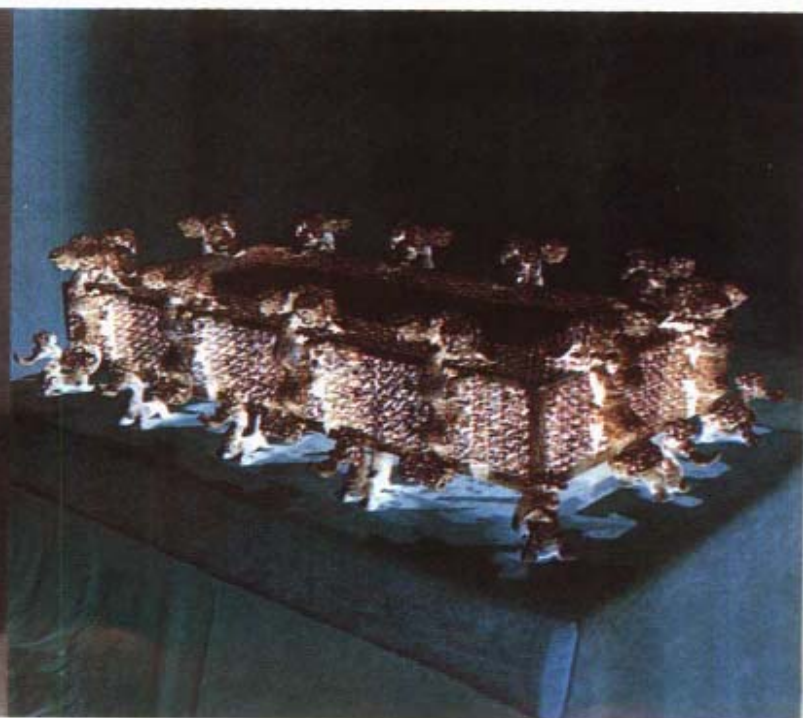
番君盘（春秋）  
信阳杨河出土



莲鹤方壶（春秋）  
新郑南街李家楼出土



王子午鼎（春秋）  
浙川下寺2号墓出土



云纹铜禁（春秋）  
浙川下寺2号墓出土





## 作者简介

胡 戟 1941 年出生，上海市人。1959 年至 1967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为本科生和隋唐史研究生。中国唐史学会第二届至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日本明治大学客员教授，唐研究基金会专家委员。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作有《武则天本传》、《隋炀帝新传》、《敦煌史话》、《吐鲁番》、《中国古代礼仪》、《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等和百余篇论文，主编隋唐历史文化丛书和《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82—1995）》、《二十世纪唐研究》等书。

# 目 录

1. 汉魏隋唐历史底蕴初探	
——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	1
2. 简论唐史研究·····	42
3. 二十世纪的唐研究·····	78
4. 浅谈武则天研究·····	106
5. 论治史·····	113
6. 把史学建成一片讲真话的净土·····	119
7. 关陇集团的形成及其矛盾的性格·····	122
8. 隋朝的建立·····	140
9. 试辩仁寿宫变之谜·····	145
10. 炀帝西巡·····	153
11. 千秋功罪说隋炀·····	169
12. 大运河与隋炀帝·····	186
13. 唐高祖与玄武门之变·····	198
14. 唐太宗的生平事业·····	224
15. 贤相诀别明君	
——房玄龄与唐太宗·····	229

---

16. 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	248
17. 三让天下的唐睿宗 .....	267
18. 开元名相——姚崇 .....	273
附:《“十事要说”考》	
19. 做寻常夫妻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追求 .....	294
20. 安史之乱前后的杜甫 .....	297
21. 马嵬三论 .....	301
22. 马嵬后论	
——乱世谋臣李泌 .....	311
23. 廉政宰相杨绾 .....	326
24. 唐代储君 .....	328
25. 莽量尺考 .....	342
26. 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 .....	348
27. 北周与隋代的租额	
——隋文帝“重租政策”论质疑 .....	362
28. 唐代粮食亩产量 .....	369
——唐代农业经济述论之一	
29. 从耕三余一说起	
——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	
和生产结构问题 .....	373
30. 均田——逃户/括户——两税	
——以逃户问题为中心评价武则天时期的	
经济政策 .....	392

---

31. 李皋和江陵创造的唐代粮食单产纪录 .....	402
——读两唐书李皋传札记	
32. 黑城行 .....	415
33. 周秦汉唐礼仪文化的价值定位 .....	422
34. 茶与婚姻 .....	425
35. 贬抑运河的文化心态 .....	429
36. 试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科学被牺牲的代价 .....	439
37. 盛唐的莫高窟艺术 .....	445
38. 净土宗胜地巡礼 .....	455
39. 佛教东渐二千年香火不绝的反思 .....	471
40. 《隋炀帝新传》前言 .....	476
41. 《武则天本纪》前言 .....	478
42. 《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导言 .....	481
索引 .....	483
后记    告别隋唐史 .....	503

# 汉魏隋唐历史底蕴初探

## ——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

有鉴于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①</sup>的认识,我们应当承认,每个人对自己目的的追求和进取精神,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人类社会文明发育程度的高低优劣,也首先体现在社会为每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提供的空间有多大,体现在对每个人合理愿望满足的程度。当然,作为社会的人,每个人占据或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相互区别为不同的种族、宗教、阶级、阶层、宗派、集团、社区、宗族和家庭,人们的不同追求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乃至冲突,需要国家政权和法律来加以调节,也需要礼仪道德来加以制约。于是人们争夺生存空间和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历史活动,集中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暴力或非暴力形式展现,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坎坎坷坷,艰难前进。按实证科学的标准,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很难说有多少规律可言,但从人——这里排除那些算不得人的人——追求真善美的本性来说,历史趋向自由、光明、进步的大势是存在的,尽管一时的黑暗反动也屡见不鲜。

本文首先要讨论的是,处于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前期的秦汉至隋唐间 1128 年历史之大势。其间可区分为秦与西汉、东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8 页。

汉至南北朝前期、南北朝中期至初唐、盛唐至中晚唐等四个阶段。政治史的内涵是士族门阀政治自酝酿、发展成熟、极盛而衰到终结转型,在随后的五代、宋完成了向后门阀社会科举官僚政治的转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进入后期。

开辟这一时代发展前景的物质前提,是铁器牛耕为标志的农业文明进步,它带来一家一户小农独立经营能力的提升,唤起千百万农民开创自主经济的生活热情,这是从集体化农业、大规模奴隶劳动生产方式下的一次解放。这一历史性变革,在早些时候的战国开始,开风气之先的秦国借废井田、开阡陌的商鞅变法而强大,具备了平六国的实力。

## 一、秦汉隋唐间的历史大势

统一的秦王朝终结了王权时代裂土分封众建诸侯的宗法贵族政治体制,在郡县制基础上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政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sup>①</sup>的古典理论,自此真正付诸实施。在整个帝制时代这一理论框架下,讨论中国古代土地的国有、私有制问题,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在观念上和实际上,皇帝掌握着对全国土地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谁都不能向“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帝王思想挑战,这样,任何臣民都不能有对土地的最后所有权,他们所能拥有的,只是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买卖转让的也是这些权利。如果一定要讲土地所有制的话,比较确切的说法是家天下的皇帝所有制。长时期中多少次农民激烈的造反运动都不能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正可见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已达到难以动摇的地步。这样,信奉皇权主义的农民给自己留下的追求的空间就很狭小了。中古社会渊源于这最广大的

<sup>①</sup> 《诗·小雅·北山》。

农民阶层进取精神的社会进步,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助力。

在中国大部处于暖温带的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比较容易做到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衣食之需,自然经济本能地排斥着商品经济。加上秦汉官府的抑商贱商政策,<sup>①</sup>使自秦汉时代起,尽管不乏有追逐商业利润而暴富的高商巨贾,但商业连同畸型发展的手工业,始终难于起到提升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品质的应有作用。

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专制主义也随之建立。其主要标志是秦始皇亲自确立的皇帝制度。叔孙通为汉高祖草创了尊君肃臣的朝廷礼仪,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在汉武帝以后逐渐确立。秦代的焚书坑儒,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央集权下专制主义刚面世时已具备的血腥黑暗本质。秦汉国家又通过郡县制度和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严密控制人口,把政令直接推行到地方,形成与西方领主陪臣制下陪臣不相属的封建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而后延续了2100余年的崇尚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相应的生产力,是铁器牛耕农业。在漫长的铁器牛耕时代发展的初期,战国到西汉,生产力个体家庭化的关键,是战国时代出现的铁口犁,其破土犁地的功效远胜于木石工具和昂贵的青铜器。这样一个一斤多重的犁铧头的轻便犁,无论人拽牛拉,都适合个体小生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一节,被认为是反映这时期个体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典型材料。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亩收一石半。……食,人月一石半”云云,每亩所产正合一人一月的口粮。依五口之家平均两个劳动力,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约2000市斤

<sup>①</sup>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今法律贱商人。”

(1000 公斤)。<sup>①</sup>但这不过是能勉强糊口的水准,如果交租,便人不敷出。所以李悝又说:“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即使如此,比起老子所称:“一人黠耒而耕,不益十亩,中田之收,不过四石”<sup>②</sup>的劳动生产率,有了不小的提高。这是牛耕取代人力锄耕以后的进步。由此亦可知,中国古代“一夫百亩”程式下的亩制,由周代以下的“百步为亩”到二百四十步为亩新制的转变,发生在犁耕出现的此时,不是偶然的。《汉书·食货志》又称:“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繆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据邓展注,九夫为井,三夫为屋,一夫百亩,为十二顷,是百步为亩的小亩,合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正是五顷。即在汉武帝时,过去十二夫耕的田,今二牛三人即可,而且收获还更好,这是生产力提高了。

如果这些典型材料能反映铁器牛耕时代到来前后生产力进步的一般状况,那我们就不难理解,生产力这最革命的因素是引起当时社会巨变的根由。奴隶劳动因而将被逐出生产领域,人身自由和独立经营的追求,带来社会上大量个体农户的广泛存在。而先周以来便存在的宗族大姓,在长期的列国纷争中备受打击,这时还不具备控制土地和大量农民的经济实力。于是秦汉国家直接掌握了大量自耕农民,直接向农民征赋税和力役、兵役,国家实力空前强大。更兼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国家控制的编户人口迅速达到创纪录的 1200 余万户和 5900 余万口。<sup>③</sup>

适应自汉文帝时开始的徙民实边和国土开发的要求,西汉开始广泛应用全铁的大型,十余斤重的犁铧结实锋利,比只能豁开浅

① 参拙文《从耕三余一说起——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问题》,载《中国农史》1983 年第 4 期。《汉书·食货志》又有晁错令民人聚拜爵疏,言五口之家,二人服役,耕百亩,收不过百石。所获仅此 2/3。

② 引自《文子缢义》卷 10《上仁》。

③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层表土的铁口犁来说,有深耕和切断草根的功能,大大增加了开垦荒地拓展农业的能力。如《盐铁论》所说:“官府皆铸为大器”,十分重视大犁的生产,一直推广到张掖、酒泉乃至居延等大西北的僻远地区。致使全国垦田达 827 万顷,平均每户 67.6 亩,人均 13.88 亩。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的这一统计数字应是按 240 步的大亩制计算的。西汉尺长以 23.1 厘米计,则西汉亩面积为 461 平方公尺,合今 0.6915 市亩,西汉全国垦田约有 5.7 亿市亩,人均 9.6 市亩。

这大犁代表的农业生产力,还酝酿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至少需要二牛三人操作的大犁,不再是一般个体农户的人力畜力能具备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结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于是宗族领袖承担起组织生产的任务,逐渐发展成专事管理的豪强,把持了土地和耕牛。个体农民生产要依赖这样的组织相帮,西汉末具有依附性的客已出现,预示“农奴化”趋势来临。这是西汉以后大族豪强地主发展的生产力方面的原因。另外,国家的赋税徭役征发很重,使一部分农民隐为荫户,也是大族豪强势力发展的原因。景帝时,“济南眭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sup>①</sup>《汉书·酷吏传·严延年传》记宣帝时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其间武帝已有裁抑豪强措施,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sup>②</sup>可见豪强已普遍存在,成为社会政治的问题。

进展到东汉至南北朝中期以前,大族豪强的经济势力日益发

① 《汉书》卷 90《酷吏传·邳都传》。

② 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引自《汉官六种》。

展成熟。

从新莽到东汉以下,随着在西汉大量使用于生产劳动中的奴婢的放免,和对使用奴婢劳动的限制,随着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数以万计的带有依附性的“徒附”和被荫庇的佃客,在劳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西晋时,无论政府怎样严厉制止,也不能阻止大量人口依附豪强为客。魏晋成为一个完成了东汉以来大量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农奴化的时代。<sup>①</sup>大族豪强终于控制了大量土地和劳动者,原因是与上述生产力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例证之一是关于人口的统计资料。两汉经济有发展,总的土地、人口不会减少,但户籍上人口数减少了,由西汉最高的 5959 万减为东汉最高的永寿三年时的 5648 万。<sup>②</sup>具体分析可参看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甲表九,后汉对前汉郡国口数增减之比较》。

东汉郡国	东汉人口	西汉相应区域人口	人口增减	东汉/西汉
京兆尹	285574	722490	- 486916	37%
左冯翊	145915	846328	- 701133	17%
右扶风	93091	836070	- 742979	11%
河南尹	1010827	1740279	- 729452	58%
河内郡	801558	1067097	- 265539	75%
弘农郡	119113	416632	- 297519	29%

① 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先生使用“封建化”的概念(第 38 页)。

② 《通典》卷 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广陵郡	410190	395175	+ 15015	104%
南 郡	747604	747138	+ 466	100%
零陵郡	1001578	157578	+ 844000	636%
长沙郡	1059372	217685	+ 841687	487%
豫章郡	1668906	351965	+ 1316941	474%

大致是南增北减,中间持平。南方大量增加,江西、湖南有增4~6倍的,关中地区人口减少一些是肯定的,而今河南地区,东汉都城所在,花很大力量经营,人口不会减少,但户籍上却成倍减少,原因就是大族豪强荫蔽人口。

例证之二是兵制的变化。由于大族豪强控制大量土地人手,东汉国家力量相对削弱,难以维持西汉时实行的普遍征兵制。汉光武帝时就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守主持的“都试”,以至兵多不练。建武七年(公元31年)还下诏罢车骑、材官、楼船等郡国兵。大族豪强利用控制的宗族、宾客组织的私人武装,乘王莽、董卓乱时不断发展,光武帝刘秀即由此起家。社会动荡由于民族纷争而激化。迫使农民寻求保护,进入坞堡,强化了对大族豪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沦为平日种地,战时打仗的部曲。

从农民战争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和以前的区别。在以前大族豪强势未成熟时,秦末农民军的力量足以推翻一个强大的秦王朝,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各地地主武装的镇压,农民的斗争主要针对中央政权,因而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刘邦本人也不是豪强地主而是小吏。王莽末年农民战争情况有变化,各地大族豪强的营堡林立,农民斗争被利用来改朝换代。绿林、赤眉虽然有力量推翻王朝,但政权落到大族豪强的代表人物刘秀手中。东汉政权

和大族豪强共同对付农民,黄巾军在组织上有很大进步,公开发动前有良好的准备阶段,但起兵后不到一年就被镇压,因为到处有大族豪强的武装狙击镇压,使张角难于集中各地农民力量取得推翻中央王朝的胜利。尔后,便形成三国的分立。

大族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实力强大,而国家掌握的人口减少,力量削弱,这是造成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根本原因。起先因长期统一在心理上的影响,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割据,没有分崩离析,随着大族豪强势力的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形成分裂局面,这是必然的。从现象上看,黄巾起兵前,表面是统一的,起兵后出现了一个三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分裂因素早已存在,黄巾不过是揭盖子。从三国、西晋的情况可以看出,南北朝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当时分裂的原因不能脱离生产的状况,仅归于“外族入侵”。当然,某些少数族进犯中原,曾起过延长强化了分裂的作用,如果中原王朝力量强大,少数民族不可能进犯推翻它的。

西晋的统一,因蜀、吴各地豪强大族经常叛乱而受到冲击,八王之乱是割据性战争,发生在少数族进入之前,更说明中原地区分裂,主要是内因起作用。四世纪初以下的一段历史,与其说是“五胡乱华”,不如说是“华乱五胡”,中原分裂割据势力的膨胀,破坏了西晋短期统一的局面,章法自乱,也乱了处于失控状态的少数族,造成社会的大动乱。

这样,王朝政权与大族豪强利益又有矛盾的一面。刘秀本人作为带宗族宾客武装的大姓豪右,起兵争得天下以后,又想裁抑豪强,度田量地,检括户口,控制人手,遭到激烈反抗。“大姓兵长”,即营堡头子,率领僮客家兵武装滋事,刘秀只得放弃度田。丈量土地,检括人口,在东汉一代都行不通。豪强问题已不是行政能解决的了。

大族豪强的实力归根结蒂来源于土地。战国以来宗族聚居的首领们依据宗族的力量兼并土地,发展起来大庄园,虽然土地买卖

始终存在,但大族豪强是最不会卖地的,族长受到全宗族尊敬,可以以种种名义收纳财物,有经济后援,不轻易出卖土地。东汉大庄园就显示出牢固的局面,同时还经营商业,掌握市场。《四民月令》记田庄里进行多种生产,自给自足的情况。二月习射备御,三月警备以抵御春荒时间闹草寇,八月缮治犂锄,正铸铠弦,九月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冬穷饿之寇。西汉末还未达到这样自给自足和防御完善的程度。特别是冶铁业,西汉时冶铁术大概还没有为一般人所掌握,因此冶铁工场集中,规模大,多为官营。这时冶铁技术扩散到民间,田庄里也有了铁匠铺等小手工业。《月令》称十二月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合耦田器是组织土地耕牛,有二牛配六人的,正体现大族组织生产方面起着作用。这是其存在的历史理由。

东汉时又有世代为公卿的世族。世族是大族的一部分,基础是牢固掌握土地,藉以在地方世代掌握权力,并到中央做大官。政治上层建筑适应这种变化,又要依靠豪强大族进行统治,所以不能不分权,中央集权有限度。郡县守令长史由中央任免,长史以下的佐吏由长官辟用,郡功曹、州县主簿等职能部门实权派,汉初由富人担任,后来由本地固定的几家大族掌握,形成一种稳定的用人制度,即门阀制度。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已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世仕州郡”,操纵乡论,主持选举的当地大姓、冠族及其代表人物“名士”控制了。故有称“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晁),弘农成瑨但坐啸”。<sup>①</sup> 范滂、岑晁被辟除为本郡功曹掌实权,外来的太守只主画诺、坐啸而已。延康元年(220年)九品官人法确立的选举制度,不能不违背“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sup>②</sup> 的初衷,而适应门阀制度,起了让某些家庭垄断某

① 《后汉书》卷67《党锢传》。

② 《宋书》卷94《恩倖传》。

些高位的保证作用。至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sup>①</sup>

东晋时代“王与马,共天下”,<sup>②</sup>是士族与皇权共治的典型门阀政治时代,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sup>③</sup>这时南方士族门阀的态度很有趣,他们欢迎司马氏到南京建都,以联合北方大族力量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南下,八公山一仗打败苻秦,很有战斗力。但他们多不愿意北伐,认为北伐对自己无利,要避免损失南方大族力量,所以北伐不能成功。起先晋元帝和王导为首的北方大族想回北方,但祖逖请纓北伐,只给“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sup>④</sup>不是不支持祖逖,是力量不够。以后北方大族王羲之等也不愿北伐了,因为在南方有了家业,兰亭鹅池,曲水流觞,回到北方没好处了。他们在南方侨居,土地势力已形成,经济力量加强了,这样便可见分裂是有原因的。

西晋末年以后,由北而南的流民潮给南方补充了大量劳动力,成为南方经济再起步的一个重要契机。不过,沉沦于这安乐之国的秦淮风月西湖歌舞中的门阀士族迅速腐朽,“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sup>⑤</sup>无心也无能从政。王、谢之家,也再不出王导、谢安那样的人才。权力自然落到寒门出身的刘裕等人手里,终于有刘裕废东晋自立,揭开历时169年(420—589年)的南朝历史。

南朝士族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sup>⑥</sup>维持极其狭窄的婚姻圈,竭力把持清流美称,均是为护卫士族特权作的挣扎,但终究

① 《晋书》卷45《刘毅传》。此句《宋书·恩倖传》作“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

② 《晋书》卷98《王敦传》。

③ 见田余庆师《释“王与马共天下”》,载《东晋门阀政治》。田先生还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④ 《晋书》卷62《祖逖传》。

⑤ 《晋书》卷75《刘悛传》。

⑥ 《宋书》卷42《王弘传》。

无改其腐朽的颓势。这些在历史上留下褒衣博带、瘦骨清相,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sup>①</sup>形象的南朝士族,落到“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sup>②</sup>的地步,兵荒马乱时连逃命的能力也没有。南方的士族是先行没落了。

北方从十六国到北魏统一,经历了无数战争,整个社会蒙受了空前的丧乱苦难,各族统治者纷纷寻觅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为国师圣人,注意利用宗教抚慰人心,同时吸纳大量士族高门代表人物进入政权。众多少数族在北方土著化,和当地人通婚,强健改善了北方人的体质精神,民族冲突和割据政权逐渐消解。自古以来北方汉族比较容易接纳异民族的特点再次充分表现。但士族大姓从与皇室共主政治的伙伴,降为皇室的附庸,越来越多要依靠当时官位而不是姓氏族望来支撑门第。南北殊途同归,大族门阀势力从南北朝一开始便进入早期衰落阶段,越过东汉到东晋极盛的顶峰以后,走下坡路了。

北魏中期,以孝文帝实行三长制和发布以“均给天下民田”<sup>③</sup>为名义的田令为标志,门阀社会转入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从南北朝中期到初唐的历史,是士族门阀经济政治势力全面衰落的时期。北魏田令和三长制,正是在士族门阀控制土地人口的能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才得以推行的。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田令,是关于土地的立法,规定诸男夫、妇人、奴婢、老小癯残、寡妇、诸宰民之官各类人等,依其身份占有田土的名义和数量的法定限额。这制度大体上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继承,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最后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 《颜氏家训·涉务篇》。

③ 《魏书》卷110《食货志》。

一个田令的颁布,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颁行而自动停废,历时近三个世纪。其间国家介入了农民和强宗豪族争夺土地的反反复复斗争。因《魏书》作者解释李安世首唱此议“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sup>①</sup> 历代又往往伴有“发使均天下之田”的措施,过去中外学者习称为均田制,这容易引起均分土地的误解。实际上,其基本的性质是荒田给授和限田,是迁就现实土地占有情况的登录以管理。田令关于把荒地按份额授给农民的规定,是带强制性的土地立法,对官僚限外占田和买卖土地,也是有制约的法律规范。渡边信一郎正确地强调:均田制到隋唐“只是为收取地租的名义制度”,<sup>②</sup> 从官方行为目的指出名义为均田的这一制度的实质。

最初北魏定田令时限制是很宽的,并不触动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任何地主的土地,对他们原有的土地均予承认,“桑田”即原有地不还不收,多于规定数额的田亩算在倍田里,超过倍田的部分也不准把桑田变露田没收。又不限奴婢数,而奴婢受田数从良。只是规定以后不准超过数额占田了,才有些限制的意义。最初的北魏田令对大族是有一些妥协的,以后各代田令内容变化,限田制的性质就越来越明显了。北齐时限制受田奴婢的数目,到隋时取消奴婢受田,限制已很严了。

田令原意并不是平均分地,这法令能执行得通也正因为不是平均分地。最初北魏实行均田,只是把一部分大族控制不稳的土地和人口转移到国家手中。这件事有很大意义。因为受田农民实际是自耕农民,中古社会生产力性质是个体生产,要求小私有制,但实际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这便可能是中世纪中国根本的社会

① 《魏书》卷53《李孝伯传附安世传》。

② 《中国古代社会论》,转引自气贺泽保规《均田制研究的展开》,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附录·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1页。



矛盾,但又是个不能解决的矛盾,因为整个社会情况不可能达到小私有制占优势地位,社会也不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不会发展成以农民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而是发展向资本主义。但自耕农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有重要的意义,田令实施后,名义上或实际上从国家受压的农民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到隋唐以后更大。与此相应的是普通的非身份地主的发展,首先在经济上取代了大族地主的地位,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生产组织、上层建筑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田令的实施对大族是一个打击,国家和大族有争夺,社会安定以后,国家只要稍微规范一下,减轻一些剥削,就可以把这些农民争取过来,使他们从大族的荫附人口,变成国家的编户。但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是革命行动,所以大族势力不是一击而溃,而是经历了一个几百年的衰落时期,到唐代才崩溃。

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又有了发展,社会情况也有了变化。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反映了生产技术有相当大提高的情况,涉及合理轮作、套种、施肥、选种、防治病虫害的知识。该书卷一《耕田第一》说:“今辽东犁,辕长四赤,回转相妨。”注又说:“今自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可知短辕犁已经出现。更早,在魏晋画像砖上的牛耕图中,已经全部是由一人操作了。<sup>①</sup>那时曾有过很长的一个大犁和小犁并用的时期,大犁用于垦荒芟草,小犁松土待播,作用有所不同而并存,也是因为那时候先进工具的推广要相当时间才能完成。而后结构完善的曲辕犁,至晚在初唐甚至更早即已出现,那是个体农户生产能力完全成熟的标志。考古发现迄今未能提供这方面更多更具体资料的原因,是因为铁犁农民世代沿用,坏了要熔炼改铸,铁器又容易烂掉,所以小犁现在不易发现。总之,在南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个体农户依靠小犁达到可以完成全部耕作的

<sup>①</sup> 参傅致《河西的犁》,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程度时,就要求改变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精耕细作也需要农民更高的主动性积极性,要求改变大族大量占有土地的情况。这就引起了社会一系列变化。更兼大动乱过去了,南方北方分别统一起来,社会逐渐安定,农民要求挣脱宗主的束缚,进行独立的生产。大族地主主要的基础彻底动摇了。

北魏颁布田令之翌年,又实行三长制。北朝初年实行宗主管护制,宗主是汉魏以来强宗大族充任的宗族首领,委以行使基层政权职能。有认为这是鲜卑带来的,即使与鲜卑有关,也是有内因为依据的,只有符合当地的经济情况才能实行。十六国时即有“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sup>①</sup>的情况,北魏时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sup>②</sup>“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sup>③</sup>为改变这种情况,在实施田令同时,北魏立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重建乡官制度以代替宗主管护制。在宗主管护制下,有些人虽然没有失掉土地,但他们要向宗主纳贡物,现在这些人转到国家控制下,三长制最初起过这样的作用,文明太后也正是出于“苞荫之户可出”<sup>④</sup>的考虑,批准了李冲这项引起长达一年争论的建议。三长制得以实施,也说明大族豪强开始衰落,和他们在东汉一代能抗拒度田的情况已不一样了。西晋的占田制也行不通,因为不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当时大族还强盛。当他们力量强大,处在发展时期时,就会反抗,不会让国家做到这一点。能不能控制农民,这是门阀经济的命根子。北魏田令实施不到40年,“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注称:“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后,大凡

①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② 《魏书》卷53《李冲传》。

③ 《魏书》卷110《食货志》。

④ 《魏书》卷110《食货志》。

户二百四十五万……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sup>①</sup> 这表明,门阀大族正在迅速失去控制农民的能力。当然,这一过程也是漫长的,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记魏、齐之际“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sup>②</sup>。这些最强大的门阀士族势力的消亡,仍是个跨世纪的社会工程。

还有租调制,北魏在实施三长制的同时公布实行,按一夫一妇为基准征收粟帛。以前户调田租按九品混通办法征收,高门大族往往把负担转嫁贫下户,现颁行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的较轻的租调额,吸引一部分荫户归为国家编民,这也是当时户口激增的一个原因。

新的租调制、三长制和田令结合,成为一配套的经济制度,国家通过户籍控制农民,依超经济强制手段来征收租调,所以实行这一经济体制的北朝、隋代到初唐,国家一直十分重视户籍计帐的编制,农民对国家依附性很强,受到徭役、兵役征发尤为酷重,但从农民自主生产的经营情况看,实际上又有相似于自耕农民的一面,定额租和生产上的自主性使之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上,新入主中原的北魏鲜卑族统治者用定族姓的办法来谋求与内地的门阀社会制度契合。太武帝神䴥四年(431年)诏举逸民,承认“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郡”,<sup>③</sup> 已略见笼络之意。稍后,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北方士族首领清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sup>④</sup> 再次推动。但崔浩修史犯讳,连累“清河崔氏无

① 《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② 引自《通典》卷3《食货三乡党》。

③ 《魏书》卷4上《世祖纪》。

④ 《魏书》卷47《卢玄传》。

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sup>①</sup>。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这场灾祸,使定族姓之事推迟了半个世纪,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才正式在鲜卑和汉姓中同时进行。“孝文帝定士族,以汉代官爵为主要标准,从而突破了‘士族旧籍’的限止,建立了新的门阀序列”<sup>②</sup>。

汉族门阀中,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等四姓与因李冲宠遇、遂与当世盛门的陇西李氏合为五姓,连同博陵崔和赵郡李为七家,是第一流高门,这直接影响到唐代的五姓七家,仍为最高门阀。四海大姓以下的诸州士族郡姓,诏宋弁酌定升降,分为甲姓、乙姓、丙姓、丁姓四等,也称四姓。

鲜卑来自代北,“代人诸胄,先无姓族”,此时新定,“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者,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sup>③</sup>诏书将鲜卑八姓比同汉姓第一流高门。在为鲜卑贵族功臣改汉姓的同时,又依其先世官爵确定姓族高低。

这项会起到巩固旧门阀制度的措施,已属落后保守的性质。但若是从缓和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说,有利于融洽汉族和鲜卑等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进而消灭民族差异带来的心理障碍,最终导致五胡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在隋初基本完成。孝文帝的这一系列政策,无疑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阶段的后一半,自西魏、北周到隋和初唐,掌握中央政权的,是陈寅恪先生名之为执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关

① 《魏书》卷35《崔浩传》。

②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

③ 《魏书》卷113《官氏志》。

陇军事贵族集团。<sup>①</sup>这个集团的核心,宇文氏和杨隋、李唐三朝皇室,都是武川系的军事贵族或其后裔,先世是北魏边镇的军将,“为清途所隔”,<sup>②</sup>定姓族时,被排斥在外,因而卷入523至525年的六镇起兵和525至528年的河北起兵,反抗朝廷的歧视政策。后来辗转入关,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被拥戴为领袖,建立并操纵西魏,自535年开始掌权。大统十六年(550年)府兵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制的确立,标志最终完成了这一军事集团的组建,直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王皇后一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摧垮,关陇集团失势为止,整个一个世纪,是关陇集团当政时期。

这期间,早已开始没落的南方士族,又经侯景之乱(548—552年)、江陵之破(554年)、隋平江南(589—590年)三次事变,更加衰败,人物扫地以尽。山东士族,经河阴之变(528年)、河北起兵和隋末农民战争,也是“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身未免于贫贱”。<sup>③</sup>唐太宗指斥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sup>④</sup>在此南北士族屡遭浩劫普遍衰败之际,关陇一隅略为平静,士族旧门稍得苟延,以鲜卑族和鲜卑化汉人组成的贺拔岳宇文泰军团入关,联合关陇胡汉世家大族组成关陇集团,给门阀势力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时在形式上强化了门阀统治,使之得以延续。

关陇集团中一批军事贵族世家实力强大,有机会就抢皇帝位置,内部争夺激烈。北周代西魏,隋禅北周,唐取隋,60年间三次改朝换代。但各大家族间又由错综复杂的姻亲故旧同僚关系牵连,争夺之余又彼此维护,尽管朝代更换,勋戚高门基址不坠。隋

①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② 《魏书》卷19上《广阳王琛传》。

③ 《唐会要》卷83《嫁娶》。

④ 《唐会要》卷36《氏族志》。

室宣诏：“前代品爵，悉可依旧。”<sup>①</sup> 唐以周、隋为二王后，享一品国宾待遇。<sup>②</sup> 关陇集团就是这样世代承袭保持下来，并且唐承隋制，隋承周制，兵制、官制、田赋等基本制度相互承袭。杨隋、李唐还都伪冒旧族，攀援名门，处在士族门阀还有崇高社会声望的环境背景下，观念、政策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印记，有因循保守的一面。但关陇集团的主要核心，包括三个朝代的皇室在内的军事贵族，不是典型旧门阀，十“禁婚家”甚至拒绝与之联姻。所以关陇集团虽是士族门阀政治的最后支柱，却不是门阀制度的忠实堡垒。表现在政策上便是既保守又有革新的两重性，思想上则既讲门第又重冠冕。他们内心深处对旧族高门每有不平，时时又情不自禁地攀附礼敬。这就是他们性格的矛盾表现。<sup>③</sup> 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多少怀旧感情，更多的是革新精神。他们的主要倾向不是代表过去，而是朝着未来。一面延续前朝的政策，承认门阀并谋求与之亲合；一面又不时在施政中表现出反门阀的新鲜内容。

比如那时的选举制度发生了由实际被士族门阀把持的九品中正制向隋唐以后科举制的转变。西魏时苏绰为宇文泰定国策六条诏书，其四“择贤良”有“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sup>④</sup>。“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sup>⑤</sup> 北周开始，“选无清浊”。<sup>⑥</sup> 隋文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继续有“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唐太宗又有发展，一步一步改变着。但唐高祖曾恢

① 《隋书》卷1《高祖纪》。

② 《唐会要》卷24《二王三恪》。

③ 参拙文《关陇集团的形成及其矛盾的性格》，载《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7月。

④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⑤ 《通典》卷一四《选举二》。

⑥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七年正月。

复九品中正制，<sup>①</sup>唐太宗又搞了一阵世袭刺史，不时又有反复。

这种矛盾和反复在唐太宗身上就很突出，典型反映在他对关陇圈外的山东人的态度上。他为秦王时，曾利用洛阳的陕东道大行台为掩护，密令张亮“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sup>②</sup>想依靠山东与太子、齐王抗衡。但对山东士族看不起靠武功起家的关陇集团，内心总是意有不平，反诘：“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待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sup>③</sup>看到高士廉等修撰的《氏族志》仍以山东高门旧族崔民干为第一等，他大为不满，又说：“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更命“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降崔民干为第三”。<sup>④</sup>但是，他“普责天下谱牒……撰为《氏族志》”<sup>⑤</sup>，事情的办法都是老一套，皇族为首，外戚第二，崔民干实际仍是最高等级。总之他既要贵官爵，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又要责谱牒，修撰《氏族志》，办这种事也是矛盾的。用人上，他比唐高祖有所突破，吸收一些山东士人甚至寒门出身的人进入权力中枢，比如魏徵、李勣、张亮、戴胄、马周等，但晚年又退回关陇集团的小圈子，只相信长孙无忌一伙，对李勣和已故的魏徵都排斥猜疑，反反复复的。

在从宇文泰（周文帝）、周武帝到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这批关陇集团最重要的首脑人物中，面对时代大潮，隋炀帝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炀帝即位，多所改革”。<sup>⑥</sup>他不仅创设了进士

① 《资治通鉴》卷190 武德七年正月。

② 《旧唐书》卷69《张亮传》。

③ 《贞观政要》卷7《礼乐》。

④ 《资治通鉴》卷195 贞观十二年正月。

⑤ 《贞观政要》卷7《礼乐》。

⑥ 《隋书》卷28《百官志》。

科,还有改勋官为散职,“制魏、周官不得为荫”<sup>①</sup>等官制方面一系列遮夺世袭特权的改革,<sup>②</sup>将取官权力向士子生徒和有德行功能的百官开放。在建设上,隋炀帝以开运河,建东都,改善道路交通等一系列大举措,卓有成效地推进国上开发,影响深远。在用人上,他突破关陇狭小圈子,任用山东人,特别是使用南方士人,以适应巩固发展新统一国家的政治格局。

直到最后,执政的关陇集团还有一段素称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政一度辉煌。而后未及腐朽,就在武则天崛起时戛然退出历史舞台。

陈寅恪先生十分看重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皇后、萧淑妃以后,立武后诏的发布,认为是“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武瞽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sup>③</sup>。张泽咸先生认为主张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唐宋变革论“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sup>④</sup>我们暂把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关陇集团统治终结的显庆四年(659年),作为阶段划分的标志。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② 参拙著《隋炀帝新传》15《改革官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6页。

③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④ 《“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



唐高宗显庆四年进入盛唐,经中、晚唐至唐亡(907年)的两个半世纪,是士族门阀经济、政治失势以后,处于向科举官僚政治过渡的后门阀社会阶段,也是中国中古时代内部的转型期。

这一阶段的前一个世纪,整个社会有一种从门阀旧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轻松感和自信心,挟带着空前的活力,创造出开元天宝盛世。为夺取皇后位而与王皇后一长孙无忌集团作殊死搏斗的武则天,在李勣的扶助下,成功地充当了门阀制度挽歌手的角色。为武则天洗雪“地实寒微”之耻辱的《姓氏录》,后族以下悉以仕唐高下为准,有力地清除着衰世旧门的社会影响。<sup>①</sup>而真正埋葬了旧门阀制度的,是业已成熟的个体农户的劳动生产力。唐朝前期长期存在的大量自耕农,包括为数甚巨的从唐太宗后期涌现的逃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耕农——以先进的曲辕犁为代表的小农家庭经济,创造的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2400市斤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占有700市斤粮食的基本可以温饱的生活水准,使部曲佃客对依附门阀地主的陈旧生产关系,和入籍农民对国家征收田租调绢及沉重的兵徭役的超经济强制,都不能再忍受,为摆脱而大量涌现的逃户表示了他们的反抗和追求。武周末年和唐玄宗初年的括户政策不能不承认了所在逃户就地安置的生存权,其意义在推动生产力横向扩展和生产关系由田令制向两税法的巨变。<sup>②</sup>全国耕地可能达到了总数7亿市亩、人均10市亩的规模。官制、兵制也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职能不同的各种使职差遣在武则天以后增多,<sup>③</sup>募兵也在开元年间取代了府兵的

① 参拙著《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8,34—36页。

② 参《均田——逃户/括户——两税》,载《平准学刊》第5辑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③ 参何汝泉《唐代使职的产生》,载《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征发。<sup>①</sup>北魏中期延续到初唐的整套制度都在调整变化中。

科举也伴随武则天首开殿试、南选而发展,南方各地士子破天荒地应试中第入朝为官,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高级官员发迹的主要仕途。<sup>②</sup>于是“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更兼丝路畅通,国威远扬,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一片光明中,李白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道出人们普遍的兴奋和信心。摆脱了门第羁绊的科举,表面上机会人人均等,造成个人价值升华的幻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把所有士人吸引向科场和文坛,却又因而冷落了科学,唐代的科技发展跌入低谷,种下后来中国落后的深刻危机。<sup>③</sup>

现实的直接危机,产生在长期的拓边政策改变的政治地图中,引发了新的对外关系和民族关系冲突。唐军终于在与大食、吐蕃的中亚争夺中失利而逐步后退,乃至河陇不保,京师失陷。<sup>④</sup>对南诏失抚也启开战争祸端。在隋唐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周边民族,实力均已今非昔比,于是广设权力很大的节度使以应付。朝廷财力不足支付兵募和募兵的军费,节度使借自筹的机会发展为割据势力。这内政边患连环性的演绎终于导致安禄山叛乱,渔阳鼙鼓惊破了霓裳羽衣曲和李白的梦。此后的大唐王朝在林立的藩镇之间勉力支撑,加上不断的派性党争和宦官之祸,中晚唐王朝在人们心中完全褪去了往日大唐的光彩。

其实,打破了表面的一统天下,优秀人才流向地方藩镇幕府,未尝不是个人和地区发展的一种新机遇。经济上,南方正是在这

① 其间还穿插既不同于前期的府兵制,也不同于后期的募兵制的兵募制,体现兵制处于过渡状态。参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论集》,天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② 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③ 参拙文《试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科学被牺牲的代价》,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④ 参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时赶上又超越北方而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地图。先秦以来封闭的都城制度也被冲破,打开了坊墙的阻隔。从洛阳、扬州开始,建设十里八里长街商业区的势头一发不止。汉唐之际延续千年的重章句训诂的汉学,向人文色彩较浓的宋学转化,现出了苗头。<sup>①</sup>奴婢劳动退出生产领域。没落的门阀后裔视为命根子的谱牒之学,大兴一时后终于被视同敝屣,先天以后官方不屑再修造官谱,<sup>②</sup>以至有“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sup>③</sup>之说。进士及第而免役的衣冠户取代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sup>④</sup>

下面我们不妨再从文化史心态史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因为汉代虽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原则,儒学却又在两汉先后崩溃中面临破产,那么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重建的文化心态又能如何反映那时代的特点呢?

中国自国家形成初期肇始的礼乐文明,经周公、孔子以降历朝历代不懈的努力,终于蔚为粲然大备的文物制度,构成礼仪之邦中国的一大景观。从文化史角度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中国,礼仪文化应是一有价值的视角,因为包括许多少数族政权在内的各政权,礼仪制度趋同的政策取向,展示了五胡民族与汉族融合和国家重新统一的历史发展大势。而一切历史轨迹又都呈现为文化的

① 见邓广铭师《略谈宋学》,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吴宗国《唐代的特性》,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

② 唐长孺先生认为唐代官修大型姓氏书只有贞观、显庆、先天三种,以后不再有官修之举。见上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86页。

③ 《通志》卷25《氏族略》。

④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

积淀,其根本内容是人们对自身价值追求的热情和成效所反映出来的人的觉醒与人权进步状况,这应是审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一个焦点。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礼仪文化

魏晋至隋唐近7个世纪间37个王朝政权<sup>①</sup>中,徙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建的便有22个之多,<sup>②</sup>还有如鲜卑化很深的汉人高氏建的北齐,和至少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的杨氏李氏建的隋唐,所以在当时的北中国深受胡风浸染。然而其时文化汉化胡化互动的主流,还是向以儒学为本体的传统文化复归和再造。从礼仪文化下述五个特征可以鲜明地体现这一文化走势,试分述之。

第一个特征:魏晋到隋唐历代礼仪制度的因循。

先是曹魏礼仪因循汉制,而后晋代礼仪又循魏制。黄初元年(220年)诏,郊祀朝会“宜如汉制”,晋初“郊祀权用魏礼”。这在《宋书》和《晋书》的《礼志》中有明确记载。

十六国与东晋、南朝与北朝对峙的分裂时代,南北无不因循制礼。

先说南方。动荡岁月,“江东草创,因循而已。”(《梁书·徐勉传》)但同时,随着西晋末以后大批士人南渡,“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隋书·牛弘传》)东晋南朝重礼仪制度有了条件。宋明帝驸马王俭,在齐武帝时领国子祭酒,大兴儒教,他将《礼论》三百卷抄为八帙,“朝仪旧典,晋末以来施行故事,撰次

① 十六国时期计入汉国、西燕、代国、冉魏、翟魏共21个政权,加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

② 匈奴族建的汉国、前赵、大夏、北凉,羯族建的后赵,鲜卑族建的前燕、代、后燕、南燕、西燕、西秦、南凉、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巴氏建的成汉,氐族建的前秦、后凉,羌族建的后秦,丁零建的翟魏。

谙忆,无遗漏者”。成为“当朝理事断决”的依据(《南史·王昱首传附王俭传》)。王俭本人虽未能完成五礼的撰集,但他“雅相推重”的何佟之,在他工作的基础上于梁武帝时纂成《五礼》,条目八千,卷帙浩繁。陈朝犹“多准梁旧”。(《隋书·礼志一》)

再说北方。最早建立少数民族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及其子刘聪已建太庙立神主,按汉族礼仪祭祖。刘渊族子刘曜,更“缮宇庙、社稷、南北郊”(《晋书·刘曜载记》),全面复兴礼仪。

五胡所立各国中,石勒的后赵最重礼仪。他在称王称帝之后,颇懂执政者的行为要有别于匹夫,方能“崇信于天下”,于是改变起兵初期肆意烧杀抢掠的“胡蝗”作风,留心文史,在胡汉分治下,依靠汉族士大夫,大兴礼治文化,“建社稷,立宗庙”,“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他临终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晋书·石勒载记下》)与《晋书·礼志中》所载魏武帝曹操的临终遗令颇为相像。石勒侄子石虎在位时还亲耕藉田,其妻杜氏祠先蚕,按传统仪式提倡农桑。鲜卑人慕容皝是前燕的奠基人,他在位时“渐慕诸夏之风”,吸引“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他大兴儒学,“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晋书·慕容皝载记》)。

北朝诸帝,最醉心于汉族礼仪文化的自是魏孝文帝。即位早年,他就很内行地讲“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定婚丧条格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贵族不婚卑姓诏》)后又强调“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魏书·高祖纪下》)。他先后发诏议定袷、明堂、太庙、圜丘和皇太子冠等重要礼仪,亲制祭恒岳文、祭嵩山文、祭岱岳文。“高祖稽古,率由旧则”(《魏书·礼志一》),他全面重建传统礼仪的热诚,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汉族君主。当时“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北史·王肃传》),王肃初仕南齐,其父被杀后于太和十

七年(439年)奔魏,传去南朝礼仪,是沟通南北礼仪的关键人物。<sup>①</sup>

鲜卑化很深的北齐诸帝时,搜聚礼仪,校写不缀,集大成为北齐《仪注》,后来隋代定五礼依为准则的。陈寅恪先生称:“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sup>②</sup>

唐代,“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贞观、显庆时陆续修礼,玄宗时纂成《大唐开元礼》,按传统五礼详分一百五十二仪,规模空前,对后世的礼仪影响巨大。但礼仪制度的建设到了这一步,繁琐之至,达到形式主义的极端,《新唐书·礼乐志一》亦称:“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断言“礼乐为虚名。”徒显其糜费财物,愚弄臣民,也把皇帝当作玩偶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特征:各政权按相生序择定五德和五行色。

《易·通卦验》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战国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汉书·郊祀志》),形成以土、金、水、木、火五德运转及与之相配的黄、白、玄(黑)、青、赤五行色为帝王嬗代之应的理论,秦汉以下历朝均定服色配德表示国运,解释朝代兴替。这种循环论虽充满神秘主义,但是各新建王朝都当成大事认真对待,无不推五运为自己在大地和中国历史上的合法排序定位。

秦为水德,服色尚黑。汉几经改动,定为火德,尚赤,这是“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继秦相克为土德,而按相生序“承周火为德”(《魏书·礼志一》)。曹魏土德,尚黄。晋初以“受禅有魏,宜一用前

① 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第43页。

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晋书·武帝纪》)后改为金德。南方的刘宋和北方的汉国、前赵均以承晋为水德,尚玄。往下,南齐木德,尚青,梁火德,尚赤。陈霸先建陈,诏书玺书一再声称“五德更运”、“五胜相推”(《陈书·高祖纪下》),承梁应为土德。

北方,前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苻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北魏在平城时代,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服尚黄”(《魏书·礼志一》)。入主中原后,孝文帝命议定五德,北魏当承苻秦为土德,还是承晋为水德,高间和李彪、崔光等发生争议,最后诏准群臣所议,以“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於理未愜……宜承晋为水德”(同上)。北周以木德承魏水德,服色尚黑。隋禅周,以五德相生为火德,尚赤。隋末突厥旗色白,李渊自太原起兵时,旗色尚赤尚白争论激烈,最后决定用绛白旗表示两从之。<sup>①</sup>李唐开国后,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

五行相生相克,可分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相生序列,和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的相克序列。邹衍似不仅用相生的五行序列解说盛行禅让的五帝时期:太昊伏羲氏木德,炎帝神农氏火德,黄帝轩辕氏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应为木德的帝喾之后,尧舜同为土德。夏商周三代以下,禅让制破坏,改以革命方式更替,朝代按土、木、金、火、水的五行不胜序列排列。<sup>②</sup>殆因此引起汉代一朝有水德、土德、火德三次改动的混乱。重要的是在魏晋南北朝各族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却在五德更始方式上一致按确认的相生序列排列,进入中原的各政权彼此承认自己是上一个政权的继承者,借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

① 参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102页。

② 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刘晓东《邹衍遗说研究》(未刊)。

五德终始说在此时能安抚人心稳定政治,产生一点正面效应。<sup>①</sup>

第三个特征:多个执政民族共戴炎黄为始祖。

魏晋南北朝时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多个民族,纷纷宣称自己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如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部自认其先出自炎帝,周孝闵帝宇文觉开国时,在《祠闾丘诏》中称:“予本自神农”,<sup>②</sup>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则“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晋书·慕容皝载记》),黄帝公孙轩辕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建立代国和而后的北魏、东魏、西魏的鲜卑拓拔部(元氏),自以为“国家继黄帝之后”(《魏书·礼志一》),是“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嫫祖所生第二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帝纪序记》)。除鲜卑外,还有如后来称帝的汉王刘渊,认汉室为祖宗,明言:刘邦“是我祖宗……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而祭之”(《晋书·刘元海载记》)。其实刘渊是“匈奴人,冒顿之后……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同上)。这样以外家为祖先供奉於宗庙,按传统礼仪是很出格的,透露出愿与汉族靠拢的心态。看来,当时的匈奴、鲜卑等族,在传播一种与汉人虽异族而同根的有趣观念,在作消减隔阂以求亲合的努力。也许这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即有许多古代民族经过汉化进入汉族,又有许多汉人经过胡化加入了少数族,胡化汉化,进进出出,反反复复,民族之间生活习俗乃至血统都有交融,以至迄今中国存在的数逾半百个民族,不少还共有同是炎黄子孙的观念,在这基础上加强了同是中华民族的心态。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无疑是先秦以来陆续发展的这种独特的富有凝聚力的大民族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① 参拙著《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中编《礼仪的沿革》第九章《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胡汉礼仪的会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全后周文·孝闵帝》。



第四个特征：历朝政权尊孔行释奠礼。

重学尊孔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之一。官方祭孔始于汉高祖时。汉末王莽当政，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封其后人为褒成侯，孔子始有封爵，后人始有袭爵。魏文帝仍以孔羨为宗圣侯，奉孔子祀。南方六朝，以孔子为先圣。历代皇帝、皇太子往往亲自释奠于太学或国子监表示崇德劝学。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年）诏奉圣亭侯孔巖四时祀孔子，为四大祭之始。北朝皇帝也多尊孔。《魏书》的《太祖纪》、《世祖纪》、《高祖纪》俱载诸帝祀孔子情况。其中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年）立孔子庙于京师，为京师立孔庙之始。太和十九年（495年）在完成迁洛和汉化政策最关键的时刻，孝文帝还曾往鲁城（今山东曲阜）亲祠孔子庙，起园柏，修饰坟垅，宗子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显然这也是推行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北齐文宣帝重申了这封崇圣侯邑一百户的政策，北齐并定制，每月旦国子、太学、四门和郡学师生拜孔揖颜，为朔日行礼之始。周宣帝更有《追封孔子诏》，封孔子为邹国公，邑数准旧。<sup>①</sup>

“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於先圣先师。”（《隋书·礼仪志四》）“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新唐书·礼乐志五》）这在初唐两度引起争议，贞观和显庆又两度复升孔子为先圣。武则天时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下制，追谥孔夫子为文宣王，其后嗣为文宣公，这是孔子身后封王之始。

由上述历史可知，孔子正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由各族统治者层层加封，被抬举到高踞紫王荣位的荣耀顶峰。

在文化史上相应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时许多帝王本人好学，有很高的儒学文化素养。曹操、曹丕、隋炀帝、唐太宗这些汉族帝王自不用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少数民族皇帝。《晋书》的载记称

<sup>①</sup>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全后周文·宣帝》。

刘渊“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皆诵之”。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於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识字有困难的石勒则“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魏书·高祖纪下》。称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读涉……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周明帝在《大渐诏》中自称“性好坟典”。<sup>①</sup>

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文化的认同比祖先的认同更具凝聚力。随着国内少数民族自上而下普遍接受儒学，将孔子当圣人膜拜，终会引起文化心理的趋同变化，明显的后果之一是华戎夷夏观念的调整，试在下文论析。

第五个特征：正统地位的争夺和夷夏观念的改变。

秦汉时代中国奠下大一统的传统。三国分裂，分立的魏、蜀处心积虑争说自身的正统地位。十六国以后，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也不甘寂寞，竞相模仿，声明自己为正统。刘渊建国，“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以改变“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大耻未雪，社稷无主”的情况为己任（《晋书·刘元海载记》）。上文五德终始一节所述刘宋与刘汉、石赵竞以自己承晋定为水德，亦可见争正统位之意。南北朝分裂的南北政权，互相诋毁为“北虏”“岛夷”而自诩为正统。梁武帝大力整备传统礼仪，使东魏丞相高欢忧心忡忡：“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资治通鉴》卷157）稍早的态势应如陈寅恪的断言：“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

<sup>①</sup>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全后周文·明帝》。

之所萃。”<sup>①</sup>高欢担心的正是这种平衡的打破,代表正统的文化优势南倾。隋文帝开国后多年,终于从南方寻得他认为的“华夏正声”(《隋书·音乐志下》),弥补了作为礼乐文明正统的缺憾才松了一口气。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夷夏观念的变化和进步。

夷夏之辨自先秦以来持续了一二千年。这时期开始时,许多人犹持传统的夷夏观念,孔恂、杨珧在同晋武帝议及刘渊时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晋书·刘元海载记》),即是一例;西晋太子洗马江统主张对境内夷虏“申谕发遣,还其本域”的《徙戎论》,又是一例。尔后人们反省血腥民族仇杀的惨痛经历,在传入未久的佛教慈悲为怀教义的催化下,包括刚刚放下屠刀的一些十六国君主在内,开始萌生消除民族隔阂的觉悟,并作出种种转变种族观念的努力。前燕奠基人、鲜卑大单于慕容皝曾规劝高瞻:“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高瞻》)魏孝文帝则说:“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魏书·高祖纪下》)这一类议论,最精彩的是隋代大儒王通见载於《中说》的言论:“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他还说:“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他的编年史《元经》承认北魏的正统地位,比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按东晋南朝系年,不承认北朝正统的史观开明多了。王通甚至为与晋室争天下的苻秦辩解,驳斥所谓“苻秦逆”的论调:“晋制命者之罪也,苻秦何逆?……晋制至私之命,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

<sup>①</sup>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白远而至,猛之力也。”由此可知,隋唐时“胡越一家”,唐太宗对中华、夷狄能“爱之如一”,被尊为“华夷父母”,是魏孝文帝、王通等进步思想积累的历史硕果。作为十六国以来改革的时代主旋律的“变夷从夏”(《晋书·苻坚载记下》),发展到突厥启民可汗对隋炀帝有“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的请求(《隋书·突厥传》),入唐更有“华心论”,形夷而具华心者即被视为华人。陈寅恪先生指出,这一观念变化在北朝时已完成,他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sup>①</sup> 本文循陈寅恪先生这“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sup>②</sup> 的思路溯魏晋南北朝,庶可触及那数百年历史运动的底蕴内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只是为此曾付出了那么漫长的痛苦和千百万生灵性命的昂贵代价,不能不令人又万分感慨和遗憾。

###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 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

时代的进步意味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物质的和精神的——不断的拓展。人们不断地发现着和发展着自己。从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到心灵自由、行动自由的追求,和为实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奋斗,展开了历史的长卷。

从心态史的角度,我们当如何为魏晋隋唐时代定位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先进的知识层,正在努力突破神学和经学的羁绊,不甘再做神坛和社稷的祭品,为找回自己做人的自主尊严,

<sup>①</sup>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同上引书第1页。

向焚坑党锢的暴力肆虐和神巫儒学的人心奴役抗争冲击,这是中国人“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的时代,“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sup>①</sup>表现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sup>②</sup>

无法走出东汉后期党锢惨祸阴影的士子们,忘不了陈蕃、李膺、范滂被囚死的教训,以仁为本,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被奚落和粉碎,动摇了对儒教的信念。珍重生命成为建安文人创作的共同主题。纵如潇洒脱凡的曹操,也不禁会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苍凉感。然而他不仅敢任用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辈,还大胆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求个人的成功,全不在乎时人对他是治世能臣或是乱世奸雄的评价。在儒学正统文人史官笔下,曹操自然只能是一个白脸的角色。

顺便说到诸葛孔明,则明知不可而强为之,五出祁山,不惜拚耗掉蜀国有限的国力也要成全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名节。在人生追求上,他实际与曹操是殊途同归的个人英雄主义。

三国之中,倒是既无天子可挟,又无皇叔可恃的孙吴,远离了正统地位,却更知道发扬人才群体的优势,以求在与魏、蜀搏击中生存。孙策、孙权敬礼名贤,优渥俊杰,人才在孙吴备受信任尊重与爱惜,择君而 from 的张昭、鲁肃、周瑜、黄盖辈各尽其能,共护大局。在官渡、赤壁、夷陵三大战中,曹、刘皆有败绩,而唯独孙吴参与的两战皆胜,且孙吴在三国中享国祚最长。<sup>③</sup>正因为这时三国竞争,人们发现和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人的觉醒”时期,所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9—90页。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而已集》。

③ 此节参卢华语《试论孙吴人才群体的特征及效应》,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123页。

以一部说人的历史的三国,千载以下读之,仍令人唏嘘不已。

解除了三国对峙压力,实现了统一的西晋,迅即肆无忌惮地走向全面腐败。再兴的世家大族强化门阀政治,到东晋时最为典型。在门阀制度下,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一大批人才因出身门第被阻断了仕途。晋室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权力恶斗,演成贾后专权、八王之乱。不断的人事倾轧使朝中人士随时面临杀身之祸,激化的民族冲突也在身边引发,人们普遍看不清前途而怀有一种空虚幻灭的绝望。“且趋当生,奚遑死后!”一种失去建安风骨的醉生梦死和堕落情绪在弥漫。代表时代良知的士子知识人,又开始了孟子之后新一轮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具体就是玄学家们组成一个个名士集团,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探索。

魏晋名士思索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即社会责任与自身价值统一的新的人格定位。促使他们作此思考和转变的背景,不仅是恪守儒家信条的东汉名士惨遭党锢之祸的痛苦记忆,使传统儒学失落了其政治理想和道德精神的魅力,还因为东汉经学的衰微,“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sup>①</sup>,“一经说至百余万言”<sup>②</sup>,在社会上失去了吸引力。为走出经学繁琐自蔽的末路,一代代学子名士把眼光投向诸子百家学说,用道家“三玄”《周易》、《老子》和《庄子》中天理人性自然原则的“道”,补充或修正儒家名教的伦理政治,逐渐形成儒道兼宗的双重人格,作为安身立命的依归。在东汉名士、魏初名士之后,由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和江左名士依次建构了关于理想人格的“道本儒末”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模式,“内圣外王”模式,“三教互补”模式。<sup>③</sup>

① 《汉书》卷3《艺文志》。

② 《汉书》卷88《儒林传·费曰》。

③ 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下篇《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生活在东汉末和魏初的曹氏父子，魏初名士，以慷慨悲凉的情怀，表现他们摒弃名教精神失落的痛苦。打着赤壁大战又吟着《蒿里行》的曹操，内心矛盾彷徨，只能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排遣。郁郁不得志的曹植，除了作同根相煎的悲鸣，还屡作《九愁赋》、《悲命赋》，在《释愁文》中借“玄虚先生”之口指点迷津，明言病愁之发生，是因“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治疗用“无为之药”、“澹泊之汤”、“玄虚之针”、“淳朴之方”，与王乔、黄公、庄生、老聃为伍，于是“众愁忽然不辞而去”。<sup>①</sup> 东汉末以来滥觞的名士对道家自然主义的朦胧追求渐趋明朗。

初步完成魏晋士大夫理想人格构建的是曹魏中期的正始名士。作《老子注》的王弼持“名教”出于“自然”说，调合儒道二家形成玄学。他崇尚无为自然，奉自然为“无称之言，穷极之辞”<sup>②</sup>，又说“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sup>③</sup> 主张放纵感情遂其本性，但绝不放弃统治秩序，被视为是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相结合的“道本儒末”说。当时声誉很高的夏侯玄是正始玄风中实践这种儒道兼宗理想人格模式的典范，他一面宣扬“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sup>④</sup>，一面又主张用人以孝行、仁恕，须“义断行于乡党”。<sup>⑤</sup> 司马懿父子兵变夺权，何晏、夏侯玄均遭屠杀，天下名士减半，正始名士的人格追求被残酷的现实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竹林名士。

① 《艺文类聚》卷35，并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三国文·陈王植》。

② 《老子·二十五章注》。

③ 《老子·三十二章注》。

④ 引自何晏《无名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三国文·何晏》。

⑤ 《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

竹林名士改持“越名教而任自然”<sup>①</sup>说,“非汤武而薄周孔”<sup>②</sup>的嵇康被世人尊为英雄,他“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宗朴,养素全真”<sup>③</sup>,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之游,被称作“竹林七贤”<sup>④</sup>。他们散发裸裎,肆意酣畅。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幙,诸君何为入我幙中?’”<sup>⑤</sup>说别人进他屋是跑进他裤裆里。阮籍更在其《大人先生传》中,以“群虱处于裈中”来比喻“君子之处域内”的境况,“自以为远祸近福”,而一旦遇灾,“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sup>⑥</sup>是对名教束缚人性残害生命的警告,与《法华经·譬喻品》的三界火宅故事异曲同工。

名士逸入竹林,是逃避现实的象征。当时司马氏当权,一方面对名士屠戮有加,嵇康亦被刑于东市,一面又标榜以孝治天下,原因如鲁迅所揭示:“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是要孝治天下。”<sup>⑦</sup>足见其虚伪。愤世嫉俗的竹林名士,一反文人儒雅风度,放浪不羁,借以排遣烦闷。竹林七贤袒胸赤足的形象被图画后供奉于阳间阴世,<sup>⑧</sup>显然他们的行为已不是个人的疯癫,正感召着一代代名士群体进行不合作的抗争。其中阮籍对现实的批判已直指君权和礼法:“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

① 《嵇康集·释私论》。

② 《嵇康集·与山巨源绝交书》。

③ 《晋书》卷49《嵇康传》。

④ 《晋书》卷49《嵇康传》。

⑤ 《大人先生传》。

⑥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三国文·阮籍》;又见《晋书》卷49《阮籍传》。

⑦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91页。

⑧ 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初年墓竹林七贤砖画。



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日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sup>①</sup> 阮籍明言：“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sup>②</sup> 为鲍敬言《无君论》的先声。

逃避现实而追求精神超越的人生模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竹林七贤发生分化，向秀在嵇康被诛后出山应岁举，忍受司马昭的辱问：“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sup>③</sup> 回到官场。和山涛、王戎一样抛弃“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实践，又主张“以儒道为一”<sup>④</sup>，协调名教与自然，为社会建功立业与个人精神超越的矛盾，为郭象进一步完善为“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sup>⑤</sup>

郭象为西晋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他用名教即自然说来铺叙他的“内圣外王之道”<sup>⑥</sup>，认为维护皇帝专制制度和尊卑有序的伦理关系的名教，是自然最好的表现，盛赞“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sup>⑦</sup>，“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sup>⑧</sup>的“圣人”，“将强调个体精神追求的道家学说（内圣）与强调社会规范秩序的儒家学说（外王）不分彼此地糅和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sup>⑨</sup>，设计了既能涉足齷齪的政治，又能纵情享受人生，使门阀贵族倾心的生活方式。从中可以看到，魏晋士人的人格追求，终究还是屈从现实政治的压力，作了扭曲和修正。后来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积极入

① 《大人先生传》。

② 《大人先生传》。

③ 《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

④ 参见谢灵运《辨宗论》。

⑤ 参《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第三章《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同前引书，第121页。

⑥ 郭象《庄子序》，载《二十二子·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见同书第84页。

⑦ 《庄子》内篇《逍遥游》注，同上引书，第14页。

⑧ 《庄子》内篇《大宗师注》，同上引书，第30页。

⑨ 同前引《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第125页。

世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和人格特征,影响直至明清。

魏晋士人的“觉醒”,转了一圈又回到老庄那里找灵感,从他们的思想库里取来“内圣外王之道”,用“以儒道为一”之方重申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生诉求。最后由葛洪、张湛更进一步的“三教互补”论收尾。汉代经学之后,魏晋的清谈名士创造的辉煌一时的玄学就此止足,而后直到宋代才有理学问世。其间出现大段空白。相比之下,南北朝、隋唐士人的理性思维显得十分苍白,比较重要的只是佛学流行引起三教互补到合流理论模式的再探索,结果援佛入儒成为共识,三武灭佛再三的对佛教毁灭性打击也不能阻断这一文化进程。当然主流思潮是儒学的全面复归和振兴,为尔后理学的创立准备条件。

隋唐虽然除了佛学的传扬外提不出一个什么学来与玄学、理学并列,但尽管资料零星,还是有一些探索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问题的可贵积累。

隋代王通,向隋文帝上太平之策,不用,遂还河东论学任教,创立河汾学派。他被尊为大儒,但认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sup>①</sup>,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sup>②</sup>。虽然王通以全面振兴儒学为己任,因此被批评为复古保守派,但如上文引述,他承认苻秦、元魏等少数族自治权,表现出政治上的开明;“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sup>③</sup>,更将他要使“生民有庇”的政治理念具体化到对每一个生命的重视。显然,在王通那里,对人的生存权的尊重,已是他政治思维的一个出发点。

隋唐之际,以开设进士科为标志科举制的确立,扩大了社会中

① 《中说·周易篇》,见《二十二子·文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8页。

② 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③ 《中说·天地篇》,同前引书第1312页。

下层人士的从政权,包括以前被九品中正门阀制度排斥的寒士在内,广大士子可以通过比较公平的考试竞争加入仕途,唤起了一代读书人仕进的热情。“致君尧舜”成为魏徵、杜甫辈最高的人生追求。表面平等的竞争带来仕途的一片光明,使李白产生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然而唐太宗诱使士子“入吾彀中”的初衷,道出隋唐统治者行科举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士人思想行为的控驭,于是很自然的用刊定《五经正义》,恢复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学传统经学来规范科举考试,扼杀思想的活泼和创造力。自信的李白失望了,“长安不见使人愁”,再生了一付魏初名士的愁肠。“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杜甫,更无法以杜康解忧。杜甫终于在盛世末年幼子饿死和安史之乱中长安国破的双重痛苦中醒悟,实现人生意识的飞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sup>①</sup>,“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sup>②</sup>,奉献给人们伟大的人道精神与和平理想。

唐后期,士子“多以从诸藩府辟署为重”<sup>③</sup>,对中央朝廷失望的许多士人离开京城,涌向外地,去物质待遇较丰的藩镇任职。<sup>④</sup>这成为一时风气的个人行为,表示人们摆脱了对一个没有希望的中央王朝的愚忠观念,到地方上去追求自己的发展。当然其中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存活下去,而不是如何为实现有价值的人生而斗争。

真正有思想理论意义上建树的,是写出《原道》、《原性》、《原人》的韩愈和写出《复性书》的李翱,他们在整个唐代真如凤毛麟角。

①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② 《洗兵马》。

③ 《容斋续笔》卷1《唐藩镇幕府》。

④ 参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9页。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sup>①</sup> 韩愈比较容易地从孔子的泛爱讲到博爱，但是随佛教传入的平等、自由观念，却很难纳入他依孟子之学建立的儒学道统。于是他把“与生俱生”的“性”解释为伦理道德的仁义礼智信，规范束缚起来，否定其自然的天性。李翱修正韩愈《原性》中提出的这性三品说，主张“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sup>②</sup>，复“道德之性”的代价，是克服“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为此要诚意、正心、修身，目的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韩愈、李翱反对佛教，实际上对佛理有所吸取，是以儒学为主干，合流三教，作为一种权威思想来统治人们的心性，这些想法深深烙上了官方需要的印记。

在隋唐科举制的引导干涉下，儒学向章句之学的经学回归。纵有繁荣的诗词歌赋点缀，知识界对中国人的进一步觉醒和进步，没有提供相应有价值的东西，显示那个时代理性思维的贫乏。韩愈、李翱的努力，只是为在宋代完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作了铺垫。

在旧的门阀时代遗痕被涂抹干净的唐宋变革中，中国历史步入中古后期，那是一个职业科举官僚政治时代。与前期的重大区别，是再没有一个世袭的可以依据氏族门第维持自己优越社会地位，甚至与皇帝抗礼分权的门阀存在。在租佃制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长期滞止不前的基础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传统体制在明清时日益强化，而皇帝独裁权力更加强大。以前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为王者师的卿相，先失去座位，再由站立变为跪伏，口称奴才。整个中华民族失去了汉唐的魄力精神，自 15 世

① 《原道》，《全唐文》卷 558《韩愈》。

② 《复性书》，《全唐文》卷 637《李翱》。

纪初由世界先进地位上滑落下来,直至结束了中古时期进入近代以后都无有转寰。终于有“五四”运动力挽颓势,旗帜鲜明的民主与科学作为 20 世纪中国人的追求,标志中国历史进入向现代文明迈进过渡的伟大历程。

### [附记]

本文第一部分《秦汉隋唐间的历史大势》,据业师汪篾教授于 1961—1963 年在北京大学授课的内容为基础写成,曾提供给 1996 年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对先生不幸逝世 30 周年的悼念。续补后两部分,礼仪与人格追求,内容俱是初习;冒昧借重多位学界朋友的精彩论述,只是希望从文化史、心态史方面能对隋唐时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谨求正于'97 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各位与会专家。

1997 年 7 月 10 日求正稿



## 简论唐史研究

历时二百九十年的唐朝，曾是震熠东方的少数强盛王朝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一系列重大变革发生的时期。这些变革包括：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的转变，从世袭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的转变，农民身份由部曲佃客制向契约租佃制转变。具体有如均田制、租调徭役制、府兵制的瓦解，地主庄园和小农私有土地发展，两税法的确立，职业兵的出现和坊市制度的废弃，并通过胡汉民族文化融合和几经反复后，按儒学为主，佛、道、儒并立的格局，改铸了中国传统文化，全国政治中心由西向东的转移和财政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这一系列变化，唐代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中古社会前后期的转折点。它那承前启后创新开拓的历史变革和威武雄壮动人肺腑的历史悲喜剧，千百年来吸引中外历史学者瞩目。

唐代历史的整理著录，自唐朝建立之时就开始了。迄今为止，或许可以粗略地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 一、唐宋之际，着重史料的编纂；
- 二、南宋元明清，着重史评，最后转向考据；
- 三、20世纪以来，着重专题的耙梳研究。

至于在更宏阔的层面上，展开对唐代物质与精神、环境与人统一的总体研究，形成学派的争鸣，还有待于90年代的酝酿和21世纪的努力。

## 一、唐宋之际唐史的编纂

唐朝建立伊始,温大雅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实录自晋阳起兵至唐朝建立的历史。而后定制,起居郎逐日记录历代皇帝活动为起居注,起居舍人汇编制诰德音。则天朝又创制,宰相随时记录军国大事为时政记。德宗、武宗、宣宗等朝延续此制。在这些基础上,史馆按月撰定日历,陆续修起高祖至武宗的十一朝实录,勒成纪传体国史(止于肃宗乾元)和唐历、续唐历(止于宪宗元和)。这些官修史籍,保存到五代北宋虽已不完整,仍为官修两唐书的基本依据。

唐代还陆续撰成一批关于典章制度的典籍,重要的有《唐律疏议》(653年)、《大唐六典》(738年)、《会要》(德宗)、《续会要》(853年)。后两部书成为宋初成书的《唐会要》的基础。另外,唐代还留下了《贞观政要》(720年?)、《大唐新语》(807年?)一类政论书,《大唐西域记》(641年)、《括地志》(641年)、《两京新记》(722年)、《元和郡县图志》(814年)一类地理书,《元和姓纂》(812年)等姓氏书和《法苑珠林》、《安禄山事迹》、《朝野僉载》、《隋唐嘉话》、《桂苑笔耕录》等不下四五百种具有相当史料价值、认识价值的杂史笔记小说,又有殆以万数计的石刻碑志资料,五万首唐诗。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710年)也在唐代问世。

五代和宋撰成了《旧唐书》(945年)和《新唐书》(1060年)两部正史,诞生了附有考异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1084年),还有《太平御览》(977年)、《太平广记》(978年)、《文苑英华》(986年)、《册府元龟》(1013年)等官修的四大书编纂成功。这些书保存了包括实录、国史在内的大量唐史原始资料,通鉴更是鉴戒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作。

五代、北宋陆续编成的还有《唐摭言》(954年)、《唐会要》(961

年)、《唐文粹》(970年)、《唐大诏令集》(1070年)、《长安志》(1079年)、《唐语林》(1110年)等书,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唐史的资料,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唐代史料的编纂,并借初兴的活字印刷成书保存下来。

唐宋之际五百多年,上述体裁丰富的史学著作,除了史料价值外,代表史学理论和鉴戒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史家逐渐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而颂扬明君政治,强调史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经世明道的现实作用,以史为镜。不过以两唐书纪传的“史臣曰”和通鉴的“臣光曰”为代表的史论,还只是停留在君臣明暗、忠奸顺逆、治乱兴衰上发议论,鉴戒史学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的困惑,并不能给现实的历史运动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这道理大概应该翻过来,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生产简单重复造成社会发展在周期性兴衰中迟滞,局限了史家的眼光陷于循环论中不能自拔。

## 二、南宋元明清的唐史走向考据

南宋及元明清不到八百年为唐史整理研究的第二时期。总体来看,除了李贽等个别人的思想不时见闪光的火花外,史家群体因为思想观念陈旧僵化,仍停留在鉴戒史学上,大多只是发表一些随感式的议论,作君臣大义的说教和盛衰兴替的叹息。

史料方面,由于连续的民族冲突引起政权迁徙更迭,唐代留下的原始档案实录国史陆续散失殆尽,各种图籍在女真的靖康之灾(1126年)和蒙古的绍定之祸(1228年)中大量毁损,因此史料的编纂再无北宋时的规模。但得力于印刷术的初步发展,仍有一些有价值的类书、丛书刊行。收有唐史资料的,比如南宋的《玉海》(1256年)、《百川学海》(1273年),明代的《说郛》(1368年)、《永乐大典》(1408年),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707年)、《四库全书》(1782年),分别保存了许多佚书、罕见书和初刻本的珍贵资料。



尤其是清代汇编的《全唐诗》(1707年)、《全唐文》(1814年),给唐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此外,石刻碑志和佛道经典的整理出版,丰富了历史研究资料,前者如《金石录》(1132年)、《金石萃编》(1805年),为史家习用。佛教和道教经典的全书,在唐代已有初编,传世的南宋碇砂版与清版的多种《大藏经》和明刻《道藏》中,也可沥出独家的唐代史料。

这阶段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是十通的完成。前面三通,除唐代撰成的《通典》外,南宋的《通志》(1161年)、元代的《文献通考》(1324年),是研究唐代制度有用的政书。此外,南宋《通鉴纪事本末》(1175年)以事件为中心重新组织通鉴的材料,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后,开创了方便理解事件来龙去脉的纪事本末体,成为传统史学的第三种新体裁。地理书中,清代《读史方輿纪要》(1774年)经纬史地,瞻前顾后,对了解历史活动的地理环境颇有裨益。朱墨两色套印古今地名对照的《历代輿地图》(1906年)可满足“左史右图”读史习惯的需要。

有关两唐书的著作有《新唐书纠缪》(1138年刊)、《新旧唐书杂论》(1488年?)、《新旧唐书合钞》(1736年?)、《新旧唐书互证》(1821年),考究两唐书异同。对唐代历史评论性的意见,北宋仁宗时的《唐书直笔》和《唐鉴》(1180年)等书中已有反映。此时这类书更多,如南宋的《唐史论断》(1157年)、《郡斋读书志》(1165年)、《容斋随笔》(1180年),元初的《困学纪闻》,明代李贽的《史纲评要》和《藏书》(1599年),以及《金薤琳琅》、《纲鉴合编》、《历代史论》,清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1687年),以及《十七史商榷》(1787年)、《陔馀丛考》(1790年)、《廿二史札记》(1795年)、《廿二史考异》(1796年)。其中李贽、王夫之的史论,历来为人称道。另外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1810年)和《唐登科记考》(1838年),对资料做了细致的钩稽排比。只是明清以降,随着学案文字狱迫害的加深,文人钳口,如李贽那样,能看透“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

有是非”的学者,真如凤毛麟角,唐朝可以指陈当今皇上的言政自由,成为依稀的历史记忆,学问家们埋头故纸堆作考据,不敢干预世事,轻言是非,鉴戒史学有过的一点可怜的锋芒,也黯然隐销。虽然乾嘉学派坚实的考据功夫对后来的学术有深远影响,但整个史学像所有御用的学问一样,在皇帝专制时代覆灭的黑暗前夜,万马齐喑,久久徘徊彷徨在穷途末路上。

### 三、20世纪前半叶唐史研究在争鸣 中新的起步和两起两落

这阶段的学术一开始便得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便是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遗书的发现,唐史研究意外地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罗振玉、孙毓修、刘师培、王国维、刘半农、陈垣、陈寅恪、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等著名学者纷纷研究这些写本,完成的许多论著是与唐代相关的,如《唐写本公牒契约考》(1911年)、《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补唐书张义潮传》(1922年)、《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1943年)。韦庄的咏史诗《秦妇吟》失传千年,传抄本藏在遗书中得见天日,使黄巢起兵时代不少史实大白天下,王国维、罗振玉在1923年和1924年都发了专稿研究,而陈寅恪的《韦庄秦妇吟校笺》(1936年)公认校勘最精,是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一个范例。

总数达四五万号之巨的敦煌卷子,很大一部分是唐代写本,佛道宗教经卷之外的世俗文书和石窟画塑资料,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唐代社会的真实情况。诚如郑振铎所说:“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作一番窥探的工夫。”唐史与敦煌学为交叉学科,更能相得益彰。如今中外治唐史者,无不十分重视敦煌的资料,广泛利用敦煌学的成果。

由于铅字印刷代替木石印的技术进步,20世纪报刊杂志业兴

起,学术交流有了阵地。发表唐史方面论文的主要刊物有《国粹学报》、《食货》、《禹贡》、《学衡》、《史学杂志》、《史学年报》、《东方杂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及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女师大、中法、金陵、中山、岭南、厦大等大学的学报,还有《天津益世报》、《中央日报》等报纸。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隋唐史研究室编的《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统计,自1900年至1949年9月报刊文集发表的大陆学者唐史论文(除诗词文学语言文字部分)1082篇,前20年共12篇,只半数年头有一两篇;20年代共98篇,由每年二三篇增至一二十篇;30年代共467篇,先是持续上升,在1935年、1936年达到105篇和104篇的高峰,但随即在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1939年大跌为10篇和9篇,退到十年前的低水平。40年代共505篇,其间1943、1944年和1947、1948年有两个小高峰,分别达到69篇、71篇和85篇、76篇,但未达到1935年、1936年的水平,并又在1949年猛跌为8篇。半个世纪里两起两落,显然是与抗战和内战的局势相关。

这阶段里,唐史研究已比较广泛地涉及许多方面的专题,诸如唐代经济的均田、庄园、雇佣劳动、灌溉、租庸调、杂徭役、田赋、户税、两税、商税、盐法、茶、专卖、财政、货币、钱荒、官私工业、矿业、陶瓷、商业、市、邸店、牙人、胡商、市舶司、都市、西京、广州、扬州;唐代社会的农村、农民、贱民、官户、奴隶、氏族、户籍、户口、逃亡;唐代政治的官制、科举制、地方行政制度、官品、俸钱、内外官待遇、藩镇、宦官、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安史之乱、会昌灭佛、黄巢暴动、边政、边功、边患;兵制的府兵、镇兵、折冲府、都督府、屯戍烽燧;法制的唐律、唐律疏议、继承法;人物唐太宗、长孙皇后、武后、唐玄宗、唐代宗和许多文人;民族研究中以突厥、南诏、吐蕃论文最多,兼及回纥、高昌、吐谷浑、西突厥、渤海、契丹、党项、蛮族和胡化、降胡、天可汗、松赞干布、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阙特勤碑、慕容

氏墓志、会盟碑；唐代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哲学、经学、儒学、佛学、禅学、韩愈、李翱、学校、学制；宗教的佛道之争、净土宗、法相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佛寺、寺院经济、法华经、译经、道教、袄教、回教、景教、摩尼教、慧能、义净、鉴真、皎然、空海、僧伽，有关玄奘的论文在 20 篇以上；还有关于城址、墓葬、陶俑、铜镜、碑刻和敦煌的许多考古论文；艺术方面的绘画、雕塑、书法、乐舞、百戏；史学的史馆、实录、起居注和涉及两唐书、通鉴等许多史籍的研究。另外，有关于唐代文学和文学家的论著约五百种。

这前半半个世纪里刊印的唐史专著不下 150 种，有如《唐代的科举制度》（1933 年）、《唐代社会概略》（1936 年）、《唐律通论》（1944 年）、《唐宋帝国与运河》（1944 年）、《唐代之交通》（1944 年）、《李世民》（1936、1945 年）、《武则天》（1948 年）、《郭子仪》（1925 年）、《张义潮传》（1915 年）、《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1915 年）、《唐书注》（1935 年）、《新唐书斟议》（1936 年）、《唐代文献丛书》（1947 年）、《元和姓纂四校记》（1948 年）。鞠清远经济史方面的论著甚丰，他的《唐宋官私工业》（1934 年）、《唐代经济史》（1936 年）、《刘晏评传》（1937 年）、《唐代财政史》（1940 年）等几部著作，实有筚路蓝缕之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3 年），对实施“关中本位政策”的关陇集团，即自西魏、北周、隋至唐初一个世纪中掌握中央权力的胡汉混合集团的研究，成为很有影响的解释唐史的第一个框架性意见，而书中“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篇，又充分体现了这位早年曾游学日本、德国、瑞士的史学大师得心应手运用辩证方法的活力。书中关于牛李党争人员党派分野和政争的见解，和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 年）中阐发的许多具体观点与种族文化史观引起的长久争论，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时学术自由争鸣的又一个例证如关于李唐氏族的讨论。陈寅恪据河北隆尧县现存的唐光业寺碑记载推测，李唐假称先世出于陇西，其实“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

牌’”，连发三篇文章加以论述。而朱希祖则一再驳李唐为胡姓说和出自赵郡说，仍相信两唐书所称李唐先世为陇西李，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后。刘盼遂则以十个例证作《李唐为蕃姓考》，认为李唐出自代北鲜卑族拓跋达闾，使这个对认识唐初政治及社会风尚很有价值的讨论有趣而深入。

这时期唐史研究的长足进步，很得力于另一些史学大师的涉足。

辛亥革命后曾避居日本的王国维，掌握了近代的研究学问的方法，他治学严谨，规模宏伟，在敦煌学和唐史研究上也卓有成就。他是最早据敦煌遗书考证唐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准确地考证伦敦藏 S.514 号卷子为大历四年的敦煌县户籍，解释实授田不足的情况，认为“盖唐时职事官田与勋官田皆有名无实”，并肯定了当时沙州敦煌县地方，均田制还在继续实行。（《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文载《观堂集林》）他还考定《大云经》晋代已译，非武则天时沙门法明等伪造，纠正了《旧唐书》、《资治通鉴》的错误（《唐写本大云经疏跋》，文载《观堂集林》）。近年意大利东方研究所福安敦教授的被认为是“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最重要的西文书籍”《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意识》一书，得出的结论与王国维是一致的。王国维还根据日本所存唐尺实物，写了《中国历代之尺度》（1926年）和《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六唐尺摹本跋》，最早对唐代尺度作了考释。

编有《敦煌劫余录》的陈垣，考据功精深，在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等方面成果丰硕，他的《二十史朔闰表》（1925年）为治史者必备的工具书，《袄教杂考》（1923年）和《摩尼教人中国考》（1923年）等文，研究宗教的兴衰和与政治的关系。

另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师岑仲勉，他的主要成就在隋唐史的考据方面，这时期里发表《金石证史》（1936年）、《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1939年）、《贞石证史》（1939年）、《续贞石证史》（1945年）等以碑证史的名篇。他的《跋突厥文阙特勤碑》（1937年）、《景教碑之

Sarag 为“洛师”音译》(1946年)和《翰林学士壁记注补》(1948年)、《补唐代翰林两记》(1943年)等篇,显示了运用对音和史源学方法治史的光彩。他的《元和姓纂四校记》揭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元和姓纂》之“嫡子”,更被唐史界同仁视为快事。而《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1945年)和《阐扬突厥族的上古文化》(1948年),则引起了中国古代文化是否来自突厥族的争论。

陈寅恪的学生蓝文徵所著《隋唐五代史》(1946年)是两唐书以后第一部断代史,先总叙年历、地理、民族之后,以两章篇幅叙述唐史纪事,九个标题为“唐之开国”,“贞观之治”,“平定东国”,“高武之世”,“开元盛世”,“安史之乱”,“方镇之祸”,“宦官之祸”,“唐之乱亡”,因为只出版了上册,还只是一部政治史的规模。可这样的架构体系,后来成为讲唐代历史的基本模式。

这时期发生了一件大事,随着《资本论》等译著的刊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二三十年代有了初步传播,由此引起的一场大论战也波及到史学研究领域。邓拓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关于在中唐发生课耕制向佃役制转化的论点,很有深度地探讨了均田制瓦解时生产关系的基本变化。

我们可以注意到,稍前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一句不提殷商的奴隶与奴隶制,西周径直创兴了封建帝国,这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在战国秦汉间彻底打破,西汉有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并以盛运再临、盛运中之衰象、大时代之没落和黑暗时代来解释隋与初唐、盛唐、唐中叶以后、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的历史。该书主旨如在引论中所说:“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有规律发展理论的。但是这场大论战对唐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还无多涉及。

无论如何,20世纪上半叶是用近代方法分专题研究唐史的新的起步阶段。应当承认,与特别重视唐代的东邻日本相比,研究的

新起步我们稍晚,不少方面这时国内研究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也逊于日本学者,但毕竟逐渐抛弃了单纯考据的成法,并留下了迄今仍应珍视的不少学术成果。

#### 四、20世纪后半叶唐史研究的曲折发展

1949年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大陆政治生活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史学界便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迄至1991年底,这42年的学术可按“文革”和“文革”前后分为三段,中间1966—1976年的10年,工农兵涌入历史界大搞评法批儒,被引入阴谋史学的贼船。成篇累牍充斥报刊的批判文章,除少数考古资料外,几无学术价值可言。“文革”结束后又经过两三年,才基本摆脱批判和再批判的纠缠,重新回到历史研究的轨道上来。因此本文介绍和统计的只是“文革”前17年和“文革”后1977—1991年15年的唐史研究情况。

这期间共发表了唐史论文约5870篇,前17年1314篇,占22.4%,从一年仅数篇的低点开始,在1956年以后过百篇,超过上半个世纪最好的水平,经济困难时跌落一下,而后迅速回升,1962年达到183篇。但随着“文革”的酝酿和临近,发表论文数量直线下降,退回50年代前期水平。“文革”以后,15年共发表论文约4550余篇,1979年起又呈大发展之势,整个80年代始终保持在每年发三四百篇的稳定水平上,只是近两年又有一明显跌幅。这42年整个一个马鞍中又有三个小起落,反映出政治形势对学术有太多的影响力。

论文之外还有约三百种专著和整理的古籍刊出,如计入唐代文学和通俗读物,数量还要增一倍以上,其中仅隋唐五代的断代史便有十来种,唐长孺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五代史卷》(1988年)和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上下)(1988、1991年)可为当

前学术水平的两种代表。其他为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1955年)、岑仲勉《隋唐史》(上下)(1957年)、吴枫《隋唐五代史》(1958年)、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下)(1959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1961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61年)、吴枫、陈柏岩《隋唐五代史》(1984年),还有一些通史中隋唐史单独成书或占相当篇幅,即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1965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1965年)、郭沫若《中国史稿》(第四册)(1982年)、李培浩《中国通史讲稿》(中)(1982年)。这些书多被选用为教材,培育了几代学者,奠定了隋唐史研究的格局。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就是适应教材要求,从形式到内容比较划一雷同,不利于学术思想自由活泼的发展,大学生在这方面接受的训练便有些先天不足。当然问题不在编书的教师学者,而在处处追求统一的教育体制。

本世纪中叶以来大陆的唐史研究,虽然几经曲折,又有模式化和僵化之弊,对于学界百千同仁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留下的300本书近六千篇文章,我们无疑要给以应有的积极评价。从选题范围看,更较以前宽泛,尤其在制度史方面,已展开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在理论上,虽然有些单调,但注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普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使许多论著比以前更有理论特色;在方法论上,五六十年代有一场关于历史主义的有益讨论,八十年代以后法国年鉴学派等史学流派被介绍过来,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跃跃欲试在史学研究中引入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理论等老三论、新三论的方法,通过实地考察,熟悉历史地理环境、遗址文物,促进与文献的结合研究已蔚然成风,这我们称之为“考察历史学”的方法,作为对传统的“文献历史学”的补充,发扬光大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学风,已促成一批有质量的学术成果问世。

下面分述各方面的研究概况,重点介绍若干引起争论的重要



唐史专题。

在经济史方面,研究涉及户口、田亩、租佃、均田、租调徭役、两税、财政、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交通运输、货币、专卖、仓库、经济重心和区域经济等。

人口田亩数字,作为古代小农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指标,长期困扰着历史研究,影响对历朝国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评估。梁方仲编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年),汇编了经过初步考核的数据。业师汪篔1962年发表的四篇隋唐史杂记<sup>①</sup>,力纠许多学者误以《通典》所载隋唐垦田数为实际耕地面积的错失,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混乱,他说:“唐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八百万顷到八百五十万顷(依唐亩积计)之间”,并推断当时的逃户约在三四百万之间,因此除边疆地区很多唐朝这时没有直接控制的户数之外,全国人口总数不下一千二三百万户。王育民认为天宝年间实际户数至少在一千三四百万,八千零五十万口<sup>②</sup>。这看法源自杜佑,他认为天宝末年“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当千三四百万户。”(《通典·食货七下中》)英国普利布兰克也认为“杜佑的数字大约距离事实不远”,而日本日野开三郎估计唐朝总共有二千万户,将近一亿四千万人的数字“肯定是太高了”<sup>③</sup>。看来杜佑提供的人口数字,已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接受。但他提供的垦田达到一千四百万顷的数字,虽经汪篔考释,梁方仲在他的统计一书中仍引了,并称每户平均160.45亩。郑学檬等的《简明中国经济通史》说:“这个估计数反映了均田制确实推动了荒地的开垦,增加了自

① 《隋代户数的增长》,1962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非实际耕地面积》,同上,8月15日;《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数》,同上,8月29日;《唐代实际耕地面积》,同上,10月24日。

② 《唐代人口考》,《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荷兰《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961年12月号,译文见《历史译丛》1963年第1期。

耕农的数量。”道理合乎逻辑,数字怕有些问题。自两汉直至清末,除隋唐之外,只明万历时有一个 11.6 亿亩地的统计数,其余各朝代均无超出 10 亿亩的。唐代全国田地总数,恐怕也就是一千三四百万户,每户平均六七十亩,总计八九百万顷,合今 7 亿市亩上下,比汉代的 827 万余顷合今 5.7 亿市亩增加五分之一。

还应提到翁俊雄所著《唐初政区与人口》(1990 年),在落实贞观十三年 300 余州 1500 余县的基础上,考订各州府的户口数字。黄盛璋注意到了地区的变动,指出开天时黄河中下游户口居首位,元和时完全让位于长江中下游。<sup>①</sup> 地区性的人口,有如齐陈骏研究了敦煌的人口,<sup>②</sup> 郑学檬更研究了敦煌的人口结构由于兵役差役重,男劳力减少引起男女比例、劳力与非劳力比例的不合理状况和发展缓慢。<sup>③</sup> 宁可则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人口发展规律及台阶式跃进的原因<sup>④</sup>。对于汉唐千余年间国家编户三起三落,人口一上五六千万就大跌下来的原因,除天灾人祸外,也许我们还应该从国土的承载力即生产力水平制约的角度去探讨深层次的原因。

人口中的逃户问题也引起许多讨论。唐长孺和杨际平论述了对逃户政策法规的变化。<sup>⑤</sup> 张泽咸一论再论唐代的客户,指出宇文融括得的一些客户“是具有部分家业的逃户”,有的“起码应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sup>⑥</sup> 孙达人首先肯定汉唐八百年间流民逋亡南下,使南方得到了开发,逃亡农民是这种开发的生力军。<sup>⑦</sup> 黎仁凯

① 《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

② 《敦煌沿革与人口》(上下),《兰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敦煌学辑刊》2。

③ 《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人口结构试析》,《敦煌学辑刊》5。

④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⑤ 《武则天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 年第 6 期;《隋唐均田租庸制下的逃户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⑥ 《历史论丛》1964 年第 1 期;《中国古代历史论丛》1982 年第 3 期。

⑦ 《“贯串于人类历史的根本规律”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陕西师大学报》1979 年第 3 期。

进一步指出,均田制逐渐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后,“农民逃亡本身就是冲破这种桎梏的重要力量”,“争取了直接生产者身份地位的提高”。<sup>①</sup> 翁俊雄论证了武则天时期逃亡户的流向,是从狭乡向宽乡,重点是从关辅、蜀中流向关东和山南道,使人口区域分布相对合理。<sup>②</sup> 通过这些不断深化的研究,在回答从初唐到盛唐“经济史上的一个矛盾现象:众多的逃户与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存”的原因时,也许可以像对流民一样,也给逃户一点积极的评价,肯定“逃户对农业经济上升和生产向广度发展的贡献”和“逃户对均田租庸调制向两税法过渡的促进”<sup>③</sup>。这些意见一反历来视逃户为经济生活中纯消极因素的成见,在经济史研究中另辟蹊径。李春润等关于括户政策前后变化的研究<sup>④</sup>,也有助于这个角度研究的深化。

唐代的农业,关于铁器牛耕,杨宽指出:继秦汉的韧性铸铁农具之后,唐宋之际逐渐推广使用钢刃熟铁农具的改革,曾促使农业生产出现第二个高峰。<sup>⑤</sup> 鲁才全指出:唐初曲辕犁的出现,标志役一牛一人耕作方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sup>⑥</sup> 阎文儒、阎万石的论文图示曲辕犁各部件的使用情况和工作原理。<sup>⑦</sup> 傅玫结合敦煌壁画,实地考察了河西的犁,断定“河西地区由长床犁向无床犁的变化是发生在唐代”。<sup>⑧</sup> 汪篔指出:“大族地主的成熟和大犁头的出

① 《关于唐代的逃户》,《文史哲》1982年第4期。

② 《试论武则天时期狭乡民户徙就宽乡的问题》,《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年)。

③ 《均田——逃户/括户——两税》,《平准学刊》第5辑上册(1989年)。

④ 《宇文融括户的两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宇文融括户的评价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⑤ 《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⑥ 《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耨耩》,《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⑦ 《唐陆龟蒙〈耒耜经〉注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

⑧ 《河西的犁》,《丝路访古》(1982年)。

现(西汉开始)相适应,因为犁人,个体耕作困难,不得不依赖宗族组织,因而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强。当时对生产力的提高有好处……在唐初已普遍使用短辕犁等新工具……农民个体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成熟,达到可以完成全部耕作的程度时,就要求改变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就引起社会一系列变化。”<sup>①</sup> 力图从生产力这最革命的因素中寻找唐前期社会变革的根源。

唐代粮食生产,有的按品种论,<sup>②</sup> 有的讲耕作制度,<sup>③</sup> 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兴趣。蒙文通认为唐代平均每亩约一石半,生产量比汉增加百分之五十。<sup>④</sup>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65年)认为“唐代亩产,平均约为五斗到一石”。朱伯康认为江陵良田亩收一钟和河源屯田合亩收十石的产量都是夸大的,从唐代私租率来间接推算亩产量,为二石或一石五斗至二石之间。<sup>⑤</sup> 吴慧认为唐代平均亩产0.94石(亩产一石,打九四折),按百步之亩折今制为每市亩334市斤,其中南方水稻为344市斤。<sup>⑥</sup> 胡戟认为唐代粮食亩产量,一般为一石至二石,平均不少于一石,折今一市亩一百市斤略多一点,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约2400市斤(粟),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700市斤,<sup>⑦</sup> 并肯定江陵亩产一钟合今制为662市斤的亩产量是唐代比较可靠的丰产纪录

① 《汪篻论隋唐以前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期,1991年第4期。

② 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文史》18。

③ 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暨南学报》1984年第1期。

④ 《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徭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⑤ 《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

⑥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因未见到正式出版物,此据1980年油印初稿。

⑦ 《从耕三余一说起》,《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

之一。<sup>①</sup>于也非推算唐代南方水田每亩平均产稻三石。<sup>②</sup>李伯重认为唐代粟产量一般是每亩一石,水稻亩产量一般约为三石,而麦产量约为六七斗,稻麦复种制下约为四石,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水稻一作制下为三十亩,稻麦复种制下为二十亩。<sup>③</sup>曹贯一的《中国农业经济史》(1989年)认为大体是每亩产谷一石左右,唐代农业生产恢复了汉时水平,折合为市亩,则每亩产粟0.66市石,约合85.8市斤,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可产谷合2574市斤。关耳、韩铁铮也研究过亩产量。<sup>④</sup>目前各人估算的结果还不大一致,原因之一是对度量衡认识不一,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已嫌不足,国家计量总局等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1981年)和《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1990年)提供了一些经过复核的数据可供研究。同时分析史料要瞻前顾后考虑历代的情况,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意见。但显然,用计量方法来处理史料,力图给人一个比较明晰的唐代农业生产水平概念,总是一个有价值的努力方向。

均田租庸调和两税法作为热门课题,在这时期由于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不断发掘披露,更久盛不衰。包括色役资课在内,又有至少180篇以上论文和好几部专著发表,<sup>⑤</sup>研究水准有了长足的进步。

关于均田制意见分歧的焦点在实施状况,争论已有半个多世

① 《李皋与江陵创造的唐代粮食单产记录》,《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1988年)。

②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考略》,《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③ 《唐代江南地区粮食亩产量与农户耕田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④ 《唐代江南水稻的亩产量》,《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10;《历代口粮、亩产初探》,《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

⑤ 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1984年);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1986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1988年);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年)。

纪了。认为唐初均田令自始就不曾认真推行过,实际上还应算是一种具文的意见,<sup>①</sup>在1955年引起一场争论。胡如雷认为,虽然授田不足,但均田制度在初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通典》所载全国垦田约六百二十余万顷,即是当时掌握在唐政府手中实际分授出去的官地。<sup>②</sup>韩国磐也认为确实施行过,还曾影响日本、高丽、吐蕃与南诏的颁田授田,被四邻模仿。<sup>③</sup>岑仲勉解释武德二年令不提均田是因为当时李唐占地仅得河东南部及关西新附,到武德七年初全国统一才有条件均田,造籍的主要作用即在均田<sup>④</sup>。后来汪篔逐条研究了唐田令,认为这显然是一个制度严密为供实施的法令。<sup>⑤</sup>

更多学者钻研了敦煌吐鲁番资料,宋家钰、郑学檬都认为均田令作为重要的土地法令或根本土地大法,在全国实施<sup>⑥</sup>。杨际平的《均田制新探》重点在探究均田制实施状况,认为唐朝实行均田制“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受政局动荡的影响最小”,且在“征服高昌后,立即将均田制推广到吐鲁番地区”。至于江南是否推行了均田制的问题,许多学者有怀疑,他认为作为统一的政令,是颁行全国的,江南地区推行均田制也有具体例证,只是实施状况因目前还未发现更多的实证材料所以还难以深入探究。霍俊江具体指出,唐代不仅在河西关中河东河南淮南地区推行均田制,而且推及长江流域包括剑南道、山南道和江南道,只有岭南道大部分地区相当落

① 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8期。

② 《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③ 《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④ 《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⑤ 《唐田令释要》,《汉唐文史漫论》(1986年)。

⑥ 《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简明中国经济史》。

后,才缺乏推行均田制的条件。<sup>①</sup>

至于实施程度,杨际平认为只是做了帐面调整,初授田后土地还授再没实行,<sup>②</sup> 奴隶和官吏授田规定也并未实授。<sup>③</sup> 韩国磐认为西州按狭乡口分田减半授田。<sup>④</sup> 授田不足是普遍现象,唐耕耦据《敦煌资料》第一辑统计,没有勋田的 29 户,应授田 4196 亩,已授田 1238 亩,占不到百分之三十。<sup>⑤</sup>

帐面土地严重不足下,需要解释人口如何存活,因此自然地引出了均田外有无私田存在和自田性质的问题。唐耕耦认为私有土地都被包括在均田范围以内,<sup>⑥</sup> 韩国磐认为自田可能指自己另一段的已受田。<sup>⑦</sup> 侯绍庄认为自田不是农民的另一段已受田,是均田外归各户所有的私田<sup>⑧</sup>。胡如雷也说自田是指本户在均田制范围以外所拥有的私有土地,<sup>⑨</sup> 与日本学者西川正夫在 1955 年发表的论文《敦煌发现唐代户籍残卷上的“自田”》中的意见相近。朱健还指出,唐政府鼓励垦荒的政策是自田存在的根本原因。<sup>⑩</sup> 杨际平则认为自田并非一种土地名目,只是表明该户某段永业、口分田

① 《关于唐代均田区域问题的札记》,《河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② 《从敦煌户籍看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的实施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③ 《北朝隋唐均田制下奴婢官吏的“授田”与“限田”》,《厦门大学学报》1983 年第 4 期。

④ 《关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户籍残卷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⑤ 《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 3 期。

⑥ 《唐代均田制的性质》,《历史论丛》2。

⑦ 《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件略谈唐代均田制》,《历史研究》1962 年第 4 期。

⑧ 《“自田”考释》,《社会科学》1981 年第 2 期。

⑨ 《也说自田并论与唐代的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⑩ 《从唐代敦煌户籍中的“自田”看均田制》,《浙江学刊》1989 年第 6 期。

旁边还有一段属于该户的土地,但唐代均田制下确有私田存在,并且估计当时敦煌地区平均每户约有私田 25 亩上下。<sup>①</sup> 鲍晓娜指出均田以外的私田与户等有关。<sup>②</sup> 朱雷则认为:“只有小块私有土地的均田民,他们在登录所有土地时,私有的,以及通过均田制所获得的土地,一并纳入‘已受田’之中。”“在唐代不存在户籍中所记之田亩皆‘均田制’授予,而私有土地则另有记载登录的现象。”<sup>③</sup>

或有因敦煌吐鲁番户籍上登记的田亩数少,推论是因为另有大量私田存在。能否这样论证似需慎重推敲。比如吐鲁番地区直至 1985 年在拥有 751 条坎儿井,3023 眼机井和总长 3600 公里以上的引水渠的条件下,才利用了 600 万亩绿洲中全靠灌溉维持的 65 万亩耕地,人均 1.5 亩。依唐时全靠引水渠灌溉的耕地应很有限,合到天宝时交河郡 19016 户 49476 口人头上,大多数人户怕只能有十余亩甚至四五亩,《通典》所载交河郡垦田便是只有 900 顷,要说再有许多籍外私田存在恐怕不是事实。

还有常田、部田的问题。一种意见如马雍所说:部田是需要轮休的田地,常田乃是常年耕作,不需休耕的农田;<sup>④</sup> 韩国磐也认为这是按土田的质量命名的,常田是质量水利好的上等田,部田质量要差些。<sup>⑤</sup> 另一种意见如杨际平,认为部田非“倍田”、“薄田”,也不必是当乡之田,是专指自具特殊意义的田地;<sup>⑥</sup> 赵吕甫认为杨际平的解释可算是得其正解,将部田一概划为劣质的农田是说不

① 《均田制新探》(1991 年)。

② 《略论汉唐间户等与田产的关系》,《东岳论丛》1987 年第 4 期。

③ 《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4 辑。

④ 《麹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文物》1972 年第 12 期。

⑤ 《关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户籍残卷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⑥ 《试考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再谈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通的。部是部内之部,属于某州某县或某一机构的田地,吐鲁番文书上的部田指唐代屯田的土地,常田就是民田。<sup>①</sup> 不过杨、赵二人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又互相商榷。

关于官员的职田,李文澜有专文可以参考。<sup>②</sup>

关于两税,束世澂指出,欧阳修将建中元年二月改革税制诏书中所有内容都当作两税法,是以讹传讹,两税法仅是其中讲户税夏秋两征而丁额不废的部分,并不包括田亩之税以下内容。<sup>③</sup> 那么首先就有一个何为两税的问题,是户税地税两种税还是夏秋两征而名两税? 胡思庸说:两税原义指唐前期的地税和户税,不过杨炎时兼合夏秋两征之义罢了,<sup>④</sup> 继承了鞠清远的意见。岑仲勉则认为两税是两度征收,无两项税制之义,建中以后两税成为专名,则完全因夏、秋两征之故,与户税尤其是地税毫无关系。<sup>⑤</sup> 实际上问题似较复杂,金宝祥以比较有力的论据说明,两税指的只能是夏秋两征的户税,而不是户税加地税,且一切以货币为内容的费用,包括以钱雇役的费用,都已注入户税。<sup>⑥</sup> 赵和平认为金说解决了问题,可以肯定,“两税”一词最早来源于户税一年分两限征收,沿用时间较长,所以中晚唐的公式文中,两税多是指户税。而建中后,地税也和户税一样征收,并且户、地二税的征收时间统一为夏税六月,秋税十一月,所以地税有时也被称为两税,或把户、地二税统称为两税。指出唐人在术语使用上不严格,对各处“两税”一词要具

① 《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② 《唐代职田的渊源及其演变》,《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期。

③ 《两税法与建中税制的改革》,《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2期。

④ 《怎样理解两税法》,《新史学通讯》1951年第2期。

⑤ 《唐代两税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教学》1951,5-6。

⑥ 《论唐代的两税法》,《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第3期,1981年第2期。

体分析,看它到底指什么。<sup>①</sup>

两税法实施后一度取消的力役又恢复,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与此有关的资课,看法有分歧。范文澜认为资课就是财产税,<sup>②</sup>束世澂的上引论文认为旧户税亦称资课,唐耕耦认为资课是代役钱,<sup>③</sup>王永兴认为资或课是不服役者所纳,<sup>④</sup>金宝祥的上引论文认为天宝以后,部分资课,指因不服色役而缴纳钱币的资课,并入户税。李春润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资课是色役的代役金,开元至大历几十年间一项重要税目。<sup>⑤</sup>

有关的另一问题是户等。金宝祥强调“两税法中所规定的两税,就是按户等高下而征收的税”。那么追溯唐初以来户等是如何按资产量定的呢?唐耕耦认为,唐前期评定户等时,土地是被排除在资产之外的,户等也不影响租庸调数额,但与运送地点远近、运输费用轻重有关。<sup>⑥</sup>他不同意岑仲勉、韩国磐认为租庸调可以参以户等高下增减的意见,同意邓广铭租庸调不问户等高下按课丁一律征收的意见。<sup>⑦</sup>鲍晓娜既不同意唐耕耦的唐定户等的资产中不包括田产说,也不同意杨际平的“始终包括田产”说,<sup>⑧</sup>认为在实行均田制时期,只与均田以外的私田有关,以后户等与各户的全部田产有关,田产成为构成资产的基本因素,影响户等高低。<sup>⑨</sup>

① 《唐代“两税”一词探源》,《敦煌学辑刊》3。

②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

③ 《唐代的资课》,《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④ 《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

⑤ 《略说唐代的资课》,《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

⑥ 《唐代前期的户等与租庸调的关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1981年)。

⑦ 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1984年);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⑧ 《唐代户等与田产》,《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⑨ 《略论议唐户等与田产的关系》,《东岳论丛》1987年第4期。

寺院经济是敦煌文书研究推动下有长足进展的课题之一,这方面最出色的成果当数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诚如作者所说,部曲佃客制对于中国中古研究具有突破意义。该书通过缜密细微周详的研究,论证了部曲佃客制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剥削农奴式人口的制度,中国敦煌石室藏卷也千真万确地证明了中国式农奴式人口的存在。可以期待这样对8至10世纪敦煌寺户制盛衰史的研究,成为解剖部曲荫户制度衰落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一把钥匙。

经济史方面其他专著,如张泽咸的《唐五代赋役史草》(1986年),张弓的《唐朝仓廩制度初探》(1986年),葛承雍的《唐代国库制度》(1990年),陈衍德、杨权的《唐代盐政》(1990年),都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逐一解决问题,因而其学术价值不是赶热门的一些举例式议论的“一家之言”可以同日而语的。

史念海的《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历史论丛》五辑,1990年)也是一重要成果。

区域经济的研究,除一些零散的论文,<sup>①</sup>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1988年)、《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1989年)、《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1989年),这是在唐长孺会长倡导下在长江上中下游分别召开的三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此外,还有牟发松著的《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1989年)。由于大家着意努力将考古资料、生态方面古代地理气候水文资料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研究,总结古代经济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并为当前经济决策提供借鉴,使学术研究气象一新。黄约瑟预言这样的区域经济研究“将成为中古史一大新研究领域”(台北《中

① 如黄新业:《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历史论丛》第三辑(1987年)。

国唐代学会会刊》创刊号,1990年)。似要注意的是一些论文没谨慎处理带文学夸张的史料,轻用“大发展”、“非常繁荣”等论断,与到头来还是贫困线上勉强供衣食的维持型经济总状况难合,使论文有失水准。

经济史方面一个普遍关注的题目是经济重心南移,或者说长江流域经济赶上超过黄河流域的问题。发生这个变化的时间有六朝说(唐长孺,彭神保),唐末五代或唐宋之际说(郑学檬,陈衍德,曹尔琴),多数学者认为是唐后期。王炎平认为,南方经济经魏晋南北朝开始赶上北方,到唐后期开始超过北方,经五代十国明显超过北方。<sup>①</sup>而治水的困难与进步是影响南方经济长期落后于北方后来又赶超北方的基本原因,流徙南下的人口对南方开发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比较一致的意见。经济格局除了有南北变化的问题,王炎平指出还有“东盛西衰”,全国经济重心东移的问题。<sup>②</sup>抚今思古,这显然也是应该研究的课题。

此外经济史方面还有关于商品经济、商业、商人,钱物轻重,虚实钱和畜牧业、手工业等许多研究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不能细述了。

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似不如经济史有生气,人物仍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个身上,事变仍是老题目。

关于晋阳起兵,在李唐创建过程中,李渊、李世民父子俩谁为首谋,是第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汪篪在1962年的一次报告中,对此有十分透彻精辟的分析:“唐太宗的皇位不是由合法继承得来,而是通过杀兄逼父取得的。这种行动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

① 《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看三国至五代南方经济的发展》,《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② 《关于古代天府经济的几个问题》,《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

太宗在夺得皇位以后,就着手修改国史,来为自己辩护……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歪曲地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成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他的皇位获得近似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汪篔隋唐史论稿·唐太宗》)而后不仅李树桐、布目潮泓,还有牛致功、徐连达、赵克尧、许道勋等都各自作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力纠历史上将李渊说成是个昏庸无能之人的旧说,当然大家也都不否认李世民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何敦华认为在创业中李渊的作用次于唐太宗。<sup>①</sup> 杨希义更发表了论点鲜明的文章《大唐创业功属太宗》(《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强调这是为古代史家所公认的结论。

关于玄武门之变,新的争论集中在李渊对事变的态度。过去一般忽视他的参与,如王夫之就认为“高祖若木偶尸位于上”(《读通鉴论》),影响人们将事变看作单纯的兄弟之争。宋家钰指出李渊无形中已站在建成一边,成为李世民夺权的重要障碍。<sup>②</sup> 胡如雷也认为“大致在东宫、秦府的复杂斗争中,李渊始终是向建成一边倾斜的”,并对李渊几次轻许立世民为太子事作了倾向否定的辨析。(《李世民传》,1984年)牛致功则认为李渊汲取了杨坚支持杨广夺嫡的教训,放手让儿子们竞争,他乐于看到李世民的 success 并让位于他。<sup>③</sup> 与之商榷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一文(《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从晋阳起兵时对待突厥问题上的芥蒂起,历数李渊、李世民的矛盾,到玄武门事变前李世民实际已被置于死地,终于激成事变,李渊的退位也成为事变必然的目标。程宗才

① 《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② 《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0期。

③ 《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析》,《人文杂志》1980年第5期。

的《玄武门之变新探》表示了大致雷同的意见。看来解决歧见首先有一个如何对史料作去伪存真的辨析的问题,但如杨希义在前引论文中担心的,两《唐书》和《通鉴》的作者多为良史作者,如果这些都不大可信,“我们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和文化的继承,将根据何依?”恐怕还更要先解决对旧史料的认识上存在的分歧。至于有人说玄武门守将是中立骑墙的,李世民的人马较少,所以进宫时放行,建成元吉兵多不能不管才打起来,从宫禁制度看,此论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关于常何墓碑的许多研究应该可以说明李世民是先打通了玄武门关节的。

黄永年“发现,武则天革唐为周后曾筹划创组一个以李氏居虚位,以武氏掌实权的畸型政权”。<sup>①</sup> 武则天革唐为周后,明明是女皇在位十四年,何以得谓“李氏居虚位”? 以此“李武政权”论代替陈寅恪对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分析,似未见妥当。

关于马嵬事变,他又说“不是将士自发行动,是陈玄礼在高力士操纵下诛杀杨国忠兄妹”,<sup>②</sup> 取消了历来争议的兵变主谋是陈玄礼还是李辅国、李亨的问题。多数学者的看法,如陶冶的文章标题《唐玄宗的忠实家奴——宦官高力士》,《文史知识》1987年第3期)高力士作为一个处事谨慎的忠仆,实在很难说清他为何要夺君爱妃,而事后玄宗还能对他亲信如初,死后成为泰陵的惟一陪葬者。由于断为两截的高力士碑在1963年和1971年先后发现,使我们能看到钱大昕、王昶未能得见的全璧,通过葛承雍等的研究(《重评高力士》,《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对高力士的生平为人均可有新的认识,显然是应该先把握住高力士与唐明皇关系的基本特征,再看可不可以认定他是一个马嵬悲剧操纵者的角色。

关于安史之乱、二王八司马事件和甘露之变的研究似不如牛

① 《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② 《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学林漫录》5集。

李党争深入。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关于牛李党争的基本意见引起许多讨论。

关于党争的起因,唐长孺在《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上发表一篇旧稿:《〈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从分析李宗闵、李吉甫两传完全不同的记载入手,辨明“皇甫湜与牛僧孺的策文主要不是以李吉甫为攻击对象”,对传统的关于党争渊源的看法提出疑议。何灿浩早二年发表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元和三年对策矛头不是针对李吉甫的,泣诉于上者不是李吉甫而是宦官,牛李党争缘始不是元和三年对策,是长庆元年科场风波。<sup>①</sup>胡国然更否定长庆元年的复试案的科场风波是两党结怨之始,认为通鉴有关记载纯属臆测。<sup>②</sup>岑仲勉早在《隋唐史》第四十五节中就力辩通鉴关于党争记载之误,认为李德裕无党。王炎平深以为是,并指出“党争最初是由于逢吉反对削藩引起的”,牛党之第一个党魁是李逢吉,“逢吉结党在元和十年裴度拜相以后,故党争始于元和十年”。

关于两党分野,陈寅恪认为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因此又有文学与吏干之别。岑仲勉认为此论经不起分析。刘运承也提出《牛李两党以科举分说质疑》。胡如雷认为两党争执的焦点是对藩镇叛乱持不同态度,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牛党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李党的政策具有进步性,牛党的政策多具有反动性。<sup>③</sup>周建国不同意陈寅恪、胡如雷的意见,认为对于藩镇,牛党不一味姑息,李党不人人主讨伐,两党各无一致政纲。<sup>④</sup>杨志玖认为,确有一些既非牛党也非李党,既与李党有交往又与牛

① 《元和对策案试探》,《南开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② 《长庆元年复试案浅析》,《重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③ 《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④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与胡如雷同志商榷》,《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党有联系的人物,而在牛李两党内部,他们各自的见解也不尽一致,不能一刀切,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去衡量评估古人。<sup>①</sup>有了“文革”中大打派仗的经验,我们也许可以考虑牛李党争是否也是一场掺杂门第、仕途、政见、恩怨许多纠葛,但基本为派性斗争的性质呢?

关于两党与宦官的关系,何灿浩不同意陈寅恪的朋党是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说,认为宦官内廷之争与朝官朋党之争是两条独立的平行发展线索。<sup>②</sup>

还有一些论文谈杜牧、李商隐等人与牛李党争的关系。赵吕甫辨史事之误,因唐末战乱,穆宗以后实录、国史遗落十无二三,故《旧唐书》记述多缺乱,牛僧孺、李德裕史事尤甚。<sup>③</sup>

看来关于牛李党争几乎所有方面认识的分歧都很大,1996年已出版的王炎平《牛李党争》一书提供系统的分析论辩,应该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

关于藩镇的研究,杨志玖和张国刚的十余篇论文和《唐代藩镇研究》(1987年)一书气势可观,他们将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御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类,和肯定藩镇使府辟署制度不拘一格选拔大批人才等许多新颖的观点在唐史界反响颇好,有助于理解唐后期的形势,理解安史乱后唐王朝还能延续一个半世纪的原因。此外刘运承、周殿杰继承范文澜、陈寅恪的研究,探讨藩镇与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氏族残余的关系,认为“藩镇的兴衰存亡是和唐代历史时期民族融合的整体发展进程相吻合的。”<sup>④</sup>李晓路认为方镇是都督府改造而成,地方两级行政制的缺陷是方

① 《释“台参”并论韩愈和李绅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② 《牛李党争和内廷之争的关系辨析》,《宁波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

③ 《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④ 《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



镇出现的导因。<sup>①</sup>程志指出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无藩不反”，藩镇的质变从内部给了唐廷致命的最后一击，结束了李唐王朝的历史。<sup>②</sup>还有对地区或单个藩镇的具体研究，涉及河朔三镇、武宁镇、朔方军、宣武军等。<sup>③</sup>

关于唐代后期宦官的专权，往往与藩镇、党争和其他事变结合在一起研究。牛志平与齐陈骏、陆庆夫商榷的文章，认为对唐代宦官不应一味贬斥，尤其肯定了宦官统领的神策军，是中唐以后唐王朝在军事上的主要支撑者，<sup>④</sup>从另一侧面揭示安史乱后唐王朝能苟延的原因。宦官是附着在君主专制机体上的一个怪胎，这些不阴不阳的中性人，居然也娶妻养子建立家庭，陈仲安撰文研究了宦官世家。<sup>⑤</sup>

关于农民的起义暴动，论文涉及陈硕真、裘甫、庞勋、阡能、王仙芝、黄巢等领导的事变。宁可研究袁晁、方清、陈庄起义，指出这是农民拿起武器来批判过时的害人的租庸调法，推动了建中元年的赋税制度改革，迫使唐统治者采取一些减轻剥削发展生产的措施，促使江南经济恢复发展成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唐中央政权也得以进一步依赖江淮经济的支持，支撑到唐亡。<sup>⑥</sup>关于黄巢起义的论著多达近百种，这还不算“文革”期间的50篇，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和农战史研究一起冷下来，显然这和阶级斗争动

① 《唐代中央集权之变化与方镇的产生》，《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晚唐藩镇与唐朝灭亡》，《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

③ 方积六：《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刘建伟：《唐代武宁镇的依附性和游离性》，《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樊文礼：《唐朔方节度使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周宝珠：《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④ 齐陈骏、陆庆夫：《唐代宦官述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⑤ 《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

⑥ 《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力说理论的盛衰是一致的。

制度史方面研究很广,法制方面有几部著作发表,如刘俊文点校的《唐律疏议》(1983年),杨廷福的《唐律初探》(1982年),乔伟的《唐律研究》(1985年),官制方面张国刚的《唐代官制》(1987年),何汝泉的《唐代转运使初探》(1987年),兵制方面唐长孺的《唐书兵志笺证》(1957年),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1962年),科举制度方面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1980年),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1992年)等,大多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体现在论文中,这里列举29种制度:皇帝制度、宰相制度、三省制度、政事堂与中枢体制、中央决策制度、文官制度、散官制度、谏官制度、御史制度、监督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铨选制度、考课制度、门荫制度、吏制、兵制、监军制度、爵封制度、食封制度、品阶制度、俸禄制度、致仕制度、流放制度、财政制度、两税预算制度、和籴制度、专卖制度、市场管理制度,凡72篇,题目如下:

①王超:《唐朝皇帝制度的发展与完备》,《南京大学学报》,1985.4

②刘希为:《唐朝宰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4.3

杨际平:《隋唐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8.3

薛贻康:《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山东师大学报》,1990.3

郑胜强:《中唐宰相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0.6

③姚澄宇:《唐三省制度述论》,《南京师院学报》1982.3

吴枫、关大虹:《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东北师大学报》,1982.2

④姚澄宇:《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3

王超:《政事堂制度辨证》,《中国史研究》,1983.4

陈振:《〈政事堂制度辨证〉质疑》,《中国史研究》,1985.1

贾宪保:《论中晚唐的中枢体制》,《陕西师大学报》,1985.4

- ⑤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机构与活动》,《文献》,1988.4  
袁 纲:《延英奏对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9.5
- ⑥姚澄宇:《唐朝的文官制度》,《江海学刊》,1985.4
- ⑦马小红:《试论唐代散官制度》,《晋阳学刊》,1985.4
- ⑧姚澄宇:《唐朝的谏官制度》,《南京师大学报》,1984.3  
李 莉:《论唐代谏官制度》,《行政管理研究》,1991.2
- ⑨李俊恒:《唐代御史制度述论》,《许昌师专学报》,1982.2  
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的特色》,《福建师大学报》,1989.3
- ⑩刘太祥:《唐代监督制度浅探》,《南都学坛》,1987.2
- ⑪徐连达、马长林:《唐代监察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981.5  
谢元鲁:《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社会科学家》,1988.3  
何汝泉:《唐代前期的地方监察制度》,《中国史研究》,1989.2
- ⑫郑学檬:《漫谈唐代的科举制度》,《厦门日报》,1979.2  
吴宗国:《唐代科举概述》,《电大文科园地》,1982.2  
乌廷玉:《唐代的科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7.1  
何忠礼:《科举制度起源辨析》,《历史研究》,1983.2  
金旭东:《〈科举制度起源辨析〉之商榷》,《历史研究》,1984.6  
周东平:《关于科举制度起源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4.6  
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文史》,1985年总第23期  
吴宗国:《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北京大学学报》,1982.1  
吴宗国:《进士科与唐朝后期的官僚世袭》,《中国史研究》,1982.1  
吴宗国:《唐代科举应举和录取的人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1  
吴宗国:《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历史研

- 究》，1986.4
- 刘恩惠：《唐代科举制初探》，《松辽学刊》，1984.3
- ⑬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9.3
- 李雪华：《唐代文官铨选制度刍议》，《西南师大学报》，1986.1
- 刘海峰：《唐后期铨选制度的演进》，《厦门大学学报》，1991.1
- 宁欣：《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及流弊》，《北京师院学报》，1991.4
- 宁欣：《唐代的选人与官阙》，《人文杂志》，1991.5
- ⑭高世瑜：《唐代的考课制度》，《东岳论丛》，1983.2
- 徐连达：《唐代官吏的考课制度》，《文史知识》，1983.6
- ⑮田廷柱：《唐代门荫制度考论》，《历史教学》，1986.3
- ⑯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89.2
- ⑰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4
- 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历史研究》，1984.2
- 杨鸿年：《唐募兵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3
- 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文史》，1985年总第25期
- 王育民：《论唐末五代的牙兵》，《北京师院学报》，1987.2
- 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88.3
- 张国刚：《唐代的健儿制》，《敦煌研究》，1990.4
- ⑱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2
- ⑲徐连达：《隋唐的封爵制度》，《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84.1
- ⑳韩国磐：《唐朝的食封制度》，《中国史研究》，1982.4
- ㉑徐连达：《隋唐官员的品阶及职、教、勋、爵制度》，《中国史论集》，1986
- ㉒阎守诚：《唐代官吏俸料钱》，《晋阳学刊》，1982.2
- 刘海峰：《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晋阳学刊》，

1984.2

刘海峰:《再析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4

迟乃鹏:《略谈唐代的俸禄》,《文史知识》,1987.7

②李翔:《唐代致仕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1

④齐涛:《论唐代流放制度》,《人文杂志》,1990.3

⑤陈明光:《唐代前期国家预算形态述论》,《财政研究》,1989.4

吴丽娱:《中后唐财政官制变革刍议》,《中国史研究》,1989.4

⑥陈明光:《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4

陈明光:《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1989.1

⑦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6

杨际平:《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

李雪华:《唐代和籴制度述论》,《贵州大学学报》,1985.2

赵文润:《唐代和籴制度的渊源》,《陕西师大学报》,1986.2

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9

⑧陈衍德:《专卖制度与唐朝后期阶级矛盾》,《社会科学家》,1987.3

⑨刘志坚:《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初探》,《兰州学刊》,1986.4

研究唐代人物的情况似远不如制度史,下点功夫研究过的不过七八十人,论著的眼光过多集中在唐太宗、魏征、武则天、唐玄宗、黄巢和李白、杜甫、李商隐等少数人,许多皇帝和大多数将相都是空白。“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但我们至今对在唐代历史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中的大多数人的面目,还若明若暗。

唐太宗有三部历史传记一起在 1984 年问世,<sup>①</sup> 武则天<sup>②</sup> 和唐玄宗<sup>③</sup> 也各有几部传记,牛致功和赵文润的《隋唐人物述评》(1989 年)更涉及多人。还有汤用彤的《唐太宗与佛教》,高世瑜的《唐玄宗崇道浅说》(《历史研究》1985.4)等有特色的一批研究论文和李必忠的《评〈唐太宗传〉》(《华东师大学报》1984.6)等少数书评文章。多数传记在详尽地占有资料解释历史上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但除了袁英光、王界云的《唐明皇传》等书,不少传记似还缺乏带历史烙印的个人心理品格入情人微的描写,使著作更像一朝国史而不像个人传记,特别是过分强调规律性的体现,使人物工具化而缺乏个性的光彩,对生活环境细节的描述更普遍显得单薄枯涩,而史料的堆砌又使拼凑起来的人物形象缺乏性格发展的逻辑内涵。看来,好的历史传记的诞生要比制度史的工程更为艰难。

社会史、科技史、文化史这些曾一度相当冷寂的专史,在 80 年代以后又有起色。

文化史的研究,陈寅恪和向达两位先生在四五十年代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寅恪先生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代表作的制度文化研究,虽被批判为种族文化论,实已进入探索隋唐历史运动底蕴的深层次。觉明先生以名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为代表的研究,则以中西交通发展为背景,论述唐代文化发展方方面面的新气象。张广达先生继往开来,有志于做唐代西域与中原文明的逆向研究,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总结历史上我国的固有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相

① 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胡如雷:《李世民传》;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② 胡戟:《武则天本传》(1986 年);吴枫、常万金:《女皇武则天》(1986 年)。

③ 郑英德:《唐明皇全传》(1987 年);袁英光、王界云:《唐明皇传》(1987 年);阎守诚、吴宗国:《唐玄宗》(1990 年);许道勋、赵克尧:《唐明皇与杨贵妃》(1990 年)。

应成分相接榫的经验,是“既有选择、吸收、融合,也有拒绝、排斥、扬弃”,特别强调了交流过程中必要的创造性,研究充满时代关怀。

整个文化史研究涉及哲学、儒学、宗教、史学、地理学、文学、语言学、艺术、风俗和衣食住行各方面,普遍关注文化政策、文化冲突、文化精神以及文化的地区性差别,近年的情况可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中毛蕾的综述。中国文化中寄存有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文化的研究应从各种表象深入,致力于这密码的揭示。否则,只是各种文化现象的罗列,难免使人读了有不得要领之感。

唐代科技史研究的进步,明显是受到了70年代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英国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推动。唐代科技进步状况同前后时代作比较,是否是一个相对的低谷,学术界尚有争论。如果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唐代科技相对的被冷落,及其与文学辉煌的发展间的反差,应是一个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短长的切入点。

社会的研究大量论文集中在士庶问题上,李季平的《唐代奴婢制度》(1986年),高世瑜的《唐代妇女》(1988年)和牛志平有关唐代妇女、婚姻的一系列论文受到好评。

关于唐代边疆民族的研究,在吐谷浑史、吐蕃史、南诏史、突厥史、西突厥史、渤海国史等领域都有一些佳作,如周伟洲的《吐谷浑史》(1984年),《唐代党项》(1988年),段连勤的《唐代薛延陀》(1988年),林干的《突厥史》(1988年)。还有马驰的《唐代蕃将》(1990年)与章群的同名作可以做有趣的对照阅读,切磋学术。

古籍的整理有相当成绩,首先是标点本两《唐书》和《通鉴》的整理出版,《通典》、《唐会要》以下一系列有关唐代的史籍和笔记小说的出版,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新旧唐书人名索引》,《唐会要人名索引》,《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工具书的出版,正在编印陆续出版的还有《中华大藏经》、敦

煌社会文书和内容超过原《全唐文》一倍的新编全唐文。岑仲勉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1984年)和郁贤皓的《唐刺史考》(1987年)也是备受称道用功很深的力作。这些都给唐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贻惠海内外学者。李斌城等历年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和自1979年起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提供各年唐史研究的基本信息,只是中国史学会编的年鉴因经费困难有时推迟出版,近年更有难以为继之虞,令人不安。

由于“文革”时中断了正规的大学教育,80年代初一度令人担忧的后继乏人情况,近年已有相当改善,一批中青年唐史学者正在成长起来。但是由于长期受政治运动冲击,整个唐史研究队伍也受到太多的耽误和冲击,一批正直的知名学者受到伤害甚至含冤死去,唐史学界缺乏大师的情况看不到在短期内解决希望。

1980年成立的唐史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团结300名会员,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办讲习班和访古考察,编印十期会刊,组织包括《隋唐历史文化丛书》在内的31种正式出版物,努力地推动着唐史研究。1991年辞去美国SSA公司领导职务后专门致力于唐文化研究的罗杰伟先生,他设立的唐研究基金会已在中国开展工作,资助出版的《唐研究》年刊和《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已经面世。唐研究基金会还与中国唐史学会建立了固定的工作关系,除了资助学会的年会等多种学术活动外,还支持开办旨在培育一个对21世纪的唐研究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术群体的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以期对唐代历史文化研究有切实的推动。

应该说,迄今为止,我们对唐朝历史的总体研究还很不够,还说不大清楚唐朝历史发展变化的所以然。这方面值得重视金宝祥的《唐史探颐》(《西北师院学报》1986.2),吴宗国的《唐朝的特性》和张泽咸的《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年),分别从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到减轻,转折期不断的全面变革或地主农民状况等角度,力图说明唐朝历史大



趋势,在比一般具体专题更深入的层面上研究唐朝。我们期待有更多像抓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一样的关系全局性的本质事物作深入剖析的论著,来对唐朝历史发展线索作出明晰的解释。

当然由于史料的局限和工作条件的制约,我们对唐史研究认识的期望值要适当。相信只要好好继承前人来之不易的已有成果,努力开展同海内外唐史界的交流,再做些把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移到人权上去之类的调整,以努力阐明社会进步的历史轨迹,打破帝王将相史的旧框框,我想开创唐史研究新局面的前景还是光明的。

(本文所收资料,截至1991年底,全文原载于我主编的《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1992年10月出版的日本《中国史学》第二期先已摘要刊载。)

## 二十世纪的唐研究

唐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开始具有世界性的规模，中国大陆和港台之外，涉足唐史的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国家和欧美一些西方国家，均有可观的成绩。总共有近千著作和数逾二万论文刊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全面囊括了三十余种制度以及四百上下唐代人物。

推动二十世纪唐研究学术进步，有诸多积极因素，主要是：

一、进化史观、唯物史观和兰克史学、年鉴派史学，以及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的影响，气候环境、天文地理、文物考古等学科的交叉作用，使二十世纪的唐研究有别于传统史学，开始具有较多理论的和科学的色彩；

二、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和整理发表，以及包括不下六七千方唐墓志在内的大量文物考古新资料的发现和发表，极大地丰富了唐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三、计算机网络和各种复印复制技术的发展普及，方便了资料的检索传递和论著的撰写出版，研究工作的技术手段正在告别传统的手工方式逐步现代化；

四、唐史研究得益于内藤虎次郎、加藤繁、陈寅恪、唐长孺、严耕望、戴密微（Paul Demierill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等中外一批大师级学者的介入，代表着并提升了整体的学术水

平；

五、唐史研究还得益于本专业的一些专业学术团体的组织推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美国分别成立了唐史或唐代学会，韩国等国也有中国学会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会，得到政府或基金会、企业家的资助，开展学术活动，出版会刊、会报和论文集，方便了切磋学术，促进了信息交流。

二十世纪唐研究的具体成果，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唐代或隋唐的断代史著作；

二、关于唐代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民族史、科技史、文化史、宗教史、风俗史、生活史、对外交流史研究的专门史著作；

三、关于唐代各种制度研究的论著；

四、关于唐代政治事件、社会集团研究的论著；

五、关于唐代人物的传记和论文；

六、关于唐代文献包括敦煌吐鲁番资料、唐墓志、唐人诗文和笔记小说、古代民族文字资料的整理和工具书的编纂。

下列简表，以一批综论唐代的著作，反映各时期唐史研究的总体情况。表列内容分四部分：唐史专著；中国通史或东洋史中的唐史；汇编个人或多人唐史论文的集子；信息目录工具书。年代可注意本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代中期前、后，下半叶的1950—1965年、1966—1976年、1977—1999年，这样五个时间段的差别。

二十世纪四类唐史著作年表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张金铃 十七朝事新论 1902		
	柳诒徵 历代史略 1905		
	市村瓚四郎 支那史要 上海广智书局 1905		
	陈庆年 中国历史 武昌印本 1906		
	梁启超 中国四千年开化史 成都印本 1906		
			罗振玉 敦煌石室书目 上海虞罗氏 1909
			徐汇公学 历代帝王年号录 上海土山湾 1910
	葛陛纶 国史概论 1914		
			苏甲荣 中国地理沿革图 北京中国舆地制图社 1922
	上海新书局 中国五千年全史 上海新华 1925		陈垣 二十史劄记 励耘书屋 1927
			罗振玉 纪元以来朝国考 东方学会 1927
	孙嘉会 中华大历史 亲友学社 1929		
	张震南 国史通略 中华 1930		刘钧仁 中国地名大辞典 北平研究院 1930

一、新 代 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 文 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大矢透 隋唐帝国 东京大村书店 1932	土桐龄 中国史 北平文化学社 1931		臧励和等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商务 1930
三岛一 隋唐帝国 东京大村书店 1932	三岛一 东洋中世界 世界历史大系 1932		卓宏谋 中国历史年表 商务 1931
三岛一等 东洋中世史(二) 平凡社 1933	松井等 隋唐的盛世 世界文化史大系 1932		陈 垣 敦煌劫余录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31
三岛一等 东洋中世史(二) 平凡社 1933	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 商务 1933		万国鼎 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 商务 1933
	李泰荣 中国史纲(卷三) 上海新华 1933		
	黄现璠等 中国通史纲要 北平文化学社 1934		哈佛燕 唐诗纪事著者引得 哈佛燕京学社 1934
	邓之诚 中华二千年史(卷三) 商务 1934		哈佛燕 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 哈佛燕京学社 1934
			钱亚新 太平御览索引 商务 1934
			周一良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 哈佛燕京学社 1934
			聂崇岐 太平御览引得 1935
	缪凤林 中国五史纲要 南京钟山书局 1935		二十五史刊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刊 开明 1935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铃木德 隋唐时代 雄山阁 1937	刘师培 中国历史教科书 刘师培先生遗书本 1936		魏建新 中国历代疆域形势史图 上海中国文化馆 1935
	敏之 中国历史 上海读书生活 1936		刘师培 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 刘师培先生遗书本 1936
			王重民 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 北平图书馆 1936
			梁启雄 二十四史传目引得 中华 1936
			江宏声 中国历代年号索引 开明书店 1936
			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 二十五史编本 1936—1937
			黄大华 唐藩镇年表 二十五史编本 1936—1937
铃木德 隋唐时代 雄山阁 1937	章敬 中华通史 商务 1937		罗振玉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 上虞罗氏 1937
	佐野袈裟美 中国历史教程 (汉译本) 上海生活 1937		委亮夫 历代人物年表碑传综表 商务 1937
	朱翊新 本国史纲 世界书局 1938		商务印书馆 一通索引 商务 1937
	金兆丰 中国通史 昆明中华 1939		郭伯恭 水乐大典考 长沙商务 1938
	冈谷城 中国通史 开明 1939		
	李方叔 中国通史大纲 抗战先锋社 1939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陈恭禄 中国史 商务 1940		郭伯恭 宋四大书考 长沙商务 1940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重庆商务 1945	钱穆 国史大纲 长沙商务 1940		王重民 巴黎敦煌残卷叙录 (第二辑) 北平图书馆 1941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重庆商务 1944	金毓黻 中国史 重庆正中书局 1942		李士涛 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 长沙商务 1941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 新华 1942		范腾端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 (墓志类) 开明 1941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缪凤林 中国通史要略 重庆商务 1943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唐绍培 中华史纲 兰州青年印刷社 1944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吴 洋 中国历史简编 重庆峨嵋 1945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葛伯赞 中国史纲(第二卷) 重庆大呼出版公司 1946		万斯年 唐代文献丛考 开明 1947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胡玉堂 中国史简编 商务 1948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上编) 商务 1946	吕振羽 简明中国通史 三联 1949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中国历史 中国通史简编(中册) 研究会 新华 1949		
	尚 钺 中国历史纲要 人民 1954		
杨志玖 隋唐五代史纲要 新知识 1955	谢鹤轩 中国历史纲要 台北北开 1955		程光裕等 中国历史地图集 台北中华文化 1955
	黄大受 中国史纲要 台北世界书局 1956		滕岛达朗等 东方年表 京都平乐寺书店 1955
	翦伯赞等 中国历史概要 人民 1956		万国鼎 中国历史纪年表 商务 1956
岑仲勉 隋唐史 高等教育 1957	吕振羽 简明中国历史(修订本) 人民 1957		严耕望 唐仆尚丞郎表 台湾中央 研究院史语所 1956
傅乐成 隋唐五代史 台北中华文化 1957			中科院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 科学 1957
章 群 唐史 台北中华文化 1958			陕西省 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 博物馆 文物 1957
吴 枫 隋唐五代史 人民 1958			王重民 敦煌古籍叙录 商务 1958
吕思勉 隋唐五代史 中华 1959			
		岑仲勉 唐史余论 中华 1960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纲 三联 1961	冯明之 中国历史提纲 香港上海书局 1961	郭沫若 文史论集 人民 1961	
	张其昀 中华五千年史 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 1961~1963		
	拉铁摩尔 中国简明史(汉译本) 商务 1962		王重民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商务 1962
沈起炜 隋唐史话(上) 中国青年 1963	同舟川 简明中国史纲 香港文苑书屋 1963	缪钺 读史存稿 三联书店 1963	余秉权 中国史学论文引得 (1972~1962) 香港正东学社 1963
沈起炜 隋唐史话(下) 中国青年 1964			
	范文澜 中国历史简编第三编(修订本) 人民 1965	李树桐 唐史考辨 台湾中华 1965	王宝先 历代名人年谱总目 香港龙门书店 1965
	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三册) 人民 1965		
	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二册) 人民 1965		
外山军治 隋唐帝国 东京人物往来社 1967		严耕望 石刻史料丛书(甲、乙编) 台北共文 1966	
林天爵 隋唐史新编 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 1968		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论集 台湾大陆杂志社 1967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官崎市定 大唐帝国 东京河出书店 1968			
山本达郎等 东洋的专制帝国 东京集英社 1968			
布日潮颯等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5 岩波书店 1970	傅乐成 中国通史(增订本) 台湾大中国 1969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 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9	
谷川道雄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东京筑摩书房 1971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论集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72	
		李树柯 唐史新论 台湾中华 1972	
布日潮颯等 六朝与隋唐帝国 东京社会思想社 1974	钱穆 国史大纲(修订本) 台湾商务 1974		周次吉 太平广记人名书名家引 台北艺文 1973
布日潮颯等 隋唐帝国 东京讲谈社 1974	朝阳编辑部 中国历史简编 香港朝阳 1974	任育才 唐史研究论集 台北鼎文 1975	谭其骧等 中国历史地图集(五) 中华地图学社 1975
贝冢茂树 中国的历史·隋唐五代 中央公论社 1976	中国文 中国通史 台北华冈 1976		
中央公论社 1976	化学学院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日比野丈夫 图说中国历史(4) 东京讲谈社 1977	陈致平 中华通史 台湾黎明 1977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全集 台北九思 1977	箭内互 中国历史地图 台北九思 1977
宫崎市定 唐五代 岩波书店 1977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论文集补编 台北九思 1977	
		傅乐成 汉唐史论集 台北联经 1977	
黎杰 隋唐五代史 台北九思 1978	余玉荪等 中国通史 台湾商务 1978	林天蔚 隋唐史新论 台湾东华 1978	
	范文澜 中国通史 人民 1978		
菊池英夫等 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 汲古书院 1979	葛伯赞 中国史纲要 人民 1979	韩国枢 隋唐五代史论集 三联 1979	樊开印 中国历史疆域古今对照图说 台北森氏基金会 1979
傅乐成 隋唐五代史 长桥 1979		李树桐 唐史研究 台湾中华 1979	社科院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 中华 1979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一期 武大古籍系 1979	
	葛伯赞等 中国历史概要(修订本) 知识 1980	陈寅恪 寒柳堂集 上海古籍 1980	杨殿珣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 书目文献 1980
	白寿彝 中国通史纲要 上海人民 1980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古籍 1980	万曼 唐籍叙录 中华 1980
	天津师院 中国简史 人民教育 1980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古籍 1980	张忱石等 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 中华 1980
	赵振绩 中国通史史纲 台湾新士林 1980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二期 武大历史系 1980	许逸民 初学记索引 中华 1980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宫崎市定 中国史(汉译本) 台北华世 1980		方诗铭 中国历史纪年表 上海辞书 1980
		汪篌 汪篌隋唐史论稿 中国社科 1981	
		黄烈等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 中国社科 1981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三期 武大历史系 1981	
	李培浩 中国通史讲稿(中) 北京大学 1982	吕思勉 吕思勉读史札记 上海古籍 1982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四期 武大历史系 1982	
		金宝祥 唐史论文集 甘肃人民 1982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 人民 1983		黄烈等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 中国社科 1983	Nienhauser 唐学报第一期 美国唐学会 1983
姚大中 中国世界的全盛 台湾三民 1983		中国唐史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 1983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五期 武大历史系 1983	
		宁可等 丝路访古 甘肃人民 1983	
吕思勉 隋唐五代史 上海古籍 1984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六期 武大历史系 1984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一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4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吴枫等 隋唐五代史 辽宁人民 1984			Nienhauser 唐学报第二期 美国唐学会 1984
乌廷玉 隋唐史话 北京 1984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二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4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三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5
			Paul Kroll 唐学报第三期 美国唐学会 1985
			张泽咸等 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 (1900-1981) 江苏古籍 1985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四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5
王寿南 隋唐史 台湾三民 1986		卞孝萱 唐代文史论丛 山西人民 1986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五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6
		陕西人民 汉唐文史漫论 陕西人民 1986 出版社	Paul Kroll 唐学报第四期 美国唐学会 1986
		宁可等 晋秦豫访古 山西人民 1986	
		田余庆等 运河访古 上海人民 1986	
		唐代史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律 研究会 与国家 汲古书院 1986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崔瑞德 剑桥中国史·隋唐篇(上) (汉译本) 台湾南天 1987		史念海等 唐史论丛 第二辑 陕西人民 1987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六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7
		史念海等 唐史论丛 第三辑 陕西人民 1987	Paul knoll 唐学报第五期 美国唐学会 1987
王仲荦 隋唐五代史 上海人民 1988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九期 武大历史系 1987	
唐长孺 隋唐五代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 1988		唐代史研究会会报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1988	Paul knoll 唐学报第六期 美国唐学会 1988
杨根相 等 大唐兴亡三百年 新华 1989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十期 武大历史系 1988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七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8
		史念海等 唐史论丛 第一辑 陕西人民 1988	
		史念海等 唐史论丛 第四辑 陕西人民 1988	
		李树桐 唐史素隐 台湾商务 1988	胡戟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八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89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三秦 1989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二 代的行政地理(汉译本) 上海古籍 1989
		陈寅恪 陈寅恪读书札记·唐书 新唐书之部 上海古籍 1989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六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汉译本) 上海古籍 1989
		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论文 文集 台湾唐代研究者联 委会 1989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九 李白的作品(汉译本) 上海古籍 1989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谷川道雄等 中国通史(汉译本) 台湾稻乡 1990		黄约瑟等 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 选 三秦 1990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十 代散文作品(汉译本) 上海古籍 1989
崔瑞德 剑桥中国隋唐史(汉译本) 中国社科 1990		史念海等 唐史论丛 第五辑 陕西人民 1990	牛志平等 中国唐史学会刊第九 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0
		瑞特等 唐史论文选集 台湾幼狮 1990	高明士 中国史研究指南 台湾联经 1990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一-唐代 的历(汉译本) 上海古籍 1990
	张传玺 中国古代史纲(下) 北京大学 1991	严耕望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台湾联经 1991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三 唐代散文作家(汉译本) 上海古籍 1990
	集英社 中国的历史(5)(汉译本) 国际文化 1991	中国唐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三秦 1991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四 唐代的诗人(汉译本) 上海古籍 1991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十一期 武大历史系 1991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五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索引 上海古籍 1991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七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 上海古籍 1991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八 李 白诗歌索引 上海古籍 1991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大学 1992			平冈武夫 唐代研究指南第十一 唐代的诗篇 上海古籍 1991
			Paul knoll 唐学报第八、九期 美国唐学会 1991
			牛志平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 十一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1
			唐代史 唐代史研究会会报 4 研究会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1991
		汪钺 汉唐史论稿 北京大学 1992	牛志平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 十一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2
		中国唐 唐代研究论集 1-4 辑 代学会 台北新文丰 1992	唐代史 唐代史研究会会报 5 研究会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1992
		刘俊文等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 者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 中华书局 1992	方积六等 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 说人名索引 中华 1992
		唐代史 中国的城市与农村 研究会 东京汲古书院 1992	
		中国唐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史学会 三秦 1993	唐代史 唐代史研究会会报 6 研究会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1993
		中国唐 第二届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史学会 集 台北文津 1993	牛志平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 二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3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赵克尧 汉唐史论集 复旦大学 1993	
		黄约瑟等 隋唐史论集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十二期 武汉大学 1993	
		唐长孺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十二辑 武汉大学 1994	高明上等 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五 期 台湾中国唐代学会 1994
		郑学檬等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马驰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三 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4
		南开大学 纪念杨志玖教授八十华 诞中国史论集 历史系 天津古籍 1994	吴钢等 全唐文补遗 第一辑 三秦 1994
		张洙日等 存史上麟锡教授还历纪 念唐史论丛 唐史论丛编委会 1995	吴钢等 全唐文补遗 第二辑 三秦 1995
		史念海等 唐史论丛 第六辑 陕西人民 1995	马驰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四 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5
		河北师院 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 辰中国古史论丛 历史系 河北教学 1995	
		朱新江等 唐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 1995	杨志玖等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 五代史 上海辞书 1995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吴宗国等 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 (隋唐卷) 广西人民 1996		朱雷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四辑 武汉大学 1996	张国刚等 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论集 第十九卷 中国社科 1996	吴钢等 全唐文补遗 第三辑 三秦 1996
		胡戟等 唐研究纵横谈 中国社科 1996	高明士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修订本) 台湾明文 1996
		荣新江等 唐研究第二卷 北京大学 1996	马驰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五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6
布日潮汎等 隋唐帝国 讲谈社学术文库 1997		朱雷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五辑 武汉大学 1997	马驰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六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7
俞钢 华夏五千年·隋唐五代 上海辞书 1997		谷川道雄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の基本问题 东京汲古书院 1997	气贺泽 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 保规 东京汲古书院 1997
		刘健明等 黄约瑟隋唐史论集 中华 1997	胡戟等 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 (1982-1995) 陕西师大 1997
		朱雷等 唐代的历史与社会 武汉大学 1997	吴钢等 全唐文补遗 第四辑 三秦 1997
		荣新江等 唐研究第三卷 北京大学 1997	
		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 中国社科 1997	
		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 台湾稻禾 1997	

一、断代史	二、中国通史·唐代	三、论文集	四、信息资料工具书
葛承雍 煌煌盛世—龙蛇沧桑隋唐卷 中国青年 1998		荣新江等 唐研究第四卷 北京大学 1998	杜文玉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8
吴宗国 隋唐五代简史 福建人民 1998		史念海等 唐史论丛 第七辑 陕西师大 1998	砺波护等 唐代史研究创刊号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1998
史念海等 陕西通史·隋唐卷 陕西师大 1998		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年诞辰论文集 厦门大学 1998	吴钢等 全唐文补遗 第五辑 三秦 1998
		宁可 宁可史学论集 中国社科 1999	杜文玉等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期 中国唐史学会 1999
		荣新江等 唐研究第五卷 北京大学 1999	堀敏一等 唐代史研究第2号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1999
			钟肇鹏 新编道藏目录 北图 1999
			高峽等 西安碑林全集 广东经济 1999
		吕思勉 吕思勉说史 上海古籍 2000	国家图书馆 历代碑刻史新汇编 北图 2000
		胡戟 胡戟文存·隋唐历史卷 中国社科 2000	北图 敦煌资料丛编三种 北图 2000

此外,制度史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成为热门,成果颇丰。诸如:皇帝制度、宰相制度、三省制度、中央决策制度、文官制度、散官制度、谏官制度、御史制度、监督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门荫制度、铨选制度、考课制度、吏制、兵制、监军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封爵制度、食封制度、品阶制度、俸禄制度、致仕制度、律令制度、流放制度、财政制度、两税预算制度、和籴制度、专卖制度、市场管理制度、馆驿制度、关津制度、礼仪制度等等,林林总总,初步展示出唐代社会管理有序的风貌。具体的研究情况,将在本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中分叙。

中国学者关于唐代的断代史专著出现稍晚,四十年代才由陈寅恪先生的两部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奠基,却因此一开始就起点很高。他的学生蓝文徵出版了第一部隋唐五代史,惜仅有关于政治史的上编,下编始终未见出版。而其唐前期侧重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期则是安史之乱、方镇之祸、宦官之祸的写法,成为后来唐史的基本构架,这似有《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的影响。

1955年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面世之后,大陆和台湾出版了七八种断代史专著,六十年代开始又有个人的文集出版。但在1966年爆发的“文革”十年期间,中国大陆的这些唐史、唐史论文集,包括中国通史的出版都中断了,学术研究出现大倒退,大停顿到近于空白,所幸香港和台湾仍在进步,还开始出版陈寅恪先生的论集。

“文革”结束后,到七十年代末大陆的学术研究才又恢复。1980年10月在郭琦、唐长孺、王仲荦、史念海等先生倡导推动下成立了唐史研究会(1984年3月更名为中国唐史学会),1983年又成立了以季羨林先生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十余年来,两会有力地推动了唐史研究和敦煌学、吐鲁番学的进步。加上学术环境比前有所改善,大陆的唐史研究达到每年刊出三四百篇论文和

数十部著作的水平,并形成了以老学者为中心的若干学术重镇。

首先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在唐长孺先生精心培育下梯队完整,实力雄厚,该室1979年创办的刊物《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至1998年已出版了十六期(辑),是学风正,水平高,国内最好的史学刊物之一。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敦煌学、唐史和唐代考古,有向达、汪篔、王永兴、宿白、张广达等先生为学术带头人,奠下深厚根基,邓广铭先生创办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汇聚了许多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北大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和唐史研究的学术重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人才济济,在1981年和1983年出版了两辑《魏晋隋唐史论集》,1985年还编印出版了《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00—1981),近年出版多部高水平的个人专著,是与武大、北大鼎足而立的唐史研究学术重镇之一。

此外还有已故陈寅恪先生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史念海先生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和历史系、杨志玖先生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韩国磐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金宝祥先生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敦煌研究室、已故缪钺先生所在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已故胡如雷先生所在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唐史研究所、李埏先生所在的云南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宁可先生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吴枫先生所在的东北师大历史系、林干先生所在的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西南师大历史系、新疆大学历史系、江西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唐史研究方面均建树颇多,其中陕西师范大学是中国唐史学会会址,1987年以来出版了七辑《唐史论丛》,1997年编印了《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82—1995),2000年又续编该目录(1996—1999)。

1949年后大批学者到香港,在罗香林、全汉升、严耕望、饶宗颐等先生带动下,出了几代学者,唐史和敦煌学研究方面均有出色成绩。八十年代后,已故黄约瑟先生在推动大陆和港台之间,乃至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方面,起了积极的令人怀念的作用。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终保持了其学术重镇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该所的集刊和出版物始终对唐史界和整个学术界保持着影响力。傅乐成、章群、王寿南等先生在台湾均有唐史专著出版,李树桐、傅乐成、林天蔚等先生有唐史论文集出版。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至1986年黄永武先生编的140册的《敦煌宝藏》较全面收入了俄藏以外的敦煌文献影印件和艺术品图片,这和毛汉光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的出版,都是学界的福音。

1984年5月台湾成立了唐代研究者联谊会,三年后有国内外会员近百名。每年定期召开年会,出版会讯。1988年、1992年两次举办国际唐代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1989年改名中国唐代学会,在1992年即出版了唐代研究论集1~4辑,内容兼及唐代文学、历史和敦煌学。

五十年代以后在一批高水平唐代学者带领下,台湾一批批年青学者成长起来,半个世纪中持续不断努力,发表论著甚多,内容和出版质量俱佳,成为唐研究的一方主力。台湾学者潜心研究中国历史的价值不仅限于学术层面,对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对一个中国的认同贡献甚伟,我们对之表示敬意。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起步很早,在唐以前的隋代大业四年(608年)倭王多利思比孤应即推古女皇就曾对隋使裴世清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隋书·东夷·倭国传》)从此遣隋使、遣唐使不断派往中国,

大化革新(645年)更全面吸取中国典章制度,以至日本的法制以唐律令为母法,日本古代国家的最盛时期也被称为“律令时期”。

一般认为是公元891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从中国带去的汉籍数达1579部,16790卷。由开元盛时《古今书录》总计大唐四部书为3060部,51852卷来看,日本当时拥有的汉籍数量十分可观,正可见其全面借鉴汉文化的规模。

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翻刻了《隋书》、《唐书》等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二十世纪初那波利贞留法时曾协助伯希和整理敦煌遗书,带回笔记。仁井田陞也有抄本。日本还有大谷探险队多次从敦煌弄去的遗书,称大谷文书,本世纪中叶在大谷旧宅发现后交给龙谷大学,成立了研究机构,1958—1961年在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和一卷别册上发表了资料和研究成果。

由于日本长期使用汉字,阅读汉籍有方便之处,收藏资料又丰富,在国外研究唐代处于优越地位。一百年来,创立的近代学科东洋史学,成绩斐然。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了“东洋史学专攻”,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也设立了“东洋史学科”,以内藤虎次郎(1866—1934)、白鸟库吉(1865—1942)、桑原鹭藏(1871—1931)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分别担任两校东洋史三个讲座,培植起两大汉学中心。京都、东京两派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看法不同。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内藤虎次郎认为后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过后汉后半期到西晋的第一个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过唐末至五代的第二个过渡期,至宋元明清为近世。“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式微,代替的是君主独裁政治”,所以“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10年)。

三十年代以后活跃的第二代学者开始了隋唐史的专门研究,主要学者有宫崎市定、滨口重国、曾我部静雄、日野开三郎和加藤

繁、那波利贞、玉田是博等。五十年代以后活跃,现在多已年逾古稀退休了的第三代学者,有布目潮汎、西嶋定生、堀敏一、古贺登、谷川道雄、池田温等,是学力坚深,学术上有颇多建树的一代令人尊敬的学者。往下还有已是学界中坚的第四代和正在迅速崛起的第五代中青年学者。百年来日本学者梯队完整,耕耘不辍,在唐史领域的研究起步早,第一部唐断代史和第一部唐论文集的发表,乃至唐代研究学会的成立,均在中国之前。系列的《敦煌讲座》展示了日本学者在敦煌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虽然重对历史问题的精细考究而不喜欢多作历史评价的学风和中国大陆学者有很大差异,但在一些研究领域中的高水平乃至领先水平,时时激励中国学者要“务着先鞭,不可再落人后”(任二北语)。

韩国有和日本一样同处在汉文化圈内的历史背景,韩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有很深的中国素养,也努力吸收中国文化。但是韩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少有进展,要比日本逊色,其原因,金铎敏先生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除了朝鲜后期的实学研究者,传统时代大部分学者把中国当作理想模型,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实体,所以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史书的内容,力图从中获取政治统治的教训,因而谈不上实质的研究;其二,具有上述的中国学修养的统治阶层主导了历史,而丧失国权和殖民地的现实大大降低了对中国学或汉学的兴趣和研究水平;第三,殖民地时代难于建立韩国人自己的大学,近代史学无法立足,所以传统时代的汉学也就无法与现代的中国史研究接轨。”

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才开始了正式的现代的研究。1949年全海宗发表了《唐代均田考——以户籍为中心考察其实施状况》,由于1950——1953年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黑暗政治,唐代史在整个五十、六十年代里几乎没有进展。七十年代开始出



现较多论文,八十年代以后逐步打开与外国交流的局面,近年对史料进行了较有深度和广度的探讨,韩国的唐代史研究进入正常轨道。

得益于韩国切实发展教育的国策,大学学历的普及率达到近40%的世界第一水准,韩国还有关于企业利润必须拿出一个份额来赞助国家级研究所或大学科研的规定,韩国中国学会到1997年为止已召开过17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在1998年出版了第三十八辑《韩国中国学报》,其中发表了不少各国有关唐研究的论文。近年韩国魏晋隋唐史学会也比较活跃,发表具有专业水准的唐史论文的学者多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不下20名,还有一些在中国攻读唐史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这些都给未来的研究带来了希望。

新加坡由于古正美和李志贤两位在佛教和武则天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唐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西方国家中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关于唐研究的成果。

西方各国的汉学,法国最有传统和根基。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石室挑走大量精品,其中汉文写本即有近四千卷之多,前他一年去敦煌的斯坦因不懂汉文,面对石室宝藏扼腕长叹,只能求助蒋孝琬帮他挑拣,而伯希和自己翻检一遍,把有纪年的汉文文书和其他非汉文的古代文字文书几乎尽数搜走,以至他认为没有再来的价值,不像斯坦因后来还再三到敦煌觅宝。伯希和的老师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89年沙畹任法国驻华公使馆专员,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先后发表多种译注的汉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西突厥史料》(1903)及《补

编》(1904),他曾参加英法等国所获敦煌西域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1902)、《古代和田》(1907)、《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的汉文文书》(1913)、《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1—1913,与斯坦因合撰)。伯希和1908年或实际是1909年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EFEO)第8卷3、4期上发表的《甘肃发现中世纪的文库》,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敦煌学的发端。1920—1924年他又将所撰敦煌壁画照片编印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他的包括石窟笔记在内的大部分遗稿被编为《伯希和遗稿丛刊》。法国学者称:“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爱的孤儿一样。”

沙畹另一学生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924—1926年任中国厦门大学教授,1944年任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教授,又继马伯乐(Henri Maspéro)为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和文明讲座教授,曾促成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敦煌文献研究组(简称第438联合组)的成立,有名著《吐蕃僧诤记》(1952年初版名《拉萨宗教会议》)等多种著作发表,被誉为“法国敦煌学之父”。

戴密微的弟子谢和耐(Jacques Gernet)有代表作《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另一弟子苏远鸣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敦煌文献研究组主任,编制《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1979、1981、1984年连续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是目前西方唯一的一套敦煌学论著专集。

在法国还有一批敦煌藏文写本研究者,如巴科、斯巴尼安、哈密顿等。

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等多所院校培养了不少汉藏语言文献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1959年以后又吸收了允丹嘉错等藏族学者参加。近年张广达教授主持过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前后参加438组工作的主要成员除戴密微、谢和耐、苏远鸣外,还有藤枝晃、饶宗颐、吴其昱、左景权、梅弘理、戴仁等十余

人,开放式的组织汇聚了一批当代各国的优秀敦煌学家,使法国的敦煌学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平,一直处于欧美的领先地位。以敦煌学见长,正是法国唐研究的特点。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907年先于伯希和到敦煌以后,1914年再到敦煌,弄去的敦煌文书,据1957年伦敦出版的《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数达8102件,另外还有英联邦事务部图书馆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斯坦因本人没有直接研究汉文文书的能力,于是交由沙畹在张凤协助下整理考释,王国维、罗振玉为沙畹审订书稿。

英国人魏礼(Arthur Waley)1960年出版了《敦煌的民谣与故事选集》。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除了发表《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统治阶层的成分》(1973)和《敦煌发现唐水部式残卷》、《敦煌唐格残卷札记》等敦煌学论著外,他主要研究隋唐史,著有《唐代财政制度》、《唐代官修史书著作》,还和费正清共同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其中他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的汉译本已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反映西方学者研究隋唐史的新成果,视角与中国学者多有不同,观点新颖,反映颇好,是西方学者研究隋唐史的扛鼎之作。

意大利不忘马可波罗的传统,对东方仍有相当关注。设立在日本的东方研究所,所长福安敦(Antonino Forte)先生据敦煌遗书S.6502号及相关文书研究写了《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意识》于1976年在那波里出版,被认为是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最重要的西文书籍,对武周政治多有创见。

美国1983年成立了美国唐研究学会,发行《唐学报》(T'ang Studies),有会员五十余位,时有研究唐代文史的论文发表。只是

数位知名学者过早相继去世,影响了美国唐研究的水平。

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 Corey)先生笃爱唐代文物文化,本人潜心钻研外,创办了唐研究基金会,资助美国学者从事唐研究,也资助中国出版《唐研究基金会丛书》,至1999年已出版14种。唐研究基金会资助,由荣新江先生主编的《唐研究》年刊,自从1995年出版第一卷以来,已出至第五卷,被公认是中国最有水平最有分量的学术刊物。唐研究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唐史高级班自1994年开始策划,1996年以来举办了多期活动,在国内外三十余名学者共同努力下,将于2001年完成四卷本的《二十世纪的唐研究》世纪总结。

在我们珍惜地总结和评价本世纪唐研究的业绩和进步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国内外交流不畅,国内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大量重复,甚多剪刀加浆糊、人云亦云的拾人牙慧甚至跟风抢进之作。观念受传统和时政的双重影响制约,思想不够活泼新鲜,学术水平难于提高,历史研究没能达到应有水准和取得应有社会效益,不免有被社会冷落之虞。究其原因,妨碍唐研究学术繁荣,起负面影响的因素有下列一些:

一、本世纪初以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国家长期处于应付外来侵略和内战分裂状态,变幻无常的政治形势对学术干扰甚大,学者的人格尊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得不到保障,学术研究缺乏良好条件,甚至在极左思潮控制下,被引上阴谋史学的歧途。大大伤害了历史学科的尊严和信誉;

二、大批优秀学者在战争年代颠沛流离,在政治运动中被中伤摧残。文革造成人才培养的大断层,商品经济大潮下又有众多人才流失。诸多因素影响正常的学术梯队建设和学术积累,缺乏大师的现状使总体的学术进步处于徘徊状态;

三、史学批评严重滞后,党同伐异、名利熏心的学阀作风压制

新人成长；

四、学术交往和信息沟通方面存在障碍，资料检索和工具书缺乏而且编纂工作不受重视，电脑应用不够普及。

所以在作世纪回顾时，我们对唐研究的总体水平似难于乐观。比如对于唐代政治，还说不很清楚庞大的唐帝国的国家机器如何高效率地运作，大家仅瞩目于帝王将相的个人行为和纸面上的制度，仍属帝王之学；对于唐代经济，还说不清农民和各阶层人的经济生活实况；对于唐代文化，表象的描述居多，深层的精神发掘尚少；研究大唐近三百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优劣变化，并依此对唐代这一历史时代作出评价的论著还很匮乏……因此讨论对唐朝这个时代的总体认识时，因为心里若明若暗而难于言表，以至好像这是一个要三五十年以后才能讨论的题目。显然对这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历史的底蕴，还不甚了了。

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陈寅恪先生奉为人生圭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享受，当史家能够充满时代关怀又不受政治摆布，自由地耕耘在史学这片只讲真话的净土时，二十一世纪的唐研究一定会取得真正伟大丰硕的成果。

（本文作为四卷本《二十世纪唐研究》的序篇，充《政治卷·概论》）



## 浅谈武则天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武则天重新受到学子和社会各界的青睐。《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sup>①</sup>、《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sup>②</sup> 这些标题文章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粗略统计，从那时以来，刊发的关于武则天的论著文章已逾三百，数目正和诗三百篇相当。武则天俨然已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最受瞩目的人物之一。

分时间而言，大致是建国前 26 种；建国后“文革”前 74 种，其中在 1959 年、1960 年关于越剧《武则天》和郭沫若的话剧《武则天》上演后引起的讨论热潮中发表的占十分之九；“文革”后期至 1979 年底 75 种，绝大多数是所谓“评法批儒”和批判阴谋史学的文章；1980 年至 1988 年 128 种，而在咸阳、广元、洛阳和文水四次武则天研究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即有 106 篇之多，并出版了《武则天与乾陵》、《武则天与洛阳》和《武则天与文水》三个文集，还有三秦、辽宁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几本武则天传记，即胡戟的《武则天本传》、吴枫和常万生的《女皇武则天》、郁贤皓和方义兵的《女皇帝武则天》。

顺便还可以提一下，香港的 40 集电视连续剧《武则天》、日本

---

① 《妇女杂志》15 卷 12 期，1929 年 12 月。

② 《妇女月刊》3 卷 1 期，1943 年 7 月。

原百代《武则天传》两种中译本和山东、东风、长江几个文艺出版社的《女皇武则天》、《则天女皇》、《风流武媚娘》等小说的推出,使前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武则天热。

若以三百种论著的内容而言,对武则天生平作评介的占76篇,论武则天政治的72篇,两类合计占全部论著近一半。其余,综述与评论文章30篇,有关文物和乾陵的40篇,关于武氏先世及其子女后人的17篇,关于武则天出生地的11篇,关于武则天诗文和戏剧的15篇,而涉及当时经济、社会、宗教、民族、军事的论文都不过三五篇或七八篇,关于当时文化、中外关系、武则天性格心理的论文则近乎空白阙如。选题很不平衡,且很多重复,泛泛而论多,对当时社会具体情况、施政后果作深入剖析者少,以至对武则天从政数十年的社会变化和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各方面政绩的成败优劣尚少令人信服的中肯结论,对从贞观到开元之间承上启下时代历史运动的内涵还不甚了了。人们早已不满足于用古代历史家的片言只语来代替我们的评论,切实提高研究水平的任务,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特别应该看到,港台和国外有关武则天的研究专著的出版,比我们更着先鞭。先后计有:[英]菲茨杰拉德《女皇武则天》,伦敦1956年出版,台北虹桥书店中译本;[日]外山军治《则天武后》,中央公论社新书99,1968年出版;[美]格伊瑟《武则天》,华盛顿1978年出版;雷家骥《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捧书生《武则天外传》,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985年出版;[日]泽田瑞穗《则天武后》,集英社1986年出版,三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出版。这种情势,更使我们有一种推进武则天研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能再落于人后的紧迫感。

首先是关于武则天本人的历史还有许多争议,要着力澄清这些问题,比如:

1.对武则天的出身门第怎么看?是士族高门还是寒门新贵?《攀龙台记》和《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书所述其高祖武居常以上至七世祖武洽都任高官,有封爵晋阳公或寿阳公,这些是否可信?家世究竟给了武则天什么样的影响?

2.唐太宗召武则天入宫,封才人,那十二年武则天境遇如何?她很得宠还是受冷遇了?唐太宗为她提供传习政治的机会了吗?

3.武则天二次入宫后,内外廷是否有一个反对派关陇集团与她作梗?废王立武事件具有寒族地主反对士族地主的社会意义吗?

4.王皇后、萧淑妃之死的真相如何?人讠说是引用汉吕后杀戚夫人故事杜撰的,还是真有其事?唐高宗皇帝如何能够容忍此类事件发生?

5.唐高宗与武则天政治上是一种什么关系?二圣时期的高宗皇帝是尸位于上的傀儡吗?

6.武则天扼杀女婴是否历史事实?李弘、李贤之死的真相如何?李贤生母是谁?

7.裴炎与扬州事件有无干系?

8.对武则天的男宠问题该怎么看?说她淫乱一塌糊涂,有无渲染夸张和传统观念歧见?

9.狄仁杰、姚崇、宋璟、朱敬则、陈子昂等比较有头脑有作为的官僚,和武则天是什么关系?武则天的统治是否得到了众多正派官吏的真诚支持?

10.无字碑无字之谜,是武则天自己不让写字还是唐中宗不愿写或不好写而空白的?

除以上这许许多多具体问题,武则天研究中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

其一,对武周乃至整个武则天治国政绩的评价,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边疆民族政策方面的评价。为什么“逃户过半”而没有引起



成规模的农民起义？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是处理好了，还是搞乱了？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其二，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和主观条件、机遇造就了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其三，武则天对妇女史、女权运动史的影响，她在中古世界史上的女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在近年活跃的武则天研究气氛中，我们还感到有一种难以有突破性进展的困惑。应该承认，学术研究工作的大踏步推进，在理论上、方法上、手段上、观念上有种种主客观困难，这也是当前史学界都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不是把这看成史学危机。

也许可以把历史区分成以下三个层次：历史Ⅰ，指过去的活生生的历史；历史Ⅱ，历代保存下来的史料和有史料价值、认识价值的史籍；历史Ⅲ，我们致力于研究撰写的具有尽可能多真理性的历史论著，终极目标是尽善尽美地描述过去历史的全貌，并说明以往历史运动的本质，揭示其中人类精神的内在积极性，给人以鉴古知来的某些启示，这具有绝对真理性质的认识价值，要在人类无穷尽的认识长河中方得以完全实现。换言之，任何一代的史学著作，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只能接近而不能达到那个可望不可及的终极目标。

其原因有二：

一、从主观上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掌握迄今积累的全部史料，能融汇贯通各门相关学科的必要知识，对历史进行充分的研究。更不要说，实际上每个时代都在为自身的需要，在重新塑造历史，改写历史，或者说在重新认识历史。无论怎样说：“历史总该是为接近于真实而作出的最严肃、最有步骤的努力的结果。”<sup>①</sup> 众多史学家的这种真诚愿望，结果总是打了折扣，他们被无法摆脱的种

<sup>①</sup> [法]伊雷尔·马鲁《历史如同知识》，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种时代的和社会的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左右,不由自主地或多或少背离着纯客观的“公正”和“信史”的原则。因此我们更可以期待——在许多场合也只得期待——新的时代,获得新的自由的历史学家,以新的理论观念,新的方法手段,站在新的高度角度,对历史研究的老题目提出新见解。我们相信,后来的历史家对以往历史的研究,会提出超越前人的新成果。这是一个不断更新永无止境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历史课题研究价值的永恒性。

二、从客观上说,历史学和允许虚构创作的文学不同,和依靠思辨逻辑演绎的哲学不同,也和物理、化学、天文学等所有使用实验观察手段的自然科学不同,历史Ⅲ只能借助历史Ⅱ,以及其他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历史遗存,来说明和研究历史Ⅰ,但是历史Ⅱ是历代有思想倾向的史学家们有选择有褒贬的记载,从春秋笔法到阴谋史学,无不有意地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历史,这样的历史Ⅱ,只能是历史Ⅰ的一个片面,甚至面目全非。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记述并不可全信,因此哪怕你能做到事事有根据,字字有出处,仅按以往保存下来的资料来回排列组合,搞剪刀加糨糊的史学,是跳不出前人窠臼的。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史料去虚构历史。存在着这样的困难,我们就不能指望在历史研究中轻而易举地穷尽真理。

那么在历史Ⅱ的限制下,追求历史Ⅲ有成功之路吗?的确,那很渺茫。面对支离破碎,存在许多疑问和空白的历史材料,每当要讲清一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不得不借助推测和想象力来衔接长链上的缺环。在自然科学中,这种假设是科学的方法,随着实验手段的进步,假设的成分最终可能被发现,因为那需要填补的缺环本来就是客观存在,只是认识的局限,一时没被发现而已。历史的缺环则因材料已经湮没永远消失,甚至连文物和遗址上都不留痕迹,于是只得靠智慧的分析判断去填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不能用实验重新合成一次历史事件来验证自己的论点,所以历史家的论

述要具有说服力,便有十分的难度。事情的好处也恰恰在这里,要把颠倒的一切颠倒过来,要将湮没的许多恢复起来,要在无法实验的条件下把历史复原摹写出来,要在无数杂乱无章充满偶然性的事件背后,把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寻找出来,历史家需要智慧,也考验着他们的智慧。而且只有在史家的智慧与读者的智慧的接合处,新的史观史论才能具有魅力并实现其社会价值。

我们回过头来具体讨论一下今后如何推进武则天研究这样的历史问题。

首先我以为,理论上的突破将是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的关键。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借用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像物理学、化学或哲学、经济学那样,形成历史学本学科的史学理论体系,使中国史学像一门缺乏理论力量的学科而少有生气。需要通过对历史哲学问题的探讨,寻找解决历史Ⅰ、Ⅱ、Ⅲ之间矛盾的途径。实事求是地确定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对历史学寄予的期望值,把历史从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对于武则天研究这样备受史料的残缺、湮没局限的题目,也许可以特别寄希望于模糊理论的运用,借鉴模糊数学的理论原则,创立模糊史学理论,据以处理已残缺的不确定的史料,或许可以使研究结论比较容易接近历史实际。这更提醒我们,不要轻言信史。

这里也有方法论的问题。一个个情状各异的历史课题,往往是先要煞费苦心摸索适当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门径。求索一种既有分析人物内心世界复杂活动的深度,又有揭示外部社会种种联系的广度的具体方法,运用于武则天研究这样的具体题目上,恐怕非经过来来回回多少次“颠倒”——我喜欢喻之为对心爱之物的“把玩”——不能接近人物的真实面目。应该承认,单个人的才力智力往往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发挥群体的力量,按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展开自由的辩论和评论,一起进行探讨。学会和研究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难免重蹈分

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的挫折。我想应特别提倡搁置已久的学术批评,火花都是碰撞出来的。

还有,文风的革新也很要紧。不知为什么,我们史学论著的文字也有点模式化了。大家都称赞《万历十五年》的文采,可是国内竟无人作一次同样的尝试。现在流行的单调的教科书体,并不能容纳和适应再现历史全貌的要求。近年兴起的博士论文体,作为一种新的模式,更加繁琐枯燥。作为人的历史,应能充分表现历史人物的心理性格和声音笑貌,但现在的人物传记,总不免给人一种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简单翻版的印象。尽管从历史系的大学生到博士论文的评审教授都头疼看干涩繁琐的论文,可是好像论文只能那样选题那样写。史学的沉闷不能不说与文风有直接的关系。历史家不仅要面对过去的历史,他们在著述时,原本还应想着今天的读者。历史著作如果没有读者,讲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统一,一定是一句空话。

要从多方面努力,创造出自己的史学理论和风格,别再让史料和文章模式捆住手脚,在历史研究中走出一条成功的路。虽然一代两代人走不到尽头,也要尽可能远地走一段。我想这样做起来,我们的武则天应是一个很好的实践题目,有着令人鼓舞的前景。要知道,她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据信是没有被盗掘过的陵墓——乾陵存世,那像一张没有亮出的底牌,当这座文物宝库打开的时候,关于她的无知妄说将受到无情的奚落,而研究家们的一切真知灼见被新史料证实时将大放异彩。自郭沫若以下每一个潜心研究过武则天的学者,无不热切盼望自己能嗅到“思想——人间最美丽的花”放出的令人心醉的芳香。

(原载 1988 年 9 月 13 日《太原日报》,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 年 9 月出版)

## 论 治 史

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归根结底在于她独特的文化,其中尤其重要的一方面,是对自己历史的认同,藉此涵养出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因此,科学地总结传统文化,将国民的凝聚力汇集在进步向上的共识上,成为我们历史教学和每一个历史学者的神圣职责。

能不能自觉地恪守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史德问题。中外历史上都不乏有为讨回公道、讲真话而殉职的良史,千秋万代,成为社会正气的象征,人们仰慕的表率,这是首要的一点。

关于史才与史识,就是如何把学问做起来,这就是要善于学习和积累,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锻炼的问题,积以时日,或许能得到一种悟性,学术上的创造性。不然,最多是一个将史料不断排列组合,拼凑文章的糨糊匠,或者凄惨如不少皓首穷经,一生读死书、死读书的人,只是把书库搬进了脑子,成为一部活字典,聊备查索顾问而已。至于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把学问做起来,提出自己对历史的真知灼见,让人信服,也许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想,但是这样的努力目标是必须树立的。

那么怎么做呢?我试谈几点拙见。

做学问,一要努力求得名师指点,又不放弃一切机会向所有内行的人学习;二要尽量保持对古今中外各种事物的广泛兴趣,不断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三要能坐冷板凳,多读书,也要走出书斋,投

入生活,学习社会那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学习流传在民间,写在大地上的历史;四要多思,许多历史之谜的破解,往往需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五要重文采,无论讲课或写作,要精心准备,刻意加工,使史学不仅内容,而且语言文字表达形式也独具魅力。

我有幸在 50 年代末教学秩序比较稳定时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而后从师汪篔教授攻读隋唐史。那七八年间,深深受益于翦伯赞、向达、邓广铭、周一良、邵循正、柴德赓、宿白、田余庆等老师和郭沫若、吕振羽、吴晗、邓拓等知名学者,听他们谈论学问,海阔天空,帮我脱出井蛙之见,而能略知学问的深浅。特别是通读业师汪篔和师祖陈寅恪的主要史学论著,让我走了一条捷径,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慢慢体味着怎样读书,怎样驾驭史料,怎样抓问题,以文证史,自微见著,摸索搞学术研究的门径。汪先生那时对我讲,他当陈先生研究生时,陈先生对他说过:“你研究的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可以问我呢?”虚怀若谷的大师风度又帮我破除对名家的迷信,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即使在尊师面前,也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在高度评价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概念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对李唐先世是否出自赵郡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我也鼓励学生大胆发表不同于我的观点,言之有据的我总是格外给予好的评分,要讲学问面前人人平等。

结束学生时代以后,我在专业上最感苦闷的是周围难得有一起切磋学问的师友。文章没有机会经过别人的挑剔就发出去,总不免出硬伤纰漏。于是尽量多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节衣缩食自费也要去,利用学术会议的机会向前辈和同行们请教。比如贞观开元之间,既有“武韦之乱”,经济却持续上升的原因,使人久思不得其解,这也是对武则天评价的关节点。我试将当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逃户,作为生产力的积极因素看待来解释。1984 年厦门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提出来请教唐长孺会长,唐先生当时听了没

有回答。1986年蒲圻会上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唐先生马上接话说:“是的,当时有一些新的县是在逃户开辟的地区建制的。”唐先生还列举出新建县的名字,使我大受鼓舞。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武则天本传》一书,指出武则天对逃户比较放任和宽容的政策,“或许是我们揭开当时经济振兴之谜的关键所在”。王炎平先生认为这观点对于解释唐代历史发展有一定价值,批评我在书中没有展开评论。于是我又著文《均田——逃户/括户——两税》,分析脱籍而不脱产的大多数逃户,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自耕农,对生产力向广度发展和从均田到两税过渡起的积极作用,由此来解释唐初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这样颠倒过来看逃户的意见能被史学界首肯,那么唐先生过去对逃户的研究和给我的指点,是起重要作用的。

名师终究有限,求得指点不易,但如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更应随时随地向一切有知识的人学习。中国话“学问”这个词很好,学问就是要学要问才做得起来的。《武则天本传》一书的写法,就是在1985年10月咸阳的学术会议上请教了几位朋友后定的,并从此开始把活生生的人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再如一次在成都会议谈及玄武门事变时,北京大学吴宗国教授的一句话:“突厥是李世民手里的一张牌”,启发我探讨事变的远背景,结论强调事变性质中李渊、李世民父子矛盾的一面。这样学术上毫不保守,彼此可以无条件运用对方观点材料的朋友圈,是能支持共同成功的一层保障。

再说到改善知识结构。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几乎没有无用的知识,知识面越宽,知识结构越合理,取得学术成果的可能性也越大。汪先生曾概括为三条:党校的马列主义,中学的数学,陈寅恪的方法。时时提醒我注意研究成果要有理论的形式,而数学知识曾帮助我对历代农业劳动生产率作计量分析,写了研究度量衡的《莽量尺考》和《从耕三余一谈起》等文。

有人说搞历史只能钻古书,不能搞调查研究。其实杜甫所说,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方法,早在司马迁时代就结出了硕果。所以我主张将传统的“文献历史学”与“考察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自1981年起,唐史学会的同事们从事过丝绸之路、蜀道、河东两京路和运河、内蒙古的多次历史考察,参加过的近百位学者都感到受益匪浅,总结这几次考察成果的四个文集,即曾受到胡耀邦好评的《丝路访古》等书,可为明证。台湾《大地》地理杂志约我写了三篇考察文章:《踏霍去病足迹西行》、《重走唐明皇入蜀古道》、《大运河与隋炀帝》,“大地编语”称拙文体现了历史、地理、人文、生态环境等知识,主编函告文章受到台湾人民的喜爱,认为“这是真正的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自称是从参加考察才开始做起学问来的朋友一样,读那部写在大地上的历史书,使我有灵感,有了进步。

一个学术问题的解决,不仅必须详尽地占有资料,经过多年细致的积累,更要花“多思”的辛苦。好比对一件心爱的宠物,反复把玩,摸熟摸透了,才能指望有一天豁然开通的解决。比如李贤之死,我在毕业论文中认为只是武则天与他母子间权力之争的悲剧,汪先生对此作了肯定的评语。二十多年后,我还是作了自我否定,又从《旧唐书·李贤传》中宫人私下传说的一句话:“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提供的线索,试解武则天对李贤薄情之谜,也顺理成章地解释了高宗皇帝以韩国夫人所生的贺兰敏之奉武士彟祀等一系列反常事情。熊德基先生来信感叹自己忽略了这细节,而香港发的书评更称拙著“在在都能解答历史的疑惑”。回想起来,在这个小问题上费了二十多年时间,才从一团迷雾中跨出了一步。

历史问题需要多思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历史资料被当权的统治者做了太多的篡改伪造,更不要说许多重要的史料已经亡佚不存。今天要靠片面的被歪曲了的史料去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是十分困难的,有许多事也许随着材料的湮没已经不可能弄清楚了。所以我们对史学的期望值要适当,不要轻言信史,信口讲对什么都搞清楚了。另一方面要看到,史学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被颠倒的



历史要颠倒过来。隋唐史上就有如隋炀帝、武则天等被泼了许多脏水,而唐太宗、黄巢等又被过分地赞扬了,还有如均田、科举等制度的评价也欠全面,都有待于重新评说。

如何使历史研究更贴近生活,不至自外于社会改革大潮,丧失社会效益而被冷落,最是令人久久萦怀的难题。历史学再不能因为盲目紧跟政治形势,实用主义随心所欲地作改写而损害自己的声誉。在我看来,历史研究要把着眼点从政权移到人权上来,才能摆脱帝王将相历史的旧框,并真正阐明人类历史进步的轨迹。这就是说,历史应该着重研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研究各阶级各阶层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或退步,把对人的尊严和个人自身价值普遍实现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合理、进步的实实在在的尺度。这一历史性的觉悟,将有力地推进我们现代文明的建设,从而体现人文科学的巨大的社会价值,历史学家也就找到了自己社会角色的位置。

最后一点想说历史论著应十分强调文采。“文史不分”曾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传统,而近年的历史著作几乎千篇一律模式化为教科书体和艰涩难懂的博士论文体,连历史系的大学生也说,若不是为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是不愿看的。这又是很损害史学的社会价值的。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们必须努力把文章写好,尽量写得生动活泼,让人喜闻乐见。这方面我又有幸得到著名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教诲。1978年我在帮他整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文稿时,读了十来本他带到友谊宾馆去的文学集子,像《月下小景》描述一个古老野蛮的婚俗扼杀一对年青恋人生命的故事,深深打动人心。那文字是那么宁静优美,对封建愚昧的无言批判却是那么深刻,实在是我们写作的楷模。这方面我还受益于中学的语文老师,尤其是上大学后还给我批改文章的连树声老师,他曾指出我文章的毛病是主谓语相隔太远,嘱我写短句。至今连老师的话我还

时时记起,帮我把文章改得明快一点。

当然文章的水平决定于思想,没有深刻的新颖观点,文章轻飘飘的,若再过于雕凿,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正像马克思所说,他的文章总是达不到他思想的高度,想用文字充分表达思想常常是很困难的,这又要靠笔耕不辍勤学勤练了。按沈先生的意见,要花上三五十年再看能不能完全掌握住文字。

以上零零散散说了许多,关于治学最想告诉年青朋友的一句话是要善于做学问。如果你能在自己周围构筑一个良师益友圈子,互相帮助,你就成功了一半。

(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年第5期)



## 把史学建成一片讲真话的净土

各位前辈老师,各位女士先生:

我来自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很感谢大会给我一个宝贵的发言机会。我一向是一个老百姓,不需要讲官话,也不会讲官话,想讲的题目是“把史学建成一片讲真话的净土”。这有三层意思:一、史料的整理;二、理论的创新;三、队伍的净化。

一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系统整理资料,尽快实现历史研究从手工作坊到电脑操作的革新,把史学研究建筑在方便穷尽史料和以往的学术积累的科学基础上去求真。这方面希望中国史学会能发挥作用,将大约 20 万篇论文和上万部著作以大约 1000 万字的篇幅把索引编出来。我们写断代史的文章,也总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中国,比比外国,没有索引工具很不方便。我们中国唐史学会已为会员编印分发了 1982 - 1995 年的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还在唐研究基金会支持下组织中外中青年历史学者在做本世纪唐研究的总结。这些作为以往学术积累的一个基本资料提供给后来的研究者和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使之减少重复劳动,提高学术水平。戴会长的大会报告在世纪之交对中国史学作了回顾与展望,讲得很好,但还需要具体化。中国史学会新的理事会能否用自己这块含金量很高的牌子把对中国历史学的世纪总结工程承担起来?那至少可以帮助下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少说空话、废话、重复的话,在继承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坚实前进。这是一个建议。

二是鼓励提倡史学理论的探索,创立各种史学流派。田余庆先生嘱咐我告诉学生要敢于创新,敢于超越。这当然很不容易。在中国,过去毛泽东讲他也有违心的讲话。大会第一天的报告,一位先生也说有些话不好说就不说,只是要不违心的话,看来至今讲真话并不容易,这样的学术环境恐怕就难以出创新的成果和造就人了。戴会长的报告中罗列了一批本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学家,大多可被尊为大师;下半世纪他没提,恐怕有个“有没有大师”的问题。1992年我曾斗胆说了一句“后半世纪唐史界没出大师”,那么整个史学界出没出?有这样一个意见,说就看田余庆先生了。他正是1949年前后读完大学开始工作的,如果他是,那这半个世纪还出了大师,还可以往下排,如果他不是就没有。田先生自己说他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下半个世纪就不如上半个世纪了。我想这是一个学术环境妨碍了学术积累的问题,框框多,限制多,挨整的时间多,研究的时间少,总是要违心地讲话,那学术怎么搞?既然环境造人,人也可以改造环境,希望共同努力把21世纪的史学阵地建成一片讲真话的净土。虽然还不能说这是21世纪中国史学最大的任务,也总是一项有意义的任务,是为21世纪中国史学准备能健康发展的基础,能产生大师的土壤。

学派问题与理论框架有关。中国史的理论框架问题许多先生都在谈,我想赞成五种社会形态的先生可以继续努力完善这一说;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先生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框架体系。我现在试用最具有中国特色的2132年的皇帝制度为核心来框架中国史,也是五段:秦始皇到宣统是皇帝时代,前面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的王权政治时代,是从原始民主社会向皇帝时代过渡的前皇帝时代,后面的辛亥革命以后是从皇帝时代向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后皇帝时代,再前再后是原始民主和现代民主时代。这样一个五段论从国体、政体划分中国历史,起码是符合实际的,也有利于学生了解中国,明确中国社会前进努力的方向,让历史带着时代关怀介

入生活,实现自己应有的社会价值,

三是要净化史学家队伍。过去不好讲真话,是因为容易被扣帽子、打棍子,可是我们想想把历史学家整苦的还不是历史学家自己?批尚钺的是谁?批吴晗的是谁?今天你批我,明天我整你,最后谁都逃不脱,谁都不好过,重复着李斯出主意搞“焚书坑儒”的悲剧。在座的许多前辈包括我们这一辈人的苦难,领教过的这类棍子够多了,再不要把这遗产“传帮带”给下一代。史学界同仁应有一个共识:再不容忍那些背后整人的龌龊行为存在,大家堂堂正正做人相处,才有真正的团结稳定。而且社会的正义是要靠历史学家的刀笔来维持的,维系天地间的正气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能之一,我们不能净化自己的队伍,怎么能完成这个使命呢?

各位先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但事后的一切是非曲直还不是由我们历史学家说了算?人生苦短,转眼百年,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该说的说,该写的写,应该无所畏惧地讲真话、讲真理,要对得起历史交在我们手里的这支笔,21世纪的中国史学才会有真正伟大丰硕的成果。

(本文是1998年9月17日在扬州中国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 关陇集团的形成及其 矛盾的性格

自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之后,在历史界颇有反响。虽然众史家看法还有分歧,但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在中古史上,西魏、北周、隋、初唐政权均掌握在关陇集团手中。如果能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给予科学的论证,是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权性质、政治人物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变革潮流,求得深入一步的理解的。本文拟粗略疏理关陇集团由来发展的脉络,并对其历史性格特点作一探讨。

## 一、武川系军事贵族的渊源

研究关陇集团,要溯源于武川系军人。这批人后来不少成为军事贵族,北周、隋、唐三朝皇帝就是在这个系统里产生的。实际主宰西魏政权的宇文泰,是关陇集团初创时的首领。(关于宇文周、杨隋、李唐都出自武川一事,有明确记载,赵翼等亦曾述及。但因他们籍贯有伪冒问题,引起许多争议,笔者略作辨析,附录于文后。)

武川是北魏北边有名的六个军镇之一。北魏建都平城时代,柔然称雄漠北。北魏为防御柔然,重修了东起赤城、西至五原二千余里的长城,设置了许多军镇,六镇最为著名。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附近,处于六镇中心,控制穿越大青山的军事孔道——白道。

北魏初,镇将例由鲜卑贵族担任,戍兵由拓跋族人和其他“强宗”、“良家”子弟担任。《魏书·广阳王建传附深传》云:“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宇文泰、杨坚、李渊的先人大都是那时移镇武川的。

太和中迁洛之后,边镇的重要性不如平城时代,鲜卑上层染中原土风,轻视武人。后来又发配罪犯充戍卒,鲜卑兵士沦为“府户”,低于编户一等。所谓“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魏书·广阳王建传附深传》)。引起边镇官兵不满。

特别使镇将军官怨恨的是,魏孝文帝迁洛后定族姓,把门阀世族制度移植到鲜卑和内迁各族中去,“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sup>①</sup>。这些政策只顾及南迁的那一部分,没有留边镇人的份,当时“籍贯兵伍,地隔宦流,处世无人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sup>②</sup>。迁洛留镇之人官运迥别。“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sup>③</sup>。镇兵镇将都不满这一政策,军镇内部又有重重压迫和矛盾,遂酿成523—525年的六镇起兵。这场暴动除了基本的阶级斗争性质外,反对北魏政权的歧视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利益的相同使不少镇将军主卷入了事变。

战斗两年,六镇起兵在北魏和柔然军联合镇压下失败,二十万“六镇降户”被迁到冀、定、瀛三州,马上又爆发了525—528年的河北起兵。不少和降户一起被安置在河北的镇将再次卷入起兵的情

① 《魏书》卷24《崔玄伯传附崔僧渊传》。

② 《魏书》卷94《阉官传·抱焜传》。

③ 《魏书》卷18《广阳王建传附深传》。

形更加明显。比如宇文泰和他父亲宇文肱都曾在鲜于修礼军中；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等则在葛荣军中，独孤信（杨坚岳父）也曾归葛荣；葛荣本人，还有侯景，都曾任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将；杨坚、李渊的父祖辈也有类似的经历。

528年尔朱荣镇压葛荣以后，派尔朱天光和贺拔岳、侯莫陈悦为正副帅西进镇压关陇一带的起兵。这支军队入关时只一二千人，基于还是从六镇过来的，习称贺拔岳军团。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在岐州镇压了万俟丑奴起兵。532年尔朱天光被高欢杀，534年侯莫陈悦杀贺拔岳，达奚武等又杀侯莫陈悦，翊戴宇文泰为帅。翌年宇文泰杀掉西奔长安投靠他的北魏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傀儡帝，史称西魏。这一事变为关陇集团掌握政权之始。

随着宇文泰执政，一批武川系旧人也升为新贵。地位最高的自然是缢杀侯莫陈悦翊戴宇文泰的那批军人，知名的有达奚武、赵贵、梁御、若干惠、寇洛、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宇文导等。

在东西魏，实际是高欢、宇文泰之间频繁的争战中，这批武川系的军事贵族始终是宇文泰依靠的核心力量。为说明问题，兹将534年翊戴宇文泰者、537年沙苑十二将、550年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等四批人名及其籍贯表列于下：

籍 贯	翊戴宇文泰者	沙苑十二将	八柱国	十二大将军
武 川			宇文泰	
洛 阳			元 欣	
武 川			李 虎	
陇西成纪 <sup>①</sup>		李 弼	李 弼	
武 川		独孤信	独孤信	
代		于 谨	于 谨	

① 李弼，据《北史》本传云陇西成纪人，而《周书》卷15《李弼传》、《旧唐书》卷53《李密传》记李弼辽东襄平人，显然有改籍伪冒问题。



籍 贯	翊戴宇文泰者	沙苑十二将	八柱国	十二大将军
武 川	赵 贵	赵 贵	赵 贵	
武 川	侯莫陈崇	侯莫陈崇	侯莫陈崇	
武 川	梁 御	梁 御		
武 川	若干惠	若干惠		
冀	怡 峰	怡 峰		
中 山	刘 亮	刘 亮		
武 川	王 德	王 德		
代	达奚武	达奚武		达奚武
陇西成纪		李 远		李 远
武 川	寇 洛			宇文导
武 川	宇文导			元 赞
洛 阳				元 育
洛 阳				元 廓
洛 阳				侯莫陈顺
武 川				豆卢宁
柔玄镇				宇文贵
夏 州				贺兰祥
武 川				杨 忠
武 川				王 雄
太 原				又:王思政
太 原				又:念 贤
武 川				

(注:最后两名王思政和念贤虽不属十二将军,但两人在大统十六年前都有大将军衔,仅因外任不带府兵,这里还是一并列入。)

上表二十八人中,史书记明出自武川的十四人,占百分之五十,若加上出自六镇之一的柔玄镇的豆卢宁和出自代郡的于谨、达奚武合十七人,再除去魏宗室四人,则来自代北武川等镇的军人在这批军事贵族中占百分之七十。由此可见贺拔岳、宇文泰军团骨

干之一斑,这也是西魏府兵制初创时的情况,武川系军人是中坚。

## 二、关陇集团的形成和内部构成

关陇集团是以武川系的军事贵族为核心的,他们掌握了西魏至初唐历朝政权,当然后来当权的是他们的后裔了。如北周第一位皇帝宇文觉(闵帝)和著名的周武帝宇文邕,都是宇文泰之子;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大将军杨忠的儿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孙子。跟随他们入关的许多有功将士,包括后来李唐开国时的太原元从禁军,大多在长安附近关中地区分到一份土地产业,变成地主,他们同关陇地区原来的土庶地主一起,构成为关陇集团的阶级基础。

关陇集团中除了来自武川的那一部分军事贵族外,还有以下三部分:

一是关中“郡姓”,如柳芳言:“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sup>①</sup>关指函谷关,因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东,所以关中除陕西渭河流域外,还包括今河南、山西之一部。关中郡姓指的汉族世家大族是京兆(长安)韦氏,弘农(灵宝)杨氏,河东(闻喜)裴氏,(解州)柳氏,(汾阳)薛氏,京兆杜陵的杜氏,还有武功苏氏,三水(旬邑)侯氏,三原李氏,陇西成纪、狄道的李氏。

二是鲜卑贵族“虏姓”,指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独孤诸族,大多籍贯两京。

三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士人,出仕长安政权并取得高位的,典型代表如来自江南的褚遂良依附了关陇集团。从关陇集团形成、发展的历史看,不应把这个具有地域性的集团视为一个封闭僵化的关陇籍人的组合。

<sup>①</sup> 《新唐书》卷199《儒学传·柳冲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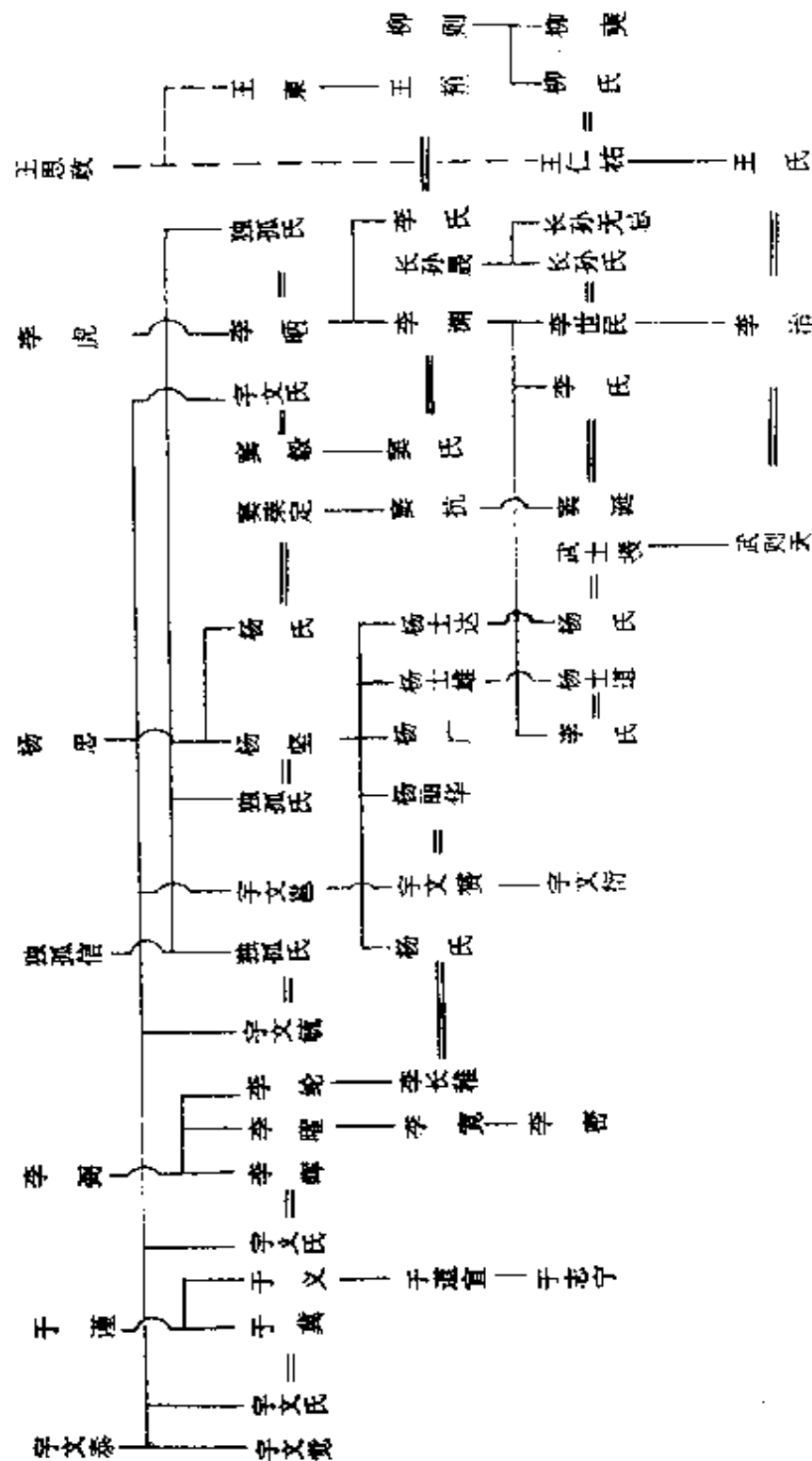
剑桥中国史第三卷《隋代的主要问题》一节讲到中央政府的问题，统计三省首脑十八人中十一人曾在前朝作过官，其父辈在北魏至北周政权中任职的有十四人，南方人只有一个炀帝萧后长兄萧琮。从地理来源上讲，十八人中有十五人来自比较狭窄的从天水起经过都城地区至洛阳为止的东西带状地域。

该书又统计，六部尚书六十五人，其中有四十二人是在北魏或北周任职的人的子孙，其中北魏十三人，北周二十九人，北齐只三人，且都是在户部管税收和分地的。他们在地理方面分布情况和三省长官相似，统计的四十六人中有三十个来自从天水到洛阳的狭窄地带；其次集中在山西，有七人；其余散布在北方平原上。

上述统计资料可以说明关陇集团在魏、周特别是隋代政权中的地位和历代承袭的情况。

通过关陇集团内部的联姻状况，也可窥见关陇集团的地位。下面以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皇室联姻关系为例，列表说明。图中十八对双线连结表示婚配关系，可显示关陇集团最高层姻族联结盘根错节的情况。当然受图式限制，这里还远没有标示出这些家族成员之间的全部婚姻关系。表中宇文泰、于谨、李弼、独孤信、李虎是西魏八大柱国中的五个。另外三个，元欣是宗室王，赵贵、侯莫陈崇在西魏宇文护执政时被杀，后嗣不显。

## 关陇集团上层联姻图



图表中宇文泰第三子宇文觉受西魏禅建北周,是为闵帝。杨忠子杨坚和李虎孙李渊分别为隋、唐王朝的开国君主。杨忠、王思政是西魏大将军。

于谨,其先为代人,鲜卑贵族勿忸于氏,北魏孝文帝时改汉姓为于。曾祖于婆为怀荒镇将。于谨曾参与镇压六镇及河北起义,随宇文泰入关后立家于京兆长安。于谨在北周被尊为“三老”,皇帝亲自迎拜,尊崇备至。子孙辈中文武达官极多,嗣子于寔官至大左辅,次子于翼隋初拜太尉,在唐于氏一门出于志宁、于颀、于琮三个宰相,是关陇集团的重要家族。永徽中于志宁对唐高宗说:“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提出把赐给他的田地让给寒族新贵张行成等。<sup>①</sup> 这个家族世代承袭的经济政治实力,对我们认识关陇集团是很典型的材料。

李弼,从尔朱天光入关后徙为京兆长安人。周初宇文护执政,“朝之大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sup>②</sup> 李弼一门名将辈出,曾孙李密袭爵蒲山公,因门第崇隆一直被隋炀帝猜疑。隋末主瓦岗军,群雄逐鹿中唯与唐公李渊推论将来,旁若无人,大有天下非他们这些“八柱国”后裔莫属之意。

独孤信,匈奴族屠各之裔,其先为部落大人,祖父俟尼“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sup>③</sup>。信曾在葛荣军中,随魏孝武帝赴长安,官至太保。与赵贵同谋诛宇文护,事败自尽。然长女为周明敬后,第四女为唐元贞后(追尊为元皇帝的李渊之父李昉的妻子),第七女为隋文献后,史称“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sup>④</sup>。全仗女儿出色,门望不衰。

① 《旧唐书》卷78《于志宁传》。

② 《北史》卷60《李弼传》。

③ 《北史》卷61《独孤信传》。

④ 《北史》卷61《独孤信传》。

杨忠，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和独孤信、李虎联为儿女亲家，所以杨广和李渊是姨表兄弟。杨坚一女又为北周宣帝宇文赧天元皇后，杨坚即藉此外戚身份篡了北周建立隋朝。李世民又娶杨广一女为妃，生吴王恪、蜀王愔。

李虎，是起自武川的军事贵族，其孙李渊、曾孙李世民继承乃祖武将风度，都是智勇双全的统兵帅才，削平隋末群雄，建立唐朝。

王思政，太原祁人，也有西魏大将军衔，进入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的裔孙隋州刺史王裕娶了李渊唯一的同胞姐妹同安长公主。他的玄孙女又嫁给了唐高宗，这位王皇后就是和武则天闹废立之争的两主角之一。

图中所附其他人物：

窦毅，京兆人，初家于代。祖父窦略与叔父窦炽六镇起兵后到定州归葛荣，葛荣败，迁并州，又从孝武帝入关。窦炽为北周元老，官至太傅，杨坚为相国时百官劝进，唯独他不肯署笏。窦毅在沙苑也有战功，为北周上柱国，娶宇文泰第五女襄阳长公主，所生第二女嫁李渊，即李世民生母。窦氏是代北虏姓之一，源出匈奴，在魏有三皇后，在唐一门五相：窦威、窦抗相高祖，窦德玄相高宗，窦怀贞相睿宗，窦参相德宗。史称：自武德至开元，“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sup>①</sup>。唐高祖曾对窦威戏言：“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乃不平矣。”又说：“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sup>②</sup>道出这些关陇军事贵族世家自鸣得意之所在。

长孙晟，先世居代，为鲜卑南部大人。原姓拔拔，太祖道武帝

① 《旧唐书》卷61《窦威传附诞传》。参见日本《史学杂志》91编第10号（1982年）载石见清裕《唐之建国与匈奴费也头》。

② 《旧唐书》卷61《窦威传》。

时改姓长孙,是北魏宗姓十姓之一。曾祖长孙承业为北魏上党王,随孝武帝入关,家由河南洛阳迁京兆长安。长孙晟有女嫁李世民,即有名的长孙皇后。后兄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宰相,唐太宗曾托孤给他,是关陇集团晚期的核心人物。

河东柳氏,也是关陇集团成员,唐高宗元配王皇后的娘家。其舅柳奭永徽五年(654)罢相,揭开王、武二后争夺之序幕。

武士護,太原文水人,木材商出身。李渊晋阳起兵后,随军入长安,忝名功臣。又由高祖皇帝和桂阳公主作媒,娶隋宗室女杨氏为继室,生武则天姐妹三女。尽管已是王朝新贵,仍被人指陈“地实寒微”,成为武则天发迹的一大障碍。她走上政治舞台第一场争夺皇后位的斗争,对手就是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伙老牌关陇军事贵族。于是埋葬关陇集团的历史责任自然地落在她肩上。武则天和唐高宗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继贬逐柳奭、褚遂良和废黜王皇后之后,以长孙无忌的败死为标志,结束了关陇集团控制中央政权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开始了普通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大发展的武则天时代,并衍为中古社会的太平盛世——“开元之治”。

### 三、关陇集团的历史评价

关陇集团在士族门阀地主普遍衰落时强化了门阀统治,这是首先应注意到的一点。

南北朝后期,士族门阀经过东汉以来几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尤其在民族战争中,“衣冠迁徙,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士居乡土,百无一二”<sup>①</sup>,因而日渐没落。

在南方,自寒人出身的武将刘裕当皇帝后,掌机要的中书舍人等职多由寒族担任,士族中衰。孙恩起兵后,王谢等大族垮了。后

<sup>①</sup> 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见《唐文粹》卷28,《全唐文》卷368。

来南方的三次事变,更使士族元气大伤。其一是侯景之乱(548—552),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涉务篇》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事变中建康十几万军民死剩数千,奕世高门更在劫难逃。其二是江陵之破(554),西魏于谨、宇文护攻破萧梁江陵,虏走百姓十余万,“江陵即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sup>①</sup>。其三是隋平江南(589),东晋时有卜辞:“淮流竭,王氏灭”,而“陈亡之年,淮流实竭,曩时人物,扫地尽矣”。<sup>②</sup>南方士族同他们的政权一起崩溃。

山东,经河阴之变(528),胡太后被尔朱荣溺死,两千多王公官僚被围杀,中央政权中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的汉族士人被消灭殆尽。加上河北起兵(525—528)等战争的扫荡,特别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sup>③</sup>,重点打击的就是山东士族,以至“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於贫贱”<sup>④</sup>。正当南北士族屡遭洗劫普遍衰败之际,关陇地区略为平静,使旧门士族稍得苟延。以鲜卑族和鲜卑化汉人组成的贺拔岳宇文泰军团入关,联合关中等地胡汉世家大族,组成关陇集团,给门阀势力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时在形式上强化了门阀统治,使之政治生命又得延续。他们从代北带来的尚武风习和手中握有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他们当权的支柱和后盾。

关陇集团中一批军事贵族世家实力强大,有机会就抢皇帝位子,内部争夺激烈,以至朝代更换频繁。北周代西魏,隋禅北周,唐取隋,六十年间有三次。但各大家族间又由错综复杂的姻亲故旧

① 《周书》卷32《唐瑾传》。

② 《南史》卷24李延寿论。

③ 《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

④ 《唐会要》卷83《嫁娶》。



同僚关系牵连,彼此争夺又相互维护,诛杀之余不乏妥协,故尽管朝代更迭,勋戚高门却总是他们那些家族,如于志宁,历经四朝,“基址不坠”。唐代还以周、隋为二王后<sup>①</sup>,给他们以尊崇的地位。关陇集团就是这样世代承袭保持下来的,并且唐承隋制,隋承周制,自北周至唐,各朝代的基本政策也承袭下来了。这也是其特点之一。

关陇集团人才辈出,生气勃勃,对我国中古时代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应给予公正的历史评价。

关陇集团出现于东汉末以后三百多年的动乱分裂将结束的时期,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条件日臻成熟,历史赋予关陇集团可以大有作为的契机,也造就出一批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渊、李世民和从苏绰、苏威到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大批得力臣佐。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致力于统一国家和发展国内民族关系的大业,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除了周宣帝在位两年的荒唐和隋炀帝后期政治引起农民战争的一段曲折外,关陇集团当权一个多世纪里全局形势基本是向上的,出现了隋开皇初到大业中期和唐贞观时期两个治世。柔然、鲜卑、羯胡、吐谷浑等族和一部分突厥在这时期里基本上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中华民族更加壮大。这一自然历史过程进展比较顺利,和关陇集团本身就是个多民族融合体,在民族问题上大多持比较开明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最后,关陇集团的统治在自身还未明显腐朽时便因武则天跃上历史舞台而嘎然结束,所以自始至终没有丧失积极的进取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朝气蓬勃的形象。

<sup>①</sup> 《唐会要》卷24《二王三恪》、《新唐书》卷202《文艺传·王勃传》。

#### 四、关陇集团政治上既守旧又革新的矛盾性格

当中世纪前半期,衰而未亡的门阀地主还有一定经济实力,处在社会声望颇高的士族包围中的关陇集团政权,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印记,接受“士庶区别,国之章也”<sup>①</sup>的先朝成规,充当门阀地主的政治代表。但关陇集团内部新旧杂揉,成份复杂,各成员家族原门第差别悬殊。特别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核心,包括三个朝代的皇室在内,不是典型的旧门阀,而是起自下层的新门新贵,社会上看重门第阀阅的风气对他们很有刺激。他们低声下气攀援名门,伪冒旧族也不被承认,甚至高贵的公主竟不配一个普通士人子弟。终唐一世,李唐的族望未被承认,李渊、窦威虽贵为天子、帝戚,徒聊以自慰,实难于同“以爵位不如族望”<sup>②</sup>的旧族高门匹敌。唐宪宗、文宗、宣宗无不为“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而感慨。<sup>③</sup>对那些全然不把皇帝勋贵放在眼里的“禁婚家”,他们简直无可奈何,心里既企羨又恼火。关陇集团成员理应被视为最高门第,七姓十家为首的旧门就是不承认,每每把他们摒于按族姓门第等级通婚的婚姻圈外。所以关陇集团既是士族门阀政治的最后支柱,但却不是门阀制度的忠实堡垒。表现在政策上便是既保守又有革新的二重性,思想上则既讲门第又重冠冕。他们内心深处对旧族高门每有不平,时时又情不自禁地攀附礼敬。这就是他们性格的矛盾表现。

① 《南史》卷23《王惠传附王球传》。

② 《国史补》,引自《太平广记》卷184。

③ 《旧唐书》卷147《杜佑传附琮传》;《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附敏中传》;《旧唐书》卷149《于休烈传附琮传》。

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多少怀旧的感情,更多的是革新精神。他们的主要倾向不是代表过去,而是朝着未来。一面延续前朝的政策,承认门阀并求与之亲合;不时又在施政时表现出反门阀的新鲜内容。

比如那时的选举制度发生了从西汉以后的察举制向隋唐以后科举制的转变。北周武帝时的选举“不限资荫”,“罢门资之制”。<sup>①</sup>隋文帝正式废九品中正制,并有秀才等科的考试,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唐太宗、武则天又有发展,并开制科南选,一步一步改变着。但唐高祖曾恢复九品中正制<sup>②</sup>,唐太宗又搞了一阵世袭刺史<sup>③</sup>。隋唐时期门荫和科举一直是最重要的仕进途径,这两个矛盾的办法甚至可以协调地并存,相互补充。

举代表人物来说,隋炀帝在取消妇人受田的同时,大约也取消了奴婢受田的规定<sup>④</sup>。大业初朝廷内山东士人,“自作门户,更相刻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sup>⑤</sup>,隋炀帝查处惩治了一批,还逐步限制和取消勋官世袭的特权,不许授勋官文官职事,特别是从他起开设了传承一千三百年的进士科。在所有关陇集团人物中,他是革新步子最大、走得最远的一个。唐高祖在位时定下唐前期的主要制度规模,基本上延续着隋炀帝改革的路子,但唐高祖远没有隋炀帝那种捭阖纵横的革新气魄,当然也没有像隋炀帝那样遭到包括门阀旧势力在内的举世反对。

唐太宗对待世族旧门的复杂的内心感情更为典型。贞观十二年(638)他授意编撰的《氏族志》修成,太宗看后很不满意,说:“汉

① 《周书》卷23《苏绰传》、《通典》卷14《选举二》。

②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七年正月。

③ 《贞观政要》卷3《封建》。

④ 从汪篋师说,见《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数》,《汪篋隋唐史论稿》第52页。

⑤ 《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

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乃命重新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sup>①</sup>，透露出他对食世禄的世卿的嫉恨。他儿子唐高宗李治同他一样，对掌选的宰相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sup>②</sup>，很不高兴。他们这种思想情绪，和自己的家世有关。

代北之人尚贵戚，唐高祖李渊“创业君臣，俱是贵族”，所用将相，“并是贵胄子弟”<sup>③</sup>。这些近世新贵和重婚姻的山东士人、重人物的江南士人是不一样的。当然处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不能太过分。唐太宗还是要编《氏族志》，还要讲阀阅，用的是高士廉及“四方士大夫谱练族姓者”<sup>④</sup>，办法是“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分为九等”<sup>⑤</sup>。他虽把山东高门崔民干从第一等降为第三等，以崇今朝冠冕，但既以皇族为首，外戚第二，崔民干实际还是最高等级。总之，他既要讲氏族，责谱谍，又要以今朝品秩为高下，论官爵。显然办这么件事也是矛盾的。

产生矛盾的原因，是门阀在社会上、在关陇集团内部还有势力，但实行纯粹的门阀统治，完整地维护旧门阀制度，实行旧政策，已经不行了，或者说他们也不愿意。时代在变，经济基础在变，统治集团的成分也在变，这些不可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各方面，反映到现行政策上。尽管每个人的保守或激进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随着时代前进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历史潮流。认为当时有政策路线上法家、儒家的鲜明对立，政权性质上有代表门阀和代表庶族地主的鲜明对立，这在同一个关陇集团内部是不可能的。

① 《资治通鉴》卷 195 贞观十二年正月。

② 《旧唐书》卷 81《李敬玄传》。

③ 《唐会要》卷 36《氏族》。

④ 《唐会要》卷 36《氏族》。

⑤ 《资治通鉴》卷 195 贞观十二年正月。

从这种认识出发,去看隋唐政权的政策和统治阶级政治思想上的种种矛盾、差异就好理解了。比如在用人政策上,那个时代总的来看,都已不排斥寒族了,但唐高祖偏于保守,唐太宗有所突破,吸收了不少关陇集团之外的山东人士乃至寒门地主如魏徵、李勣、张亮、张玄素、戴胄、马周等进入权力中枢。但晚年又退回关陇集团的小圈子,只相信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连李勣和已去世的魏徵都被猜疑,是反反复复的。保守正是时代、阶级的局限对个人的制约,突破也是时代变革的要求对个人的促进。这样去理解唐初一系列政治斗争,解开政治人物的特点、气质和性格上的矛盾,就容易多了。

对于关陇集团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有独创的研究。正如崔瑞德所说:“他的分析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富有成果的出发点。”<sup>①</sup> 陈先生认为关陇集团是混合关陇区内保存的旧时汉族文化与鲜卑六镇“胡俗”而形成的,是由宇文泰创设,并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后来被出身于山东寒族的武则天破坏了,到唐玄宗时破坏殆尽。

陈寅恪先生多从文化角度看待这个胡汉混合的集团,而我们侧重从阶级阶层背景去认识。在关陇集团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性质和历史上的作用、影响等方面的观点,我们同陈先生有些差别。但关陇集团这样一个完整的政治概念对认识北朝至隋唐的历史至关重要,业师汪篈先生和许多先生也作了许多精心的研究,拙文只是补叙一下关陇集团的渊源,并对其构成和集团心理特性作了一点分析,以期对理解、把握那个变革中的时代有所裨益。

对那个极重阀阅的时代,我立论侧重出身成分的角度,每虑或失之偏颇,尚祈方家指正。

<sup>①</sup> 《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转引自《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

### 附论：宇文泰、杨坚、李渊的籍贯和家世

宇文泰是武川人。《北史·周本纪上》：“天兴(392—404)初，魏迁豪杰于代都，陵(宇文泰高祖)随例徙居武川，即为其郡县人焉。”《册府元龟》卷1《帝王部·帝系》记为“代郡武川人也”，且记宇文泰之高祖在魏初曾封侯，天兴初迁武川。其后几代的身份逐渐沦为被排斥在士族之外的边镇军将，因而才卷入了后来的六镇与河北起兵中。

杨坚，《隋书·高祖纪上》：“(五世祖)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北史·隋本纪上》：“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颍焉。”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杨坚父杨忠由北道攻北齐晋阳时，“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飨将士，席卷二十余镇。”(《周书·杨忠传》)。可见籍贯武川，祖坟亦在武川。杨忠随宇文泰入关后，安家于冯翊，所谓弘农华阴人疑是伪冒。其夫人(杨坚生母)吕氏族微，也无门第可言。

李渊，《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熙，金门镇将，戍于武川，因留家焉。”并云其先“陇西成纪人”。《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裴寂传》及李唐公主墓志亦有类似记载。朱希祖先生持唐室为陇西李之说。而陈寅恪先生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99页)主要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7载李虎的父祖李天赐的启运陵和李熙的建初陵在赵州昭庆县，且“今河北省隆平县尚存唐光业寺碑”。碑文为开元十三年宣义郎、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所撰，文中述唐先世，有“维王桑梓”等语。实际李熙终于武川，李天赐六镇起兵后南迁至南赵郡，死于西魏大统年前。李虎旋又入关，在赵郡不过暂住，唐开国后在赵州所起建初、启运二陵不能代表籍贯。又当时议立七庙，欲以凉武昭王李暠为始祖，于志宁“以凉非王业所因，独建议违之”(《新唐书·于志宁传》)。恐怕真实的原因是不能把攀附的远祖作为真正的始祖供奉于宗庙。贞观

中沙门法琳对唐太宗所说：“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唐彦琮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下》，转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页）显然是说李唐祖籍并非陇西。这比杨晋碑文更早更可信些。所以无论说陇西李抑或赵郡李都是伪冒，现在能说清楚的李唐先世就是武川镇的中下级军官。再往上追溯，尚难确论。

（原载《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修改稿提供给1988年广州“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收入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之该讨论会文集，篇名为《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对隋唐历史研究的贡献——谈“关陇集团”问题提出的学术价值》）



## 隋朝的建立

民间往往把开国皇帝视为真命天子，其实，他们所以能得天下，半是人为，半是机遇，并非有什么天意所属。对于隋文帝杨坚来说，他能创建隋朝，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点名气的皇帝，首先是这样一个机遇：周武帝和周宣帝两代皇帝在两年内相继死去，八岁的周静帝身边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杨坚得以皇太后之父的外戚身份辅政，在一群野心勃勃的“反覆子”策划下矫诏夺权，得了个轻取天下的便宜。

早年周武帝在世时就不放心杨坚，因为他父亲杨忠是西魏府兵大将军，杨忠死后杨坚袭爵隋国公，出身是与北周皇室相伴的关陇军事贵族高门，更兼他“为人龙颜”，风骨不凡，不断有人说他相貌非常，貌有反相，劝周武帝及早除掉。杨坚恐惧不安，收敛锋芒，学当年刘备的韬晦计避祸。

昏暴的周宣帝继位后，杨坚的日子更加难过。他女儿杨皇后曾被赐死，逼令自裁，老伴独孤氏闻讯急忙上殿请罪，叩头流血，苦苦哀求，总算凭她独孤信家的面子救下女儿性命。事后周宣帝还狠狠地威胁杨皇后：“必族灭你家！”有一次又生疑心召杨坚来，事先交代左右，若杨坚脸色不对，立即杀了他。杨坚对质时神色自若，异常镇定，才逃过这次劫难。

杨坚如坐针毡，一心避出京城，托郑译给他谋一地方官的外任。郑译安排他去扬州当总管，还没赴任，当月就有机会来了。荒



淫过度淘空了身子的周宣帝突然病倒,说不出话,来不及交待后事就一命呜呼,仅仅二十二岁便离开了人世。时为大象二年(580年)五月。

他的儿子周静帝年方八岁,因为没留遗诏,辅政的大权成为朝臣们争夺的焦点。郑译和刘昉一伙支持杨坚以外戚身份辅政,伪造诏书,以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先夺兵权。周宣帝的亲信大臣颜之仪拚死相争,坚持要由北周宗室年德最长的赵王辅佐静帝,反对以神器假人。颜之仪知道那诏书是假的,不肯在上面签名。刘昉见他严辞拒绝,便代他签上名字。向诸卫禁军发出这道诏令后,兵权顺利夺到杨坚手中。起初杨坚犹豫时,刘昉很不客气地宣称:“你要是干就快来,你要是不来我自己干了!”这时杨坚手中拿到了兵权,心定下来,下一步准备要改朝换代了。

杨坚还想占卜一下未来,夜召庾季才问天时人事。庾季才摸透了他的心思,说:“我纵使讲不行,你能够再行箕、颍之事吗?”借喻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尧曾经打算把天下让给一个名叫许由的贤人,许由听到后逃进箕山,还在颍水把耳朵洗了又洗,人远远避开了还不算,还要把听到的话也洗掉。杨坚想了想,沉默许久,才对庾季才说:“你讲得很好。”还有那位曾为女儿叩头请命的独孤夫人这时也劝丈夫:“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已经骑虎难下了,只有干下去了!”夫人真是将门虎女,帮助杨坚横下了一条心。

杨坚这时夺取皇权的障碍是三股势力:北周的宗室,官僚中的反对派和在北边虎视眈眈的突厥。杨坚用武力讨平北周旧臣的三方起兵,用和亲与厚赂安抚突厥,同时与北周宗室在宫廷内外展开了争夺皇权的恶斗。

北周宗室中最有地位人望的是以赵王为首的五位亲王,周宣帝死时他们都在封国闲居,颜之仪孤掌难鸣,未能阻止杨坚夺取军政大权。这时杨坚怕他们在外生事,便以嫁千金公主往突厥为名,征他们入朝。六月,五王都到了长安。此后北周宗室谋杀杨坚的

案件迭出不穷,最有戏剧性的是赵王为杨坚摆的鸿门宴。

七月一天,赵王邀杨丞相到自己府上赴宴,宴席有意设置在庭院深深的后院寝室内,赵王的儿子和妻弟佩刀站立左右,室内外暗藏兵刃,埋伏壮士。杨坚的侍从都被挡在院外,只有杨弘、元胄两员心腹武将跟随,坐在寝室外。酒过三巡,赵王亲用佩刀扎挑甜瓜,一块块送到杨坚嘴边,是要伺机行刺,气氛骤然紧张。元胄见势不好,赶紧跑进屋去,以相府有事不可久留为借口,拉起杨坚要走。赵王斥责道:“我和丞相有话说,你这是干什么!”命他退出。元胄瞪着眼睛,气呼呼地不吭声,也不走,留在屋里,持刀侍卫。赵王赐酒给他,缓和口气说:“我哪会有恶意,你怎么这样多心?”过一会儿,赵王假装呕吐,往里屋走。元胄猜出他是想溜,伸手拦阻,要赵王回到座上,不让离开。赵王再三假装要吐,都没走成。又称喉干,命元胄去厨房取饮料,想支走元胄,元胄不理睬。

这时滕王到,杨坚走下台阶迎接,元胄上去悄悄耳语,说情形不妙,赶快离开。杨坚还说:“他们没兵马,不要紧的。”元胄讲:“兵马这里用不上,他们先下手就大事去矣。我不辞死,只怕死了白死。”

重新落座后,元胄听见屋后有动静,是披挂甲胄的声音,立即说:“相府事多,你哪能在这里闲坐。”拉杨坚下座,夺门而走。赵王追过来,被元胄用身体挡住出不了屋,眼巴巴望着杨坚离去。

赵王恨自己没有及早下手,气得用手敲案子,指头弹出血来。这情节差不多是重演了八百年前项羽在霸上给刘邦摆鸿门宴的那一幕。

事后杨坚即以谋反罪将赵王、越王和他们的儿子都杀掉,重重赏赐了元胄。当年又杀陈王、代王和滕王。五王全被诛杀,北周宗室的核心力量垮了。

朝官中,拒绝签署伪诏的颜子仪一直不妥协地反对杨坚,当他听说杨坚又索取符玺时,去责问说:“那是天子之物,丞相索要,是

何用心？”杨坚将他逐出朝廷，放为外官。而手握重兵的并州总管李穆却命儿子李浑将一只熨斗赠给杨坚，捎话说：“愿执威柄以慰安天下”，还送去一副十三环金带，是天子才能用的服饰，表达劝进之意。高颀、李德林也表示不辞灭族，愿以死奉公。这些人成为支持杨坚禅周的中坚力量，并依靠他们的支持，迅速平定了相州（今河南安阳）、郟州（今湖北郟县）、益州（今四川成都）三方起兵。

翌年二月，在庾季才、卢贲等劝进下，完全控制了局面的杨坚，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宝座，周主履行了下诏退位逊居别宫的程式，命大臣奉诏书和皇帝玺绶禅位于隋。在一场以禅让为名、行篡夺之实的宫廷戏中，新的大隋王朝彬彬有礼地开国了。

周静帝逊位后被封为介公。这个不过十岁大的孩子的存在，仍似乎是对隋王朝的威胁，三个月后，隋文帝就将他暗害，又为之举哀，彻底抹去了北周王朝遗留的影痕。

此刻，举国上下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接受了杨坚篡位的既成事实，人们只在三位女性同胞那里听到几声并非微弱的反响。

一位是才嫁到突厥去的赵王女儿千金公主，她为宗祀的覆灭，日夜向突厥可汗沙钵略哭诉，请为周室复仇。突厥因而发兵四十万南下，着实给隋文帝找了麻烦。

另一位是新皇帝杨坚的亲生女儿杨丽华，她作为北周的皇太后，起先为其父辅政感到高兴，后来知道父亲有异图，便心中不平，形于言色，最后父亲受禅灭周的做法使她非常愤慨。一个嫁出去的姑娘，哪怕夫君再坏，她也不愿意改由父亲当朝，感情立场完全倒向夫家。隋文帝心里总感到有点愧对这女儿，后来改封她作乐平公主，又要她改嫁，公主发誓不从，要为北周宇文氏守节，父皇拿她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再一位也是将门虎女，其父上柱国窦毅，其母北周襄阳公主宇文氏。这位窦氏姑娘听到隋主受禅的消息后，倒地痛哭，深深叹息：“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吓得她爹妈赶快捂住她的嘴说：

“别乱讲,要招惹灭族之祸的!”这位血性的女子,后来自己用比箭术的方法选中武艺高强射两箭皆中凤目的李渊为婿,是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她亡隋的志向,经由夫君和儿子之手,变成为事实。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窦姑娘的那一句话,竟蕴涵着并有意无意地传递出下一次王朝更迭的第一个信息。隋文帝好不得意地在临光殿登上皇帝宝座时,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女子已代替历史下了要他的新王朝覆灭的决心。

(原载《隋唐宫廷》,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1993年8月第2次、2000年6月第3次印刷)



## 试辩仁寿宫变之谜

在《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sup>①</sup>一书中,有幸忝名的八位中国人之一隋文帝杨坚,仁寿四年(604)猝死于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历史上盛传是隋炀帝谋害的。在人们眼里,弑父篡位自然成为这位暴君的第一大罪状。

综合正史、野史的记述,<sup>②</sup>仁寿宫变可以编成这样一个相当圆满的故事:隋文帝是当年正月去仁寿宫的,四月在那里得病,七月病危,太子杨广入侍。眼看着父皇不行了,毫无经验的太子向老臣杨素请教后事,自然也包括自己如何登基继位之事。不慎,杨素的回信被宫人传递到老皇帝手中,隋文帝看他们急于打发自己,心中气愤不已。恰在这时自己宠爱的姬妾宣华夫人陈氏慌慌张张跑进来,见她面伤发乱,隋文帝问她是怎么回事,宣华夫人低首小声说了句“太子无礼”,原来是子在旁边屋里调戏她。隋文帝勃然大怒,恨得把自己指头咬出血来,骂道:“死狗,那可付后事!”当即命令身边的两名亲信大臣柳述和元岩发诏书召废太子杨勇回来,要将杨广废掉,重新立杨勇为太子。杨广一看大事不好,去找杨素紧急磋商,杨素决定首先把老皇帝软禁起来,矫诏调东宫兵士担任宿

① [美]麦克·哈特著,李唯中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1月版。

② 主要据《隋书》、《北史》有关纪传和《通鉴》及《通鉴考异》逸录之野史材料,不备注。

卫,由宇文述、郭衍控制门禁出入,逮捕柳述、元岩下大理狱,又派心狠手辣的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张衡将后宫的人都驱赶到别室,杨广为配合他行动,又选派三十名骁健宦奴穿上如人的衣服,身上暗藏兵器,立于门巷之间严密警戒,不一会儿,张衡便下手拉帝,强灌毒药,隋文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须臾即死去。

接下来的故事是陈夫人和后宫闻变后都相顾战栗失色,慌作一团。晚饭后太子派人送来一个小金盒,上面贴着太子亲手写上封字的封条,陈夫人见了害怕,以为是毒药,不敢接,来使几番催促后,才战战兢兢地打开,众人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几枚同心结,是太子向她求爱的信物。宫人们庆幸可以免一死了,宣华夫人则又气又羞坐在一边,被强拉起来拜谢来使,表示接受了太子礼物。当夜杨广就在父皇未寒的尸骨旁,逼淫了老皇帝的爱妾,做出了最不能为中国礼法容忍的乱伦事。再想到两年后杨素得病时,隋炀帝不时向御医打听杨素病情,唯恐他不死,杨素心里明白,对兄弟杨约说:“我岂须更活耶!”绝医而死。当年拉杀隋文帝的张衡,临死时也是这话:“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监刑的人怕他说出什么犯禁忌的话受到追究,连忙堵住自己的耳朵,催促刽子手赶快开刀。显然是杀人灭口,不容当年知道弑父真相的当事人再活在世上了。所以从前前后后的事情看来,杨广弑父的罪责是不容人置疑的了。

不过宫闱事秘,从来就真象难明。就说上面这个故事,各种史书的记载也远不是天衣无缝的。

首先,隋文帝得病到去世的情况是基本正常的,暴死一说有可疑之处;其次,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关系一直很好,儿子不像会下毒手弑父;第三,其中的关键情节,太子调戏陈夫人引起的冲突,按他俩平素的亲昵关系,也难以令人卒信。

先说第一点,隋文帝生病、去世的情况。当年正月隋文帝准备

去仁寿宫时，术士章仇太翼便曾加以劝阻，说：“但恐是行銮輿不反”。<sup>①</sup> 不知这位月盲的预言家是看出皇帝的健康要出问题，还是觉察到一场政变又在酝酿，总之皇帝很不高兴听到这不吉利的话，气恼地将他投入长安狱中，对他说自己回来就杀他！不料此行真被这位术士言中了，隋文帝没能从仁寿宫活着回到长安。

隋文帝四月份得病，七月初十病危，卧床与百官辞诀，流着眼泪与臣下从容告别，临终还没忘记交待太子回去后释放章仇太翼，说他是“非常人”，“前后言事，未尝不中”<sup>②</sup>，后悔这次没听他的话。十三日隋文帝死在仁寿宫大宝殿，留下的遗诏说：“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专门说了杨广很多好话，表示相信他和内外群官能够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sup>③</sup>，是放心地走的。不仅如此，就连隋文帝发病的原因，他本人也有交待。他不讳言是耽于女色，房事过度，伤了身体。独孤皇后在世时对他的约束很严，两年前皇后去世，他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等宠姬在一起，任情纵欲，毫无节制。到底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过两年就折腾垮了。隋文帝不无悔憾地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sup>④</sup> 由此看来，生前病后一切情况都无异常，太子杨广已可以坐等继位，当皇帝只是旦夕之事，他有何必要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政变，给自己落个弑父的恶名呢？

再说第二点，隋文帝杨坚和太子杨广父子间的关系一向很好，是隋文帝看中这个老二“堪成朕志”，把他置于储君位置上的。杨广呢，自小就有“仁孝”和“大孝爱”的名声，才博取到母后父皇格外的青睐。直到隋文帝死后多年，隋炀帝心中一直对父皇保持着崇

① 《隋书》卷 78《卢太翼传》。

② 《隋书》卷 78《卢太翼传》。

③ 《隋书》卷 2《高祖纪下》、《北史》卷 11《隋本纪上》。

④ 《隋书》卷 36《独孤皇后传》。

敬的挚爱,不时用种种形式表达思念和追悼。即位之年营建东都洛阳时,就同时起天经宫,取名孝为天经地义的意思,宫中存放亡父高祖衣冠,四时致祭。<sup>①</sup>第二年大业元年(605)又下诏改成月祭,以殊礼来纪念父皇“功侔造物,道济生灵”的功迹。<sup>②</sup>大业三年(607)再次下诏为隋文帝单独建庙,“以彰巍巍之德”,重申月祭聊表自己“蒸蒸之怀”<sup>③</sup>,直至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从辽东回来路过博陵(今河北定县),触景生情,不胜伤感地对侍臣说:“朕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倏经三纪,追惟平昔,不可复希!”话没说完,“流涕呜咽”,侍卫的人也都感动得哭了。<sup>④</sup>十月,隋炀帝下诏,改博陵为高阳郡,召父皇当年的故吏,都量才给授官职。<sup>⑤</sup>可以说隋炀帝对开创了大隋王朝的父皇始终保存了敬爱之心,这感情似乎是真诚的而不是做作的,这份情感与弑父的歹毒是很难协调的。

第三点,杨广自晋王时代便与宣华夫人陈氏有了非同一般的关系。陈氏是陈宣帝晚年出生的女儿,此时不过二十多岁,她“性聪慧,姿貌无双”。<sup>⑥</sup>隋文帝虽然最宠她,但她未必甘心将感情专注于这个六十多岁的老皇帝身上。年轻英俊的杨广早就同她有勾结,杨广为晋王在藩蓄谋太子位时,求她从内襄助,送给她金蛇、金驼等贵重礼品,让她高兴。在皇太子废立的时候,宣华夫人也确实为杨广出了不少力<sup>⑦</sup>。这件事说明早在仁寿宫事变前四五年,杨广和宣华夫人便有深交。在那个时代,受少数民族儿子有义务继

① 《隋书》卷7《礼仪志二》,《册府元龟》卷29《帝王部·奉先二》。

② 《册府元龟》卷569《掌礼部·作乐五》。

③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④ 《隋书》卷4《炀帝纪下》。

⑤ 《隋书》卷4《炀帝纪下》。

⑥ 《隋书》卷36《宣华夫人陈氏传》。

⑦ 同上。传称:“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娶亡父妻妾——只要不是自己生母——风俗的影响,在杨广这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家庭里,太子和父皇妃嫔之间发生些苟且之事,并不足为怪。杨广向宣华夫人求爱,就像后来唐高宗继娶父皇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一样,虽然在宋明以后越来越遭到封建礼教卫道者们的强烈谴责,但在隋唐之际还是马马虎虎能为当时社会容忍接受的。事后新皇帝也没有冷落那位委身于他的宣华夫人,“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sup>①</sup>。当她的不幸去世时,隋炀帝还为她写了《伤神赋》,表示深切的悼念之情。由这前前后后看,当时在仁寿宫中发生太子施暴而陈氏激烈反抗之事,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宣华夫人为自身计,也确实犯不着为守住对那位行将就木的老皇上的忠贞而撕破脸皮同对自己有好感的、对自己有感恩之情的、未来的年轻皇帝闹翻。随后当杨广送来同心结时,她还不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而若陈氏告过恶状,曾将杨广置于死地,事后杨广还能否那样对她一往情深,就很是问题了。

那么仁寿宫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细审史书的异同,可以发现,所谓仁寿宫变的故事,是陆续铺叙渲染而成的。

尽管因为遗诏每每是当事人弄虚作假的玩物,不一定能表达逝者的真实心愿,我们可不认真理会隋文帝遗诏中为炀帝说的那么多好话,但如上所述,《隋书》和《北史》二书的隋纪所载隋文帝去世情况并无异常,本纪中完全不记宫变之事耐人寻味。不过,同是《隋书》和《北史》,在《杨素传》中又有这样的材料:

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官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

<sup>①</sup> 《隋书》卷36《宣华夫人陈氏传》。

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

《通鉴》录用了这段史料，在“张衡入寝殿侍疾”之后加了一句“尽遣后宫出就别室”，补充了张衡下手的条件。再加上《隋书·张衡传》说他临死时那句話：“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正史上已羞答答地暗示了隋炀帝有弑父之劣迹。

野史笔记的叙述便直言不讳了。

赵毅的《大业略记》和马总的《通历》分别说：

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於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啗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女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sup>①</sup>

时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覩歔。是时唯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sup>②</sup>

马总详述杨素令张衡入室拉杀隋文帝的经过，但只有《大业略

① 《通鉴》卷 180 仁寿四年《考异》。

② 《通鉴》卷 180 仁寿四年《考异》。

记》明记是隋炀帝召杨素、张衡进毒药。此外，也记有隋文帝在仁寿宫去世情况的《炀帝海山记》一书，只说及杨素拒不执行隋文帝召杨勇易太子的命令，全无炀帝命毒杀父皇和调戏陈氏之事。

依我看，仁寿宫变的基本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隋文帝和杨广的关系一直维持到病危时，最后因书信的误传而关系突变，太子的活动简直是在咒自己早死和急不可待地要夺皇位，隋文帝盛怒之下想再更换太子，但来不及了。杨广一伙已经控制了宫廷的禁卫和职能机构，已经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在杨素安排下死于张衡之手。尽管可以一般地讲太子杨广参与了这场宫廷谋杀，但对隋文帝之死，他不能负直接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要确认他有弑父的罪责，材料只有《大业略记》提供的一条孤证，并不充分。而且就在这条材料中，杨广调戏的陈宣华夫人也换成蔡美人，人头和身份都与他说不同。因此其史料价值颇可怀疑。中国人惯用制造桃色新闻来丑化人，而且非常灵验，隋炀帝是不是又一个被泼了脏水的牺牲品呢？

再从登基后的隋炀帝一再建庙祭祀哀悼已故父皇的行动来看，似乎他的内心仍保留着对开创隋王朝并传承给自己的父亲的敬爱之心。对仁寿宫变是否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判断：事出仓促时，张衡在杨素指使下残害了病危的隋文帝，对此隋炀帝不能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后来事过境迁，内疚与怨恨与日俱增的隋炀帝，到底没让杨素和张衡善终，一面还用立庙月祭等种种仪式，来追念亡父，藉以忏悔自己当年不慎的言行。隋炀帝对杨素“外示殊礼，内情甚薄”<sup>①</sup>和后来发恨地说“使素不死，夷其九族”<sup>②</sup>的真正原因，也就在那场宫变的擅杀行动中。

而杨素所以擅杀隋文帝，是他决不能坐看皇帝再次改易太子。

① 《隋书》卷48《杨素传》。

② 《炀帝海山记》。

因为当年废黜杨勇，是他按杨广要求，秉承独孤皇后旨意一手策划包办的，他掀起的那股黑风恶浪险些将杨勇置于死地。如果容杨勇复太子位，而且马上会接替病危的老皇帝临朝，那时杨素决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一听隋文帝有此议，杨素必然吓得魂飞魄散，哪敢坐等老皇帝自己咽气，便不顾一切地指使张衡——当年策划废杨勇的同谋——下了毒手。这行动对窘促不安中的太子杨广也是先斩后奏的。他俩的擅自行动，尽管在当时得到杨广的默许，最后还是成了杨素、张衡双双不得善终的孽缘。

(原载《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



# 炀帝西巡

## 一、隋炀帝西巡的原因和目的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往返历时半年。在中古时代,中原王朝的皇帝这样亲巡大西北的,只有隋炀帝一人。这次兴师动众的西巡的目的和背景如何?

首先是为安定西陲。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之间十来个建都长安的王朝,都把西北方面的防御放在首位,其中对河西走廊的经营,更是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一点早在汉代就认识得很清楚。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的中心设张掖郡时,起名就取“张国臂掖”之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述:“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合乎逻辑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自南北朝以来,由于南北分裂,突厥、吐谷浑等部的骚扰,西边很不安定。据《周书》和《隋书》的《吐谷浑传》等记载,仅以隋朝建立前后半个世纪的情况来说: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吐谷浑可汗夸吕“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北周时,仍“数为边寇”,武成初(559年),“夸吕复寇凉州,刺史是云宝战没”;隋开皇初(581年),“以兵侵弘州”,致使隋文帝废弘州建置;是年又寇凉州;开皇三年(583年)四月,“复寇临洮”,旭州刺史皮子信战败而死;并寇

岷州；俄又入寇廓州。“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sup>①</sup>。这些材料说明，陇西河右广大地区，长期以来受到吐谷浑的严重骚扰。

吐谷浑都青海湖西十五里的伏俟城，据有今青海大部、南疆一部和甘南、川西北一些地方，“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sup>②</sup>。人口虽不过数十万，但时与突厥、党项连兵，长期以来是西陲边地的不安定因素。

征服吐谷浑，很自然地成了西魏、北周和隋唐政策的既定目标。各政权连续不断地对吐谷浑采取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比如：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凉州刺史史宁袭击过境的吐谷浑赴北齐的使臣商队，“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史宁又与突厥木杆可汗攻入青海，袭破吐谷浑树敦、贺真二城，有意“拔其本根”<sup>③</sup>；北周明帝武成初（559年），诏贺兰祥、宇文贵率兵讨吐谷浑，攻拔洮阳、洪和二城，置洮州以还；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遣太子伐吐谷浑，军渡青海，至伏俟城而还；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遣元谐和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率步骑数万击吐谷浑，兵出鄯州，趋青海，连战大捷，俘斩万计，夸吕远遁，其名王十余人率部来降；开皇三年（583年）五月，窦荣定破突厥及吐谷浑于凉州，六月，梁远又破吐谷浑于尔汗山；开皇四年（584年），贺娄子干发河西五州兵击吐谷浑，“入掠其国，杀男女万余口”<sup>④</sup>。

隋文帝初年对吐谷浑连续用兵，杀掠甚众。后来吐谷浑发生内乱，无力寇边，隋文帝亦改行招抚，不准河间王杨弘和垒州刺史杜粲用兵。开皇九年（589年），隋大军南下，一举灭陈。吐谷浑震

① 《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

② 《周书》卷50《吐谷浑传》。《隋书》卷83《吐谷浑传》又称“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或是隋炀帝“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时，按小里制略记之数。

③ 《北史》卷96《史宁传》。

④ 《资治通鉴》卷176，《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

慑,比较收敛。开皇十六年(596年),吐谷浑可汗世伏娶隋宗室女光化公主,建立和亲关系。世伏死,其弟伏允立,依俗尚主,朝贡岁至,但犹“常访国家消息”,隋文帝“甚恶之”<sup>①</sup>。暂时相安,矛盾依旧。

大业三、四年间,吐谷浑又屡寇张掖。当时阴世师出任张掖太守,曾亲自捕击联合党项屡来寇掠的吐谷浑。另一次吐谷浑来寇张掖,被长孙炽率精骑五千击走,直追至青海。西陲不安,处于河西走廊中心的张掖尚且频被侵袭,这是隋炀帝对吐谷浑用兵,亲巡西地的背景之一。

隋炀帝西巡的另一目的是为畅通丝绸之路,发展商业贸易。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最捷便的主要通道,这条路早在西汉以前已经使用,公元前二世纪初张骞通西域和汉武帝设河西四郡之后,交通运输日益繁忙。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大陆,在东西方文明史上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汉唐乃至明代之间十五六个世纪里,无论我国是处在统一的还是分裂的时期,历代政府都特别重视维护这条道路的通畅。即使在动乱的南北朝时期,客商和使臣的队伍仍络绎不绝,克服千难万阻,在丝绸路上奔忙。上文提及的凉州刺史史宁截获的吐谷浑使臣商队,并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很典型地反映了丝路贸易的宏大规模。平城时代的北魏,也几经努力打通了通过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进到姑臧(凉州,今武威)的道路,把自己和丝绸之路联结起来<sup>②</sup>。

由于丝绸之路在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乃至宗教等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历代争夺这条道路控制权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在东西方间并演成若干国际性的战争。在隋代,危及走廊通道安全的主要

<sup>①</sup> 《隋书》卷83《吐谷浑传》。

<sup>②</sup> 参前田正名《北魏平城时代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东洋史研究》第31卷第2号。

就是吐谷浑和突厥呈南北夹峙的两股势力。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说：“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sup>①</sup>隋炀帝详细了解这方面情况后，决定采取行动。他将经略四方的事务交付裴矩掌握，并有亲自西巡之举。

西陲不安，丝路不畅，是炀帝西巡的背景，他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亲征吐谷浑的。

## 二、隋炀帝西巡的路线和情况

关于这次实为亲征的巡狩活动，《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较详。但《隋书·吐谷浑传》将西巡和前一年宇文述进攻吐谷浑的事混记在一起，该书《炀帝纪》和《食货志》的有关记载与《通鉴》所记互有出入。今参用诸书，综述如下：

事情是裴矩策动的。大业初，“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裴矩通过胡商对西域情况作了一番调查，写了《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上，引起隋炀帝极大兴趣。裴矩被召见时又讲了一通，说那边各种珍宝如何多，吐谷浑也不难打。“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自此，隋炀帝把降服吐谷浑、突厥，“混壹戎、夏”<sup>②</sup>，交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定为国策。

裴矩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sup>③</sup>。裴矩对付吐谷浑，兼用了传统的“以夷制夷”办法。

大业三年，居伊吾以西蒲类海一带即今哈密、巴里坤地区的铁勒犯塞，寻遣使谢罪。裴矩奉炀帝命前往慰抚，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

① 《隋书》卷 67《裴矩传》。

② 《资治通鉴》卷 180 大业三年。

③ 《隋书》卷 67《裴矩传》。



裴矩曾设想联合母亲是汉人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一起行动,隋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大业四年二月派司朝谒者崔君肃出使西突厥,对处罗说:“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sup>①</sup>

对于东突厥,隋朝以义成公主妻于启民可汗和炀帝亲巡其帐给与殊遇等办法加以笼络,使启民可汗断绝了与吐谷浑的往来。

虽然处罗可汗没有如约到大斗拔谷会同隋军共攻吐谷浑,但仍可见隋朝在离间吐谷浑与其周围民族关系的战略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为后来征服吐谷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是铁勒被裴矩说服,在大业三年或四年时先出了兵,契弊歌稜大破吐谷浑,伏允可汗东逃,保西平境(大业初改鄯州为西平郡,治今青海乐都)。

吐谷浑遣使向隋求救,隋炀帝命左翊卫大将军许国公宇文述率兵屯西平之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抚纳降附”。吐谷浑见宇文述兵强,来势不善,又西遁。宇文述率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追击,连拔曼头(在今青海共和西)、赤水(河源郡治,在今兴海东)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虏男女四千人而还。吐谷浑伏允可汗南奔雪山。时大业四年七月。

宇文述这一仗实为炀帝西巡的前奏。隋军撤回以后,伏允又返回故地,于是有翌年隋炀帝亲征之事。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自关中赴河西,古道主要是两条,习称南道和北道。北道大体沿泾河走,过泾川、平凉,越六盘山,直趋武威,或转道兰州进河西。南道沿渭河西溯,越陇山,绕过宝鸡至天水间山河曲折险阻难行的地段,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又分两道,或北上兰州,过乌鞘岭进河西走廊到武威,或西北行,经青海之乐

<sup>①</sup> 《隋书》卷84《西突厥传》。

都、西宁，自俄博——扁都口穿越祁连山到张掖。隋炀帝西巡，主旨在解决吐谷浑问题，自然是走南道，经青海赴张掖。

据《隋书》、《北史》、《通鉴》和《册府元龟》等书记载，这次西巡的具体日程是：

三月己巳(二日)，从长安出发。

庚午(三日)，到武功(今武功西北)。

乙亥(八日)，过扶风(今凤翔)旧宅。又至天水。

四月己亥(三日)，大猎于陇西。到了陇川宫。

乙巳(九日)，次狄道(今临洮)。

癸亥(二十七日)，出临津关(今循化东)，渡黄河。

至西平(今乐都)，陈兵讲武，演习军事。

五月乙亥(九日)，大猎于拔延山(今化隆马场山)，长围

周亘二百里。

庚辰(十四日)，入长宁谷(今西宁北川)。

壬午(十六日)，度星岭(今达坂山?)。

甲申(二十日)，宴群臣于金山(今西宁西)。

丙戌(二十二日)，至浩门川(今大通河)。

因桥未修好，斩都水使者黄亘和督役者九人，数日桥成乃行。时炀帝命元寿等四面合围吐谷浑于覆袁川(今俄博河)，伏允遁出，其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在俄博河南)。

壬辰(二十六日)，左屯卫大将军张定和率师往车我真山，劝降不成，挺身登山，中矢而死。其亚将柳武建悉斩守敌数百。

甲午(二十八日)，吐谷浑仙头王穷蹙，率部落男女十万余口(一说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来降。

六月丁酉(二日)，遣大将军梁默、右翊卫将军李琼等追击吐谷浑主，皆力战而死。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吐谷浑，

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追奔，至伏俟城。左武卫将军周法尚出松州道，逐捕亡散，也到了青海。伏允南遁，率数千骑客于党项（在今海南、果洛地区）。

辛丑（六日），隋炀帝谓给事郎葵征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云云。

癸卯（八日）（？），经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遇霖雨，人马俱有损失。

丙午（十一日），次张掖。

辛亥（十六日），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等四科举人。

壬子（十七日），隋炀帝至燕支山（今山丹大黄山），高昌王鞠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谒，献西域数千里之地。

癸丑（十八日），置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鄯善（治鄯善城，今若羌）、且末（治且末城，今且末南）四郡，谪罪犯为戍卒以守之。又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

丙辰（二十一日），在观风行殿宴高昌王、伊吾吐屯设和西域各国来使。

戊午（二十三日），大赦天下，巡行路过的陇右诸郡给复二年。

七月丁卯（八日），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九月癸未（二十五日），车驾入长安。

上述巡狩情况，尚有几点须说明：

其一，巡行之路线，正合关中河西路之南道。临津关是黄河古渡，又名积石关。《清一统志》：“积石关，东去积石山五十里”，应在

积石山中的炳灵寺西。一说即在临夏大河家附近<sup>①</sup>。《水经注》卷二引段国《沙洲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桥在清水川东”；《西宁府新志》卷五：“清水河，在（贵德）所治东南百六十里，清流见底，东北注于黄河”，按方位里程，河厉桥即在临津关一带，或隋军即从桥上渡河。拔延山，《隋书·地理志上》西平郡化隆县有拔延山。汪受宽《拔延山考》以为即今青海化隆巴燕镇西北三十里之马场山<sup>②</sup>，从之。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之研究》认为拔延山在西川（伯颜川）以南今青海山脉中，似不可能那么偏西。金山，按所记炀帝行程应在星岭与浩门川间，即在星岭北，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河西诸郡图》标在星岭南，与《西宁府新志》卷一《西宁府全图》所标金山位置符合。杨应琚在该书卷四《地理志》记：“金山，西去（西宁）县治七十里”，并说即隋炀帝宴群臣和元寿南屯之处。若是，则星岭当在金山东南距长宁谷口不远处。覆袁川，即《括地志辑校》卷四甘州张掖县之“覆表水”，又名鲜水、张掖河。隋炀帝合围吐谷浑的具体地点，判断应是张掖河上游祁连县以东一段支流，今俄博河，旧名伏牛河者。

巡行日程只详及张掖、燕支山，返程情况诸书缺载，唯《通鉴》有一句：“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示意是原道返回。《通鉴》此说有《略记》为依据，考异且曰：“帝记在六月癸卯。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此次随考察队七月二十七日进到扁都口内，时亦暑日，仅较六月癸卯（阳历七月十四日）晚一旬，出入之间，天色骤变，由艳阳天忽而阴霾密布。但当地同志说，寒流霜冻来潮要在阳历八月以后，我们去时还不至有。故如《通鉴》所改，车驾从燕支山折回大斗拔谷，时间当在置马青海求龙种的七月丁卯（阳历八月三日）前后，那时遇冻害的可能性比去时或者大些。如果这一

① 参见冯国端《炳灵寺石窟勘察记》。

② 《西北史地》1981年2期。

点《通鉴》改《隋纪》改对了,那么这次西巡往返走同一条道的问题也解决了,而且把张掖燕支山地区宴请西域三十来国贵宾的盛会放在大斗拔谷悲剧之前,没有那令人沮丧的情绪,于情理上也通。当然《通鉴》的根据是不很充分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

至于这次在大斗拔谷的损失,《元和郡县志》记“士卒冻馁死者十六七”,《北史·隋纪》、《隋书·炀帝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巡幸门》和《通鉴》都说“士卒冻死者大半”或“大半”,《隋记》和《通鉴》并记死“马驴什八九”,数字惊人,难以想象。但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大斗拔谷贯通祁连山,纵深四十公里,地高天寒,山路隘险,大部队通行甚难,倘遇不测风云,稍一滞阻,困在山中,便可能冻死人。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军在那里遇大雪,“冻死者甚众”<sup>①</sup>。这类事直至近代亦有发生。炀帝这次西巡,队伍庞杂,一部分人当天未能走出山,“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损失会更大些。炀帝胞姊乐平公主,即前北周天元皇后,这次随行,殁于河西,也许就与大斗拔谷出事有关。不过当日气象,《隋书·食货志》与《元和郡县志》记是“霖雨”或“大霖雨”,《通鉴》、《隋纪》、《北史·隋本纪下》及《册府元龟·帝王部·好边功》记是“风雪晦冥”或“风霰暝暝”,明显有别。按当时节气,是雨而不是雪的可能更大。那么若不是山洪暴发,仅遇雨能否死那么多人便是个疑问。《隋书·食货志》记这次损失是“士卒死者十二三”,同一书前后出入如此之大,显见是有意夸大了。某些著作未及详审,贸然引“死者大半”一说为全盘否定炀帝此行的论据,实不足为凭。

其二,对吐谷浑作战的情况,由于史书记载不详或地名考证不清,也有些疑问。

包围覆袁川,迫降吐谷浑,是这次战役组织的核心。宇文述和

① 《旧唐书》196上《吐蕃传上》。

群臣参加的金山之宴,似为作具体部署的军事会议。当时“吐谷浑王率众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sup>①</sup>。历史地图标示这四个地方,金山在西宁西川河北,雪山在祁连山东端冷龙岭,琵琶峡在门源县南大通河与西宁北川间,泥岭在青海湖北大通山。琵琶峡若如图在金山与雪山之间,则无所谓“东屯”。按其东约三百里有一琵琶山,《元和郡县志》卷39兰州广武县条曰:“琵琶山,在县西北一百五十里”,则在乌鞘岭一带。《太平寰宇记》卷151兰州广武县条亦记琵琶山:“峻险曲折,有似琵琶首”,佐藤长认为这就是杨义臣屯军之地<sup>②</sup>。沿庄浪河越乌鞘岭到凉州是出入河西走廊的又一条古道,这次包围吐谷浑,为防其北窜而派一支兵马在那里驻守自不无可能。且“(杨)义臣屯琵琶峡,连营八十里,南接元寿,北连段文振”<sup>③</sup>,元寿和段文振皆“连营三百余里”<sup>④</sup>,按里程计,大致可在琵琶山接合。但究竟如何尚难论断,暂且只好置疑。

在覆袁川搞的合围圈,唯西屯泥岭的张寿部连营数字缺载,按其他三面推算,合计不下七八百里。动用的部队若按《隋书·礼仪志三》记载的拔延山围猎部队计,“四十军,军万人”,合四十万。殆非有此数,不能一次迫降吐谷浑十万余众。除合围部队外,还有几支部队配合行动,见于记载的有安德王杨雄出浇河道,左武卫大将军郭衍出金山道,鸿胪御史祥出玉门道,左武卫将军周法尚出松州道,右候卫将军赵才出合河道,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sup>⑤</sup>。刘权和周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② 《西藏历史地理之研究》第三章第四节《隋炀帝征讨吐谷浑路》。

③ 《隋书》卷63《杨义臣传》。

④ 《隋书》卷63《元寿传》、《隋书》卷60《段文振传》。

⑤ 见《北史》、《隋书》本传。两书《赵才传》皆曰刘权从赵才出合河道,与《刘权传》不合。

法尚都攻至青海,史祥“俘男女千余口”,郭衍“纳降二万余户”,其他作战情况不得详知。但已可见,这是一次有合围重点,又有多路配合,精心安排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无怪在隋军重围之下,不过数日,仅在车我真山一次不大的接触后,仙头王便“穷蹙”而降。伏允在别人冒名顶替掩护下逃出包围圈,又被几路隋军追击,远遁入党项,其地皆空。隋军一举取得全胜。至于《隋书·宇文述传》所记“复寇张掖”,被负责斥候的宇文述用警卫部队击走的吐谷浑军,似是从覆袁川溃围而出顺河北上流窜到张掖的残部,无关大局,毋庸详考。

历史上的事情常常无独有偶,在覆袁川搞合围的战例前代还有。汉宣帝派赵充国安羌弭乱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也制订过这样一个作战方案,提出由他率兵从酒泉、张掖南越祁连,与沿湟水西进的赵充国在鲜水合击罕犂羌。鲜水亦即覆袁川。前后这些计划行动惊人地一致。不过西汉辛武贤的方案没有实施,隋炀帝这次却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其三,会见高昌王等西域君长的情况。

炀帝西巡之前,已派裴矩在张掖负责联络西域之事。他“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大业四年,先有西突厥处罗可汗来贡汗血马,复说铁勒击吐谷浑,八月,炀帝亲祀恒岳,“裴矩所致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大业五年西巡前,炀帝又命裴矩说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入朝,于是有在河西两次大会之盛事。

《隋书·裴矩传》和《通鉴》记述较详,略曰:六月壬子,炀帝至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丙辰,炀帝御观风行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吐屯设升殿宴饮,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一说三十余国),奏九部乐设鱼龙戏以娱之,赐赉有差。气氛热烈友好。

两次会见的地点,史籍一般笼统记在燕支山,“渴于道左”,使用观风行殿,更易使人理解为在旷野。但那样规模的盛会,更有讲究排场的中原天子主持,在路边上举行,于礼仪于安全似都说不过去。从实地情况看,当时可供选用的地点有几个,一是张掖城,其位置自隋唐至今无变化。《隋书·阎毗传》记殿内丞阎毗“从幸张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这“行所”按一般理解应是离宫式建筑。今张掖城内大佛寺,规模宏伟,当地同志说即是当年炀帝下榻处,但未见该寺创建于西夏前的确凿资料,尚难断言即为高昌王朝见的行所。二是永固城,在今民乐县东南十公里,正扼扁都口出入,汉唐以来历代都是屯防要地,城池规模与张掖相当,当地父老亦有说这是隋炀帝会见西域君长之地。三是定羌庙,今名绣花庙,正位于兰新公路上,张掖至燕支山之道左,南眺可见大黄山(燕支山),相距不过十余公里。究竟何处才是,有待识者确指了。

至于西巡的终点,宋《武经总要》说这次隋炀帝到了玉门关。不知所据,不取。

### 三、隋炀帝西巡的后果和评价

隋炀帝这次亲征得胜,吐谷浑主南遁,至大业末不为边患,又在其地设郡,历史上第一次使青海省的大部分归入中原王朝郡县制度的管理之下(两汉和新莽时代所设郡县范围仅及青海东部湟水流域)。所设四郡中且末、鄯善在今南疆东部。稍前,炀帝还派刘权往北疆城伊吾,显见是全面实施着“固河西,斥西域”的战略。诚然这里有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个人的想法,也不可否认那一发展体现着历史上业已成熟的一种趋势。经汉武帝和汉宣帝以来七八百年的经营,古代青海、新疆类似甘肃,已和关中内地建立了牢固的联系,经济上彼此支持和补充,文化上密切交往互相吸收,通过联姻血统上也有所接近,一些杂居的民族已经“同操华语”,有的屡



议要“解辫削衽”改变胡服,吐谷浑要求“归化”、“藩附”的部落更是前后相继。西巡及设四郡这样一个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和疆域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合乎大势所趋的行动,它的成功,是不能仅仅用隋炀帝个人扩张统治地域的欲望野心来解释的。当然,帝王君主个人的及官僚统治集团的意志在这类事件中是起作用的,但主流的决定性的东西,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那股无可阻遏的走向联合和统一的潮流。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经过汉唐以来包括这次隋设四郡在内的不断努力,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整个大西北终于成为我们整个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内在原因。

隋炀帝亲巡在吐谷浑和突厥南北夹峙下的河西,着意解决吐谷浑问题,他的做法和汉武帝为断匈奴之右臂,打破羌和匈奴的联合,开设张掖等河西四郡,及唐太宗最后征服吐谷浑的行动十分相像。唐太宗在这件事上,更可说是跟在隋炀帝之后亦步亦趋。既然我们肯定了汉武帝、唐太宗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又怎能不同样地评价隋炀帝西巡在这方面作的努力呢?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隋末离乱时,伏允又尽复故地,在唐初那几年骚扰得很厉害,于是又有贞观九年(635年)李靖平吐谷浑之役。西海等四郡在西巡时设置之后,为戍防转输物资,“西方先困”,增加了隋王朝的社会危机。四郡之地归于中原王朝统辖之下的情况,后来还有过反复。但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隋炀帝西巡是历史上许多代人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所作的无数努力中比较有成效的一次。统一国家疆域的形成,正是这样一代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的结果,那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战争给双方,特别是给吐谷浑人民带来牺牲和损失。在历史上,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在具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后,往往又楔进战争的形式促进解决。如果想到在那时国内各政权之间的分裂对立情况还再延续下去,时时刻刻可能发生的相互掠夺和冲突会给双方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那么具有统一性

质的战争这样一次性的损伤,也许应该说是一种有补偿的代价。

随着吐谷浑问题的初步解决,中西交通更加畅通,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要办好这件事,隋炀帝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当初派裴矩往张掖监诸胡商互市和西巡时的情况,上文已有交代,这里还可再补充几点。

在敦煌以西丝路诸道中,当时“客商往来,多取伊吾路”<sup>①</sup>,所以伊吾地区的戍防攸关丝路安全。西巡前不久,“(炀)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竞”<sup>②</sup>。裴矩善于外交辞令,这里说建伊吾城为便于与西域贸易倒不全是巧言诡辩,因此能得到西域各国赞成。

西巡作战胜利后,又“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sup>③</sup>,这主要指青海路和新疆南道,也有在南边拱卫河西路的意义。刘权“在边五载,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sup>④</sup>。新设的西海、鄯善、且末等郡和河源郡一样,都有戍卒防守。丝路上商旅往来交通的安全比较有保障。

这些措施促成丝绸路上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高潮在炀帝于河西停留期间即以盛会形式出现,所谓的朝贡和赐赉可看作官方实物交易的别称。这一高潮迅速波及两京。翌年正月十五,诸蕃酋长毕集洛阳,大献方物,皇城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百戏之盛,振古无比”<sup>⑤</sup>。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突厥等二十六国并遣使朝贡,又到了洛阳,其中许多沿丝路来

① 《隋书》卷83《高昌传》。

② 《隋书》卷67《裴矩传》。

③ 《资治通鉴》卷181 大业五年。

④ 《隋书》卷63《刘权传》。

⑤ 《隋书》卷10《音乐志下》。

自西域。隋炀帝再次设鱼龙曼延之乐,大会宾客,颁赐物品。他从张掖到洛阳对西域客人的盛情款待,无疑是对发展丝路贸易的刺激和推动。宴乐之外,实质性的内容还是商业贸易,“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于是整饰店肆,盛设帷帐,珍货充积,“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sup>①</sup>。规定胡商进酒食店,一律免费招待,还以缙帛缠树,炫耀富庶,按隋炀帝的脾气,极尽靡费奢华。这种做法,貽笑当时,也屡为后人抨击,或许也不能完全抹煞隋炀帝极力提倡内外贸易的苦心。一般都把丝绸之路上继两汉之后又一次繁荣推到唐代,其实这一新的高潮在隋代已经到来了。尤其是洛阳方面的材料,肯定会教呼吁不要把洛阳排除在丝路之外的同事们以及致力于研究“东丝绸之路”的日本朋友们感兴趣。

隋炀帝西巡在屯田建设和改良马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后果不很明显,就不细说了。

炀帝西巡,有失误,更有成果。总起来看,一度解决了吐谷浑寇边和干扰丝路的问题,设了西海等四郡,西陲得到安定,丝路更加畅通,隋与西域的交往和丝路贸易达到新的高潮,“隋氏之盛,极于此矣”<sup>②</sup>。在我国的疆域史和中西交通史上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西巡的成功是可以肯定的。这一成功不仅是河西的、内地的,也包括吐谷浑人民付出了代价换来的,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繁荣丝路的物质条件,他们的长期交往、共同奋斗,创造了逐步归于一统的历史条件。

隋炀帝作为一个处在中国长期分裂后重建大统一时期的皇帝,又是处在中古社会鼎盛发展的起点上,他的许多活动带着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西巡之外,还有北狩、建洛阳、修驰道、筑长城、开运河、下江南等等,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强度发疯似地干了十几

① 《资治通鉴》卷 181 大业六年,《隋书》卷 67《裴矩传》。

② 《资治通鉴》卷 181 大业五年。

年,但他并不是发昏,他做的一些事,不无建设和发展统一国家的历史内容。许多做成功了,有的做糟了,特别是他本人残暴的专制君主的品格,在做一些本无可厚非的事时,也给人民带来格外深重的灾难,积累成无法忍受的负担,最后征辽东激起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隋炀帝是个矛盾的人物,他在历史上既有重大建树,又有重大罪恶。他常常把事情做坏的很大一个教训是操之过急,失之于暴,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打乱了社会生活的节奏,这方面留下了很值得引为龟鉴的教训。魏徵亲眼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很懂得这一点,以隋为鉴是他劝诫唐太宗时常用的法宝。为了为当时的现实政治服务,魏徵在主持编撰《隋书》时,不免要着重强调隋炀帝作为暴君的失误,有意无意地抹煞这位“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雄心勃勃的君主的一切历史功绩。一千多年来,魏徵的观点很容易地被人们接受,今天我们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武器,对隋炀帝的功罪的评说,应当能比魏徵他们更实事求是。

(附:隋炀帝西行路线图,略。本文是据1981年7月30日参加丝绸之路考察,在张掖作的学术报告录音写成,刊载于考察队文集《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 千秋功罪说隋炀

评价隋炀帝,最好先去运河上走走。在我们考察运河的途中,隋炀帝很自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考察愈深入,这个题目的吸引力愈大。当考察队泛舟苏杭,跨越大江,来到扬州雷塘畔的炀帝陵前时,大家一拥而上,争相抚弄那半截埋在土中的毛石墓碑,细细端详高不及二丈的坟陵。当然各人观感不同。我被视为隋炀帝一生事业苦心的知音,而登上坟头的田队长得意地宣称把隋炀帝踏在脚下了。夕阳的余辉泼洒在冢上、碑上和全体考察队员的脸上,我摄下一张每一轮廓线都镶上了金边的彩照,记录下考察全程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的,十几个世纪过去了,无论为龙舟拉纤的宫女,还是瓦岗寨横刀的将士,他们的遗骸早都灰飞烟灭了,杨广本人也只落下一丘荒冢半截残碑。但是南北运河依旧碧波荡漾、生气勃勃,四化宏图上规划的调水调煤工程仍是依傍运河故道开拓,这永褒青春生命力的历史业迹,不能不教人思绪万端,感慨良深。

隋炀帝究竟算何等样人?

隋炀帝当政十四年亡隋,这一败迹使他成为一个被否定的历史人物,一千三百多年来铁案如山。加之他夺宗篡位过程中屠兄弑父施展的各种阴谋,在我们素称以忠孝治国的礼仪之邦,便更无容足之地了。多年来,他更多的被当作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人们甚至很少屑于一顾他的全部历史。

这个暴君是否还有功罪两面可论呢？他是怎样的历史条件造就，又怎样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他继位以后长年不在京城长安，一生东奔西走忙乎了些什么？他做的全是荒唐事吗？这些问题如不加细致探讨，不免会辜负历史付出极大代价才得以留给我们的这份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我们还是从隋炀帝做了些什么说起吧。

## 一、平定江南

隋文帝在用军事、政治各种手段暂时解除了北方突厥的威胁并灭梁以后，便部署了平陈战役。杨广时为晋王，被任命为主帅，“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sup>①</sup>。或据史籍并云当时“以颀为元帅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颀”<sup>②</sup>，认为杨广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似不尽然。

开皇九年(589年)是役隋军得胜后，晋王广入建康，以施文庆等五佞“皆为民害，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又“使高颀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sup>③</sup>。

平陈之翌年，开皇十年南方发生士族土豪的叛乱。晋王杨广又奉命出镇扬州，他用“三吴之望”吴郡陆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sup>④</sup>。《资治通鉴》未收这条材料，又将晋王广为扬州总管之命记在杨素平定泉州之后，给人印象杨广是事后受命赴任的，司马光这样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就抹煞了杨广在平定南方叛乱中的作用。按《隋书》陆知命、郭衍等传，杨广

①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② 《隋书》卷41《高颀传》。

③ 《资治通鉴》卷177开皇九年正月。

④ 《隋书》卷66《陆知命传》。

当时主持了政治攻势,有力地配合了杨素的军事进剿,功不可没。

## 二、四大工程

隋炀帝一生兴建甚多,我们举其主要的营建洛阳、修筑长城、凿太行驰道、开南北运河四项来谈。

隋炀帝在仁寿四年(604年)即位不久便下诏书营建东京洛阳。下诏前十八日他先调发丁男数十万在洛阳外围掘堑,起自龙门(山西河津),东至汲郡(河南浚县),南度河后折向西,包洛阳,达于上洛(陕西商县),沿堑设置关防。用意是使长堑与长安周围的关山合拢,拱卫两京,扩充和巩固这块全国的腹心地区。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开始营建洛阳。新城坐落在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跨洛河南北,澧水东西,规模仅略小于隋唐长安城。二年正月,这座在隋唐两代为东都,并是东西丝绸之路新起点的古都名城便建成了。隋炀帝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指出:洛阳有“水陆通,贡赋等”的好处,而没有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缺点。<sup>①</sup>这表明隋炀帝已认识到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东移的发展趋势。从当时因关中地狭人稠,出产有限,时而发生供应困难,吏员百姓不得不“就食”洛阳的情况看,隋炀帝营建洛阳,试图解决都城设置问题的努力是有道理的。

第二项工程,大业三年和四年两次修长城,都是隋炀帝亲巡时实地决策的。

大业三年修的是榆林以东段。榆林即胜州,故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方的十二连城,扼黄河渡口,过河溯金河而上可通白道,出入阴山南北,自古便是漠南北入塞的一条大道。赵武灵王设

<sup>①</sup> 《隋书》卷3《炀帝纪上》。

置的云中郡城就在河北道旁,秦长城的东端也正修到这里黄河南沿。<sup>①</sup>隋炀帝从榆林郡又往东续修了一段,用长城连接金河、紫河即今大黑河、浑河,在定襄大利城突厥启民可汗牙帐以南构筑了一道防线。大业四年隋炀帝二次出塞巡视并修长城,《通鉴》胡注以为这次所修长城在上述榆林以西,疑误。实际似自今陕北定边迤东,即开皇初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sup>②</sup>七百里工程的继续,是上年所修长城以南的又一道防线。详见后论。

突厥自六世纪中叶灭柔然以来,称雄漠北,时为中原政权边患。佗钵可汗控弦数十万,“周、齐争结婚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开皇元年佗钵可汗死,沙钵略等五可汗并立,二年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sup>③</sup>。隋文帝君臣处心积虑,多方用计对付,兼之东西突厥分裂,隋与突厥关系才缓和一时。隋炀帝修长城时苏威曾持异议,但从大业末至初唐突厥又成为北方大患的形势来看,修长城作为战备并非徒劳。

第三项工程,大业三年凿太行驰道,从河北达于并州(山西太原西南)。另一条是在晋东南穿太行通河内(河南沁阳)的九十里直道。大业年间所修道路还有在运河岸边筑的御道。又有一条西起榆林北突厥牙帐,东达于蓟(汲郡治所,今北京西南)的三千里御道,走向与今京包线略合,在涿郡接大运河。大业四年隋炀帝巡行路线,自陕北五原(定边)至代北恒山,正是北魏平城时代以来兴盛一时的通凉州(甘肃武威)、西域的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走的路的东段。综合以上情况可知,隋炀帝的总体思想是适应国家统一后

① 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载《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

② 《隋书》卷60《崔仲方传》。

③ 《隋书》卷84《突厥传》。



的形势,搞网状分布的交通线。

第四项工程,大业元年至六年分段开南北运河。古代水运比陆运省工省力。在使用机械动力以前,长途陆路运粮,所运不一定够运丁和役畜的食粮,实际成为不可能,必须依靠水运。而我国河流多东西向,海路漕运在元代以后才发展,此前南北水运全靠运河。运河自春秋以来历代都有整修,首次贯通海、黄、淮、江、浙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是隋炀帝时开通的。

大运河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在勘查测量、节制水量、平衡水位、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原有水道各方面都需要高超的科学水准,工程进展的顺利和神速更雄辩地表明了我国古代工程管理人员和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我们也不能抹煞当时以极大魄力发动这一伟大工程的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决策人隋炀帝的一份功劳。

五千里大运河被举世公认为古代文明的奇迹之一。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它虽也历尽沧桑变化,但是顽强地存在下来了。在历史上,它作为一条闪光的纽带把长江、黄河两大文明摇篮连成一气,曾为祖国南北的物资文化交流日夜奔忙。它千里波涛澎湃激荡,为维系祖国的统一,为推动祖国的发展,贡献过不懈不倦的力量。

大运河不仅“为后世开万世之利”<sup>①</sup>,在隋代即已“商旅往还,船乘不绝”<sup>②</sup>。历来认为开运河“为其国促数年之祚”<sup>③</sup>,苦了隋一代人,是亡隋的重要原因。实际如岑仲勉先生强调的,隋代修大运河相当部分并非新创,是半自然半人工又利用了古运河故道<sup>④</sup>。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辑引《谷山笔麈》。

② 《旧唐书》卷67《李勋传》。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辑引《谷山笔麈》。

④ 《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页。

这样一条分段分期开凿的运河，一时征用占总人口五十分之一的百来万人，几个月到半年就完成一段的工程量，以隋代极盛时代的人力、物力是可以承担的。“役及妇人”在古代社会是一种破例的征发，说明劳动力一时相对紧张的状况，但仅以一项大规模水利建设有妇人从役而论，也不是严重得了不得的问题。

开运河无疑要加重农民的负担，影响一些生产，积累了阶级矛盾，但对这项工程应作如何评价，隋代人民的态度是最权威的回答。他们作出了牺牲，开通了运河，承担了历史落在他们肩上的这份责任。国家总要建设，建设总要付出代价，当时人民，包括妇女，为这样一项建设国家的伟大事业付出的代价不是太过分的。运河的主要河段，除江南河外，在大业四年就完成了，农民战争是三年以后因准备征辽触发的，运河施工的那些年里没有爆发武装造反那样激化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可见人民对修运河和对征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至于隋末农民军有许多聚集在运河沿岸，显然是因为这里富庶，兴起了一批新城镇，有囤粮的仓库。并不能以此作为运河亡隋的证据。

### 三、两大改革

其一，“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sup>①</sup>。

奴婢和部曲在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中是一支基本力量，这与南北朝动乱及民族战争频繁有关，不仅在边地各族间彼此虏掠奴婢，西魏陷江陵时也一次虏走男女十余万为奴婢。分裂和动乱加强了门阀地主的坞壁经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强化，奴隶制的残余从法律和制度上得到保护，北魏起均田令便有奴婢受田的

<sup>①</sup> 《通典》卷5《食货五》。

条文,是对贵族门阀有利的规定。

隋炀帝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的同时也不再授田给他们<sup>①</sup>,除了土地不足的原因外,这也是时代进步在制度上的反映,对门阀地主经济是一个打击。唐田令妇人、奴婢、部曲也不受田,本源于此,是唐承隋制一例。

其二,“炀帝始建进士科”<sup>②</sup>,并对官吏的选举、考核和勋爵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

中国中古社会官吏的选举制度,前期是察举和征辟制,后期主要是科举制,北朝后期已开始转变,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和地方长官辟举僚佐的旧制,品官都由吏部任免,当时已有秀才、明经等考试科目,而最重要的进士科是隋炀帝开设的,影响及唐直至清代的科举制,这“学而优则仕”比靠门第血统选官总是一个进步。

非常值得注意隋炀帝在官制方面另外的一系列改革。<sup>③</sup>

大业二年七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sup>④</sup>,这是取消熬年头长级的陋规,要靠才能政绩提级。

大业三年四月所颁律令,官制方面有两条重要改革。

一条为“旧都督已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皆罢之。……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左右光禄……等九大夫,建节、奋武……等八尉,以为散职”<sup>⑤</sup>。

勋官之设,起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为劝赏战功,许多勋官因请勋田,上升为地主阶级。高级勋官社会地位很高:上柱国从一品,比郡王;柱国正二品,比尚书令;上大将军从二品,比尚书左右仆射;大将军正三品,比纳言、内史令和六部尚书、九卿。其渊源显

① 参汪篪《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数》,1962年8月29日《光明日报》。

② 《通典》卷14《选举二》。

③ 本节内容参卢启勋《评杨玄感起兵》。

④ 《通典》卷14《选举二》,又《资治通鉴》卷180大业二年七月。

⑤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与府兵制初创时的柱国大将军、大将军有关,那曾是关陇军事集团的核心,高级勋官借用那些名称表示优崇。隋炀帝改易用左右光禄大夫等文散官的名称,是要抹掉他们这种身份上带有的过去的光荣的余辉,是一种实际上的降格,这使一些人非常不满。杨玄感起兵时重申“我身为上柱国”,翟让把瓦岗军寨主交椅让给李密后称“上柱国……东郡公”,李密讨隋炀帝檄文中标榜自己是上柱国之子,这些说明高勋在社会上很被重视,很有诱惑力,向来是一些人争夺最高权位时炫耀的身份资本,当时几朝皇帝俱出自关陇集团上层的这类贵族世家,所以隋炀帝取消旧勋官名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有其政治用心的。后来唐高宗为澄清“国初勋名与散官名同,年月既久,渐相错乱”的情况,申明“武德初光禄大夫比今日上柱国……”<sup>①</sup>。由诏书可知,隋炀帝这一改革是实施了的。

大业三年四月官制改革的另一条:“开皇中,置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为九等者,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sup>②</sup>这样取消了低级爵位,使有封爵的人数大为减少,保留的高级爵位自然是很难受赐的。比如郭衍,平尉迟迥有功,超授上柱国,封武山郡公。他曾密劝杨坚篡周,又与宇文述同领东宫兵宿卫,参与谋害隋文帝,助炀帝登基,但也以“新令行,衍封爵从例除”<sup>③</sup>。可见这削除一批旧封爵的诏令是相当严格地实行了。一批贵族子弟世袭爵位的特权丧失了。

大业五年二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sup>④</sup>。同是出自关陇集团的西魏、北周、隋和后来的唐政权,对前朝官僚大都留用,百官多“历世勋贤”<sup>⑤</sup>,虽政权更迭而能门第不衰。隋炀帝这项改制堵绝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

②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③ 《隋书》卷61《郭衍传》。

④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⑤ 《隋书》卷40《王谊传》。

了一大批前朝官员子弟以门荫入仕之途，意在改善官吏队伍的结构。

大业六年二月诏：“自今已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sup>①</sup> 进一步甄别包括开皇以来的封爵，无功袭爵的贵族也被夺封。

大业八年九月诏：“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教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授文武职事，……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sup>②</sup> 这个诏书很有见地，要使历来占据高位蠹政害民的勋官勇夫丧失受任职事官的权利。

再加上隋炀帝开进士科取士，新旧交替，改革官制，解决封爵冗滥官员猥杂的积弊，用心良苦。当然这不可避免会在关陇集团乃至整个统治阶级内部激起反对，杨玄感起兵就是一批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特权的达官贵族子弟造反。仅就这件事而论，杨玄感代表或利用的是倾向保守的官僚子弟的思想情绪，隋炀帝则是正确的，他为改革招来风险，在政治上付出了代价。

#### 四、交通四方

隋炀帝不是个局面隋境耽于守成的君主，他志在四方，野心勃勃，把眼光放到周围世界的许多地方。除了巡塞外、通西域、征辽东外，他还招抚流求、经略林邑、结好赤土、通使倭国。他远交近攻，活动范围很广，胃口很大，办的事情有是有非。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② 《隋书》卷4《炀帝纪下》。

大业三年、四年隋炀帝派朱宽两次去流求(台湾),史书记载为“慰抚”或“招抚”<sup>①</sup>,不同于对一般外域的用词,可见流求与大陆关系密切,隋代已有意将流求收入版图。流求不从,于是大业六年派陈稜、张镇周带万余兵去流求,差不多是重演了三百六十多年前东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舰队去夷州的那幕历史。这次行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后果。

隋文帝末年刘方率军往当时在隋管辖下的交州(今越南河内),平俚帅李佛子后,又奉命南征断绝“朝贡”的林邑(今越南中部南部)。隋炀帝继位后在这一路继续军事行动,林邑王象军被打败,刘方在归途中也因脚肿病而死。

大业三年十月常骏、王君政应募从南海郡(今广州)启航去赤土(在今马来半岛),带去绢帛五千段(合近六万公尺)作为隋炀帝给赤土国王的礼物。船队进赤土界后受到隆重迎接,赤土王回赠了厚礼,并派那邪迦王子随常骏来中国,带来金芙蓉冠、龙脑香等特产。大业六年春,那邪迦王子在常骏陪同下,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谒见了隋炀帝。这是我国和赤土间首次通使,是一次很友好的交往。

大业三年、四年日本两次派小野妹子为大使来中国,隋炀帝派裴清为使报聘,倭王接见时说:“冀闻大国惟新之化。”<sup>②</sup> 随小野妹子来了些学生和两批沙门、学问僧,隋炀帝置之鸿胪寺四方馆,并召创建兰田悟真寺的净业和尚入馆担任教授。时值日本大化革新前夕,这批僧人和学生学习了中国的文物制度,回国后对日本文明的进步作出过贡献。在东丝绸之路开通的初期,隋炀帝是一个积极的赞助人。在中日友好的历史中,他和当时为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一样,都是应载入史册的人物。

① 《隋书》卷 81《流求传》,《资治通鉴》卷 181 大业六年正月。

② 《隋书》卷 81《倭国传》。

## 五、十次征巡

隋炀帝在位期间曾北巡塞外，西巡河右，南下江都，东征辽东，合计十次亲巡。用他自己巡至河西时的话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他看不上“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sup>①</sup>，无所事事的作风。他十次征巡涉足之处，多有狼烟荒漠，不都是好玩的地方。显然他四处奔走，自有其政治军事目的。

对于塞北的突厥，除修长城加强防御外，隋炀帝还三次亲巡，悉心镇抚。

大业三年他从长安出发，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到榆林郡，在那里会见并宴请来朝的启民可汗、义成公主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八月北渡黄河，出塞耀兵，亲莅启民牙帐。稍作停留后，取消了取道突厥去涿郡的计划，径由太原返洛阳。这次北巡时，启民可汗前后“献”马三千匹，隋炀帝“赐”物万二千段及金瓮等；诸胡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帝又“赐”帛二十万段。实际是一次大规模的官方贸易，用“赐”和“献”等传统用语，具有朝贡贸易意味。当时启民可汗表称自己是“至尊臣民”，请求“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隋炀帝回答：“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还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sup>②</sup> 表现隋炀帝北巡，意在安边，加强与突厥启民部的经济、军事联系。出巡前半月他曾下诏：“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sup>③</sup> 这应是他北巡的初衷。出塞时为安全考虑，结方阵，设行城，冒着风险，绝

①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五年六月。

② 《隋书》卷 84《突厥传》。

③ 《隋书》卷 3《炀帝纪上》。

非巡游玩耍。

大业四年三月隋炀帝第二次北巡，所经路线是个问题。《通鉴》记：三月“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胡注：“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并注五原为“丰州”，所巡为“去年所筑”之长城<sup>①</sup>。当时还下诏为启民可汗“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同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 13-14 图标万寿戍在云中，即启民可汗牙帐附近。按这些解释，隋炀帝这次所到之五原是位于河套的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北），也就是重复作了一次与上年路线雷同的巡行，那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是胡三省搞错了，引起一系列的误解。隋代五原有两个，另一个即今陕西定边，正在开皇中修的长城线上。颇疑此行是从今陕西定边之五原起沿长城东北行，以恒山为终点。这次所修长城之榆谷，或即在今陕西榆林附近，为上年所修长城以南第二道防线。所巡正是北魏平城通往凉州西域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又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道路。当年四月诏起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南管涔山天池附近，也正在巡行途中。这样认识似较合理。且三月即巡至五原，从季节讲，当时到的是南面的五原也合理些。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巡。这次行程，《通鉴》和《北史》、《隋书》的本纪所记有抵牾，大致是先去太原，而后到汾阳宫避暑，七月在天池狼狈遇雨，八月巡北塞，遭突厥袭击。

大业五年启民可汗死后，隋与突厥关系恶化。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继位，隋立其弟叱吉设为南面可汗并欲妻之宗女以分其势，又诱杀始毕的一个能干的宠臣史蜀胡悉，于是两家断绝往来，突厥又兴兵寇盗缘边诸郡。这时始毕得知隋炀帝自己来了，便率骑兵数十万奔袭，在雁门猛攻隋军，四十一城下三十九座，箭头落到隋炀帝跟前。紧急中隋炀帝下诏停辽东之役，许愿厚给勋格，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四年三月、七月。



将士们奋力苦战,坚持三十二天,突厥才撤走。隋炀帝劫后余生,十月回到洛出。事过境迁,自食其言,守雁门的一万七千人只有一千五百人得勋,而且又张罗征辽,使“将士无不愤怒”<sup>①</sup>。三年后他终于在扬州鼓城阁之变中死于这些禁军手中,不能说和他搞的这场言而无信的欺骗没有关系。这是后话了。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河右,目的有二,首先是为解决吐谷浑问题,安定西陲,其次是为畅通丝绸之路,发展商业贸易,显然是实施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战略。<sup>②</sup>

这次行动是裴矩鼓动起来的。他写的《西域图记》和关于西方之事的谈话引起隋炀帝很大兴趣,“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sup>③</sup>。三月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临津关(今青海循化东)、西平(今青海乐都),由长宁谷(西宁北川)北上,出大斗拔谷(今甘肃扁都口)至张掖。途中在覆袁川(今俄博河)合围吐谷浑主,降其仙头王以下男女十余万口。在河西时,高昌王鞠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于行所,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当即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河源(治赤水城,今青海兴海东)、鄯善(治楼兰城,今新疆若羌)、且末(治且末城,在今新疆)四郡,历史上第一次使青海省的大部分归入中原王朝郡县制管辖之下。击败吐谷浑并派兵戍守沿途后“道路无壅”<sup>④</sup>,丝绸之路更畅通了。次年元宵日西域各国王宾毕集洛阳,“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sup>⑤</sup>,丝路的繁荣在隋代便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

这次西巡归途中再过大斗拔谷时出了事,史载“风霰晦冥,与

① 《资治通鉴》卷 182 大业十一年十月。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 63。

③ 《资治通鉴》卷 180,大业三年。

④ 《隋书》卷 63《刘权传》。

⑤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六年正月。

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sup>①</sup>。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当地也不至有雪。在山谷中逗留一夕便冻死这许多人畜,实有夸张。同是《隋书》,《食货志》所记为“霖雨”,“士卒死者十二三”。隋炀帝这次西巡,不顾路途艰险,队伍十分庞杂,竟带着乐平公主(即周天元皇后,她这次殁于河西)及后宫一大批无用的人,增加了无谓的牺牲。至于《资治通鉴》一再强调的隋炀帝通西域后,“西域胡商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sup>②</sup>,在当时条件下,为沟通西域的交通,人民的负担无疑是沉重的,隋炀帝办这事又让人们付出更大的牺牲,这终究也换来丝绸之路促进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有价值的成果。魏徵和司马光看不到这点而持怀疑和全盘否定的态度,未免失之偏狭。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以历史为镜鉴而特别贬抑隋炀帝,因此而下的有关断语常不免夸大其词,我们不能无分析地听之信之,按他们提供的一些显然失实的数据和带有偏见的论断就否定这次历史上有影响的中古中原王朝皇帝唯一的一次亲巡河西的行动。

大业元年、六年、十二年隋炀帝三下江都。江都即扬州,是他当年平定江南时坐镇的故地。隋文帝自开皇九年灭陈荡平建康后便着力营建扬州,驻屯重兵,作为控制整个东南地区的重镇。隋炀帝时修大运河,在这里与长江交会,使扬州处在和洛阳相当的国内水陆交通枢纽位置上。当时扬州濒临长江,可以停靠海船,九世纪中叶时曾到扬州的大食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称之为东方四大商港之一。扬州这座至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历史的名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新起点便在隋代。运河修通后,依托日益繁荣的江南经济,扬州迅速发展,后来到唐代更有“扬一益二”之说,成为国内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资治通鉴》卷181 大业五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0 大业三年,卷181 大业五年六月。

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对扬州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发展,隋炀帝是最有影响的人物。

他去扬州决不是单纯的巡游看琼花,而是着眼于扬州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政治地位,并为加强扬州的这一地位。换言之,他去扬州的主要目的是搞统一,是为使江南经济成为隋帝国的财力物力支柱之一。他大摆排场,率领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去扬州,是他迷信这种帝国天子威风对南方土豪酋帅的镇慑作用。他一去再去,明白地表示他对东南地区的关注,对这块统一不久并曾经叛乱过的地方无疑具有监视和稳定的作用。大业六年开江南河,正是他在江都时的决策。“我梦江南好”,对这块他曾多年经营过的美丽国土,他确实不无感情。但大业十二年他最后一次去江都,则是想逃避农民战争的惩罚,幻想那里能有一块可了却残生的安乐地,而且是一去不返地埋葬在雷塘了。

大业八、九、十年隋炀帝连续三次进攻辽东。大规模征辽的活动早在大业七年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了。这是一场给人民带来无法忍受的困苦和死亡的灾难。如大业八年征辽,出征军“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sup>①</sup>,直接从役的即三百多万,在各地造兵械船只运粮秣的更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了以往营建洛阳或开凿运河时的征发。连年过度的征发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于是旱疫交加,“苦役者始为群盗”<sup>②</sup>,终于在以《无向辽东浪死歌》为号召的农民大起义中隋炀帝和他的王朝一齐覆灭了。

概括隋炀帝一生的政治活动,大致可以大业六、七年为界,分前后两段。在大业六年以前,他曾有一系列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影响的作为。他处在中国中古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折的关头,他的

① 《隋书》卷4《炀帝纪下》。

② 《隋书》卷3《炀帝纪上》。

家族属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的西魏、北周、隋、唐几朝政权,既是旧门阀统治的终结,又是新兴地主政治统治的开端。重建不久的统一国家表现出蓬勃向上的活力。隋文帝时代经济迅速繁荣留下一份丰实的家底,到他手里变成大规模营建和征巡的物质基础,他大事张罗一番,立见成效,许多事体现出他能适应时代潮流的战略家水平。即使他和他前后的那批杰出历史人物——无论是宇文泰、宇文邕、杨坚,还是李渊、李世民——相比,他也是最敢作敢为,在革新创造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个。特别是当他的名字和大运河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便是不朽的了。但他专制君主的残暴本性和极端妄自尊大的品格,无论做什么总是极尽奢侈铺张之能事,从不顾惜民力,即使做一些该做的事,也往往要人民作出惨重的不必要的牺牲,因而积累了社会矛盾和阶级仇恨。大业七年后为征辽,举国从役,“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sup>①</sup>,连续几年耗尽国力办的这件事,性质、后果与前期大多数事不同,在因此而爆发的长达十余年的农民战争中,全国五千万人口死亡三分之二,一个曾经是生气勃勃的繁荣的隋王朝顷刻间覆灭在他的暴政下,所以他又是一个在历史上有重大罪恶的人物,他的暴虐也是秦始皇以下罕有人可与他相“匹敌”的。这个曾被“天下称贤”<sup>②</sup>的杨广,终于变成被万世唾骂的炀帝。

隋炀帝应当被否定的是他的暴虐而不是他所做过的一切。失之于暴是他历史活动的主要教训,他的暴政意味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破坏。人民创造的前进的历史造就了他这样一个可以有许多建树的历史人物,历史无可阻遏地要继续前进的潮流又使这个终于成为绊脚石的暴君陷于灭顶之灾。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② 《隋书》卷3《炀帝纪上》。

隋炀帝就是这样一个既有重大历史建树,又有重大历史罪恶的两面性人物——一个雄才大略的暴君。不妨以历史的名义,在古运河畔为他竖一块发人深省的鉴碑。

(本文是提交 1983 年 6 月陕西省史学会年会的论文,修改刊于 1984 年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著的文集《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0 月出版)



## 大运河与隋炀帝

公元618年，虚岁刚满五十的隋炀帝，在一次政变中被缢身亡。大唐开国后，高祖李渊，也就是他的姨表兄弟，将他改葬在雷塘。如今这座孤坟坐落在扬州城北邗江县一片长着水稻的田间，毫无皇陵帝冢的万千气象。要不是坟前有一块清代扬州巡抚阮元立的“隋炀帝陵”碑，任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隋炀帝的最后归宿。

数年前唐宋运河考察队一行来到这儿，大家一拥而上，争相抚弄那方粗糙的毛石墓碑。考察队长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第一个兴冲冲地登上坟头，宣称他已把隋炀帝踏在脚下了。不过随后他在考察文集《运河访古》的前言中，还是从运河的角度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地位，并认为隋炀帝的荒冢，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考察队当中我被视为隋炀帝一生事业苦心的知音，面对炀帝陵的凄凉，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人间天堂一水相连

“文革”后期百无聊赖之际，我曾把魏徵的著作《隋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从此对关于隋炀帝的传统评价产生了疑问。我悟到，或许后人根本不能指望出身反隋大纛“瓦岗军”，又一心要大唐皇帝“以隋为鉴”的魏徵，会公允地评价隋炀帝，许多历史恐怕真是

要颠倒过来看的。在这儿我并不想为这位被“桃色烟雾笼罩着的”隋炀帝翻案而翻案,我是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开辟运河的隋炀帝。

迄今为止,全长二千公里的隋代南北大运河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中国人创造的一项“世界之最”。

提到古代世界的著名工程,人们通常会历数七大奇迹:即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希腊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神像、爱琴海滨的阿泰密斯女神庙、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像和亚历山大港灯塔。此外人们还会提到中国的万里长城、秦兵马俑。依我之见,肇始于春秋,完成於隋炀帝时代,现今一部分河段还在造福人民的大运河,更有资格称得上是古代世界举世无双的伟大工程。

国外列的七大奇迹,六项是神像和帝王陵墓花园,只有亚历山大港的灯塔曾为航船指路。即使与长城相比,我们不免有这样一种感受:长城宏伟则宏伟矣,但只能算是一种单纯的防御性的军事设施,而大运河的形象就活泼开放多了。澄彻的清波,像一道彩虹沟通了中国的南北,又荷载着古老的黄土文明,奔向蔚蓝色的世界。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古代社会,运河代表着一股新鲜的生命力。对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格局而言,运河促进商业和经济的活跃,带来的无疑是社会进步的希望。

大运河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进步,实实在在地起过无可估量的作用,其价值更是在长城之上。历数古代中国的无数发明创造,这恐怕是最伟大的一项了。

我之所以潜心投入大运河与隋炀帝的研究工作,其实是肇始于一次偶然的旅游。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傍晚,我在苏州玩得疲乏不堪又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于是赶往码头,花了二元伍角钱买了张开往杭州的船票上船。晚餐时,我已饱览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水乡景色,尔后在淙淙作响的水激声催眠下,安然睡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客轮已驶入

杭州市区。不一会儿,我又精神饱满地漫步在西子湖畔。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将人间天堂一水相连的运河,不就是隋炀帝当年开的江南河吗?在他死后一千三百多年,还能让我享受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真是皇恩浩荡!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大运河和隋炀帝的好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二十年来,那条河,那个人,时时让我萦怀。于是在数年后蜜月旅行时,我又情不自禁地邀我新婚妻子一起旧地重游。一九八四年夏,我因为参与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使我有机会更严肃、完整地窥探隋唐运河的面貌。

## 千年运河梦

纵观中国的地形,总体上是西高东低倾斜的形势。因此,主要的大江大河,如长江、黄河、淮河等,多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偶尔有由东向西流的,如西入青海的倒淌河,便被视为反常了。

这一地理形势,造成南来北往交通困难,不像东西之间,有天然河道通航之便利。如今,有津浦、京广和宝成、成昆等几条南北铁路,担当着交通运输大动脉的重任。可是在没有火车,特别是在海运发展之前的古代,开凿一条南北运河,便成为国土规划和开发历史上的大事。

中国人想这件事,总有二千几百年了。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就曾规划过长江、黄河之间的三条通道。由西而东,分别通过梁州、荊州、徐州的三条道路,因为没有水道直通,只得水陆兼程。

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为沟通往岭南的交通,支持对南越用兵,修了灵渠。这是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的一道分水岭上开的运河,连接北去的湘江和南下的漓江。因为两江上游相邻之处,水面的高程有数十公尺之差,所以又专门开了一条六十里的长渠绕了一个大弯来缓和落差,辅以斗门,以便通航。后来灵渠曾支持过东汉



马援的南征和唐宋漕运,可以视为南北向的一条水道,但终因处于西南一隅,运力有限,效益有限,对中原腹地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不大。

除了灵渠之外,秦始皇还曾着意发展江南水运。现在苏常运河沿线,父老时能指点,某处某港有秦时所修运河的遗迹。

秦始皇之前,春秋时代吴王夫差开的邗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之一。为了北上中原争霸,夫差从长江北岸的邗城(即今扬州)往北开凿,经射阳湖,到今淮安北边的末口入淮,沟通了长江淮河。四年后为赴黄池之会,他又开荷水运河,沟通了泗水和济水。这样由淮入泗,转荷水入济,经今封丘南济水边的黄池,便可以接通黄河。不料就在这时,越王勾践攻入吴都,抄了夫差后路。吴国败亡后,越王循故道北上争霸。但小肚鸡肠的勾践在杀了文种,逼走范蠡之后,不能再有什么作为。夫差揭开的修南北运河的序幕,令人惋惜地又落幕了。

夫差之后,历代都曾修治运河,最重要的是东汉陈敏取直邗沟,曹操在黄河北开白沟。另外西晋初杜预曾建议王浚的舟师,平吴后自江入淮,自淮入泗,再由汴渠入黄河,溯河回洛阳。

所以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设想,当时人可以从今北京以东的潞水启航,经曹操所开的泉州渠和平虏渠到滹沱河、漳水,再经曹操所开的利漕渠和白沟到黄河,入汴渠上游,沿鸿沟而下,由颍水入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沔水,经春秋时楚国所开的渠道入泚水、汉水,再经杜预所开扬口渠道到江陵入长江。再入洞庭湖,溯湘水,过灵渠,沿漓江、西江来到番禺。在统一的西晋时代,南北运河的建设,出现光明前景。可惜,终因随之而来的南北分裂,各处运河旋开旋湮,不能形成一条真正的南北大运河。也没有材料能证明,上述从北京到广州的水路,有人真正走通过。

隋代统一中国后,凿通南北运河的呼声又日渐提高。但不知什么原因,隋文帝在平陈前,在关中修广通渠,在淮南开山阳渎后,

便住手了。

运河千呼万唤新一代开拓者，终于有隋朝的第二代皇帝杨广应声而出。

这位背着弑父屠兄恶名的隋炀帝，公元604年登上皇位，安葬父亲后才一个月，便离开了充溢血腥味的京城去到洛阳，下诏营建东京。翌年三月动工，短短十个月，一座宫苑齐备、崭新的洛阳城，矗立在龙门正北的黄河之滨，洛水之阳。

就是在洛阳城动工的那个月，随炀帝又下令开凿运河，沟通黄淮的通济渠和连接江淮的邗沟同时开工。这两段运河工程的进展速度，比建洛阳城还快。三月动工，八月隋炀帝就乘着龙舟，出洛口，下扬州，“巡历淮海，观省风俗”去了。总共一百七十六天，这两段运河一齐竣工。

隋炀帝在扬州过完春节，于公元606年四月返航。回到伊阙龙门时弃舟登岸，换上绣着日月星辰的冕服，摆法驾，在千乘万骑簇拥下，来了一个入城式，满面春风地开进新都——东京洛阳。

洛阳与运河是他国土统一规划的两个方面。随后，他又将运河向北拓展到涿郡（今北京），向南延续到余杭（今杭州），这完整的格局更清晰地体现了他以洛阳为中心建设大运河的发展战略，是为顺应并且促进全国经济政治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政治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其实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 生态恶化国势东移

关中自古以形势完固、易守难攻著称。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代即以关中的咸阳（长安）为首都。此后又被十几个王朝选为帝京。住在里面，政治可以多一层安定感。更兼渭水两岸八百里秦川和灌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和白渠，秦汉时代的关中，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当时号称，天下十分财赋，六分在关中。

可是星换斗移,曾几何时,形势变化了。关东广大平原地区更加发展,关中相对衰落了。

生态的恶化是个大问题。建都八百年,随地泼洒的脏水渗漏不已,终于使“水皆咸卤”,再也打不出甜水井了。地下水的污染毁了汉长安城,隋初时不得不在旧城东南的龙首原下,为京城另觅新址。这时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减少了十之七八,原因是松软的黄土上,长流不息的渠水不断下切,在缺乏提水设施的时代,许多高地浇不上水了,虽然在渠首一再将引水口移前抬高,仍无补大局。森林的破坏也很严重,到唐玄宗时,长安附近已找不到五六十尺以上的大树。唐德宗时,偶然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发现一谷林木,有几千条皆长七八丈,这事成为一大新闻,振奋了朝廷。随着森林的过度采伐,长安这块风水宝地日呈颓势。

在这里要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几十万军队,真是不堪负荷,国都长安要维持昔日的地位,越来越困难了。公元594年关中大旱,闹了饥荒,隋文帝亲自“率民就食于洛阳”,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回避扶老携幼逃荒的人群,生怕惹恼了这些以豆屑杂糠填肚的饥民在路上生事。皇帝自叹成了“就食天子”。后来即使唐明皇,都不免要去洛阳就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关中不熟,所以为人行幸”。千年古都长安的历史地位被取代,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 一个新都、一条运河开创国土新貌

隋炀帝极有眼光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选中洛阳建新都。那里也是“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有虎牢邙山可以守险的形胜之地。公元604年他到洛阳后的第二天,便调发丁男数十万,在洛阳外围掘堑数百里,强化拱卫。

洛阳被选作新都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处中原腹地,南北东西交通方便,用隋炀帝自己的话来说,洛阳有“水陆通,贡赋等”的好处,

不像八百里外的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河南、河北又是当时国内人口最稠密、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东南江浙一带的经济也蒸蒸日上，朝廷越来越依赖这些地区提供的钱粮布帛维持。然而这里往关中的漕运，却嫌路途遥远，更有黄河三门峡——人门、神门、鬼门的险阻，岁岁月月船覆人亡，不胜其苦。

移都洛阳远胜守阙长安，在隋唐之际，不仅是隋炀帝一人的见解，唐太宗也完全因袭着他的看法。公元630年唐太宗再度命修洛阳宫时，曾作如此解释：“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其后，女皇帝武则天也明智地长期驻蹕洛阳。公元704年，一位叫杨齐哲的官员，把这道理说得清清楚楚：“神都（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相比而言，“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陛下居之，是国有横费，人疲重徭。”这些说法，与上述隋炀帝的诏令，如出一辙，可以说是代表了那时代许多人的一种共识。

回顾更早的历史，东周继西周，东汉继西汉，长安不行了，就挪往洛阳。到隋唐时，洛阳与长安并为两京，且无可如何地出现取代之势。隋炀帝很早就看清楚了这个趋势，断然采取了行动，用一个新都，一条运河，为国家发展规划了一幅新的蓝图。我们把他营建洛阳和以洛阳为中心建设运河两件事联系起来，就不由得要赞赏他敢把山河重新安排的进取精神，和在国土开发史上的实际贡献。

### 运河工程得以成功关键是选线

大运河由北而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有了这么一条南北交通干线贯穿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为我国整个东部地区的国土开发，奠定了一个新格局。细算起来，605年开通济渠和邗沟用了半年，608年开永济渠和610年开江南河，按各用一年计，前后六年间，实际施工时间不过两年半，

就完成了这项里程碑式的大工程,大运河施工的速度令人叹服。苏州市航政处的一位官员不无感慨地说:“苏州市运河,从枫桥起到宝带桥,长仅 14.4 公里,我们用了多少年还没治理好,真不知道隋炀帝是怎么一下子把大运河修成的!”

运河工程得以成功,首先在于设计的巧妙、合理,关键是选线。

偌大一片国土,从哪里来开挖一条贯通南北的水道呢?上文提到过,西晋初可能沟通的那条水道,曲曲折折,航道迂回,即使能够行船,也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汉唐两代都开过秦岭两侧的褒斜道。褒水入汉水,斜水入渭河,两头可通长江黄河,因此连接褒斜二水,便可沟通江河,只是秦岭山高水急,巨石嶙峋,无法行船,工程失败。

很早人们就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部平原地区,想在这里凿通南北运河,而后通过黄河、渭水连接洛阳、长安。

隋炀帝时,人们汲取以往比较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东部平原上修运河。近年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酝酿的南水北调工程,经水利专家多年反覆勘测比较,提出可供选择的西线、中线、东线三个方案,分别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这下游的东线便是运河线,在三者中被认定是最捷便易行的一条,已经开始实施。一千三百年前后的人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了隋炀帝关于运河线路抉择的科学。

更细算一下设计的时间。运河是 605 年三月里开工的,即使从隋炀帝到洛阳的那一天,604 年的十一月算起,满打满算,从决定开河到实际动工,只有五个月时间。这勘测、设计工作的神速,更加令人叹绝。

缀连江河,要做得成功,做得巧妙,并不容易。一大难题是要解决水道交接处的水量控制和过船设施。

就像前面说过的,灵渠用了一系列分水、引水设施,才完成了湘江、漓江的缀连。大运河穿行在万水千壑之间,无论借水行舟,

还是截江横渡,时时都会面临灵渠那样的水头有高差的麻烦。弄得不好,或者不上水,成干沟一道;或者江河灌溢,引来水灾汪洋。以上种种,在大运河完成后并没有构成问题。在在都显示了设计者的聪明睿智。

## 亡隋此河?

隋炀帝把大运河开成了,可是历史上却流传着“亡隋此河”的说法,把隋代的灭亡和八年前开成的运河联系起来。在众多的责难中,除了编造出一个吃人生番麻叔谋来渲染挖河之苦外,非议者主要抨击两点,说隋炀帝开运河是为游扬州和打辽东。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件事。

605年、610年、616年,隋炀帝三次下扬州,船队之奢华,的确无以复加。

比如605年八月,隋炀帝第一次下扬州时,随行的文武官员,按品位分别给楼船和黄篾,还有护驾的兵船两千五百艘,总共五千多艘船,头尾相接,迤迤二百余里。隋炀帝本人乘坐的龙舟,长二百尺,高四十五尺,合今长五十九公尺,高约十三公尺。上下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一百多间房都以金玉装饰,下层是内侍太监的住处。整个船队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中为皇帝、后妃和贵族挽船的九千余人,都穿锦袍,称为“殿脚”。

还有二十余万骑兵在两岸翊卫前进,旌旗蔽日。沿途供应,由所到州县负责,献食丰美者加官晋爵,缺乏者有被责罚致死的。造船之外,营造车舆卤簿和百官仪服又役工十万余人,耗去金银钱数亿。为造舆服羽仪,课责天下,百姓求捕,网罟遍野,羽毛可用的水陆禽兽都差不多被捉光。总之是极度破费扰民,殃及禽兽。

应当怎样理解隋炀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下扬州的行动?这做法诚然不可取,但二十多年前扬州瘦西湖的一位花匠就曾对

我说,隋炀帝来扬州,不是开琼花的时候,对隋炀帝去扬州是为看琼花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应该说隋炀帝大摆排场,率领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去扬州,是他迷信这种帝国天子的威风对南方土豪酋帅的镇慑作用,正如西北师范大学的金宝祥教授指出的,这“何尝不是一次声势赫赫耀兵江南的军事示威”。

隋炀帝二十岁为晋王时,曾任五十一万八千平陈军的主帅,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翌年又与杨素配合,平定了南方的士族叛乱。而后在扬州任十年总管,在那里度过了他年轻时最美好的年华。他做梦也是江南好,对这片多年经营的美丽国土,他充满感情。当了皇帝,不免会作衣锦还乡式的重游。但他的主要着眼点,放在扬州所特有的重要经济政治地位上。他一去再去,就是要明白无误地传出一个他对东南地区深切关注的信息,对这个分裂二百多年后统一未久,又曾经叛乱过的地方,无疑具有监视和稳定的作用。

他继位后首先修好洛阳到扬州的运河,第二次下扬州时,又敕开八百里江南河,使扬州成为国内水陆交通枢纽,对扬州及整个东南经济日后的繁荣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忽略隋炀帝下江南的重大经济政治目的,只把他贬抑为去看琼花的个人游玩,这是庸俗的历史观。

公元616年他最后一次下扬州,则是想逃避造反农民的惩罚,幻想那里能有一块可了却残生的安乐地,这不同于前两次的行动,是当别论的。

## 征 辽 论

再说征辽。不错,隋炀帝开运河,特别是把永济渠修到涿郡,至少部分目的是为征辽军运粮秣。611年春,隋炀帝从江都启航,舟行五十六天直达涿郡,在途中下讨高丽诏,到涿郡后部署了大规模的征发和往前方调运黎阳、洛口诸仓的粮食,完成征辽的准备工

作。

从612年起,隋炀帝连续三年三次亲征辽东。第一次征辽,出动二十四个军,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后勤运输的人员还要加倍。从涿郡出发时,四十天才全部上路,旌旗九百六十里,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可是第一次征辽失败而归,人马损失惨重。第二次征辽,因杨玄感反于黎阳,匆匆撤回。第三次征辽,高丽王乞降,总算挽回一点面子,便退兵了。但在此时揭竿而起的农民战争已经烽火遍地,不几年就造成了亡隋之势。

以当时的后勤,没有办法支持大军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对城池坚固的高丽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运河只修到涿郡,距辽东前线还有千里之遥,不靠海运而靠陆运,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推米三石,合今不到三百市斤,供车夫自己往返途中食用外便所剩无几了。粮食的匮乏,使远征军只能求速决战,仗很不好打。

然而打辽东不是隋炀帝一时的心血来潮。从他父亲隋文帝算起,到唐太宗、唐高宗,七十年间四代皇帝总共不下十次用兵。在他们眼里,汉代时,辽东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已是版图。隋唐完成南北统一后,自然会有收回这片旧土的想法。金宝祥教授更指出,当时北方草原军事部落组织,正形成了一个积极觊觎中原的“北方弧形”,高丽是其中的一个力量。隋炀帝是为解除这个北方弧形的威慑而战的。

当时高丽占着辽河以东地跨鸭绿江两岸的地方,曾联络突厥和南朝,对抗中原政权,并曾派兵侵扰到辽河以西。后来终于由于隋唐以来长期争战,促成高丽瓦解,一部分归中国,一部分归朝鲜,最后形成以鸭绿江为界的新格局。这是一段民族国家和边界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是评论隋唐之际多次战争应该考虑的。即使隋炀帝的仗没打好,也不能对将辽东(即今东三省很大一部分地域)最终纳入中华版图的历史性努力,都一概加以否定,并以此否定开运河。



## 历史反思

那么开河的工程是否因役使民力过度而激起民变以至亡隋呢？开永济渠时，确曾因丁男不足而“始役妇人”，说明劳动力一时相对的紧张。但这么一项“开万世之利”的伟大工程，动员一些女同胞参加似乎没什么不好，即使到唐代，也还常有妇女修路的劳役。况且开河那些年，正值隋代极盛时期，国库里攒下的钱粮，足够国家几十年支用不尽，富庶程度，甚至为盛唐所不及。这么大一宗财力、物力在手，投入对国土开发影响深远的运河工程，是再好不过的用场了。《大业杂记》也说：“时天下丰乐，虽此差科，未足为苦。”隋末农民战争是在611年因动员征辽开始的，修运河些年里，天下太平，农民没有造反。隋代人民默默地承担了开通大运河的历史责任，他们具有非常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

我们并不反对文学家从各个角度来评说隋炀帝的龙舟游，这很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感，让人们更有兴趣去回味反思历史。最后我想介绍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张勇同学的想法作为结语，他在听我的课后做的作业《隋炀帝与大运河》中说：

“尽管运河为后代开万世之利，但由于其开发者是历代被骂为残暴荒淫的隋炀帝，大运河也由此背上了‘亡隋’的黑锅，晚唐诗人皮日休在他的《汴河怀古》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人的这种观点是比较公正的，但似乎也有失偏颇。纵使有‘水殿龙舟事’，炀帝之功绩也还是极其卓著的。”

（原载台湾《大地》地理杂志，1992年2月号）

## 唐高祖与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年)之玄武门事变,乃初唐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学者们研究甚多。这一段历史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那样,曾“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sup>①</sup>,所留疑点颇多,尤其是唐高祖与玄武门事变的关系,旧史上更讳莫如深。今试侧重从李渊、李世民父子之争的角度,将诸文未多涉及的几点,作一补叙。

### 从后来太子承乾被废一事谈起

研究玄武门事变,不妨先倒过来,回顾一件后来的事情,也许有助于我们看清事变的真谛。

唐太宗长孙皇后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第四子李泰、第九子李治。承乾以嫡长子身份在武德九年八岁时就被立为太子,而魏王泰多艺能,得太宗宠爱,渐生夺嫡之志。贞观十七年(643年),这兄弟俩矛盾爆发,承乾在汉王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等支持下,谋以兵反,事败被废。唐太宗伤感万分,对长孙无忌等近臣说:“我三子一弟(指齐王祐,太子承乾、魏王泰和汉王元昌。齐王祐同年早些时候反于齐州,被处死),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说完“自投于

---

<sup>①</sup>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床”，又“抽佩刀欲自刺”<sup>①</sup>。这位临机果断铮铮铁骨的盖世英雄，为何伤心过度失去常态？显然是眼前的事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惶恐。往事历历，当年在玄武门他与兄弟们的厮杀，他孩提时代杨广夺宗成功后其父隋文帝杨坚和长兄废太子杨勇一齐被害死，那两幕活剧又在重演。继隋文帝和唐高祖之后，下一场厄运正在轮到自己头上，展现在面前的是又一场骨肉残杀的刀光剑影，是自己身败名裂的惨淡前景。除了这还有什么能挫伤这位英姿勃勃的明君圣王面对人生的勇气呢？

由此可以想到，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纵使他曾硬撑着面皮让史官“改削浮词，直书其事”，<sup>②</sup>但从他不顾侍臣反对，执意要看国史，而且在自己生前就破例地审定实录来看，他内心并不坦然。那么他的难言之隐何在？玄武门事变的真象如何？那便是他既要夺宗抢班篡位，又要保全仁孝的名节，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而最使他伤心难堪，置他于危难之中不得自拔的，正是李渊，那个不能反又不能不反的皇帝老子。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虽然可以在正史上掩盖起来，但是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

### 李渊、李世民父子间和谐关系的恶化

李渊、李世民间的关系本来是很好的。在晋阳密谋反隋起兵的时候，建成和元吉都在河东护家，李渊身边只有世民一个儿子，散财接客，阴养士马，自始至终参与了李渊主持的起兵密谋，是最

① 《资治通鉴》卷197 贞观十七年四月。

② 《贞观政要》卷7《文史》。

积极最活跃的助手,所以有“义师云举,首赞奇谋”<sup>①</sup>的美誉。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史官进而编撰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sup>②</sup>之类的话,用李渊在决定起兵时对李世民说话的口气,把起兵的第一号谋主身份推归李世民。

而后,李世民领兵作战,徇西河,攻翟邑,克长安。唐开国后,又平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在李唐王朝的开创时期,论战功,李世民居第一是没有疑问的。李渊也没有亏待他,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武德四年,他已拥有“太尉、尚书令、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sup>③</sup>一大串头衔。洛阳平,一举解决了李唐政权的最大对手窦建德和王世充,“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sup>④</sup>,十足是皇帝和皇太子以下第一人。

也正是在这天下大定,秦王李世民得到极崇权位时,他与兄弟建成、元吉及父亲李渊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经历了由和谐共事、逐渐恶化、最后决裂的转折。其原因要从双方面找。

从李世民这一方来说,他利用多年统兵征战的机会,从各处网罗人才,组织起自己的势力集团。武德四年以后,逐渐在他的秦王府(包括文学馆)、天策上将府和陕东道大行台名下,聚集了大批名士骁将。他们的名字是:

权弘寿、窦纶、萧景、于志宁、杜如晦、李玄道、薛收、房玄龄、虞世南、唐皎、颜思鲁、杜正伦、姚思廉、褚亮、李桐客、戴胄、阎立德、蔡允恭、杨琮、苏勋、褚遂良、薛万均、段志玄、齐善行、尉迟敬德、秦

① 武德元年十二月《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唐大诏令集》卷35。

② 《资治通鉴》卷183义宁元年四月。

③ 武德四年九月《秦王天策上将制》,《唐大诏令集》卷35。

④ 《新唐书》卷2《太宗纪》。

叔宝、田留安、程知节、公孙武达、丘行恭、宇文士及、张亮、苏士长、陆德明、孔颖达、李守素、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刘孝孙、屈突通、刘文静、冯少师、殷峤、韩仲良、卢赤松、皇甫无逸、温大雅、唐俭、封伦、杜淹<sup>①</sup>。

仅从这五十二个人的名单就可看出，李世民已羽翼丰满了。在权力便是一切的封建观念诱惑下，他无法遏制觊觎太子和皇帝之位的权势欲。早在武德初，房玄龄劝说他奏留杜如晦为秦王府属时，李世民就表露出不甘“守藩端拱”，而要“经营四方”的野心<sup>②</sup>。包围在他身边的那一大批乱世英雄，更是跃跃欲试，怂恿他进取不已。他们利用陕东道大行台的合法机构，积极经营洛阳，便是悉心安排应变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张亮奉李世民之命，在洛阳“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的行动，被元吉告为“欲图不轨”，并非诬词。不过有合法形式掩护，张亮受审时守口如瓶，“卒无所言”，秘密计划才没有败露<sup>③</sup>。另外李世民私自蓄养八百勇士，可以随时调入秦王府，就是准备在京师动手时用的。

李世民和李渊在政见上除《资治通鉴》记在武德七年与突厥有关的徙都之争外，并不见有何重大分歧。后来贞观年间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大体上都是沿袭武德时期的。所以崔瑞德先生所说：“太宗时代没有制定过一项新制度，政府政策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sup>④</sup>，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和从家世与出身来分析双方人员的组成情况几无差别的结果都能说明，把李世民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区分为新旧势力代表人物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建成、元吉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

① 布目潮泓《隋唐史研究》第二章第六节《武德时代世民属下的官僚群》。

② 《旧唐书》卷66《杜如晦传》。

③ 《旧唐书》卷69《张亮传》。

④ 《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

阻”<sup>①</sup>。政变成功当天,就对这些人宣布大赦,贞观年间,他们多数继续得到任用,有些人得官甚至在秦府旧人之前<sup>②</sup>。特别是王珪、魏徵这些人,先既曾为建成心腹,后又作了太宗股肱,正说明两方之间判若鸿沟的阶层区别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权力之争结成对立的两个派系。李世民实力的膨胀和野心的表露,使李渊和建成、元吉产生共同的戒惧之心而站到一起了。因此引起矛盾的最初责任,是在李世民方面。

李世民既存异志,被唐高祖猜嫌,在言行上必有失检点和不安分之处。至于他怎样违忤父亲,最后为何见弃于李渊,旧史百般为李世民遮掩,使我们今天难明其详情。不过也并非全无披露。

比如武德四年洛阳初平,为淮安王李神通与张婕妤父争赐田一事,秦王李世民因出教与高祖手敕不合,横遭怒责:“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sup>③</sup>。本来在唐军进围洛阳时,唐高祖曾让宇文士及传令,授权李世民:“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赐将士。”<sup>④</sup> 李世民将土地赐给部将是按令办事,却被怪罪,原因是事关后宫利益,李渊出尔反尔,以致政出多门,引起争执。盖因诸如此类事情,在妃嫔们不时潜诉下,高祖“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通鉴》并记道:“由是无易太子意”<sup>⑤</sup>。当时高祖是否想到这一层,大有疑问。史籍上多处关于李渊早有立李世民为太子意的记载,除武德七年杨文干兵变时那次外,大都是后来史家为抬高太宗的身价编造出来的。这里“无易太子意”一句,怕只能在高祖从此疏远李世民的意义上理解。

①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② 《贞观政要》卷5《公平》。

③ 《资治通鉴》卷190 武德五年十一月。

④ 《册府元龟》卷63《帝王·发号令》二。

⑤ 《资治通鉴》卷190 武德五年十一月。

唐高祖为人深沉有谋,也是文武全才<sup>①</sup>。他谨慎地抉择晋阳起兵时机,在群雄逐鹿中轻取天下;开国后又确立适用于整个唐前期的基本制度,“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打下了基础”<sup>②</sup>。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此人绝非昏庸等闲之辈。但耽于酒色,贪图享乐,却是难移的本性。早年留守太原,以晋阳宫人私侍罹死罪,王夫之说他“尝试生死以殉其嗜欲”<sup>③</sup>。如果说那也算是韬晦自安之计,那么在建立唐朝当皇帝后,他就真是放荡无羁了。初平京城,他便夺太子舍人辛处俭妇,成为魏徵讥刺他的话柄<sup>④</sup>。“帝晚多内宠”,十七个妃嫔加上元配夫人窦氏生有四十一个儿女,窦后早死,开国后没再立皇后,“张婕妤、尹德妃最幸”。这两人和秦王府有宿怨,与建成、元吉关系密切非常。玄武门事变前一天,将李世民在宫中密奏的消息驰语建成的就是张婕妤。也正是因为妃嫔们耳鬓厮磨对高祖有不可小看的影响,李世民和建成、元吉一样,争以金宝贿赂诸妃<sup>⑤</sup>,且依仗其妻长孙氏在后宫周旋。只因建成身为储君,是皇位的既定继承人,地位无比优越,纵使李世民手中的战利品财宝再多,在后宫支持建成的力量还是占着优势。

外廷的情况和后宫有类似之处。宰相中裴寂最得唐高祖宠

① 《册府元龟》卷57《帝三·明察》：“唐高祖初，军国多务，奏请填委，临朝处分，剖决如流，每发其奸伏，皆出人之意表”。同书44《帝王部·神武》记隋末李渊在“太平关遇贼数千人……率精骑一十人出击之，所向皆靡……后至龙门县，有贼毋端儿，众数千人，奄至城下……高祖亲率十余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弦而倒，贼大溃……时高祖射七十发，明日于户上尽得所射箭。”《新唐书·窦皇后传》亦记高祖善射，请婚时比箭术，发二矢射孔雀目，皆中，窦氏遂归于帝。

② 《剑桥中国史》第三卷《高祖时期·玄武门事变和权力转移》。

③ 《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十一。

④ 《贞观政要》卷2《纳谏》。

⑤ 《新唐书》卷79《隐太子建成传》：建成谓元吉曰：“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十一月条所谓“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殆非事实。

信,是支持建成的。封伦在世民、建成间是个两面派,实际倾向建成。杨文干反乱事发后,唐高祖曾考虑太子的废立问题,因封伦等为太子游说遂止。此事在太宗继位后很久才查明,时封伦已死多年,犹给“降赠改谥”的处分。杨恭仁虽有从侄女为元吉妃,但为人持重,似未介入。萧瑀和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力量不及裴寂他们。

以上说明了矛盾的起因和双方背景,那么在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的冲突逐渐展开的情况下,李渊持什么态度呢?

武德五年,刘黑闥在河北败而复起,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说建成自击黑闥,取功名以安太子位。这件事反映秦王的声名已构成对太子的威胁,建成不得不和官僚考虑对策。由此可知,至晚在武德五年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已见端倪。

史称元吉“凶戾”而建成“仁厚”,元吉早想在一次世民去他家时伏兵刺杀世民,当时建成还不肯下手<sup>①</sup>。这条材料,在《新唐书·元吉传》、《册府元龟》和《通鉴》上都不记日期,或疑是玄武门事变后罗织元吉罪状时捏造的事件,吕思勉先生谓“亦莫须有之辞也”<sup>②</sup>。这且不论。在建成和世民矛盾初起时,建成确实并不一定要采取使世民死于非命的极端手段。李建成有嫡长子身份,李渊被封唐王后五天就立建成为世子,称帝后半个月又立他为皇太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嗣君的位置。办这两件事,李渊也不像有过什么犹豫。李世民一开始就对他长兄的地位提出挑战,是不大可能的。建成本人,在晋阳起兵后领左军,攻霍邑受挫时和世民一起说李渊有进无退,接着在潼关永丰仓一线独当一面。开国后协助高祖处理政务,进而还担任一些出征备边的军职。虽然功勋不及世民,或者才识也略逊一筹,毕竟没有什么大的过

① 《新唐书》卷79《巢刺王元吉传》、《册府元龟》卷298《宗室·不悌》。

② 《隋唐五代史》第二章第一节《高祖太宗之治》。



失,李渊自不能轻言废他。特别是建成有后宫和外廷权臣极力回护,地位实相当牢固。只是李世民执意要取而代之,对建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建成才联合元吉对付世民。大约自武德七年起,两人在诛除世民这一点上合谋一致了。从那以后,反对李世民的阴谋似紧锣密鼓,频繁地策划着和实施着。

李建成与秦王府的人马抗争,在军事上作了准备。私自扩充东宫武装,擅募四方骁勇及长安恶少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侯率可达志募幽州突厥骑兵三百补东宫长上,为人所告。唐高祖仅“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嵩州”<sup>①</sup>。尽管有说建成的用意是“将攻西宫”<sup>②</sup>,也未见追究。长林兵经告发后大概取消了,但从后来玄武门事变时,东宫、齐王府出动兵数达三千来看,李建成还有私养的精兵是无疑的。在京师眼皮底下藏这么大一支人马,高祖不会毫无察觉,恐怕他对建成的这种事,后来是睁一眼闭一眼不再过问了。

武德七年六月,唐高祖到仁智宫(在今铜川市北与宜君县交界处)避暑,世民和元吉随行。建成受命居守长安,趁机策动东宫旧臣杨文干在庆州(今庆阳)、宁州(今宁县)一带兵变。与他“表里相应”,元吉在仁智宫“就图世民”。高祖得到报告大怒,将建成召到仁智宫监禁起来,一面派李世民等出讨杨文干。从宁州到仁智宫仅隔一子午岭,两天的路程,事变搞得李渊夜不敢寐,他怕猝不及防,带着宿卫出山夜行数十里,天明才回宫。杨文干起兵不过十来天便败死,这一场虚惊却非同小可。按正史所记,人证物证俱全,是太子指使,罪不容诛。但如范祖禹所说:“高祖不以公义废之,乃外惑于奸臣之计,内牵于妃嫔之请”<sup>③</sup>，“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

①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六月。

② 《新唐书》卷 79《隐太子建成传》。西宫承乾殿是秦王府所在地。

③ 《唐鉴》二。

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嶲州。<sup>①</sup>真是对建成、世民各打五十大板，将他们的人各处理一两个算完事。而后“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当初李渊派李世民击杨文干时说的“还，立汝为太子”<sup>②</sup>的话，不见下文了。

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奇怪，因此有人怀疑杨文干起兵与太子建成并无相干<sup>③</sup>。确也可能杨文干是单独行事，太子派人授甲和高祖所说“事连太子”云云都是后来史官编造进去的，高祖得到宁州方面密告后，仅因杨文干原是东宫宿卫而召建成到仁智宫鞠问，后查明与他无关便又遣回长安居守。为此事世民和建成互相攻讦，唐高祖将他们的僚属各处理一两个以示戒惩。这样说和刘餗《小说》所云“人妄告东宫”合<sup>④</sup>，且高祖的处理和元吉、妃嫔、封伦敢于为建成说项在情理上亦较易通，但与诸史相悖。究竟能否作此解释，现在只能以疑存疑。惟从封伦死后被改谥“缪”（名与实爽曰缪）来看，兵变时“高祖将行废立……伦固谏而止”<sup>⑤</sup>，应实有其事。这是关于高祖许愿立世民为太子的许多记载中唯一比较可信的一次。当然这样大的事情信口乱说，对建成与世民的矛盾发展无疑是火上浇油。后来唐高祖不能不为自己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承担后果。

武德七年秋，突厥人寇，侵扰关中，高祖自仁智宫还京师，欲徙都以避之。建成、元吉、裴寂都赞成，唯世民苦谏不可，请兵退敌。高祖怒，建成、元吉借题发挥，诬“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

①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六月。

③ 李树桐：《唐史考辨·唐杨文干反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转见自布日潮撰《隋唐史考究》第 281 页。

④ 转引自《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六月条《考异》。

⑤ 《旧唐书》卷 63《封伦传》。

成其篡夺之谋耳！”<sup>①</sup> 这些恶意中伤的话，高祖是听进去了。以后李渊虽还临时用李世民领兵作战，可是“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sup>②</sup>。

有一次出猎，建成故意将一喜蹶的胡马授世民，“欲以此见杀”。但几次马蹶，世民都机警地跳开，安然无恙，说：“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却让妃嫔们到高祖跟前造谣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高祖大怒，痛斥世民求为天子一何急<sup>③</sup>！话说得很重，直接道出他对世民的戒心所在。

还有一次建成召世民夜饮，在酒里下了毒，“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高祖去看了问了，不过是不着边际地说建成：“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他心里并非不明白，所以又对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李世民嘴上推辞，其实他早已派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秦府车骑将军张亮等镇守洛阳，精心经营自己的根据地。这次高祖亲自发话安排他走，建成、元吉怕他到洛阳后，“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所以指使人极力阻挠，说秦王左右喜跃，将一去不返。于是高祖改变主意，不让世民去洛阳了<sup>④</sup>。这就是《剑桥中国史》中所说的，“皇帝为缓和儿子们之间增长着的紧张关系作了一些努力，他试图使建成和世民彼此不直接接触，作了一些软弱无力的不成功的弥合裂缝的尝试。”这样让李世民出居洛阳，与建成分主东西，不是一个高明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那也只是说说罢了，而这差不多是他弥合建成与世民间裂缝所作的全部努力了。虽然高祖或者有使儿子们两全的想法，但他始终没有认真妥善地

①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闰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闰七月。

④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

解决他们的争执,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或无意的疏忽,终于使争执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态急剧演变向暴力的结局”。

武德九年,双方的对立已处于水火不容的紧张状态。建成杀世民心切,日夜诉说,高祖终于听信谗言,将罪世民,就如他后来所说:“几有投杼之惑。”元吉看到这点,才敢“密请杀秦王”。高祖听了并不责怪元吉,只是患于无辞,未即下手<sup>①</sup>。

建成、元吉为了清除杀戮李世民的障碍,使出釜底抽薪之计,用重金收买尉迟敬德、段志玄,进谗言使高祖将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逐放外任,用又拉又打的办法挖秦府的墙角。恰逢突厥郁射设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军北征,欲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秦府骁将连同秦王帐下精兵囊括而去。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僚属们皆忧虑“府朝涂地”<sup>②</sup>。应该注意,逐房、杜“不听复事王”是奉高祖“敕旨”行事,元吉“籍秦府精兵益麾下”,这样调兵不通过皇帝也是办不到的。据《册府元龟》990,这次突厥数万骑围乌城,遣元吉等率兵援之,事在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即六月初一,距玄武门事变仅三天,已经是刀出鞘,弓在弦,“存亡之机,间不容发”的紧张关头,此时此刻高祖下此等诏,解除秦府武装,若不是要置世民于死地,还能作何解释?

建成、元吉有恃无恐,决定在大军钱行时杀死世民,同时全部坑杀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秦府将领。他们预计,事后只须“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sup>③</sup>。“宜无不信”这话颇有意思,就是说,杀了世民,编什么谎话,高祖都不会不信,自然更不会追究。对这一点他

①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

③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旧唐书》卷 64《巢王元吉传》作“谅无不信”,《册府元龟》卷 298《宗室·不悌》作“义无不信”。

俩完全放心。建成、元吉几度加害世民，高祖并非不知，将世民杀了，奏云“暴卒”，高祖若非局内人，岂有肯信之理？他俩敢这样下手而无后顾之忧，足以说明高祖在儿子们的冲突中，一味地袒护建成、元吉而压制李世民，袒护到了不惜枉法的地步，已完全站到建成、元吉一边去了。王夫之论史甚多精辟之处，但说在东宫天策之间这场生死搏斗中，“高祖若木偶之尸位于上”<sup>①</sup>，则是很不切实际的。

### 突厥问题上的芥蒂

事变临发前突厥兵入塞围乌城（在今陕北定边或横山一带），李渊不用李世民而用李元吉领兵抵御，并尽夺秦府兵马交齐王，使李世民及其整个秦王府面临灭顶之灾，这一非同寻常的决策的原因，令人颇费思量。而且正值玄武门事变爆发前夕，突厥进兵南下，直打到长安北渭水边，这是一场偶然的巧合吗？突厥十余万大军倏忽而来，悄然而去，事甚蹊跷，特别是渭水桥边李世民单独和颉利可汗的那阵密谈，谁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轻易说突厥退了兵，更是一个永远不可解的千古之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研究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关系和玄武门事变时，我们不能不把眼光放到突厥问题上。

在如何对待突厥的问题上，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几乎是在政见上他们之间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公开分歧。由此而形成的芥蒂，曾使刘文静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关于刘文静之死，陈寅恪先生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sup>②</sup>一文中有独到的分析，我们试顺着陈先生的思路往下走，摸一摸在

① 《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11。

② 《寒柳堂集》。下引陈先生此文不另注。

突厥问题上李渊、李世民间矛盾发展的脉络线索。

刘文静是晋阳起兵的重要角色，李唐开国的第二号功臣，但仅仅一年之后，未闻他有什么大过，便在武德二年九月下狱，尽管审理此案的“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sup>①</sup>，仍被骤然处决。杀他的真正原因，只有裴寂的一句话透露了一点，“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sup>②</sup>。陈寅恪先生指出，“外有勍敌”指突厥。在晋阳时，与突厥始毕可汗议订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及高祖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乃被杀矣。”间或是因为刘文静知道的内幕太多，有碍当今皇上的面子，李渊不愿留下口舌，授人话柄，匆匆处决了他。虽事发突兀，但是事出有因，除掉一个和突厥关系很深的善于造反的干将，起码是一项预防性的措施。

晋阳起兵时，李渊必须先解决后顾之忧，稳定和突厥的关系，才好南下入关，当时不得已“称臣于突厥”<sup>③</sup>，这诚是李渊的决策，但起初有些犹豫。突厥提出支持李唐的条件是要李渊和隋彻底决裂，从属自己，事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始毕部达官等议：“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李渊，“帝开书叹息久之”，犹豫不从，“官僚等以帝辞色凛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sup>④</sup>这闹事的兴国寺兵就是刘文静部。当时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以备边为名募兵，李渊指定以兴国寺为安营处，而且就以“文静顿于兴国寺”<sup>⑤</sup>。刘文静以兴国寺兵胁迫李渊服从突厥，当时李渊

① 《资治通鉴》卷187 武德二年九月。

② 《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

③ 《旧唐书》卷67《李靖传》。

④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⑤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隐忍了，事成之后李渊不再容他，是有宿怨耿耿于怀。

起兵时还有一场旗帜用色之争，也是刘文静挑头闹的。突厥旗色尚白，隋旗绛赤，刘文静请建白旗。《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由《旧唐书·刘文静传》可知，所谓“军司”，即刘文静。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建白旗，即打出与突厥一样的旗色，表示臣属。李渊还是决定“宜兼以绛，杂半续之”<sup>①</sup>，即使用绛白色旗，表示不纯臣服于突厥。

当时李渊背靠强大的突厥，不得已，也和其他北方群雄一样称臣突厥，同时他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对突厥尽量保持距离。他这思想是一贯的，比如派刘文静出使搬取突厥兵时，便约束道：兵不须多，“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sup>②</sup>后来请来的兵少马多，李渊很高兴。这正表现了李渊的深谋远虑和政治上的成熟。

我们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事件李世民都卷进去了。李世民与刘文静关系极深，晋阳起兵前李世民就去狱中探视刘文静密谈取天下事，两人结为莫逆之交。上述刘文静等所部的兴国寺兵隶属李世民，温大雅书记该部“总取秦王部分”。刘文静所倡“改旗帜以示突厥”之事，也是“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人启”。所以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高祖称臣于突厥，其事实由太宗主持于内，而刘文静执行于外。”这件事上他们采取兵谏要挟的手段，李渊是不满的。他们要完全投靠突厥的主张，遭到李渊的抵制。因为有那么一段历史，刘文静和李世民成为李唐政权中和突厥关系最近最深的两人。在武德二年突厥进犯并州、介州，直捣绛州、龙门，唐军屡败，关中震撼的紧张时刻，李渊杀掉让他不放心的刘文静是为防范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通鉴的有关叙述与此有出入，不确切。

② 《资治通鉴》卷184 义宁元年六月。

措施。而刘文静之死也是给李世民的一个打击和警告。当然这是一桩冤案,唐太宗贞观三年给平了反,后来刘文静又名列凌烟阁功臣<sup>①</sup>,享受第一等的荣誉。

唐高祖一直特别着意防范内部勾结突厥。刘文静之后,武德四年又处死了并州总管李仲文,其主要罪名就是“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下长安”,“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sup>②</sup>李渊时代一直对突厥采取守势,在军事上无力进行决定性的反击,面对这个劲敌,不仅要经常致币通好,保持半臣服的关系,更要严密防范里应外合的不轨行动。

即使对自己的儿子李世民同突厥有深交的关系,李渊也是明里利用,暗中防范,警觉得很。比如武德二年裴寂讨刘武周大败,改派李世民退敌,其原因,“不仅以太宗之善用兵”,李世民出兵后,突厥“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sup>③</sup>,可是就在一年前这场战争开始时,突厥以五百余骑助刘武周犯太原,这时反以兵助李世民打刘武周,“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陈寅恪)这就是李世民对突厥可汗颉利、突利叔侄所说:“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sup>④</sup>或者当时已与突利可汗结下“香火之盟”。由此可知,武德七年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人扰关中时,朝廷一片惊慌,唐高祖和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宰相裴寂等急欲移都山南以避,唯有李世民不大在乎突厥,独自表示反对迁都的原因所在,和他要求领兵去会颉利时李渊怒气冲冲只让他“将三十余骑行划”<sup>⑤</sup>的道理所在。此时,“建成与妃嫔因共谮世

① 《唐会要》卷45《功臣》大中二年。

② 《资治通鉴》卷188武德三年七月、四年二月。

③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④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⑤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上。这次李世民请兵,旧纪曰:“高祖怒”,而通鉴记“上曰:‘善’”,应是通鉴纂误,从旧纪。



民曰：‘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sup>①</sup>也是活里有话。由是“帝寝不悦”<sup>②</sup>，更“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致此疑忌”（陈寅恪），是信而有证的。

陈先生对于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的分析到此为止。我们再往后延伸两年，试探突厥问题上李渊、李世民之间的芥蒂与玄武门事变的关系。

很明显，这是导致李渊疏远李世民，父子关系恶化的根源之一，特别是到高祖晚年天下大定以后矛盾就掩盖不住了。李世民手下秦府人马能征惯战，不但有同突厥作战的实力，又有当年联络突厥共图天下时结下的老关系。李渊对此，须用时则用，该防时则防，后来打突厥再不把全部兵马交李世民一人，或让齐王同行，或让很少外出的太子建成也领一支军队，不无牵制一下李世民的意。到最后突厥不要他打了，兵权也被收掉，这是符合事理发展逻辑的。

齐王元吉领兵作战素无独当一面的能力，只有常败的记录，为何武德九年突厥大举入塞——不久攻到渭水边——时，居然“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军北征”<sup>③</sup>，李渊便立即同意了呢？岂不是将国家安危视作儿戏吗？是不是李渊、李建成他们已看出，把军队交给李世民比突厥打来更加危险呢？突厥兵可以“得赂即退”，李世民再统领大军，不会掉过头来搬倒他们的皇帝、太子宝位吗？

“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这条也获准了，于是“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

①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七年七月。

② 《新唐书》卷 79《隐太子建成传》。

③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

军”，“秦王骁将精兵”尽为齐王所得<sup>①</sup>，要让李世民在兄弟决斗中束手待毙，这明显是李渊本意。

建成与元吉合谋，将拨归元吉带领的秦府骁将尉迟敬德等就地“悉坑之”<sup>②</sup>，为何不敢真的“与之偕行”，驱使他们去与突厥厮杀呢？该不是怕他们临阵生变，留下后患吧。这样便使出了斩尽杀绝的手段。

李渊如此怂恿建成、元吉施展一系列毒计，置自己的次子李世民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对这一切做法的后果，以他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心智，自然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并非“若木偶尸位于上”。事情做得这样绝，除了说明他放心不下李世民和突厥的关系，防范他们之间秘密勾结颠覆自己，认为存在着一种对自己皇位的实实在在的 danger 需要加以解决之外，还能有别的说得通的道理吗？这父子俩之间在突厥问题上的芥蒂是早已存在很久很深的，矛盾终于要在玄武门事变时爆发了。

处在累卵覆巢之危下的秦府众多造反出身的人士，会不会想到秘密联络突厥引为外援的自安之计呢？正巧事变发生时突厥铁骑长驱而入是不是他们悄悄招来的呢？唐祖高所担心的刘文静并没有做过或没有来得及做的那种事情是不是真要发生了呢？这一点没有直接史料可证，唐太宗君臣也不会让留下这样的话柄，我们也不能就那样说。前面所述，诚然亦多是以当时情势推论之说，不过仍只有这样解释，才使那前前后后李渊一切不合情理之措置皆在情理之中，许多被掩盖的事情真相也才能分析明白。吴宗国先生议及突厥似乎始终是李世民同他父亲兄弟争斗时手里的一张牌的看法是发人深省的。这样说来，事变将爆发时突厥骑兵风尘仆仆而来，政变成功后李世民赶到渭水边和颉利可汗悄悄一席话，突

①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

厥便撤兵回去也就很自然了。至于两人单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这当然是要作为永远的秘密封锁起来。因为尽管当时胡汉各族之间在军事上政治上常有互相支持的举动，但如果那只是在历史上是正常的，而道义上有些出格的事，还是掩盖起来不使人知为好。

本节讨论成为李渊、李世民关系中的芥蒂的突厥问题相当微妙，很没把握。仅介绍陈寅恪先生宏论，学为续貂，再“拈出此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

### 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

李世民在部下撺掇下临发难前的犹豫彷徨很可玩味。毋庸说，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自己成功的把握。站在李世民对面的，不仅有他的兄弟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还有和建成、元吉站在一起的他的父亲高祖李渊。李世民的胜利，不仅要消灭建成、元吉的势力，夺取储君的位置，还必不可免地要把老子赶下皇帝宝座，否则胜利就是不彻底、不牢靠的。李渊的介入使斗争变得严重而复杂。如果只是以建成和元吉为对手，尽管建成一方在京城的实力和内外廷的支持方面都占优势，但自己已被置之死地，发难是义无反顾的。就是因为碍于父皇插手其间，一时不知如何措置为好，所以他忽然变得“处事有疑”，“临难不决”。

请看：

太子率更丞王晷密告建成与元吉谋在饯行时杀世民的消息，长孙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他不决；

尉迟敬德说他“非智”、“非勇”，和长孙无忌等啰嗦要散伙逃亡，“窜身草泽”，“相随而去”，他不决；

府僚们向他指出：齐王“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

……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劝他以社稷为重，他“犹未决”。<sup>①</sup>

李世民素称大智大勇，这时举棋不定，足见问题之棘手。他顾虑的是和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

当时社会舆论十分重孝行。李渊葬母“跣行二十余里，足皆流血”。李世民“丁穆皇后忧，毁瘠三年，杖而能起”<sup>②</sup>。贞观三年四月诏中亦说：“百行之本，要道唯孝”<sup>③</sup>。《孝经》在唐代是太子以下的必读课本。自隋代以降，“不孝”为十恶不赦的重大罪名之一，正式列入刑律。唐太宗素重名义，对此不能不介意，生怕落下无父、无君、不孝、不悌的恶名，无以立足，所以伤透脑筋。连日来这事在他心中交结，百思不得其解。长孙无忌那些人的话，都说不到点子上，他自然是决心难下。

秦王府中到底不乏聪明智慧之士。有人看出了他的心事，即举舜的父亲瞽瞍几番要害死舜，一次要把舜封死在井里，一次又要把舜烧死在粮仓里，舜不肯听命，设法逃了出来。儒家经典盛赞他的孝悌之道，历代犹奉他为万世帝王之表。正是说舜仍不失为“孝子”、“圣君”的这些话，才说动了李世民，遂未卜而决，定计政变。<sup>④</sup>这瞽瞍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一语点破机关，为李世民排除了作决断的疑惑。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但是既然还记载了在那危急关头说及瞽瞍和舜

① 《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

② 《册府元龟》卷 27《帝王·孝德》。

③ 《册府元龟》卷 63《帝王·发号令》二。

④ 《册府元龟》卷 298《宗室·不悌》，《旧唐书》卷 64《巢王元吉传》。

的故事,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是直言不讳地研究了对付李渊的问题的。

点破这层关系,得有点胆量,能说出这个话,也要有些学问。这话是谁说的?史书含糊其词为“府僚”、“众曰”,没有名姓。李世民登基后,九月下诏表彰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sup>①</sup>,无疑他们都在玄武门事变中有重大建树。长孙无忌系元舅身份,是关系最密切的心腹,自始至终参与事变的策划和行动。尉迟敬德作为打手,既坚决又得力,替他杀元吉,逼李渊。论功第一,这两人都够格。房、杜二人在秦王已决定行动后,才被秘密召回,功在后来具体部署得当,议论舜与瞽瞍的时候他俩还未入府。看来,这一席话是出自侯君集之口。此人出将入相,有胆有识,也很有点阴谋家的花花肠子,能想出那些话来捅破李渊这层干系,打消李世民的疑虑。旧传说:“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sup>②</sup>,都应有所指。不过后来侯君集又参与太子承乾谋反案被诛,也许因此而在史书记载说瞽瞍这一段故事时,删去了他的名字。至于尉迟敬德墓碑上说:“二凶伏辜……盖赖君之算也”<sup>③</sup>,显然是撰者许敬宗的溢美之词。<sup>④</sup>尉迟敬德自称是“蓬户瓮牖之人”<sup>⑤</sup>,有人说他是铁匠出身<sup>⑥</sup>,生性耿直鲁莽,出谋划策,非其所长,怕没有那么大的心计和学识,能揣摩透李世民的心事,恰到好处地讲出那么一大段典故。不过

① 《唐会要》卷45《功臣》,《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

② 《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册府元龟》卷58《帝王部·守法》。

③ 《全唐文·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

④ 据《唐会要》卷63《史馆杂录上》:“敬宗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宝琳父敬德”,知许敬宗与尉迟敬德有亲戚关系,小两辈。

⑤ 《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

⑥ 《太平广记》卷146引《逸史》:“有煅铁尉迟敬德者”,又自称“打铁人”。

此事已难确证，仅按事理推究，姑备一说而已。

### 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

直接引发李世民和李渊的矛盾，成为发动玄武门事变的导火索的，是一桩通常不大被人们注意的小事。武德九年五、六月，太白星屡见于白天，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sup>①</sup>这一星象，古人的解释是属于凶兆、灾变一类，主兵丧、不臣、更王<sup>②</sup>，并非祥瑞。因此李渊对傅奕报告的理解是：星象呈凶兆，秦王将谋反篡国。六月己未，即事变的前一天，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sup>③</sup>，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但他到底还是沉住了气，灵机一动，反告建成、元吉一状，说他们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sup>④</sup>这样以攻为守，真有回天之力。这些话事关痛痒，离间了李渊和建成、元吉的关系，李渊不能不追究，于是暂停单独质讯李世民，改定在第二天把建成、元吉召来一齐鞫问，当时嘱令李世民明天一早到场。李世民从可能“枉死”的险境中脱身，李渊却不自觉地被推到中间仲裁人的

① 《旧唐书》卷79《傅奕传》，《唐会要》卷43《五星临犯》略同，皆记傅奕奏事在五月，而《资治通鉴》记在六月。按《新唐书》卷33《天文志》三，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昼见，六月又两见，故两说都可成立。傅奕奏事，可以在五月，也可以在六月丁巳（初一）或己未（初三）太白又昼见之时。

② 刘向：《五纪论》。转引自《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条《考异》。

③ 《旧唐书》卷79《傅奕传》。

④ 《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

地位,他和李世民的矛盾,被儿子们之间的纠葛冲淡了。虽然这个局面仅仅维持了一天,但有这点喘息时间,李世民用来发动事变是足够了。

六月初三宫中发生的这件事,使李世民摸到了李渊要对他下毒手的底,父子俩关系的危机表面化了。大难临头,再无回旋迟疑的余地。李世民牢牢地抓住了这最后一天的时机,房玄龄、杜如晦换了道士装束秘密潜回秦府,连夜计事,决定次日清晨采取行动,先发制人。正是借重这两位能谋善断的智囊,李世民才能在瞬息之间化险为夷,稳操胜券于手中。三个主要对手都没有来得及认真招架,就一个个地被解决了。李世民没有遇到久久萦怀的麻烦,顺顺当当地取得了胜利,房玄龄、杜如晦以“运筹帷幄,坐安社稷”,功居第一<sup>①</sup>。

他们在幕后是如何策划的,就连淮安王李神通等宗室至亲在当时也不大清楚。不过,我们从事变的实施情况,可以看到全部计划的中心一环,是既要除掉建成、元吉,又要避免同李渊直接冲突,或者说是又要夺李渊的权,又不能把他像建成、元吉一样杀掉,必须维持一个表面和气的假象。要以李渊自愿让位的形式,给权力转移到李世民手里披一件合法的外衣。这不仅事关李世民的名声,而且将直接决定事变的成败。因为如果真与当今皇上兵刃相见较量起来,李世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处于绝对劣势不说,四方“勤王”的兵马一到,军事上能否成功就大成问题,说不定秦府人马也会分崩离析。李世民一直迟迟不敢行动,担心的就是弄出这样无法收拾的局面。但他到底成功了。他能取胜的确有很大的偶然性,也不能不看到胜利来自智囊们的策划和将士们果敢的行动。

---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192 武德九年九月。

## 事变的三部曲

六月初四清晨早朝前，李世民在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常何等人配合下设伏<sup>①</sup>。建成虽得张婕妤密报，已知李世民告状的内情，仍仗高祖是他们的后台，对鞫问一事竟不介意，和齐王元吉大模大样进宫。到临湖殿发觉有变，拨马东归，为时已晚，转眼间双双死于世民和敬德箭下。东宫兵和齐王府兵虽在数量上对秦府占三千对数百的优势，但猝然失去头领，攻势不力，开始溃散。

尉迟敬德转身进宫，“擐甲持矛，直至上所”。李渊对事变已有所闻，逃避在海池船上，见状大惊，无奈木已成舟，只得束手就范。尉迟敬德以“宿卫”为名，把他监视起来。李渊在武装挟持下，又自知有负于世民，所以未敢对政变行动指责半句，并不得不从萧瑀、陈叔达所奏，“处以元良，委之国事”，还降敕平息了东宫、齐府的战事。史籍记李渊当时有两句话：一句是“善，此吾之夙心也”，这是回答萧瑀、陈叔达的，是言不由衷的；另一句“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感”。是事平后见到李世民时讲的，倒是半句老实话，因为不是“几有”，差一点，而是早就听信了那些没日没夜灌进耳朵里的关于李世民的坏话。李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则是故作姿态<sup>②</sup>。李渊“体有三乳”<sup>③</sup>，跪吮抚玩大概是李世民小时候的习惯，此时此刻当众重复这个举动，表现父子间的亲昵和好。李世民在手杀兄长、逼退父皇的胜利时刻，也没忘记保全仁孝的名声，这位

① 《旧唐书》卷187上《敬君弘传》。敬君弘为云麾将军，掌宿卫兵，屯玄武门，为建成将冯立、元吉将谢叔方攻杀。《常何墓碑》：“于北门领健儿长上……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敦煌残写本，伯希和2640号。

② 《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

③ 《新唐书》卷1《高祖纪》。



政治家的心机真是够可以的。

事情并不因为杀掉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就算完。李世民要把一切权力夺取到手的既定目标是毫不含糊的。政变当天,以高祖名义下诏:“军国事皆受秦王处分。”<sup>①</sup>三天后,七日癸亥,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sup>②</sup>,当天又下一诏:“自今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sup>③</sup>就在一个月里,李渊就知趣地提出自己退位当太上皇的问题<sup>④</sup>。八月正式传位,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李渊称太上皇,提前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从此以后,直到贞观九年(635年)去世,政治上再不见他有任何作为,因为事变后他就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了。有鉴于此,我们把政变当天李渊被夺权视为玄武门事变全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步骤,而李渊随即退位下台则是合理的尾声。这是一个三部曲。如果把玄武门事变仅仅解释作“唐高祖的儿子们为争夺太子地位而进行的互相残杀”,是不够的。它的实质内容:一边是李世民,一边是建成、元吉和李渊,经过玄武门的军事冲突,李世民杀死建成、元吉,并迫使李渊立即交权,然后退位,历史进入唐太宗时代。

唐高祖的历史活动留下的最后回响,是玄武门事变发生后下的几个诏令。其一是政变当天六月庚申日诏<sup>⑤</sup>,说到建成、元吉:

皇太子建成,地居嫡长,属当储贰,处以少阳,冀克负荷。遂昵近群小,听受邪谋,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

① 《册府元龟》卷 83《帝王部·赦宥二》。

② 《唐大诏令集》卷 27《立秦王为皇太子诏》,《册府元龟》卷 257《储宫建立二》。

③ 《册府元龟》卷 259《储宫部·监国》,同书 10,《帝王部·继统二》。

④ 《册府元龟》卷 10《帝王部·继统二》:“是月壬申(六月十六日)高祖手诏司空裴寂等曰:‘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有司择日,宜速闻奏。’”

⑤ 《册府元龟》卷 83《帝王部·赦宥二》。

逆，潜为泉豸。司徒齐王元吉，寄深盘石，任惟翰屏，宠树既厚，职位非轻。背违天经，协同元恶，助成隐匿，递相驱扇，丑心逆迹，一旦尽彰。惟彼二凶，罪穷数稔，祸不旋踵，用取屠戮，念兹丑恶，惭恨盈怀。今祸难既除，氛箝澄荡，国步夷坦，政道惟新，思与于万民，涤除更始……

另一个是三天后六月癸亥日立秦王为皇太子诏<sup>①</sup>，说到李世民：

秦王世民，气质冲运，风猷昭茂，宏图昔著，美业日隆。孝惟德本，周于百行；仁惟任重，以安万物。王迹初基，经营缔构，戡翦多难，征讨不庭。嘉谋独举，长算必克，敷政大邦，宣风区奥。功高四履，道迈二南，任总机衡，庶绩惟允。职兼内外，彝伦载穆，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承鼎业，允膺守器……

这两个诏令，将建成、元吉说成内挟邪谋、将危社稷的坏蛋，而特别称颂了李世民的仁孝，完全按胜利者的政治需要说话，力图将政变要办的事情办圆满，使李世民称心如意。想想看，已处在完全听命于人的地位上的李渊，如果当时能看到这样以他名义发布的诏令，心里会作何感想呵？

## 旧史的曲笔

最后稍微讨论一下旧史的笔法问题。

关于李世民同建成、元吉及李渊矛盾斗争的原委，旧史一脉相承，几乎完全以曲笔记载，这一直可以溯源于最原始的实录和国

<sup>①</sup> 《唐大诏令集》卷27《立秦王为皇太子诏》，《册府元龟》卷257《储宫建立》二。

史。为了使唐太宗这位圣明贤君的形象臻于完美,包括他杀兄逼父非法夺取皇位的政变,都要做出合乎封建礼法道义的辩解,所以精心地改写了历史。在吹捧李世民的同时,旧史家又极力贬低甚至抹煞李渊和李建成在李唐王朝开创阶段的功绩,否定他们个人的品格才干,同时讳而不谈李世民跟李渊闹的矛盾,把李渊不利于李世民的言行尽量加以删削或者修饰。他们竭力为李世民继位提供历史的理由,而且制造出一种传位于李世民是李渊夙愿的假象。学者们对旧史上这类曲笔揭示甚多,汪篋先生在《唐太宗》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旧史所记李渊对太宗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也是虚构出来的。这正是史臣辩护太宗合法取得皇位的画龙点睛之笔。”<sup>①</sup>我们还可以说,出于同样目的的又一笔,是落在关于玄武门事变的叙述上,就是说“善!此吾之夙心也”那样一种渲染早就想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话语。这样有头有尾地把唐太宗上台以前的历史一改,李世民为李渊合法继承人的事情便似是无容置疑了。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史臣们真可谓用心良苦。

中国的历史学诚然有良史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却也有另一种为尊者讳,为胜利者改写历史的坏传统。后者手段尽管高妙,究竟是作伪心劳,难免有破绽可攻。经过认真的分析探讨,相信历史终究是可以回复其真貌的。

(本文是与舍弟胡乐合撰的。他提醒我关注星象与事变的关系,并判断侯君集在决策时起了关键作用,多有发明。本文提交1983年全国唐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收入《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sup>①</sup> 《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 唐太宗的生平事业

唐太宗李世民生于公元599年1月23日(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童年少年时代经历了隋王朝由极盛而大乱的转折,青年时代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

十六岁时,隋炀帝北巡,在雁门被突厥围攻,他从军勤王,事后随父亲李渊在太原。那时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如火如荼,李渊任太原留守,手握重兵,威震一方,许多人怂恿他反隋。李渊早有此志,但他是个老谋深算的官僚,吸取杨玄感失败的教训,不肯贸然行动,直到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先后攻占金堤关、兴洛仓,在洛阳牵制住隋军主力,农民战争发展到使隋炀帝政权首尾不能相顾时,才于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李世民在这段时间里非常活跃,结交豪杰,秘密组织力量,迫不及待地催促李渊动手。起兵后与长兄李建成分领左右军,击西河(山西汾阳)、攻霍邑(今山西霍县)、巡渭北、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屡建战功。他率领的右军胜兵十三万,是兴唐的主力。

隋亡以后,群雄逐鹿,争战激烈。李渊坐镇国都长安,李建成以世子身份居中协助,领兵四出征战的事更多地落在次子李世民肩上。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在黄河流域负责指挥一系列重大战役,对唐政权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他颇以为得意的“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二十四而天下定”的一段经历。

李世民负责指挥的第一次大战,是对薛举、薛仁果父子的战

争。薛举占据陇右，自称秦帝，兵进扶风（今陕西凤翔）、泾州（今甘肃泾川），构成李唐的心腹大患。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初战，唐军大意轻敌，被秦军袭破大败，损兵折将十之六七。年末再战，李世民冷静坚守高塘城（今陕西长武）六十余天不出战，待秦军粮尽求战心切，才派出小部队引诱疲敌，随即自己率大军从敌后突击，秦军在夹攻下溃败。李世民马不停蹄，只带二千轻骑抢先赶到敌据点折塘（在今甘肃泾川东北），使溃退下来的敌兵不能入城，纷纷散去。待唐军大部队兵临城下时，薛仁杲计穷只好投降，唐军取得全胜。事后李世民解释说：薛军都是陇外人，将骄卒悍，我们先只是出其不意打了胜仗，斩获不多，如果让他们退进城里重新组织起来就不好打了，所以必须赶在前面把败兵截在城外，这些兵一散回家，薛仁杲就无计可施了。显然他是认真地吸取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这次战事成了作为军事家的李世民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在以后的战争中，他非常注重战场的实地调查，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在军事舞台上导演了许多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武德二年（619年）平刘武周的战争，李世民率军在晋西南与敌军相持五个月，不与决战，同时尽力策应坚守在浩州（今山西汾阳）的唐军，在敌后安下一个钉子，借以阻断汾河东西敌军运粮的道路。这个策略获得成功，敌军被迫北撤。李世民抓住战机击敌之堕归，一昼夜追击二百余里，打数十仗，自己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为士卒作出表率。被追歼的敌军丧魂落魄，作鸟兽散，刘武周逃奔突厥被杀。唐军拓地至代北。

唐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后，便于武德三年（620年）集中兵力东进，与洛阳的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决战。他们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对手。出征军的统帅仍是李世民。

唐军这次是外线作战，不能旷日持久地等待战机，李世民就采取直逼洛阳合围攻坚的战法，经八个月的鏖战，眼看困在洛阳城中的王世充旦夕难保。这时，窦建德怕王世充覆灭后自己会成为唐

军的目标,突然调十万余大军援救洛阳。李世民当机立断,围城打援,亲率精骑前去迎战,阻止王、窦两军会合。在汜水上李世民略施小计引诱窦建德出击,待窦军疲乏饥困时,李世民率先以优势的骑兵陷阵,窦建德仓促应战,全军溃败,本人被生擒。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这次一仗而克二敌的大胜来得似乎有些侥幸,但想到李世民临阵表现的大智大勇,胜利就并非偶然了。

最后对窦建德故将刘黑闥的战事,使李世民十分棘手。唐廷处死窦建德后,又严厉绳治他的旧部,激起刘黑闥为首的反抗,不到半年就完全恢复了窦建德故地,还打死了唐军骁将罗士信。李世民再度前去,采用决洛水灌敌的办法打败了刘黑闥。但两个月后,刘黑闥东山再起,仅仅四个月又尽复故地。

李渊改派太子建成为帅,用魏徵的建议,释放俘虏,以示宽大,瓦解了刘黑闥的军心,迅速平定了河北。惯于征战的李世民在这件事上受了挫折,他在太子的成功里看到了魏徵的才能,认识到政策的威力,这无异使李世民又长起了一颗政治头脑,有益于成就他未来治国的大业。

从晋阳起兵到唐统一全国,李世民战功第一,开国后位兼将相,他的天策上将府和秦王府文学馆中人才济济,羽翼丰满。在众人鼓噪下,他萌发了覬觐皇位之心,唐高祖却逐渐对他疏远。在太子建成联合齐王元吉倾轧秦王世民的争斗中,李渊偏袒建成,李世民危在旦夕,迫使他在武德九年(626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死兄弟,逼父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号为太宗。这时他才虚岁二十九。

唐太宗李世民接手的唐政权是一个很景气的摊子。隋末以来的丧乱中,山东、河北、河西等许多地方遭到大破坏,贞观初年又逢连年灾荒,关中饥民多卖子女以换衣食,社会经济凋敝残破,远未复苏。靠什么人来同他一起治理这样一个国家,是个严峻的问题。在这方面唐太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家胆略,他按任人唯贤的原则,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从中央到地方拔用了一批精干的官

吏,这是他成功“贞观之治”的秘诀所在。

唐太宗继位后,就着手改组宰相班子。唐高祖留下的一班人: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萧瑀,尽是姻亲宿旧前朝遗老,无不出身士族高门,大多迂腐保守,经改组,只一年功夫,除裴寂暂挂名司空外,其余都淘汰殆尽。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中自己提拔了二十三个宰相,出身寒门的超过三分之一,突破了西魏、周、隋至唐高祖时期朝政尽把持在士族门阀,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手中的格局。

贞观初的三年中,他起用的八个宰相,平均年龄五十岁,著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徵当时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八人中有三个还是曾有宿仇的政敌:

李靖是隋末的马邑郡丞,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密谋起兵被他识破,报告了隋廷,李渊占长安后抓住他要杀,李世民替他说情得免,召入幕府,成为唐朝“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这时用为宰相。

王珪、魏徵原是太子宫臣,在他们兄弟之争中介入很深,曾劝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事变时魏徵还以建成若用他计必无今日之祸的话顶撞李世民。唐太宗爱重人才不记前愆,委以国事。这就是他所说的:“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襄邑王神符(李世民堂叔)是也;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魏徵等是也。”(《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再如韦挺,也是东宫旧属,与建成关系最好,也受到李世民重用,官至黄门侍郎、御史大夫。韦挺以自己“非勋非旧而超处藩邸故门之上”,不敢就高位,太宗不许。这样做确曾引起一批秦府旧人不满,有人发牢骚说:追随左右多少年,现在封官倒落在前宫、齐府人之后!唐太宗告诉他们:“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资治通鉴》卷192)

原东宫的李纲、窦轨、裴矩、郑善果、贺德仁、萧德言、欧阳询、

唐临、唐宪、冯立、谢叔方、薛万彻，原齐王府的武士逸、袁朗、袁承序等，在贞观年间都继续任用，可见对建成、元吉党羽“一无所问”的政策是实际贯彻了的。这样容人的度量对延揽人才、稳定政局很有好处。著名的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才识，知无不言，以致君尧舜为己任，对“贞观之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唐太宗高度评价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说，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旧唐书·魏徵传》）

唐太宗用的宰相中，魏徵、李勣、张亮、许敬宗参加过李密的瓦岗农民军，王珪、张亮、戴胄、马周小时家境贫苦，杜淹、温彦博、戴胄、刘洎、岑文本、褚遂良、张行成曾在王世充、萧铣、薛举等割据政权中供职。这些人在隋末动乱中都有丰富的阅历，对农民革命风暴的威力印象极深，做官竟以国事为忧，孜孜求治，多能直言极谏，时时以亡隋之鉴劝诫唐太宗，使他铭记“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他们为官也多清廉，魏徵、戴胄、温彦博居处宅宇弊陋，死时家无正寝，没有像样的地方停尸。贞观年间，君臣相互约束，不敢纵欲重敛百姓，人民能在比较安定的条件下致力生产，使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很快恢复发展。

贞观君臣在为国事分忧中各尽其职，他们肝胆相照，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李勣患病，唐太宗剪须烧灰为其合药，李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一次食瓜味美，唐太宗想起早逝的杜如晦，“怆然悼之，遂辍食之半，遣使奠于灵座。”侯君集因卷入太子承乾谋反案，法不容赦，唐太宗为他说情，群臣不依，只好与他挥泪长诀，说：“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因念其功，指示不要涂去侯君集在凌烟阁的功臣像。温彦博和岑文本两人是在职期间劳累过度而死的，唐太宗伤心懊恼，“恨不纵其闲逸，致天性灵”。岑文本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拒绝亲友庆贺，说“受吊不受贺”，是为“责重位高，所以忧惧”。果然上任不久便“精神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不过一年，仅五十一岁便溘然



长逝。魏徵为相，“深惧满盈”，房玄龄在职，“罄竭心力”，都频表辞位。可见那时的官是不好做的。李靖六十四岁时恳辞相职，唐太宗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忧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旧唐书·李靖传》）人不恋栈，这也是贞观官场中的一种良好风气。

关于官吏的退休，在唐代逐渐形成制度。为保持官吏队伍的干练，唐太宗还不时裁汰冗员。贞观元年（627年），房玄龄按他“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指示，一次将中央各官府的两千多官吏精简为六百四十三人。为革除地方上“民少吏多”之弊，还并省了许多州县。唐太宗特别重视地方吏治，“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他强调“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择官》）。唐代许多朝廷大员还不时被派到地方任职。官场中有进有出，能下能上，人才流动，大小职事官都不是终身职务。

唐太宗认为，君主的责任是“驱驾英材，推心待士”，并不求备责人，只是舍其短而用其长，但要求官吏必须奉公尽职，除了立程序，定制度，使各部门互相监督，还挟刑赏以制约臣下。他在位时完成了唐律的修订，那是我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刑法。他本人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常常表彰敢于犯颜执法的官吏。贞观九年（634年），岷州都督高甑生犯诬告等罪，被判徙边，有人替他说情，“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唐太宗说：“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有功之人，皆须犯法。”（《贞观政要·刑法》）还有一个卢祖尚，才兼文武，被选作交州都督，不肯赴任，受到斩决处分。老将尉迟敬德，战王世充时曾在重围中跃刺单雄信落马，救李世民于危难，玄武门事变中又射杀元吉论功第一，后来居功傲物，曾在宴席上争座次拳殴大

臣,唐太宗以“韩、彭夷戮”的故事给予严厉警告,对他说,“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资治通鉴》卷191)尉迟敬德从此收敛,善保终身。

唐太宗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培植起一批比较得力的官吏,他正是依靠这支队伍,实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那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渔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几至刑措。曾被理想化为古昔未有的盛世。他对数以百万计的来归少数民族也能待如一家,信用不疑,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爱戴,被尊为“华夷父母”、“天可汗”,使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

唐太宗晚年的思想作风,各方面都有所倒退。功业垂成使他踌躇满志,终于禁不住物质享受的诱惑,步历代帝王的后尘,滥用民力,营缮宫殿陵墓。还四出征讨,兵革岁动。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谏诤,甚至无端地怀疑死去的魏徵和活着的李勣,误杀张亮、刘洎等极有才能的宰臣。当年君臣间互相信任的气氛日渐淡薄,阿谀奉承之风重新抬头,国家的治理情况大不如前。这是他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的表现,是终身制和世袭制的专制政治制度使他不能自拔。确如秦文炯指出的:由他所主演的“贞观之治”这出英雄戏剧,终于不能不带着几分悲剧的色彩,在哀歌声中降下了幕布。

唐太宗病故于公元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时仅五十周岁。此前一年,他对太子李治谈了一次话,历数自己当皇帝以来的种种“不善”,为自己的“深过”感到多愧。他告诉儿子:“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资治通鉴》卷198)那恳切陈词的珍贵遗训,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大政治家的坦荡襟怀,到底还是不同凡响的唐太宗啊!

(原载《唐太宗与昭陵》,《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  
1985年5月)

# 贤相诀别明君

——房玄龄与唐太宗

大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的一个夜晚,在玉华宫的寝殿里,昏暗摇曳的烛光下,唐太宗正会见奉召前来的房玄龄。皇帝的本意是让留守京城的这位宰相来避暑,养养身体。皇恩浩荡,房玄龄不能违忤皇上的好意,强打精神,半躺半倚在舆轿中,马拉人抬,好容易捱过三百里的颠簸。可到见面时,俩人却全无情绪,因为年届古稀的老臣房玄龄,这时已病体垂危,而小他近二十岁的唐太宗,也已病人膏肓。他俩心照不宣,知道这一次见面,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诀别了。有气无力的谈话间,弥漫着一层伤感的气氛。

说起来,这君臣二人出生入死,风雨同舟,已有数十年深交的情份了。这次最后的长谈,回顾了他俩三十二年前开始相识相知的漫长岁月。

当初,年方十八血气方刚的李世民,随其父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进军长安打到渭北时,年近不惑在隰城(今山西汾阳)任县尉的房玄龄“杖策谒於军门”,弃官前来投奔。担任唐军右军元帅的李世民,同他一见如故,当即收在麾下,任为参军记室,做掌文翰的秘书工作。

房玄龄是位进士出身的饱学之士——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位进士,史书上有关他“年十八,本州举进士”<sup>①</sup>的记载,被一些学者引用为进士起源的证据——尤以足智多谋见长,加盟唐军以后,罄竭心力,为李世民幕府收罗人才,推诚相待,结交谋臣猛将,促使唐军迅速扩充。晋阳起兵时,李渊总共三万人马,全军攻打一个霍县城还很吃力。可是渡河进入渭北以后,兵力与日俱增。打到泾阳时,仅李世民的西路军便已“胜兵九万”,到进攻长安时,二十余万唐军中,李世民所部至少有十三万,占到三分之二。部队能发展得这样快,与房玄龄的努力有相当大的关系。为此李渊十分赏识房玄龄,夸奖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sup>②</sup>李世民则说:“汉光武得邓禹,今我得玄龄,犹禹也。”<sup>③</sup>刘秀起兵夺天下时,邓禹也是杖策徒步投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为东汉开国元勋,后来又君臣相得,两相无猜,所以李世民引以为比。

秦府很快团聚起数以百计的济济人才,著名的有如尉迟敬德、侯君集、程知节、徐世勳(李勳)和秦叔宝(秦琼),其中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两位,至今民间崇拜为门神,年节时彩印张贴。程知节即程咬金,徐世勳即徐茂公,和侯君集都是几乎家喻户晓的《说唐》中的瓦岗英雄。李世民就是凭借秦府这一兵精将广、谋臣如云的实力,有了与长兄李建成争夺太子位的资本。

事情恐怕应该倒过来说,是这批造反起家的草莽英雄,怂恿李世民与其父兄争权夺位的。这方面,房玄龄是用心最早的一位。武德初年,唐高祖李渊将秦王府中许多幕僚调出,改任他职,以削减秦府的实力。房玄龄认为调走别人都不足惜,唯有杜如晦,是王佐才。他对秦王李世民说:“若大王守藩,无用之;必欲经营四方,

①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②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③ 《贞观政要》卷2《任贤》注。

非此人不可。”<sup>①</sup> 如果只想当个王爷过平安日子，那么用不着杜如晦；如果要取天下当天子的话，就不能放杜如晦走。可见这类被隋文帝斥为“反覆子”的造反英雄，在建立李唐王朝之初又另有他图，房玄龄带头密谋着第二次夺权。

于是一场父子相逼、兄弟残杀的恶斗，不可避免地在武德九年（626年）爆发了。

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嫡子中，建成为长子，世民为次子，第三子元霸早夭，第四子元吉封齐王。建成拉上元吉保自己的太子位，诬告、下毒，什么手段都冲世民用上了，弟兄们各自蓄养私兵，暗斗明争日趋白热化。建成和元吉看出，秦府的智略谋士中，最有能力也最危险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便在父皇面前说了他俩许多坏话。唐高祖终于下令，将房、杜二人逐出秦王府。

高祖皇帝本来就对不安分的秦府上下心存芥蒂，武德元年杀掉第二号开国功臣刘文静，是对秦王世民的一个重大打击和警告。后来，受到后宫妃嫔们蛊惑，皇帝的态度变得明显地倾向太子，建成和元吉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寻衅生事，一心要铲除秦王势力。当武德九年（626年）突厥来犯时，齐王和太子乘皇帝诏令秦府兵马调拨归齐王指挥之机，定计在移交军权后饯行出发时，将尉迟敬德、程知节等秦府骁将全部坑杀，并且连秦王世民也不放过。处境岌岌可危的李世民在生死存亡关头，终于下决心先发制人，急召房玄龄、杜如晦回府，谋划举事。

在外多时的房玄龄一时不摸李世民的底，不敢贸然违抗皇命私回秦府，他对前来叫他的长孙无忌说：“皇帝下了敕旨，不准再效力秦王，现在私下去谒见，必然是死罪，我们不敢从命。”李世民听说这情况后大为震怒，伸手摘下自己的佩刀，交给尉迟敬德：“你去看看，如真的不肯来，就给我把他俩的首级取回来！”说来也可怜，

<sup>①</sup> 《大唐新语》卷1《匡赞》。

房、杜二人自从卷入了皇子们的储位之争后，便死生由之，再无脱身的自由。秦王世民所以要采取不来便杀的极端行动，是恼恨房玄龄、杜如晦的违命背叛，更怕他们把举事的消息泄露出去。长孙无忌偕尉迟敬德再次前去，先作劝说，房、杜两人探知秦王已下决心，便再不犹豫，答应回秦府共谋大事。长孙无忌怕四人同行会被皇帝、太子的探子发现，便让他们换上道士的衣服跟自己走，尉迟敬德单独走别的道，悄悄回去。秦王见这擅长计谋的房玄龄和擅长决断的杜如晦两位谋士归来，不由得大喜，寻即发动了玄武门事变，顺利夺得政权。事变后房玄龄出任中书令，做了宰相。仅隔一个月，唐高祖连傀儡皇帝的名义也保不住了，被迫传位给太子李世民，历史进入了唐太宗的时代。

唐太宗为有功之臣定勋赏，公布的名单上，房玄龄、杜如晦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唐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表示不服，声称自己隋末在关中举兵接应唐军，从平京师有功，现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舞文弄墨的“刀笔之人”反而功居第一，心里不服。唐太宗指出：“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功”，<sup>①</sup>就像汉初佐刘邦定天下的萧何，虽然没有冲锋陷阵的汗马功劳，但是运筹决策，理当功居第一。劝他不要以皇亲的身份，与功臣争赏。

至此，房玄龄在秦府已十年，如以上所述，建立了“佐太宗定天下”<sup>②</sup>的不世之功。这期间，从群雄逐鹿的攻城略地，到兄弟阋争的自相残杀，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唐太宗登基十年以后，有一天突然问起侍臣：“创业与守成哪件事更难？”房玄龄回答：“天下大乱，成败生死不明之时，与百千群雄竞起争战，取胜而后使群雄屈膝称臣，创业实为难。”魏徵则说：“自古以来的帝王，

① 《旧唐书》卷60《淮安王神通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条柳芳曰，参《新唐书》卷96《房玄龄杜如晦传》赞引柳芳言。

无不是得之於艰难,失之於安逸,还是守成更难。”唐太宗评论说:“房玄龄与我共取天下,百死一生,深知创业之难。魏徵与我共安天下,总怕骄奢生於富贵,祸乱生於怠忽,看到守成之难。现在创业之难已经过去,守成之难正要与诸公一起慎重对待。”房玄龄等折服地称:“陛下这样说,真是四海之福!”<sup>①</sup>

玄武门事变以后的二十二年间,房玄龄作为在任最久的资深宰相之一,建立了辅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的又一不世之功。这期间,房玄龄多次被委以居守京城的重任,与太子一起守护社稷。有他在长安,唐太宗便能放心地出巡各地,或统兵亲征。此外,房玄龄对朝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贞观初主持并省机构,裁减官员的工作。史称,当时台阁规模,典章文物,都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所定。这一次裁减,中央三省六部等衙门只留文武官员六百四十三员的定额,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精减机构、淘汰冗员的改革行动。官员少了,减少了官僚程序,反而达到了较高的行政效率,经济上也节省了政府开支,有助于渡过贞观初年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走上经济逐步恢复振兴之路。

二、隋亡以后,慑於农民战争中“得隋官皆杀之”的余悸,士人多不愿意从政,一时造成治国人才的匮乏。为选拔人才,房玄龄亲自掌考,“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公平地考核内外百司长官的政绩。

具体办法是按四善和二十七最的标准,评出从上上到下下的九等,作为官员升迁黜降的依据。这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按职责分的,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牧养肥殖,蕃息滋多,为牧官之最。考核官员

<sup>①</sup> 见《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二年九月条,《贞观政要》卷1《君道》。

一年的功过,得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工作一般,评不上善和最好的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不合理为下上;背公向私,玩忽职守的为下中,谄上诈下,贪赃枉法为下下。唐代考法规定,考官考核的结果,先要在尚书省当众公布,然后再上奏朝廷,考评有一定的透明度。房玄龄亲自参与考法的制定和实施,秉公办事,悦服百官,推动贞观官场的廉政建设取得在整个中古时代都堪称比较清明的效果,而且也成为他得到“良相”美誉的政绩之一。

唐太宗很赏识房玄龄的知人之明,在任命重要官员时,常常会征求房玄龄的意见。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纬为主管度支的户部尚书,事后向人打听在京城留守的房玄龄对此有何意见。当听人报告说,房玄龄只说李纬胡须长得好,没说别的,唐太宗意识到用人不妥,马上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将他调离这主持民政和财政的要职。到贞观末年,君臣二人在这些事上已是非常默契了。

三、财经方面,鉴于隋末荒乱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在经济凋敝又逢连年灾荒的情况下,重振经济,摆脱财政困难,成为终贞观之世的头等大事。房玄龄负责审官求贤,曾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便不辞辛苦繁琐,自己亲自兼管度支,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和国家预算的制定及实施。由此也可知,为何王珪在品藻评论人物时,称赞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sup>①</sup>而唐太宗对这评价也大为赞赏,并赞成褚遂良所说“人臣之勤,玄龄为最”<sup>②</sup>。

四、贞观中主持定律令。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sup>③</sup>,也是作为“良相”的美政之一。比如他修改连坐法,以前异居的兄弟,因谋

① 《贞观政要》卷2《任贤》。

②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末条。

③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反连坐都判死刑,房玄龄奏改轻判为配役,只服苦役,不杀头。他改定的贞观律五百条,刑分笞、杖、徒、流、死五类,共二十等,与隋律相比,减去大辟罪等九十二条,“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sup>①</sup>律条以外,还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又删留武德以来敕格七百余条。律、令和赦、格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颁行以后,定罪量刑有了依据。此外,还与魏徵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辅助法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规范人们行为。这样,使法制建设比以前更完备。律令格式与诏敕的法令体系,再经过唐高宗、唐玄宗时代继续修订,唐土成为古代东方法制建设较早较完善的地方,对周边的日本、新罗等国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因此进步为“律令国家”。

五、监修国史。中国自古有官修史书的传统,唐代国史总是由宰相监修,房玄龄又兼了此职。当时国史撰修的程序是左右史逐日记录皇帝的言行诏令为《起居注》和《日历》,逐年积累后删成一朝皇帝编年体的《实录》,再改写为纪传体的《国史》。前代的正史也由宰相领修。

唐太宗有发动玄武门事变、弑兄逼父夺权的记录,有碍万代瞻仰。而这行为又与隋炀帝上台的过程十分相似,不能不防人们用隋炀帝的历史来影射他,所以修史一事,唐太宗格外在意,特命心腹宰相房玄龄和魏徵监修。

即使这样,他还不能放心,时时询问一些史事是怎么写的,曾向褚遂良打听:“《起居注》记些什么事?可不可以看看?我自己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也一定要记吗?”<sup>②</sup>唐太宗还曾问房玄龄:“以前各代史官的记述都不给国君看,是为什么?”房玄龄解释自己监修国史的职责说:“史官不空讲好话,也不隐讳错恶,因为如果君主看到了必然动怒,所以不敢进献给皇上过目。”唐太宗还说自己 and 以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② 见《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六年四月条。

前的君主不同,想要亲自看看国史,可以知道以前的错处,以后好避免,你可以将写好的拿给我看。一位叫朱子奢的谏官感到唐太宗这样做很不妥,便婉转地提出意见:“陛下圣德无过,史官所记,自然尽善尽美。光是陛下自己阅看《起居注》,当然没什么关系,但若这规矩传示子孙,恐怕曾孙玄孙辈以后,万一出一个饰非护短不很明智的君主,那史官就难逃刑诛了。这样一来哪个史官还敢讲真话?如果都变得只为自身安危计,看风使舵,顺旨撰史,那么要流传千秋百代的史书还有可信的吗?所以前代帝王都不过问史官的记述,就是出於这些考虑。”<sup>①</sup>可无论大家怎么劝阻,唐太宗一概不听,硬要亲自看看史官的记载。

历来遵循的那个君王不得索看《起居注》、不能干预史官著述的规矩,是约定俗成的,也算是对至高无上的君主独裁权力的一种小小制约罢。可是无论有什么规矩,有多少劝谏,唐太宗还是执意要自观国史。当他亲自审阅《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时,特别注意了关于玄武门事变的记法,果然是“语多微隐”,由房玄龄他们删定的稿子已替唐太宗作了不少遮掩。唐太宗看后放心了,嘴上还冠冕堂皇地让“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而且搜检出历史上两位在政变中杀了哥哥的事例来为自己辩解,一是西周初年成王幼时诛叛乱的兄弟管叔、蔡叔以安周的摄政周公,二是春秋鲁庄公病重时,毒死为庆父谋大位的哥哥叔牙以存鲁的鲁公子季友,示意按此口径解释玄武门事变<sup>②</sup>。实际上从房玄龄以下,史官们哪敢直书事变的真相呢?所以,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玄武门事变的记载,语多隐晦,有的地方画蛇添足,有的地方闪烁其词,反正是真相难明。这也是以房玄龄为首的臣子,替唐太宗办的。

由以上诸项便可知道,房玄龄毫无疑问是唐太宗的心腹股肱,

<sup>①</sup> 见《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七月条。

<sup>②</sup> 同上。

他全心力地效忠于从敦煌公、秦王到坐了皇帝位的唐太宗。唐太宗回报与他的,除了高官、爵位和封赏外,还有相当的信任,这一点甚至不容臣下离间。

贞观初,监察御史陈师合写了一篇《拔士论》上奏朝廷,提出人的思虑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兼任数职。笔锋所指,是当时最受重用,“共掌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唐太宗说:“我以至公之心治天下,现在任用玄龄、如晦,并非因为他们是勋旧故人,是因为他们才行两全,这个陈师合妄加毁谤,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以往蜀国的后主刘禅无能,齐国的文宣王狂悖,可是国家治理得不错,是因为不加猜疑地任用诸葛亮、杨遵彦的缘故。我现在也是这个用人不疑的办法。”<sup>①</sup> 说罢给了陈师合一个流放到荒远的岭南去的重重的处分。从此陈师合这个天子身边的谏官,就在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了。

贞观末又有一次房玄龄奉旨留守京师,太宗皇帝特别授权允许他“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就是可以自行处置军国大政,不必请示报告。突然有人来到朝廷,声称有秘密事上奏,告的就是房玄龄。房玄龄不敢多问,连忙派专用驿马将他飞速送往皇帝所在地。唐太宗闻讯后布置好刀斧手才召见告密者,一问果然是告房玄龄,顿时龙颜大怒,再不多问一句,便叱令腰斩。处死告密者后,唐太宗又发玺书郑重严肃地责备房玄龄,说:“这种事完全可由你自己处置,为什么这样不自信!再遇到这类事,你自己办了就是,再别往我这里送了。”<sup>②</sup>

还有一则很能反映这君臣二人间亲密关系的故事,是说唐太宗有意赐一美女给房玄龄为妾,房玄龄尴尬地拒绝了。唐太宗猜到是房玄龄惧内,不敢纳妾,于是召其夫人入宫,当面陈说此意。

① 见《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② 见《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正月条。

房夫人竟不顾君臣礼仪，言语顶撞起来。唐太宗佯怒，命拿出准备好的鸩酒一碗，对她说：“若不从命就饮鸩赐死！”房夫人二话不说，端起碗来一口气喝干。唐太宗哈哈大笑，原来所称鸩酒是假的，房夫人喝下去的是一碗醋。纳妾之事自然作罢，可是夫人吃醋的故事由此成为一个典故流传下来。唐太宗赐妾不成，便将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了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两人结为儿女亲家了。

但终究他们是君臣，无论关系多深多亲密，伴君如伴虎，作为臣下的房玄龄不能不小心翼翼伺候。做了十几年宰相，年过花甲后，“深畏满盈”<sup>①</sup>，主动提出辞职要求，唐太宗没有批准。他再三上表恳辞，唐太宗下敕不许门禁接受他的辞呈，这才作罢。但二三年后，他又提出辞职和退休，唐太宗称赞他能“齐踪往哲”，像过去的张良、窦融一样，“知进能退”，但又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sup>②</sup>挽留他勉为其难，如果骤然离去，好像自己断了左右手。既然是皇帝金口玉言，称为“良相”，房玄龄只能继续留任，总理朝政。

无法功成身退的房玄龄，更不敢有一点居功骄矜的疏忽，在小他近二十岁的皇帝面前，始终恪守一臣子身份，表现得唯唯诺诺，却为此一再受到有明于兼听、善于纳谏美名的唐太宗的训诫。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群臣训话，指出以房玄龄为中书令的中书省和门下省，职掌机要，当皇帝下的诏敕有不合适处，都应该提出修改意见，可是这一向只见顺从，听不到异议，如若只是传递文书，谁都可以做，何必要选择有才识的人呢！房玄龄等听了训斥连连叩头认错。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再次点了他的名，话说得很重：“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sup>③</sup>批评他什么事都不提

① 《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三年正月条。

②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③ 《贞观政要》卷8《刑法》。

不同意见,当的什么宰相呢?唐太宗发火是一件案子引起的。大理寺官员张蕴古奉旨审李好德言语妖妄案,报告说:“李好德有癡病,精神不正常,按法律不应当判罪。”唐太宗答应从宽处置,张蕴古私下把皇帝的旨意透露给李好德,还同他下棋玩乐。这事被人揭发报告,唐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想起处置不当,迁怒于房玄龄,责怪说:“你们吃着皇粮,应操心国事,大事小事都应该留意才是。现在不问你就不说,什么谏议都不提,这宰相是怎么当的?比如张蕴古,身为执法官,却与囚犯玩乐,泄漏我的言语,罪过是很重的,但按法律,还不至于判极刑。我一时盛怒之下做出决定,你们竟不吭一声,执法部门也不按规定尽职办理,没有对死刑犯履行三次申报三次复审的手续,就仓促处决,这像什么话?”为了防止这一类错案再度发生,唐太宗下诏,以后死刑犯的判决,要履行五次覆奏的审批手续,通过以后,才可用刑。<sup>①</sup>这次房玄龄见死不救,被唐太宗训斥,应该感到汗颜内疚。

可是事情过后,无论皇帝的决定是对是错,房玄龄照旧讳莫如深,不敢置喙,贞观二十年(646年)又重复了一次类似的见死不救的错误。

刑部尚书张亮被人告发,罪名是养假子五百之多,又与术士谈论自己“名应图讖”,当有天下,还曾说自己臂上起龙鳞,欲举大事,涉嫌谋反。复审时张亮不服罪,可是唐太宗说:“张亮有假子五百人,养这么多闲人干什么?就是想造反!”给定罪量刑定了调子。百官听他这样讲,都附和说张亮是谋反,罪当诛。唯有一个叫李道裕的主管工程的官员认为:“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罪不当死。”李道裕官微言轻,朝中无人理会他的话。临刑前唐太宗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到狱中与张亮诀别,他们还是说张亮:“你言行不慎,与凶人交往,犯了国法,现在有什么法子,好自准备上路去罢!”表面

<sup>①</sup> 见《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五年六月条、《贞观政要》卷8《刑法》。

上公允执法,实际只是附和皇帝意旨,根本不考虑张亮的申辩。随即张亮被处死。过了一年多,刑部侍郎一职出缺,物色了几个,怎么也选不出合适的,唐太宗忽然想起李道裕,说:“有合适人选了。以前李道裕议论张亮谋反一案的证据不足,他的话很对,我没有采纳,很后悔。”<sup>①</sup>就这样决定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让他做了职掌司法政令的刑部副长官。

张亮谋反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房玄龄心里不会不清楚,他是不敢说。这样有话不讲,被唐太宗数落了多少回,可无论怎样训斥,他也不改初衷,当年造反打天下的时候,敢说敢为、生气勃勃的劲头,在他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人变得非常世故。唯上命是从,也是有他的难言之隐。他是太清楚中国特色的专制政治的可怖了。“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sup>②</sup>,一句话说不对,就满门抄斩的厄运不仅是武则天时代才有。只是他看到唐太宗不像勾践那么狭隘,才没有像范蠡那样激流勇退,泛舟江湖而去,也没有像张良为避韩信那样的杀身之祸而辟谷深山。他还留任在太宗身边,但是谨小慎微过日子,少说话,多做事,唯唯诺诺,恭恭谨谨,处处看皇帝眼色行事。即使这样,他还是免不了不时遭到皇上的责罚。

贞观十年(636年),有人打小报告,说朝中大臣轻蔑越王。这越王李泰也是长孙皇后所生,是唐太宗的宠儿,有意扶为太子承继自己皇位的,群臣竟敢无礼于越王,使唐太宗怒不可遏。他召三品以上大臣到齐政殿训话,厉声说道:“我有句话对你们讲。以前的天子是天子,现在的天子不是天子啊?我看隋朝时,达官贵人都不免被王子们欺辱,我约束儿子,不许胡作非为,可你们反而轻蔑我儿!如果我放纵他们,看你们要受多少气!”房玄龄听了惶惧战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叩头认错。倒是魏徵挺身而出:“三品以上,位

<sup>①</sup> 见《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三月条。

<sup>②</sup> 《旧唐书》卷87史臣曰。

居公卿，都是天子大臣，连陛下也礼仪有加。纵有小过，越王怎能私加折辱。如果放纵王子，坏了纪纲，我不知这国家怎么治理。”唐太宗马上悟到自己刚才发脾气没有道理，赏赐给魏徵一千匹绢作为奖励，转过来又把房玄龄严厉批评了一顿。<sup>①</sup>

稍早，贞观八年（634年）的一天，房玄龄走在路上碰到窦德素，他是主管百官营缮的官员，顺便问他近来宫城北门有些什么建筑工程。唐太宗知道以后，对房玄龄说：“你在南衙处理政事就行了，北门施工搞点建筑，是宫里的活，关你什么事！”房玄龄又叩头认错。魏徵在一旁进言：“我不知道陛下有什么可指责的，也不明白房玄龄有什么错要认。”魏徵认为：“房玄龄为大臣，理当过问营造之事，统筹核算，该建的就帮陛下办好，不该建的就奏明陛下停罢，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之道。”<sup>②</sup>一件是非明明白白的小事，遭到皇帝无理的斥责，房玄龄也只是认错，不敢申辩，似乎已是他养成的职业习惯了。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644年）时就说起过：房玄龄在我左右二十余年，一见我责罚人，便“颜色无主”<sup>③</sup>。如果批到他头上，便日复一日在朝堂上跪叩请罪，手足无措，仿佛无地自容。<sup>④</sup>这么个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宰相，还得可怜兮兮地做事、做人。

房玄龄还不时因为一点小事，一次次被敕令回家反省过错，受到停职处分。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病危弥留之际，有几件心事交待给前来诀别的唐太宗。第一件就是劝唐太宗召回“以谴归第”、被停职在家的房玄龄，说“玄龄追随陛下已久，为人小心慎密，一切密

① 见《贞观政要》卷2《纳谏》。

② 见《贞观政要》卷2《纳谏》。

③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十一月。

④ 见《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条

谋奇计,从不外泄,如果没有大错,希望不要遗弃。”话中暗喻,玄武门事变等不光彩的往事,房玄龄一直为当今皇上面子而守口如瓶,这样的忠臣,要格外恩宠有加,如若轻弃,是很不仁义了。贤惠的皇后去世后,太宗皇帝睹物伤情,想起她临终的遗言,便召回房玄龄,让他复职,仍旧用他为宰相。<sup>①</sup>

贞观二十年(646年),房玄龄又因“微谴归第”,再一次被斥退回家。褚遂良上书:“玄龄自隋末举义旗时便翼赞圣功,武德年末又冒死决策,贞观以后又选贤能立朝纲,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认为他能与扶植武王的姜太公,辅佐成汤的伊尹,关中的萧何,江东的王导匹比。“除非罪在不赦,不可闲弃。如果因为衰老,可依礼安排退休,不可因小过弃数十年的元勋故旧。”唐太宗接奏书后想想也是,便召房玄龄回朝复职。<sup>②</sup>

房玄龄非常辛勤、非常吃力地伴随唐太宗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在他的人生之路走到尽头之时,他被召到玉华宫,抬到唐太宗御座跟前。唐太宗望着他这副模样掉了眼泪,房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sup>③</sup>心中的激动和感慨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衰弱的身体已使他无法完全用语言来表达心声了。君臣之间,有一句没一句的谈话进行得十分费力,更多的时间只是默默地相对凝视,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因为体力不支,更因为长期养成的拘束,房玄龄连诀别的时刻都没能畅所欲言。陛辞以后,越想心里越不舒服,决心要办一件萦怀已久的大事,劝谏唐太宗停止打高丽。一辈子都不敢讲真话,现在要死了,话还憋在肚子里,如果不说一说,房玄龄真有死不瞑目的遗憾。隋朝是亡于征辽,大唐再不能重蹈覆辙,想到自己已是有

① 见《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十年六月条,《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末条。

③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一天没一天了,恐怕不一定再有机会再有体力当面陈述,便决定抗表上奏章。他一反拘谨的常态,掷地有声地对儿子们说:“我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皇帝的恩泽却是与日俱增,如果有负圣君,那真是死有余辜。现在天下大治,只是东讨高丽不止,实为国家隐患。皇上因屡攻不下,怒火难遏。对他的这一决定,臣下不敢犯颜进谏,我知而不言,将衔恨地下。”于是强挣扎着起身伏案,拿起笔来。这篇长达千言的表奏,以“武贵止戈”的中国古典军事学最精粹的论断开篇,备述太宗皇帝的武功圣德,而后讲进退存亡之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理,指出高丽并没有违失臣节,侵扰百姓和长久为患中国,无此三条而大举用兵,得不偿失。“愿陛下遵老子止足之诫,以得万代巍巍之名。”奏章中,对无故被驱于行阵之间的兵士,死于锋刃之下,肝脑涂地,魂魄无归的境遇,对他们的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灵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的哀伤,表示了充满人道精神的同情。他恳请结束这“天下冤痛”,停止对高丽的战争。果然是“其人将死,其言也善”。唐太宗看了以后,对递送谏书的高阳公主夸了一句,说她公公:“这人病危到这种程度了,还能忧虑国事。”<sup>①</sup>

自贞观十八年(644年)以来,唐太宗集中全国南北很大的人力物力用于征高丽之役,他拓地开疆要完成规复汉代版图的雄心,不会因房玄龄的临终奏请而动摇,当然也不会再降罪于他。

在最后的日子里,唐太宗表现得对房玄龄的健康关怀备至,“驰遣良医,并赍御药”<sup>②</sup>,亲自选派名医抢救,让御膳房供应他每天的饮食。听说他精神好一点,唐太宗便喜形于色,他病情加重,便“改容凄怆”。他病危时,让凿破玉华宫苑墙,另开一小门,以便宦官来往问疾。在他弥留之际,还带着皇太子李治亲临病榻前探

①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② 《宋拓房梁公碑》。

视，“握手叙别，悲不自胜”<sup>①</sup>。又当面加封其两个儿子房遗爱、房遗则，让房玄龄放心地离去。

房玄龄终于在玉华宫去世了，享年七十岁。唐太宗为他废朝三日，册赠太尉，让陪葬昭陵，给他一个臣子可能有的最高荣誉。唐太宗为功臣建的凌烟阁纪念馆中，高悬着房玄龄的画像，给他的赞语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sup>②</sup>。这上凌烟阁的荣宠，后来的千百年中，成为所有士子毕生奋斗的追求。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sup>③</sup>在佐成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四位贤相，即他与杜如晦、姚崇、宋璟之中，房玄龄名列第一。史家特别称道说：“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谏争而房、杜让其直，英（李靖）、卫（李勣）善将兵，而房、杜济以文，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看重他能够不居功伐善，“无迹可寻，德亦至矣”，表现了很高的道德修养，因此“为唐宗臣，宜哉”<sup>④</sup>！将他一生的小心恭谨，树为百官的楷模。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能臣，又能完全驯服地顺从君王，自然是专制政治最适用的人才。

至此，我们讲完了唐太宗与房玄龄的故事。不过写到这里，还似乎言犹未尽，有一件后事不能不交待一下。

自古功臣，即使自己能恭谨小心熬到善终，还会对子孙未来的前程放心不下，房玄龄也曾这样告诫他的儿子们：不得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他手录古今圣贤家诫，写在屏风上，给儿子们每人一具，让他们时时观看，处处留意，以保身成名。<sup>⑤</sup>不料，房玄龄尸骨未寒，便祸起萧墙，儿子们争家财反目，互揭隐私，落下谋

①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② 同上。

③ 《新唐书》卷96《姚崇宋璟传》赞。

④ 《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条柳芳曰，参《新唐书》卷96《房玄龄杜如晦传》赞引柳芳言。

⑤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反罪名,次子驸马房遗爱与儿媳高阳公主在永徽四年(653年)双双被处死。

事情是唐太宗宠爱的女儿骄横的高阳公主闹大的。她由皇帝作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为妻。房玄龄一死她就闹着分家,还诬告她的大伯房遗直。唐太宗查明此事后将她严厉地教训一顿,从此失去父皇宠爱。不久御史台又破案,从玄奘的弟子辩机处查获宝枕,交待是高阳公主所赐,由此查出辩机与公主私通,而公主让另外两个女子服侍房遗爱的丑闻。唐太宗大怒,腰斩辩机和尚。公主被宽免了,可是心怀怨望,唐太宗去世时,这做女儿的竟暗自庆幸,毫无哀伤的表情。等她的兄弟李治继位后,她又唆使丈夫与长兄房遗直争讼,结果兄弟俩都被贬出京城。丈夫走后,她又与智勣和尚等数人私通,还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想再次黜其官位,夺其封爵。房遗直这次忍无可忍,便揭发出房遗爱夫妇与驸马薛万彻、柴令武等谋立唐高祖的儿子荆王李元景的阴谋,长孙无忌审理此案时把唐太宗的爱子吴王李恪也牵连进去,一并处死。此案发生后,荣宠一时的房府败落下来,房玄龄的神主也被迁出庙堂,停止配享。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依照传统,功臣之后五代人可以领受君主的恩泽,而房玄龄受不法儿子儿媳连累,死后也不得安息。

人们来到玉华宫,就会想起或听人说起在这里贤相诀别明君的故事。最后诀别的一幕虽然短暂,但这故事前面后面的故事,和故事里面的道理,却多得很,大得很。这对君臣之间动人的但绝非美妙的故事,是很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感慨、深思和回味的。

(原载《玉华宫》,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9月出版)

## 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大周女皇帝武则天在五王政变中退位,她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自己活跃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当年十一月,凄凉地死于洛阳的上阳宫。

谁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位在唐代贞观治世和开元盛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她在唐高宗逝世后,独掌朝纲二十一年,其中十四年多还名正言顺地做了自己开创的大周王朝的皇帝。

正因为她是这样一位奇特的政治女性,中国古代唯一一个真正执掌国柄的女皇帝,于是妇孺皆知,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她从生前掌权时起,便是一个被争议的对象。迄今一千三百多年来,人们对她的毁誉褒贬莫衷一是。

武则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呢?她是被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又怎样改变了这个世界?

—

武则天,名曌(zhào,音照),山西文水人,生于唐武德七年(624年),卒于神龙元年(705年)。父亲武士彠(yue,音约),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封应国公。生母杨氏,出身名门,其父杨达是隋朝宗

室宰相。这是大唐京城里的一个达官贵人家庭。

但文水武家原是务农的。武士彠早年做木材生意致富,因而得以结交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渊在隋末任太原留守时经常出入其家,晋阳起兵后任命他为行军府司铠参军,作为军需官跟随进军长安,李唐开国后享受“太原元从功臣”的荣誉。唐高祖还亲自为他作媒续弦,撮合了他和武则天生母杨氏的婚事。

虽然外祖父家是关中军事贵族的重要成员,武则天的血统里有高等士族的成分,但当时的门第是按父辈来论的,武士彠的出身不过是一介地主富商。他作为开国功臣,官居三品,爵封三等,以“今日冠冕”而论,可以跻身士族,但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修的《氏族志》,并“不叙武氏本望”,按传统的门阀观念,把武则天家族排斥在外。社会上敌对派攻击她家“地实寒微”,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

家庭给予武则天的,一方面是当时宦游于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是过去沉迹于下层民间的寒门根底。荣华富贵滋养了她无限的权势欲,寒门根底却使她饱受流俗的鄙视攻击。在一个极重阀阅的门阀社会里,她这样寒门出身的新贵政治前途是坎坷多虞的。正像在一座打开了的希望之门前,横着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出身境遇刺激着武则天,她那追逐最高权力,要支配一切的欲望,和冷酷地不择手段地报复一切的心理并存的独特的女皇性格,便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养就起来的。

## 二

贞观元年(627年)武士彠改任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三岁的武则天随父来到这蜀门重镇,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武士彠督利州五年,改任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贞观九年(635年)武士彠去世后,武则天孤女寡母四人的生活,由于受武家子侄

的苛待陷入困境。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贤惠的长孙皇后去世。次年,太宗听说武则天“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年仅十四岁的武则天,很乐意摆脱受异母兄长们欺凌的逆境,满怀对宫廷神秘生活的憧憬,步入深宫。临别,母亲杨氏恸哭不已,武则天小小年纪却自有主张,轻松地劝慰母亲:“我去见天子该是好福气么,何必哭哭啼啼!”

唐太宗赐号她称“武媚”。当时宫中有一匹叫“狮子骢”的马,性情暴烈,连戎马半生的唐太宗也拿它没办法。武则天却在一旁说:“我能制它,先用铁鞭抽,不服,再用铁挝击,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但是武则天在太宗后宫十二年,一直只是正四品才人身份,才人料理皇帝的食宿生活琐事,是低级的内官。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武则天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年华虚度在深宫后院,除了宫中对女官们要求很严的读书习文增长了她的知识外,她前途渺茫。于是不甘寂寞的武才人乘太宗晚年多病太子入侍之便,与李治暗中往来,打定了把自己托付给这位比自己小四岁的储君的主意。性格刚强又长于心计的武则天,很容易便取得了素称懦弱的李治的好感。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武才人和后宫未曾生育的侍妾被送进感业寺当尼姑。但不过一二年,怀念旧情的李治——已即位的唐高宗,便把她接回宫中。

武则天深受唐高宗宠爱,第二次进宫不久被册封为正二品昭仪,比才人高了两等。过去争风吃醋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便联合起来诋毁昭仪。由于外廷官僚的介入,这场后宫的争斗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永徽三年(652年)七月,后宫刘氏生的唐高宗长子李忠被立为太子,这是王皇后的舅父中书令柳奭(shì,音释)的主意,经王皇后同意后,与太尉长孙无忌及另外三名宰相褚遂良、韩瑗、于志宁一起出面办的。而后又拉张行成、高季辅、宇文节在太子东宫兼

职,为李忠安排了一个最强有力的保护班子。所有宰相,除李勣(jì,音绩)一人外全都卷入了这一立储事件。

原来这时武则天怀孕的消息从后宫传出来了——半年后生下了她和唐高宗的第一个儿子李弘——没有生育过的王皇后感到恐慌。当时操纵外廷的是托孤大臣、太上国舅长孙无忌,一个世纪以来掌握西魏、北周、隋、唐政权的关中军事贵族或称关陇集团,这时以他为核心。王皇后是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的裔孙女,长孙无忌一伙为他们集团的政治利益着想,自然要极力维护王皇后,反对武则天,因而匆忙导演了这场抢占太子位的戏。

武则天隐忍了两年,看起来她只是接二连三地在为唐高宗生儿育女。但到永徽五年(654年)六月,柳奭突然上书请解政事,皇帝敕准罢相。武则天给对手的回击由此开始。

立李忠为太子的事件告诉她,内外廷都是容不得她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当时她已生下第二个孩子,是女儿,王皇后也去看了看。皇后走后皇帝要来,武则天见机下狠心掐死了亲生女儿。皇帝来后掀开被子一看,大惊失色,讯问情况,宫女们说刚才王皇后来过。唐高宗便不加思索地断言:“后杀吾女!”对王皇后的妒妇心肠痛恨不已,就此下定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的决心。以当时的情势而论,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幼女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迈出这一步的。

王皇后失宠使有裙带关系的宰相柳奭被迫辞职,武则天回击敌对阵营,打开了缺口。

关键人物是长孙无忌。武则天陪唐高宗登门拜访,封官许愿,馈赠厚礼,但长孙无忌对皇帝要改立皇后一事竟不予理睬。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和礼部尚书许敬宗的祈请说项也碰了钉子。武则天终于明白,以自己的出身门第,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贵族遗老们的支持,她和长孙无忌集团的决斗提到日程上来了。

武则天在一群不得志的官僚中找到了支持者,诸如中书舍人李义府、王德俭,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和许敬宗,都是关陇集团圈子以外的人。李义府按许敬宗外甥王德俭的主意,首先上表请求废王皇后立武昭仪,武则天大喜,私下派人劳勉,李义府随即被提拔为中书侍郎。有这批人在外廷替她说话办事,她如虎添翼,可以同长孙无忌公开摊牌了。

永徽六年(655年)八九月间,皇帝正式提出废立大事,借口是“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长孙一派激烈反对,“濒死固争”,褚遂良、韩瑗、来济谏争说:皇后名家,不可轻废。一定要换,也要妙择天下令族、礼义名家,不可立武氏。还抬出妲己、褒姒等女祸倾覆殷周的故事为亡国的鉴戒。宰相中唯有李勣对皇帝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暗示他不要理会众人的反对,于是唐高宗拿定了主意。九月,先贬褚遂良为外官,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李勣主持了册皇后礼。翌年正月,太子李忠黜为梁王,李弘取代他为太子。

尔后四年间,武则天不歇手地把王皇后——长孙无忌一党彻底整垮。王皇后和萧淑妃惨死于冷宫,褚遂良贬死爱州(今越南清化),柳奭被杀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长孙无忌在黔州(今四川彭水)被逼自缢,韩瑗死在振州(今海南岛崖县西),还开棺验尸。此外,来济远贬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于志宁免官,长孙氏、柳氏、于氏和褚氏一批亲属子弟或杀或贬,他们在朝中的势力被摧垮殆尽。“自是政归中宫”。若从这显庆末年开始计算,武则天一生从政长达四十五年。

麟德元年(664年)利用皇后和皇帝间一时的龃龉摩擦,宦官王伏胜告皇后行蛊祝,宰相上官仪乘机劝皇帝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在皇帝授权下上官仪起草好废武则天皇后的诏书。武则天闻讯赶去申辩,懦弱的唐高宗又于心不忍,推说自己本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上官仪和王伏胜当初都是废太子



李忠的僚属，武则天指使许敬宗诬告他们与李忠谋大逆，于是上官仪、上官庭芝父子和王伏胜被杀，上官庭芝的妻子和女儿上官婉儿没人官被为婢，监禁在黔州的李忠被赐死。从此，每当中朝，武则天都跟随垂帘听政，“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长达十二年的皇后——太子位之争，武则天取得全胜。这场斗争双方营垒分明：王皇后长孙无忌一边，是士族门阀地主最后的政治代表关陇集团；武则天李勣一边，是新进寒门地主的政治代表。武则天的胜利，意味着魏晋以来士族门阀地主控制中央政权四个半世纪的历史结束了。上层建筑的这一变革，和中国中古社会由前期的门阀地主部曲佃客制经济向普通地主契约佃农制经济的过渡是同步进行着的。关陇集团的垮台更直接导致关陇地区军事贵族地主的部曲佃客制最后覆灭。这是有利于普通地主取代没落的门阀地主，活跃社会经济，并使之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武则天不同凡响地以关陇集团和门阀制度挽歌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

### 三

从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集团覆灭到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的二十四年，史称“二圣时期”(659—683年)。

上官仪事件平息后，武则天接受教训，在黜陟大权在握的夫君面前，言行比较检点，稍稍改变了过去专恣行事的作风。唐高宗由于风眩和目疾，国事更需要仰仗武则天的帮助。夫妻间重建了新的平衡和谐的关系。史称唐高宗前贤后愚，他虽算不上是个有为君主，但他当初能勇敢地坚持自己感情上的执著追求，力排众议接武则天回宫并立为皇后，而后又委政于她，把这位绝代女强人拔上政治舞台，已是尽了他的历史责任。武则天则着眼于巩固自己的

权位,实际肩负着与残余门阀势力斗争,为新兴普通地主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拼搏前进。

显庆四年(659年)六月,长孙无忌刚被逐出京城两个月,修改官颁族姓等级文书的事就由许敬宗、李义府提到日程上来了。他们要另订《姓氏录》取代《氏族志》的原因是唐太宗时修的《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也不载李义府的家世。

新修的《姓氏录》以皇后家族为第一,一共分九等,全按当时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是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皆升士流。这样一来,旧门阀的孽子孽孙凭祖先族望便可跻身于社会上层而获得种种经济政治特权的好处就完全丧失了,他们强烈反对这打破旧框框的新规定,讥刺《姓氏录》为“勋格”,即赏军功的办法。书中有名的旧族官僚也耻于被叙录,纷纷抵制。但武则天还是借用皇权的力量,强行没收《氏族志》而推行《姓氏录》。

士族门阀在经济、政治上陆续失势之后,竭力在最顽固难变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保持自己的影响。重视阀阅,以门第取人,作为流行了几百年的落后社会意识,也确不是一朝一夕容易改造的。终唐一世,以门第相尚的风气始终有广泛的影响。但无论武则天、李义府他们出自怎样的一己私利的考虑,《姓氏录》终究代表着一股冲击旧门阀观念的新潮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大突破,对提高过去沉溺于下层的一批普通地主的社会政治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而来,要求进入官场,这是又一股生气勃勃的社会潮流。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为他们打开了闸门,借此不断培植和更新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每年吏部接纳的选人以数千上万计,每年入流人数超过一千四百,比正常需要补充的数字高出两倍,都不加控制,还在上元二年(675年)开始设“南选”,以便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选拔官员。乾封元年(666年)在泰山行封禅礼后宣布“文武官三品以

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使一批官员得以通过泛阶制度入五品、三品高官。新兴普通地主在政治上的要求得到满足。

科举制度在这二圣时期也有重要发展。咸亨年间(670—674年)以后，进士成为科举中诸科的重心。每年取士的人数比贞观年间扩大一倍，平均为二十余人，而且更加重视以文章取士，史家称这和“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有关。这政策种下了盛唐文坛繁荣的契机。比较起实际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旧制度来说，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和文坛巨擘陈子昂、刘知几等，都是这时期通过科举制度拔选出来的杰出人才。

如何驾驭整个官僚队伍，是武则天必须考虑的。她以皇后身份参政，不免还有许多不便，需要有一支亲信力量，替她沟通内外廷。曾为她争皇后位出过力的那批人，到六十年代末，只剩下李勣、许敬宗两个不久人世的耄耋老人在朝，于是她在乾封年间(666—668年)组织了“北门学士”，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文人，即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敬业等，以修撰为名，特许从北门出入禁中，除了编写署武则天名的《烈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少阳正范》、《兆人本业》、《乐书》等著作外，密令他们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显然这是皇权、相权之外，武则天自己控制的第三权力中心。从此直到武则天称帝前的二十多年中，这类似李世民的秦王府学士、李泰的魏王府学士的北门学士智囊班子，为武则天造舆论拿主意出过不少力，他们也多被擢升为三、四品高官，范履冰、刘祎之还做到宰相，长期受重用。

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唐高宗称天帝，皇后称天后，武则天的地位又升了一级。四个月後，她上书“建言十二事”，俨然是抛出了一个政纲。内容为：“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

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那些年接连灾害，京畿关中闹饥荒，又多方用兵，东征高丽、新罗，南击叛蛮，西战吐蕃，四镇废弃，穷于应付，所以有劝农息兵，尽量节俭的建议，但对百官则在官位待遇上多方照顾，以示笼络。这十二条意见涉及国家经济、军事、社会、政治许多方面，唐高宗诏准施行。可见武则天很有心计地全盘张罗国事，稳步扩充着自己的实力和影响。

#### 四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儿子们成为权势欲极强的母后继续扩充实力的麻烦。历来史书上有武则天先后杀害了自己的大儿子李弘和二儿子李贤两位太子的说法。

太子李弘“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咸亨二年（671年）以后，唐高宗一再命他监国或处理朝政。李弘发现宫中幽闭着他两个年逾三十的姐姐——萧淑妃生的义阳、宣城二公主，奏请准他们出嫁，因管这闲事惹恼了武则天，此后几次奏请违旨，由是失爱于天后。皇帝因身体不好有意传位给他，这就危及武则天辅佐丈夫执掌朝政的大权。突然，太子李弘死于洛州合璧宫绮云殿，他的死成为历史上一谜。不少史学家认为李弘是武则天用毒酒鸩杀的；也有的认为李弘一向多病，他父皇发布的几篇追悼文字皆说他死于“旧疾”、“沉疴”的突发是可信的，“沉疴(zhai, 音债)”即肺癆发作吐血正和遇鸩七窍流血的症状相类。无论怎样，李弘一死，他们母子间争权的矛盾就过去了。

继任太子的次子李贤与母后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上元三年（676年）初，李贤立为太子未久，唐高宗曾想逊位于皇后，遭到宰相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的激烈反对，这两位士族出身的官僚引经据典要皇帝“谨守宗庙，传之子孙”。唐高宗因此作

罢，一心培植儿子李贤，任命郝处俊和新提拔的李义琰两名宰相兼太子左、右庶子，辅佐李贤。李贤也招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一批学者注《后汉书》，实际是在后党北门学士之外另立太子系的宗派。唐高宗数次命他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论称之”，表现得比他哥哥更有能力，而和母后之间却存在隔阂。武则天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给李贤读，还“数作书诘让之”，李贤并不顺从。正谏大夫明崇俨“私奏章怀太子不堪承大位”，消息泄露出去被李贤知道。仪凤四年（679年）五月一天夜里，明崇俨突然遇刺身亡，李贤成为怀疑对象。搜查东宫，从马坊里查获皂甲数百领，以为是谋反的罪证。武则天不同意皇帝要宽宥李贤的想法，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李贤终于被废，幽禁起来。四年后，文明元年（684年）二月，在废唐中宗后三天，武则天派人去巴州（今四川巴中）杀了李贤。李贤成为与母后争权的牺牲品。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他们的第三子李显继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为皇太后继续过问国事。两个月后，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唐中宗被废。他让岳父韦玄贞当宰相，授与乳母的儿子五品官，和中书令裴炎顶撞起来，武则天立即命裴炎、刘祎之带禁军上殿，将唐中宗撵下宝座，废为庐陵王。她再容不得一个想握实权的人坐在皇帝位上，哪怕那个人是她的亲生儿子。

武则天严密防范儿子们，牢牢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使包围着他的儿子们的士族官僚士大夫复辟门阀旧制的活动无隙可乘。无论当时一心用在权力上的武则天是否明确想到过这一层，她同儿子们的争夺是有这样的后果的。

## 五

文明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立小儿子李旦为皇帝(唐睿宗),但居于别殿,不许参与政事。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从此到武则天下台的神龙元年(705年),其中包括天授元年(690年)起武则天称帝的十四年,史称“则天朝”(684-705年),是武则天“圣衷独断”,掌握着全部皇帝权力的二十一年。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和称帝的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光宅元年(684年)的扬州起兵、垂拱四年(688年)的宗室起兵和自文明元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长达十四年的酷吏政治。反对派官僚和李唐宗室两次发动武装叛乱,武则天则任使酷吏,以滥刑恐怖为回报。

发动扬州起兵的是以李勣(原名徐世勣)之孙徐敬业为首的遭贬谪的失意官僚。唐高宗死后政局动荡,他们以为有机可乘,举兵“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还抬出一个貌似李贤的人,扬言“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发了一篇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向武则天公开挑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他们麇集十万兵马,占了扬、润(今江苏镇江)、楚(今江苏淮安)三州,却没有渡淮北上直取洛阳与武则天决战,而是以金陵(今江苏南京)有王气,可以守江自固,掉头南下,营筑分裂割据的“霸基”去了。

武则天看到对自己极尽诽谤漫骂之能事的檄文不过微微一笑,她问明作者是骆宾王后,还可惜如此人才流落在外,说是宰相之过。行动上武则天一面果断地处决在朝中利用这一事件要挟自己退位的首相裴炎,一面派出三十万大军沿运河南下直扑扬州,在盱眙都梁山、淮阴、高邮下阿溪一路鏖战,终于大破叛军。前后四十四天,平定了扬州,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徐敬业一伙搞分裂的野心家得不到社会的同情支持,很快就一败涂地。

垂拱四年(688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并正式称“陛下”,这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要改朝换代的信息。一时盛传预定在年底举行的明堂朝会是个阴谋,待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会齐,武则天要对宗室子弟下毒手。于是李唐宗室诸王策划举兵反抗,还是以“迎还中宗”及救拔被幽繫的唐睿宗皇帝为旗号。

卷入这一事件的有以韩王李元嘉为首的宗室王公和公主驸马十余家,但因范阳王李霁出首,计划泄露,只有琅玕王李冲及其父越王李贞俩人仓促起事。李冲在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胁迫五千兵发难,因是“与国家交战”,人无斗志,纷纷逃亡,不过七日便不战自败。待李贞闻讯在豫州(今河南汝南)起兵接应时,李冲已经败死。李贞无奈,一度想罢兵赴阙请罪。武则天派十万大军前往讨伐,围城攻坚,李贞征募的七千人马毫无斗志,争先恐后坠城出降,越王见大势已去,服毒自尽。

两处宗室起兵简直都不堪一击。回想他们的祖先,从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到李唐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奕世以武功见长,但随着关陇军事贵族整个集团的衰败,他们的子孙把马上征战的看家本领也丧失殆尽了。在政治上斗输之后,兵戎相见时也敌不过武则天。至此关陇集团只好绝了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希望。这是被历史巨浪淘去的一代风流。关陇集团在其存在的一个多世纪里曾有过光辉的建树,历史铭记着他们为结束南北朝的纷乱,重新开创大一统繁盛局面的贡献。李氏一家,从李虎到李世民四代人都可为之见证。但他们既然从下层上来后又趋向与旧门阀合流,在面向未来时又代表着过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于是历史优选出武则天来取代关陇集团,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造更适应新的门阀后社会的特点,从而能比较顺利地前进。

为了给一切公开的和潜在的对手以最沉重的打击,武则天作为一个专制君主,除了动用军事机器进行镇压外,平时更多仰仗严刑酷法慑服群臣。

武则天在朝堂设铜匭，接受告密文书。规定凡有告密，官员不得过问，无论农夫樵人，一律按五品官标准供给食宿，驿送京城。告密有功者破格封官，失实者不加追究，造成“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的恐怖气氛。

武则天很快就拉起一支凶残狠毒没有人性的酷吏队伍。后来受到禁锢惩治的二十七名大酷吏中包括周兴、来俊臣等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们编写《告密罗织经》，教唆其徒陷害无辜，设计出“定百脉”、“求即死”、“死猪愁”等刑具和“驴驹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方梁压髀”等骇人听闻的酷刑。凡下制狱者，几乎无一生还。那是专制政治历史上极黑暗极恐怖的一页，武则天本人因而也难逃“千古未有之忍人”的恶名。她这一套还被后代的专制独裁者传承，流毒深远。

从文明元年(684年)杀李贤、裴炎起，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杀李昭德的同一天来俊臣弃市为止，十四年间可以统计到的四十余宗大案里，李唐宗室近支被诛杀殆尽，特别是有资格同武则天争夺皇位的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除了武则天自己生的李显、李旦二人外，无一幸存。十四年间任职宰相五十八人，被杀被贬的各二十一个，占72.4%，误伤了如刘祎之、范履冰、岑长倩等自己的一批亲信力量。而冤杀禁军主将程务挺、王方翼、李孝逸、黑齿常之、张虔勖、泉献诚等，又使军队战斗力大损。由于随时有被酷吏捕杀的危险，朝官每上朝时往往战战兢兢地同家人诀别：不知能再相见不！他们认为武则天“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武则天因此丧失群臣的信赖，一批旧臣难忘中兴之计，酝酿政变，埋伏下最终导致她下台的危机。

历史地全面地看，这场酷吏的恐怖政治主要是针对宗室贵族和上层官僚的，除了派六道使到地方杀流人和王弘义杀做邑斋的耆老等少数事件，对社会下层骚扰不大。武则天的做法当时还取得了一些官吏的谅解，他们也认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而



“苍生晏然，紫宸易主”，是一“大哉伟哉”的成功。武则天在酷吏猖獗时注意悉心保护了徐有功、魏元忠、狄仁杰等一批直臣，而当皇权在她手里逐渐巩固时，她便陆续处置了包括周兴、来俊臣在内的大部分酷吏，放弃了酷吏政治，并在生前下诏平反了所有冤狱。我们还应该看到，搞酷吏政治的滥刑和当时武则天破格用人的滥选相辅相成，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更迭。在这个变动中，大量普通地主涌上政治舞台，不少旧门阀士族被清除出去，士族门阀世袭的政治特权无从维系，新兴普通地主得到了在政治上大发展的机会。没有完全被酷吏政治的血腥气淹没的社会，还是挣扎着蹒跚地迈出了自己向前的步履。

## 六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和称帝的则天朝时期，国家的治理颇有成效。

武则天一贯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北门学士编写的《兆人本业》通过到朝廷述职的朝集使们颁行各地指导生产，她要求刺史县令“敦劝农桑，均平赋役”，以“田畴垦辟，家有余粮”作为官员考核擢升的基本条件。据统计，则天朝二十一年共兴修水利二十二项。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反映沙州、西州也都有发达的灌溉系统，河陇一带的屯田也取得成功。贞观前期，河西州县萧条，户口鲜少，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这时由于郭元振屯田成功，粮价大跌，由一斛数千钱降为一缣可换数十斛，凉（今甘肃武威）、甘（今甘肃张掖）一带“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全国的人口，在神龙元年（705年）即她退位去世那年达到六百一十五万户，比贞观时期增加一倍。若从永徽三年（652年）的三百八十万户计算，五十三年中递增率为千分之九点一。半个多世纪里保持住这样的增长率，反映出经济稳步地发展着，这就为紧跟着出现的开元盛世准备了直接的经济条件。

为了培植亲信,改造官僚队伍,她继续破格用人,科举制度也有发展。载初元年(689年)她亲自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首创殿试。长安二年(702年)又初设武举,选拔军将。科举考试时用“糊名”等办法防止作弊。还不时下诏求贤,允许自举。她待人能进用不疑,求访无倦,得官虽易,课责却严,“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最著名的如姚崇、宋璟,这时都已被她破格提拔担任要职,后来他俩成为开元名相。所以又可以说,武则天还为后来的开元之治作好了干部方面的准备。但她这时选拔上来的官员太多,正员已满,就作员外官安置,最后员外官数达二千,不仅增加财政负担,官滥也影响吏治,遗留到开元初成为一大弊端。

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唐高宗在世时即比较紧张。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吞灭吐谷浑后,又于咸亨元年(670年)攻陷西域十八州及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其后唐军还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切吉平原)和青海湟川接连大败。高宗末年,西突厥连和吐蕃,侵逼安西,不断举兵反唐,四镇一再易手。调露元年(679年)东突厥二十四州酋长皆反,三十年无事的北边又烽火连年。东边,唐军平高丽后不过八年,便于上元三年(676年)撤回辽东。武则天临朝之初,各方都不安宁。

对叛唐复立的东突厥,武则天除了调动军队进行防御战外,还以极大的耐心和宽容争取和解,终于在对契丹作战时得到突厥默啜可汗的配合,突厥军两次突袭契丹后方,使骚扰河北的战火很快平息下来。武则天授予默啜“立功报国可汗”的称号,并归还其咸亨年间安置在丰(今内蒙古临河东)、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灵(今宁夏灵武西南)、夏(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朔(今山西朔县西南)、代(今山西代县)六州的突厥降户数千帐,又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后来还建立了和亲关系。武则天当时虽未能完全遏制突厥的不断侵掠,但由于比

较重视发展内地和突厥族间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的交换关系，为天宝初年突厥再次来归，并最终融合在我们民族大家庭中准备了条件。

对一度依附吐蕃侵逼安西的西突厥十姓，高宗末年接连派裴行俭、王方翼讨平。垂拱(685-688年)以后，因无力抵御东突厥的攻掠，西突厥继往绝可汗斛瑟罗率领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武则天改封他为“竭忠事主可汗”，后来用他镇守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

吐蕃自松赞干布和禄东赞死后，在西边为患三十年。由于大规模屯田的成功，加强了西北边防的实力，武则天很有战略眼光地派军队同吐蕃反复争夺安西四镇，终于在长寿元年(692年)由王孝杰最后收复了四镇，派三万汉兵镇守，以拱卫西北边防，维护东西方间丝绸之路的畅通。对吐蕃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和分十姓突厥之地的无理要求，武则天派郭元振调查考察，最后采用郭元振的建议，向吐蕃声明：置四镇就是为扼其东侵，若吐蕃实无东侵意，可归还吐谷浑诸部和青海地为交换，婉转地拒绝了。武则天并连年派出和亲使，作出友好的高姿态。怀念松赞干布一文成公主时代唐蕃亲密关系的吐蕃人民，因而深怨好战的论钦陵，终于这个三十年来破坏唐(周)蕃关系的罪魁在内讧中自杀。

东北的契丹族，因不堪忍受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翔(hui,音会)的欺凌，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起兵反抗，攻陷营州、冀州(今河北冀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幽州(今北京)、赵州(今河北赵县)，一路杀掠屠城，收复四镇的名将王孝杰也战死。由于东突厥的配合，奚族反水，才平息了这一事件。事后武则天赦免的契丹勇将李楷固、骆务整曾建功击平契丹余党。但开元以后这个方向的民族纷争一直不断，由于唐玄宗处置不当，酿成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极盛的峰巅一下子跌落下来。

总之在以上几个主要方向的边防和民族关系上，武则天时期

采取各种手段努力镇抚,有一定成效,但问题也很严重,时时给各族人民带来惨痛的劫难。不过就整个形势的发展而言,治边的问题历代层出不穷,不能完全归罪于她个人的失误。

## 七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一场突发的宫廷政变中下台,唐中宗李显复位,改周为唐,一切又回到原来李唐王朝的轨道上。

武则天统治末期,原来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比较尖锐的矛盾,即由滥刑造成的武则天和她的大臣之间的矛盾以及李武两姓争夺皇位继承权的矛盾,已因诛杀来俊臣等酷吏和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而缓和下来,一时朝野庆泰,人们若重睹和煦的阳光,政治气氛轻松活泼,那么为什么又爆发了推翻武则天、拥戴太子李显的政变呢?问题出在幸臣张易之、张昌宗身上。武则天晚年重用二张,在统治阶级内部酿成新的争权斗争,导致政变的爆发。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太平公主把“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的张昌宗荐给母亲武则天。张昌宗又把他的哥哥张易之也拉进宫里。兄弟俩成为僧怀义(冯小宝)和御医沈南璆之后的又一代男宠,连权势炙手的武承嗣、武三思等一班贵戚重臣都“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在他俩面前像门生家奴奉主一样恭敬地称爷。

圣历二年正月(698年12月),武则天为张易之置控鹤监,以张昌宗、吉顼、田归道、李迥秀等为控鹤监内供奉。同时,武则天又命张昌宗和李峤为修书使,召张说、徐坚、沈佺期、刘知几等二十六人在内殿修《三教珠英》,是一部关于儒、释、道的百科全书。控鹤监和修书网罗才能文学之士参与,类似以前设北门学士包含的政治目的,是想以二张为核心再形成一股新的亲信力量。朝臣中一

批趋炎附势的人物也投靠二张,其中包括吉顼、李迥秀、李峤、苏味道、杨再思、房融、崔神庆等宰相,占当时曾在相位人数的三分之一。武则天复立庐陵王为太子这样的大事,也是经二张、吉顼策划说项而决定的,由此可见他们干预政事之深,绝非等闲之辈。

二张得势后,经常打击不顺从自己的大臣乃至王公贵戚,武则天为之贬逐多年最受信重的宰相魏元忠和张说及杨元禧、杨元亨兄弟,长安元年(701年)又杀了私下议论武则天委政张易之兄弟的李显长子邵王重润(懿德太子)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夫武承嗣子魏王武延基。官员们则利用张氏兄弟贪赃枉法和引术士占相等案件,绳之以法,可是武则天一再将他们赦免。诉诸法律解决不了问题,一场政变就不可避免了。

策划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宰相张柬之、崔玄晖和中台(尚书)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等五人,政变成功后他们都封王,所以历史上称这次政变为“五王政变”。另一名宰相姚崇,是重要的幕后人物。中央禁军中,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和左、右羽林卫将军杨元琰、李湛、薛思行、赵承恩等参与政变,五王中敬暉、桓彦范也有将军衔。政变集团还联络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和武则天外家的杨执一、杨睿交及洛州长史薛季昶等人。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乘武则天卧病不起,张柬之等发动了政变,首先顺利占据了宫城正北的玄武门,突入宫中,直奔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在廊下当即将张易之、张昌宗处死,而后又杀了他们的兄弟张昌期、张昌仪、张同休,他们的党羽流放外地的计有韦承庆、房融、崔神基、李峤、阎朝隐、宋之问、杜审言等数十人。当时他们回答武则天,政变是因张易之、张昌宗谋反,奉太子令诛之。武则天看到李义府子李湛和她亲自提拔起来的崔玄晖也参与政变,非常生气,李湛受到责备,愧无以对。

政变的性质是反二张的,从根本上说,不是反武则天的,参与

政变的许多人物,包括太子、太平公主、姚崇等,都和武则天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因为二张弄权,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政变为自安计。但是既然政变已经成功,完全控制住局势,就顺便把武则天请下台。次日,以武则天名义下《命皇太子监国制》,第三天宣布传位太子,第四天唐中宗复位,武周政权至此告终。

当年武则天搞酷吏政治,虽然一时维护了她的统治,但这件很不得人心的事在武则天君臣关系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表面上后来融洽起来的君臣关系下面埋伏着信任危机,武则天的晚年政治上实际是非常孤立的。内心的空虚寂寞使她不得不在政治上求助于二张,而这样做又使她陷于更加严重的孤立,最后二张为她招来了政变。这位在半个世纪政治斗争中的常胜者,终于没有逃脱悲剧性的结局。政策在社会上必然的反馈使她自食恶果。

这一年十一月,武则天悄悄地死于洛阳宫城西南的上阳宫仙居殿。有人反对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乾陵,唐中宗没有理睬,亲自将灵柩护送回长安,隆重地为母亲举行葬礼。复立庐陵王以后武则天母子间前嫌俱释,这一成功的决策既安定了当时政局,也为自己身后赢得哀荣。

乾陵是我国唯一一座一对皇帝夫妇的合葬陵,陵前高耸着一块武则天纪念碑。这庄重的巨碑意味深长地一字不镌,有的说是因为女皇功绩盖世,无法以文字表达;有的说是因武则天功过是非当时人难以结论。这座闻名于世的无字碑栉风沐雨,千余年来昂然挺立,它似乎象征着武则天对自己一生事业的信心,是有意留下空白,任凭世人评说吧!

(原载《中国历代明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1990年第二次印刷)

## 三让天下的唐睿宗

皇位的争夺酿成酷烈的残杀,是中外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常事。即如我国隋唐之际,百十年间便有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刀兵相加喋血宫门的一系列事变,以至前后七八代皇帝无一按嫡长子继位的原则传承。这期间却又出了一位三让天下的天子,他的经历可算是政治史上一段奇闻。

唐睿宗李旦(662-716年),武则天的少子,唐明皇的生父,好像是淹没在这两位著名皇帝之间,在历史上寂寂无闻。确实他本人没有多少建树可言,他一生的使命好像就是拱手让位,一让母亲,再让兄长,三让儿子,自己与世无争,在险恶的政治斗争旋涡中急流勇退,只图保全自己,却成就了别人,让母亲武则天做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让儿子李隆基开创了号称天下升平的开元之治,自己瞑目时心满意足地看到这个盛世出现在人间。人们回过头来再看他便不难明白,他不是个低能的笨人,正是他一再谦让皇帝的尊位,成全了两位有为君主,使历史顺应潮流前进,使盛唐社会步入繁荣。他以自己独特的让位于贤能的方式尽了历史责任。正像庙号所表示的,他不失为一个明智聪睿的皇帝。

### 一、让母亲武则天称帝

唐高宗初年,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摧垮长孙无忌集团,结束了

关陇军事贵族把持中央政权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要求复辟门阀特权的旧势力和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卫道者们随即勾结起来反对武则天，他们往往奉太子为号令同她对抗，武则天则回报以滥刑恐怖。斗争的血腥气直弥漫到她的家庭，武则天同一个个儿子的关系不断处于剑拔弩张的危机中。长子孝敬皇帝李弘不以寿终；次子章怀太子李贤被杀于巴州；嗣圣元年（684年）三子唐中宗李显被废黜；李旦奉母命即位，可是叫他住在别殿，不许干预政事。李旦小心翼翼地做着母后掌握中的傀儡皇帝。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不满足于皇太后临朝称制的权力，要当皇帝。李旦知趣地上表劝进，请求改姓武氏，顺从地交出李唐天下。于是女皇登基，改唐为周。史称“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旧唐书·睿宗本纪》）。

从个人而言，他处在武则天多年严密监护下，孑然一身，全无与要当女皇的母亲抗衡的能力，让位是迫不得已的。降为皇嗣后更朝不虑夕。长寿二年（693年）因一个叫团儿的户婢诬告，武则天秘密杀掉他两个妃子，即元配夫人刘氏和玄宗生母窦氏，尸首都下落不明。“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通鉴》卷205），可怜巴巴地眼看着妻子被害，只能暗自吞泪，不敢稍有愤怒情绪外露。当时还有裴匪躬、范云仙两名旧臣去探望他，便被以“私谒”罪腰斩于市，从此公卿百官皆不得见，李旦完全被软禁起来。嗣后酷吏政治的恐怖直接降临头上，有人告他“潜有异谋”，武则天竟派头号酷吏来俊臣主持审讯，身边的人忍受不住酷刑要胡乱招认，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剖胸以明皇嗣不反，拼着性命把他救下。当年二哥李贤曾拿《黄台瓜辞》给武则天看：“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旧唐书·承天皇帝俊传》）也许武则天就是因为不愿“抱蔓归”才没对小儿子下毒手。要在这样处境下的李旦反抗武则天是不实际



的。

以国事而言,武则天正在同形形色色的保守势力作殊死斗争,创造着女皇治国的宏伟业绩,作为亲儿子自然大可不必去冒犯她,妨碍她,应让她毫无后顾之忧地拼搏。武则天一生的成功中不也可以说有这位甘心退避三舍的儿子默契配合的贡献吗?

## 二、让兄长李显承大位

武则天做了皇帝,她本家的武姓子侄封王,武承嗣和武三思极力钻营谋夺太子位,将来天下归属谁家的争夺,在李武两姓之间激烈地开展着。武则天动摇反复许久,终于看清多数官僚和少数民族首领倾向李氏,天下思唐,人心难忤,便于圣历元年(698年)从房州迎回被黜为庐陵王的李显,李旦立即明白母亲的意思,固请逊位,于是哥哥又当了皇太子。

复立庐陵王之后,持续了八年的李武两姓之争彻底平息了,被幽闭在宫中十余年的他们弟兄的几个儿子也从祖母的敕杖下恢复了自由,武周之后李唐再兴的大局明朗,这件事和结束酷吏政治一道使政治气氛一时轻松下来,这是武则天晚年非常明智的重大决策,李旦又是以充分理解和豁达的姿态支持了母亲,诚心让位于哥哥,自己安居藩邸,“深嘉清闲”(《全唐文》卷18《付史馆纪皇太子等劝进诏》)。尽管李显是一个昏懦的庸人,但当时需要遏制武姓诸王夺权的阴谋,安排好武则天之后权力的平稳过渡,李唐宗室必须齐心协力,李旦逊位其兄,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积极行动。

神龙元年(705年)五王政变后唐中宗复位,念兄弟逊位之义,要立安国相王李旦为皇太弟,李旦又一次辞让这副君位置。看到皇帝纵容韦后和安乐公主,政治一塌糊涂,李旦并辞去太尉和相职,超脱于五王与韦后、武氏势力纷争的乱局。

神龙三年(707年)节愍太子李重俊(中宗三子)兵变死后,安

乐公主诬相王、太平公主兄妹俩与节愍太子连谋举兵，请收制狱。皇帝命萧至忠审鞠，萧至忠泣奏，诉说相王为皇嗣时固请以天下让陛下曾累日不食的故事，“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岂不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罗织！”（《唐会要》卷 62《谏诤》）。唐中宗被说动，不再审理此案。

李旦是聪明的，他接受几个哥哥的教训，在权力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淡泊，素称“宽厚恭谨，安恬好让”，这和他的小儿子、小弟弟的身份一起救了他，“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通鉴》卷 208）。他保存自己，不只为李唐政权保存了一个众望攸归的团结核心，将来需要时出来收拾局面安天下者非他莫属。这位安国相王始终操持着可以以退为进的主动权。

### 三、让儿子李隆基登基

景龙元年（710 年）唐中宗被韦后、安乐公主母女毒死，韦后仿效武则天临朝称制，藉口叔嫂不通问的礼法，罢相王政事，“韦氏宜革唐命”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月李旦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率兵诛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众约今夕共立相王”。无论这次李旦有没有直接插手，事变是打着“以相王安天下”的旗号进行的。

事成，睿宗再次登上皇位，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协心革中宗之弊，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通鉴》卷 209）。

这时韦、武两党势力被铲除干净了，太平公主又起来干政。她和李隆基一起发动平韦后的政变，对唐睿宗的复立有大功。皇帝对这位称“镇国太平公主”的妹妹非常尊重，凡政事都问“三郎”和她，对她言听计从，一时“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很快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位武则天的小女儿沉敏多权略，又是一个武则天式的人才，她稍一得势，便盯上了号称英武的太子李隆基，挑

峻宋王李成器(唐睿宗长子)、幽王李守礼(李贤次子,因李弘无子,李贤长子李光顺已死,守礼时有唐高宗长孙身份)争太子位,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便自己当权。她公然向宰相们提出“易置东宫”,撤换李隆基。

姚崇、宋璟为唐睿宗献计,将宋王、幽王和太平公主移居外地,解除对太子的直接威胁,并使太子监国,以平息又要发生政变的流言。太平公主被安置在蒲州,不胜恼怒,太子惧,奏姚崇、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睿宗手下留情,只将姚、宋贬为外州刺史,“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通鉴》卷210)。太平公主搬回长安,安插亲信,七人的宰相班子中,新进用的窦怀贞、崔湜、岑羲、萧至忠等四出其门,李隆基不安,提出让太子位与宋王李成器。

先天元年(712年)太平公主使术士说唐睿宗,以帝座及前星有灾,象“皇太子合作天子”,意在挑拨。唐睿宗“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早有传位之意,看到妹妹和儿子争夺激烈,他既想保住儿子,又不忍心对曾同自己共患难的胞妹下手,断然作出传位太子的决定,自己急流勇退,以求两全,将儿子扶上皇位,断绝太平公主争位之念。挑拨者弄巧成拙,弄假成真,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一齐力谏劝阻皇帝,太子惶恐疑虑不敢从命,可是皇帝的决心不变,下制传位。不过太上皇仍兼理军国事,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照旧擅权用事。睿宗形式上的让位并不解决问题,玄宗和太平公主都在准备兵变。太平公主暗定在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初四动手,早她一天,七月初三唐玄宗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发兵杀太平公主党人,公主被赐死,睿宗交全权与玄宗,当年改元。开元天子召回姚崇、宋璟辅政,从此宏图大展,中古社会走向鼎盛阶段。

三十年来饱受政治风云惊扰之苦的睿宗皇帝如释重负,交权时他轻松地诉说自己终于能够“闲居大庭”,“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全唐文》卷19《命皇帝处分军国政刑诏》)。他高兴自己一贯的

“无为无事，岂不美欤”（《唐大诏令集》卷 30《睿宗命皇太子即位诏》）的心愿得到满足。确实世界上能做事的人和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何必一定要揽在自己一人手里呢？唐睿宗有两个女儿金仙公主、玉真公主都出家当了道姑，可知他一家的思想是深受道家影响的。

开元四年（716 年）太上皇帝李旦去世。遗诏中回顾自己“三为天子，三以天下让”（《唐大诏令集》卷 11）的往事，平静地离开人间。埋葬这位平凡而又非凡的皇帝的桥陵已列入近年发掘规划，我们拭目以待这座规模宏伟的陵园打开之后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他的故事。

（原载《中外历史》1987 年第 1 期）



## 开元名相——姚崇

附：《“十事要说”考》

“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sup>①</sup>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二人相得，与魏徵等一起，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而辅佐唐玄宗，成就了“开元之治”的功臣，首推姚崇、宋璟。

姚崇进士出身，受武则天破格提拔，“超迁夏官(兵部)侍郎”。又因狄仁杰推荐，担任相职。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出将入相，官至首辅。他一生政治活动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的，是位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历史人物。

在姚崇出生前后的贞观到永徽、麟德年间，社会经济已逐渐从隋末的丧乱破败中恢复过来，由于频岁丰稔，斗米才值数钱，史称当时“海内康宁”、“百姓阜安”。但到他成年以后，国家大统一以来蓬勃向上的发展险些被动荡不安的政局破坏，酷吏政治，二张专权，韦后、安乐公主到睿宗时期太平公主干政，制造了许多混乱。开元元年(713年)以前的八年中，接连发生七次政变，给社会生活笼罩了一层恐怖气氛。姚崇经历了这一系列事变的全过程，时局的变化也影响到他个人的荣辱进退。而姚崇对“开元之治”的贡献，首先就在拨乱反正，消除了武后时的酷吏、二张专权和中宗时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 221，中华书局标点本 6725 页。

期韦后、安乐公主到睿宗时期太平公主的干政,使政治恢复安定,为“开元之治”的形成创造了首要前提。

酷吏政治素来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武则天文明元年(684年)以后的十四年中更是搞得人人自危,自王公以下被害的人殆以二万计。圣历元年(698年)姚崇同武则天谈到诏狱冤滥情况时直言:“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为保“朝廷义安”,他要求得“告状”不须推问,自己愿“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sup>①</sup>,力劝武则天结束酷吏政治。这时周兴、来俊臣已死,武则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统治权力的目的已达到,正想改弦更张,调整同群臣的关系,更兼姚崇替她回护开脱的话也非常入耳,乐得顺水推舟卸下“淫刑之主”的恶名,便采纳了姚崇的谏议。

开元二年(714年)二月,朝廷公布第二批酷吏名单(第一批名单是神龙元年三月公布的),给酷吏以罢官,终身不得录用的处分。那时姚崇正在首相任上,这道名义上是皇帝下的敕令,也可以视为他主张采取的行动。经过这样一再打击,至少终唐之世酷吏没能死灰复燃起来。

继酷吏之后,影响政局稳定的主要是二张集团,那是武则天晚年在自己感到颇为孤立的心境下新扶植起来的一股政治力量。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委以往事,以幸臣身份弄权,“贵宠逾分”,“势倾朝野”,贪赃枉法,秽声载道。他们纠集党羽,排除异己,朝臣分裂为追随二张和反对二张的两派,这场斗争最后导致“五王政变”,以二张集团的毁灭和武则天下台告终。姚崇在消灭二张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姚崇兼知春官(礼部)尚书事受理僧

<sup>①</sup> 《旧唐书》卷96《姚崇传》,中华书局标点本3021-3022页。《资治通鉴》记为神功元年(694)事,今从《唐会要》卷41《酷吏》条说。

人告张易之兄弟往原籍定州移僧和私置寺的案件,姚崇依法“断停”,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张易之“屡以为言”,姚崇不肯通融,因此被“易之所潜”,降为司仆卿,不要他管礼部的事了<sup>①</sup>。九月姚崇又被任命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派了外差。当时突厥默啜可汗正和朝廷和亲联姻,灵武一带暂相安无事,所以姚崇此行,实是二张的一种别有用心的安排。临行前,姚崇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堪为宰相,“惟陛下急用之”。十月,张柬之即得到任命,这是姚崇把他放到代理自己指挥反二张斗争的位置上。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姚崇从灵武军回到东都,张柬之等立刻找他密谈,而后就发兵进宫,诛杀二张,一举成功。姚崇名虽不入五王之列,他神秘地居于幕后,实为政变的一个决策人,殆是无可置疑的。

二张被诛后,唐中宗复位,韦后“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sup>②</sup>,韦后小女儿安乐公主图谋“皇太女”位置,武三思勾结上韦后,继续用权,政局更加混乱。姚崇离开相位,到地方上任刺史。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唐中宗被韦后母女毒死,李隆基发动兵变攻杀韦后、安乐公主。唐睿宗登基后,姚崇被召回复相职,他与宋璟“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sup>③</sup>。但这一时期的努力又被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矛盾斗争打断。武则天的能干的小女儿太平公主权势膨胀,同太子李隆基的矛盾激化。姚崇、宋璟谋将太平公主和宋王、幽王调离京城以解除对太子的直接威胁,并支持张说提出的使太子监国的办法平息流言。这一下激怒了太平公主,太子在惶恐之余竟以“离间姑、兄”的罪名要皇帝处姚、宋以“极法”。

① 《旧唐书》卷96《姚崇传》。据《资治通鉴》、《旧唐书·则天本纪》与《新唐书·宰相表》,姚崇知春官尚书事和改为司仆卿都是八月事。

② 《资治通鉴》卷208,658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9,6652页。

姚、宋两人再次被贬为地方刺史，“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sup>①</sup>。不久李隆基提出让位于大哥宋王成器，太子地位动摇。唐睿宗被太平公主和太子间的矛盾困扰，想用自己急流勇退的办法保住儿子，于是在先天二年（712年）传位给太子。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与野心勃勃的太平公主的矛盾并没有缓和，双方都在军事上作好了准备，结果是唐玄宗提前一天下手，杀掉太平公主和追随她的四个宰相，还用半年时间穷治其枝党。不久姚崇又回朝执政，用过去提过的办法，把李成器（睿宗长子）、李成义（睿宗第二子）、李守礼（李贤太子第二子，实际上已是高宗长孙身份）等可能威胁玄宗帝位的诸王都分派到外地当挂名刺史，严禁大臣私下结交诸王和僧尼道士，把心怀怨望可能生事的官员迁往南方远州。

纷乱的政局终于安定下来，这安定的局面真是来之不易。在为之奋斗的许多仁人志士中，姚崇是最杰出的一个。说到姚崇对“开元之治”的贡献，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从这时起到天宝末，唐玄宗一代有四十来年基本安定的日子，那是中国中古社会鼎盛时代唐代的黄金期。就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

姚崇对“开元之治”的第二点贡献是在政策方面。在实现大治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财政经济措施，妥善处理了国内各族之间及对外的关系，为年轻的唐玄宗和开元之治设计了一套适宜的施政纲领。

开元时代的基本国策，沿用隋唐相承的一贯制度，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科举制、中央政府组织的三省六部制、地方州县制和官员的考核制度等等。可是历经武则天和唐中宗两代，社会时弊甚多，急需革除和做某些政策上的调整，特别要对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准则作出若干明确规定，才能避免重蹈以前政局混乱的覆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210，6664页。



辙。

先天二年十月,即太平公主事平后的第三个月,唐玄宗在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田猎时召见姚崇,亲自把早就要委以相职的意思告诉他。在这次会面中,姚崇分析了当时形势,作“十事要说”,提出了一整套办法,深得唐玄宗赞赏,当即拜相。这是姚崇在两次罢相以后,第三次受命担任这个重要职务<sup>①</sup>。

“十事要说”的基本精神是不搞酷吏政治,不许国亲外戚幸臣宦官干政,整顿机构,裁撤冗员,提倡礼制法治,协调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爱惜民力,杜绝额外征敛,改变奢靡浪费和崇尚信仰的社会风气。“十事要说”对当时政治情况有很强的针对性,反映出姚崇平生的思想和抱负,既可能使皇帝乐于接受,又实际体现于开元政治,因此这件事是可信的,而且应将“十事”的原则提到“开元之治”施政纲领的高度来看待。正是按这些原则进行的调整,解决了武则天 and 唐中宗统治时的弊政遗患,迎来了“开元全盛日”。

姚崇对“开元之治”的第三点贡献是他在首相任上管理全国的卓著政绩。可以举两件事来看他的作为。

一件事是抑佛。开元二年正月,姚崇奏沙汰私度僧尼令还俗,“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sup>②</sup>。这年二月、七月连下数敕:“毋得创建佛寺”,“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sup>③</sup>。这是“十事”之一“寺观宫殿,止绝建造”的实施。

① 《唐太诏令集》卷44《姚元之同三品制》即这次任命所下制,但记为“先天二年六月”,有误,据《升平源》:“即诛太平,方任元崇以相,进拜同州刺史。”姚崇在同州任上赴新丰应召、拜相,应在七月诛太平公主事后。今从《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纪、传、表。

②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诸书记沙汰僧尼数字不一,旧传、通鉴及《册府元龟》卷313《宰相部·谋猷三》同新传,旧纪曰“二万余人”,《唐会要》卷47《议释教上》曰“三万余人”。

③ 《资治通鉴》卷211,6696页、6703页。敕文见《唐大诏令集》卷113、《唐会要》卷49《杂录》。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我国,南北朝时盛行起来,北齐、北周合计人口不过三千万<sup>①</sup>,僧尼数竟达二三百万<sup>②</sup>。佛教在唐代继续盛行,危害很大,故唐朝有几次反佛斗争,以会昌灭佛最著名,姚崇抑佛也是重要的一次。佛教信仰的传播在唐宋以后绵延不绝,但是宗教势力在我国始终没有发展到像世界上许多中世纪国家里那种政教合一的地步,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人民的毒害还是有所限制,除了有孔孟儒教抵制等原因外,历代不断的反佛事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姚崇抑佛颇有一些见地。他虽无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但能借鉴历史,屡用后秦、北齐、梁武帝、胡太后及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安乐公主等人,或倾国造寺,或广置僧徒,最后都不免国灭家破身败名辱为天下所笑的事实,宣传抑制佛事。他曾对唐玄宗说:“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sup>③</sup> 这些思想在他的遗令中有充分发挥<sup>④</sup>,是针对武则天、唐中宗以来,“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的严重问题的<sup>⑤</sup>。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的政策,使佛教迷信活动有所收敛,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开元之治”的好处都是明显的。

唐代佛教,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许多派别,兴衰消长殊不相同。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弟子创立法相宗,他本人被唐太宗授“御弟”身份。可是法相宗生搬印度经典,教义繁琐,很快

① 《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户口盛衰》记齐被周灭时有口二千万,北周大象中有口九百万,北周此数必不包括北齐旧境口数,故合计之。

② 据何兹全先生《辩证录》、《释氏通鉴》统计,北齐僧尼三百万,北周二百万。转引自《禹贡》第二卷十期杨效曾《汉末至唐户口变迁的考察》。

③ 《资治通鉴》卷221,6695页。

④ 姚崇遗令见《旧唐书》卷96《姚崇传》,3026-3029页。

⑤ 《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3159页。

就衰落下去。大致和姚崇是同时代的惠能正式建立禅宗，一反旧佛教的繁文缛礼和偶像崇拜。惠能主张：“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sup>①</sup> 禅宗七家之一的成都保唐寺无住，连“礼忏、转读、画佛、写经，一切毁除。”<sup>②</sup> 禅宗鼓吹：佛不在外，于心求之。只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确是向人们散发廉价地进入天国的门券。这个新宗派从佛教内部冒头以后的发展特点，也许也可以从姚崇等当权派政策的影响中找出一些根由。

另一件事是灭蝗。开元三年、四年，山东（今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发生蝗灾，在前两年连续岁饥之后，如果再酿成大灾，事情就非同小可了。姚崇派出御史分道杀蝗。这样做居然在朝廷和地方官中引起一片反对，都说蝗是天灾，不使用人力驱除，“杀虫太多，有伤和气”<sup>③</sup>。姚崇举历史上两次蝗灾为例，因为不敢灭蝗，以致苗稼草木都被蝗虫吃光，闹出人相食、牛马相啖毛的惨剧，说明灭蝗“事系安危”，再次以“在身官爵”向皇帝保证除蝗成功。姚崇严厉警告迟疑不肯灭蝗的地方官，督促他们行动。这次灭蝗，汴州（治今河南开封）一地用姚崇主张的焚瘞之法就获蝗一十四万石，终于战胜连年蝗害，没有出现大饥荒。此事已有许多文章论及，姚崇之正确自不待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宰相，在力排众议办这件事时，挂念“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还表示，如果天谴降祸，“愿独自承当”。这倒是真够难为他的。

姚崇应玄宗之请复出执政的时候，国家的情况很不妙，多年昏乱政局造成的后果严重。景龙以来，“国家租赋，太半私门”<sup>④</sup>，国库空虚，财货匮乏，更兼水旱灾害，“粒食踊贵……宿卫兵至有二日

① 转引自范文澜《唐代佛教》71页。

② 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38页。

③ 卢怀慎言，见《旧唐书》卷96《姚崇传》，3024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三年（709）韦嗣立疏。

不得食者”<sup>①</sup>，国子监学生也因吃不上饭，在麦熟前“暂停课艺”<sup>②</sup>，“百姓食犬彘之食者，十室而九”<sup>③</sup>。在重敛苛征下，农民无心生产，逃亡过半，“一夫耕而供数百人食，一妇蚕而供数百人衣”<sup>④</sup>。经济恶化的同时，阶级矛盾和民族关系也都相当紧张，社会已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开元初又岁饥灾害连年，姚崇这时接手治理国家，他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十来年的努力，国家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彻底改观了。开元三年秋，“四方无事，百谷有成”<sup>⑤</sup>；又十年，因累岁丰稔，海内富实，已是一派太平景象了。杜佑《通典》关于开元十三年社会情况的一段文字和《新唐书·食货志》的有关叙述，常为人们引用。那时“天下无贵物”，长安、洛阳两京米斗不过二十文，青、齐间才三五文，绢价稳定在一匹二百文上下。“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正如元结所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sup>⑥</sup>巨大的社会财富是农民创造的，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调动起来了。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表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社会从濒临绝望的逆境一下子恢复了蓬勃向上的生气，唐玄宗和姚崇他们手中似乎有回天之术，或者说那就是“十事要说”在社会实践中体现的威力。姚崇作为“救时之相”的美名也正是得之于此。

① 《册府元龟》卷 317《宰辅部·正直门二》景龙二年苏瓌奏。

② 《全唐文》卷 16 中宗《集学生制》。

③ 《册府元龟》卷 544《谏诤部·直谏门十一》神龙初宋务先疏。

④ 《唐会要》卷 62《御史台下·谏诤》景云二年(711)韩琬疏。

⑤ 《唐大诏令集》卷 80《放国兵赦》。

⑥ 《元次山集》卷 7《问进士第三》。

如果说“贞观之治”主要指一种比较开明的政治局面,“开元之治”则是古代政治经济全面繁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大治。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创造的灿烂的文明,留下光华灼灼令人眩目的珍贵遗产,使我们伟大民族为之而振奋、骄傲。那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自然有前代的,特别是唐太宗、武则天时期逐步发展打下的基础,但它在开元前期便迅速出现,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位开元政纲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开元盛世的第一任首相姚崇的卓越贡献。

姚崇对“开元之治”的第四点贡献是他选择和推荐了自己职务适当的继承人,由宋璟很好地接替他,主持和推进了开元治业。

在历史上要做好一件事情,常常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力量就能办到的,总得上有靠,下有帮,生前有人协助,身后有人接办。姚崇“荐贤自代”,在这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宋璟对于姚崇,正是这样理想的合作者。

从史籍记载上看不出这两人有什么私人交往,在职守上却是秉公行事,密切配合。唐睿宗景云初年,姚崇、宋璟同在冢司,有过一段颇为成功的合作,但不多时就被太平公主打断了。唐玄宗开元四年末,姚崇因失误离开相位时“荐宋璟自代”。宋璟从广州刺史任上调京,接任宰相后又主持全国政务四年。他执政的实际情况表明,“十事”原则继续得到认真贯彻。司马光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sup>①</sup> 开元之治在他们的坚持努力下实现了,姚宋二人的名字也因此一起彪炳青史。

最后不妨从姚、宋二人品格的差异上来给姚崇一点批评总结。司马光上面那段话中说姚、宋“二人志操不同”一句不尽妥当,应该是志同操不同。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 221, 6725 页。

姚崇一生从政为人,大节上是好的。处在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中,姚崇掌握分寸,进退得宜。比如酷吏开始猖獗时,姚崇已在刑部或兵部供职,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和酷吏们死争硬碰,只是到狡兔死,走狗烹,武则天杀掉周兴、来俊臣,已有意思废弃酷法峻刑时,才极言罗织滥刑的危害,促使武则天痛下决心就此结束酷吏政治再没翻改。既把事情办了,又无伤于自己,还得到赏赐和提拔。

姚崇得到武则天进一步信任以后,在同二张斗争时,态度比以前明朗。处理张易之移僧置寺事时,只在职权范围内就事论事断案,没有涉及其中“谋大逆”的阴谋,或者是由于案情尚未全部暴露,有意不去深究吧。

那桩公案之前不久,姚崇任宰相职外,又为相王府长史,还兼知夏官(兵部)尚书事。他看到矛盾尖锐,非常知趣地以“事相王,知兵马不便”为由,主动辞掉兵权,改知春官尚书事。当然这不过是为掩人耳目,他居于幕后,照样悄悄操纵了反二张的政变。

五王政变后,看到韦、武二姓权势益盛,政出多门,唐中宗庸懦,无能制服韦后、武三思,自己又和唐中宗的关系平平,宰相难做,于是设下一条退身之计。在武则天搬出皇宫移居上阳宫的时候,姚崇独自呜咽流涕前去“泣辞”,别人警告他:“恐公祸从此始”,他假中有真地坦然回答道:“缘此获罪,实所甘心。”<sup>①</sup>果然因此罢相,贬为亳州刺史。祸兮福所倚,在闹韦后之乱的五年中,他得以安然无恙。

睿宗朝,他再入相,充分估计到自己与睿宗皇帝有多年的密切关系,所以说话办事比较放手,敢同宋璟一起为安太子谋出太平公主。话一出口,果然惹翻了太平公主,太子马上退缩,推出姚、宋请以“极法”处置,而唐睿宗只是把他俩放为外州刺史就过去了。太平事平,唐玄宗主动与他和解,亲自在新丰讲武时加委相职,姚崇

<sup>①</sup> 《旧唐书》卷96《姚崇传》,3022-3023页。

重返长安。

在宰相任上这样二出二进的历史表明,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他居然能从容应付进退自如,自己掌握着相当的主动权,这位长于算计的名相有过人的心智。他说话办事,审时度势,适时而行,适可而止,深通政治诀窍。或者说这是姚崇的圆滑之处。古人就有这样的评论。清代康熙皇帝说:“开元贤相,姚宋并称,实则崇不逮璟远甚”,奚落他“谄谀顺旨”、“专事恩府怨”,“材干虽优,瑕瑜岂能自掩”<sup>①</sup>。司马光也说他屡贺日食不验和豫鼎符命,“上诬于天,下侮其君”<sup>②</sup>。确实,宋璟为官,耿直刚正,以“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sup>③</sup>,每每与权奸抗争,保护忠良,是个丝毫不逊色于包公、海瑞的人物。姚崇在这方面是比不上宋璟的。实在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处在他的地位,在那样错综复杂的环境里,要办成事,也要保护自己,要一个为臣子的官僚该怎么做呢?谁能比他做得更好些呢?宋璟确有过他之处。可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终究还是姚崇比宋璟做的事更多些呵!

姚崇有一点是应该自愧的,那就是在经济上确实不大检点。开元四年他罢相,是受几个不成器的儿子和亲信贪赃受贿案件的牵连,或者就是他本人犯案而推在别人身上罢了。老子当大官,儿子吃贿赂;亲信犯下法,主子给翻案。姚崇是难脱贪污罪嫌的。姚崇临死前,留“遗令”嘱薄葬,诫“诸子侄各守其分”,再不要为财产竞争,其中一句说:“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sup>④</sup> 隐约其词,有为自己辩解之意。

可叹姚崇,年刚六十七岁,居家司“独当地任”,正是大有可为

①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 54。

② 《资治通鉴》卷 211,6704 页。

③ 璟谓张说语,见《资治通鉴》卷 207,6564 页。

④ 《旧唐书》卷 96《姚崇传》,3026 页。

之时，为财货小事，遭罢斥之辱，“为时所讥”，追悔莫及。纵有巍巍相业，却白璧有瑕，身后千年，犹遭指责。

惜哉！一代名相……

附：

## “十事要说”考

姚崇“十事要说”，详见《资治通鉴》卷210《考异》引吴兢《升平源》及《新唐书》卷124《姚崇传》。此事对研究“开元之治”至关重要，故略加考辨。《升平源》记曰：

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颇德之。既诛太平，方任元崇以相，进拜同州刺史。张说素不叶，命赵彦昭骤弹之；不许。居无何，上将猎於渭滨，密召元崇会於行所……上曰：“朕久不见卿，思有顾问，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犹后，上纵辔久之，顾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公不谢。上顾讶焉。至顿，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适奉作弼之诏而不谢者，欲以十事上献；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上曰：“悉数之，朕当量力而行，然定可否。”

公曰：“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

又曰：“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

又曰：“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於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予公事，可乎？”上曰：“怀之久矣。”

又曰：“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



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罢停，可乎？”上曰：“朕素志也。”

又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网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齿久矣。”

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愿行之。”

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

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上曰：“事诚当然，有何不可！”

又曰：“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

又曰：“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

公再拜曰：“此诚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载一遇之日，臣敢当弼谐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称万岁者三。从官千万皆出涕。

《新唐书·姚崇传》记“十事要说”，文字省略，内容相同。

对“十事要说”是否事实，历代有争议。《旧唐书》不载其事，《资治通鉴》不信不取，《册府元龟》也不见收录，由此推想，《唐实录》中就没有记这件事情。但是多数看法认为有其事：

《白氏长庆集》卷44《为宰相谢官表》：“臣伏闻：玄宗即位之

初,命姚元崇为宰相。元崇欲救时弊,献事十条,未得请问,不立相位。玄宗明圣,尽许行之。遂致太平,实由于此。”这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为元稹作的表,是《升平源》之外又一条唐代人认为有“十事”之说的重要史料。

殿本《旧唐书》卷96沈德潜《考证》:“崇上陈十事,使玄宗力行,此生平大节而传中不及,新书详之,此足补旧书之阙。”

《廿二史札记》卷17《新书增于旧书》条:“增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原注:“此为相业之始,而旧书不载。”

《丹铅总录》卷10:“旧唐书与新书同载此一事(按:指十事要说),而新远不如旧。”明杨慎(升庵)嘉靖中在闻人詮校刊本《旧唐书》复出后犹作此说,引起后人许多猜测非议。如《旧唐书疑义》卷3:“姚崇十事要说,古今传诵,今崇传独无有,则与杨升庵所见之本异矣。”《十七史商榷》卷87《姚崇十事要说》条驳正《丹铅总录》:“今旧唐纪传皆不见,必杨氏偶见他书载之而误耳。”《唐史余沈》卷2《姚崇十事》条亦曰:“杨慎征引常舛,前人言者已多,此必曾见传本《升平源》而误记为旧书耳,张氏复何疑焉。”按:闻人詮所辑《旧唐书》之《姚崇传》并无残缺痕迹,当时杨慎那样说《旧唐书》是另有所本的可能性极微,王鸣盛和岑仲勉的分析盖无误。

王鸣盛还说:“旧传不载十事要说,而《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四张说撰《神道碑》亦无此。若谓新书滥采小说,不可信,则非。盖《神道碑》简略草率之主,事迹殊觉寥寥,此真不可解。不足据也。”按:《玄宗实录》(《今上实录》)和《姚崇神道碑》都出自张说之手。先天二年姚崇进拜宰相一事,张说曾多方设法阻挠。后来张说捉笔,讳而不详言这段史实,以至一些史籍阙载“十事要说”,并不难解。

另外,《郡斋读书志》卷2上:“《开元升平源记》一卷,右唐吴兢载姚崇以十事要明皇。”《困学记闻》卷14:“姚崇十事见《开元升平源》,《通鉴》不取。”对“十事要说”是否事实都未置言。

唯《资治通鉴》是明确否认有“十事要说”的事情的。该书卷

210《考异》对此作了说明：“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sup>①</sup>，难以尽信，今不取。”

以上三种看法，我们不仅根据多数史家的意见和撰史者与当事人的关系来判断，主要考虑当时政治形势的客观要求和姚崇的阅历思想，认为“十事要说”是可信的历史事件，在当时提出来是可能的，体现了姚崇的思想抱负，实际上也是那样去做了——虽然不能都做到。从当时励精图治的唐玄宗看，能够欣然接受也是有道理的。而司马光否认这事的依据却是很不充分的。

先分析“十事要说”的背景。

从时机看，提出在太平公主被诛，太上皇退出政事，唐玄宗“始听政”<sup>②</sup>，切实掌握军政大权，准备要有一番作为而起用姚崇之时。只有在这时候，才可能提出和推行这种进行改革的政纲。

从关系看，两年多以前，唐玄宗（当时是太子）慑于太平公主的淫威，曾打算牺牲姚崇来保护自己，这件往事在他们君臣关系中是个疙瘩，姚崇不能不掂量一下在他下面宰相好不好做，因此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要求来试探唐玄宗的反应，以便自己作出决定，为此而用“十事要说”沟通双方思想，是合情理的。

从内容看，“十事”针对武后、中宗弊政和太平公主擅权用事以来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谈这些问题姚崇是有准备的，其中许多以前已有人提出来了。如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问政要，陈子昂对以缓刑罚，息兵革，省赋役，抚宗室；长寿元年（692年），刘知几表陈四事：节赦以肃奸宄，少赐阶勋，沙汰冗官，刺史非任三年以上不可迁官；神龙元年（706年），袁楚客说魏元忠十失：不早建太子，

① 岑仲勉先生考证《开元升平源》传讹为吴氏作品，著者应是撰《大统记》的陈鸿。见《唐史余沈》卷2《玄宗·姚崇十事》。

② 《新唐书》卷5《玄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122页。

公主开府置僚属,宠进宦者,王公贵戚竞为侈靡,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等;景龙二年(708年),萧至忠、辛替否谏官滥;景龙三年(709年),韦嗣立上疏议造寺极奢,食封逾百,员外官数倍正阙等弊。

特别是先天中比姚崇上“十事要说”稍早一些时日,常州晋阳尉杨相如的上疏:“国家自垂拱以后,至于近年,寇贼屡兴,兵革数动,边师溃丧,日费滋多。加以观寺修营,锡赀繁数。郡县之吏,未息侵渔;寰区之氓,率尽周瑾。官班冗赘,淫费频频。近者,人献直言,时有切谏,徒闻谏议,竟不施行。至于营造,未甚休息,是使国储不足,人蓄久空。俗弊之由,其来已渐……夫法贵简而能禁,罚宜轻而必行……请一皆除去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然后停不急之务,渐无为之理。休罢造作节减之赋,息徭役除赘官绝吏之侵渔。复人之本业,斯则人安而俗富也。且俗富则国富,人安则国安。所为之术无他,惟此而已矣。”<sup>①</sup>内容及“十事”之四五。

姚崇的“十事要说”应是集纳了以上许多人的意见作出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创造,内容是有依据的。

再从姚崇本人来看,他是个有能力,有算计,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政治家。从神龙元年与谋诛二张的政变起,经中宗朝主动出刺外州,睿宗朝扶持太子,谋出太平公主和诸王,他就是在准备和等待自己能有所作为的时机。至此,二张、武、韦两党和太平公主俱倒,朝廷里能和唐玄宗、姚崇抗衡的力量暂时松散无能,唐玄宗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起用旧臣姚崇改革政治,于是姚崇便在自己再次被授予相职并能得到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实际权力时,提出了这个经过自己长期深思熟虑的、有希望被唐玄宗接受的施政纲领。

<sup>①</sup> 《册府元龟》卷533《谏诤部·规谏第十》。《资治通鉴》卷210略记此疏。时在先天二年三月。

“十事”反映了姚崇一贯的政治主张,并实际贯彻于开元政治,这是我们辨证“十事要说”真伪最主要的依据。试逐条证之于下:

姚崇早年答武则天问诏狱事时,就反对“峻法绳下”。唐玄宗时又公布第二批酷吏名单并给以惩处。开元元年的下半年穷治太平公主枝党时,“当坐者众”而“所全甚多”<sup>①</sup>,表示“政先仁恕”的实施。

姚崇一生三次为兵部尚书,多次担任军府主帅或长史,熟谙军事,“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号称“文武全才”<sup>②</sup>。当时从东北到西南,契丹、突厥、西域各族和吐蕃屡动兵革,以致“丁壮尽于边塞,孤嫖转于沟壑”,造成“公私虚竭,户口减耗”<sup>③</sup>。姚崇提出“不求边功”,是反对武将们邀功请战,安定边疆。开元二年姚崇谏不击契丹。开元三年又反对讨安西。这两仗硬是打了,果然损兵折将,败而无功。且不论对这些军事行动如何评价,姚崇考虑节省巨大的军费开支,改善财政拮据状况,以利经济的恢复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睿宗景云元年时,姚崇、宋璟等就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将唐中宗时授的数千冗员罢免<sup>④</sup>。开元二年唐玄宗二哥申王李成义要将其王府一名从九品录事提为正七品参军,姚崇等上言:“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阻止了这件事,“由是请谒不行”。<sup>⑤</sup>。那年又“悉罢员外、试、检校官”<sup>⑥</sup>。后来,开元七年,唐玄宗下墨敕与后族王仁琛五品官,被宋璟谏止<sup>⑦</sup>。武则天时期滥授官爵和唐中宗时墨敕斜封大

① 《资治通鉴》卷210,668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0,6690、6688页。

③ 神龙元年宋务先疏。见《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直谏十一》。

④ 《资治通鉴》卷210,6655页。

⑤ 《资治通鉴》卷211,6697页。

⑥ 《资治通鉴》卷211,6699页。

⑦ 《资治通鉴》卷212,6737-6738页。

批官员的做法,在开元初终于停废,官吏铨选又按制度考核升黜。

在整顿中,姚崇特别着重从制度上解决王公践贵干政的问题,并注重地主官吏的人选和考察。

景云二年姚崇、宋璟一起谋出诸王为外州刺史,提出诸王、驸马不得典禁兵的主张,在开元初年才完全实现。唐玄宗的两个哥哥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堂兄幽王守礼和在平太平公主乱中有大功的两个弟弟岐王隆范,薛王隆业,在开元二年都出到外地做刺史,规定他们不许管地方政务。开元四年又立“诸王遥领节度”的制度,委任都护、大使,也仅是挂衔而不到任。直到开元八、九年,唐玄宗的帝位稳固了,才让他的兄弟们迁回长安。唐玄宗同他们过往亲密,给予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但“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往”的制度不变,就是不许他们干预政事。大臣攀附诸王,往往是乱政祸根。开元元年,张说与岐王私下交往,姚崇对唐玄宗说:这是“腹心之疾”,撤了张说的宰相职务,把他贬到地方上去。驸马都尉裴虚己“私挟鬻纬之书”与岐王游宴,被流放岭南<sup>①</sup>。开元年间对这类事防范很严。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对安定政局起了作用。

唐朝士大夫素轻外任,是造成地方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为改变这个风气,开元二年立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sup>②</sup>姚崇又坚持复置十道按察使,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督察。姚崇着意保护奉公尽职的官员,尚书左丞(正四品上)韦玠对沙汰“宽怠及不称职”的台省郎官出过力,改任时,姚崇反对派韦玠做小州刺史(正四品下),坚持要皇帝修改敕书,委任他为冀州刺史(上州刺史,从三品)。继姚崇之后,“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sup>③</sup>。这

① 《旧唐书》卷95《惠文太子范传》,301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6694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1,6724页。

就抓住了革新政治的中心一环。经过多年努力,大力整顿官僚队伍,澄清了吏治,实为社会转向大治的关键。

开元二年,薛王隆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被御史弹奏,薛王找皇兄为他说情,姚崇等认为“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终于将王仙童治罪,“由是贵戚束手”<sup>①</sup>。开元四年,杨皇后妹夫长孙昕在街上公然殴打御史大夫李杰,唐玄宗以“陵犯衣冠”之罪,命于朝堂杖杀长孙昕。是“法行自近”的两个实例。

开元二年,唐玄宗焚珠玉、锦绣于殿前,下敕:“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sup>②</sup>。开元四年,宦官远涉江南,“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极谏,唐玄宗深表嘉慰,“禽鸟并令放讫”<sup>③</sup>。当年又罢营求海南珠翠奇宝。开元初年姚崇辅政时,唐玄宗的这些行动使司马光不胜感慨地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溺人也!”<sup>④</sup>当时地方官员每年冬天赴京城时,“往往赍货入京师”,贡献求媚谋升迁。开元七年,“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sup>⑤</sup>。这些是实行“十事”之六:租赋之外,禁绝贡献。

“十事”之七:寺观宫殿,止绝建造,上文姚崇抑佛一节已经论及。开元二年又毁武则天所造天枢和韦后所造石台,那是她们为自己纪功颂德建造的巨大建筑物。

待大臣“接之以礼”和“群臣皆得触龙鳞,犯忌讳”两条,姚、宋二人的境遇便是最好的例子。开元四年姚崇得疟疾,“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每有大事,常令就寓所问姚崇。唐玄宗甚

① 《资治通鉴》卷 211,6696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211,6702 页。

③ 《旧唐书》卷 185 下《倪若水传》,4812 页。

④ 《资治通鉴》卷 211,6702 页。

⑤ 《资治通鉴》卷 211,6738 页。

至说：“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sup>①</sup>《新唐书·姚崇传》说：“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他相莫如也。”其后，唐玄宗对宋璟也是这样。宋璟“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sup>②</sup>。司马光评论说：“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sup>③</sup> 皇帝时代，君臣关系能像唐太宗对房、杜、魏徵和唐玄宗对姚崇、宋璟这样推心置腹、优礼尊重是不多的。可以说，只是有了充分的信任，才有倾心的合作。唐太宗、唐玄宗得到贤相辅佐而成为一代英主，魏徵和房、杜、姚、宋有了英主信用才成为治世贤相。唐玄宗失去姚、宋以后，在李林甫、杨国忠一班奸相的包围下，堕落成荒唐误国的昏君，从反面说明宰相对国君和当时政治的优劣不无举足轻重的影响。

“十事”最后一条，不许外戚干政“作万代法”，在唐玄宗前期是做到了的。唐明皇原配夫人王氏，先天元年立为皇后，好左道，冀“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唐玄宗亲自审理，废为庶人，“为国大计”，毫不容情<sup>④</sup>。其后至杨贵妃以前，后宫武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杨妃（唐肃宗生母）等在政治上都默默无闻，几不为人所知。公主们也被严加管束，再没出太平、安乐那样人物。乱了多年的内廷总算安定了一时。王仙童和长孙昕伏法后，外戚也收敛了。

综上所述可知，姚崇“十事”在开元政治中是基本上全面贯彻了，对安定政局，改善吏治，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生产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说“十事”有政纲的性质。姚崇对“开元之治”的贡献，这是重要的一方面。

至于说“十事”基本上全面贯彻，是因为没有完全得到贯彻，特

① 《资治通鉴》卷 211, 672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211, 6724 页。

③ 《资治通鉴》卷 211, 6725 页。

④ 《旧唐书》卷 51《玄宗废后王氏传》，2177 页。



别是“宦竖不与政”一条,姚崇自己也不免要用高力士暗通消息,为之周旋。唐玄宗把宦官当做亲信重用,“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sup>①</sup>。唐代后期宦官专权之祸这时已见端倪。

姚崇不能严格律己按“十事”去做的地方还多。如贺日食当亏不亏,贺豫州鼎铭为授命之符;引李义又在自己紫微省(中书省)属下,去其任黄门(门下省)侍郎的封驳之权;纵子纳遗请托等。当然这些并不足以影响我们对“十事”和姚崇的基本评价。

《资治通鉴》认为“十事要说”“难以尽信”,然论据不足。司马光仅提出“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和“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两点理由,如果很好地考虑到姚崇之前已有许多人详论过这些事,他必然留意在心,当时又有合适的讲话机会,皇帝来俯就他,那么对姚崇一旦邀之就是很自然的了。至于“进不以正”,更是从正人君子的道德观念着眼的非议,在政治斗争中,人们从来是不拘泥于这些小节的。何况“十事”的内容,《通鉴》也不能尽否认。司马光说:“元之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褻狎,上皆纳之。”这些分明都是“十事”的内容,胡三省在注中已经指出:“此即前所献十事之二三也。”<sup>②</sup>

(考,1963年于北京大学;文,1979年于西北大学。  
原载《汉唐文史漫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① 《资治通鉴》卷210,668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0,6690页。

# 做寻常夫妻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追求

按人们传统的心理去判断,做一个能得到皇帝恩宠的后妃,该是皇帝时代女性的最大满足了。孰不知,还有唐明皇、杨贵妃这样享尽人间富贵的一对,却怀着做寻常夫妻的向往。他们共有着怎样一种厌倦帝王生活的逆反心理?

后宫佳丽三千,宠爱在一身,杨玉环无疑是充满幸福感的。她还会有什么不满足的吗?有的,深邃的后宫花团锦簇的另一面,是莫测的阴森和神秘。历代选宫女时,尽管入选的一些人有机会得到皇帝、太子的眷顾而青云直上,光宗耀祖,可是妙龄二八的女孩子们,无论名门淑媛还是小家碧玉,大凡都在她们父母的焦虑中,用仓促婚配等种种办法,像避瘟疫一样,逃避选美使臣的搜索。后宫那片只有一个男子的天地,对成千上万人来说,无疑是金丝的囚笼,上阳宫白发人可怜的形象,是她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归宿。即使得到帝王宠幸的幸运儿又怎么样?不难统计到,唐史上立传的后妃,三十六人中有十三个死于非命,三人中便有一个不得善终,她们更没有平平安安的日子过。

万千后宫绝色女子的争宠,何尝不是人世间最残酷的竞争?她们活得不轻松。伴君如伴虎,表面上极尊极贵的后妃和黜陟生杀大权在握的帝王,何尝有过真正的平等人权?杨贵妃尚且两度

被休斥回家,命运全系于皇上一时的喜怒,那是怎样提心吊胆的日子!除非像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仗着娘家煊赫的门第耍泼使妒,终日盯住隋文帝身边的每一个女性,绝对不允许夫君有异母孩儿。皇帝偶尔宠幸了后宫尉迟氏,皇后竟指使人将那女子残杀,隋文帝气得发疯,独自骑马跑进山谷二十里,宫廷里闹了一场丢了皇帝的虚惊。隋文帝被劝回宫后深深地叹息:“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独孤皇后生前是把皇帝控制住了,她得意吗?用那人人憎恶的悍妒来维系夫妻关系能有真情乐趣吗?由此看来,杨玉环要与唐明皇做寻常夫妻,向往平常人家的家庭生活,希望有一分平等,更有一分自在,是绝顶聪明的。

那么皇帝呢?皇帝还有什么不满意过皇帝日子的道理吗?有的。在当时的中国,皇帝既是万民膜拜的偶像,也是万夫觊觎的目标。年轻的李隆基,带兵发动政变平韦后和姑姑太平公主之乱,是在刀光血泊中杀出自己走向储君和皇位之路的。即使在太平盛世当了圣明君主的他,还只是在心腹家奴高力士宿值时,才能放心安稳地睡一觉,皇帝的神经总处在一种怎样的紧张中便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天不亮就得上朝,终日国事缠身的辛苦。他想偷闲,多享受一刻在温柔乡中拥着爱妃的风流,便为不早朝而备受责难;懈怠了国事,终于又饱尝安史之乱的劫难之苦。“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这两句诗,点破红尘,看穿了帝王家的愁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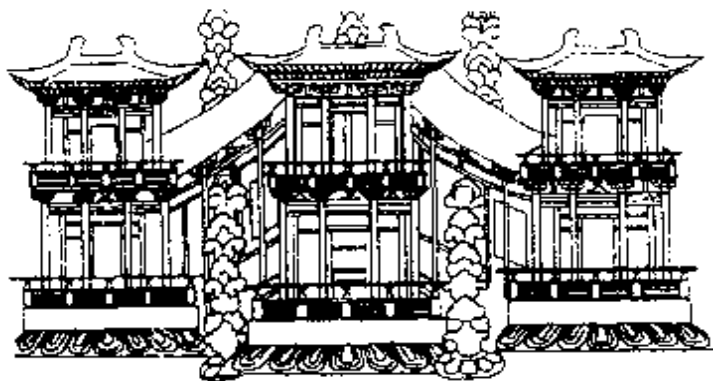
皇帝与后妃实在都被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捉弄,都是被封建枷锁桎梏扭曲了人性的可怜人。于是隋代有临终发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的恭皇帝,也有如唐明皇杨贵妃这样做寻常夫妻的觉悟,七夕之夜他俩面向天上的牛郎织女,发出“愿世世为夫妇”的密誓。当然生活不可能为他们作出走向民间的安排,于是有了那样的誓约和祝祷:后世像寻常人一样恩恩爱爱真诚相待,甚至也可以你争我吵互不相让,过任情的日子,撕下各自的假面具去生活,挣扎着

讨回一点人性。

想想看,唐明皇虽然给了杨贵妃第一夫人的待遇,但始终没有立她为要板起面孔做人的国母,杨贵妃也不曾为要这皇后的名分和皇帝发生争辩。他们宁愿稍微轻松一些活着,与那最刻板的母仪天下的形象保持一点距离,和谐地相处在这样一种默契之中。杨贵妃因而没有被宫廷生活泯灭活泼的天性,于是她在奴颜婢膝的所有后宫佳丽中反而如鹤立鸡群般出类拔萃,博取了君王终生不渝的眷恋。杨贵妃在感情生活中成功的秘诀也就在此吧!

什么是人生最值得珍贵的东西?这对生活在华清宫中的唐明皇和杨贵妃,他们愿做寻常夫妻的故事,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原载《马嵬坡诗文续集》,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 安史之乱前后的杜甫

开元的前一年，先天元年（712年），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瑶湾。三十岁以前，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作为官宦人家的子弟，生活悠闲，有机会积蓄很高的文化素养。从这一点讲，他可算是个幸运儿。后来，他有《忆昔》讴歌这个“公私仓廩俱丰实”的“开元全盛日”。不过说当时人家都有几年的存粮，国库也很充实，这可能有些夸张。中国古代铁器牛耕的小农经济，从来就没有达到耕三余一的劳动生产率，更不要说全国有三年之蓄的理想。

天宝以后杜甫过了而立之年，一度热衷于谋求官职，于是在天宝五载（746年）到了京城，没想到第二年应制举不中。当时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可是在李林甫操纵下，黜落了所有举子，无一人及第。杜甫被捉弄了，感到辛酸而无奈。就这样开始了长安十年的落魄生活，前后共三次落第。因为他父亲杜闲在奉天县令任上去世，生活失去依靠，他只能低声下气寄人篱下，“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当时，他和一般读书人一样殚精竭思写诗赋文章，希望得到皇帝和权贵的赏识，平步青云。天宝六载（747年）他上《天狗赋》，称赞玄宗打猎的西域狗，投送出去没有反应。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八日到十日唐玄宗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三大盛典，杜甫写三篇《大礼赋》，把《进三大赋表》投进延恩匭，“玄宗奇之，召试文章”，命待制集贤院，可是考试却没有下文，还是李林甫让他的满

怀希望再次破灭。天宝十三载(754年)他又写《雕赋》，在进赋表里哀鸣：“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一再说“伏惟天子哀怜之”，“伏惟明主哀怜之”，可怜巴巴地求天子给以一官半职。当时他总以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读书人大凡开始都很天真，跃跃欲试，甚至自命不凡，后来被冰冷的社会碰得头破血流才醒悟。杜甫也不能脱俗，也不免从天真开始。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才得到“河西尉”的小官。当时的县尉，要“拜迎官长”，“鞭挞黎庶”(高适：《封丘作》)，杜甫不愿就任，改任正八品下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给禁卫太子东宫的卫队管理器械戎杖杂物。得官后，杜甫于十月回奉先探家。路过华清宫时，玄宗与杨贵妃正在那里避寒，依旧是一片饮宴歌舞的景象。杜甫到家正赶上未满周岁的幼儿饿死，“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于是他在天宝十五载元月所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留下了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面对这样的惨状，他这首诗还说自己：“生逢尧舜君”，蒙受丧子之痛，还要违心地颂扬皇上圣明，他的良知忍受着矛盾心理的煎熬不能自拔。这时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不久，奉先未受战乱波及，杜甫享受着官宦人家“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却连一个幼小的孩子也养不活，这令人不得不对天宝末年还是不是盛世产生疑惑。

但无论如何，生活的教训使他对时弊有所认识。《丽人行》对“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杨家有所讽刺，对唐玄宗连年用兵更有批评。天宝十一载(752年)年写的《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同年《前出塞》指责“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首篇)；“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第六首)；天宝十四载(755年)《后出塞》批评“六合已一家”还要“誓开玄冥北”(第三首)。在《后出塞》第四首中他写道：“渔阳豪侠地……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

不敢议，议者死路衢”，点出唐明皇宠幸安禄山大有问题，和当时到过范阳的李白疾呼“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看法一致。杜甫认为当时社会危机的最大根源是唐明皇无休止地拓境开边，天宝后期屡开战端。天宝八载(749年)哥舒翰十万兵攻吐蕃石堡城死亡过半，天宝十载(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与大食军队遭遇战中大败。天宝十载和十三载两次征南诏也大败，死殁近二十万兵，杨国忠还叙功报捷，继续捕人出征。帝国扩张，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不堪负担，于是让节度使自筹，兼理军政、财政和民政，使藩镇日益坐大，终于造成安禄山叛乱。杜甫反对穷兵黩武有一定道理。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叛军攻入潼关，占领长安。此前一个月杜甫离开长安。五月，他从奉先带家人到白水县寄居舅父家。六月，爆发马嵬事变，长安陷落。白水沦陷后，杜甫一家流亡到郾县同家洼，安家于城北羌村。七月，太子李亨在储君位上苦等十九年后，终于在灵武登基，建号至德。杜甫听到消息，于八月北上延州，想出芦子关(安塞北土门山)投奔灵武。途中被捉到长安，这是《北征》诗中讲“堕胡尘”的经历。押解途中经过昭陵，他怀念唐太宗时“文物多师古，乾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这时的昭陵满目荒凉，“松柏瞻虚殿，尘沙立冥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行次昭陵》)诗中“石马汗常趋”是当时传说潼关会战时唐军战败，忽然一支人马在黄旗指引下冲出与安军厮杀，后来又无影无踪。事后昭陵令上奏，这一天太宗陵宫前的六骏石马和石人身上流汗(《安禄山事迹》)，这离奇故事是乞灵祖宗保佑。

十月房琯指挥的唐军在陈陶覆灭，杜甫写《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失望不已。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冒死奔凤翔投肃宗。五月被任命为左拾遗，仍只是从八品上，比原任正八品下胄曹参军还低了一阶。对此杜甫“涕泪受拾遗”，对“流离主恩厚”感激肺腑。但他立即为援救玄宗派来的宰相房琯(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上疏得罪，

受审,虽六月一日敕放,不再追究,但皇帝从此对他失去兴趣。杜甫一事无成,八月皇帝放他回鄜州探家。闰八月他作的《北征》中有“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痛斥杨贵妃为褒姒、妲己,误国祸首,死有余辜,盛赞陈玄礼有保全国家的盖世功勋。这与当年春天他在陷落安史叛军手中的长安时潜行曲江所作《哀江头》有极大的转变。那时他对曾为“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侍君王侧”的杨贵妃缢死马嵬不乏同情,感叹她“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现在时过境迁,杜甫身为唐肃宗的命官,不能不转换立场,改持激烈批判杨贵妃的态度,并对权势炙手的陈玄礼极口赞扬。他将肃宗颂为与兴复周汉的宣王、光武帝一样的中兴明主,寄予厚望。形势也确有转机,十月官军收复了长安。十一月杜甫携家回长安,满怀希望“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再过昭陵》)十二月肃宗迎上皇归长安,杜甫在左拾遗任上只不过半年多一点,在758年六月改任华州司功参军,管些学校和祭祀的琐事,临行“驻马望千门”,依依不舍地走了。乾元二年秋他弃官离开华州去秦州(天水),《秦州杂诗》中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知道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离开了政治中心,离开了官场。在这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从洛阳到华州途中写《三吏》《三别》,感情转向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杜甫生活在唐由盛转衰的社会大动荡年代,而立之年以后,一直为生存奔走流离,饱尝艰辛。生活的磨难、官场的失意反而使他的人生得到升华,得到成功,一个新的人民的杜甫,丢掉对专制皇帝的幻想后新生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仅此两句,就足以使杜甫不朽。杜甫是一个伟大的充满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情怀的诗人,这思想情怀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真正精华,也是建设现代文明最宝贵的财富。

(本文与胡明翌合作,提交1998年第十届中国唐史学会年会)



# 马嵬三论

## 一论马嵬事变

### 腐败的专制政治酿成的惨剧

渔阳鞞鼓动地惊天，神州陆沉；马嵬驿舍君王掩面，香魂殒销。象征大唐中衰的安史之乱，只是马嵬事变的前因，而杨妃之死，又将那幕长达八年的历史悲剧推向高潮。关于酿成这场事变的原因，众多史家各有精辟的分析，诸如边陲形势的紧张，军政制度的紊乱，内轻外重的变化，军费财政的拮据等等，多不尽把责任归到明皇个人的昏愆怠忽，即不再用英雄史观的翻版罪人史观的眼光解说一切。但是无论讲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要把那原因和原因的原因说全说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笔者的直感，天宝末年，可怕的腐败政治，深深根植于专制政体中的癌毒，是那酿造剧变而难有回天之力的祸根。

且不说开元晚年张九龄先睹未萌，至少在事变发生前十年，安禄山要造反的警告已充斥于耳，从节度使王忠嗣、安思顺，宦官高力士，到太子李亨，宰相韦见素、杨国忠，频频上奏。先是权相李林甫袒护，唐明皇多年不予理会，还竟然把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一些人缚送交安禄山处置，以为自己一贯厚待这员目不识书的蕃将，再作出这样不容置疑的姿态，安禄山决不会造自己的反。那时到过幽

州的李白痛心疾首地呼喊：“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

天宝十四载(755)五月，即安禄山起兵前半年，唐明皇终于有点不放心了，遣中使辅璆琳以赐珍果甘子为名，前往范阳察看动静。不料这个宦官收了大量贿赂，返朝后诬骗皇帝：“禄山尽忠奉国，必无二心，特望官家不以东北为虑。”明皇不明，听信了他的谎言，焚毁调安禄山进京的制书，取消了另派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褫夺其兵权的计划。这次至关重要的调查和弭祸的紧急安排，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断送在一个贪官手中。官场上这类贪赃纳贿的丑行在宦官中滋蔓已久，“帝城中甲第，畿田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宦官们已是京师巨富，家产半长安。在这普遍腐败的风气中，出个把辅璆琳坏大事，就不是纯属偶然了。

七月，辅璆琳受贿案发被处死。这时安禄山上书献马三千匹和兵车甲杖三百乘，要派一支有二十三名蕃将，六千名牵马夫和九百名车夫的部队押送进京。有人担心是要袭击京师，急奏不要安禄山派兵，待入冬由官方另派民夫去接。唐明皇这回总算对安禄山起了疑心，接受了意见，并遣中使冯神威通知安禄山十月进京。但为时已晚，安禄山知事情败露，八月以后公然秣马厉兵，屡擒士卒，十一月便发动了叛乱。

从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起兵范阳(今北京一带)，到翌年六月长安陷落之间，有约七个半月时间，唐廷如在军事上处置得当，尚有机会阻遏祸乱，挽狂澜于既倒，不必銮驾蒙尘，两京夷为丘墟。因为顺逆之间，人心还向着大唐，唐廷为抵御十五万叛军，很快就分三次集结了二十余万军队，另外还有河东、河南、河北等地组织起来进行抗击的二十多万军民，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叛军在最初的突然袭击后便不占什么优势了。可惜这时唐廷的决策竟是一错再错，自毁长城。

九月十五日，安禄山起兵一周后朝廷才得到消息，指派正好在朝的北庭都护封常清往洛阳募兵守御。但他所募的六万兵尽是市

井白徒,未经作战训练,在虎牢、葵园和洛阳上东门、都亭驿、宣仁门连战连败,十二月十二日丢了洛阳后退到陕郡(今河南陕县)。这时右羽林大将军高仙芝率五万军也到了那里。封常清认为陕郡无险可守,而潼关无兵,说服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确保长安。到潼关后总算抵挡住尾随而来的叛军的攻势,为唐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备战时间。

不料监军边令诚记恨高仙芝不按自己的主意行事,回京诬告封常清动摇军心,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明皇不分青红皂白,立即派边令诚到军中斩封常清、高仙芝。封常清临刑时呈上遗表,针对杨国忠散布的盲目轻敌情绪,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高仙芝则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士兵替他喊冤枉,呼声震地。高仙芝、封常清是当时唐廷能指望的军事家,在天宝六年(747年)他们曾率领一万军队远征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兴都库什山南麓)。20世纪初实地考察过高仙芝远征路线的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对那次进军所表现出的伟大气概赞叹不已,认为他们横越帕米尔超过了欧洲史上从汉尼拔以至于拿破仑同苏沃洛夫诸名将之越阿尔卑斯山的战绩。可叹两位盖世名将被宦官阉竖的一句谗言,便双双横死作了刀下鬼。

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以后,唐明皇起用了病废在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哥舒翰拖着中风麻痹的病躯勉强去了潼关,重兵把守,全仗河南、河北军民和郭子仪、李光弼等在敌后牵制叛军,战局在反反复复中朝有利于唐廷方面转化,河北十七郡又归朝廷,叛军局促于汲、邺两郡和洛阳、陕郡间的狭小地区,连同范阳老巢的联系也被隔绝了。安禄山忧惧不知所为,大骂当初鼓动他举兵的高尚、严武:“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一度“议弃洛阳,走归范阳”。

但是这大有希望的转机,迅即丧失于唐廷将相间又一次的内

耗争斗。

哥舒翰一向与安思顺、杨国忠不和,这时恃兵权在手,不积极整军备战,却矢志报私怨。先于翌年三月间伪造截获安禄山给安思顺的密信,陷这位很早就奏言安禄山必反的前朔方节度使于死罪。接着又有人给哥舒翰出主意,留三两万兵守关,率精锐进京诛杨国忠,以清君侧报私怨。哥舒翰部下骑将王思礼还建议,或者派三十骑劫杨国忠到潼关而杀之。杨国忠听到消息后大为惊慌,一面派剑南军将李福德训练监牧三千,在身边抓起一支亲兵,一面又令亲将杜乾运募万人屯灊上戒备哥舒翰。哥舒翰马上奏请灊上军隶属自己指挥,六月初一把杜乾运召到潼关杀掉。杨国忠顿觉“吾死无日矣”,于是告哥舒翰逗留不进,居心叵测地假手皇帝催逼他仓促出击,收复陕、洛。尽管哥舒翰奏明:敌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郭子仪、李光弼也力主固守潼关,不可轻出,很有先见之明地指出:“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但唐明皇信从杨国忠的蛊惑,一个接一个地派中使去急令出击,哥舒翰只得于六月四日痛哭出关,结果中敌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二十万大军退回潼关的仅八千人。九日潼关失守,哥舒翰投降了安禄山。

九日晚平安火不至,长安知大势已去。次日杨国忠首倡逃往四川。十三日黎明,皇帝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悄悄出了延秋门仓皇西去,京城不日便陷入叛军之手。马嵬便在这时演出了又一幕霸王别姬式的历史悲剧。

历史车轮执拗地滑向悲剧的结局,原因何在?仅从以上对安史之乱初起前后情况的简单回顾,唐廷上下腐败政治的种种劣迹已经暴露无遗。那贪赃受贿诬主误国的辅璆琳;那妄进谗言致使前线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冤死的边令诚;那大敌当前将相失和置私怨于国难之上的杨国忠同哥舒翰的恶斗;那将在外犹滥用君权胡乱发号施令平白葬送二十万大军的唐明皇……这一切诚然是明皇

不明,最后他自己落得在马嵬遗恨千古。然而主导这场悲剧的不正是作为专制政治最高代表的皇帝自己吗?在这个人明与不明的背后,在那官僚群上上下下令人窒息的腐败空气中,不正是那专制主义的行政机制充当了历史车轮无情地滑向悲剧高潮的润滑剂吗?

事情表面上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昏庸和罪恶铸成的大错,似乎可以设想,倘若当时朝政没有这些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安史之乱乃至整个唐史的面貌也许要改写了。历史的表象诚然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可是在那一人独裁的决策体制和存在着制造腐败的专制政治温床的条件下,难道可能杜绝安史之乱、马嵬事变式的祸乱,而奢想抹掉盛唐历史的悲剧色彩吗?

## 二论马嵬事变

### 亡国祸乱中犹夺权不止的政变

永无休止的内耗恶斗,层出不穷的夺权政变,把中国历史画卷装点得格外多姿多彩。两千年间难得放晴的政治气候,时不时地阴云密布,突兀而来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袭击宫廷,万里江山走马灯似地易主,这构成一部二十四史的基本格调,也可算是我们文明古国的国粹传统了吧。在那长长的昏沉的梦里,马嵬事变是一幕幕可怕的悲剧之一。大唐政权在安史乱起后的危机中,最高层统治者仍不肯稍微休战,在西向亡命途中演出了又一场自相残杀的恶斗。

马嵬事变的实质,是太子、阉将向父皇、权相篡夺权位的一次政变,可以说就是年已四十六岁,在储君位上苦苦等了十九年的太子李亨(唐肃宗)向其父,年已七十二岁做了四十五年皇帝的唐明皇夺权。让我们且先不论双方的是非曲直和事变的历史后果,但

凭人们的直觉去观察事变的这一性质。不过这一点往往被帝王家仁孝的假面具和禁军厮杀的刀光剑影掩盖,而并不易为人一眼看透。

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争夺,是古代一切政变的主题。李唐王朝自唐高祖开国以来六传到唐肃宗,竟无一嫡长子继位的。从玄武门事变起,已有建成、承乾、李忠、李弘、李贤、李宪、重俊、李瑛至少八位太子,或废或杀,离开储位。李亨在唐玄宗三十几个儿子中排行第三,生母杨妃地位不高,且在他刚成年时便已去世,李亨没有母党的后援。李亨对父皇又没有信心,当年唐明皇一日杀三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的作法,在他心头留下了无法驱除的阴影。真正的麻烦是在朝中深得父皇信任的两任宰相李林甫、杨国忠都同自己不和。太子处心积虑依靠韦妃兄韦坚和杜良娣父杜有邻组织起来的私党,包括左相李适之和兼管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的王忠嗣在内,掌握了外廷部分权力和西北军镇,但在天宝五载(746年)被李林甫诬以交构东宫,欲共立太子的罪名,两次兴狱,翦除干净,李亨因此还被迫同韦妃、杜良娣离异,陷于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的窘境。皇帝授权进行的这一行动,在太子心中又添上了怎样的芥蒂,是不言自明的。

杨国忠当年积极参加了那次迫害太子党羽数百家的行动。李林甫之后,以他为首继续与太子作对。李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位东宫侍读李泌,旋被杨国忠弹劾贬逐。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安禄山攻占洛阳,唐明皇勉强作出要亲征的姿态,下制由太子监国。面临皇权移交,杨国忠大惧,他深知,“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于是兄妹们让杨贵妃出面“衔土请命”,皇帝当天收回了成命。太子眼巴巴丢掉了承接大权的一次机会。

更可怕的是杨国忠在做着将皇帝和朝廷迁往蜀地的安排。蜀川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经过章仇兼琼、鲜于仲通两位恩人和杨国

忠本人三任剑南节度使的经营,杨家在蜀川已很有根基。一旦到了那里,太子必将成为这位权相掌中的玩物,前途险恶莫测。

安史乱起,杨国忠成为众矢之的,他只有入蜀一条退路,早早安插亲信崔圆在益州(今成都)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潼关陷落,杨国忠首倡幸蜀之计。由于杨氏姊妹的推动,皇帝同意跟他们走。

对于太子李亨来说,蜀地是无论如何去不得的陷阱。随着战火的蔓延,当杨家的人蜀计在紧锣密鼓中策划并付诸实施的同时,一场与之对抗的事变在禁军骄兵的推动下酝酿成熟了。起先曾计划在城中诛杨国忠,但未及动手,皇帝就在杨国忠秘密安排下匆匆西行,事变遂延至马嵬爆发。

六月十四日,唐明皇与太子一千人马来到了马嵬驿。从驾军士连日劳累,却无人管饭,众人口出不逊,蓄意闹事。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因势利导,与东宫宦官李辅国找太子商量,就地诛杨国忠以安军心。这主意正中下怀,是太子求之不得的。于是陈玄礼鼓动军士诛杀罪魁祸首杨国忠以谢天下。军队一哄而起,正巧看到吐蕃使者二十余人在驿门找杨国忠诉事,便呐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反!”呼啸着追上去乱刀将杨国忠砍死,当下又捕杀其儿子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还围住驿舍不散,要皇帝割恩正法,处死杨贵妃。紧急中唐明皇还为她辩护了一句:“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劝道:“贵妃诚无罪,然将上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众怒难犯,唐明皇只得将杨贵妃交给高力士,一条罗巾将她缢杀于佛堂前梨树下。

事变至此并未真正结束。事变意味着居于幕后的太子和被伤害的皇帝之间的决裂,因而还有分道扬镳和分庭抗礼两幕来完成这场政变。

从一开始就藏身在后军的太子,在马嵬始终躲避着再不与皇

帝见面；翌日皇帝启程时，也便只是留高力士传话，不等太子来送别便径自走了。此间太子按李辅国的主意，并与张良娣和他两个儿子广平王俶、建宁王倓商量以后，决定留下，导演了一场“百姓遮道请留太子”的戏，藉此要挟皇帝或简直就是夺了后军两千人及飞龙厩马归自己。仓皇而去的皇帝，差一点落到只有子孙中官追随入蜀的地步。

事情往下看得远一点，马嵬事变的性质可以看得更清楚。当天留在马嵬的太子一伙紧急磋商去向，权衡军事形势，在西北、东北（安禄山）、西南（杨国忠）三大军事势力中，只有和自己有些宿缘的西北军镇可以依靠，于是回军，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平凉，七月初九到灵武，仅仅三天后便擅自即位改元，另立朝廷。又过了整整一个月，从灵武派出的使者才到成都通报此事，分明是先斩后奏了。唐明皇见事已至此，为顾全大局，只好违心地讲些早已有传位之意的话，交出传国玺，自己退居太上皇。而肃宗上台后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把原来上皇所命宰臣尽行撤换。收复两京后上皇回到长安，想改葬杨贵妃，肃宗不许。最后连他喜欢的兴庆宫也不让住，被迫迁居西内宫城。搬迁之日走在夹城中，又是那个李辅国领铁骑数百人戛戛而来，直逼御马，幸亏高力士挺身回护，未得下手。李辅国骂骂咧咧，杀了高力士手下一人悻悻而去。十天后，高力士便以潜通逆党罪名被除名，长流巫州（今湖南黔城），赶走了老皇帝身边最后一名心腹侍从。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早他十三天，即于当月初五，太上皇凄凉地死在宫里。唐肃宗患病后，唐明皇即与他一前一后而去，不知道是否偶然的巧合，难免让人联想起光绪皇帝早慈禧太后一日死去之谜，毕竟唐明皇连光绪那样一份最后的病历也没有啊。

唐代这一对皇帝父子，尽管彼此作出了多少慈爱仁孝的姿态，可是在马嵬摊牌的那场父子之争，真是至死不能罢休。撩开温情



脉脉的面纱,人们当可以藉此窥见一点那被权力腐蚀的封建帝王家庭关系的真谛。

### 三论马嵬事变

#### 马嵬归天的杨贵妃她冤不冤

对杨贵妃在马嵬的惨死,历来拍掌称快者有之,抚膺叹息者有之,近年更有愤愤然要在马嵬插一块“杨某受死处”的告示牌,非把杨贵妃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不能解恨者。只是这革命得很的先生的义愤似乎并不能扫荡那位最会赚取人情泪的诗人千年前留下的一篇长歌撒在世人心间的悠悠长恨。

“一根麻绳,诉尽了娘一生的委曲。”说的是雷锋的母亲,旧中国的一位穷妇。那么那条佛堂梨树下的长巾,是不是能说杨贵妃她也死得冤枉呢?

中国素来有女祸误国的史观,杨贵妃被赐死时自己也说:“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不过多数人还是认为杨玉环并不是一个政治女性,她对安史之乱这场大难,负不了什么责任。

在武则天时代结束后不久出生的杨贵妃,选择了与女皇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她远远地躲避处处漩涡的齷齪政治。她用不着吃力地耍弄权术诡计谋求荣华富贵。她自有丰艳的体貌,过人的聪颖,但凭天生丽质轻歌曼舞博取夫君欢心,她便有了想要的一切。她并不要权力,宁愿轻松地尽情享受人生。一句话,懒散的本性决定了她成不了一个铁石心肠的政治人物。

但是她却不能完全逃离政治。裙带关系把她同天宝末奸相杨国忠和极度挥霍的杨家五兄妹这些闹得民怨沸腾的家伙紧紧拴在一起,她深深地陷在家族主义的泥淖中无以自拔。当以讨杨国忠为名的安史之乱起,她的杨氏家族面临灭顶之灾,为救杨家,她一

反常态,平生唯一一次贸然涉足干政,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六日衔土请命,力阻皇帝作出亲征和让太子留守监国的决定,由此埋伏下了她与太子的矛盾,这是她在马嵬事变中被指陈为“贼根”或“贼本”而难免一死的真正原因。

无论如何,杨贵妃终究不是一个有雄心或野心的政治女性,她被政治风云席卷而去是她的不幸。明眼人多不过分责难她,反而对她的死寄予无限的感慨,于是有了长恨歌,有了长恨传,有了“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之类千余年不绝响的咏叹。不仅如此,就连那位酿成大祸的风流天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似乎不那么丑恶。对安史之乱后返回长安闲住兴庆宫的太上皇,父老们犹“往往瞻拜,呼万岁”。真是不减尊崇之情。呵,善良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善良!虽然历尽苦难,竟有这等胸怀,如此的宽宏大量。历史地理解这种感情和宽容,应该说是人们没有忘记早年大有作为的开元天子曾经将中国的历史推向盛世,人们在自己的记忆中宁愿保存一个美好的而不是可憎的唐明皇与杨贵妃,在他们身上寄托对开元盛世黄金时代的怀念。难道不是吗,杨贵妃三个字已然成为形象化艺术化的大唐盛世的代名词。

生前有明皇真挚的爱恋,身后有国人永久的怀念,长恨歌为她万古扬名。在马嵬熬过了那可怖一瞬的杨贵妃,她纵死又有何怨,又有何冤?

(原载《杨贵妃之死与华清池·马嵬坡》,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出版)

马嵬后论

## 乱世谋臣李泌

盛世末日

唐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造反，叛军还没攻进长安，杨贵妃就在马嵬香魂殒销。灾难也降临在大唐臣民身上，长达八年的战乱和伴之而来的饥荒中，生灵涂炭，国家的编户竟从八百九十万锐减为二百九十万，损失达三分之二。大唐盛世，跌入末日恐怖之中。

唐太宗说过：“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虽然“天不佑玄宗”，可是“人不厌唐德”<sup>①</sup>。一代忠臣，张巡、许远、颜真卿、颜杲卿、郭子仪、李光弼等，奋不顾身地率领民众抗击叛军，有的以身殉国。此时又有一名“山人”李泌，也想力挽狂澜于既倒，他的奇谋秘计和忽隐忽现飘忽一生的行踪，富有传奇色彩，引人入胜。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位“先生”作为一个介入决策中枢的天子宾友，在乱世的政坛上，是怎样的一位风云人物。

---

<sup>①</sup> 王夫之《读通鉴论·肃宗》。

## 天子宾友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论述，马嵬事件是一场亡国祸乱中犹夺权不止的政变。事变后一月，太子李亨便擅自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正浪迹于嵩山、颍水间的李泌闻讯奉召，不顾穿越叛军占区的危险，兼程奔赴行在，再次回到政治舞台。

新皇帝唐肃宗正愁身边缺少谋臣，见到这位东宫旧人，欣喜万分，经常在寝宫卧室里同他彻底长谈，“动皆顾问”<sup>①</sup>。李泌自称“山人”，不肯接受“右相”官职，但是中枢事务，无论四方文状还是将相任免，皇帝都和他商量，一时“权逾宰相”。李泌也很得意：“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sup>②</sup>

李泌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灵武朝廷要抗击和平定叛军，要取得老皇帝的承认，要预防李唐宗室内部皇族子弟间的阋斗，要抑制挟宠窃权的良娣张氏势力的膨胀，要约束宦官将相之间的内耗避免再次爆发恶斗……还有粮秣财政民生等等棘手问题。可是对于在肃宗称帝后不过八九天便赶到灵武的李泌来说，他两手空空，除了那位刚自我加冕的新帝的一点信任以外，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好一个李泌，还真拿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锦囊妙计，支撑住危局，没让灵武小朝廷变成风雨飘摇中的大唐江山的一段短命插曲。

## 元帅长史

当务之急是军事问题。抵抗叛军，事关生死存亡，也是在马嵬借百姓遮道请留后到灵武另建朝廷的口实，肃宗不能丢掉自己立

① 《旧唐书》卷130《李泌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8。以下此书引文不备注。

命安身的抗敌平叛的旗号。可是仅仅靠从马嵬分兵带过去的一二千人马,要与已占领了都城长安的至少十五万叛军对抗,又谈何容易。幸而郭子仪、李光弼很快就从河北带五万兵赶来勤王,“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肃宗给郭、李二人都加封了宰相官衔,以示笼络。

有了军队,兵权交给谁?唐玄宗在入蜀途中下制由太子李亨充任天下兵马元帅,又分兵权给诸王子,让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等率制李亨。他不知道这时李亨已自行加冕做了皇帝,帅印要另外选人执掌。起先肃宗想用建宁王李倓,他是自己第三子,英勇果断,有才略,自马嵬北上以来,李倓组织骁勇,侍卫于李亨鞍前马后,不怕势孤力单,途中多次与寇盗奋力血战,保护李亨安全。父亲吃不上饭时,他又悲泣难过,表现得忠孝两全,很得军心。可李泌认为不能用李倓为元帅,说:建宁王诚然有元帅才,但广平王是兄长,如果建宁王立下大功,能让广平王学吴太伯,为让兄弟继位而自我流放吗?肃宗说:广平王是冢嗣,第一继承人,何必还在乎元帅身份呢?李泌解释:广平王还没有正位东宫,现在国事艰难,人心寄于元帅,一旦建宁王成就了大功,陛下虽不想立他为副君,可跟他一同建功的人们肯罢休吗?唐太宗和太上皇不都是因为有定天下之功而承继大统的先例吗?

李泌的话非常老到,他提醒要预防再次发生玄武门事变式的兄弟相残悲剧。肃宗接受李泌此议,任用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后来李俶顺利继位为唐代宗,他是隋唐两朝立国以来一百八十余年中第一个以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嫡长子继承法的传统从此恢复并基本上稳定下来,唐政权因而增加了经受后期衰败冲击的承受力。当然宫廷政变有时也有选优汰劣的作用,不全是坏事,这里不能细说了。

用兵是军国大事,帅印可以让皇子挂,处理军务还得老成的行家。就像隋朝平陈一役,隋文帝让晋王杨广为统帅,但军中事皆取

决于元帅长史高颖和司马王韶两位副手一样，唐肃宗执意要李泌辅佐广平王，为此，动了些心眼来说服李泌。

皇帝先要李泌换下平民布衣穿的白衣，改服紫袍，那是三品以上官员最高级别的服色，借口是李泌陪他视察军队时，军士总指着窃窃私语：“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是山人。”为杜绝军士对李泌的闲话，才要他改服紫袍。面对以衣帽取人的陋习，这样做自然有其道理。皇帝声明，这并不是强要李泌在这危难之秋屈就为官。李泌不得已，让了一步，勉强接受。

换上紫袍后去谢恩时，唐肃宗见他上了圈套，又笑着说：“既然已经穿上这官服，怎么可以没有官职呢？”边说边从怀里掏出早已写下的敕书，宣布任命李泌为元帅长史（一说司马），前面还冠上一个专为李泌创设的头衔“侍谋军国”。李泌坚决推辞。肃宗说：“朕不敢命你为相，给你这职务是为救国难。一旦贼平，任行高志，去留一切听尊便。”难得皇帝这样恳切待人，李泌只好再让一步，临危受命了。肃宗高兴地说：你曾侍奉上皇，为我师友，现在又任广平王行军，我们祖孙三人都借重你的道义支持。

到任以后，李泌不能不想到，以自己一介布衣山人的阅历去面对不乏骄兵悍将的西北镇兵，能服众吗？如何取得指挥军队的权威呢？当年刘邦曾用设拜将台的办法，成功地树立了韩信的权威。现在灵武，既无设台的财力，也无建台的时间，李泌别出心裁，要在酒场上演武，借酒文化造势。

李泌和皇帝商量好，当李光弼、郭子仪二将首次晋见新任元帅时，特做这样的安排：李泌在家摆酒，约见李、郭二人，席间让广平王赶到李府，二将必然要起身恭迎拜谒，李泌示意听他酒令官的，不必拘礼。于是广平王进屋后随便坐下，参加饮酒谈笑，元帅、长史一起对二位将军好言慰安。酒席撤后，李泌才提醒二将军做正式拜谒。这样令李、郭二人亲眼目睹，元帅以天子元子之尊都要俯从李泌的酒令，体会皇帝正宠任元帅长史，将来在军中必能令行禁

止,一旦有谁触犯军律,死生都在李泌手中,由此对李泌肃然起敬。全军上下听说后,也无不对之心生敬畏。《邺侯家传》所载这个故事若非虚构,那么李泌的做法,比起用杀宫女杀将士使全军股栗的办法带兵的名将孙武、杨素来,要文明多了。

当时兵权,出征军由郭子仪、李光弼统领,分赴河东南北作战;作为指挥中心的元帅府置於宫禁之中,除了负责保卫天子,出警入蹕,还要处理全国军务。四方奏报都先由李泌开拆,紧急事,就近呈送皇帝定夺。宫廷门禁锁钥,也由广平王和李泌掌握。

李泌有时也直接参领军事行动。如至德元载(756年)十月,好说大话的宰相房琯自己请命带兵收复两京,按古代兵法,用二千乘牛车摆出车战阵势,被叛军火攻大败,死伤四万余,李泌赶紧带兵将房琯和数千残军营救回来。至德二载(757年)九月,十五万唐军与回纥联军收复长安一役,由元帅广平王李俶指挥,李泌和他一起在前线行动。

## 北伐妙计

作为总参谋长的角色,李泌关于平叛的整个军事行动,有全盘考虑,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战略意见,认为应该命令李光弼军从太原出井陘,突入河北;郭子仪军由冯翊(今陕西大荔)挺进河东,使范阳和长安的叛军首尾不能相顾。战术上,令郭子仪先不攻取华阴潼关,让洛阳、长安两部顽敌之间的道路保持通畅;灵武方面的官军进驻扶风(今陕西省凤翔)牵制敌军;子仪、光弼两军从河东、河北交替出击,叛军救其首则击其尾,救其尾则击其首,迫使叛军在数千里之间疲於奔命,而官军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遇路。”扰敌疲敌数月,到明年春天,再任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南下,与李光弼南北夹击,攻取范阳,倾覆叛军巢穴,使之退无所归,大军再四面合击,最后收复两京。

正愁叛军强悍,不知何日能平定的唐肃宗听了此计之后,眉开眼笑,心中大悦。可惜肃宗缺乏用两年时间取胜的耐心,所以又一次次命房瑄、郭子仪急取长安,结果在陈涛斜和清渠一败再败,河北也一度全部陷入敌手,军事形势逆转。

至德二载二月,李泌再次重复前策,派遣安西和西域来援的部队从塞东北南取范阳。肃宗认为这样迂回数千里,调兵北伐先取范阳,绕弯子太大了。李泌解释,以现有兵力直取两京是可以攻克的,但叛军必然会重整旗鼓而来,再困官军,不是久安之策。原因是用调来的西北守边和各族的军队作战,强攻两京虽可以取胜,但调来的军队不能久留,天热了都要走,而败退的叛军余众,回到老巢休兵秣马,一定伺机重来,这样打下去战争就没有尽头了。李泌强调,应该先捣毁其巢穴,使贼无所归,才能一劳永逸。这道理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是被肃宗拒绝,他一味说,自己着急想早晚侍奉上皇,不能等那么久。实际上肃宗一心只想早些收复京城,以再造社稷之功来巩固他马嵬以来用不正当手段夺来的皇帝位,所以李泌怎样说,他也是听不进去的。

王夫之痛惜李泌此计受阻,说:“使其计行,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而肃宗不从,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於晨昏之恋,不能久待’,徒饰说耳。”<sup>①</sup>

如果肃宗按李泌计行事,最跋扈的河朔三镇乃至整个藩镇割据之势得以消弭,大唐中衰局面也许因而改观,盛世又可回到人间,那么李泌功莫大焉。然而皇帝的意旨是不能抗拒的,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李泌彻底失望了。在中国军事史上,他只能是一个被遗忘的战略家。虽然他也曾拥有和隋代良相高颀一样的元帅长史头衔,他却不能像主持平陈之役的高颀那样有所建树;虽然他灵活机动

<sup>①</sup> 王夫之《读通鉴论·肃宗》。



将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的全套战略战术不啻是胸中百万雄兵，却被皇帝出自私心弃置而付诸东流。李泌无缘成名，只能落下深深的遗憾而耿耿于怀。

半年以后，官军按肃宗的既定方针向前平推攻下长安，但整个平叛战争却因而延续多年，藩镇割据更是终唐之世不能消弭，于是确有先见之明的李泌乘被紧急召见之机，在凤翔陛辞肃宗，坚决告退，不等肃宗春风得意回到长安，他便踏上往北岳衡山的路，拂手归隐而去。那断然的告辞成为与浅薄武断的肃宗皇帝的永别。黄鹤一去不复返，显然是这时郁结心中的失望和遗憾的无声发作。

## 迎归上皇

召见李泌的谈话是至德二载九月在凤翔（在今陕西）进行的。当时收复京城的捷报刚刚送到凤翔。肃宗立即选调骏马飞驰长安召随军行动的李泌奔赴行在。二人一见面，肃宗就告诉他，已经往蜀中呈送奏表，请上皇东归，自己准备交出皇权，退回东宫，再为臣子。显然，马嵬事变以来，杀了父皇爱妃，又夺了他皇位，事情做绝了，道义上很难交代，成为肃宗一大心理负担，想借收复京城迎回上皇之机，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急找李泌来，就是磋商这件大事如何进行。

李泌听了忙问：送奏表的中使还能不能追回来？得知已经走远了，李泌叹道：“上皇是不会回来的，原因自然是父子间已结下很深的芥蒂，可现在儿子把父亲丢掉的京城收复了，有大功于社稷江山，一功遮百丑，下台的明皇帝再糊涂也该知道自己已没有资格再存复位的奢想了。肃宗的表奏还提出交还皇权的问题，他哪能回来呢？”

事情完全像李泌料定的那样。先派去送表奏的中使带回上皇回话的诰书说：分给我剑南一个道自为奉养，不再回京了。

肃宗问有何办法补救？李泌说他可以另发一贺表，以群臣名义，承担马嵬请留、灵武劝进的责任，解释一切都是为平定安史之乱。现在大功告成，皇帝朝夕思念上皇，请速还京，以就孝养。这样只说尽孝，不提皇位的事，才能请回上皇。

肃宗在忧惧不安中等待第二份奏表的回话。

好容易等到送表的使者回来，报告说：上皇收到第一个表奏，得知皇帝请求退位，要回东宫去，终日惶惶不安，饭也吃不下，为避皇位之争议，决定不回来。等收到李泌的群臣贺表，方才大喜，摆宴奏乐，已定好回京的日期。肃宗听了如释重负，宽下心来，自己进京，准备迎接上皇归来。

十二月，唐明皇回到阔别一年半的长安。肃宗备法驾，亲往咸阳迎接。相见时，肃宗脱黄袍改服紫袍，趋拜舞蹈，呜咽不止，还捧足牵马，十足地扮孝子表演了一番。上皇见状，也洒了几滴泪，要来黄龙袍，亲自为肃宗穿上。肃宗伏地顿首，叩头固辞。上皇很明事理地把儿子要的话递过去：“天数，人心皆归于汝”，皇帝位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还表示自己只要能安度余生，就是你尽孝了。肃宗这才坦然地又穿上天子黄袍。

父子间马嵬事变以来的齟齬，至此在表面上戏剧性地收了场；肃宗皇位的合法性，终于得到公开的承认；李唐皇室南北两个朝廷并立，内部隐伏了一年多的一场大危机，顺利平复了。对此，肃宗早早就感激地对李泌说：“皆卿力也！”

## 五不可留

在凤翔，李泌处理完贺表的事情，肃宗高兴地去他那里一起饮酒，同榻而寝。不想这时李泌却提出隐退赋闲的请求。肃宗感到很意外，便问他：朕与先生多年共忧患，眼看着要天下太平可以同享安乐，为何马上要离去呢？李泌说：我有五不可留，陛下还是放

我走，“免臣于死”。肃宗更奇怪了：这话是怎么说？李泌的解释是：“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肃宗若有所悟，推说：先睡吧，过几天再议。李泌称：陛下今天睡到我床上，都说不通，更何况过几天上朝当殿再议呢！陛下不让我走，“是杀臣也”。肃宗有点生气，说想不到你这样怀疑我，是把我看作勾践了！李泌说：要杀我的不是陛下，是“五不可”。陛下一向如此厚待我，我有事还有不敢讲的，将来天下安定了，就更难讲话了。

肃宗想了半天，问：是因为我没有采纳你北伐范阳之谋吗？李泌有意回避这话题，直截了当地说：不敢讲的，是建宁的事。前面提过，建宁王李倓，从马嵬到灵武，血战侍卫，表现得有勇有谋，李泌也很看重他，虽然明白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宜让建宁王担任，但是北伐范阳之事，还是保举他带兵的。李倓对这两件事一再表示很理解，很感激，私下还对李泌说过，知道张良娣与李辅国勾结起来要害李泌，自己愿为先生除害。李泌当即劝阻，可李倓不听，屡次到父皇那里告御状，揭发张、李的罪恶。张良娣与李辅国反咬一口，诬告李倓恨不得为元帅而谋害广平王，肃宗竟听信谗言，赐李倓死。对忠孝两全且“有艰难定策之功”<sup>①</sup>的儿子说杀就杀，李泌不能不寒心。在与肃宗同榻而寝时的言谈中，两次说及“免臣於死”、“是杀臣也”，重复提到死杀的问题，是现实的危险而非杞人之忧，因为麻烦正来自手狠心毒的张良娣和李辅国，皇帝一时的恩信并不可估恃。

### 抑制良娣

说到张良娣，她是肃宗为太子时娶的侧室，因为韦妃被废，吴

<sup>①</sup> 《郾侯外传》。

妃(代宗生母)早薨,才有轮到她出头的机会。此女子“辩惠丰硕,巧中上旨”<sup>①</sup>,是个乖巧的胖美人。当夫君忐忑不安苦守东宫等待继承咫尺天涯的皇位时,她还安分。一百年前,以武则天为首的一代女性崛起,曾有叱咤风云的一度辉煌。但自从太平公主败亡,她们在政治舞台上沉寂了。新一代女性的面貌改换成徒以色事人的杨贵妃柔顺的模式。现在安史之乱和马嵬事变创造的机会,又唤醒了张良娣内心深处隐藏很深的政治激情。事变时她就力主太子与上皇分道。在仓促去灵武途中,道路多虞,每夜入寝,她睡在外面,称有盗寇入室,“妾以身当之”,以便太子在后面脱身。在灵武她临盆三日便挣扎起身,为将士缝战袍。肃宗心疼地劝阻,她却说:现在不是妾身自养之时,要尽力替夫君做事。危难中有不俗的表现。可她出自皇亲国戚之家,绝非柔弱安分之辈,稍一得志,便学她婆婆(玄宗韦妃)的婆婆(睿宗窦妃)的婆婆武则天的样子,弄权干政。

她勾结的宦官头目李辅国,飞龙小儿出身,本是个在禁苑马厰中供事的阉奴,因为粗通书计,早年被派到东宫做事,成为太子李亨的亲信。马嵬事变中参预陈玄礼的策划,又与建宁王李倓一起挽住马缰导演遮留太子,拥戴李亨径往灵武自立。从此飞黄腾达,拥兵专权,与张良娣为表里,左右了皇帝。他俩耳边风加枕头风一刮,轻易就除掉了李倓。而后的目标是李泌和广平王李俶。

李俶谋于李泌,要设计除去良娣和辅国,明确表示对李泌处境十分担心。李泌怕李俶也遭建宁之祸,劝阻李俶,嘱他恪守孝道,委曲顺从良娣,可以免祸。因为良娣所生二子,长子李侗早薨,幼子李侗还小,无法取代李俶的冢嗣地位,只要不激化与良娣的矛盾,尚可相安无事。自己则早已与皇帝有约,“候平京师,则去还山,庶免于患”。国难当头,李泌无论如何要避免再生内乱。

<sup>①</sup> 《旧唐书》卷52《肃宗张皇后传》。

但是必须抑制张良娣挟宠窃权,李泌为此做了些努力。当肃宗提出使良娣正位中宫时,他竭力加以劝阻,说:“陛下在灵武践大位,是俯就群臣心愿,为使光复成功。立皇后这是家事,应请示上皇之命,那不过是早早晚晚的事,不要急着办。硬是给搁置起来,让张氏尴尬地继续使用太子侧室的名号良娣,留在远离正宫皇后的位置上。”

又一天成都送来上皇赐张良娣的七宝鞍,李泌见了说:现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合适乘用此鞍,应将珠玉拆下来交付库吏,将来赏给有战功的将士。良娣听了新怨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她人还在后面阁中就忍不住叫喊起来:“乡里之旧,何至于是!”张良娣母亲是新丰人(在今临潼),李泌家居京兆(今西安市),所以喊他乡党。肃宗还算明白,说:先生这是为社稷考虑,当时就命人将鞍上装饰用的珠玉拆下,以备用来赏军。建宁王见此状在廊下禁不住哭泣起来,肃宗感到奇怪,问是怎么回事。李泌说:我以前担心祸乱难平,如今陛下从谏如流,相信不用多久就能看到陛下迎上皇回长安,所以高兴得哭泣起来。良娣越听越气,因此怨恨李泌、李泌。史家认为,这是良娣潜杀李倓和李泌不自安的起因。

### 保全储君

李泌在请求归山的那次夜谈中,曾反复说明皇帝错杀了建宁,最有力的证据,他提出了当初皇帝要任命建宁为元帅,被李泌阻拦,改用广平一事。因为事后建宁不仅不记怨李泌,反而称赞他的忠心,和李泌更加亲善。李泌说:“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说得肃宗后悔不已落下眼泪,承认先生所言有理,但是“既往不咎”,自己不愿再提这件错杀儿子的伤心事了。

李泌说自己讲这事的意思,不是追究既往,是想要陛下慎将来。他给肃宗讲了武则天的一个故事。

昔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天后方图称制，恶其聪明，鸩杀之，立次子雍王贤，贤内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卒死於黔中。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

据考证，李弘是病死的，说是武则天鸩杀，证据不足。而且李贤自己是老二，怎么说“三摘犹为可”呢？看来李泌这样解释《黄台瓜辞》十分勉强。如果这故事是李泌编出来的，那更可见他保全处在储君地位的广平王李俶的良苦用心了。事实证明李泌保全储君的计谋是成功的，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死后，李俶便继位为唐代宗。虽然当时还不免有一段小插曲：肃宗病危时，已经决裂的张皇后、李辅国之间闹起火并，李利用矛盾，命李辅国、程元振率禁军逮捕张皇后，肃宗咽气后立即将她处死。李俶登基当年，又指使人暗杀飞扬跋扈的“尚父”李辅国，尽除这两个死对头，出了憋在心中多年的恶气。此事的意义当然不在报个人的宿怨，而在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李俶等到了从容诛除乱政元恶的时机，也使还未丧尽人心的大唐王朝，又有了延祚一百五十年的阳寿。

### 以爵赏功

政局的稳定，还有赖于安抚好功臣。光复大业垂成之时，肃宗皇帝已经为如何封赏功臣伤脑筋了。他问李泌：现在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等打下两京平定四海以后，再没有官位可以为赏了，这怎么办？唐朝政治自天宝以后，已经腐败到了用宰相官衔为封赏，滥赐给边镇节帅了。

李泌十分精辟地分析了以官赏功的弊害，提出解决办法，说：

“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有功之臣，可以赐以茅土，让传之子孙，不能给职官。唐初未得关东之地时，封爵是虚设的，唐太宗想恢复古制，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等怕失权，以不愿离京久违天子为借口表示反对，以至只得用给官做的办法奖赏功臣。这“以官赏功”有两大害处：“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没本事的把政事搞得一塌糊涂，大权在握的又难管得住。这些做了大官的功臣，都不为子孙想想，只顾自己当官，好以权谋私，无所不为。比如安禄山，如当初不给他左仆射和三镇节度使的高官重权，只封他一百里之国，他顾惜要传封国爵位给子孙，就不会造反了。现在一旦天下太平，不如以爵土赏功臣，把他们养起来，最多封二三百里之地，不过一个小郡，想作乱也不难制。肃宗称赞这办法好。

且不说复古封国行爵赏是否可行，李泌分析的“以官赏功”的坏处，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政治积弊的。除非“官以任能”，否则要想解决官场的腐败和内耗动乱，无异于缘木求鱼，水中捞月。

### 归隐衡山

说到自己，李泌说：我受赏与别人不一样。“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他是练气功辟谷这一门的，传称他早年就精究易象，人称“神仙”，大概有点特异功能。以往肃宗在宴请臣下时，总是给这位不吃饭的神仙蒸两只梨，因为是御手亲自调制，反倒最是荣耀，让别人羡慕不已。既然连饭都不吃，又不娶亲，没有家室之累，孑然一身，与世无争。他倒也不是毫无所求。李泌要求皇帝：“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话说得十分幽默潇洒，肃宗听了大笑不止。因为有这样记载他历史的《邺侯家传》，使千年之后李泌这个人物仍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司马光不大相信这种材料，认为近于戏谑，不可取。我以为倒是符合李泌性格的，有诗为证：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  
 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  
 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气是良图。  
 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长歌行》

诗是李泌本人所写，《全唐诗》也收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了。官军收复西京长安以后，他在凤翔辞别肃宗，不等皇帝凯旋回京，就兀自归山走了，作为元帅长史，也没给元帅打个招呼。

张良娣和李辅国肆虐，缺乏安全感，又与宰相崔圆不合，都是急于要出走的原因。皇帝留他不住，做个人情，下一道敕文给郡县守令，让在山里建一处住所给李泌，还给供三品料，大致是月俸一万七千钱，算是管他饭了。

回想李泌这前半生，早年唐玄宗任他为翰林待诏，不久被杨国忠挤走，唐肃宗召他回来，用为元帅府长史，得与元帅广平王李俶未来的唐代宗亲密共事，祖孙三代皇帝都对他优礼有加。可是他一次次失望地离开，腐败的政治使他无法施展抱负，于是先是嵩岳，后是衡山，两次归隐而去。

李泌精研易象，熟谙国情，料事如神，是个旷世奇才，可朝廷权贵并不希罕他，在派系争夺的政治倾轧中，他是个不合时宜的多余的人。那个时代分派给他的角色，就是做一名隐士，他知趣地走了。

李泌是丢下大功垂成坐享荣耀的机会走的，这一走，有失也有得。所得者是从齷齪的政治旋涡中脱身，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在山林溪水间隐居，大自然会安抚他那颗失落的心。

千百年来，中国士人都信奉这么条格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



独善其身。”尽管这后半句未必合他心愿,他也只能这样聊以自慰了。功成身退,这源自老子的思想:“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sup>①</sup>更是从范蠡、张良以下许多聪明之士保全性命自我解放的办法,于是李泌,一个皇帝的先生,又变成了一名超凡脱俗的隐士山人。至于唐代宗时他又被召回长安,做了两朝宰相,人有变化,那是后话不提。

(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1期)



<sup>①</sup> 《老子》第九章。

## 廉政宰相杨绾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藩镇割据和吐蕃进犯的内外侵逼下，一蹶不振。而朝中以宰相元载、王缙为首的一班权臣，仍聚敛邀宠，专横贪暴。他们的家属，包括元载妻王氏，子伯和、仲武，及王缙的弟、妹，都争纳贿赂。政治乌烟瘴气。

唐代宗隐忍多年，终于在大历二十年（777年）下决心诛除这伙国贼巨蠹，与执掌禁军的舅父吴凑密谋，在宰相议事的政事堂里逮捕了元载、王缙。执行元载的死刑时，刀斧手存心羞辱他，脱下秽袜塞进他口中而后杀之，替百姓们出了一口恶气。元载的凶妻暴子随即也被处死。抄没元载家时，搜出远自西域、南海进来的贵重调料胡椒达800石之多，成为历史上一个惊人的记录。

为平息人们对贪赃枉法行为深恶痛绝的激愤情绪，唐代宗处死元载、远贬王缙后，起用一向清贞自守因而众望所归的杨绾为相。史称：“及诏出，朝野相贺。”

杨绾素以德行著闻，质性贞廉，车服俭朴，一贯廉洁自律。这样一位清廉的名儒上台主政，立即对官场产生了净化的效应。受到震慑的文武百官纷纷收敛行迹，著名的如“家富於财，第舍宏侈”的御史中丞崔宽，当天就派人急速拆毁了建在皇城之南，号称“池馆台榭，当时第一”的别墅；京兆尹黎干，平时出门，随行骑从百余，前呼后拥，排场逾礼，也即日减损了出行仪仗；连鼎鼎大名，有再造唐朝的不世之功的郭子仪，虽远在邠宁行营，听说杨绾拜相，马上

将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史官赞叹:“其镇俗移风若此!”

为开展廉政建设,杨绾就任后就奏请为京官加俸。元载理财主政时,虽然财政情况已大为好转,但仍故意将京官的薪俸定得比外官低许多,以致不少京官不能自给,常向外官乞贷借钱,这容易引发行贿索贿的腐败风气。为此杨绾奏请每年增拨十五万六千余缗钱,为京官加俸。此举是很有见地的,意在创造要求百官一心奉公、清廉为政的物质保障前提。杨绾“居庙堂未数月,人心自化”。是他本人的表率作用和相应的配套政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可惜,杨绾上任旬日便中风抱病,为相仅三个月就逝世了。唐代宗倚重他的才望,正想厘革旧弊,重振朝纲,他却匆匆撒手而去。皇帝不由得深深叹息:“天下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

这位清官,生前虽累任清要,却“无宅一区”,所得俸禄,随月分给亲故,以至他死时,“居家无匹帛之余”。皇帝遣内使往吊时,赐绢千匹,布三百端,才得以了却丧事。而那一场颇有生气的廉政建设,也因这位主持人的去世,就此打了句号。没有制度的保证,这次反腐倡廉,一起步便夭折了。大唐中兴的前景,又暗淡下去。但是像杨绾这样一身正气的政府首脑对官场的廉政建设会产生上行下效的巨大影响,和杨绾采取的高薪养廉的办法,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杨绾的这一事迹,可参看两唐书《杨绾传》,《资治通鉴》卷225,《唐会要》卷53。)

(原载《中学历史报》1995年第10期,收入《读史新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唐代儲君

有唐一代，登儲位者三十一人，名義為皇太子、皇太弟、皇太叔，內有皇嗣一人，是武則天稱帝時給降封的唐睿宗的稱號，也是儲君，這裡一併計入在內。<sup>①</sup> 這三十一人中，十九個得以繼位，其中包括少帝重茂。其餘十二個未能繼位的儲君，被廢、殺的十人（建成、承乾、忠、賢、憲、重俊、瑛、永、成美、裕），也就是說，在儲位上就出事的，占30%以上。如果換一種方法計算，曾在儲位，連同登基后被殺的，達十四人（建成、忠、賢、重俊、中宗顯、少帝重茂、瑛、憲宗純、敬宗湛、永、成美、昭宗晔、裕、哀帝祝），也就是說，在唐代曾為儲君者，45%死於非命，其中還未計入李弘。人們也許很難接受煌煌大唐政治上這險惡可怖的一頁。我們自不必去揣度太子們一個個地去參加隆重的冊立典禮時，如果得知他們總體的命運是如此暗淡，會持什麼心情。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當他們正位東宮時，一只腳就踏上了斷頭臺。

為了解儲君們既輝煌又恐怖的命運，我們回顧一下儲位爭奪的血腥歷史。先說被廢、殺的十位儲君。

李建成 武德元年（618年）李淵稱帝一個月即立年已三十的嫡長子建成為皇太子，“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sup>②</sup>。

---

① 永淳元年高宗立重照為皇太孫，時太子顯在東宮而更立太孫，不合禮制，不計。

② 《舊唐書》卷64《隱太子建成傳》。

曾悉心加以培养。但他的胞弟李世民开国功高,羽翼丰满,早就不甘“守藩端拱”。<sup>①</sup>到武德五年(622年),建成从王珪、魏徵说,请兵击刘黑闥,取功名以安太子位一事,已可见建成、世民兄弟间争斗之端倪。而后建成与四弟元吉变本加厉地频频谋害世民,最后激成喋血宫门的政变,建成、元吉双双死于世民和尉迟敬德箭下,李世民夺取了太子位和皇帝宝座。诚如布目潮飒先生指出的那样,作为次子的李世民屠兄夺位的这段经历,和当年隋炀帝的作为十分相像,<sup>②</sup>时隔二十多年,历史重演了一遍。

**李承乾** 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登基后两个月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贞观九年(635年),退位的唐高祖去世,唐太宗服丧期间,“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sup>③</sup>十六七岁就开始练习政事。但他患足疾,长大后好声色,又搞同性恋,唐太宗爱重的李泰渐生夺嫡之心,亲兄弟俩各树朋党,作你死我活的阍斗。贞观十七年(643年)事泄,唐太宗伤感万分,用将太子、魏王两废的办法处理,并挥泪斩功臣侯君集,以防争夺储君之位的冲突再起。两年后,二十六岁的承乾以庶人之身郁郁死于放逐地黔州(今四川彭水县)。

**李忠** 唐高宗李治的长子,生母是后宫刘氏,没有地位。王皇后无子,看到二进宫的武昭仪独专房帷之宠,可能又得到她已怀孕的消息,在其母舅柳奭策划下,联络长孙无忌和另外三位宰相褚遂良、韩瑗、于志宁一起出面,“固请立忠为储君”,<sup>④</sup>匆忙立李忠占据太子位。<sup>⑤</sup>他们还安排于志宁和另两位宰相张行成、高季辅兼任东宫辅臣,这样一来,除李勣一人有意被排除在外,宰相班子中

① 《旧唐书》卷66《杜如晦传》。

② 《つくられた暴君と明君の炀帝と唐の太宗》清水新书044,昭和59年出版。

③ 《旧唐书》卷76《恒山王承乾传》。

④ 《唐会要》卷45《功臣》。

⑤ 参汪篊《武则天》,《汪篊隋唐史论稿》。

的全部人马都卷入了拥立李忠的事件，显然是拉开架势和武昭仪较量了。最后的结局是武昭仪接连生下儿女后使手段夺取皇后位，正是那个被长孙无忌等排斥的李勣为她主持了册立仪式，尔后以已有正嫡为名，废李忠，储位腾给了武后所生大儿子李弘。当年拥立李忠的全班人马，自长孙无忌以下或贬或杀，全军覆没。被囚于黔州当年关押李承乾的故宅中的李忠，也不免在麟德元年（664年）被诬与草诏废武后的上官仪合谋而处死，时年仅二十二岁。

李贤 唐高宗的第六子，上元二年（675年）五月太子李弘去世，六月李贤以武则天所生次子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二十二岁。父皇一心栽培这个天分很高，“容止端雅”的儿子，屡次命他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论称之”，皇帝手敕褒奖，称“家国之寄，深副所怀”<sup>①</sup>。当时宰相多半是李贤的支持者，有如当时曾反对皇帝“逊位于后”<sup>②</sup>的郝处俊、李义琰，他俩和为李贤主持注《后汉书》的张大安都兼着太子左、右庶子的要职，还有一个来恒，是二十年前密表进谏不可立武昭仪为宸妃而被外贬的来济之弟。武后担心地看着这个不顺从的儿子逐渐羽毛丰满，曾命北门学士替她撰写《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给李贤读，自己“数作书消让之”<sup>③</sup>，但是这母子间的感情裂痕已无法弥合。于是有正谏大夫明崇俨“私奏章怀太子不堪承大位”，<sup>④</sup>李贤得知后，“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sup>⑤</sup>。仪凤四年（679年）明崇俨突然遇刺身死，被怀疑是他指使人干的，终于把从东宫马坊中搜出的皂甲当作他谋反的证据。高宗“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武则天却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调露二年（680年）废李贤为庶人，幽禁起来，张大

① 《旧唐书》卷 86《章怀太子贤传》。

② 《新唐书》卷 76《则天武皇后传》。

③ 《资治通鉴》卷 202 永隆元年八月。

④ 《旧唐书》卷 191《明崇俨传》。

⑤ 《旧唐书》卷 116《承天皇帝俊传》李泌语。

安以下十余人和曹王明、嗣蒋王炜等连坐，被流徙远州。李贤后来迁至巴州（今四川巴中），嗣圣元年（684年）唐中宗被废后一月，李贤被逼自杀，时年三十二岁。他的三个儿子被幽闭宫中十八年，不许出庭院，“每岁被杖数顿，”<sup>①</sup> 受尽折磨。由李贤与武则天格格不入的感情和他儿子们悲惨处境反思，特别是考虑到高宗皇帝对韩国夫人及其子女出格的眷顾，我相信新旧传和通鉴都载称的宫人所传李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李宪** 原名成器，唐睿宗嫡长子，嗣圣元年睿宗即位当月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建大周称帝，睿宗降为皇嗣，太子改为皇孙，长寿二年（693年）降为王。唐隆元年（710年）李隆基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唐睿宗复位。面对地居嫡长又曾为皇太子的李宪和有功于社稷的第三子李隆基，睿宗为建储事感到两难。李宪以“储副者，天下之公器，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sup>②</sup> 固让异母弟隆基。玄宗即位后对他这位大哥礼敬有加。总算李宪聪明，谦让得享天年，活到六十三岁，是未能登基的储君中唯一高寿的，死时还被追谥为让皇帝。

**李重俊** 唐中宗第三子，后宫所生。中宗嫡长子重润在长安元年（701年）被武则天杀，次子重福被韦后诬与此案有涉而被放逐，<sup>③</sup> 才于神龙二年（706年）立重俊为皇太子。时诸武跋扈，教安乐公主“辱重俊以非韦出，晋为奴，数请废，自为皇太女”<sup>④</sup>。神龙三年（707年）重俊愤而起兵，发羽林及千骑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最后失败被杀，卒年约二十余。

**李瑛** 原名嗣谦，唐玄宗第二子。王皇后无子，瑛生母赵丽妃

① 《旧唐书》卷86《章怀太子传附幽王守礼传》。

② 《旧唐书》卷95《让皇帝宪传》。

③ 旧传明言重润为长子，重福为第二子，但以重润生于开耀二年（682），重福卒年三十一则生於680年言，重润为嫡子，重福为长子。

④ 《新唐书》卷81《节愍太子重俊传》。

有才貌,善歌舞,“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sup>①</sup>。开元三年(715年)为皇太子。不久母宠衰而子爱弛,得宠的武惠妃谋陷太子瑛,想以己出的寿王瑁取而代之。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将废太子,谋于宰臣,张九龄谏:“太子天下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且太子之在东宫,未闻大恶……无宜废绝。”<sup>②</sup>武惠妃密遣宦官牛贵儿传话:“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遭张九龄叱责:“房幄安有外言哉!”还将此状报告了皇帝,“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sup>③</sup>。不过在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罢相贬往荆州之次日,唐玄宗即废太子瑛和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而后赐死。皇帝一日杀三子使朝野震惊,其直接原因,通鉴从旧传,用太子、二王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说,新传是惠妃诡召太子、二王披甲入宫,而后诬告他们谋反;《唐会要》称:“瑛与鄂、光自谓母氏失职,常有怨望,遂为李林甫及驸马杨洸所诬。”无论废杀太子的具体事因为何,其深层的原因恐怕是要探讨“玄宗对太子自始至终的猜忌”<sup>④</sup>。他耳闻目睹隋唐以来一系列政变均以太子为号召,使他特别警觉预防东宫成为与自己对抗的政治势力,为此他罢免了维护太子瑛的张九龄,后来专用与太子作对的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选择太子时又偏偏拒绝了李林甫建议的元子李琮或所宠武惠妃所生之李瑁,立了李琦,即后来策动马嵬事变的太子李亨。正是唐玄宗这种多疑的心态造成一日杀三子的悲剧,并为他自己和他的爱妃准备了长恨绵绵的历史悲剧。

李永 唐文宗的长子,太和六年(832年)立为皇太子,生母王德妃失宠,被杨贤妃潜死。本人又冥顽不悛,杨贤妃日夜潜毁太

① 《资治通鉴》卷211 开元二年十二月。

② 《唐会要》卷4《储君》。

③ 《新唐书》卷126《张九龄传》。

④ 孟艳红博士论文《藩镇与中唐政局》(未刊)。



子,开成三年(838年)议废,不久暴死宫中。后来文宗见儿童爬竿表演杂技,其父环走竿下悉心保护,受到感动,悲叹自己“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儿乎”<sup>①</sup>!“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sup>②</sup>,于是悉召当日告状害太子的教坊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十四人皆杀之,可知李永死于非命。卒年其父才三十岁,他尚未成年。

李成美 唐敬宗少子,生母亡氏位。太子永暴死后一年,即开成四年(839年)被文宗立为皇太子,未及行册礼而文宗病重。翌年正月命杨嗣复、李珣等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幼小有疾抗旨,矫诏立穆宗第五子颖王灏为皇太弟。隔一日,为“受制于家奴”<sup>③</sup>而愤愤不平的文宗带着甘露之变失败的遗憾去世。随即,被降为陈王的成美和杨贤妃、安王溶一起被赐死。年幼的成美为当两个多月的皇太子送了命。

李裕 昭宗嫡长子,乾宁四年(897年)册为皇太子。光化三年(900年)刘季述等两中尉、两枢密使帅禁兵逼宫,把密谋尽诛宦官的昭宗囚禁起来,迎太子监国,旋令嗣位。仅月余,刘季述四人被擒杀,昭宗复位,李裕黜为德王。天祐元年(904年)昭宗被朱全忠、蒋玄晖杀,翌年,李裕等昭宗九子一齐被杀害。

除去在储位上病死的李弘、李宁,上述十位未能继位的储君,八个被杀,一个幽死,只李宪一人以寿终,储位对他们来说名副其实是九死一生的陷阱。

实际上,在唐代卷入储位之争,失败而成为悲剧角色的历史人物,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我们至少可以再列举出吴王恪、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安乐公主、澹王重福、建宁王倓、澧王恽、绛王悟、漳王凑、安王溶等十个为争储而丧命的亲王、公主。

① 《新唐书》卷82《庄恪太子永传》。

② 《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

③ 《资治通鉴》卷246 开成四年十一月。

吴王恪 唐太宗第三子，生母是隋炀帝女杨妃，“地亲望高”。<sup>①</sup> 承乾废时，太宗次子宽早死，恪处于长子地位，但唐太宗听从长孙无忌劝，立了长孙后所生之子李治。而后太宗还担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提出“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长孙无忌以“储副至重，岂可数易”<sup>②</sup> 为由，力保他亲外甥李治的太子位。永徽四年（653年）又将恪牵入房遗爱谋反案，赐自尽，“以绝众望，海内冤之”。<sup>③</sup>

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俱为武则天异母兄之子，武周时封王，二人“营求为太子”，<sup>④</sup> 谋废皇嗣，遭到李昭德、狄仁杰等大臣坚决反对而未得逞。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迎回庐陵王，“承嗣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而卒”。<sup>⑤</sup> 中宗复位后，武三思又与安乐公主密谋废黜太子重俊，太子不堪凌侮，神龙三年（707年）起兵，武三思、武崇训父子被攻杀于家中。

安乐公主 唐中宗女，韦后所生，初嫁武崇训。中宗时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宰相多出其门。所穿织成裙，“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直钱一亿”，<sup>⑥</sup> 以豪奢出名。节愍太子死后求为皇太女，欲韦后临朝而得逞，景龙四年（710年）母女俩合谋毒死中宗，激起李隆基政变平乱，韦后和安乐公主被军士斩杀。

譙王重福 唐中宗第二子，后宫生。神龙初被韦后告与重润被杀案有涉而被贬，失去立储机会。景龙四年（710年）李隆基政

① 《新唐书》卷80《郁林王恪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76《吴王恪传》。

④ 《资治通鉴》卷206圣历元年二月。

⑤ 《旧唐书》卷133《武承嗣传》。

⑥ 《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二年七月。

变杀韦后，重福以“地居嫡长，自合继为天子”<sup>①</sup>，举兵争位，失败投河而死。

**建宁王倓** 肃宗第三子，宫人张氏生。英毅有才略，马嵬事变时劝留其父太子亨，血战保护往灵武即位。后肃宗听信张良娣、李辅国谗言，认为“欲害其兄，图继嗣……不得已而除之”<sup>②</sup>。杀倓后肃宗知其冤，懊悔不已，李泌仍为此拂袖而去，离开随时有性命之虞的肃宗朝廷。

**澧王恠** 本名宽，宪宗第二子，后宫所生。元和六年(811年)末，长兄太子宁去世，议立储副，“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恠为太子”，<sup>③</sup> 宪宗不许，立郭子仪孙女郭贵妃所生第三子宥为太子，改名恒。承璀仍谋废立，使太子忧。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暴崩当日，中尉梁守谦与宦官王守澄等并杀吐突承璀和恠，尔后扶太子恒登基，是为穆宗。

**绛王悟** 宪宗第六子，后宫所生。宝历二年(826年)宦官刘克明和军将苏佐明等谋杀年仅十八岁的敬宗，“矫制立绛王勾当军国事”，<sup>④</sup> 这是行储君的职守了。担心被排挤的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等四贵另拥戴穆宗第三子江王涵(文宗，改名昂)，发禁军人宫，斩刘克明等二十八人，绛王悟也死于乱兵之手。

**漳王湊** 穆宗第三子，<sup>⑤</sup> 母氏失载。文宗欲尽诛王守澄等权阉，密令宰相宋申锡谋画，被守澄门人郑注侦知，令人告变，称宋申锡与漳王谋反，言有“上多疾，太子(永)幼，若兄终弟及，必漳王

① 《旧唐书》卷86《庶人重福传》。

② 《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241宪宗元和十五年正月。

④ 《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

⑤ 新旧唐书称湊为穆宗第六子。《唐会要》卷4《追谥太子》亦称第六子。考穆宗共五子，依次为敬宗、文宗、湊、溶、武宗，湊为第三子。

立”<sup>①</sup>。漳王被贬黜而死。文宗知湊冤，哀其“被谗死”，(同上)开成三年(838年)追赠怀懿太子。

安王溶 穆宗第四子。<sup>②</sup>生母杨贤妃先潜太子永母王德妃致死，开成三年(838年)太子永暴死后又请立其子皇弟安王溶为嗣，文宗却立了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五年(840年)正文宗疾甚，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矫诏改立穆宗少子胤(武宗炎)为太弟，权勾当军国事。隔一日文宗死后，杨贤妃安王溶母子和成美都被赐死。

上述罗列的材料充分说明，唐代储君和争储失败者命运多蹇，除这些直接当事人外，受牵连枉死或遭贬谪的还有不少。如武周时降为皇嗣的睿宗二妃，即让皇帝生母刘氏与玄宗生母窦氏，被秘密处死宫中，“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sup>③</sup>情状可怜；未久，前尚方监裴匪躬和内常侍被腰斩于市，罪名是“私谒皇嗣”。(同上)睿宗时，姚崇、宋璟为安太子位，请出宋王(睿宗嫡长子)、幽王(高宗长孙)、太平公主，分别安置于外州、东都，使公主大怒，“太子惧，奏元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sup>④</sup>险些断送自己这两位开元名相的性命；玄宗时，太子韦妃兄韦坚和杜良娣父杜有邻等先后以交构东宫罪处死，受牵连死者还有李邕、李适之等多人，太子被迫与韦妃离异，出良娣为庶人；寿王瑁曾是李林甫推出的太子位竞争者，后来他能平安无虞，全仗他有忍气吞声向父皇献出爱妃杨玉环的修养；顺宗为太子时，因萧妃母郾国大长公主有罪被父皇严责，只得与萧妃离婚，他本人因德宗欲改立舒王谊而“欲先自仰药”<sup>⑤</sup>

① 《新唐书》卷82《怀懿太子湊传》。

② 新旧传称溶为第八子，应是第四子，参上页注⑤。

③ 《资治通鉴》卷205长寿二年。

④ 《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二月。

⑤ 《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八月。

自尽,幸赖李泌劝止,又“百端奏说,上意方解”<sup>①</sup>,皇储得安;德宗时被杨炎诬杀的刘晏,真正的死因是如李德裕所说:“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sup>②</sup>几句有关皇帝在储位时的流言,就要了这一代理财家的性命;宣宗时长子郗王温无宠而爱第三子夔王滋,故久不建东宫,临终,密令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立滋。事败,中尉王宗实迎立郗王(懿宗),杀王归长等三人。

宫省事秘,上述这些今天我们所能知晓的事情,绝非当年储位之争的全貌,但已足令人惊心动魄。皇帝、后妃、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宦官和将相大臣全方位的介入,使围绕储位的恶斗厮杀层出不穷,不时猛烈地冲击唐王朝的根基。究竟是祚胤所系,宫廷内外,朝廷上下,为了长治久安的整体利益,也曾立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来防范和制约内耗,对后妃、宦官干政,诸王交通大臣,有种种限制,特别是有传统礼法嫡长子继承一条,指望储君的确定成为不争的事实以平息祸端。这些是否有效呢?

“贤妃开国,嬖宠倾邦。”<sup>③</sup>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下,“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以此自律,谨慎回避政事,然而从她儿媳武则天以下,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到肃宗张良娣,整整一个世纪里创下女性干政的空前纪录,实为李唐王朝的一大劫难,御用的鉴戒史学目之为“武韦之祸”。

宦官专权蠹政害民是历代政治的又一大弊端,唐太宗诏令“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sup>④</sup>因而唐初“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权未假於内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廩食而已”<sup>⑤</sup>。武韦之际,

① 《旧唐书》卷130《李泌传》。

② 《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三月。

③ 《旧唐书》卷51《后妃传》序。

④ 《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序。

⑤ 《旧唐书》卷184《宦者传》序。

宦官渐充喉舌之任,姚崇警觉地在“十事要说”中提出“宦竖不与政”<sup>①</sup>。但就是在玄宗任上,曾参与平韦乱的高力士发迹,宦官势力膨胀,不过还不算跋扈。而后靠出谋划策马嵬事变起家的李辅国专掌禁军,押署制敕,开启宦官擅权一个半世纪的局面。“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为祸超过东汉及前明。<sup>②</sup>然而处在藩镇割据混战和朋党之争危局下的唐王朝,也只是靠宦官掌握神策军才能苟延,待到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尽诛宦官八百,唐亦亡矣。这很像东汉末袁绍尽屠宦官二千那一幕,除非用斩尽杀绝同归于尽的办法,不能解决矛盾。

外戚专权历来是又一亡国败政,长孙皇后生前一再恳请唐太宗免去他兄长长孙无忌的宰相职务,称“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sup>③</sup>。上引姚崇在玄宗即位之初请他出山时提出“十事要说”作为施政纲领,内容包括“戚属不任台省”,还说“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此鉴戒为万代法”。<sup>④</sup>玄宗欣然同意。但他后来出于对杨贵妃的宠爱,还是情不自禁地委政杨国忠,激发太子李亨马嵬兵变,唐王朝险些被以诛杨国忠为名起兵的安史乱军颠覆。唐后期,殆因皇帝孱弱,外戚亦无权而为患稍浅。

人们更指望传统的嫡长子继承法,<sup>⑤</sup>希望能比以上各种裁抑措施更有效地安定储位,能在老皇帝过世时实现皇权的顺利过渡。但遍查唐史,先后正位的大唐皇帝中有十四位不是嫡长子,<sup>⑥</sup>占开国皇帝李渊和大周皇帝武则天之外总共二十位继大位者的

①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② 《廿二史札记》卷20《唐代宦官之祸》。

③ 《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

④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⑤ 原则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见《春秋公羊传》卷1隐公元年。

⑥ 唐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少帝、玄宗、肃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僖宗、昭宗、哀帝。

70%。换言之,在唐代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六位皇帝,<sup>①</sup>是按嫡长子原则继位的。细辨一下可知,唯唐中叶不到半个世纪,代、德、顺、宪四帝顺序按嫡长子原则传承皇位,前期一个半世纪中竟无一位皇帝是嫡长子。原因很清楚,从唐太宗到唐肃宗的七位皇帝,全是藉宫廷事变登上储位或大位的;而后期自唐穆宗到唐昭宗凡八帝,“以宦官所立者七君”<sup>②</sup>,唯唐敬宗在太子位上一年余等到继位,此外曾在储位稍久的三人:庄恪太子永、陈王成美、德王裕都未能继位,<sup>③</sup>而那位侥幸继位的唐敬宗,却和以前的唐宪宗一样,又死于宦官之手。他们的生杀废立都掌握在宦官手中,皇位的正常继承便无从谈起,再说立嫡立长,简直是与虎谋皮了。我们统计到,自唐建立到穆宗以前的二百零二年中,储位只有不到二十一年空缺,而自穆宗以后到唐亡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七十六年储位空缺,更可见宦官控制下的晚唐政局极不正常的状况。

唐代储君的状况,反映出专制政治中一个极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具有君临天下的储位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帝王思想,使竞争者趋之若鹜,执迷不悟;另一方面,储位背后乌云翻滚,黑幕重重,储君往往会掉了脑袋,丢了一切,生存权全无保障。

专制主义政治给亿万臣民带来痛苦的时候,也常使专制君主自己痛苦不堪。在这方面,唐代储君也提供了足够的教训。从周公实际确立嫡长子继承法,否定在诸子中立贤和兄终弟及的旧制以来,历代王朝纷纷立下众多更严厉的规定,希望平息宫廷斗争,稳定政局。但无论是北魏的规定,立太子先杀其母,<sup>④</sup>还是宋朝的

① 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懿宗。

② 《新唐书》卷10《僖宗纪》赞。

③ 唐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登基当月亦曾被立为皇太弟、皇太叔或皇太子,徒为过渡形式,此处略不计。

④ 《魏书》卷13《皇后列传》:“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

家法,明朝高悬宫中的金字红牌,<sup>①</sup>什么措施都和忠君孝悌的说教一样软弱无力,无法遏止“家天下”占有一切的诱惑而来的政权争夺。唐以后,从宋初“烛影斧声”中宋太祖死于其兄弟之手,到清末光绪帝幽死于太后瀛台,依旧是血淋淋的政治,使在储位的储君如坐针毡。赵翼对此有专论,说:“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明代“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sup>②</sup>比唐代储君的悖运有过之无不及。到清代,雍正和乾隆、嘉庆几代皇帝干脆将储君空缺着,改用密匣藏诏於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办法,到身后再宣布继承人名。看来他们对预定继承人不是个好办法已有所认识。韩非子早就指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蚤死者。”<sup>③</sup>隋文帝便疑忌太子杨勇,“每入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sup>④</sup>唐宣宗明白:“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sup>⑤</sup>都把太子当作对手政敌,无怪清帝有时竟不愿他们存在而不设太子了。皇帝太子父子之间关系如此紧张,他们也真是活得太累了。当然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问题,是专制主义的制度使然。

古代专制社会最后必然崩溃的原因,不仅在于古代生产关系不能容纳近代工业化的新生产力,而且在于专制主义的政治架构不能容忍自由市场经济和人权、民主的进步历史潮流,于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用选举有任期限制的国家领导人的办法取代落后的世袭制、终身制,逐步创造比较平稳和宽松的政治局面,在清除专制政治流毒方面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 1891 年恩格斯发表的一段名

① 《明史》卷 113《后妃传》序:“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纪,首严内教……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於宫中。”

② 《廿二史札记》卷 24、卷 32。

③ 《韩非子》卷 5《三守》

④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

⑤ 《资治通鉴》卷 240 大中十年正月。



言,他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一再论述过的两点:“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sup>①</sup> 这样筑起防止钻营和腐败的可靠堤防,才能有真正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是对封建政治的彻底否定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封建时代做不到这两条,因此封建政治也永远不可能走出内乱的泥淖。唐代储君的悲哀作为一场场噩梦留在青史上,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只是不知他们临终前,能否有如死于大唐开国那年的隋炀帝孙子皇泰主那样最后的醒悟:“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sup>②</sup>

(原载韩国《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收入《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文史知识》1996年第1期摘登)

① 弗·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② 《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五月。

## 莽量尺考

近年史学界比较重视定量的研究,而要对历史资料进行数量分析,首先要掌握历史上多变的度量衡工具。研究古代度量衡制度,以定尺度为关键,依据尺度,又可以推知其他。隋以前各代尺度之间的关系,《晋书》和《隋书》律历志有记载,而律历志中用作基准的“晋前尺”,是西晋荀勖依据七件古文物造的古尺,其主要依据之一的“铜斛”,系王莽时刘歆所造,又称王莽新嘉量,1924年已在故宫坤宁宫中发现。刘复、唐兰等先生考莽嘉量尺(刘歆铜斛尺),长与现存战国秦的商鞅量尺合<sup>①</sup>。现在研究古代度量衡,寻根索本的方法,应是以该尺为基准,按律历志记载来推算战国至清各朝代的官颁标准尺度,再证之以存留至今残缺不全参差不齐的历代量尺实物。王国维称原藏故宫博物院的莽嘉量为“旷世瑰宝”,早就指明了该文物的重要性。

故宫所藏嘉量,据王国维考证,乃近代出土物,曾久积压于水土中,器形不免有所损,故今所测斛、斗、升、合、龠五器的数据与铭文所记比例关系殊不合。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指出:“观刘氏之校量,就各器深度求得之尺值为0.23406633公尺,而就各器径长求得之尺值则为0.227678675公尺,两者相去至6.987655公厘[应

---

<sup>①</sup> 据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的测定数据,商鞅量尺一尺合23.2厘米,略大于我们测定的莽量尺。

为 6.387655 公厘],如原器制作若是不精,则据此平均而得之值,是否可靠,亦为疑问。”嘉量今在台湾,重新测定有困难,而莽量尺值不准,影响今天认识隋以前历代尺度的准确性,给各方面研究工作带来困难。有必要对刘复《新莽嘉量之校量及推算》一文,根据实测推算出新莽时一尺长 23.0868 厘米的数值,用各种古物古器来校核。最重要的新莽铜丈现在也在台湾,据测长 229.2 厘米,尺度稍小,殆因折断变形,不能当标准器了。现在可以依据的,自然主要就是新莽当时的其他标准量器了。值得庆幸的是除嘉量外,新莽时期的量器,除合之外,还有斗、升、龠、撮保存在国内外几个地方。

咸阳市底张湾在 1970 年出土的一批秦汉遗物中有一件“律量龠”,柄背铭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正和故宫原藏器同,是新莽之物。该律量龠柄正面的铭文也和故宫藏器右耳部分律嘉量龠的铭文完全一致,同为:“方寸而圜其外,庹旁九豪,冥百六十二分,深五分,积八十分,容如黄钟。”

《考古》1973 年第 3 期咸阳市博物馆的文章报导了这一发现,但所发表的律量龠实测数据<sup>①</sup>,与原藏故宫新莽嘉量的测定数据出入颇大,也与所见拓片明显不合。1980 年笔者曾专程前往咸阳访律量龠,蒙博物馆应允,用游标卡尺重测该器的径、深,用小米量筒测容量,复核数据如下:

内径,按龠圆八等分对点测得四个数据:3.262、3.296、3.3、3.296,平均 3.2885 厘米;

外径,测得三个数据:3.668、3.666、3.668,平均 3.6673 厘米;

边深,按龠圆四等分沿内边取点,测得四个数据:1.118、1.156、1.168、1.168;中深,也测得四个数据:1.168、1.168、1.15、1.

<sup>①</sup> 原报道的数据是“龠的内径 3.164,外径 3.643,深 1.119 厘米,容水 9.287 毫升”,其中内径数据明显有误,误差一毫米以上。

122,取八点平均值为龠深,为 1.15225 厘米;

龠容,用小米量,刮平,三次,合计为 30 毫升,除以三,为 10 毫升。二十倍之为一升,合 200 毫升。

根据以上数据和律量龠铭文推算律量龠尺的数值如下:

#### 一、由器深求尺值

据铭文“深五分”,二十倍之为一尺:

$$1.15225 \times 20 = 23.045(\text{厘米}) \cdots \cdots (1)$$

#### 二、由内径求尺值

据铭文知,积 = 冥 × 深(810 = 162 × 5),故“冥”即龠圆面积。由内径与圆面积的关系求尺值,按古人实际掌握的方法推算,可有二式:

1.按刘歆旁廡法求尺值,径为圆内“方”之边长的 $\sqrt{2} + 2$ (廡)倍,则边长“寸”等于内径除以刘歆圆径<sup>①</sup>,十倍为尺长:

$$\frac{3.2885}{1.4332136} \times 10 = 22.944939(\text{厘米}) \cdots \cdots (2)$$

2.按祖冲之圆径求尺值,径为圆内“方”之边长的 1.436192

① 量器铭文记圆内正方形边长为整数,而制造时为保证容积准确,实际定圆径并非正好内接正方形边长(某整数)的 $\sqrt{2}$ 倍,所以要用旁廡数字等法调整圆径尺寸。传统计算法,有刘歆圆径和祖冲之圆径等几种,数值略有出入。刘歆圆径用旁廡值表示。杨宽引刘复论嘉量龠,铭云:“廡旁九毫”依斛计升推算,当为九毫五秒,九毫,乃简约之辞。(《中国历代尺度考》第 29 页)律量龠铭“廡旁九毫”,与嘉量龠铭同。今依刘说,亦定刘歆圆径为 1.4332136。

$$\sqrt{2} + 2(\text{廡}) = \sqrt{2} + 0.019 = 1.4332136(\text{寸})$$

倍,则边长“寸”等于内径除以祖冲之圆径<sup>①</sup>,十倍为尺长:

$$\frac{3.2885}{1.436192} \times 10 = 22.897356(\text{厘米}) \cdots \cdots (3)$$

三、由容积求尺值

$$\sqrt[3]{\frac{10}{810}} \times 100 = 23.112(\text{厘米}) \cdots \cdots (4)$$

四、由所测径、深求容积,再求尺值

$$\frac{\pi \times 3.2885^2}{4} \times 1.15225 = 9.7866096(\text{厘米}^3)$$

$$\sqrt[3]{\frac{9.7866096}{810}} \times 100 = 22.9465(\text{厘米}) \cdots \cdots (5)$$

以上从实测数据推算出来的五个尺值,最大值与最小值间的误差不及尺长的百分之一,这是因为该量器容部分,除内底面有轻微锈蚀外,完好如故,依然是一个相当规整的凹空圆柱形体,所以测算所得数据,可能与当时制度所定相去差不,有实在的参考价值。律量龠尺之长度,若取以上(1)(2)(3)(4)(5)五个尺值之平均值,则为 22.989158 厘米,可略计为 22.99 厘米或 23 厘米。

1981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载对该器的测定数据:“容 10 毫升”,“龠内径 3.311、深 1.1496 厘米,计算容积 9.898 立方厘米”。他们折算铜龠所用尺一尺长为 23.03 厘米。数据与笔者所测算数非常接近。

① 祖冲之圆径当圆内正方形边长的 1.436192 倍,见《隋书·律历志》记:嘉量“祖冲之以圆率考之,此斛当径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是按圆面积公式推算来的,即:

嘉量斛铭“其百六十二寸”,

$$S = \frac{\pi D^2}{4} \quad D = \sqrt{\frac{162 \times 4}{\pi}} = 14.361921(\text{寸});$$

律量龠铭“其百六十二分”,

$$S = \frac{\pi D^2}{4} \quad D = 14.361921(\text{分}) = 1.4361921(\text{寸})$$

新莽时同制的量器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始建国铜方斗和始建国铜撮,还有一件今藏日本的始建国铜升,各器铭文都有“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一句,所以各器的实测数据也都应是考定莽量尺的珍贵资料。今介绍上引度量衡图集所载数据资料:

始建国铜方斗,或称始建国律量斗,上口横刻篆书铭文:“律量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积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实测容 1940 毫升,盖因有锈,且四壁因受压而微向内凹以致今容量稍小。又测靠近底部的四个内边长度平均为 13.8165 厘米,合尺长 23.0275 厘米;深测得 11 个点,平均为 10.363 厘米,全尺长 23.0288 厘米;并可求得计算容积为 1978.25 立方厘米。

始建国铜撮,或称始建国律撮。器壁一周刻:“律撮,方五分而圜其外,庇旁四豪,冥卅五分耗,深四分,积百六十二分,容四圭。”实测容 2.1 毫升,口径 1.6638 厘米,深 0.9536 厘米,计算容积为 2.07 立方厘米。

按上述推算律量龠尺的方法推算律撮尺,可得到五个尺值,分别为(1)23.84 厘米,(2)23.4 厘米,(3)23.17 厘米,(4)23.5 厘米,(5)23.39 厘米,平均为 23.46 厘米。正如图集编者所云,“其单位量值略大,可能与氧化层剥蚀过多有关。”律撮在确定量值方面的价值逊于其他新莽量器。

今在日本的圆形始建国铜升,或称始建国律量升,器侧铭文:“律量升,方二寸二分而圜其外,庇旁四耗八豪,冥八寸一分,深二寸,积万六千二百分,容十合。”据测容小米 198 毫升,口径 7.15 厘米,高 4.9 厘米,未记内深,数据不全详,暂不作推算。

除标准量器外,新莽时代留下的布币、货泉,按各部位的实测尺寸和文献记载的制度对照也可以推算货布尺、货泉尺度作为考定新莽尺度的参考。但笔者实测货布所得数据和其他各种发表的数据对比,有时相差甚多,那是货布本身大小不一造成的。毫无疑问,逐个精细加工的标准量器,比大量铸造时难免粗糙逾制的货布

钱币在度量衡制度史方面的文物价值,自然是要高得多了。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试定新莽尺(即晋前尺)长度在 23 厘米至 23.1 厘米之间——附带说一句,新莽量的量值,约为每升容 200 毫升——再据晋、隋书律历志所载十五等尺,又可折算出隋以前历代尺度,这也能帮助我们确认继承隋制的唐代大小尺的尺度。我们再反验诸汉唐之间历代度量衡实物特别是应用于历代经济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数据比较合理,所以以上考定的在度量衡史上至关重要的莽量尺即新莽尺的尺度,是比较可信的。

最后,将各家关于嘉量龠的测算数和律量龠数据列表于下,供比较研究。

	故宫嘉量龠				咸阳律量龠		
	《西清古鉴》	刘复	马衡	紫溪	咸阳	本文	计量总局
龠径(厘米)	3.2	3.23		3.3	3.164	3.2885	3.311
龠深(厘米)	1.152	1.2865		1.1	1.119	1.15225	1.1496
龠容(厘米)		10.65	9.98437		9.287	10	10
量尺(厘米)		23.08864	23.1			23	23.03

(原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 年第 1 期,修改刊于《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2 期)

## 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

关于中国古代的度量衡,经过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悉心研究,已把历代制度和沿革的主要线索摸清,但在量值方面,还未取得一致意见,所以至今尚无一本公认比较可信的度量衡史书作为定论。拙文赘述唐代度量衡,实不过是考选诸家意见,试证当时制度,以求掌握习史必不可少的计量工具。

### 一、唐 尺

唐尺分大、小尺。《唐会要》卷 66 太府寺条载开元九年敕格：“诸积柜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冕服制用之外，官私悉用大者。”《唐六典》卷 3 所记略同。可知当时社会上通用的量尺是大尺，小尺仅用于音乐、天文、冕服等专门方面。在小尺等小制计量器的特殊应用范围之内，须因袭旧制，利用原有成果，计量工具不便随时更动，所以到隋唐时代，一般通用量尺再次加长以后，又特地保留了小尺制度。

传世和出土的唐尺都是大尺，国内现存近 30 件，短者仅 28 厘米，长者逾 31 厘米，略举其要如下：



尺名	量值(厘米)	出 处	藏 地
石尺	28.00	1956年西安郭家滩6号唐墓	陕西省博物馆
雕花木尺	29.00	196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44号唐墓	新疆博物馆
木尺	29.30	196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91号唐墓	新疆博物馆
木尺	29.50	196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91号唐墓	吐鲁番文物保管所
铁尺	29.50	1955年长沙丝茅冲唐墓	湖南省博物馆(?)
铜尺	29.60	1956年陕西刘家渠唐墓	
人物花卉铜尺	29.67		故宫博物院
铜尺	29.71	1958年武昌何家垄唐墓	湖北省博物馆
鍍金刻花铜尺	29.97		中国历史博物馆
镂牙尺	30.23		上海博物馆
鍍金镂花铜尺	30.40		中国历史博物馆
残铜尺	30.67	1956年西安郭家滩唐墓	陕西省博物馆
残错银铁尺	30.70		故宫博物院
残鍍金铜尺	30.80	1964年洛阳涧西22号唐墓	洛阳博物馆
刻花铜尺	31.00	1956年西安韩森寨	中国历史博物馆
铜尺	31.00	50年前出土于嵩县房从会墓	北京师范大学刘盼遂
鍍金镂花铜尺	31.35		中国历史博物馆

日本奈良市正仓院所藏唐尺及仿唐尺,量值在29.4—31.2厘米之间<sup>①</sup>。

这些实物说明了唐代尺度的大致范围,但彼此相差甚多,又皆无官颁标准器记号发现,因此仅根据存世实物是不能精确地考定唐尺标准长度的。

《唐六典》卷3金部郎中员外郎条记:“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这是小尺,其制与《汉书·律

<sup>①</sup> 藤田元春:《尺度综考》。

历志》所记相同,都是黍尺。但如唐李淳风所说:“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前代量校,各有不同,又俗传讹替,渐致增损”<sup>①</sup>,今用累黍之法不能得到可信量值。幸而李淳风撰《隋书·律历志》时,将历代尺分成十五等,用它们与荀勖晋前尺的比值表示各尺尺度。虽然他只记到隋尺,但唐承隋制,王国维和杨宽先生对此有确切论证<sup>②</sup>,所以我们可以依据隋志记载,逐步推算唐尺。

先推定唐小尺。唐小尺可直接追溯到南朝刘宋时代的宋氏尺。《隋书·律历志》记当时为“人间所用尺”,即民间通用量尺,“传入齐、梁、陈,以制乐律”,后周颁用铁尺,长短“与宋尺符同”,调钟律外,“并用于均田度地”。隋灭陈后继续“用此铁尺律”。

《隋书·律历志》中,宋氏尺、后周铁尺和两种隋调钟律尺并列为一等,“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从西晋荀勖制尺时的依据可知,晋前尺长与新莽尺合,约在 23—23.1 厘米之间<sup>③</sup>。若以 23.1 厘米计,宋氏尺合 24.5784 厘米,此亦即隋调钟律尺和唐小尺长。唐制,小尺“一尺二寸为大尺”<sup>④</sup>,唐大尺合 29.49408 厘米,略为 29.5 厘米。

隋志又记:“开皇官尺,即铁尺一尺二寸”<sup>⑤</sup>,“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铁尺指后周铁尺,长与宋氏尺同,其一尺二寸为开皇官尺或市尺,即唐大尺,计为 29.5911 厘米,略为 29.6 厘米。

① 《隋书》卷 16《律历志》上。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 15《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六唐尺摹本跋》;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97—100 页。

③ 原藏故宫现在台湾之嘉量(刘歆铜斛),刘复先生测算尺长为 23.08864 厘米,唐兰、马衡等先生定为 23.1 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始建国律量斗,其量尺约合 23.3 厘米。咸阳博物馆藏始建国律量俞,按笔者复核的径、深和容积推算,一尺合近 23 厘米。

④ 《唐六典》卷 3 金部郎中员外郎条,《唐律疏议》卷 26《杂律》校斛斗秤度条疏议。又,《唐会要》卷 66 太府寺条开元九年敕格:小尺“三尺为大尺”,误。

⑤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405 页,“铁尺”与“一尺二寸”间误加逗号,不可解。

同是依据《隋书·律历志》，从宋氏尺或开皇官尺分别推算唐大尺长，所得数值有差，是李淳风测算未能十分精确之故，但所差不足一毫米，二数值应皆可信，实物可以为证：

存世唐尺，绝大多数尺长合在 29 - 31 厘米之间，其中长沙铁尺与吐鲁番木尺之一长 29.5 厘米，陕县铜尺长 29.6 厘米，日本法隆寺藏红牙尺和正仓院收藏的一批唐尺或仿唐尺，长在 29.421 至 29.694 厘米者，占十之八九<sup>①</sup>。

唐长安外郭城“周六十七里”<sup>②</sup>，今实测约 35.5 公里<sup>③</sup>。唐“五尺谓之步……三百有六十步谓之里”<sup>④</sup>，一里为 180 丈，合一尺 29.436 厘米。《元和郡县志》等书记，外郭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sup>⑤</sup>，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实测为 9721 米<sup>⑥</sup>，则唐一尺合 29.4799 厘米，即按日本平冈武夫氏据街坊数合计城东西宽为 6600 步计算<sup>⑦</sup>，唐一尺合 29.458 厘米，都很接近 29.5 厘米之数。

平冈武夫氏计算长安城址时采用森鹿三氏之说，以唐大尺长为 29.4 厘米<sup>⑧</sup>，陈梦家先生论断唐大尺长 29.5 厘米<sup>⑨</sup>，傅振伦先生记为 29.51 厘米（北周市尺和开皇官尺，即唐大尺）<sup>⑩</sup>，杨宽先生断

① 藤田元春《尺度综考》记 26 件正仓院唐尺，长在 29.421 至 29.694 厘米之间者 21 件，占 84%。

② 《元和郡县志》卷 7 唐京城条，《长安志》卷 7 唐京城条。

③ 《新中国考古收获》第 95 页。

④ 《李文公集》卷 3《平赋书》。

⑤ 《隋书·地理志》、《唐六典》、《长安志》、《长安志图》、《唐两京城坊考》记与《元和郡县志》同。《旧唐书·地理志》记为“十八里一百五十步”，《新唐书·地理志》记为“六千六百六十五步”，里步之数略多。

⑥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 11 期。

⑦ 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地图篇·长安城》。

⑧ 森鹿三：《汉唐一里之长的研究》，《东洋史研究》第 5 卷第 6 号。

⑨ 《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 年第 1 期。

⑩ 《隋唐五代物质文化史参考资料》，《历史教学》1955 年第 1 - 2 期。

为 29.57656 厘米<sup>①</sup>,万国鼎先生定唐大尺长应在 29.49 - 29.59 厘米之间<sup>②</sup>,曾武秀先生断为 29.6 厘米<sup>③</sup>,诸说相近。

但是事情不尽如此。如前所述,唐尺的实物有一些长在 30 厘米甚至 31 厘米以上。不少日本学者以为唐之大尺与日本曲尺相同,长为 30.3 厘米<sup>④</sup>。唐初所铸开元钱,“径八分”,今诸家测算,尺长皆在 30 厘米以上<sup>⑤</sup>。唐李台《钱志》曰:王莽货布长“一寸九分”,记载了新莽尺和唐尺的比值。王莽货布长短有差,若按足立喜六氏和笔者所测数,都合唐一尺长 30.4 厘米<sup>⑥</sup>。唐长安城南北长 15 里 175 步或 5575 步,诸史记载悉同,考古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实测为 8651.7 米<sup>⑦</sup>,合一尺为 31.034 厘米。所以中外也有一些研究家认为唐尺长在 30 厘米以上。如杨宽先生虽论断唐大尺长 0.2957656 公尺,又说“大尺还是不断在加大,有长到公尺 0·三一五的”<sup>⑧</sup>。曾武秀先生说“隋和唐初官定尺度长 29.6 厘米。中唐以

① 《中国历代尺度考》第 100 页。

② 《唐尺考》,《农史研究集刊》1959 年第 1 册。

③ 《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1964 年第 3 期。

④ 持此论者有物观:《度量衡考》,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和成岛柳北《明治新撰泉谱》也认为开元钱尺与日本曲尺合。

⑤ 成岛柳北、足立喜六测开元通宝钱径,皆曰合日本曲尺八分,则唐尺长 30.3 厘米;物观择开元钱,小者累十为七寸八九分,大者累十为八寸三四分,折尺长为 29.88 至 31.58 厘米,平均 30.73 厘米;王国维、吴大澂所测折尺长约为 31 厘米;傅振伦先生说合尺长 31.6 厘米。笔者实测合 30.625 - 31.5 厘米,详见下文《唐衡》一节。

⑥ 足立喜六著《长安史迹考》记:货布长日本曲尺“一寸九分一厘”,即 5.7873 厘米,折算唐一尺长为 30.46 厘米。笔者实测咸阳市博物馆藏货布,长 5.78 厘米,折算唐一尺长 30.42 厘米。

⑦ 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所测南北长是由明德门至宫城北街之玄武门偏东处。又陕西省文管会实测西城基 8470 米,东城基 7970 米。见《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

⑧ 《中国历代尺度考》,第 100 页。

后,微有延伸,至唐末五代,达到 31 厘米左右”<sup>①</sup>。吴承洛先生指出“唐大尺即隋开皇官尺”,表列隋开皇官尺长 29.51 厘米,又说“唐代的尺和清营造尺(等于 32 厘米)也相差不大”,表列尺长 31.10 厘米<sup>②</sup>,不知所云。

从制度上讲,唐代计量器是有统一规格的。说现存唐尺长短不一是因为官颁标准尺度在唐代前后期曾更动加长,似缺少根据。可断年代的出土唐尺并不都是前小后大,唐初武德四年(621 年)铸的开元钱反映的唐尺量值恰恰是较大的。大历十二年(777 年)推翻上年“改造铜斗斛尺秤等”之议,下敕“公私所用旧斗秤,行用已久,宜依旧,其新较斗秤宜停”<sup>③</sup>,正说明唐代计量器久用不变,唐政府是注意到稳定计量制度的。

史籍还明确记载,开元九年(721 年)下达关于度量权衡的敕格时,同时颁发了度量衡标准器,“京诸司及诸州,各给秤尺及五尺度斗升合等样,皆铜为之。”唐关市令规定:“诸官私斗尺秤度,每年八月,诣金部太府寺平较,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较,并印署,然后听用。”《唐会要》卷 66 太府寺此条还记载,关市令规定的这一制度,早在武德八年(625 年)就已在实行,大历十年(775 年)和太和年间还一再下敕重申。更可见唐政府管理度量衡是认真不苟的。《唐律疏议》卷 26《杂律》中还有“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的条文。

如果没有材料证明开元九年或别的年代颁发标准器时曾经改制,那么只能认为唐代度量衡前后是统一的。由主管度量衡的太府寺颁发的秤尺和五尺度等铜质标准计量器和经校验合格加印署

① 《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1964 年第 3 期。

② 《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163 页,第 54 页表,第 90 页表,第 37 页。

③ 《唐会要》卷 66 太府寺条。

的各种市用尺,数量绝非稀少,虽然现在还未有实物发现,相信将来总是可能出土的。

为了现在计算应用方便,需要初步确定一个唐尺量值,愚意可暂定唐小尺长度为 24.5784 厘米,唐大尺长度近 29.5 厘米,待将来有标准器出土时,我们现在考定的唐代标准尺度是否近乎实际,就能得到检验和回答。

## 二、唐 量

隋唐量器存世甚少,仅见隋太府寺合一件,今在日本。据山下泰氏《隋大业合》称:实测容水 19.91 毫升。该器乃大业三年(607 年)所造,是隋炀帝改度量衡复古制遗物。《隋书》卷 16《律历志》上记改制事:“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sup>①</sup>

古斗亦应指王莽时量器,其制与商鞅量同。商鞅量铭:“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嘉量斛铭:“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皆合后来所说的“斛法一尺六寸二分”。

新莽尺长 23 - 23.1 厘米,按上述斛法计算,

$$23^3 \times 1.62 = 19710.54$$

$$23.1^3 \times 1.62 = 19968.75342$$

一石为 19710.54—19968.75 毫升,一升约合 197.1—199.7 毫升。

新莽尺长度主要是依据存世的各种莽量推算得来的,今在台湾省的嘉量(刘歆铜斛)、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律量斗、咸阳博物馆藏的律量龠,按实测容积或计算容积均合 200 毫升/升或 200 毫升

<sup>①</sup> 唐孔颖达:《左传》定公八年《正义》亦曰:“周、隋斗秤于古三而为一”,与《隋书·律历志》说同。

/升上下<sup>①</sup>。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律撮,量值合 210 毫升/升,因器形较小,锈蚀严重,误差稍大。

可初步确定古斗之量值为近 200 毫升/升,正与隋太府寺合相当,可见大业初依复古斗实有其事。

隋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与大业斗有大、小之别。唐亦分大、小石制,通用大石制,乃袭开皇制,为古制之三倍<sup>②</sup>。故隋开皇量与唐量每升约为 600 毫升,每石近 60 公升,合今制十分之六。

唐制,戍卒、役丁日给米二升,合每月六斗,粟米比重以 0.8 计,折今制为 57.6 市斤<sup>③</sup>,定量较高,但还合理,反证我们论断的唐代量制可能与事实相差不多。

关于唐量,有一个问题不能不研究作出解释,即按《夏侯阳算经》卷上《言斛法不同》一节诸题的算法,得出的数据与我们上述分析不合。如其例题之一:“今有方窖,长一丈三尺,广六尺,深一丈。问受粟几何? 答曰:四百八十一斛四斗八升二十七分升之四。术曰:置长尺数,以广尺数乘之,又以深乘之,得积尺。以斛法除之,即粟数”(原注:“凡斛法一尺六寸二分”)。这是一道简单的四则运算题,

$$13 \times 6 \times 10 \div 1.62 = 481.48148(+)$$

恰为四百八十一斛四斗八升二十七分升之四。所谓“斛法一尺六寸二分”,指以 1.62 立方尺为一斛,即如本例题之前说:“仓曹

① 刘复:《新嘉量之较量及推算》,《辅仁学志》第 1 卷第 1 期;笔者实测咸阳始建国律量龠,容小米 10 毫升,合一升容 200 毫升。

② 《唐律疏议》卷 26《杂律》引《杂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积黍计量之法同古制,由积黍之数知唐大斗为古制三倍。令文中“十龠为合”之十应为二,自古二龠为一合。

③ 北京市农林局《农业常用数字手册》列每立方米油粮重量估算表,小米为 1509 市斤,若按此比重计算唐戍卒、役丁定量每月粟米六斗合 54.3 市斤。

云：古者凿地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受粟一斛。”

据中华书局本《算经十书》校点者钱宝琮先生考，“《夏侯阳算经》是在唐代宗在位时期写成的”，是“一部结合当代法令的实用算术书”。按此说，唐代似仍用古斛法计量。试按唐一尺长 29.5 厘米，斛法一尺六寸二分计算，得唐一石（大石）容 41.59 公升。

斛法反映度与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按此斛法，而唐一石以 60 公升计，又得唐一尺长 33.3 厘米余，恰与今市尺长度相同。

可见斛法一尺六寸二分、尺长 29.5 厘米、石容 60 公升三个数据不合，其中至少有一误。尺长和石容都已经初步验证，问题在斛法。判断该书《言斛法不同》一节六道算题，虽皆云“今”如何如何，并注明“凡斛法一尺六寸二分”，但并不反映唐制，不是唐代计算仓储粮食数实用的方法。算经作者深知历代斛法有变，特意具体记述了前代斛法有“用二尺三寸九分”、“用二尺九寸二分”等等不同，而且指出：“时异事变，斗尺不同。以古就今，临时校定，始可行用。”连本节标题都是非常醒目地选用“言斛法不同”的字样，提示人们要注意斛法的变化，经过实测，再“为斛法定数”。很清楚，书中所列算题和注明的斛法数字，仅仅反映着古制，示范了一个方法。六道算题，或者是古书上引来，或者是作者杜撰，绝非唐代实用算术题的引录。校点本在提要中认为是“一部结合当代法令的实用算术书”，就全书而言，基本是对的，但是并不符合《言斛法不同》这一节的情况。

《夏侯阳算经》卷上《辨度量衡》一节记述：“仓库令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以铁为缘，勘平印书，然后给用。”原注：“以上今时用之也已”。这些经过校正印署的标准量器，或可祈有实物出土，那将是检验我们关于唐量的量值和史料的分析是否恰当的第一手资料。



### 三、唐 衡

隋唐衡器亦少实物传世,仅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一隋代铁权,实测重 693.1 克,当为一斤权。但唐代出土文物中不乏铭记重量的器物:

1970 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窖藏的唐代金银器物一批,据其中七种的标重和实测重推算,每两合今 40—46 克,总平均每两合 42.798 克,一斤为 684.768 克或 1.37 市斤;<sup>①</sup> 又从该窖出土的银板中任取十五块测重,平均每两合 41.755 克,每斤合 668 克或 1.336 市斤;

最近铜川市出土一银盘,铭:“信永录六两三分”,实测重 255 克,每两合 42.4116 克,一斤为 678.586 克或 1.357 市斤<sup>②</sup>。

《新唐书》卷 54《食货志》四记:“武德四年(621),铸‘开无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参”应作参,十钱合二十四铢,重一两。笔者在陕西省博物馆实测西安鱼化寨新近出土之“开元通宝”钱,情况如下:

第一组,挑选十枚制作精好者,其径为 2.5 厘米或略多一些,十枚平列,共长 25.2 厘米,推算开元钱尺合 31.5 厘米,又测这十枚钱,其厚共合 1.55 厘米,总重 42.5 克,此即一两之重,合一斤为 680 克;

第二组,取十枚稍轻薄者,其径在 2.5 厘米以下、2.4 厘米以

① 《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金银器》,《文物》1972 年第 1 期。

② 《铜川出土一批唐代银器》,1980 年 4 月 14 日《西安日报》。计算数据此处作了订正,“六两三分”即六两三参,一参为十黍或十分之一铢、二百四十分之一两,六两三分合 6.0125 两,重 255 克,合每唐两 42.4116 克。唐代记重,斤以下为两,铢、参(分)、黍,今十进制的两、钱、分、厘始于宋初,顾炎武《日知录》中已言明。前后“分”涵义不同,不能混淆。

上,十枚平列,共长 24.5 厘米,推算钱尺又合 30.625 厘米,又测这十枚钱,其厚共合 1.45 厘米,总重 38.6 克,合一斤仅 617.6 克;

还拣得一枚“开元通宝”,其径仅 2.3 厘米,当即伪滥之“恶钱”,在研究度量衡时没有参考价值。

按常理判断,应是第一组开元通宝钱反映唐一斤为 680 克之数可能更近制度。

还可以结合文献有关记载推断唐衡的量值:

1.《隋书·律历志》记:“开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唐承隋制,亦当如此。《汉书·律历志》上记嘉量:“其重二钧”,实测重 13600 克,合一斤为 226.7 克,三倍之,正合 680 克。

但嘉量是唯一的例外。存世的秦汉和王莽时代的权衡和记重实物,绝大多数每斤合 240 克上下。《汉书·食货志》曰:“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黄金比重为 19.3,以尺长为 23 或 23.1 厘米计,一斤合 234.8 或 237.9 克,三倍之数也都在 700 克以上。所见隋代铁权和唐代各种记重器物折算一斤之重无一达到此数。

试释这个矛盾。若嘉量在晋唐间数百年中一直传世未湮,隋唐定度量衡时,很可能仍用它作定制依据的标准原器使用,当时所谓古制,实际就是以它为代表。因而嘉量“例外”地提供给我们的度量衡方面的数据,加以一定的倍数,倒是真实地反映唐制的。如果是这样,就更见这件“旷世瑰宝”无上的文物价值了。

2.《唐会要》卷 66 太府寺条记:大历“十一年(776)十月十八日,太府少卿韦光辅奏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较两市时用斗,每斗小较八合三勺七撮<sup>①</sup>,今所用秤,每斤小较一两八铢一分六黍。”时用秤一斤仅合新较秤一斤之 384 分之 351.84,即 91.62%,古一斤按 240 克计,合唐一斤为 659.7 克。因为唐代

<sup>①</sup> 按此说唐石容当小 8.3%(唐代勺以下计量单位诸书记载不一,今略不计),约合 55 公升,与隋大业寺合折大石之数相差较多,但可备参考。

较量黍与古黍未必一致,新较秤一斤不会正好是古秤一斤之三倍,所以此修正值反映唐代“行用已久”的旧秤情况难免会有几分失实。看来,以黍计量的方法在唐初也未见得应用过,大历官员沿用书上的古黍法验秤斗的失误,可能正是由于不了解原来依据嘉量定制的初衷所致。

3. 据《唐律疏议·杂律》引《杂令》,唐一两和一合同为 2400 黍,故一石(一千合)即 62.5 斤(一千两)<sup>①</sup>,大小制相同。黍(糜子)的出米率一般比粟(谷子)高一成,其容重也应较高,以一市石黍重 140 市斤计,唐黍一石合今 84 市斤,唐一大斤为 1.344 市斤或 672 克,一大两为 42 克。如果所取黍之容重无误,此数据可供考定唐代衡制参考。

4. 《唐会要》卷 66 太府寺条记天宝九年(750 年)敕:“面皆以三斤四两为斗”,也反映量、衡之间的关系。笔者实测标准粉的比重为 0.516,按唐斗容六公升计,斗面合 3.096 公斤,折合每斤为 952.6 克或 1.9052 市斤。数据偏高,疑《唐会要》数字有误。但《旧唐书》卷 48《食货志》上记该敕,亦为“面三斤四两”,暂存疑。

关于唐衡的量值,傅振伦先生引用吴承洛先生《中国度量衡史》的说法,认为唐衡一两实重 37.301 克,一斤合 596.82 克<sup>②</sup>。吴先生的数据来自吴大澂,后者测十枚开元钱重 37.301 克,比笔者所测第二组钱之重 38.6 克还轻,也比所见所有唐代记重物的测算数小,实不足为据。吴先生又说:隋、唐二朝的斗和秤,大制等于新莽的三倍。他定新莽一两的重量是 13.9206 克,则唐一两合重 41.7618 克,一斤 668.2 克重,比吴大澂测开元钱所得数大近 12%,但

① 所谓“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之“石”是衡器名,一石 120 斤;“十斗为一石”之“石”是量器名,一石 62.5 斤。两者不是一物。

② 《隋唐五代物质文化史参考资料》,《历史教学》1955 年第 1~2 期。

不知为何吴先生又说这两个数“相差不大”<sup>①</sup>。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唐一斤可试定为 680 克,一两为 42.5 克(大制),或较近事实。

#### 四、唐 亩

唐代亩里制度,史籍有明确记载。确定了唐尺长度,便可以进行计算。

武德七年令规定:“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sup>②</sup>。开元二十五年令重申:“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sup>③</sup>。

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一亩合 6000 平方尺或 60 平方丈,与今市亩制同。唐以大尺为量地尺,一尺合 29.5 厘米,亩积计为 522.15 平方米,合今 0.783225 市亩,略计为 0.783 市亩。

苏联《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 15 页:“当时(隋)的一顷等于现今 6.14 公顷”,合一亩为 0.921 市亩。隋唐亩积相等,此说系误。

#### 五、唐 里

《夏侯阳算经》卷上论步数不等条引《杂令》:“诸度地以五尺为一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李翱《平赋书》亦记:“三百六十步谓之里”。这是大里。

以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合 1800 尺,尺长 29.5 厘米,一里为

① 《中国度量衡史》,第 164—165 页。

② 《旧唐书》卷 48《食货志》上。《唐六典》卷 3 尚书户部亦记:“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

③ 《通典》卷 2《食货典》二田制下。

531米,当今1.06华里。

唐长安城周六十七里,今实测约35.5公里,合一里为530米,与上述大里制吻合。

唐代又有小里,《夏侯阳算经》同卷又引田曹云:“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原注:“此古法也。”虽云古法,实际还用于测晷景。一些与唐代各地里程有关的史籍,还见用小里记载,大概是抄袭旧籍的缘故。

小里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也合1800尺,尺长24.5784厘米,一里为442.5米,当今0.88华里。

《元和郡县志》卷1关内道京兆府条:“东至东都八百三十五里。”<sup>①</sup>西安至洛阳旧程约736华里<sup>②</sup>,合唐一里440.7米,与小里制略合。

宋初钱易《南部新书》记唐五代故事,言及度量衡和里制,曰:“诸度地五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按我国里制,自古以六尺为步,步三百为里,唐或隋以后以五尺为步,步三百六十为里,除元代曾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里之外,至明清以前,都是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民国十八年后才有以一百五十丈为一里的新制。钱易所记或系误,或仅是唐初或隋唐之际步制已改而里制未及更定的一段时期内新旧制混用记里,不是唐代记里的基本制度。

(本文承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古代度量衡史研究组热心帮助,提供了他们近年来仔细复核过的原始数据,笔者对此谨致谢意。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① 《通典》卷173《州郡典》三京兆府条:“去东京八百三十里”,与《元和郡县志》所记略同。《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京兆府条:“去东京八百里”,是略计数。今从《元和郡县志》。

② 今铁路线西安至洛阳387公里,因绕三门峡水库,里程有加。此据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所记数计。

# 北周与隋代的租额

## ——隋文帝“租政策”论质疑

在评价隋文帝治国的政绩时,近年有同志提出杨坚实行“重租政策”的见解。首倡此议的是王士立同志,他认为“在几个实行均田制的皇朝中,隋朝的田租剥削量是最重的”<sup>①</sup>。齐陈骏同志认为王说符合实际,“隋代农民受田的数目并不比以前各代多,而租的负担却远比以前各代都要重得多”<sup>②</sup>。王士立同志立论时将隋代租额与前后朝代租额列表作了比较,其中北周保定以前和天和以后一夫一妇的租额分别为78.6升和105.25升(米突制),相当于隋代178.32升的44.1%和59%。本文拟着重讨论这个问题,试论北周的租额,以之与隋代比较轻重。

北周有室者丰年全赋,租粟五斛,沿用西魏时宇文泰定制,史家无异词。但北周量制频改,先用官升,保定五年(565年)或天和元年(566年)宇文护改用玉升(铜升),建德六年(577年)平齐后宇文邕颁用铁尺律,量器也当相应改制。惟《隋书·律历志》云:据玉斗造尺,“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而《周书·武帝纪》又云:颁铁尺律后,“其不应新式者,悉追停”。不详建德六年后铜升到底还用

---

① 《杨坚的重租政策和隋王朝“富有”的关系》,《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

② 《关于评价隋文帝杨坚和“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不用,按铁尺律所造量器今又失考,故下文只论官升和玉升制租额。

官升和玉升(铜升)的量值虽无实物可考,但尚有文献记载可征,王文即是依《隋书·律历志》的有关记载推算的。隋志云:

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诏改制锺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积龠,同兹玉量,与衡度无差。准为铜升,用颁天下。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玉升[升当作斗]积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斛积一千一百八十[十当作寸,方合前数与传统斛积记法,中华书局标点本已注出]五分七厘三毫九秒。

古代量器按尺度定制,多少寸(立方寸)为一升或一斗、一斛的斛法,历代自有具体规定。所以求玉升容积要先定玉尺。

据隋志,玉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sup>①</sup>。晋前尺即新莽尺,据出土文物考证,尺长在23厘米至23.1厘米间<sup>②</sup>,通常以23.1厘米计,得玉尺长26.7498厘米,

$$23.1 \times 1.158 = 26.7498$$

玉尺一寸(寸<sup>3</sup>)为19.140867毫升,

$$2.67498^3 = 19.140867$$

玉升[斗]容积,按“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计,为110.85737寸<sup>3</sup>,

① 《隋书·律历志》又云:“后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厘”,则玉尺长27.07厘米(这里后周市尺按29.5911厘米计)。隋志关于玉尺尺度与他尺的比率有若干记法,推得之数不尽一致,正文中姑取一说而论。

② 参拙文《咸阳始建国律量龠尺》,《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1期。

$$\frac{1}{4}\pi D^2 H = \frac{1}{4}\pi \times 7.1^2 \times 2.8 = 110.85737$$

合一斛为 1108.5737 寸<sup>3</sup>,此即隋志所云:“斛积一千一百八(寸)五分七厘三毫九秒”之数,再乘以玉尺每立方寸合 19.140867 毫升,得玉斛一斛为 21219.065 毫升。此数值略大于嘉量斛容(约 20000 毫升)。按公制,一升为一立方分米(1000 毫升)折合,玉斛一斛为今 0.21219 石,五斛为 106.095 公升,此即王士立表中 105.25 公升之数,误差在表取晋前尺为 23.04 厘米,这里取 23.1 厘米。

再推官升。按《隋书·律历志》引甄鸾《算术》:“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则官斗一斛为 15835.123 毫升,

$$21219.065 \div 1.34 = 15835.123$$

折今 0.15835 石,五斛为 79.1756 公升,此即相当王士立表中 78.6 升之数。

但这样计得官升量值有误。因隋志又云:“甄鸾所据后周官斗,积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积九百七十七寸有奇。”既然我们由李淳风记载并知玉升“斛积一千一百八(寸)五分七厘三毫九秒”,由两者比率可以求得玉升一斗实为官斗一斗一升三合四勺,

$$1108.5739 \div 977 = 1.134(+)$$

可知今本隋志引甄鸾《算术》“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一句有阙误,原文应为“玉升一斗,得官斗一斗一升三合四勺”。以此计得官斗一斗为 1871.1697 毫升,

$$2121.9065 \div 1.134 = 1871.1697$$

此数值略小于嘉量。乘以五十,得官斗五斛为 93558 毫升,即 93.558 公升。这是对王士立表中 78.6 升一数的修正值。

然而北周是否就直接用官斗、玉升为通用量器计粟收租呢?因为史无明文,一般容易这样理解,王士立表中数据也是这样计算的。实际似不可能这样。因为以上推算得官斗、玉升的量值,约在每升为 187 - 212 毫升之间,上下与新莽古斗每升容约 200 毫升相



近,而北朝斗秤实已成倍增大,即如唐孔颖达所云:“魏、齐斗秤,于古二而为一,周、随斗秤,于古三而为一。”<sup>①</sup>孔说应有所本。李淳风亦曰:“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开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sup>②</sup>,两说可合。我们知道,制度史上许多方面,北周、隋、唐一脉相承。度量衡方面,隋开皇官尺、调钟律尺和唐大、小尺皆为一尺二寸与一尺之比,就是沿用北周市尺和铁尺旧制。由此而论,隋唐量衡大小制相差三倍<sup>③</sup>,可能也是援引北周制度。就是说,北周量衡和尺度一样,也已分大小制。官升、玉升相当于小制量器,通用量器实大官升或玉升三倍,分别为 561.35 毫升和 636.57 毫升,上下平均差不多就是隋唐量器的量值。北周为在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冕服制度等特殊应用范围内因袭旧制,利用原有成果,须保留小制计量器,因而精心研制官升、玉升的道理,和隋唐时代是一样的。尔后也应和隋唐一样,规定有由官升、玉升导出通用量器的办法。这办法应即孔颖达所说“三而为一”,因语义不甚明确,以至我们今天容易把拟古的官升、玉升当作通用量器看待<sup>④</sup>。

上述论断如无大谬,则北周一夫一妇租粟五斛约为隋三石的三分之二(1.67 倍),隋租额反而低于北周五分之二,这和隋文帝减轻力役三分之一、调绢二分之一相一致<sup>⑤</sup>。如果说当时其他方

① 《左传》定公八年正义。

② 《隋书》卷 16《律历志上》。

③ 关于唐制,见《唐六典》卷 3 金部郎中员外郎条:“三斗为大斗”、“三两为大两”。

④ 在度量衡制度史上,一些朝代下过恢复古制的诏令,如北魏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魏书·高祖纪下》),隋大业三年“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隋书·炀帝纪上》),应只是在礼乐器用等方面复古,以示承继正统。既不见租调额有相应调整,所以通用计量器不会改用古制,否则将使国家租赋岁入成倍减少,这是不可能的。王士立文中对北魏太和十九年后租额的考订,没有注意这方面问题,因此所得结论“隋朝租粟的实际剥削量比北魏超过三倍还多”,与实际情况可能出入甚大。

⑤ 开皇三年,减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绢调一匹为二丈。

面都减了,服役年限也因提高成丁年龄减少三年,却偏偏实行“重租政策”,在租粟一项上进行残酷剥削,倒是使人费解的。

隋代租额轻重的问题,还可以从文献中取证。有一条受到魏徵和杜佑重视,收进他们编的《隋书》和《通典》的史料,即苏绰、苏威父子分别为宇文泰、杨坚理财的故事:“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sup>①</sup>西魏租税是苏绰为宇文泰定的,宇文泰掌握西魏政权时的各种制度,在他子孙称帝的北周时期沿用。西魏时苏绰所定租额应即北周租额。如果按王士立表列数据,隋代田租高于前代,那就和《隋书》、《通典》并载的这条史料满拧了。既然苏威替他父亲了却了平生一大憾事,合理的租额只能是隋代比西魏北周为轻。

下面试将隋代和北周的租额折成今制,也提出数据,以供比较。

先说隋代。隋文帝开皇年间,“丁男一床,租粟三石”<sup>②</sup>,当时量制以古斗三升为一升,隋一升合0.6公升,租粟三石为180公升,粟容重以每公升1.35市斤计,三石折今243市斤。

按上文推断,北周天和元年前后分别行用官升和玉升制量器时,五斛各合280.6公升(378.9市斤)和318.2公升(429.6市斤),相当于隋代租额的155.9%和176.7%,或者说隋代租额比北周低35.9%至43.5%,略言之,平均要低40%,即上文所说的五分之一。

从实际出发,还应考虑隋代以“社仓”名义征的粟,这也是农民的一项固定的负担。开皇十六年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

① 《隋书》卷41《苏威传》、《通典》卷5《食货五》。

② 《隋书》卷24《食货志》。

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同上),各合 81 市斤、56.7 市斤、32.4 市斤。多数小农户为下户或中户,社仓和正租合计输粟 275.4 市斤或 299.7 市斤。这负担诚不为轻,但比北周时,仍少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素称轻徭薄赋的唐太宗时,正租二石加义仓亩二升,以七十亩计<sup>①</sup>,合为三石四斗,这数量正和上述隋代下户的输粟额相同,都是 275.4 市斤。

看来“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sup>②</sup>之后,隋文帝调整政策,自称“薄赋于人”<sup>③</sup>,不能全说成是装腔作势的欺世谎言。杜佑在《通典》中说“高颀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除了“轻税之法”是高颀还是苏威创设这一点外,他的总结是有相当的事实为依据的。

王士立同志也曾从多方面分析了隋朝统治阶级富有的原因,归纳为四点:“(一)隋朝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二)隋国家控制了大量户口;(三)隋文帝向农民征收了高额租粟和大量庸绢;(四)比较次要的原因,隋文帝统治时期开支比较有节。”除第三点外,分析都很中肯,但王士立同志强调的恰恰是第三点。他说:“到底隋朝统治者的富裕从何而来呢?简单地说,是隋国家残酷剥削农民的结果。”他为自己这句话的具体含义作了注脚:“(隋文帝)他征收了比前代重得多的租粟,而这正是隋朝粮仓盈溢的秘密所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其所以国库盈积,和重租政策的施行,是密切不可分割的。”他文章的题目便是《杨坚的重租政策和隋王朝“富有”的关系》。这些把隋王朝的富庶主要归结于杨坚的重租政策的话,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当时的所谓富,在一定程度上是假象,隋代生

① 《通典》卷 6《食货六》载天宝中“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杜佑注明是按每户七十亩计的,此处从之。

② 《通典》卷 7《食货七》。

③ 《隋书》卷 24《食货志》。

产并不比别的朝代强多少,只是剥削更为残酷,那不是社会进步,反而是社会反动的反映了。

我们感到如果这样评价隋文帝的经济政策不符合实际。纵观我国古代的全部历史,像隋王朝这样在建立之初的一二十年间经济上就达到堪称富庶的水平,是一个奇迹,是汉唐所不及的空前的奇迹。这是再次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一个新国家的丰功伟业。这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历史课题,怕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什么皇帝的残酷剥削政策的结果一笔交代的。所以我们从度量衡着手试论隋与北周租额轻重,提出质疑。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本文是承齐陈骏先生推荐刊出的)



# 唐代粮食亩产量

## ——唐代农业经济述论之一

记载唐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史料,有如下几则:

一、《唐会要》卷 85 逃户条,开元十八年(730 年)宣州刺史裴耀卿论时政上疏:“(浮户)每户给五亩充宅……种桑枣,筑园蔬……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按:《通典·食货典》作‘十丁’)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早收一年(《通典·食货典》作‘不啻得之,计平收一年’)不减一百石。”<sup>①</sup>

按:此疏奏未见下文,不知是否实行,但所言一顷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产一石余,大约是反映当时一般产量的。唐一亩合今 0.783 市亩,一石粟合今 81 市斤<sup>②</sup>,唐亩产一石,以粟计,合今一市亩 103 市斤。

二、《李文公集》卷 3《平赋书》:“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

---

① 《通典》卷 7《食货典七》记为宇文融上言,今从汪篾先生,依《唐会要》说,为裴耀卿上疏。见 1962 年 10 月 24 日《光明日报》《唐代实际耕地面积——隋唐史杂记之四》。

② 参拙文《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

按：李翱此书反映九世纪上半期时平均亩产量不下一石，与裴耀卿所言相同。

三、《新唐书》卷 107《陈子昂传》垂拱中上疏言甘州屯田：“其四十余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但人力寡乏，未尽垦发。”

按：唐制，屯田“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sup>①</sup>。甘州，今甘肃张掖，当为军屯。四十余屯合地二千余顷，岁取二十万斛，陈子昂所估，亩产亦合一石。

四、《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元和中“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籾、水运使……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

按：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共耕一千九百五十顷，岁收粟二十万石，合亩一石。所言“垦田三千八百余顷”，恰为实耕地数之二倍，应是包括一半休耕地在内。

五、《新唐书》卷 54《食货志四》唐代宗时议天宝以来情况：“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

按：唐代通常“每米六升折粟一斗”<sup>②</sup>，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合亩产粟八九斗以上。

六、《旧唐书》卷 163《崔弘礼传》：“上言请于秦渠下辟荒田三百顷，岁收粟二万斛，诏皆从之。”《新唐书》卷 164《崔弘礼传》：“迁河阳节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

按：此长庆后事。河内，今河南沁阳。旧传所记为奏请之言，新传所记是实收情况。田千顷收八万斛，合亩产八斗。殆是新辟荒田，亩产量略低。

七、《通典》卷 174《州郡典四》风俗：“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

① 开元二十五年令。见《通典》卷 2《食货典二》屯田。

② 《陆宣公集》卷 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千九百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校四五百万石矣。”

按:“每亩所减石余”,是说地减一亩,收减石余。大历初两渠溉田比汉代减三万八千九百顷,故总收减四五百万石。反映大历初关中水浇地亩产量是一石余。

八、《新唐书》卷110《黑齿常之传》:调露中,黑齿常之拜河源道经略大使,“垦田五千顷,岁收粟斛百余万。”《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资治通鉴》卷202永隆元年七月,“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

按:河源军治鄯城,今青海西宁。调露二年(680年)八月改元永隆,黑齿常之屯田年代诸书记载合。垦田数亦合。唯《通鉴》记岁收五百余万石,合亩收十石,大面积屯田的收获量高于常田十倍,不可信。殆“五”为衍字。当以两唐书所记为准,岁收百余万石,合亩二石。

九、《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六》:贞元八年(792年)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观察使(治荆州,今湖北江陵),在江陵东北七十里重修古堤,整治废田,“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

按:一钟为六石四斗。这是南方良田,作物或是水稻,且已可能是稻麦两作的产量,自非粟黍可比。这是唐代粮食单产的最高记录,当时南方少数良田达到这个水平,不一定是夸大的。

上述材料反映唐前后期全国广大地区的粮食生产情况,当时平均亩产量通常不少于一石,折今一市亩一百来斤或略多一些。新开荒地和贫瘠地亩产要少一二斗,较好的收成可以达到亩二石,折今制为一市亩二百多斤,最高为亩一钟,合六百六十斤左右(皆以粟计)。

这一分析结论,可以当时的地租额为旁证。唐德宗时陆贽上疏中说到:“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语见《陆宣公集》卷 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亦见引于《新唐书》卷 52《食货志二》。按一般租率为收获量之五成计,亩产合二石。又唐代职分田、公廩田一类国有土地,通常也按社会通行的办法出佃收租,法令限制租额“不得过六斗”<sup>①</sup>,租率与私田相近或略低,亩产合在一石数斗以上。公私地租额也反映出唐代粮食亩产量,通常不下一石,有的可达二石的一般情况。

研究唐代亩产还可以注意另一类史料,兹举二条:其一是《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开元二十五年诏:“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其二是唐武宗灭佛时处置寺田:“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sup>②</sup>唐代官定口粮标准是男丁月食粟一石,年十二石。规定人给十亩,当能保证其口粮,亩产应合一石以上。这是镇戍的可耕地和中下田,而非上腴好田熟地的产量,与以上估计的唐代一般亩产水平相合。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宁可先生见告《新唐书·地理志》又有“十石埭渠”,见蒲州龙门条注:“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埭渠,[贞观]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如无虚美成分,是唐代最高的亩产量)

① 《通典》卷 2《食货典二》田制下。

② 《新唐书》卷 52《食货志二》。



# 从耕三余一说起

## ——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问题

我国农业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口号：“耕三余一。”语出先秦诸子，《汉书·食货志》载，曰：“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蓄。”那曾是两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追求的目标，所反映的大致是铁器牛耕时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它提示给我们一条研究我国历代农业生产水平的途径。

###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战国秦汉之际，全国逐渐进入普遍使用铁器牛耕的阶段。史籍上保留了颇为丰富的反映那一时期农业产量的材料，但是材料有断代的问题，数据间或有出入<sup>①</sup>，特别是当时有大、小亩和大、小石等计量制度的差别，今天进行准确的折算有些困难。本文试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利用这些材料。

战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sup>②</sup>，言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

---

① 如晁错说汉文帝时引述的数据，《汉书·食货志》为“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同一段话，荀悦在《汉纪·文帝》记为“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

② 见《汉书》卷24上《食货志四上》，参文后附注①。

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这材料告诉我们，一亩平收的产量，相当农家大小口平均一人一月的口粮，或者说，生产一人一月之口粮需治田一亩。那么，在百亩所收一百五十石粟中，五口人的口粮用去六十亩的产量九十石，占百分之六十；缴十一之税十五石，占百分之十；余四十五石中，须留出种子和役畜家禽的饲料用粮，这部分参考近代统计方法，约占总产量百分之十五，为二十二石半，余仅二十二石半。按李悝所计，社祠、衣著、病丧、赋敛等都要从收获的粮食一项中出的话，仅前两项社祠、衣著即需六十石，便亏三十七石半，显然是入不敷出的。如果是租地主的地，即按交四成租六十石计，余九十石仅够口粮之数，非缩食节衣吃糠咽菜，不能省出籽种，维持生计。

可见这五口之家种百亩收百五十石，是仅够农民勉强度日，甚至是交租后便难以糊口的水平，没有什么积蓄和扩大再生产的余量。李悝所说：“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实有道理。

既然李悝的材料所反映的，无论是战国魏，或是西汉初的一般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如要做到耕三余一，至少须将产量提高三分之一，即亩产二石、一户总产二百石以上。张晏注李悝所说“大孰”、“下孰”时一家五口之农户的消费量，正是年二百石。

比《汉书》记载李悝之说更早些，《孟子·万章下》、《礼记·王制》和《吕氏春秋·上农》等篇，又有“上农夫食九人”或“上田夫食九人”等语，从供养人口数字言及劳动生产率的问题，那是更高于耕三余一的水平。试推算之：

上农夫或上田夫之家<sup>①</sup>，也应按一般户二个劳动力计算，而所食之九人可不必都是本户人口。简论之，上农夫之家一劳力供养

<sup>①</sup> 引文亦可断为“上农，夫食九人”，“上田，夫食九人”，两种断法都不影响计算结果。这里按上农夫、上田夫断句行文。

四口半,比一般户一劳力供养二口半高百分之八十。参照李悝之说,也按人月食一石半粟计,九人一年食为一百六十二石,加十一税和种饲粮百分之二十五,合计约二百石,为亩收二石之田百亩的产量。这是仅够九人口粮之数,若再加社祠(一户年十石)、衣著(每人年十石,九人年九十石),两项合计一百石,总计三百石,合亩收三石之田百亩的产量,高于平收一倍,即李悝所说“下孰自倍”的产量,比“耕三余一”的劳动生产率还要高百分之五十,即每劳力更须从年产粮百石提高到一百五十石,这肯定是罕能做到的。

看来正因为如此,一夫食九口之说后世不大提了,代之以比较现实的“耕三余一”为理想目标。至于再往上,“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云云,要比平收高三四倍,按常理是不大可能做到的。李悝这几句话徒为具文罢了。

下面我们试把耕三余一的产量,按今制折算成具体数字。

先算没有积余的数字。按我国古代传统的食物结构和消费习惯,农家正常的口粮标准,最低不能少于大小口平均每人一天净粮八市两,即一月24市斤,一家五口一年口粮需1440市斤,按六成出米率折算原粮为2400市斤(粟)。按李悝所说比例,口粮之外十一税等项支出尚占总产量十分之四<sup>①</sup>,则总产量需4000市斤,二劳力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约2000市斤。此数和宁可先生所

<sup>①</sup> 李悝说“一夫”即一家岁收粟百五十石,五人食九十石,余六十石以支付什一之税、社祠、衣著等项,占总产量十分之四。这里他没列入种子和饲料用粮,这部分应占总产15%左右,暂亦列入口粮之外的40%产量中出,冲减衣著部分所占比例。另外,社会上要养活地主和各种非农业人口,还有酿酒、熟皮等业用粮,自可从按李悝算法占总产量十分之四的付十一税等项粮中出,是一笔再分配的帐,这里可不细涉。其所占比率也可以研究(如现在供应非农业人口的口粮和其他用途的商品粮占全部粮食的20%),但计算时必须要把这一部分,不能仅计农民自家食用,农民不能把所产粮食都吃光,还要养活全社会,是明显的道理。

估汉代农业生产水平相合<sup>①</sup>。从分析方法可知,这是刚刚过得去的很低的水准。

上述标准的耕三余一,仅按口粮部分加三分之一(800市斤)、十一税和种子饲料仍按占25%(267市斤)的算法简单相加,合每个农业劳动力须年产原粮(粟)2533市斤。

口粮标准稍宽裕些,大小口平均每人每天净粮一斤,一月三十斤,五口之家一年需1800市斤,加上在总产中占四成的他项支出,为3000市斤,折原粮为5000市斤(粟)。

按上述同样方法计算,口粮标准要达到平均每人每天一斤净粮时,耕三余一的产量须是6333市斤,合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3167市斤(粟)。

既然汉代平均农业生产率仅是年产2000市斤,而做到耕三余一要达到2500甚至3100市斤以上的水平,在一户耕田百亩不变的情况下,须将通常的亩产提高26%至58%以上,其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计算回避了当时亩产量的具体数字问题,虽然那样做有难处,还是有材料可考的。东汉末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中有一条可以比较准确折算亩产的材料:“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穡之人,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斗],未为甚多。”东汉通行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和以大石计原粮的制度应无争议,按尺长23.1厘米,石容当今0.2市石计,亩产三斛合今一市亩产粟约117市斤,麦为125市斤(粟以每市石135市斤计,麦以145市斤计)。仲长统为强调所征税额不为甚多,所说亩产三斛不会是一个低估的数字。这也许可以代表战国秦汉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达到的中上水平的亩产量。可

<sup>①</sup> 见《汉代农业生产漫谈》,1979年4月10日《光明日报》。其中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宇文定为486斤,本文为480斤(按粟计的原粮,净粮为288市斤),亦基本合。

惜仲长统未讲到按亩三斛水平,一户的实耕亩数,所以不能按此亩产得到一个劳动效率方面的数据来验证上文的推算。

## 二、唐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以笔者拙见,唐代粮食亩产量一般为一石至二石,平均不少于一石,折今一市亩一百市斤略多一点。唐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以上亩产人耕六七十亩地计,可能达到年产粮 5000 市斤,但每个农业劳动力实种粮地不过三十来亩,合今制约 23.5 市亩,故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约 2400 市斤(粟)<sup>①</sup>。在盛唐社会,这是比较稳定的能达到的生产水平。这比汉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约 2000 市斤有了提高,但还略不及稍宽裕些的平均每人每天净粮一市斤的口粮标准,也达不到按平均每人仅净粮八市两的低口粮标准计算的耕三余一水平。尽管如此,那已近是我国整个中古时代在其鼎盛时期达到顶点的平均农业劳动效率了。

唐代人口约近七千万(参文后附注②),唐代全国垦田数约为七亿市亩(参文后附注③),除去休耕地和种桑麻等经济作物田地,种粮地当不少于杜佑所说的纳一千二百四十万石地税的六百二十万顷,即占垦田总数三分之二的数,这也便是占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的二千万农业劳动力合有种粮田三十唐亩的数字。按亩产一石

① 参《唐代粮食亩产量》,《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唐代农业劳动生产率,若按杜佑《通典·食货典六》约计,当时农户平均垦田七十亩,《新唐书·食货志三》载韩重华屯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亦合人七十亩。如是一劳力经营,年产粮可达 5000 市斤,但考虑到休耕和经济作物用地及五口之家通常应有一个半至两个劳力的情况,唐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实耕地便只是三十亩上下,即如储光羲《田园杂兴》所咏“种黍三十亩”的样子。韩国磐先生统计敦煌 47 户平均每丁已受田数即为 35.77 亩。北魏时“一夫制理四十亩”便可“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故田令规定男夫受露田四十亩。《(通典·食货典一)》这些可供我们判断唐代每劳力实际种粮田数额作参考。

计,盛唐时代全国每年产粮可达六亿石,合今近五百亿市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 700 市斤<sup>①</sup>。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堪称富裕的经济水平,况且在地主经济贫富不均的分配制度下,许多农民既不能保证得到那土地的份额,更得不到粮食的平均份额,然而那实实在在被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仍不失为秦汉以来我国中古社会中一个黄金时代的物质基础。

关于盛唐的富庶,有许多人们熟知的描述:

杜甫的《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元结的《元次山集》卷 9《问进士第三》:“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郑繁的《开天传信记》写当年也是:“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万,米一斗三、四文……行者不费粮。”

《新唐书》卷 51《食货志一》记开元天宝年间岁入之物中,粟一项为“千九百八十余万斛”。《通典》卷 6《食货典六》赋税下记天宝中天下计帐,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又出丝绵郡县“租粟则七百四十余万石”,两项合计千九百八十余万石,即《新唐书》据引之数。《通典》还记有“出布郡县”中“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通计为“二千五百余万石”。当时岁入之物中粟一项当按此数为准,唯官籩等数尚须另加。《通典》卷 12《食货典十二》又记库存粮食:“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若按所载和籩及诸仓存粮合计数更高达一亿二千三百七十万二千二百一十四石。即是说,唐代国家每年征粮二千五百万石,合今约二十亿市斤,库存粮食总计一亿多石,合今约一百亿市斤。

<sup>①</sup> 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汉代“每年粮食总产量约为三百二十亿市斤上下,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六百四十市斤。”录以供比较。

按《通典》所记“课口八百二十万”计，每丁每年缴粮食二百四十余市斤。库存粮合全国每人一百四十余市斤，够全国七千万人三个月的口粮。没有一个相当水平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数字和唐人描述盛唐的文字都能作为我们论证唐代农业生产达到的水平的依据。这国库存全国三个月口粮，曾是周恩来当政时的努力目标。

历史上的事情常常无独有偶。隋唐两代的农业经济各有一段繁荣，从制度到现实情况都非常相似。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sup>①</sup>。直到隋亡之后二十年“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sup>②</sup>。了解隋王朝殷富、库藏充实的概貌，可以印证对盛唐农业水平的分析。在相近的历史条件下，继隋之后，唐代农业经济再度繁盛是不足为怪的。

对唐代粮食生产水平，有一种偏低的估计，所以我们引用以上许多文字来印证数字；又有一种偏高的估计，我们也指出它并没能做到耕三余一，甚至保证不了农户有稍宽裕的口粮消费。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反复的讨论得到比较适中的对唐代农业劳动生产率近于实际的估计。

### 三、明清至 1950 年前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明清时期，乃至 1950 年前后，我国农业基本上还是保持着传统的依靠人力和畜力及简单农具经营的水平，所以我们仍以粮食生产水平为标志来讨论农业劳动生产率。

明清之际，江浙一带粮食生产情况能代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

---

① 《贞观政要》卷 8《辩兴亡》。所谓“得供五六十年”，指官方开支，不是国人消费。

② 《贞观政要》卷 6《奢纵》。

发达地区的水平。当时那里一般亩产量为米二石<sup>①</sup>，而“一夫所耕，不过十亩”<sup>②</sup>。以清一亩为 614.4 平方米、一石容 103.55 公升、大米比重为 0.8、稻谷出米率为百分之七十五计，合今亩产稻谷近 480 市斤，约比唐代平均亩产一石的水平提高了三倍半，但每人能耕种的水田仅十亩（合 9.216 市亩），不及唐代每人粗放式经营可能负担的六七十亩（约合 50 市亩）的五分之一。明清之际的江浙地区，一个劳动力年产粮一般为二十石米，折今 4418 市斤稻谷，仍不超过唐代已可能达到的，并且是在土地耕畜等条件充分时不很难达到的年产粟六七十石，折今约 5000 市斤粟的水平。

按通常的规律，农业先进地区的生产效率比平均水平要高许多，或竟至有成倍的差异，而水稻产区的亩产又要比旱地作物高许多。如嘉庆年间河南、安徽的材料说，水稻比旱地黍麦产量高一倍或一倍以上<sup>③</sup>。如其他地方耕地面积不能相应地有成倍增加，那里的劳动生产率必大大低于江浙一带水稻区。从乾隆末年起，我国人口数字接连翻番成倍增长，而增加耕地面积的前景日益黯淡，直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不妨再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对大陆的统治终结时的情况。1949 年全国人口是 5.3013 亿，全国农业人口将近 4.7 亿，全国粮食总产量大豆除外是 2162 亿斤<sup>④</sup>。仍以劳动力占农业人口五分之二计，每个劳动力年产粮仅 1150 市斤，简直难于和汉唐时代的水

① 参陈振汉《明末清初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经济研究》1955 年第 3 期。

② 清俞樾《川沙厅志》卷 4 引《汤斌疏略》言康熙初江苏、苏州松江一带情况，又明沈氏撰《补农书》记一名长工仅能管（桑）地四亩，种田八亩。

③ 清朱云《豫乘识小录》记河南之收获，“水较早，可倍增。”清李兆洛《凤台县志》记安徽亩产“黍麦可二石，稻可四五石”。

④ 谭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1957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报》。按 1979 年 10 月 13 日新华社新闻稿《我国历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情况》记 1949 年的全国人口数为 5.4877 亿，与谭文略有出入。



平相比。当时的亩产量,按 13 亿亩种粮地计,平均才百六七十斤。若再扣除近 125% 的复种指数增产的部分,实际播种面积的平均亩产仅百三十余斤,比汉唐水平高得很有有限了。

现在全国耕地面积为近 15 亿亩<sup>①</sup>,经济作物用耕地若以百分之十计,种粮地合 13.5 亿亩,1980 年总产粮 6642.3 亿市斤,平均亩产量合 492 市斤,虽然比清初苏州、松江一带稻田区的一般亩产量还高,但是九亿多人口,每人仅合耕地 1.6 亩,以三亿农业劳动力计,每劳力仅有耕地 5 亩,内种粮地为 4.5 亩,这样算出每年产粮 2214 市斤,这一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清初江苏的一些地方,甚至也低于盛唐时代全国的平均水平。

#### 四、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水平的徘徊停滞

迄今为止的我国农业史上有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的统计数字揭示的无情的事实:两千多年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既然在汉代以前人们就能提出耕三余一这样一个有客观依据和有实现可能的目标,但是直到陕甘宁边区搞大生产运动时,耕三余一仍是响亮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前后追逐了两千年,这个目标时近时远,好像故意和人们开玩笑,始终飘忽难求,不易达到。这是很能说明劳动生产率滞止不前状况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古代步亩制度沿革的历史中再取一个例证说一说。

我国古代有一夫实际上是一户耕百亩的传统,但是历史上亩制有过几次变化。周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战国末秦改制,仍以六尺为步,而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西汉武帝时,废以百步为亩的“东亩”旧制,全国统一用一亩二百四十步之制。北周用铁尺

<sup>①</sup> 据美国卫星资料计算为 22 亿亩,这里引用国内统计数。

均田度地，亩制仍旧。隋唐改用开皇官尺和唐大尺度地，一尺合铁尺一尺二寸，步制作相应改变，由六尺为步改为五尺为步，使亩积实际保持不变。对此，陈梦家先生《亩制与里制》一文论述甚详<sup>①</sup>。隋唐以后直至明清到现在，一亩六十平方丈之制除元代一个短时期外，一直未变。

很清楚，我国古代步亩制度重大变化只有两次：一次在战国秦汉之际，由百步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一次在隋唐之际，由六尺为步改为五尺为步。虽然周秦以降一夫百亩的传统未变，但战国秦至西汉初的改革，使亩积变化甚大，一夫百亩之地实际有成倍增长。“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sup>②</sup>，倡导了这一改革，正反映农业进入铁犁畜耕时代，生产力的跃进，每个农民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可是这样明显的突变，在我国整个古代社会里只此一次而已。隋唐时步制的变化不过是适应尺长增加而作的调整，亩积并无增加。唐中叶以前的近四百年间贯彻了均田制，名义上继续实行着一夫授田百亩之古制，百亩地积比汉代因尺长有加而略有增大，八九百年中不过增大13%，即从69.156市亩增至78.3市亩。汉唐间“人耕百亩”的制度和实耕土地面积相对稳定的情况，反映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个人的耕作能力没有多少发展变化，这无疑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农业生产早已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况。

## 五、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和 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小农经济指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济形式。它可以

<sup>①</sup> 《考古》1966年第1期。

<sup>②</sup>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引杜佑言。

是古代社会的某些农奴、佃农和小自耕农的家庭经济,也可以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农场;按大农业的观点,它还可以包括生产乳品的或养鸡的一类专业户。土改时期翻身农户也是一种小农经济。甚至今天在农村广泛实行的包括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责任制形式的经济,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其经营方式上,还有许多小农经济的特点遗存。这里我们是撇开了所有制,仅以劳动的个体经营性质为小农经济根本标志的。

国外的和近年来国内也开始出现的一些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农户,在生产中尽量采用机械化和其他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说明小农经济并不注定是低效能毫无可取之处的。

那么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什么早早地就失去了生气勃勃地发展的势头呢?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长期陷于发展迟缓、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经常为人们引用,那就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研究者们还指出,专制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保守政策,将科学技术发明当作奇技淫巧打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了限制破坏作用。有的还从人口无控制地增加,造成平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抵销了亩产量的增长,结果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来立论。这些分析都是深刻的,中肯的。近来,有些同志提出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sup>①</sup>,本文也想从这方面作些探讨。经济结构,在马列原著中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同义语使用的<sup>②</sup>,为避免概念上的混乱,我们使用生产结构一词。这个范畴的内涵和生产力、生产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只是为了把问题提得更明确,便于分析讨论,我们暂且试把生产结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剔取出来研究,考察它的作用,然后再把它还原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在分

① 如陈平《中国单一封闭小农经济结构分析》,《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5页。

析时,想把凡与结构有关的种种问题尽量提出来,都从这个角度研究一下。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研究结构的问题,而不是只把生产结构视为是单一的经济还是混合经济的问题,以及产品品种的构成问题等等。

现代经济学很注意经济的结构问题,目的是追求种种合理的构成,以取得最好的生产效果。我们是借鉴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这样做的。诚然,古代农业社会经济比较单纯,个体的小农家庭情况并不复杂,但还是有一个结构的问题在内,潜在地影响着生产效果。

事实告诉我们,在同一生产关系之下或经济基础之上,可以有不同的所有制构成,生产力诸要素,也能以不同的结构形式来组合,都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效果。正如物质的构成,相同的元素成分(如碳元素)以不同的结构排列组合,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如软而耐高温的石墨和脆而极硬的金刚石)一样。特别是生产结构比之生产力、生产关系来说,是个更具有相对的可变性的,可按人们意志加以调节的因素,所以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生产结构具体指些什么呢?它可以是各种经济成分即各种所有制的结构;是生产的两大部类的关系和各部类产品品种数量的分布交叉关系,即产品结构;农、工、商等业或农、轻、重等部门间的关系,即产业结构;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的关系,产品的自给性与商品性的构成,即分工的程度和生产单位与市场的联系,产销结构;消费结构;还有人口构成与产业队伍的技术构成等等。以上种种都可视为“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各个侧面,马克思认为这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之一<sup>①</sup>。这话对各种社会经济形式都是有普遍意义的。

试逐一具体分析之:

自耕农在全体农民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是明显地影响农业社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会生产水平的因素,因为“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sup>①</sup>。自耕农对生产和分配具有较多的自主权,因此生产积极性较高,生产效果也较好。不过自耕农在各类农民中所占比例是变化的,一般在农民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开展较有成果的时间地点,自耕农数量有所增加;在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加剧,自耕农又大批破产逃亡或沦为地主的依附农民,影响社会生产出现增减的起伏,这就是所有制结构对生产效果的作用了。

产品结构,我们先从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产品情况看。在小农经济下,两者简直不成比例,因为生产力低下,常常只是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线上挣扎,除了偶尔由国家组织兴修水利工程,增加一点对土地的投资外,生产资料的扩充是极有限的。当然即使是为维持简单再生产,也还须补充一些必要的生产资料,这部分所占比例纵小,也还是有两大部类产品的结构问题。不过我们看到,即使如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犁,小农家庭也往往只买犁铧头而自己制作全部木构件,连生产资料的生产也有很大一部分合到农民小家庭中去了。曲辕犁自发明以后基本按原样沿用下来,在整个古代变化不很大,二牛抬扛抬了两千年,现在陕甘一带还在抬,设备更新换代更是谈不上。生产资料生产的这种状况,反过来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是从两大部类产品差异悬殊的生产结构看生产停滞的原因。

再从农业内部的产品品种结构看,传统的小农经济,几乎家家以种粮为主,辅以若干桑麻,后来是棉花,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畜牧业和多种经营备受排斥,造成对生态环境、生产效率和社会进步各方面的种种不良后果。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小农家庭以满足自家衣食为目标的近于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使分工极不发达,因而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商业和专业手工业,除了为满足皇帝贵族地主奢侈生活需要而畸形繁荣的某些行业和盐、茶等业外,普遍萎缩,裹足不前,表现为社会产业结构和产销结构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始平衡的僵持状态;社会生产丧失了由流通交换而来的活力,丧失了由协作分工造成的新生产力。生产像一潭死水,封闭在一个个几乎不与外界交往的小农家庭中,循环往复,难有起色。

消费结构方面,同样十分单调,一个个小农家庭各自为最低热量的口粮和最简陋的衣著奔忙,低下的生产水平只能对付低下的生活水平,在这种低级的循环中,消费对产量、品种的刺激作用近于零,高消费与大生产相互促进的现代经济的特点,没有可能出现。

人口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重视的问题。传统小农经济的经营特点,只是简单地要求补充劳动人手,技术技能的传授,仅在家庭成员中一辈带一辈便可实现,而且够了。文化科学总是处在接近被摒弃的边缘。因为人手——哪怕是稍有体力的儿童——就是劳动力,就是生产力,所以历来多子多孙被视为小农家庭兴旺发达的标志和前提。人力或可直称为人手的投资——而不是人才的投资——是小生产时代最大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投资。这样造成人口无控制地增加,使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相对减少,受技术条件限制单产的提高又有局限,于是导致劳动效率的降低。效率低,可供养人口少,就要把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搞饭吃,越是靠增加人手来增加产量,越是造成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整个经济在人口增加与效率降低的一对矛盾双重危机下恶性循环。从现象看,这种恶性循环往往是导致无数次农民战争的直接原因。每当人口膨胀到被皇帝专制统治局限和摧残的生产力水平无法容纳的时候,农民战争就必然地爆发了。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让广大人民群众承受统治阶级的罪孽带来的惩罚,用战争及与战争孪生的瘟疫饥荒等最无情的

手段把人口削减下来。社会卸掉了人口这个包袱,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得到局部调节的新的也多半还是陈旧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又慢慢地恢复起来。

宁可先生指出:“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sup>①</sup>这个规律的演绎,造成人口结构方面的种种特点,是影响古代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又一主要因素。它造成的后果之恶劣与残酷,还是许多其他原因不及的。

我国历史上数千年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特点,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占据绝对优势。这种近于封闭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几乎不与市场联系的,千篇一律的小农家庭经济单位,用简单算术和的方式组成整个社会经济。少数的经营奢侈品为主的商业和手工业,在多数情况下很不发达,只充当无足轻重的点缀。这样一个经济模式,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甚至到鸦片战争我国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以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完整地保存着,可见它很具顽固或顽强的气质。正是这无数封闭式小农家庭经济循环往复运转的顽强延续,构成全国性经济的大封闭和发展的徘徊停滞。

说到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模式的顽固性和普遍性,除了自然条件资源条件方面的原因外,不能不看到专制政权的强制干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政策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商鞅时代,或更早的井田制时代起,专制政府就把提倡和维护这个经济模式定为国策,两三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他们要求农民自耕自食,一切靠自给,圈在自己小家庭里,彼此不要往来。所谓“民以食为天”,指望他们有东西喂肚子就安分守己甘受剥削。历史上在井田、占田以后,又实行过三四百年的均田制,就是强制农民接

<sup>①</sup> 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1982年6月21日《光明日报》。

受一块份地,规定种多少粮、种多少桑麻,交多少租粟,纳多少绢布,经济生活的框框从上面定得死死的。均田制的实行,曾造成数量众多的自耕农,对农业生产起过有益的作用。但从长远看,正是这种一定就是几百年一成不变的政策,把生产结构搞单调了,把整个社会经济搞僵化了。均田制和后代一直实行的要绝大多数人户人人种地家家纳粮的政策,从长远看,在本质上又是禁锢社会经济生活的层层枷锁,是分工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全面评估我国古代的农业,首先应看到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前后数以百亿计的农民辛勤劳动,开发了我们的国土,不但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得以繁衍昌盛,也对世界农业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祖国的土地上曾培育了粟、稷、稻、麦等许多重要农作物的优良品种,是世界桑蚕业著名的故乡。在一两千年以前,我国就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在耕作技术和水利灌溉以及粮食的单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等许多方面,都有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创造。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如许多论著分析的那样,在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又出现了长期相对停滞和徘徊的趋势。这是一个至今还困扰着我们现代化经济建设速度的问题。

我们实现“四化”,必须打破绝大多数人在农村和到农村去搞饭吃的紧张局面。“四化”建设要求农业的不能只是耕三余一的水平,应该是耕一余三,耕一余三十或更高的效率。为了探寻适合我国特点的农业发展道路,回顾一下历史,借鉴传统小农经济几千年中不能逾越耕三余一水平的历史教训,是有益的。四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sup>①</sup>这些话入木三分,引人深思,深刻地总结了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特点和这样

<sup>①</sup>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



一种生产结构形式影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造成愚昧落后的严重后果。但 1950 年后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的眼光囿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局限,试图用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变化来谋求农业的改造与发展,忽略了生产结构方面的问题,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算。

历史经验如此,出路何在?考虑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吸取传统经营方式的经验,将农业置于现代科学基础上,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因人制宜发挥专业特长,不拘一格开展多种经营,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现代农业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璀璨的。

今天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亿万农民在农业科学工作者的指导帮助下,正放手实践着,创造着,为实现农村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革奋斗着。我国农业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曙光正降临神州大地,让我们满怀喜悦和信心迎接它吧!

## 附注

①李悝之说教,历来有人认为实际反映的是西汉初年的情况,其中说到:“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是三百步为一里,百步(平方步)为一亩的小亩制。但既是“作尽地力之教”而“一夫挟五口”,按一家两个劳动力计算,耕小亩百亩,一劳力仅合 13.7 市亩或 14.4 市亩:

战国尺按 22.5 厘米计,六尺为步,百步为亩,则  $(0.225 \times 6)^2 \times 100 \times 100 \div 666.6 \div 2 = 13.7$ (一)

西汉尺按 23.1 厘米计,六尺为步,百步为亩,则  $(0.231 \times 6)^2 \times 100 \times 100 \div 666.6 \div 2 = 14.4$

在使用铁器牛耕以后,这个垦田亩数仅合四五天犁耕的工作量,似颇低了。比如四十年代北京近郊某地旱作,地主雇佣长工,大致是三十亩地用一个,每年正月上工,十月地净场净完工回家。也有多达五十亩地雇一个长工的,但农忙时必须加雇短工辅助。因此怀疑李悝所说并非小亩制。当然所谓“地方百里,提封九下顷”一句,不无可能是袭用旧说,言者并未细审,所以李悝所说究竟是大亩还是小亩难于论断,此即今天进行准确折算困难所在之一例。

②开元、天宝前后,唐代户口数字史籍记载如下(万以下不计):

年 代	户数	口数	出 处
神龙元年(705)	615 万		《唐会要》84,《册府元龟》486
开元十四年(726)	706 万		《唐会要》84,《册府元龟》486
开元二十年(732)	786 万	4543 万	《通典》7,《册府元龟》486
开元二十二年(734)	800 万		《册府元龟》486
	801 万	4628 万	《唐六典》3,《旧唐书》43
开元二十四年(735)	801 万		《唐会要》84
开元二十八年(740)	841 万	4814 万	《旧唐书》38,《新唐书》37
天宝元年(742)	853 万		《唐会要》84,《册府元龟》486
	834 万	4531 万	《通典》7,《册府元龟》486
天宝十三年(754)	906 万		《唐会要》84,《册府元龟》486
	961 万	5288 万	《旧唐书》9
天宝十四年(755)	891 万	5291 万	《通典》7,《通志》61
	791 万	5291 万	《新唐书》52(计算值)
	1300 -		
	1400 万		《通典》7 杜佑注
至德元年(756)	801 万		《唐会要》84,《册府元龟》486

按:以上数字都是当时政府掌握的编户数字,在天宝末年达到九百万户,近五千三百万口。《旧唐书》卷9《玄宗纪》天宝十三年户部计帐,户数为九百六十一万,是唐代编户最高数字,但与所记课户和不课户的合计数九百八十八万不合,有误差,不取。又《旧五代史》卷58《唐书·李琪传》后唐庄宗时李琪上疏:“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所言户数有误,“一千”当为衍文。编户之外,社会上还有大量逃亡漏籍户口,杜佑以为:“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唯这数是说的全国总户数。

唐代极盛时期的最高户口数字,是中外学者都关心和研究过的题目。日本日野开三郎估计唐朝总共有二千万户,将近一亿四千万人。英国普利布兰克指出:“这肯定是太高了。但杜佑的数字大约距离事实不远。”(《唐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载荷兰《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961年12月号,引自《历史译丛》1963年1期)。汪篪先生估计,天宝年间“逃户约在三四百万之间,(《唐代实际耕地面积》,1962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加上编户,总数合一千二三

百万,与杜佑数字相近。当时每户的口数,按开元二十年、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十三年、十四年的户口数字计算,在 5.4 至 5.9 之间。若以杜佑之说为准,天宝末年户数在一千三百万以上,按每户五至六口计算,全国人口总数在七千万上下。近年葛剑雄先生研究认为“唐朝前期的人口峰值大概在 8000—9000 万之间。”(《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盛唐时期全国的耕地数字,两唐书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帐均记为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余万顷,与《旧五代史·唐书·李琪传》记“垦田一千四百万顷”合。《通典·食货典》与《通志·食货略》记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余顷,按尾数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记相同,疑亦据自开元二十八年计帐,并非新的统计资料。这些都是应受田数。从敦煌户籍残卷可知,远高于已受田的实际田亩数。杜佑按天宝末年八百九十余万户,每户垦田约七十亩,亩收地税二升,合“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通典》卷 6《食货典》六《赋税下》,则全国垦田约六百二十万顷。虽然这些数字是按每户七十亩地的估计数推算而来,误差难免,但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唐政府掌握的全国耕地数字唯一较为可信的依据了。加上掌握数字之外的隐漏地亩数,汪篯先生估计:“唐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依唐亩积计)之间”(同前文。先生认为三四百万逃户每户占地应少些,故估计实际耕地略少)。若按当时全国实有户数为 1300 万,每户 70 亩地计算,则天宝时全国实有耕地面积超过九百万顷,合今约七亿市亩。

西汉垦田为八百二十七万余顷(《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八下》),汉亩一大亩约合今 0.69 市亩,故西汉全国垦田总数约为 5.7 亿市亩,到唐代增加五分之一,是农业史上合理的现象。1950 年后统计全国耕地数字,最高是 1957 年近 16.8 亿市亩,唐代垦田只及这个数字的十分之四,主要是南方开发较差,东北、西北多未计入。

(原载《中国农史》1983 年第 4 期。收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 6 月出版)

# 均田——逃户/括户——两税

——以逃户问题为中心评价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政策

关于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政策的评价,由于资料欠缺等原因,一般论著着墨无多。但是显然,要回答盛唐的由来,要分析从贞观到开元的过渡,是不能忽略这个历史阶段的。

贞观是中古社会一个突出的治世,但贞观时期经济在复苏中起步,发展水平有限,而开元以后不几年,大唐便以盛世姿态令人瞠目。无疑,武则天在几十年里为孙儿唐明皇帝留下了一份不错的家底。其真相奥秘何在?

对那以农为立国之本的时代,自然要从农业政策论起。而一般地引证她建言十二事中有劝农桑的条陈,或她诗文中均有露均霜的字样,都不大说得清楚问题。近年笔者多次在厦门、蒲圻等地举行的唐史学会的学术会议上,向唐长孺等先生请教逃户问题,并从他和张泽咸、黎仁凯、杨际平诸先生有关逃户、客户的论文<sup>①</sup>中得到启发,或者这是可以剖析武则天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个角度,甚

---

<sup>①</sup> 唐长孺:《武则天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张泽咸:《唐代的客户》,《历史论丛》1964年第一辑;《再论唐代的客户》,《中国古代历史论丛》1982年第3辑。黎仁凯:《关于唐代的逃户》,《文史哲》1982年第4期。杨际平:《隋唐均田、租庸调制下的逃户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1986年第4期。

至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衔接贞观到开元的历史过渡和均田到两税的历史过渡。

## 一、经济史上的一个矛盾现象： 众多的逃户与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存

在古代社会,农民的逃亡总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地主和国家都要用超经济强制的办法来加以束缚,这成为传统生产方式的一个规则。我国自北魏以后实行均田租调制的三百年间,历朝历代政府都以严密的户籍制度为配合,以求均田制的有效实行,其间不时辅以检括、输籍、貌阅等种种办法搜索逃户和隐丁漏口,千方百计把劳动力控制在国家手中。可是浮逃问题仍不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到后来均田制逐渐崩溃的武则天、唐玄宗时期,逃户问题又变得十分严峻。

武周时期,有“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之说。<sup>①</sup> 开元九年(721年)“四海清晏”,大治之世已成为现实时,犹“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sup>②</sup>。天宝十四载(754年)统计,当时全国8,914,709户,52,919,309口,只及西汉人口极盛时元始二年(2年)12,233,000户的72.87%和59,594,978口的88.8%,仅与隋极盛时大业二年(606年)的8,907,536户和46,019,956口相当。杜佑认为,自武德以来经过百三十八年的经营,应“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是“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浮浪日众,版图不收”的缘故。他估算,“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sup>③</sup> 也就是说,隐漏逃户多达四五百万,为编户数的45.8%—57%。汪篪师推论,“当

① 《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子嗣立传》。

② 《册府元龟》卷63《帝王部发号令二》开元九年二月乙酉诏。

③ 《通典》卷7《食货上》。

时逃户约在三四百万之间”<sup>①</sup>，则占编户数 33.6% - 44.9%。他们都认为天宝末年逃户相当于编户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那么韦嗣立所估计武则天时“亡逃过半”的数——要考虑韦嗣立所说是长安年间的检括和开元中宇文融大规模括户以前的情况——可能和事实也相去不远。<sup>②</sup>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代，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稳步上升，最后达到空前的繁荣。于是这里出现了经济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大量的逃户和经济发展繁荣并存的矛盾。

## 二、逃户对农业经济上升和生产 向广度发展的贡献

笔者曾经论证，耕三余一是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追逐了两千年而没能达到的目标，<sup>③</sup>因而在那样低下的生产条件下农业人口必然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也就是说，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养活一个大比例的闲食人口的。那么对武则天、唐玄宗时代社会上存在的大量逃户的实际身份，唯一合理的解释，便只能是多数逃户并不脱离农业生产。

所谓逃户，是脱离国家户籍管理的浮逃隐漏人户，成分复杂，包括无业游民、商贩、乞丐、私度僧尼、背军士卒和各色寄籍人口；最多的是避役农民和工匠。他们之中无疑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寄生

① 《唐代实际耕地面积》，1962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

② 《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唐德宗）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按当时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共三百二十万（《玉海》卷20）， $130 \div 320 = 40.6\%$ 正合五分之二。也可证明浮逃户数量之巨。

③ 《从耕三余一说起——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问题》，《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

阶层,但不可能大部分靠寄食生活。如此众多的人口能够长期地,几年几十年地浮逃在外,必然要有一种新的经济生活的支持。他们中间的多数,只能是脱籍而不脱产,首先是不脱离农业生产。宇文融“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sup>①</sup>就表明这八十万脱籍浮逃的客户,仍是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

敦煌出土文书长安三年(703年)三月阴永牒,叙及在甘、凉、瓜、肃等州的沙州逃户,他们“力田为务,大小咸解农功……例被招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sup>②</sup>非常具体地说明他们出逃后仍营种务农。

《册府元龟》所载有名的天宝十一载(751年)“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中指斥“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别停客户,使其佃食。……远近皆然,因循亦久”<sup>③</sup>。也说明许多浮逃客户耕种佃食从事生产的情况。

值得重视的是逃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摆脱了国家和地主的控制,逃入山泽,辟莱垦荒,立业安家,自耕自食,成为实际的自耕农。宇文融括得的客户是有相应田产的,而且当年缴出巨额税钱,“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sup>④</sup>。如张泽咸先生所说,这些客户“只能是具有部分家业的逃户,而不是一般的佃农。”根据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的材料,他进一步指出:“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及自造屋舍”的客户,更“起码应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而不会是贫困的佃客”<sup>⑤</sup>。前述沙州逃户中一部分,便已从“本乡无业”变为“有苗”,逃亡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后来唐文宗大和年间掳杀擒获吉州“洞贼”二百三十六人,“收贼棚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事,水

① 《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

② 《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册,内藤乾吉:《西域发见之唐代官文书研究》。

③ 《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

④ 《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

⑤ 《再论唐代的客户》。

陆田四百顷,牛马等四百七十余头”<sup>①</sup>。除非多年经营,是不能建设起这世外桃源式的田园生活的。无疑,武则天时逃在蓬、渠、梁、合、遂等州山林之中的三万余逃户,无论有怎样的“光火大贼”、“群盗”的恶名,也是要这样谋生,才能长期坚持。这时他们的身份最接近于充分意义上的自由自耕农,他们在事实上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耕种谋生,具有最高的生产积极性,是当时社会生产力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基本队伍。难怪宇文融括田税客的主张一直遭到许多朝臣反对。杨瑒所谓“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sup>②</sup>,是很难理解的一段话,但若想到杨瑒意在保留浮逃客户这样一支有效的生产力队伍,那么道理就很明白了。后来韦处厚也曾激烈反对检实户口,说:“自兵兴以来,垂二十载。百姓粗能支济,免致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sup>③</sup>事情变得非常有趣,默认一支名为浮户实际务农的生产队伍,倒可与在编农户相倚相补,共同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稳定;而若把浮逃户搜括悉尽,反而会引起全社会的流亡。看来这些富有经验的从地方上来的官员倒很讲实际,他们明白保存一支不在编的不受官方征发困扰的“浮逃”的生产力,能收到补给社会经济的实效。

一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当时涌现出许多由于逃户开发而形成的新的县级建制,据统计,自武则天以至玄宗之世便有三十个左右之多。<sup>④</sup>其中有如庆州怀安县(今陕西华池西北),“古居近党项藩落,开元十年,检逃户物置,故以怀安为名。”<sup>⑤</sup>又如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县镇的唐城县,“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

① 《册府元龟》卷 694《牧守部·武功二》。

② 《旧唐书》卷 105《宇文融传》。

③ 《册府元龟》卷 493《邦计部·山泽一》。

④ 《唐代的客户》。

⑤ 《元和郡县志》卷 3《关内道三庆州怀安县》。



成十二乡，置唐城县。”<sup>①</sup> 翁俊雄先生更进一步论证了武则天时期逃户的流向，是从狭乡向宽乡，重点是从关辅、蜀中流向关东和山南道，使人口区域分布相对合理。<sup>②</sup> 这是国土开发史上有意义的事件。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唐前期逃户的运动是一次向生产广度发展的伟大进军。无论那满布高山绝壑的耒耜，缘山导泉的工程，还是神州新建制的县城，都无言地宣告着有逃户们开发的一份功绩，盛唐社会的繁荣，有他们的一份贡献。

### 三、逃户对均田租庸调制 向两税法过渡的促进

自北魏起实行了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南北朝隋唐之际频仍的战乱之后，存在大量荒地的情况下，强制农民受田，耕种课税服役，“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国有荒地的授受制”；田令也愈来愈严地限制了大族豪强占田的数额，所以“又是限田制”。<sup>③</sup> 这曾起过促进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限制豪强地主、安定国家的积极作用。但到武则天统治时，社会已太平了半个多世纪，由于生产的恢复发展，国家手中已不掌握可供授受的大量荒地，更由于庶族地主所有制的逐步成熟，均田制已失去生产调节作用，日益成为一个过时的制度，不仅难于实施，而且那样严格地由封建国家支配控制土地人口，连种植经营的内容都作划一的规定，实际上变成一种僵化的模式，对农业生产起着消极的作用，不利于农民生产主动性的发挥。

① 《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

② 《试论武则天时期狭乡民户徙就宽乡的问题》，《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汪篪：《对北魏均田令条文的解释》，《魏晋隋唐史论集》1981年第一辑。

尤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度、徭役制度、无偿的繁重的差役征发使农民不堪忍受，于是脱籍浮逃成为反抗国家奴役剥削的普遍形式。

唐太宗晚年四方用兵，人间又重复隋末时自残肢体为“福手、福足”以逃避赋役的悲剧。<sup>①</sup> 雅、邛、眉三州僚人拒不从役，还发生局部骚动。贞观初年“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sup>②</sup> 上下同心治国的安定局面被破坏了。武则天神功、圣历年间(697-698)，狄仁杰接连上疏，指出河北、山东、巴蜀、江淮以南普遍发生“人不复业”的逃亡现象，原因是“频岁出师”，“调发伤重”，“征求不息”。<sup>③</sup> 唐中宗即位赦文承认：“户口逃亡，良由差科繁剧。”<sup>④</sup> 唐玄宗时宇文融括户，就是为“天下户口逃亡，免(色)役多伪滥，朝廷深以为患。”<sup>⑤</sup> 他们都是把滥征兵役和各色徭役作为逃亡的主因，农民被迫一走了事，逃往官家管不到找不着的地方，自然是比自创福手福足聪明得多的办法。反过来，逃户又成为制约差役无穷征发的威慑力量。

这些“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逃户，<sup>⑥</sup> 使当权者十分头痛。逃户冲击了国家的财赋收入和府兵制度，使国用不足，兵力不足，出现了持续的财政危机和兵源危机，不能不担心“本根一摇，忧患不浅”<sup>⑦</sup>，酿成社会危机，但朝廷无论怎样检括也不能消弭这股逃亡潮流带来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冲击，不得不在税收和兵徭役政策上作一系列调整，募兵、和雇、代役、户税，地税各种办法陆续采用和完善，最后以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正式颁布，标志均田

① 《唐会要》卷39《议刑轻重》。

② 《贞观政要》卷10《慎终第四十》。

③ 《资治通鉴》卷206。

④ 《唐大诏令集》卷2《中宗即位赦》。

⑤ 《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

⑥ 《唐会要》卷85《逃户》。

⑦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及其相关的税制和旧兵徭役制度的废止。“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sup>①</sup>,在法律上承认了逃亡客户的合法性。对于我国古代税收从以丁身为本到以资产为本征收的历史性变革,逃户长期以来不折不扣从事的斗争是直接推动力之一。他们不仅为自己争得了合法的生存权利,也为社会的进步开辟了新的前景。均田租庸调制到两税制的变革,使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限制迁徙的松动给经济生活创造了一些活力。往长远看,一支半流动的对农业生产若即若离的劳动大军潜在于社会,也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和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

#### 四、对武则天、唐玄宗时期逃 户、括户政策的一点评价

农民在逃,官府检括,是一对矛盾。但从一个意义上,即从农民和国家都在寻找解决均田制崩坏中面临的问题的办法来讲,双方又有共同点。最后殊途同归,促成了田制税制的改革。因为尽管凭借政权的力量括逃,常常有数目可观的新户附籍和相应的财赋收入,但是并不能收到亡羊补牢的功效,括户不得不最终宣告失败,改行对主客户一视同仁的两税法,从而承认了在逃客户的合法性。

本文一方面对视逃户为经济中纯消极因素的传统看法提出商榷,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历次括户所曾起过的不同程度上的积极作用,除了增加国家赋税,局部的均平徭役外,还抑制大地主兼并,甚至也曾安抚了一批自耕农、半自耕农。但总的看,当时括户是倾向于维护旧均田制度,而那一套旧制度到武则天以后已经不合时宜,已经开始崩坏,因而迟早要被废止。唐明皇君臣没有及时找到办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 206。

法实行政策转变,是酿成天宝末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我们可以注意到历史上不仅有刘煦、宋祁、司马光否定括户,还有比他们更早些的韦处厚早在长庆二年(822年)即指责从敛财出发苦苦维护旧制度的宇文融“瘁国害身”<sup>①</sup>,倒是有深一层道理的。他和杨瑒等人的反对意见需要研究,怕是不能简单地用“多田翁”之类大地主如何如何的断语一笔带过去。

我们再看武则天的经济政策,她表现出一种审慎的明智。她没有颁布任何一个新的田令去维护均田制,相反,她曾为均田制后的制度政策,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准备。比如对待逃户问题,她规定“为政苛暴,户口流移”的地方官要被解职,曾派出十道使括天下户,也有具体的捉溺逃人的材料,<sup>②</sup>但正是她开始对逃亡人户的处理采取变通办法。早在天授二年(691年),她便允许“流宕忘归”的卫士杂色人等和官人百姓在洛、怀等七州附贯落户。<sup>③</sup>证圣元年(695年)李峤建议的“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sup>④</sup>的政策,后来在长安年间是实施了的,只要逃人声称“在此有苗”而“本乡无业”,“便可方便觅住”<sup>⑤</sup>。唐长孺先生研究了敦煌出土的这个牒文文书指出:武则天“至少承认在一定条件下逃亡人户可以不括还本乡”;而“这一点在过去的法令上是不被容许的”<sup>⑥</sup>。制订这样从实际出发的,保护逃户这支重要生产力的政策,是历史性的进步。武则天在经济上表面是无为而治,其实是讲实效的,这应是武则天时代放而不乱经济振兴的奥秘所在。

① 《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一》。

② 《括浮逃使状》,载《吐鲁番考古记》。

③ 《唐大诏令集》卷99《置鸿宜鼎覆等州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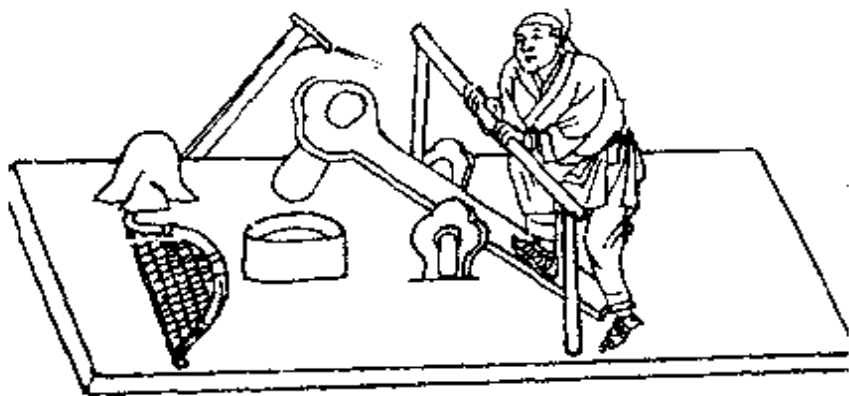
④ 《唐会要》卷85《逃户》。

⑤ 《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册,内藤乾吉:《西域发现之唐代官文书研究》。

⑥ 《武则天末年的浮逃户》。

允许逃户就地附籍的政策,后来被宇文融吸收,是为他括户取得一定成功的关键,这一点李春润先生的文章有精辟的论述。<sup>①</sup>武则天的经验告诉宇文融要谨慎行事,要顾及逃户的实际利益,因而“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sup>②</sup>。当然归根结蒂,是逃户以自己坚苦卓绝的斗争和创业劳动,为自己争得了合法生存的权利。到两税法制订时,逃户(客户)就不是个别的而是全体的合法生存权利被一起承认了。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经过逃户/括户作为过渡,均田制转变为两税法的历史轨迹。

(原载《平准学刊》第五辑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并载1990年5月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报》第3号)



① 《宇文融括户的两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宇文融括户的评价问题》,同刊1985年第1期。

② 《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

# 李皋和江陵创造的唐代粮食

## 单产纪录

——读两唐书李皋传札记

### 一、江陵的记录

《旧唐书》卷131《李皋传》载：“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新唐书》卷80《嗣曹王皋传》记事略同。《文献通考》更确指其地在江陵东北七十里。但《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和《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六》记为贞元八年事，不确，因是年三月李皋已卒于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

这是有关唐代粮食亩产量的十来个具体数据之一。

唐代亩制：“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sup>①</sup>唐以大尺为量地尺，一尺长29.5公分，亩积为522.15平方公尺，合今0.783市亩。又唐代量制，石容约60公升。今实测粟每石（公石、市石同）重135市斤石，计得唐代一石粟重合81市斤，一钟为六石四斗，合518.4市斤。唐亩折成市亩，在唐亩收一钟的产量，合今制为一市亩产662市斤（以粟计）。

$$(5 \times 29.5)^2 \times 240 = 522.15(\text{公尺}^2)$$

$$522.15 \div 666.6 = 0.783225(\text{市亩/唐亩})$$

---

<sup>①</sup> 《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135 \times \frac{60}{100} = 81(\text{市斤/唐石}) \quad (\text{粟})$$

$$81 \times 6.4 = 518.4(\text{市斤/唐钟}) \quad (\text{粟})$$

$$518.4 \div 0.783225 = 662(\text{市斤/市亩}) \quad (\text{粟})$$

此外,史籍上还有两条有关唐代粮食高产的材料。

其一是《资治通鉴》卷 202 永隆元年七月条:“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战守有备焉。”按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万石,约合亩收十石。但这同一条材料,在两唐书《黑齿常之传》中皆记为“岁收百余万石”或“岁收斛百余万”,折合亩产约二石而不是十石,与唐代一般亩产量相合。《资治通鉴》此条“五”字当为衍文。

其二是《新唐书》卷 39《地理志三》蒲州龙门条注:“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埭渠,[贞观]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折今制为一市亩 1034 市斤(粟)。

$$81 \times 10 \div 0.783225 = 1034$$

由于原资料未记明土地亩数,尚不能论断这是大面积高产。因此贞元中江陵那五千顷亩收一钟的田,便是我们现在掌握的唐代比较可靠的大面积丰产记录之一。那一片重修古堤而整治起来的废田,如同在撂荒多年后恢复了地力,良好的气候环境加上灌溉条件之下取得高产,自非偶然。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到李皋治理地方的政绩,高产田的出现有他一份贡献。

## 二、李皋的政绩

嗣曹王李皋是唐太宗幼子曹王明的玄孙,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正值泾原兵变之后,朱泚、李希烈相继作乱之时,唐德宗接连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在这多事之秋

李皋出狩江汉，曾与淮西李希烈“凡战大小三十二，取州五、县二十，斩首三万三千，禽生万六千，未尝败”，使“贼遂不敢南略”。（新传）唐室倚为中天砥柱。当时“帝驻梁州，皋之贡助相望”。源源不断往汉中输送物资接济落难的唐天子。李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靠巧取豪夺聚敛，而是倍加爱惜庄稼，努力生财。传记称赞他：“师所过，不敢伐桑枣、践禾稼。”（新传）“性勤俭，知人疾苦，设监司，能参听〔於〕下，持将吏短长，赏罚必信。所至常平物价，贵则出卖之，给将吏廩俸，豪家不得擅其利。……每遗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绝吏之私。”又能“以改过迁善，知人任下为己任”（旧传）。江陵正是在这样一位有经济头脑的精明良吏治下，创造出新的生产记录。

藩镇兵祸时，“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与贼接，皋转战数千里，餉路遂通。”应是有感于粮饷转输的艰难，他着意发展荆州农业，修复江陵古堤，整治撂荒废田，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构二桥跨江，而流人自占者二千余家。由荆抵乐乡二百里，其间墟聚凡数十，不井饮，皋始命凿井以便人”（新传）。这是说，除农田水利外他还考虑到交通、饮水，相当科学地规划了居民区和商业点，妥善安置了流民，实实在在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似乎看到一幅江陵人民在他治下安居乐业的图画，在安史乱后的动荡中流徙的成千上万农民，在他领导下成为专心致志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生产大军，创造着新的纪录。在那个时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成就。

江陵不应该忘却自己过去有过这样一位可敬的“父母官”，他曾带领人们为本地历史谱写了有光彩的一页。早归九泉的唐太宗，能有这样一位文武双全出类拔萃的后代，也应笑慰于地下。



### 三、与历代亩产的比较

唐代江陵粮食亩产一钟的记录在我国古代农业史上是怎样的一个水平呢？我们试列举其前代一批典型的高产数字进行比较。由于历代度量衡和亩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这里初步的折算远不是很有把握的，且作为抛砖引玉的想法贡献给有兴趣的研究家们。

材料之一：秦国即有亩收一钟的记录。《史记》卷 29《河渠书》载西门豹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为渠三百余里，“渠就，用注填阡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以商鞅所定计量制核算，秦一亩合今 0.65156 市亩，一石合今 0.2 石，容粟重 27 市斤，计得亩收一钟的产量为每市亩 250 市斤（粟），

$$27 \times 6.4 \div 0.69156 = 250$$

据《农情报告》，我国 1931—1946 年间全国谷子的平均亩产量都不过是 160 多市斤，1950 年后的亩产量也是百余斤，1979 年才达到 205 市斤，可见秦国当时亩收一钟已是很好的生产水平。

材料之二：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仍以“亩钟之田”为“富给之资”。《史记·河渠书》记河东守番系估计那时一般的水浇地亩产谷四石余，他对汉武帝说：“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合亩产为每市亩 156 市斤，

$$27 \times 4 \div 0.69156 = 156$$

材料之三：《汉书》卷 24 上《食货志四上》所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历来有人认为实际反映的是西汉初的情况，这里估计的平均产量是“岁收亩一石半”，“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亩产分别为六石、四石半、三石。如所用计量制与

上同爲大制，折合每市畝產量爲 234 市斤、175.7 市斤、117 市斤；如所用計量制爲小石制和百步爲畝的小畝制，即每石合 0.6 大石（16.2 市斤）和每畝合 0.28815 市畝，折合每市畝產量爲 337 市斤、253 市斤、168.6 市斤。無論如何折算，相當于平產四倍的大熟畝產仍不及江陵的記錄。

材料之四：漢代還有更高的畝產量材料。《史記》卷 29《河渠書》又載漢武帝時莊熊羆所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余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武帝這時應統一用大畝大石制，畝十石合今一市畝 390 市斤，

$$27 \times 10 \div 0.69156 = 390$$

這是莊熊羆預計的產量，“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并未實現預期效果，不能作數。但《管子·山權數》篇有“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之說，看來當時畝產十石的記錄可能出現過。即或這是小量制，則“高田十石”合畝產 562 市斤，也不及江陵的記錄，

$$27 \times 0.6 \times 10 \div 0.28815 = 562.2$$

材料之五：《漢書》卷 24 上《食貨志四上》記武帝末趙過創造代田法，在長安附近試驗，“得谷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即增加三幾十斤。改進耕作法取得如此效果是合理的。《涑勝之書》載區種法則曰：“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sup>①</sup> 這“畝收百斛”或“十畝收千石”的收穫量，是農史上的天文數字，許多人費盡心思解釋這數字的合理性，有人折算合每市畝產谷子 3898 市斤，產小麥則爲 4187 市斤。<sup>②</sup> 研究者多以爲不可能。從記載原文可知，這是涑勝之的推算，并非事實。農業諺語有“谷子三千麥六十”，是講種

① 引自《齊民要術》卷 1《種谷》。

② 《中國農學史》第 5 頁。

子和收获的比率,由此也可知亩用种二升要收百石是不可能的。

区种法当时实种的产量是“验,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十一?]石。”<sup>①</sup>也按大亩大石制折算,合每市亩 742 市斤、507 市斤、429 市斤。前两种产量与江陵亩产不相上下,也和近年的实验数据相似。前些后试验区田种植法,最好的成绩是河南安阳亩产 636 市斤,其余在 220—374 市斤之间。<sup>②</sup>可见美田十九石和中田十三石的亩产量出现在汉代便是很好的记录了。但当时还只是园艺式小区经营,没能推广,不代表社会农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

关于区田的产量,《太平御览》卷 821《资产部·一田》所引《汜胜之书》又曰:“昔汤有旱灾,伊尹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收至亩百石。胜之试为之,收至亩四十石。”与上述资料所说不一。汉代亩四十石,合每市亩产粟 1562 市斤,也不大可能。还有关于区田的资料,中田“收粟五十一石”,下田“收二十八石”云云,暂且都只能存疑。

材料之六:东汉时平均亩产,一般认为是三斛,乃据仲长统所言:“今通肥饶[饶?]之率,计稼穡之人,令亩收三斛……”<sup>③</sup>东汉度量衡,由出土实物知比西汉略有增大,但相差无多,制度上亦未见有更动的规定,暂仍以秦汉制计,亩收三斛约合一市亩 117 市斤。

材料之七:《东观汉记》曰:“垦田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sup>④</sup>这是徐县北界蒲阳陂一带水浇地的产量,合亩十斛,折今一市亩 390 市斤。

① 《齐民要术·种谷》。

② 转引自刘驰《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中国农史》1984 年第 2 期。

③ 《后汉书》卷 49《仲长统传》,《东汉会要》卷 31《食货·田制》。

④ 引自《后汉书》卷 44《张禹传》注。《东观汉记》卷 11《张禹传》则记为“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即亩产二斛半,合今一市亩仅 97.6 市斤。

材料之八：《华阳国志》卷3载：“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这是区种法亩收百斛说外最高的亩产数字，高出常产十倍甚至十六七倍，亩收五十斛折今亩产高达二千市斤，且“五十斛”在廖刻题襟馆本外，各本俱作“十五斛”，不能不存疑。

材料之九：三国“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sup>①</sup>。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司马芝曰：“建安中天下仓廩充实，良田收获到十数斛，合唐量三、四斛。”

曹魏亩积比汉略大。《隋书·律历志》：“魏尺，杜夔所用调律尺，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七厘。”合 24.1857 公分，

$$23.1 \times 1.047 = 24.1857$$

马衡即据此仿造杜夔律尺。罗振玉藏正始弩机尺长合 24.3 公分，王国维认为据弩机复原的该尺殆即杜尺。曾武秀定魏尺长 24.2 公分弱<sup>②</sup>，今据以计亩积，魏一亩合今 0.758 市亩。

$$(24.2 \times 6)^2 \times 240 = 505 \text{ 公尺}^2 = 0.758 \text{ 市亩。}$$

传世魏鼎三斗一升容 6000 毫升，合升容 193.548 毫升，当今 0.19355 升，则魏一亩十斛合今一市亩 345 市斤，

$$0.19355 \times 10 \times 135 \div 0.758 = 345$$

此数折唐量为 4.25 斛，与司马芝说可合，

$$345 \div (135 \times 0.6) = 4.25$$

若收“十余斛”，仍低于江陵亩产；若收“数十斛”，资料数据欠详，不便推断。

材料之十：《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躬自垦

① 《晋书》卷47《傅玄传》。

② 《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田,种稻二十余亩,……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每亩约得米三斛。借用唐制规定:“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谷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sup>①</sup> 糙米三石合粟 4.28 石。吴地量制不详,设与蜀地同,沿续秦汉旧制不变,亩产 4.28 石约合今一市亩 167 市斤(粟),

$$4.28 \times 0.2 \times 135 \div 0.69156 = 167$$

材料十一:西晋武帝时当阳侯杜元凯上疏请决陂放水淤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sup>②</sup> 晋尺与魏尺相当,尺长仍以 24.2 公分计,一亩合今 0.758 市亩。晋太康釜一斗容 2450 毫升,一石合今 0.245 石。晋亩一钟合今一市亩 279 市斤(粟),

$$6.4 \times 0.245 \times 35 \div 0.758 = 279$$

杜元凯所说“数钟”不具体,若是 2.4 钟,与江陵亩钟之田产量相当。

材料十二:《太平御览》卷 821 引《豫章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多良田,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映澈于器中。”据《南史·隐逸传上》,雷次宗卒于元嘉二十五年,所谓“次宗于元嘉六年撰《豫章记》”之说应可信,这也是西晋的材料。一亩二十斛合今一市亩 872.7 市斤(粟),这是“极膏腴”的良田良种的亩产,比江陵还高近三分之一,

$$20 \times 0.245 \times 135 \div 0.758 = 872.7$$

材料十三:《梁书》卷 28《夏侯夔传》:“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约合亩产十石。传世的梁尺有上虞罗氏藏尺,尺长 24.85 公分;日本人藏鍍金雕凤铜巨尺,尺长 24.90 公分;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铜尺,尺长 24.95 公分。《隋书·律历志》记载:“梁法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厘”,合 23.2617 公分;“梁表尺,实

① 《唐六典》卷 3《户部·仓部》,《通典》卷 12《食货·轻重》。

② 《通典》卷 2《食货·水利田》。

比晋前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合 23.61 公分；“梁朝俗间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合 24.74 公分。今取实用量地尺值为 24.8 公分，则亩积为 531.4 分尺<sup>2</sup>，合 0.797 市亩，

$$(24.8 \times 6)^2 \times 240 = 531.4 \text{ 公尺}^2 = 0.797 \text{ 市亩}$$

《隋书·律历志》论量器：“梁陈依古。”按石容为今 0.2 石推，梁代亩产十石合今一市亩 339 市斤。

$$0.2 \times 10 \times 135 \div 0.797 = 339$$

综上所述可见，亩收十石的产量长期以来一直是公认的高产水平，但也只及江陵亩产之半。江陵亩产一钟的记录，在迄唐以前的历史上是很先进的。唐代平均亩产仍不过一石至二石，亩一钟是相当于常产三至六倍的好收成。

表列上述数据：

朝 代	文献摘要	出 处	折今市斤/市亩
战国秦	郑国渠收皆亩一钟	史记·河渠书	250
西 汉	五千顷收二百万石	史记·河渠书	156
“	大熟田亩收六石	汉书·食货志	234(大制计)
“			337(小制计)
“	高田十石	管子·山权数	562(小制计)
“	亩十石	史记·河渠书	390
“	亩收百斛	汜胜之书	?
	美田十九石	“	742
	中田十三石	“	507
	薄田十一石	“	429
东 汉	亩三斛	东汉会要	117
“	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	后汉书·张禹传注	390
“	四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	东观汉记·张禹传	97
“	亩收三十斛	华阳国志	?

"	亩收五十斛	华阳国志	?
三国魏	水田数十斛	晋书·傅玄传	?
"	一亩十斛	养生论	345
三国吴	二十余亩米六十斛	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	167
西晋	亩收数钟	通典·食货二	?
"	一亩二十斛	豫章记(太平御览 821)	872
南朝梁	亩产十石	梁书·夏侯夔传	339
唐	亩收十石	新唐书·地理志	1034
"	亩得一钟	旧唐书·李皋传	662

#### 四、荆楚两湖地区在古代中国 农业经济中的地位

李皋似不很费力就在江陵建设起大面积高产田,作出创记录的贡献。唐代这一带还有俚语:“贵如许、郝,富若田、彭。”安陆的这四大家族,许圜师、郝处俊舅甥前后为相,而“其乡人田氏、彭氏,以殖货见称。有彭志筠,显庆中,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sup>①</sup>。可知当地多绢布,也出有名的富商大户。这里地处全国腹心,有良好的气候资源条件,又有高度发达的荆楚文化传统,可是古代荆州,乃至整个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湖南湖北地区,在明清以前很长一个时期都没能成为全国性的农业经济重心,没有像东南江淮一样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赋基地,经济上没有在全国占据应有的位置,原因是什么呢?

极为丰富的水资源,使今天的湖北、湖南都犹有千湖之省的美誉。但在久远的古代,大水更多意味的是灾难,给这里带来的曾是

<sup>①</sup> 《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

洪荒一片而不是繁荣发达。那浩渺无垠的云梦大地自古沼泽湖泊纵横,耕地有限。郢楚以降许多世纪里人们辛勤开辟,兴修水利,排水防涝,降低地下水位,水势逐步减杀,大片土地才被垦辟为耕田。“黄芦苦竹绕宅生”的地方,瘴疠之气慢慢消退,逐渐变得宜人居住繁衍,这是经过上百代人艰苦创业的漫长岁月才取得的胜利。可以说荆湘地区的进步是和治水的业绩同步实现的。

文献的和考古的资料还告诉我们,治水的事业反复多虞。晋代杜元凯上疏便言及:东南水灾,“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一时“下田所在溇汙”<sup>①</sup>。这次“三——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上蒲圻的同志提供的论文说到,近年发现东吴墓的赤壁寺湖畷,发现六朝墓的任家桥和出土六朝铜戈的白羊畷不久前都是沼泽地,正在重新被垦辟出来,而显然当年是已耕垦过又废弃的,因为一二千年前人们是不会居住和埋葬在沼泽中的。社会的进步由于反复的沼泽化而反复,真是举步维艰。比较起靠近东海或因地势也较容易排泄洪水的四川盆地来说,这里——武汉地面海拔仅 18 公尺——防治水害的工程格外艰难,这大概是开发史上首要的困难所在。

第二个困难是这里人手不足。我们极粗略地看一看大致以古荆州范围统计的两湖地区历代人户数字,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资料,列表如下:

(两湖数字/全国数字)

朝代	县数	户数	口数	户/口占全国比率
西汉(2年)	115/1377	668,597/12,356,470	3,597,258/57,671,401	5.41/6.24%
东汉(140)	117/1180	1,399,394/9,698,630	6,265,952/49,150,220	14.43/12.75
西晋(280左右)	169/1232	357,548/2,470,305		14.47/

<sup>①</sup> 《通典》卷 2《食货二水利田》。



刘宋(464)	154/1265	127,669/901,769	779,479/5,174,074	
隋(609)	122/1255	579,715/8,907,546		6.50/
唐(742)	123/1570	520,327/8,973,634	2,444,446/50,975,543	5.79/4.79
宋(1102)	83/1265	1,533,083/20,264,307	3,395,305/45,324,154	7.56/7.49
元	74/1110	2,289,204/13,867,219	8,388,825/59,519,727	16.29/14.09
明(1393)		775,851/10,612,870	4,702,660/60,545,812	7.28/7.77
清(1753)		3,421,147/38,845,354	8,905,192/103,080,000	8.80/8.64
民国(1912)		9,287,996/71,268,651	51,049,643/368,146,520	13.03/13.86

统计资料表明,东汉永和五年时荆州 117 县有近 140 万户、626 万人口,约占全国的 14% 和 13%。而后人口直线下降。到盛唐天宝元年山南东道加江南西道(除去今属江西的各州)共 123 县,才有 52 万户、244 万余人口,占不到全国户口的 5.8% 和 4.8%。只有这么一点人手,在主要依靠人的劳力的古代是不可能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宋代崇宁元年荆湖南、北路 83 县合计有 153 万户、339 万人口。只是到了元代,湖广行省中的 74 县合计有近 226 万户、近 839 万人口,占全国的 16.29% 和 14%,才重新超过东汉,走上经济上新的起点。

造成荆湘地区人口发展停滞千年很重要的社会原因是战争和经常伴随战争而来的瘟疫灾荒。自三国赤壁、夷陵大战之后,南北争战经常在这里拉锯。如西魏恭帝元年(554 年),于谨、杨忠破江陵,“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振旅而旋”<sup>①</sup>。隋开皇七年(587 年)再次用兵江陵,萧岩“驱文、武、男、女十万口”奔陈,<sup>②</sup> 这般接连不断的浩劫造成人口骤减,兼之沼泽地垦辟的困难,有限的土地粮食能蓄养的人口自然也就有限了。

交通运输是又一个曾影响荆楚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因素。这里通往古都长安要溯汉江、越秦岭,除了天子播越蒙尘逃难汉中等少

① 《北史》卷 23《于谨传》。

② 《资治通鉴》卷 176。

数时候要不惜代价运粮去接济外,平时往关中运粮在经济上几乎是不可行的。若由荆襄北上翻越伏牛山、熊耳山、崤山也很困难。六朝以后东南逐渐富庶,南北大运河便由洛阳往东南开凿;而运河的修成,使关中、中原更仰仗东南,东南亦因运河凿通而更加繁荣。相形之下冷落了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的开发就没有那样的紧迫感了。从远处说,当年大禹治水从今山西龙门一路疏浚河道直到今会稽绍兴,虽然这是一个传说,但无疑反映了先民征服洪荒世界的历程,也恰恰和运河一样把江汉地区撇下了,使这一带赶上东南地区推迟了许多世纪。大运河和都江堰造就了“扬一益二”,偏偏把居中的荆州撂下,看来就是因为长江中游的治水工程比上下游更加困难。直至隋唐甚至两宋时期,荆州虽有许多发展,但始终不及扬州、成都。

“湖广熟,天下足”。明代这一谚语说明湖南、湖北的农业终于迎头赶上国内先进地区,在一二十个世纪里经历了U字型的曲折,从波谷重新升上来,在各经济区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无论有什么样的自然方面和社会因素的困扰,到底不能阻止创造历史的人民走出自己的路来。

这以往的历史也提醒我们记取水害曾长期阻滞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教训,今天我们仍必须把防水害兴水利作为这个地区发展的战略出发点,务必把地区安全奠基在万无一失的水利工程建设上再规划一切,以免重蹈因水害而毁于一旦的历史覆辙。

(1986年5月蒲圻三——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论文,收入《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出版)

## 黑 城 行

一九八一年夏,我参加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察时曾到额济纳旗,事过已经一年有余,但那茫茫戈壁的荒凉美,那幽寂荒漠中的神秘黑城,迄今宛然在目,令人不能忘怀。

黑城,蒙名哈拉浩特,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约三十公里,乘吉普车绕行三十七公里可达。从数里之外在车中眺望,便可见蓝天下一片地势稍高而开阔的戈壁上,映着黑城清晰的轮廓。及到跟前,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城墙,巍峨壮观,气派令人惊叹。这是一座近于正方形的土城,四边各长四百米上下,城墙高达九米,南北开门,各有瓮城,并出马面。弱水故道循城西北逶迤东去,城西南角矗立着一座古塔,有一寺庙遗址。进城南门不远处,还有三座二米高的小塔,形制颇为精巧。

城中尚残存多处房屋建筑遗址,西南隅一片最高大,土坯打的山墙犹有一人多高,那里还有不少铺地方砖(36×36×6)和长方砖(34.5×17×7),当是官衙一类中心建筑物所在。

城中到处散布着居民的生活用品,如磨盘、麻鞋、古钱、陶瓷、玉饰及青铜残片。北城门外一个灰堆上,五枚宋钱散落暴露在地表,是景德、元丰和元祐元宝钱。

今天的黑城,黄沙漫过城墙,填满了瓮城,到处滴水不存。城外奇形怪状的枯树下,难得有一二株蒿草挣扎着生长。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走兽,甚至连一声虫鸣也没有。就是在这几无生命气息的地方,不

可思议地存在着这样一座可以想见其繁盛情况的古城,使我们不由要问到它兴衰的历史。传说中那位守城的黑将军实有其人吗?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第一次使西域,出陇西,经匈奴占据的河西走廊一带时被俘,“传诣单于”(《汉书·张骞传》),有人说即取道居延,径直向北方向的龙城。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自匈奴逃归长安,元朔六年从卫青击匈奴,“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汉书·霍去病传》)。数年后霍去病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夏“出北地”,“至祁连山……济居延”(同上)。汉王朝通过连年作战,将匈奴逐出河西走廊,随即在那里开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稍后在太初三年(前102年)修了居延城,四年又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阚骃云),从中原各地调去田卒屯守。这就揭开了中原王朝在边城居延置县设防历史的第一页。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将五千步兵出居延北千余里击匈奴,被八万匈奴骑兵包围,连斗八日,且战且退,循故龙城道,欲退往居延塞,但没能得到遮虏障屯兵的接应,在东北百八十里处被堵截,兵败而降,酿成一场殃及太史公司马迁的悲剧(《汉书·李陵传》、《括地志》)。

居延在新莽时称居成,东汉称张掖居延属国。《后汉书·郡国志》记当时有一千五百六户,四千七百三十三人。东汉末兴平二年(195年)置西海郡,魏、晋因之,统居延一县。南北朝时,间为前凉、北凉地。直到唐初,唐、突厥与铁勒的回纥、薛延陀等部之间发生的战事使这里又为世人瞩目。

垂拱二年(686年)武后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击铁勒之同罗、仆骨等部得胜,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陈子昂从左补阙乔知之参加了这次北征,当年五月到过同城,在那里看到“磧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陈子昂

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同城即唐初设在居延的同城守捉,大约就在黑城一带,或即是老乡称为马圈(双城子?)的那座废城址。过去的汉居延城,在唐代史籍中被称为故城,殆与同城守捉不是一地了。据侯仁之先生推断,汉居延城在古居延泽西南、黑城以北偏东处,两地相距大约十五公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沙漠中几个重要的古城废墟》,北京大学地理系《地理学论文集》第一辑)。

武则天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居河西走廊的情况史书多有记载,《新唐书·回鹘传》:“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唐会要》卷九十八回纥条记:“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武则天末,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五年,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数年丰稔,粮价大跌,“积军粮支数十年”(《旧唐书·郭元振传》)。在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下,居延地区和它所在的甘州乃至整个河西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时的居延是美好的绿洲,陈子昂有诗:《居延海树闻莺同作》,说那边地“莺声忽听新”,教人联想起西子湖畔的名胜“柳浪闻莺”。

但为时不久发生了安史之乱,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被吐蕃占领,初唐以来的发展被阻遏。这大约便是现在居延地区发现唐代遗物不很多而吐蕃文物不乏出土的原因。

西夏立国时期致力于对河西的经营。宋天圣六年(1028年)至明道元年(1032年)元昊陆续从甘州回鹘手中夺取了甘、瓜、凉州和沙州、肃州。西夏疆城“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西夏书史》卷十二),居延塞也在其内。元昊在其国内立十二监军司,其中黑山威福军司设在居延,治所即为黑城,建成于1035年。元昊“自制蕃书”,即西夏文字,并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尊孔子为帝”(《宋史·夏国传》)。所以在黑城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许多西夏文和汉文的文书。沙俄时代科兹洛夫于1907—1909年“考察”时曾到这里,盗掘走大量文

物,其中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文字写成的书籍达二千卷册之多。

1227年蒙古灭西夏。此前一年,十万蒙古兵在成吉思汗亲率下,由北而南先破黑城(黑山威福军司),而后一路攻破瓜、沙、肃、甘、凉等州,东向西夏都城进军。

元代黑城名亦集乃,立总管府。至正年间著名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过这里,准备了四十天的粮食,取道蒙古高原前往上都。考察队在额济纳旗时曾看到当地同志在黑城收集的两纸元代亦集乃路沙尔渠借麦人王伦立的字据。

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道取甘肃,攻兰州、西凉、永昌、瓜、沙州,获全胜,“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明史·冯胜传》),“留兵扼关而还”(《明史·陈德传》)。此关即这一年所修之嘉峪关。明朝防线南撤至此,今永昌、张掖至嘉峪关一带有明长城遗存。居延地区弃守为鞑靼地。黑城大约就毁于1372年的这一仗,城头上一堆堆砖头碎块显然是作为防御武器运上城墙的。北城门里火烧过的残柱大约也是那场战斗的遗存吧。至于能不能把那位黑将军与投降的卜颜帖木儿联系起来,那只能出于人们的想象了。

清代雍正时土尔扈特多罗贝勒(丹忠)率部徙至额济纳游牧。他是有名的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率部摆脱沙俄羁绊,历尽艰辛,行程万里,从伏尔加河下游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部首领渥巴锡的族叔。现在当地仍生活着土尔扈特蒙古族同胞。

黑城—居延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那里是额济纳河下游三角洲,额济纳河把这个地区和河西走廊紧密联系起来。匈奴的龙城、敕勒之金山、柔然可汗庭、突厥牙帐和蒙古的和林,就在其直北方向的鄂尔浑河上游东西两侧。从漠北南下到河西走廊,这千里额济纳河是最便捷的主要通道。所以汉以后历代在居延一带设防以拱卫河西走廊。北魏袁翻以居延“实北虏往来之冲要”,请修西海故城以处柔然主婆罗门,为“安

边保塞之长计”(《资治通鉴·梁武帝普通二年》);陈子昂说“(安北)府城一坏,则甘凉已北恐非国家所有。后为边患,祸未可量”(《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战略考虑。

从居延又可往东通银川平原和河套平原,往西通过马鬣山可往新疆,是河西路以北的又一条东西通道。贞观元年(627年)回纥酋长菩萨曾沿这条道在马鬣山大破突厥欲谷设,追击至天山。1927年黄文弼先生曾骑着骆驼由东向西沿这条路考察到居延。

居延处在南北东西交通的一个十字路口,又是沙漠中的一大片绿洲,具有明显的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它总是整个河西战略部署中的一个支撑点。

唐末以后的历史情况有些变化。国都东迁离开了关中,河西一带防御的紧迫感消减了。明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传统的丝绸之路有些冷落。清朝对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实行着有效的管辖,居延不再是边镇前哨。经济政治地理形势变了,这是后来居延沧桑变化的社会原因。

还必须注意的另一方面是自然条件即生态变化的影响。

居延地区气候干燥,年雨量在50毫米以下,全靠额济纳河引来祁连山雪水滋润,成为一片绿洲。早先这里河流分道,水草丰美,汇流额济纳河水的居延泽宽阔浩淼。汉代在这里修渠屯垦,武帝末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先进代田法,“教边郡及居延城”(《汉书·食货志上》),推广到这里,以粮入“代田仓”。大约是生产效果不错吧,接着在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一次就调遣一千五百人到居延为戍田卒(《居延汉简甲编》1590)。汉简记载当时居延的卖鱼郎还将鱼贩运到酒泉一带去卖。上引北魏凉州刺史袁翻正光二年(521年)的奏议中说西海“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说:“今居延海泽,接张掖河,中间堪营田处数百千顷。水草畜牧,供巨万人……又居延河海泽,多有鱼盐。此可谓强兵用武之国也”(《陈子昂集》卷四)。元

代“亦集乃总管忽都鲁言：‘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并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计屯田九十余顷”（《元史·地理志三》注）。

可见当初那里曾有过宜人的自然条件。可是两千年来良好的环境在变化中退化着。汉代居延城废圮已久，今湮没在深沙中。黑城又建于其南，当地传说明初该城倾覆的那一仗，是攻击者在上游截改渠道，断绝水源，迫使黑城投降的。黑城固然是在一场兵燹中毁灭，而事后再没有能重建，现在竟变成人们难以进去的地段，则是自然条件巨变的结果。干涸使黑城周围一片死寂。现在人们生活的额济纳旗在居延城和黑城的西方，紧傍逐渐向西推移的额济纳河东支纳林河（东大河）的西岸。干旱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吞噬着这片绿洲，人们在退却，可是余地不多了，西面也是砂碛。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至今未被扼制。陈子昂闻莺的居延海树，今天是一汪浅浅的死水隐没在芦苇丛中。汉代卖鱼郎倚为生计的大泽，现在湖底水退处是一片片干死的枯鱼。额旗尚有百余万亩林木，其中胡杨林占三十三万亩，号称全国第二，有些地段长势还好，普遍情况是老化了，只剩些粗可合抱的老树，小树很少。访问畜牧局的一位蒙古族副局长，三十年前他十二岁时在旗南放牧，当时那里草地茂盛，几群马放进去没在草中不见影，我们看到现在那里只有稀疏的芦苇。由于缺水，草场退化，羊群吃嫩树落叶，骆驼啃树梢，小树长不起来，胡杨林的生存处在危急中。森林草场的退却更使沙荒蔓延。不久前还是清流不断的额济纳河，现在基本上是干河，我们去到东大河桥上，滴水不见。这时已进入八月了，水头还不见过来，人们真是望眼欲穿！县里的人们可以靠深井取水饮用，而森林草场农牧业生产只能指望额济纳河水，指望上下游合理分配用水，科学管水。生命力完全系在额济纳水上的居延地区，怎么经得起常年断流的威胁。

我们不能忘记两千年来居延的开发史上的教训，一个无庸讳



言的事实是人们在自已开发过的地方一步一步后撤,开发一片,破坏一片,废弃一片;再开发一片,再破坏一片,再废弃一片。居延城毁灭了,黑城毁灭了,曾是水土宜人的地方一一变成荒漠戈壁,阶级社会里残酷的战争冲突加速了生态破坏。这一切不由得使人感慨:大自然是慷慨的,当人们珍惜它、保护它的时候,人们能源源不断地从它那里取来一切衣食之需;大自然又是严酷的,当人们破坏它、掠夺它的时候,它也会降灾,让一片荒凉代替郁郁葱葱,使人们困顿,丧失立足之地。

自然生态的变化和社会历史的兴衰之间该有一条怎样的规律联系着呢?这或许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吧!

在今天的世界上,沙漠和沙漠化的土地占了陆地的三分之一,威胁着许多亿人的生计。覆灭的黑城,作为生态问题上沉重教训的一个典型先例,应是一面发人深思的镜子。复活它,使它恢复千年前那勃发的生机,是一项有意义的实验,该是“超诺贝尔奖”的项目吧。对有能力征服旧世界,正在征服海洋和太空,征服一切邪恶和愚昧的我们中国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期待有成功的那一天的。

(原载《西北历史资料》1982年第2期,略去15帧所附图片。1981年夏的丝绸之路考察,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生态环境的巨变和恶化。考察队的文集《丝路访古》中,收有高敏先生等的相关文章,胡耀邦主席视察甘肃时看到后,在报告中引用,提出应该反弹琵琶,先念草木经的发展方针。将近20年过去了,得知的消息是当年我们所见尚有浅浅一汪水的东居延海已完全干涸,滴水不存;见到的报导是胡杨林在哭泣,断了水的30万亩林子岌岌可危,国务院关于分水的规定多年不能执行。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提醒我们,如今在谈的21世纪对大西北的开发,能不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第一位吗?)

## 周秦汉唐礼仪文化的价值定位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自周公孔子制礼作乐奠基,到《大唐开元礼》纂成定型,而后又传承宋元明清,传统礼仪绵延 3000 年。这种礼仪在古代文化中占据着基干和核心的位置,是如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所说:“如果要以简单的文字来说明中国文化的主要成分,实当举礼、律两者。”(《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礼法涵盖了文化活动的主要部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评论周秦汉唐礼仪文化,应给予一个怎样的价值判断呢?

礼仪最早的产生在人类社会文明曙光初绽的远古时代,在原始的渔猎采集极低下的生产力下,能得到的维持生命的食物经常是极为有限的,需要一种强制和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能够平均分配食物,人类社会的第一礼“饮食之礼”,就这样体现着克制和公正,产生出来了。《礼记·礼运》篇对此有个出色的论断:“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荀子的回答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说到人欲,“食”以外便数“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告子也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认为男女之性是人之大欲、人的天性。自然也需要礼节制约,这就是荀子所说:“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聘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

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荀子·富国》)《竹书纪年》称: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始创婚姻之礼。

这男女夫妇之礼还被十分看重,《周易·序卦传下》在有天地万物之后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因而荀子说:“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无怪人们把礼的创始人的桂冠给了三皇之一的人皇伏羲氏,在敦煌壁画的形象中,他和女娲人首蛇身交在一起,作为第一对夫妇,伏羲持矩,女娲持规,意味深长地要为人世立规矩。从《史记·五帝本纪》到《通典·礼典》,总结五礼,把创制礼仪的始作俑者伏羲树为炎黄之前历史上的一位大英雄,而后把制礼作乐的周公和孔子奉为圣人先师。

据称是周公在还政成王的前一年,约公元前 1050 年制礼作乐,创立以嫡长子继承法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册封、巡狩、朝覲、纳贡、六官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维护父与子、兄与弟、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尊卑等级的礼法也相应确立,于是礼仪大备,这就是后世效法的周礼。孔子回顾三代,一再表示:“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礼运》)面对贵族非礼僭越,礼废乐坏,旧宗法秩序大乱的局面,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开创的儒学,也可说是礼学,二千多年间一以贯之,成为国学的核心。三纲五常的礼教被奉为治理社会的圭臬。学子们也被引上皓首穷经诵读三礼在内的儒学经典以求取功名的科举之路,科学因而被冷落,礼学却得到广泛普及,深深影响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礼仪还居然超越地域、语言和民族,成为中国夷狄之分的标准。隋代大儒文中子拟《春秋》修《元经》,毫无心理障碍地“帝元魏”,认鲜卑为“吾君”,他看重的是元魏已“居先王之国(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礼)”(《文中子·述史篇》),完全接受了传统的礼制。唐人陈黯有著名的论文《华心》,称“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生于夷域而

行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这种以礼亲合国人的观念,对中国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持续性、包容性、同化力,有巨大影响。

礼还成为历代制订刑律的依归,是可以无所不为的政权、族权、父权、夫权等四权行使各自权力的根据。行为即使近于肆虐,也是天经地义,因为都不违礼。

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伦理纲常架构起来的社会,制造了家庭亲族的温情,培育了忠臣报国的热心,也训导出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的卑微。在以屈辱为代价换来的社会稳定中,任何一个臣民的尊严,乃至包括生存权在内的全部人权,随时可以轻易地被剥夺干净。谭嗣同的《仁学》引朝鲜人的话:“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至少应当承认,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数千年文明史上,除了汉唐一振雄风外,更无几度辉煌。

矢志维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帝王独尊地位的传统礼仪,教人们唯官、唯上,无条件地膺服尊长和权力,而不须讲法律、正义与真理。权力崇拜带来争夺皇位的阉斗层出不穷,必然趋于腐败的经济政治也不断激起农民战争,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周期式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也是举世无双的。

礼仪产生的合理性与具有的破坏性并存,它挟带着温情又制造了残酷。在我们国家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礼仪发挥过强大的凝聚力,同时又是摧残无数生灵的罪恶渊藪。研究周秦汉唐礼仪文化,批判地认识这一中国特色的传统礼仪,根绝吃人的礼教影响,使人性不受压抑,使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人人能按自己的合理意愿去追求感情和人生价值,从而换来他们对社会尽心尽力的回报,顺乎历史潮流改革前进,这将是中国文化振兴和社会实实在在进步的历史性大业,也正是我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专制政治扼杀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理念精华唤回来的前提和意义所在。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 茶与婚姻

茶文化,以其平和诚敬的高雅,不仅表现着茶人的气质风度,还曾在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融汇中,展示出礼仪文明的深刻内涵。本文仅仅以茶与婚姻一端为视角,窥其一斑。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或“礼义之邦”自诩于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礼为本”的文化。不仅精神文化,连服饰饮食、园林建筑和舆轿车马,这些衣食住行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也均以礼为其内核精髓。而极重伦理的古代哲人,又以婚为礼之本,无论是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序列,或是冠、婚、丧葬、祭、乡饮酒、相见六礼的体系,婚姻在全部礼仪中排在极重要的地位,这就是《礼记·昏义》所说:“昏礼者,礼之本也。夫礼始於冠,本於昏。”其道理,《周易·序卦传下》更透彻地说在前面:“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既把男女的婚媾视为礼之本,婚姻之礼便有了极庄重极认真的仪式。《仪礼·士昏礼》记婚礼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是为婚前礼,除纳征定亲要送一份厚重的财礼,其余五个仪式,男方的人去女家时都要带去雁为礼,雁为随阳之鸟,性又丧偶不再,寄喻将来妻子从夫之意。

上述这套婚姻理论的礼仪程式,行用了两三千年,只是在茶文化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在婚礼中用茶代替了雁。这首先是因为茶

与雁的习性相类似,也有矢志不移之性。如《天中记》所言:“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再者,人丁增殖,婚礼用雁量大,雁不易得,不仅是数量问题,雁作为候鸟,一年四季不是随时可得,若用面雁或鹅代替又有失诚敬。茶有其长处而无其短处,实为替代雁充礼的最佳选择。不仅是聘礼,在宋代,连女家的回礼也使用“茶饼果物”、“花茶果物”、“鹅酒茶饼”了(《梦粱录·嫁娶》)。而后,径称定婚的聘礼为“茶礼”,“将娶,行聘礼……俗名下茶,又名过礼”,女子受聘为“受茶”。《中华全国风俗志》等书记载的这些“茶礼”、“下茶”和“受茶”,说明茶已深深介入婚礼的全过程,成为民间普遍的风俗。

比如光绪《顺天府志》记婚礼:“合婚得吉,相视留物为贄,行‘小茶’、‘大茶’礼。”《宛平县志》和《大兴县志》记婚礼,都是:“纳采曰‘行小茶’,纳征曰‘行大茶’。”光绪《通州志》记婚礼稍详,也是:“将娶聘行礼,用衣饰及羊酒、果饼等物,俗名‘下茶’”,又称:“娶之次日,女家送果品等物,曰‘点茶’。”民国《顺义县志》仍称:“将娶纳聘,俗谓‘下茶’。”

这风俗还流传至民族地区。光绪《蒙古志》称蒙古族:“饮喜砖茶,食喜羊肉。砖茶珍如货币,贫富皆饮之,二三日不得,辄叹己福薄。切为片,碎末投于沸汤,调之乳盐,而后饮之,若和黄油,味更美。客至饷之,为异常优待。”茶亦引入婚俗:“嫁娶之制,设媒介,合年庚,送茶礼,随嫁妆,一如汉人。”民国《归绥县志》称:婚礼大别有三,为换帖订婚,下茶,迎娶。“下茶亦曰‘下会亲’,娶之前一月,婿家遣媒请期,得女家允许,择日下茶。是日,除衣服不再给外,致余物如前(为白米红枣酒羊等),别致制钱二千或银圆二为长命钱。女家贫者,下茶仪物,得酌量折价,亦有兼送肉二方、馒首百枚者。”《归绥县志》并记“满俗”:“下茶谓之‘过礼’,多于娶期前二日行之。是日婿家备衣数袭,耳环一双,猪、羊、鸡、鸭各一对,致女家。新郎偕伴郎一人、陪亲男女各四人往女家,款以酒食。”民国《丰镇厅志》

记婚礼：“择吉迎娶，行纳币礼，名曰‘下茶’，即附以请期书，铭曰‘通信’，即古纳吉、纳征、请期礼也。”

民国《奉天通志》记东北地区汉族婚礼：“婚议既定，男家将簪珥、布帛之属，偕媒氏至女家行‘定聘礼’，女家设筵，易杯而饮，俗谓‘换盅’，又曰‘放定’，亦曰‘下小茶’。……及婚期一月内或旬日前，男家复择吉日，具猪、酒、蒸饽、衣饰之属（富者双猪、双酒，贫者减半，或折钱币，惟衣饰为必备之品。又有以鹅施采色，用以代雁者，然殊少见）送于女家，谓之‘过礼’，亦曰‘行茶’，又称‘下大茶’，即《仪礼》纳征之义。”民国《庄河县志》记俗婚礼：“议谐，不用媒柬，以簪珥、布帛等作定礼。俗曰‘换盅’，次用雁、币、羊、酒请期，即纳征也，名曰‘下大茶’。”有趣的是虽都不免收授财礼的陋规，但满、蒙等族也和汉族一样，用“下茶”或“下大茶”的概念来行古婚礼六礼中最重的确定婚姻的纳征礼。又如《茶余客话》记清代淮南风俗，男方下聘礼，“珍币之下，必衬以茶，更以瓶茶分赠亲友。”在婚姻中，茶已是许多地区和民族必须的礼物和礼节了。

《甲申杂记》一则赐茶的故事也很有趣。宋“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饼角子是切开的茶饼，分赐进士。七宝茶是用茶与七种甘香佐料加工而成的宫廷名贵饮料。后妃们这样殷勤看待新科进士和考官，该不是想挑选乘龙快婿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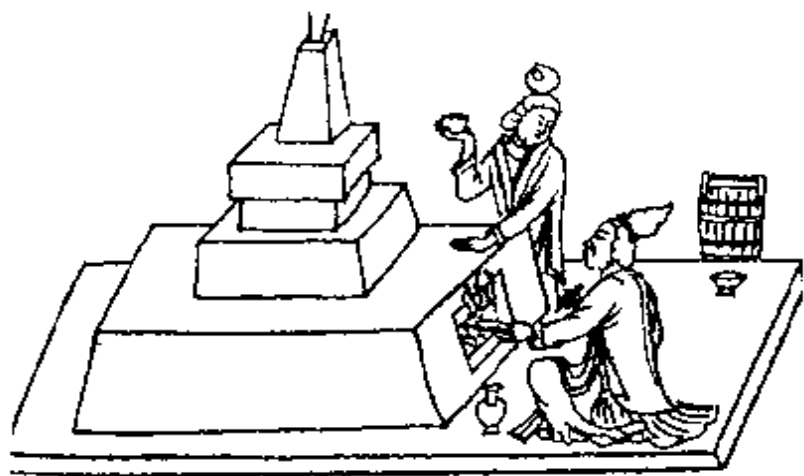
《听雨丛谈》则记清代的风俗：“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满汉之俗皆然，且非正室不用。”茶叶更升为身价很高的明媒正娶的信物。

明媒正娶的另一个代名词是“三茶六礼”。《蜃中楼·姻阻》有“他又不曾有三茶六礼行到我家来”，《彷徨·离婚》有“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李渔和鲁迅笔下都记录了这语言习俗。清代以来一些产茶区婚姻用语中还有一些与茶有关的专用词语，如新娘

进门对公婆等长辈行跪拜礼,湖南醴陵称“拜茶”,广东顺德叫“跪茶”,而四川、湖北、陕南等地,婚后女家要派出未婚少年为新嫁娘“送茶”,带去家乡亲人温馨关怀,全不是把嫁出去的姑娘当泼出去的水那样冷漠无情。

按中国的习俗,从雁到茶,礼物在人生的婚姻大事中,自提亲开始便是不可或缺的。由于雁和茶所特有的品格,特别是以人人需要丰俭皆宜的茶代替生态意义上需要保护的雁,表示着我们礼仪文明的素质和进步。送一封香茶,表示结百年好合的意愿,多么富有诗意。当今一些地方相互攀比,无止境地索求财礼,不知使多少家庭不堪负荷而痛苦。如能复归淳朴,一杯茶就办了事,既不失礼,又传递了脉脉温情的殷切期待,岂不美哉!那就是茶文化为整顿世风的贡献了。

(1994年11月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载《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





## 贬抑运河的文化心态

外国人称古代世界有金字塔和空中花园等七大奇迹，中国文明史上也有万里长城和兵马俑等惊世之作。可是无论中国的，外国的，哪一项古代工程的社会价值能与中国的大运河匹敌呢？恐怕没有。就促进文明进步的意义来说，这条迄今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隋代人民创造的一项真正的世界之最。

可惜在众多中国人眼里，运河不能得到它应有的荣耀。最典型如唐人胡曾的咏史诗《汴水》，竟直截了当把运河视为亡国祸水：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千余年间，开河作为“亡国之虐政”，几成史家定论，纵使说到它有“后世之利”，也要拐个弯说是“客观上的作用”，意思是与开河的本意无涉。

人们嘲笑因噎废食，却又常常因人废言。按这种思维习惯，大运河受到它“主人”隋炀帝不好的名声连累，滔滔运河水似乎只因为载过他命美女拉纤的龙舟就变得淫荡，变得污浊，再也神气不起来。本文在剖析中国人这般贬抑运河的文化心态时，笔触不免要扯到让运河分享骂名的隋炀帝这个人物身上。

众所周知，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风流天子。在旧史上

特别是坊间笔记小说中,隋炀帝一生,似乎只是扮演了一部荒淫无度艳史的主角。不过我们这里想在不无褒扬的意义上使用风流这个字眼,并且澄清那位“被桃色迷雾损害了的君主”的本来面目。尽管在学术探讨中劳神去申辩一位皇帝是否荒淫是忒无聊了,但这也许会使普通中国人的心理获得一种平衡。扫清了外围,才好心平气和、比较客观地去看运河。

我们先回顾一下有关隋炀帝的流传很广的丑闻:平陈时,因为没有给他留下张丽华而记恨李渊,有的说他因此诛杀高颀;登基后,与宣华夫人和西苑十六院夫人终日厮混而荒疏朝政;下扬州时,驱美女嫩羊为龙舟挽缆背纤。其实这些都是不难澄清的不实之辞。

第一则关于张丽华的故事。深受陈后主宠爱的贵妃张丽华,“发长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鉴”,是位“飘若神仙”<sup>①</sup>的绝代美人。隋军亡陈时,陈后主同她和孔贵嫔捆在一起投井,表示生死不分离的情意。但陈后主获救被俘后,她却立即被处死,由此传出第一条关于隋炀帝的桃色丑闻。

唐初魏徵主持编修的《隋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称,攻下建康后,杨广曾命在自己身边任职的高颀之子高德弘飞马进城,转告高颀说,自己欲纳张丽华,命他留人。高颀回答:“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按太公蒙面斩妲己的故事,斩张丽华于青溪。杨广因此气得变了脸色,悻悻地说:“我必有以报高公矣!”后来果然在自己当皇帝后不久,便挑他几句闲话,扣上“谤讪朝政”的罪名,杀了高颀。人们在痛惜这位隋朝第一良相冤死时,总和张丽华的事联系起来腹诽隋炀帝。

后代的文人,嫌贪图女色、残害忠良的罪名还不过瘾,又拉扯上李渊。大约在明清之际成书的《隋史遗文》又铺垫成这样的故

<sup>①</sup> 《南史》卷12《张贵妃传》。

事：

此时他(指杨广)离远京师,且又闻得张丽华妖艳,着高颀之子记室高德弘驰到建康,来取张丽华……李渊便道:“高大人,张、孔狐媚迷君,窃权乱政,陈国覆灭,本于二人,岂容留此祸水再移隋氏?不如杀却,以绝晋王邪念。”高颀点头道:“正是!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今日岂可容留丽华?”便分付并孔贵嫔取来,斩于清溪……高德弘恐怕晋王见怪,把这事都推在李渊身上……晋王大怒道:“我虽不杀丽华,丽华由我而死,毕竟杀此贼子,与二姬报仇。”当下一场懊恼散了,早已种下祸根。

《说唐全传》沿用此说,也在开卷第一回便讲了这“李渊杀美”的故事。在野史里,张丽华之死又成了杨广欲害李渊的根由,逼得李渊起兵反隋兴唐。杨广贪图女色更有了招致亡国之祸的罪过。

其实,平陈隋将的名单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清清楚楚,李渊根本没有参与,张丽华的事无论如何也扯不上他。至于高颀,按当时隋文帝的授权,只是处置军事方面事务,而人事方面生杀黜陟大权,仍由节度诸军的主帅杨广本人执掌,高颀是不大可能越权擅杀张丽华的。况且贞观年间与魏徵同在史馆的姚思廉所写的《陈书》和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撰写的《南史》,都明说“晋王广命斩之於青溪中桥”,是杨广本人下令处死张丽华的。不知为何,负责统筹正史修撰的魏徵会容许《隋书》与《陈书》、《南史》的记载出现如此相悖的差舛。在因此而留下的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谜中,不由得令人生疑:借此丑化隋炀帝,是不是历史的一个颠倒?

第二则关于宣华夫人和十六院的故事。宣华夫人陈氏是隋文帝晚年的宠姬,她本是陈宣帝之女、陈后主妹,国亡后配入掖庭,选为嫔。她“性聪慧,姿貌无双”,也是位绝代佳人。杨广为晋王时,

为夺太子位,用金蛇、金驼等宝物重赂陈氏,得到她的帮助,史书称她:“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sup>①</sup>二人结下很深的关系。至于史称在仁寿宫变中,宣华夫人被太子杨广强暴后告御状,引起病危的隋文帝大怒,要易太子被弑身亡一节,笔者认为不大可信,因为宣华夫人除非犯傻,是不大可能在老皇帝行将就木时,得罪和自己关系很深,并且马上要继位的新皇帝的。此事已另撰文辨析。<sup>②</sup>这里只说隋文帝去世当天下午,宣华夫人便羞羞答答地接受了杨广派人送去的同心结。隋炀帝登基后,宣华夫人被召进宫,两人有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宣华夫人年仅 29 岁便去世,隋炀帝有《伤神赋》哀悼她。史书将这段风流故事作为隋炀帝乱伦的罪证暴露,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更将此情节大加铺叙,在“黄金盒赐同心,仙都宫重召入”一节中称:

炀帝与宣华恣意交欢,任情取乐,真个欢娱夜短。正好受用,又早鸡鸣钟动,天光欲曙。炀帝因昨日才登极,又有丧事在身,万万延捱不去,没奈何,挣将起来早朝。……退了朝也等不到晚,略在中宫与萧后鬼混片晌,更东支西捂,依旧躲到后宫来与宣华幽会,每日家欢谈快饮,那里管什么嫌疑。一连就在宣华宫中住了半月有余。初犹出来视朝,后渐渐睡到日中不起。宣华再三劝勉,炀帝那里肯听。

分明是将唐明皇晚年迷恋杨贵妃,“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情节,拙劣地移植到隋炀帝身上了。

再说十六院,那是隋炀帝营建东京时,修在洛阳西苑内的游憩

① 《隋书》卷 36《宣华夫人陈氏传》。

② 《试辨仁寿宫变之谜》,《人文杂志》1992 年第 4 期。

之地,大运河直通苑内,隋炀帝下江南便是从这里启航的。西苑周二百里,苑内造海,海中为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海北有龙麟渠,沿渠作十六院,每院由一名四品夫人主持。又每院各置一屯,宫女管理,备养猪羊,穿池养鱼,种植蔬菜瓜果,“水陆之产,靡所不有”,<sup>①</sup>成为养殖业生产基地。在这一派田园风光中,又悉心栽培杨柳修竹,名花美草,还建有逍遥亭、曲水殿,飞桥阁道,鲜丽精巧,冠绝古今。唐杜宝的《大业杂记》还称: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宫人三五十骑游苑,马上奏《清夜游曲》,十六院竞以佳肴款待,求市恩宠。其实东京建成后,隋炀帝仅大业二年(606年)在洛阳过了一个中秋节,其余年份,他都是开春后便四出巡视,九、十月后才回洛阳,在位14年中,难得有一两次赶上观赏洛阳牡丹的机会。司马光大概觉察到这个错误,在《资治通鉴》里改作“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不提“每秋八月月明之夜”了,却将“宫人三五十骑”改为“宫女数千骑”,大大夸张了夜游的规模。而到《艳史》里,又称“炀帝自与萧后为清夜之游,神情愈觉放荡。日日只在歌舞上留情,时时只在裙带下着脚,无一日不到西苑游玩”。好像隋炀帝终日在西苑浪荡,什么也不干了。

一位香港学者曾公正地指出:查史官对炀帝之评价,虽有种种贬抑,“惟不敢及其荒于政事”。无论功过是非,“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sup>②</sup>的隋炀帝是勤于治理国政的,只末日来临前有一段颓废为例外。借宣华夫人和十六院这些事,添油加醋,把他丑化成一个耽於女色的昏君,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第三则关于用美女挽龙舟的故事。当时他从洛阳西苑出发,乘坐的龙舟高45尺,长200尺,分4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120间房和内侍的住处。皇后乘规模略小的翔螭舟,妃嫔分乘九

① 《大业杂记》。

② 《隋书》卷4《炀帝纪下》。

艘浮景, 贵人、美人和十六院夫人有三十六艘漾彩。这些船由九千余名身穿锦袍的挽船士拽行, 称“殿脚”, 比拟这列船队从远处看, 好像是一组长了腿的宫殿。另有随行的文武官乘坐的楼船和黄篾舫数十艘, 用挽船士八万余人。翊两岸护卫的十二卫步骑和前后军, 又是二三十万。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沿途五百里以内州县来献食。他所以要大摆排场, 率领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去扬州, 是存心炫耀中原天子的气派。他迷信这十面威风对南方土豪酋帅的震慑作用。他从大业元年(605年)起一去再去, 明白地表示出他对东南地区的关注, 对这块分裂了三百年之久, 才统一起来又曾经叛乱过的地方, 无疑具有监控和稳定的作用。当然大业十二年(616年)最后一次去, 是北方已经大乱, 想逃避农民战争的惩罚。

小说家们不管这一活动的历史内容, 一味在娱人耳目的用心上添枝加叶做文章。本来为龙舟挽船的殿脚, 招募的水工都是“江淮以南少壮者”,<sup>①</sup> 在署名颜师古撰的《隋遗录》又名《南部烟花录》里, 变成“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 执雕板镂金楫, 号为殿脚女。”在韩偓的《炀帝开河记》里变成“吴、越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 谓之殿脚女。”《艳史》据之衍成这样一段艳文:

一船有十条锦缆, 一缆须用十名女子, 十缆共用一百名女子, 十只大龙舟, 共计要选一千女子……再选一千嫩羊, 每缆也是十只, 就像驾羊车的一般, 与美人相伴而行, 岂不美哉!

而后《艳史》还写隋炀帝又心疼这些女子, “一个个都流出汗来, 喘嘘嘘的行走”之辛苦, 命人在河堤上种柳, 为她们遮荫。他又在殿脚女中选出“娇柔秀丽, 有西子、毛嫱之美”的吴绛仙, 宣召侍

<sup>①</sup> 《隋书》卷24《食货志》。

寢，昏昏贪睡，日午不起。

文人笔下，将少壮男性水工变成殿脚女或殿角女后衍变出来的这一串故事，又使炀帝开运河下扬州的历史性活动成为一段秽史。

隋炀帝登基之后，没有闲居深宫。他深知“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鄙视以往“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sup>①</sup>的腐朽生活，一反他父亲蛰居深宫的作风，北出塞外，西巡河右，东征高丽，南下扬州，前后十次大规模出行，亲巡四方。在位十四年中，在京城长安总共住了不过九个月。如果说他是巡游无度，那么北边、西边、东边所到之处，烽火狼烟，并非好玩的地方。在雁门关和大斗拔谷，他还多次历险，姐姐乐平公主，即前北周宣帝的正宫皇后，就死在一起去河西的路上。

隋炀帝不畏险阻，不顾鞍马劳顿，频频出巡，是在为国事奔忙。北上和西巡东征的目的，显然是为同觊觎中原的“东西呼应，笼罩北边的那个强大弧形”<sup>②</sup>的威慑力量作抗争。唐太宗时仍北攻突厥，西平高昌，东征高丽，是隋炀帝事业的继续，可他没有事事躬亲，不如隋炀帝辛苦。

比编造寻乐淫荡的故事泼脏水的办法更能损害炀帝和运河形象的手段，是渲染开河的苦难和恐怖。始作俑者为《炀帝开河记》，竟称所谓的开渠大使麻叔谋乃是一吃人生番，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称：

〔宁陵巨富陶榔儿兄弟〕盗他人孩儿年十三四岁者，杀之去头足，蒸熟献麻谋，咀嚼香美，迥异于羊羔，爱慕不已。……榔儿兄弟自后每盗以献，所获甚厚。贫民有知

① 《资治通鉴》卷181 大业五年六月条。

② 金宝祥：《隋史新探》。

者,竟窃人家子以献求赐。襄邑、宁陵、睢阳界所失孩儿救百,冤痛哀声,旦夕不辍。……于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儿者,家置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子于柜中锁之,全家秉烛围守。至明开柜见子,即长幼皆贺。

对此《大业拾遗记》则说:

炀帝将幸江都,令将军麻胡浚河。胡虐用其民,百姓惴栗,常呼其名以恐小儿,或夜啼不止,呼:“麻胡来”,应声止。

无论麻叔谋还是麻胡,史无记载。据考,主持开运河通济渠段的负责人是皇甫议<sup>①</sup>,小说里的麻某是虚构的人物,他吃孩儿的故事更是杜撰出来的。

《开河记》更称,包括丁夫三百六十万人在内,连供馈饮食的后勤人员及兵卒,挖河总共动员了五百四十三万人,丁夫折约二百五十万人,五万兵士折二万三千人,“死尸满野”,这也是不可信的。因为这二百五十多万死人,要占到当时全国五千万人口中 15 岁到 50 岁男性劳动力的 1/5,如果在大业元年(605 年)一开始挖河就死掉这么多成年男子,那一定会严重阻遏当时社会经济和人口同步上升的势头,司马光所称,到大业五年(609 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sup>②</sup> 的鼎盛局面会化为乌有。更很难想象,五百万挖河工死了一半会不引起大的社会骚乱。事实是,正在大业元年至大业六年大运河施工期间,隋代的繁荣达到了我国中古时代的一个高峰,当时社会生气勃勃,隋炀帝不失时机地利用他父亲隋文帝时代积攒

① 阎守诚:《隋唐小说中的运河》,载《运河访古》。

② 《资治通鉴》卷 181 大业五年六月条。



起来的巨大财富和人力资源开河,《大业杂记》所称:“时天下丰乐,虽此差科,未足为苦”,用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佐证,是很有说服力的材料。反过来说,当时的中国,经过自秦汉以来八百年的发展,已呈东盛西衰和南盛北衰的趋势,开运河沟通南北,将东南富庶地区与中原连结起来已是迫在眉睫的国土发展战略要求,隋炀帝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

再从工程上来说,前后六年间,分段动工,充分利用原有的人工水道和天然水道,实际施工最多不过三年半便全线开通,大业六年隋炀帝从扬州北上,乘龙舟历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到涿郡(今北京),五十六天走完全程,说明运河通航性能良好,在隋代运河上已是“商旅往还,船乘不绝”。<sup>①</sup>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显然,2000公里运河顺利解决了地势起伏、与江河交叉等许多难题,大运河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成功,没有修修停停,让隋代人民枉交学费,工程是做得很漂亮的。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肯定了开河作为隋朝的“首要工作”的意义,却不妥当地引用了《开河记》中当时损失的人数在二百万以上的材料,用这“大量的生命死亡”和“用了一百万人工,工具却是茶匙”之类的调侃为运河工程涂抹上灰调。看来传统的自我诽谤对外国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古人自我诽谤运河的文化心态呢?一方面是一些无聊文人,挟带着他们的性幻想制造桃色丑闻,将隋炀帝丑化成一个终日在深宫庭苑和龙舟上御女车里淫乐的恶棍,以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另一方面是魏徵以下的旧史家和文化人,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他们要以亡隋为殷鉴,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开河作为亡国的败政去批判。其实隋亡于不顾人民承受能力,连续三年大规模打高丽的战争,隋末农民

<sup>①</sup> 《旧唐书》卷67《李勣传》。

战争以“无向辽东浪死歌”为号角掀起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开运河来说,作全盘否定与丑化,而不是有分析地批判,检讨是否有操之过急的失误,反而妨碍了对历史经验的有益总结。

被历次农民战争打击,心理上变得十分脆弱的士大夫阶层,已几乎不能接受任何改革和任何需要付出代价的国土开发建设大业了。他们讴歌几千年一贯制的男耕女织,宁可要死水一潭式的平静和凝固不变的生活,以为这是维持封建统治万世不坠的治国良方,于是失去了在大运河这样的事情上分辨最简单的是非曲直的能力,也使中国失去了民主与科学两大社会进步的驱动力,近代中国的落后深深根植于这种保守的文化心态中。

但生产力作为最革命的因素,总是要为自己开辟出前进的路。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怎样的贬抑,历尽沧桑变化,大运河顽强地存在下来了。在历史上,大运河作为一条闪光的纽带,把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连成一气,曾为祖国南北的物质文化交流,特别是为促进东南地区经济的起步与发展,贡献过不懈不倦的力量,乃至迄今我们的国计民生还受惠运河,南水北调工程还依傍这条运河开展。现在该是从因循的历史旧观念中完全脱出,给开运河这项崇高的事业以崇高的评价,让我们国家民族历史上那最振奋人心的一章,像粼粼的河水一样,在青史上永远熠熠放光。

颠倒的历史要颠倒过来,旧的文化心态要借助重新审视历史得到更新。我相信研究运河,研究运河文化,能告诉人们的东西,很多很多。

(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 试论唐代文学的繁荣 与科学被牺牲的代价

在唐代,文学创作繁荣而科学进步滞缓,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里先对唐代科学发展情况作一评估。

组织许多专家编写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sup>①</sup>收录的资料,一再被人们引用来作为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例证<sup>②</sup>。该书统计,截至明末以前的科学发现、发明和创造 362 项中,中国占 185 项,其中两汉 35 项,魏晋南北朝 22 项,唐代 17 项,宋代 30 项,明代 20 项。这统计虽不一定完善,也已约略可以反映唐代科学成果,从数量上说,既不如前代的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也不如后代的两宋和明朝。

再从内容上看,《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中所列唐代 17 项<sup>③</sup>中,属于注释、编纂和传播的成果占 1/3 以上,而在科学史上具有开

---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② 《中西五百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 1989 年版;《国情教育读本》,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王孝通:《缉古算经》解决三次方程求正根的问题;李淳风等的《十部算经注释》;一行的《大衍历》;傅仁钧的《戊寅元历》;南宮说实测子午线的长度;一行用浑仪测量星座发现星的黄道坐标和古代不同;敦煌出土的刻板印书;烧成高温真瓷;造纸术西传;《道藏·真元妙道要略》记载炼丹士发现火药;柳宗元《种树书》中记嫁接法;孙思邈的《千金方》;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动物逃避敌害的方法;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贾耽的《海内华夷图》;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创性价值的重大成果无多。李约瑟博士说：“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sup>①</sup>

进一步考察至关重要的四大发明，便可以发现科技进步在唐代被延误的情况。

印刷术是从东汉就采用的拓印术发展起来的，根据一些迹象，李约瑟推测，“第一次试验木版印刷的最可能的时代是6世纪中叶”。但是入唐后，从唐初到唐末又迟滞了200多年才见有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而近年却在日本和韩国发现更早的印刷品。<sup>②</sup> 印刷术在中国，只是到五代冯道主持刊行儒教经典时，才得到重大发展，而后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为标志，印刷术在宋代进入黄金时代。

火药的情况也很类似，孙思邈发明说不被认可，最早的资料除上述《道藏》的《真元妙道要略》外，还有清虚子的《铅汞甲辰至宝集成》，该书所载的《伏火矾法》，是9世纪初元和三年(808年)的材料。<sup>③</sup> 可是火药在唐代却难以见到应用的例子。<sup>④</sup> 这又是到200多年后的北宋才有关于火药、火器广泛使用的记载。(《武经总要》)

①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章。

② 藪内消：《中国·科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日本《大正藏》佛经2174A《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记有“四川印子”的《玉篇》和《唐韵》，苏晋仁认为可以说明“在唐懿宗咸通六年以前，四川已板刻书籍了”。(《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待考。近见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新发现的长卷汉字译经《大陀罗尼经咒》，是更比敦煌出《金刚经》早百余年的雕版印刷品，专家认为那很可能是武则天时代或稍后入唐的新罗僧人从唐京求取带回去的。

③ 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苏晋生：《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载《从古铜车马到现代科学技术》，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宋路振《九国志》所称唐哀帝时郑繡攻豫章“发机飞火”也不能认定就是火药。

四大发明中另外两项,造纸术和指南针的发明则远在汉代,<sup>①</sup>而罗盘用于航船上,又是宋代之事,(《朱或:《萍洲可谈》)在唐代磁针只可能初次应用于堪舆术。

这些现象是不是偶然的呢?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的科技政策比较进步,以至产生了沈括的《梦溪笔谈》那样的科学名著,明代还产生了放弃科举而潜心著述《天工开物》的宋应星那样的科学家,这能解释后来的发明。唐代为什么不行呢?现实生活提出的需求,是科技发明的推动力。从唐代经济、文化、军事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来看,生活强烈地呼唤着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的发明与推广应用,可是唐代却一再错失了让科学大显身手的机遇,而将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和普及推广拱手让于五代北宋。在唐代已发展起“家有綾机五百张”(《朝野僉载》卷3)的大作坊,这样规模的织造业无疑已对动力机械的发明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是没有,连西汉已发明的水力鼓风机也没有改造移植到纺织业上来。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更要期待遥远的西方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了。

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唐代科学的进步?什么东西束缚了唐代经济向新的台阶跃进?或许我们还可以问一问作为基础的农业,在唐代粮食的人均生产和占有水平已达到近年水准,<sup>②</sup>社会又存在逃户之类大量流动的劳动力,并且物资的流通和商品经济有长足进步的时候,却未能萌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我只想探寻一下人们谈论不多的唐代文学繁荣的负面影响。

以辉煌的诗坛为表征的唐代文学,无疑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激起了古今中外永久的赞叹和向往。但却为此,我们国家民族

① 《韩非子·有度》所称之“司南”若即是《论衡》所述“司南”,则指南针发明之肇始,更可上溯至战国。

② 参拙文《从耕三余一说起——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问题》,载《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为文学的繁荣牺牲了科学的进步。当整整一代人沉迷于诗歌的创作,为吟风弄月推敲字句投入全部热情和精力的时候,科学被冷落了。眼前的太平盛世景象使人们醉心于歌舞升平,忘记了对长远发展的规划与追求,甚至渔阳鼙鼓都未能唤起社会的觉醒。面对现实正经历着向门阀后社会的深刻变革,田制、税制、兵制、徭役制度……整个旧制度都在崩溃时,贫困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表现得十分软弱无能,拿不出几个像样的理论家,有的只是敛臣式的理财家。在唐后期那么严重的“钱荒”中,却无人想起发行贵金属货币,以利商品交易,即使生产一点金钱、玳瑁钱,也只是作为宫中玩赏之物,而不在市场上和外来的萨珊朝金银币一起流通。文人尽是“大历十才子”,是“山水派”、“婉约派”,人们忙乎的是写《长恨歌》、《秦妇吟》,是“文起八代之衰”,因而革新只配是微不足道的昙花一现。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人们竟然不去苦思冥想治理的良策,依旧是长吟短歌,舞文弄墨,最多发一点感慨,发出一声叹息,整个知识界似乎停止了思维,只有过多的感情而缺乏理性,失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在唐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被诗化了,他们所以抛弃兴邦的自然科学和治国的社会科学,走上这条路,是朝廷有意诱导的结果。“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散序进士》)道出了个中秘密。所谓的“长策”,就是羁縻知识分子的科举。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sup>①</sup>很好地揭示了唐代举子在仕途上艰难跋涉的辛苦。因为科举考试成为“登龙门”的捷径,“主司褒贬,实在诗、赋”(赵匡:《举选议》,见杜佑《通典》卷17)。“进士则多以诗为贄”(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行卷、温卷,赶在考前汇编自己的文学作品托人转呈主考官,力求推荐疏通。因为名额有限,登第不易,众多落第举子往往不出京城,紧接着攻“夏课”,即使

<sup>①</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春季落第还乡者,当年秋天也会返回京城准备下一轮赶考,再次“殚工韵律”(《唐音癸签》卷27《谈丛三》),“刻骨搜新句”(刘得仁:《陈情上知己》,《全唐诗》卷544),准备新的行卷。大多数人年复一年,终老科场而一事无成。

尽管隋唐之际兴起的科举制,在人才选拔中引进了平等竞争的机制,具有打破门阀时代九品中正制度垄断的积极意义,但又成为使文学妨碍科学发展的中介。科举一方面促进了诗坛日益繁荣,另一方面,自隋炀帝创设进士科之始就种下的“以浮虚为贵”(《通典》卷17《选举典·杂议论中》)的病根,后来恶性发作,除了贞观时考试一度还重策论和经史,到永淳(680年)以后就专以诗文取士了。“按道理讲,试策论和经史,远比诗赋取士更符合选拔官员的实际需要”<sup>①</sup>,那么为什么科举制度还是不可逆转地滑向以诗赋甚至八股文取士的歧路呢?胡如雷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向将粉饰太平巩固皇权视为高于一切目标的传统政治的荒唐。因为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秩序,有古老的儒家经典教条便足够了,所以当社会进步到不能单纯依靠血统来分配经济政治权利时,他们又给竞趋政坛的文人们指了一条靠诗赋和八股文为敲门砖的从政之路,让他们皓首穷经考科举,奔走在这条独木桥式的小道上。唐太宗看到举子们在礼部贡院出出进进,笑眯眯地宣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述进士上篇》)他很满意可能与他争夺天下的“反覆子”们从此走上循规蹈矩的仕途。

一代士子全部都挤在窄窄的科考路上竞争当进士,必然造成科学人才的奇缺,这空白不得不由和尚道士和方外术士去填补。我们看到在唐代,一行、玄奘、孙思邈和《道藏》的一些作者,以及义

<sup>①</sup> 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净、鉴真等许多僧人道上、炼丹方士组成了科技方面的主力军,科学的殿堂建在寺观的后院,在科学史上留下可悲的怪诞现象。这种错误引导知识分子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推出的八股走到了极端。待到龚自珍觉醒过来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时,为时已晚。捱到20世纪初的科举制度终于废止时,整个帝制社会也随即寿终正寝了。

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便曾提出:“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以往人们在研究中国之所以落后这个命题时,多半只把眼光放在十五六世纪以后,而我以为,在牺牲科学换来文学繁荣的大唐盛世,在那传出千古绝唱的诗坛和科场联手政治文化中,已经深深埋下了这“之所以落后”的孽根。费正清教授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sup>①</sup> 可谓是一真知灼见。

(本文曾提交1992年8月在厦门举行的海峡两岸唐史学者学术研讨会,引起争论,六位发言的学者意见相左,支持与反对者参半。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刊出,《社科信息集萃》1996年第6期转载))

<sup>①</sup> 《剑桥中国明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盛唐的莫高窟艺术

唐代开国后,直到贞观五六年,吃不上饭的紧张局面才缓和下来,社会经济复苏后逐步上升,再经过唐高宗、武则天的几十年过渡,在他们的孙子唐明皇时,很容易地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是传统小农经济时代的巅峰,可以推算出,社会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可能达到每人年产粮 2400 市斤的较好水平,在人均占有粮食 700 市斤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文化的空前繁荣。<sup>①</sup>盛唐时代,人们一般没有衣食之虞,便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创造了无数精湛称绝的手工艺品和豪迈自信的文学作品。当时又是我国国内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大发展的时代,即如鲁迅先生所说,唐和汉一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sup>②</sup>。即如在敦煌,沙州十三乡中便有专为安置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设的“从化乡”,接纳慕道来归的康、安、石、曹、罗、何、史诸姓胡商。这样一种魄力,这样一种开放政策,对唐代物质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好的作用。

盛唐时代的敦煌一派太平治世的景象,整个河西陇右地区度

---

① 参拙文《从耕三余一说起》,载《中国农史》1983 年第 4 期。

② 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卷 1《坟》。

过隋末的衰败,完全复苏了。开元天宝年间,“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sup>①</sup>。稍后一点,张籍的《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笙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所描述的是盛唐丝路繁盛景象。敦煌就是依托这样的经济背景,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到八世纪中叶,由于安史之乱(755—763年),中原地区的繁荣中衰。敦煌情况有些不同,没有直接受到叛乱的破坏,反而因包括敦煌论师昙旷在内的一批僧人为避乱返回河西,带去内地流行的变相粉本和佛经变文,为敦煌莫高窟增添了新内容。

不过敦煌在盛唐时也受到吐蕃的纷扰,为此唐政府早在景云元年(710年)便置河西节度使,总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防务,但吐蕃还是在开元十五年(727年)一度攻陷敦煌东边的瓜州。763年以后,吐蕃更乘唐军被东调去对付安史叛军未归而河陇空虚之机,大举进攻,克大震关,尽陷陇右,又沿祁连山西进,占凉、甘、肃、瓜各州。败退沙州的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周鼎等一筹莫展,想焚毁沙州城后绕道漠北东奔。沙州民众在阎朝领导下展开敦煌保卫战,坚持约十年,到最后“粮械皆绝”,不得已立城下之盟,城池交吐蕃接管,从此敦煌结束了自己盛唐时代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美好岁月。

盛唐时期敦煌共开窟九十六个,即第23、26、27、28、31、32、33、34、38、39、41、42、44、45、46、47、48、49、50、52、66、74、75、79、80、83、84、87、88、89、91、101、103、109、113、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4、125、126、129、130、148、162、164、165、166、170、171、172、175、176、179、180、182、185、188、194、199、208、214、215、216、217、218、219、223、225、264、300、319、320、328、345、347、353、374、384、387、444、445、446、450、458、460、482、483、484、490、492等窟,其中第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216,中华书局版第6919页。

91、115、117、126、129、179、188、384 诸窟是至中唐才完成的。另外这时还完成了初唐开凿的第 205 窟,重修过前代开凿的第 292、371、379、383 等四窟。合计今莫高窟有盛唐画迹遗塑的窟也和隋代一样是 100 个,但盛唐 75 年,相当于隋代 37 年的两倍,平均每年修窟的数量只及隋代之一半。当然盛唐壁画多巨幅鸿篇,每铺塑像的数量也多,按壁画面积和塑像数目而论,便不在隋以下了。

盛唐新开窟,从最南边的第 148 窟到最北的第 347 窟和 374 窟,仍都在南区,因崖面中层已没什么空了,所以基本上是发展底层窟,因而后来人为损毁也较多,有些则被沙土掩埋,如第 483 窟直至 1957 年才又被发掘出来。

盛唐窟形,绝大多数是覆斗形顶,两壁开龕或设坛塑像。其中正面的西壁开一龕的窟有 70 多个。西壁仅设坛,或西壁与南、北壁各开一龕的窟又有十余个。第 39、44 两窟还是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保留有中心龕柱的旧式样。此外,第 130 窟是又一个通顶大佛窟,东壁上有两层明窗,俾使透光在俗称南大像的佛头部。第 148 窟拱形顶,第 492 窟圆券龕,第 319 窟盂形顶和一批帐形龕、甬道的盂顶,加上第 300 窟人字披顶,显得在窟形上,既有主流的西壁开龕的覆斗形顶窟,又有变化的多样性。

盛唐社会条件下,累世苦修,年复一年面壁坐禅的修行方法过时了,天堂人间拉近了距离的感觉使人们对佛典经义有了新的选择,人们喜闻乐见的是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的弥勒经变,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苦难皆可解救的《药师变》和说小孩聚沙成塔也能成佛的《法华经变》。盛唐壁画的主要内容是净土变、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诸品则以见宝塔品、观音普门品为多。单身的观音像数量尤其多。这样一类主题显示,人们似乎忘却了对过去痛苦生活的记忆,他们的兴趣完全转移到对往生无五浊之垢染,无尘世之烦恼的净土的追求,表现出他们对能超度自己出世,往生净土的阿弥陀佛和

未来佛弥勒佛、观音菩萨的崇拜。

《观无量寿佛经》是佛教净土宗的主要经典,无量寿佛是西方净土的教主阿弥陀佛的意译。北魏昙鸾(476-542)欲求长生不死之法,北天竺高僧菩提流支授以此观经,从此昙鸾专修净土,提倡最简便的以口唱佛名阿弥陀佛之口念为主要修持方法的易行道,对后世影响较大,昙鸾因此被尊为净土北派五祖之高祖。昙鸾一传道绰,再传到第三祖善导(613-681年)。善导和尚早年诵习法华、维摩等经,一次信手从经藏中探得《观无量寿佛经》,后来又听道绰师讲观经,从此大彻大悟,便依观门念佛。他倡言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往生净土。显然他的思想非常适应从门第至上的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大潮,因此徒众甚广,被尊为“弥陀化身”。他也深受武则天礼重,武则天皇后捐脂粉钱修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便请善导为第一主持人。那尊典雅秀美的释迦佛报身与敦煌宏伟的北大像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盛时代在这时降临的美好征兆。善导一生还画净土变三百壁,组织写弥陀经十万卷。净土宗因之盛极一时,净土崇拜风靡全国,它成为盛唐时代敦煌壁画的主题便很容易理解了。

盛唐时期的壁画,在充裕的经济物质条件和上述宗教思想影响下,在这艺术上最富于表现能力的时期里,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充分地在净土世界的主题下尽情发挥,他们把人间荣华富贵搬到天上,又把天国的富丽堂皇搬回人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在那个时代权贵豪富们心中,在充满宗教憧憬的善男信女的想象中,简直融为一体了。

据统计,有唐一代的壁画,数量上最占优势的是阿弥陀净土,在莫高窟总共有一百多壁,盛唐时期依据弥陀三经绘制的壁画就有三十四壁。如第45、66、103、113、120、122、148、171、172、176、194、208、215、217、218、320、446等窟的净土变和第27、34、44、66、

83、172、320 等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具体地描绘了“极乐净土”,洋溢着幸福、欢乐,对生活充满积极、肯定的乐观态度。观经变的两侧往往配上“未生怨”和“十六观”几组屏风画,成为一个固定的程式。还有为数不少的药师经变,画的是东方净土,佛经上说那里“亦如西方极乐世界,等无差别”。画面上和西方净土变不同的,只是东方以药师佛为中心,日光、月光两菩萨胁侍,十二员药叉大将分列药师佛前,两侧附加的屏风画是“十二大愿”和“九横死”。东方佛天佛国的兴盛成为此时此地人们热衷表现的主题,已和西天处在对等的地位,表明人们寻找极乐世界的目光已不光是看着西方,似乎在盛唐时代,这里人们对自己所居住的东方同样充满了信心和憧憬。潘絮兹先生说:“当时净土宗流行,……它是人民追求幸福愿望的升华,虽然采取了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基本上却是健康的,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也是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在当时历史和宗教种种条件局限下,辩证地发展的又一个例子。”<sup>①</sup>看了初唐的第 220 窟到盛唐的第 217 窟、172 窟等几壁最出色的规模宏伟的西方净土变,我们不难理解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这是对以画净土为特色的唐代壁画意味深长的肯定。

观音菩萨这时成为壁画中很热门的题材,无论是单身的画像,还是为数不少的法华经变普门品,着意刻画观音能现三十三化身,救十二种大难。她能打开监狱,让枷锁自落,刑刀节节自断,让下毒的人毒害自己。像第 45 窟南壁观音普门品中的一个场面,遇强盗持刀抢劫的商人口念观音得解脱,显然都取材于终究还远不是天国乐园的人间生活。人们欢迎这位大慈大悲的救世观音,公正而有平等观念的女神。本来佛菩萨是无性的,即非男非女的,但是艺术家们赋予中国式的观音以最美的女性的仪容,以表现她美好的心灵,只是为不违背佛经教义,又故意给观音画两撇石绿色风趣

<sup>①</sup> 潘絮兹:《敦煌莫高窟艺术》,第 105 页。

的小髻。其他单身菩萨便更无这样的顾忌,完全是典型的唐代盛妆妇女形象。正如唐道宣(596-667年)所说:“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大夫之像。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sup>①</sup>实际应是菩萨如宫娃。段成式(?-863年)在《寺塔记》卷上《道政坊宝应寺》一节中也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魏元忠)妓小小等写真也。”写真这个词传至日本,迄今仍作像片讲。

唐代壁画富有浪漫色彩,是现实生活的升华,又不乏非常写实的社会内容。如第217窟北壁西方净土变,高耸台基上的重楼连阁,就是唐代宫廷建筑的典型样式。第23窟北壁法华经变雨中耕作图和第445窟曲辕犁图,真切地反映了唐代农村生产生活情景,这作为曲辕犁唯一的形象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前面提到过的第45窟观音普门品中,除了监狱还有商人遇盗图,那些深目高鼻、虬髯鬃发,头戴白毡帽,脚登乌皮靴的商人,正是奔忙在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胡商,他们的事业攸关敦煌的繁荣,好心的画家们请观音菩萨保佑客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第445窟北壁嫁娶图画弥勒之世妇人五百岁出嫁的故事,画面却是取材于唐代以“青幔为屋”的婚俗,莫雁等迎新娘礼生动具体,雁嘴还用丝线绑住了。第194窟壁画的乐舞,非常具体地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乐器和乐舞场面。

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是唐代供养人画像中规模最大的一幅,王氏“丰肌膩体”如杨贵妃型,她是天宝五年(746年)出任晋昌郡都督的乐庭瓌夫人,头上抛家髻,饰鲜花、小梳、宝钿,碧衫、红裙、肩帔,脚登笏头履。身后女十一娘面饰花钿、花子,着朱衫白裙。女十三娘头戴凤冠,斜插步摇,衫裙帔帛,小头鞋履。再后面九个婢女,为首的也饰抛家髻,着衫裙帔帛,执

<sup>①</sup> 《续高僧传》。

纨扇,其余八人均著圆领衫,腰束带,束装似男儿,为天宝年间时兴的奴婢服装,其中三人发髻上戴透额罗幞头,造型真实,富有生活气息,是敦煌供养人壁画中最成功的一幅。

天请问经变相也在这盛唐时代开始出现,见于第148窟,所依据的《佛说天请问经》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玄奘法师奉诏新译出的,内容是天与佛之间的问答,倡言辟贪、瞋、痴等三毒,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邪见等十恶,主张施舍、忍辱、智慧、修福而求解脱。

值得一提的是这在大历十一年(776年)抗蕃斗争中建成的第148窟,宏伟精湛的绘塑里浸渍着极复杂的历史的和宗教的感情,在烽火连天的生死存亡关头,还首次出现了报恩经变新题材,用孝养品中割肉供亲的须阇提成全流亡的父母复国的故事,来激励那些正为父母之邦献身的将士,“这种时候鼓舞战斗的口号,通过石窟艺术,是披上佛、菩萨的‘圣光’出现的”<sup>①</sup>。敦煌盛唐艺术这最后一章,还是那么充满创作激情,认真讲究,在战鼓隆隆的气氛中从容完成了。

在绘画技巧上,这时又有长足的进步。第103窟南壁的法华经变幻城喻品,山势道路城垣人众已有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第320窟北壁无量寿经变画舞乐场地已合透视法。第199窟西壁龕外北侧高大的菩萨用赭红色勾勒,线条长达一、二米,骨力充盈,赋彩淡雅,是敦煌壁画中出现的新风格,即“设色极淡,其妙全在墨骨数笔”的吴道子派画法,而第172窟东壁文殊变上部的青绿山水画已达到成熟阶段,这又是当时著名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派金碧辉映的风格。在画史上,从六朝孝子图石刻棺到各种流传本的洛神赋图,山水只是人物故事背景,并非主题,到这时出现的青绿金碧山水画,标志山水与人物渐渐走上分工发展的道路。第171

<sup>①</sup>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第71页。

窟南、北、东三壁的三铺未生怨故事画，每格画面表现独立的局部情节，又用相关的场景特征表现画面之间的关联性，标志中国连环画艺术的成熟。而叠晕法的广泛运用，使同一颜色由浅入深逐渐过渡，青绿朱白诸色套迭，更使色彩变化无限丰富，给画面带来光辉灿烂的效果。

在人物肖像画中，使人们一见而难忘的第 103 窟东壁坐床的维摩诘，手握羽扇，探身向前，须眉奋张，目光如炬，全无“羸病容”，俨然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雄辩家。第 194 窟的天王，两腮上飘动着红色胡子毛根出肉。那乐廷瓌夫妇等世俗人物大模大样地出现在第 130 窟的画面，高达八、九尺，大有压倒诸天菩萨的不凡气概，盛唐时代人们思想的解放，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敦煌画坛百花齐放，或气势磅礴，美不胜收；或淡雅素洁，境界开朗，可以赏心悦目，像群星灿烂的盛唐文坛一样，尽是永垂艺苑的国家瑰宝。

盛唐时期的敦煌彩塑，具有同样的艺术的和历史的价值。现实主义精神和世俗化的特点，使富有生命力的唐塑，至今还有强大的魅力，吸引人们，叩动人们的心扉。

进入盛唐以后，以“胖姑姑”杨贵妃为标准美人的审美观不仅体现在壁画，也进入雕塑中，菩萨们也如胖美人似的，一个个丰满健硕，作“秾丽丰肥之态”。第 45 窟西壁敞口龕中南北侧二身袒胸露臂的菩萨，翠眉秀目，丰颐洁莹，艺术家对头颈、肩膀、腰胯、脚腕各个关节都有细微生动的描写，使姿态妩媚绰约，整个体型一波三折呈现 S 状自然扭动，完全突破了呆板挺立的旧模式，是一代唐塑的代表作。其中南侧的那个菩萨，双肩倾斜，头部微微侧向身旁的阿难，阿难纯朴温良，憨厚腼腆，也不由自主地稍稍侧身相就，彼呼此应，似在窃窃耳语，极为传神。这样成功的组合，更增添了这组塑像的艺术魅力。这第 45 窟中和阿难相对的迦叶，又是一派老成持重的高僧神态，双眉紧锁，富有洞察力的眼睛和微微内收的嘴



角,表现出他深邃的思想。匠师们在按传统刻画他饱经岁月风霜的外貌的同时,深入人物的内心来刻画个性,将一位富有自信心的饱学哲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 46 窟南壁佛脚前的舍利弗,是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高徒,当佛涅槃时,他以火自焚,先佛入灭。这一身高仅 0.52 米的塑像,很好地表现出舍利弗对佛一片虔诚崇拜之心。

佛作为领袖式的主尊,总是那样温和慈祥庄严镇定。第 130 窟南大寺里被称作“南大像”的弥勒像,是开元九年(721 年)处谿、马思忠等塑的,在只有 10 米进深的洞窟中,匠师们有意加大了这身高 26 米的大佛头部,在眼睑、鼻翼和嘴唇等处,处处都塑出较深的斜面,配以上下明窗自然光投影,使大佛五官轮廓分明,内在力量充沛。人们在其足下仰视时反而感到比例适中,达到了预期的艺术效果,表现出极丰富的创作经验。这尊体型圆浑饱满,气度雍容庄重的弥勒像,虽然气势比武周时凿成的北大像略逊一筹,仍不失为体现盛唐时代精神的大型雕塑的代表。

第 148 窟西壁专设的涅槃佛坛上安卧着的佛身旁,是佛弟子、天人、各国王子、佛姨母、菩萨等 72 身举哀像,这是群塑艺术上的一个试探性的新作。

第 328 窟西壁敞口龕内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供养菩萨,龕外两侧台上各塑一供养菩萨,南侧的一尊被华尔纳于 1924 年盗走,破坏了这铺塑像的完整性。第 194 窟西壁龕内外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一铺九身彩塑,艺术水平都很高,保存也完好。当时中原地区著名的彩塑大师杨惠之等人带动唐代彩塑艺术发展到高峰,莫高窟集中反映了这一成就,第 194 窟被认为是重要的代表洞窟之一。今江苏昆山县保圣寺有一批罗汉像,自 1918 年被发现后认为是杨惠之所塑,实为宋塑,水平远不及莫高窟唐塑中的精品。该窟龕外南侧力士像,怒目圆睁,抿嘴咬牙,硕壮的体格,高突的胸肌,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是敦煌力士中最出色的一身,

对比古希腊雕刻家米隆的杰作掷铁饼者,可见东西方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

本时期末,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先于沙州敦煌被吐蕃占领,段文杰先生认为榆林窟第25窟即建在吐蕃占领瓜州初期的大历十一年(776年)至建中二年(781年)这五年之间或稍后。该窟仍明显地保存着盛唐的特点,与莫高窟的第45、172、217、320、445等盛唐典型窟相似,主室四壁均保存唐代原貌,内容为弥勒变、观无量寿经变等,绘制了弥勒世界和无量寿佛净土两个极乐世界,前者人神交会,后者是纯粹的神的世界,带领人们进入佛教净土思想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境界。就时代背景而论,艺术家的这一精心创作,也似是对正在逝去的大唐盛世刻意的挽留,给我们留下了浮想联翩的历史性纪念。

唐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堪称优秀的一章,绚烂、宏富、活泼、奔放而永褒艺术魅力。余秋雨先生在巡礼敦煌后,以《莫高窟》为题著文,满怀激情地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sup>①</sup>相信每一个胸中奔腾着热血的炎黄子孙,面对莫高窟盛唐艺术,都会油然而生自尊和自信的感受。

(1993年9月无锡中国国际唐文化研讨会论文,收入《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并收为《敦煌史话》第二章《敦煌画塑》“七,盛唐的敦煌和画塑”,中华书局1995年2月出版,1997年6月第二次印刷。)

<sup>①</sup> 余秋雨《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沪版)1992年版,第11页。

## 净土宗胜地巡礼

佛教自东传以来,历两千年香火不绝,对我国政治、经济、思想及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等各个领域都曾有过深广的影响,诚为一无容忽视的历史现象。迄今寺院遗址仍遍布各地,此次在晋、秦、豫三省考察,即涉及佛教寺院五十余处。礼佛归来,那悠扬的晚祷,清脆的晨钟,仍缭绕耳际,令人难忘。今谨记一路参观净土胜地——玄中、悟真、实际、香积诸寺情况,对净土宗创立的历史作一粗略的回顾。

净土宗或称净土教,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形成的宗派之一。净土是佛教经典上原有的概念,即所谓“圣者所生之国土也,无五浊之垢染,故曰净土”。《无量寿经》以西方极乐世界为净土,是无尘世烦恼的胜地。

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立,当溯源自东晋道安大师(314—385年)。他初在邺中寺事佛图澄为师,后被苻坚、苻丕迎入长安,住五重寺,著有《净土论》六卷。“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sup>①</sup>。《弥勒上生经》说,若皈依弥勒并称念其名号者,死后得往生兜率天。兜率即净土。道安所倡为弥勒净土念佛,在其身后有

---

<sup>①</sup> 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玄奘、窥基师徒等人诵习<sup>①</sup>，中唐以后的敦煌壁画中，弥勒经变多达六十余铺，说明在民间还有相当影响，但总的情况不如弥陀净土念佛兴盛。这位被鸠罗摩什誉为“东方圣人”的弥天道安弘通净土法门的事业，由其弟子慧远等人传承发展，遂有弥陀净土念佛法门的崛起，郁为净土正宗。

慧远大师(334—416年)，初习儒学，尤善老庄。年二十一入道安门，听讲《般若经》，豁然知悟，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即落发受业。慧远尝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sup>②</sup> 汤用彤先生指出：“远公出家，盖由学悟，非比寻常也”<sup>③</sup>。由于他潜心研习，将儒家和老庄学说融会贯通于释典，使惑者易懂，成就卓越，道安赞叹：“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太元六年(381年)，慧远至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乃留驻不行。十一年(386年)建东林寺于山东。元兴元年(402年)与名士刘遗民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sup>④</sup>。此举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净土法门流行之始。庐山东林寺遂为净土宗第一祖庭，庐山慧远被尊为净土宗初祖。东林寺和慧远墓今犹为庐山名胜，惟因远在江西，这次考察未遑涉及。

慧远之后，在北方大弘净土念佛之业者，首推北魏昙鸾。其后又有隋唐之际的道绰、善导一脉相承，完成创立宗派的大业。玄中寺是三位大师先后住持弘教之处，因而作为净土宗胜地著名于世。

① 如玄奘早年曾习《摄论》，晚年在玉华寺译经，但有空隙，发愿生睹兜率天，见弥勒佛。其弟子窥基，日于弥勒像前诵菩萨戒一遍，愿上生兜率。参见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76—177页。

② 《广弘明集》卷27上慧远《与隐士刘遗民等书》。

③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44页。

④ 《高僧传》卷6《慧远传》。

玄中寺在山西交城县西北十公里,由太原前往,驱车行六十公里可达。据寺中现存的唐长庆三年(823年)《特赐寺庄山林地四至记碑》,该寺创建于北魏延兴二年(472年)。因所在地名石壁山、石壁峪,故又称石壁玄中寺或径称石壁寺。今明建牌楼门额书“永宁禅寺”,乃元代改称之寺名。

寺在峪谷深处的石壁山南,群峰环抱,丛林簇拥,环境十分幽静。寺外东峰龙山之巅两层叠涩出檐的秋蓉塔,为远来的香客指示路径。金代赵点《游石壁题》:“路折八九里,云藏四五峰。松萝深绝壁,殿阁倚晴空”,如实描述了古寺所在的山势环境。

昙鸾大师(476-542年),雁门人,初在五台山出家,与慧远一样,感人命危脆不常,欲求长生不死之法,再崇佛教,先曾往江南从陶弘景学方术,得《仙方》十卷。永安二年(529年)还至洛阳,问北天竺高僧菩提流支:“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流支唾地呵斥,授以《观无量寿经》,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也。”遂焚毁仙经,专修净土。晚年住玄中寺,聚徒弘教,行化郡邑。被东魏孝静帝号为“神鸾”,南梁武帝誉为“肉身菩萨”。

《净土论》,译文一卷,当即在洛时与《观经》同受于流支。昙鸾还著有《无量寿经奉赞七言偈百九十五行》(今名《赞阿弥陀佛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礼净土十二偈》等。

昙鸾所主修持方法为念佛。念佛是汉晋以来流行的禅法之一。如《坐禅三昧经》所说:“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相相明了,一心忆持,还至静处”,是观佛持念,入定见佛。昙鸾《略论安乐净土义》中所说的“念佛相好”、“念佛光明”、“念佛神力”、“念佛功德”、“念佛智慧”、“念佛本愿”等“十念”,应即他在《往生论注解》中所说“随所观缘,心无他想”的禅定忆念之念佛。单纯口唱佛名之口念,初并不被专重。但同时昙鸾提倡“垂命终时……

为称‘阿弥陀佛’，愿生安乐，声声相次”<sup>①</sup>，宣扬赞叹佛名，实具不可思议威力<sup>②</sup>使口宣佛号逐渐盛行，口念成为净土者之专业。这自然是比其他一切苦行、礼佛、布施、建功德更便当的修持方法，易于普及推广。直至今日，佛教徒们相见彼此合掌致意时还总是口诵阿弥陀佛。寺中做佛事，也少不了伴着木鱼的敲击，有节奏地连续重复“南无阿弥陀佛”的唱诵声。“南无”是梵语皈依、致敬之意。《阿弥陀经》更被列为每天日暮时诵读的“日课”。口念弥陀佛名流传至今，成为童叟皆知的佛事，可见净土宗风影响之深远。

昙鸾之后有道绰大师(562 - 645年)，并州汶水人，十四岁出家，大业五年(609年)四十八岁时于玄中寺见昙鸾和尚碑所记昙鸾在寺修净土之业，临终时出现种种奇瑞，幡然觉悟，舍涅槃宗，入净土门。自后常面西而坐，口诵阿弥陀佛名，日至七万声。他宣讲《观无量寿经》二百遍，劝人念佛，汶水和太原一带从者甚多。听讲经时，人各掐珠，口同佛号。道绰著有《净土论》二卷<sup>③</sup>，又有《安乐集》，系统阐述净土信仰，大张教纲。人以道绰为昙鸾之后净土北派五祖之第二祖。

第三祖善导大师(613 - 681年)临淄人。初出家，习《法华经》、《维摩经》，后信手从经藏中探得《观无量寿经》，乃专心念佛。贞观十五年(641年)二十余岁时赴玄中寺谒道绰师，听讲《观经》，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余行业，迂僻难成，惟此观门，速超生死”<sup>④</sup>。后来他到长安传教说法，组织写《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壁，收得徒众成千上万，并得到武则天扶植，净土宗因之

① 《略论安乐净土义》。

② 《往生论注解》。大致同时人撰的《陀罗尼杂集经》亦主此说，见《法苑珠林》卷60《咒术篇·弥陀部》。

③ 《新唐书·经籍志》。

④ 《佛祖统记》卷26，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净土圣贤录》卷2，“观门”作“法门”。

兴盛发展。

善导著《观念法门》，一名《功德法门》，倡言念佛者“现生即得延年转寿”。还著有《观无量寿经疏》、《往生赞》等，对往生净土之说多有发挥。他继承昙鸾，力主他力往生说，认为世风混浊，靠“自力”解脱甚难，须乘“佛愿力”（“他力”）才能往生净土。在修持方法中，最重一心念佛名号的“称名正行”，以此为“正定业”，而以诵读、观察、礼拜、赞叹、供养诸行为“助业”。特别是善导注重向下层布教，倡言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出离秽土，往生净土。他讲经时听众云集，对劳苦民众很有吸引力，扩大了宗教的社会影响。善导在这一点上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经过四五世纪的发展演变已处于日益崩坏的状态。顿悟成佛的理论自东晋僧人竺道生提出后至这时兴盛，也有同样社会背景。而日本法然上人依从善导之说，在十二世纪倡导凡夫皆得往生净土之念佛宗教义时，还曾被发配，罹“承元之难”<sup>①</sup>，其原因盖在社会情况和中国有些不同。

经过善导，净土业大兴，教义也臻完善，人称善导大师为“弥陀化身”。至此净土法门完成了创立宗派的大业。

作为净土宗祖庭之一的玄中寺，现供奉着日本佛教界赠送的昙鸾、道绰、善导三位大师的彩色画像，寺内现存最早的文物是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却波村邑师比丘法欢合邑七十人”造像残碑。却波村即今交城县治所在，“天授二年（691年）长史王及善自山北故交城县（今太原市古交镇）移就却波村置”<sup>②</sup>。邑师是传教高僧，邑七十人是邑子，反映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义邑”制度和僧尼与佛教信徒们热衷造像的风气。寺中又有一通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四面千佛造像碑，也是玄中寺早期历史的佐证，但与净土宗的

①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版，第143页。

② 《元和郡县志》卷13太原府交城县。

流传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玄奘遍游诸寺寻访名师时也到过这里，未留遗迹可征。

玄中寺现存四十多通古碑中名气最大的当推《高氏碑》，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太原参军房麟妻渤海高氏书写的《弥勒像颂碑》<sup>①</sup>，以书法隽美，笔力遒健，早在宋代即著名于世。碑记：“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辇过兰若，礼谒禅师绰公，便解众宝名珍，供养启愿。玉衣旋复，金榜遂开，因诏天下名山形胜，皆表刹焉。”按唐太宗即位以后至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去世，似并未再到过太原，这时唐太宗，尤其是文德皇后并不信佛，碑中记事，殆是附会。但该寺在唐代香火极盛，屡有兴建，一再赐名“石壁永宁寺”、“龙山石壁永宁寺”。碑并记“禅师寻终焉寺”。时称道绰为西河禅师，贞观十九年(645年)圆寂，但其舍利塔今尚未能辨识。

道绰圆寂后，善导即赴京兆。善导大师在长安一带的事迹，近年来中日佛教徒和学者甚为关注。除了大家熟悉的慈恩寺之外<sup>②</sup>，我们对悟真、光明、实际、香积等寺作了一些考察，情况分述于下：

善导从玄中寺入关后常住的悟真寺，在蓝田终南山中，距西安市约六十公里。据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终南山悟真寺释净业传》：“开皇中年，高步于蓝田之覆车山，班荆采薇，有终焉之志。诸清信士，敬揖戒舟，为筑山房，竭诚奉养，架险乘悬，制通山美，今之悟真寺也。”由此可知悟真寺是隋开皇中净业和尚所建。同书卷三十八《唐终南山兰谷悟真寺释慧超传》记，净业在开皇末以后曾邀慧超和尚到悟真寺“共隐八年”。大业四年(608年)日本圣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为使赴隋时，特选僧旻、请安、慧隐、广齐等同来，炀帝置之鸿胪寺四方馆，召悟真寺净业入馆担任教授。这批僧人回

① 录文见《金石萃编》卷84。

② 传有《唐慈恩寺善导禅师塔碑》、《唐慈恩寺善导和尚塔铭》。



国后对日本的文明进步作出过贡献。《无量寿经》在这时也传到日本，慧隐并在皇宫中讲授。日本学者回顾这一史实时，认为“和中国的交通是由皇太子为求取经论而开辟的”<sup>①</sup>。

悟真寺在唐代香火极盛，僧人最多时上千。传说贞观年间尉迟敬德奉命监修，其实是僧法诚等在“寺南横岭造华严堂”，永徽中又曾在“兰谷之西崖”原有殿堂旁，以火烧水沃等法攻石，“更修别院”<sup>②</sup>。那正是善导在寺的时候。后来诗人王维、白居易、钱起、韩湘等游寺，都有咏作。白居易来游五日，留下他诗作中最长的《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篇幅比《长恨歌》还长一半，该诗被称为“实录”，描述当时庙宇法物之精美壮丽：

西开玉像殿，白佛森比肩；抖擻尘埃衣，礼拜冰雪颜。  
叠霜为袈裟，贯雹为华鬘，逼观疑鬼功，其迹非雕镌。次  
登观音堂，来到闻沧檀；上阶脱双履，敛足升净筵。六楹  
排玉镜，四座敷金钿；黑夜自光明，不待灯烛燃。众宝互  
低昂，碧佩珊瑚幡；风来似天乐，相触声珊珊。白珠垂露  
凝，赤珠滴血殷；点缀佛髻上，合为七宝冠。双瓶白琉璃，  
色若秋水寒；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粉壁有吴  
画，笔彩依旧鲜，素屏有褚书，墨色如新干。灵境与异迹，  
周览无不殚；一游五昼夜，欲返仍盘桓。<sup>③</sup>

悟真寺今存遗迹，在蓝田县东南十余公里，自河湾进山行二公里许，涉蓝水上山，沿羊肠小道攀登约半小时可达。其形势一如白诗开头一段描述：“去山四五里，先闻水潺潺；自兹舍车马，始涉蓝

①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

② 《续高僧传》卷38《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传》，《蓝田县志》卷16引《法苑珠林》。

③ 《白氏长庆集》卷6。

溪湾。手拄青竹杖，足踏白石滩；渐怪耳目旷，不闻人世喧。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谁知中有路，盘折通岩巅。”由寺中北望，正是“野绿簇草树，眼界吞秦原。渭水细不见，汉陵小于拳”的景象。白居易又说：“我来登上头，下临不测渊；日眩手足掉，不敢低头看。”这情景宋苏舜钦《蓝田游悟真寺作》有同样描述：“杖筇赤脚渡赤水，细流激激心骨清。仰看苍山高峰旁，白云明灭藏日光。行人遥指置寺处，正在白云之中央。逡巡缘栈更险绝，攀萝扞壁随低昂。明行咫尺乃相失，已与云雾相翱翔。”我独自前往，履险下来，也不免有“叹息回头急出山，始觉全躯已为福”<sup>①</sup>之感。

悟真寺坐西向东，今仅存山门、大殿、后殿和北廊房。南廊房基毁于水土流失。大殿供释迦牟尼，有残壁画。后殿分上下层，下层中间一间原供阿弥陀佛，上层起楼，供文殊、普贤等菩萨。十余尊佛像今已残阙，历代碑石亦无迹可寻，所见六座灵塔唯一有纪年的是同治三年（1864年）立。

悟真寺自晚唐以降每况愈下。宋代改名崇法寺<sup>②</sup>，苏舜钦去时老僧引他周游，尚见“丹青黯淡唐时屋”，但按白诗所言索像已不可复得。明清时虽屡经修葺，终因交通不便，人迹罕至，不免败落。现残存的建筑和通寺的羊肠小道，得力于丛生的乱竹拱护才得幸存，因此该寺又名竹林寺是很恰切的。又为与山下之寺区别，当地习称上寺，今山门额书即是“上悟真古寺”。

下寺在蓝谷口河湾村北，因近年兴建现代建筑，已荡然无存。顺蓝水而下又三四里，有一周围环水的鱼形小岛上有红墙灰瓦古刹，名水陆庵，始建于盛唐时代，是上、下寺的水陆道场，与上下寺合为悟真寺建筑群。明以后为嗣秦王朱怀墀的家祠佛堂，使这部分建筑和壁塑得以保存下来。

① 《蓝田县志》卷20文徵。

② 《长安志》卷16蓝田。

今庵内大殿供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后壁泥塑千人听经图传是五代时塑。庵内塑像号称三千七百尊,色泽鲜艳,栩栩如生。大殿梁上题记:“大明国陕西西安府蓝田县青侯里古刹悟真峪普陀兰诸庵重修诸圣水陆殿。大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仲夏肇启,隆庆元年(1567年)姑洗月重建立”。水陆庵在1957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正在作全面整修。因近在公路旁,又有西安至陈家滩的长途汽车直达庵左,人们可以藉以重睹当年悟真寺丰姿之一二。惟善导大师在寺的遗迹仍待寻访。

善导大师遁迹终南山而时入长安说法。传说他苦修净土三十余年,居不安寝,和衣而眠,一切名利,不为所动,人皆见其念佛一声,即有一光明从口中吐出,百声千声,亦复如此。人尊称他为“光明和尚”,圆寂后唐高宗赐寺额曰“光明”。

光明寺据《长安志》卷十记载有两处,一在西安市以南的怀远坊东南隅,其地相当今西北工业大学以南白庙村一带。该寺是隋开皇四年(584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原无名,因所赐蜡烛自然发焰而名光明。武则天时改大云经寺。这与善导死后唐高宗赐额而得名的情况有别。另一在开明坊的光明寺,其地相当今西八里村以北,包括西安医学院子午路以东部分在内,兴废情况失载,亦无遗迹发现。究竟何处是善导的光明寺所在,已难确指。

近来人们寻访实际寺遗址,这不仅是因为著名的鉴真大师景龙二年(708年)在这里受的具足戒<sup>①</sup>,也由于善导及其弟子与它有不解的因缘。实际寺也是净土宗的重要寺院之一。

实际寺位于长安太平坊西南隅。《长安志》卷九太平坊温国寺注:“本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所立。景龙元年(707年)殇帝为温王,改温国寺。大中六年(852年)改崇圣寺。”《两京新记》并说:“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历代名画记》亦

<sup>①</sup> 《宋高僧传三集》卷14《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唐大和尚东征传》记同。

说：“温国寺净土院，尹琳画三门，内吴〔道子〕画鬼神，南北窗门画神。”今存西安碑林的《大唐实际寺主怀恠奉敕赠隆闾大法师碑》（以下简称怀恠碑）是实际寺仅存的极可珍贵的文物，碑中记怀恠“又于堂内造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又造织成像并余功德，并相好奇特，颜容湛粹”，他为寺主后“纲纪僧徒，规模释族，缙门济济”。上述这许多文字使人们不难想见当日实际寺——温国寺的繁盛景象。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亲自任命善导有名的弟子之一怀恠为寺主，也说明该寺地位非同一般。

更在这之前，善导本人早与皇室建立了密切关系。唐高宗上元二年末（676年）毕功的洛阳龙门大卢舍那像，即奉先寺大佛的工程，是善导奉敕主持的，武则天为此“助脂粉钱二万贯”。卢舍那佛像高达十七米多，丰满端庄，聪睿慈祥，就是“方额广颐”的武则天本人的模拟像。大卢舍那佛像龕群雕作为我国古代艺术的杰出代表作，无愧是“人类艺术宝库中最光辉灿烂的瑰宝之一”<sup>①</sup>。善导作为工程的第一主持人，自有一份不可磨灭的功绩。大像龕佛座北侧，开元十年（722年）补刊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龕记》载：“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与法海寺主惠暕、司农寺卿韦机等造像的事迹<sup>②</sup>，为我们提供了善导曾在实际寺活动的可靠线索。

怀恠师事善导十余年，“亲蒙咐嘱”，传其衣钵。善导寂后八年为实际寺主持，“每讲观经、贤护、弥陀等经，各数十遍……恳劝时众，四仪之中，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愿乘此胜因，祈生净域。”大足元年（701）怀恠圆寂，“临终之际，正念无亏，颜色怡悦，似有瞻瞩，北首西面，奄然而化”（怀恠碑），全合念佛宗教义和修持方法。善导

①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② 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上册铭文百一，河南博物馆1935年出版。

的另一弟子净业(不是创建悟真寺的净业)圆寂时也是“念佛告灭”<sup>①</sup>,表示期望“往生西方”之意。此方后来还传给了日本净土信徒,法然上人便是“清楚地唱着弥陀的名号,头朝北面向西圆寂。”<sup>②</sup>

关于实际寺亦即温国寺的位置,多年来有一种误解,以为就是今西安市长安县南湖村小学所在的湖村寺。那里大殿前一对明铸大铁狮上确实铸着“温国寺”的字样,殿前并有镌文“温国禅寺之名额记”的刻石,大殿台基下还有一断碑,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管楫撰的《重修温国寺碑记》,铭有“按长安志,城南四十里有古刹,肇自隋大业间,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所建,初名实际寺,至唐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大德进法师立为道场,始建塔□坟□,改温国寺”云云。此说为诸本《陕西通志》和《西安府志》因袭,“城南四十里”也正与今湖村寺处在西安至王曲公路20公里里程碑的位置相合,但查宋敏求《长安志》原文并无“城南四十里有古刹”这句关键的话,倒是明白无误地将温国寺列在长安城内太平坊西南隅。所以此处温国寺在明代僧人智全修寺以前的历史并不清楚,十五世纪以前它是否存在还是问题。宋代张礼曾到过这一带,但他在《游城南记》中对此未置一词,当非疏忽。该寺今尚存的三殿等建筑系明清结构,砖瓦刻石遗存亦无唐物发现,院中一株白皮松,亭亭如盖,高可参天,当地传说玄奘曾在树上拴马,但树干围仅二米,不像是千龄的古木。初步考察的印象,这是一所明代寺庙,取名温国寺而与唐温国寺实不相干。

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据考著于开元十年(722年)<sup>③</sup>,那正是温国寺兴盛的时期,善导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怀恹、思庄在那前后正

① 《大唐龙兴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

②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版,第143页。

③ 《玉海》卷160。

担任着寺主,韦书中关于温国寺位于太平坊西南隅这最早的记载是当时的实录,应是确凿可信的。《长安志》又补充了温国寺本实际寺等内容。清代地理学家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引用时并无疑议。实际寺更有早在隋代就成为国内著名的四大道场之一之说<sup>①</sup>,著名的三论宗祖师吉藏(549—623年)晚年被唐高祖聘为十大德之一,迭次住实际、定水诸寺,定水寺和实际寺同在太平坊内。后来会昌灭佛之次年,会昌六年(846年)五月新即位的唐宣宗准奏在上都两街各增置八寺,温国寺名列右街。<sup>②</sup> 这些材料都可证实实际寺是长安城内的大寺。

参照城坊图和唐长安城考古发掘的有关资料,可以判明唐代实际寺——温国寺即位于今西安城(明城)西南角外西北大学校园东南部红楼、专家楼一带。这里地表以下半米起,多处有大量唐代素面方砖、青色大瓦等建筑材料的堆积,其中莲花连珠瓦当的纹样与唐宫殿和玉华寺所出相同。在这里收集到一尊雕刻精美的汉白玉菩萨像,满身装饰着缨络宝珠,和洛阳龙门奉先寺、极南寺的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胁侍菩萨非常相似,是典型的盛唐风格。只是因为这一带兴建了密集的楼房建筑,要探测了解实际寺遗址的全面情况不大容易了。

善导茔域所在的香积寺,近年不断修整,已颇具规模,是与玄中寺齐名的净土宗圣地。

永隆二年(681年)善导寂灭,怀恽主办后事,为善导建塔立寺,这就是香积寺之源起,事在怀恽碑中记载甚明:“自惟薄祐,师资早丧,想遗烈而崩心,顾余恩而雨面。爰思宅兆,式建坟茔,遂于凤城南神和(禾)原崇灵塔也……仍于塔侧广构伽蓝,莫不堂殿 崢

<sup>①</sup> 参见黄忏华《中国佛教史》,第166页。

<sup>②</sup> 《唐会要》卷48《寺》,《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六年五月乙巳条注温国寺误为清国寺。

嵘,远模切利,楼台岌岌,直写祇园……又于寺院造大窣堵波塔,周回二百步,直上一十三级”。窣堵波即浮图,安置舍利或经书法物的塔。佛教规定,按逝者地位高低限制级层,高十三级是罕有的极崇待遇。

香积寺位于长安县韦曲西南神禾原上,潏河和漓河在其西南原下汇流,称交河。“其地前终峰之南镇,后帝城之北里”(怀恠碑),距西安城仅十八公里。今塔存十一级,犹高三十三公尺。东侧一小塔,传即善导弟子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陪窆于神禾原大善导闍梨域内崇灵塔”。香积寺位置本无疑问,但因王维有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sup>①</sup>有人拘泥于诗句,认为今神禾原环境全无诗意,怀疑香积寺当在终南山中。其实今从西南方原下交河平川向上眺望,寺塔高耸的形势依然,而且唐时这里林木森森,鸟兽出没。永徽初年,李靖弟客师致仕后常在这一带打猎,他“有别业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际泮水,鸟兽皆识之。每出则鸟鹊随逐而噪,野人谓之‘鸟贼’”<sup>②</sup>。安史乱时,郭子仪率军在香积寺一带作战,安军曾设伏兵,得到林木掩蔽。时过境迁,当时自然景观与今大不一样,不足以此对香积寺所在地置疑。

关于香积寺初建的年代,宋著《长安志》、《游城南记》注等和怀恠碑一样,都记为永隆二年即善导寂灭之年所建,因此善导本人生前不可能在寺活动,推测光明寺即香积寺之说遽难成立。雍正本等《陕西通志》及其后的《长安县志》不知据何曰香积寺为“唐神龙二年建”,此说为不少著作引用,又衍为有前、后香积寺之说,似皆不可遽信。惟《长安志》说宋长安县南三十里皇甫村之开利寺,即

① 《过香积寺》,《全唐诗》卷126。

② 《旧唐书》卷67《李靖传附客师传》。

唐香积寺<sup>①</sup>。现该地仍名皇甫村,孙浮生等先生前几年踏勘,“坎下寺院遗址一片皆是,瓦砾满地,柱础亦多。有两处发现石佛头大小各一,断肢残身更多”<sup>②</sup>。这里距香积寺仅十来里,是否唐寺,唐代是否在香积寺范围之内,尚须研究。

善导示寂后近五百年,日本僧人法然上人(1133-1212年)因读善导《观无量寿经疏》卷四“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等语,大有所悟,于是专弘净土教义为毕生事业,特别提倡称名念佛,以此为“正定业”,以礼拜、读经为“助业”、“杂行”,一如善导所传,成为日本佛教净土宗创始人。法然上人标榜“偏依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善导大师因此被日本净土宗奉为高祖。现在复修的香积寺大殿中供奉的善导坐像是日本净土宗赠送的,制作的木胎鎏金的工艺,据说还是从中国传去的,在我国失传了,而在日本保存着。这尊造价为650万日元的善导坐像金光熠熠,是1980年5月14日中日两国佛教僧众在香积寺隆重举行善导大师圆寂一千三百周年纪念法会时安置的。近日又值日本净土宗访华团到西安,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日两国僧侣在香积寺举行善导、法然二祖对面像开光法会,作为对法然上人诞辰八百五十周年的纪念。对面像安置在善导灵塔内,反映的是法然日夜思念善导,而得在梦中相见的故事。

往事历千年,日本佛教徒至今仍怀着“报恩谢德”的真挚情感络绎不绝地到玄中寺和香积寺顶礼朝拜的情谊动人心弦,显然这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宗教的原因。“永护兄弟邦”的共同心愿赋予两国佛教徒的交往以丰富的历史内容,他们为两国的友好和发展作

① 《长安志》卷12长安。近人陈子怡有遗稿《香积寺塔考》亦主唐香积寺在皇甫之说。但所说今香积寺“塔虽是唐,寺则由宋,宋人寻地建寺,虽用旧名,而塔则旧有”,殆误。

② 《净土源流善导大师香积寺考》,第25页。



出了巨大的贡献。

佛教艺术在建筑、雕塑、绘画、乐舞、文学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沐浴在晨曦中的五台山金碧辉煌的菩萨顶,巧夺天工的应县木塔,南禅寺和华严寺秀美端丽的胁侍菩萨,云岗和龙门举世闻名的石窟造像,都是那样令人一见而永生难忘。旅行家兼翻译家玄奘、建筑学家兼医学家鉴真、书法家怀素、天文学家一行……每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可如数家珍一样从古代高僧中列出这些祖国文化史上巨匠的不朽名字。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察归来,一个问题久久萦绕心头:宗教虽然历尽沧桑变化,但是仍能流传不息的缘由何在?把它仅仅解释成为一场历时两千年的欺骗怕是过于简单化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借佛的说教迫使被剥夺了做人的一切正当权利的人们安于贫困屈辱的生活,含辛茹苦以修来世;同时,他们也利用宗教为自己洗刷在尘世的种种罪孽,图谋一张进入天堂的廉价门券。对于劳苦大众来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这“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象征着的朦胧希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甚至成为支撑着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于是礼佛成为僧俗贵贱共同的事业。

宗教在历史上曾使人们虚耗了无数精力,浪掷了无数财力物力,甚至酿成几多酷烈的战争,它的消极作用是显见的。可是历史的辩证法也使它在愚昧落后的中世纪里成为文化艺术乃至科学的荟萃地。神职身份为一大批学问僧免除了营生的劳务,他们得以集中精力追求文明,在宗教的神殿里构筑自己钻研艺术和科学的天堂。宗教摧残过无数人才,可也有多少艺术家、学问家在那神秘的殿堂里造就;宗教抵制着科学进步,却又有多少天才的创造在它后院涌现。法显、义净、玄奘、鉴真等一大批高僧曾是世界历史上

开拓中外交通、传播东西方文明的伟大先驱。迄今为止,三大宗教的寺庙遗迹经卷典籍是世界上保存古代文明丰富的文化宝库。不无迷信的宗教事业居然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偌大的作用。这矛盾的现象似乎是难于理解的,但旧时代的每一点进步,何尝不是以人民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并常常伴随着多少荒唐才得以实现的呢?

苦难大众需要精神寄托,宗教活动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积极的后果,这些应是宗教得以流传不息的重要原因吧?随着文明和时代的进步,一切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终归都将被人们抛弃,宗教是要消亡的。但在可以预见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中,宗教仍将继续存在,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那么现今的和将来的世界上宗教存在的历史理由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谨慎对待的问题。

(本文收入1982年河东两京历史考察队编著的文集《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 佛教东渐两千年香火不绝的反思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以后中国化，整整两千年过去了。虽然从三武灭佛到“文革”浩劫屡经法难，却顽强生存，迄今香火不绝，还大有兴旺发展之势。对比起其他多数土生土长的或外来的意识形态宗教流派，稍经风雨一蹶不振旋生旋灭的情况，真是大相径庭。十余年前便有“一个问题久久萦绕心头：宗教虽然历尽沧桑变化，但是仍能流传不息的缘由何在？”<sup>①</sup> 这个问题使我久久不能释怀，还有这样一段因缘：

1984年7月17日下午，我在普陀山登佛顶山，前一天适逢阴历六月十九观音出家日，夜晚从山脚到山巅，香客彻夜涌动，香烛火光似一条火龙映红夜空，甚为壮观，我好奇地去看个究竟。

只见山道沿途满是未燃尽的香烛，一堆挨一堆。快到山顶我已累得下气不接上气时，见到前面三位少女，一步一拜，缓缓而进。我放慢脚步在后面远远察看，只见她们各人手持一片硬纸板，弯腰放在身前远一点的地方，而后跨一大步跪上去，恭敬地点地叩头，站起来作揖，拜一拜后再重复上述动作，虽然跨的步子大一点，可一步一跪一叩一拜的动作仍然一丝不苟，而且神情严肃，旁若无人，我们不敢惊扰。到山顶后她们又进庙上香，挨个拜佛。拜完以后，好像办完了一件大事，情绪一下欢腾起来，蹦蹦跳跳在山上玩。

---

<sup>①</sup> 拙文《净土宗胜地巡礼》，载《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我这才和同行的邓文宽等先生试探着上前问话。不想其中一位很秀气的姑娘大大方方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你们是从山下一直磕头上来吗？”

“是啊！”

“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两个多钟头。”

“累吗？”

“不累的。心里想着菩萨，不累的。”

“你们常这样上山拜菩萨吗？”

“一年三次，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

“是观音出生、出家、成道的日子吧？”

“是的。”

“昨天是六月十九，别人都昨天来，你们怎么昨天不来？”

“昨天有电影，我们看电影去了。”

“那菩萨不生气吗？”

“菩萨大慈大悲，不会怪罪的。”

她还告诉我，她18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现在是小学代课教师。我打趣问道：“菩萨怎么不保佑你考上高中呢？”她说：“菩萨当然是保佑的，不过还要靠自己努力呀。”言语中处处流露出，菩萨在她心中是个至善至美的形象，她按自己的愿望和想象在理解菩萨，或者说在塑造菩萨。

下山途中，她们三个又从后面赶上我们，一个个快活得像小鸟一般，和上山时判若两人。是熟人了，我们又攀谈起来。我发现她们对普陀山重新开放，允许外地人去参观进香以来的生活心满意足。那位当代课教师的少女一家七口，只有一亩多地，以前买不起课本纸笔，弟弟上不了学，现在开放了，处来游客多，姐弟俩每人背一箱汽水上山，一人一趟可以挣一元多钱，自己挣钱买学习用品，不让爸爸发愁了。那时“文革”结束未久，她大概对“破四旧”还记

忆犹新,话语中不免露出对菩萨今后境遇的一丝忧虑。她们想得到菩萨保佑,她们也在保佑着菩萨。她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当地的男人们也是拜菩萨的,不过他们不好意思让人看到,没人的时候拜,连乡镇的干部们也有偷偷拜的。

普陀山进香少女,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活脱脱地站在面前,在她身前身后还有一大群新的善男信女站进排了两千年的长长的佛门弟子队伍中。佛教何以能有这样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我想起了在厦门南普陀寺看到的一班正在上文化课的小和尚的作业,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出家当和尚》,大多数的回答是因为看到生活中一些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丑恶现象,想摆脱烦恼,来到佛门求一块干净之地。佛教知识多一点的还写到佛主的慈爱,真正伟大。

在横扫一切的铁扫帚刚扫过的土地上,佛门又与这么些少女少男广结善缘,真使我的心受到震撼。“文革”中拆庙、打菩萨、强迫和尚尼姑还俗甚至搞拉郎配的恶作剧才收摊,新生力量便在佛门集结起来。近年到各地寺庙要求出家的人数还在成倍甚至成若干倍地增长,使全国许多寺庙(截至1988年底为5700多座)呈爆满之势,根本无法接纳。

宗教是一种把相信神或其他超人的存在物的信仰者团结在一个精神共同体系中的信仰体系制度,具有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认识的、文化的、教化的和整合的多种功能,有人将此概括成社会控制功能,整合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心理调节功能和陶冶情操的美感功能等五种基本功能。<sup>①</sup> 归根结蒂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人毕竟有别于牛马犬,不是端起碗来有饭吃能生存就行了。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有精神生活的要求,这就是对自己人格尊严、人生价值的追求,对自己感情、理想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失落

<sup>①</sup> 陈麟书、袁亚愚主编:《宗教社会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的东西,有些人会到宗教世界去寻找。在社会文明和教育不够发达因而社会生活不能尽如人意时,应该允许人们有这样的选择,以求解脱,平衡心理。宏博精致的佛教教义恰恰又善于帮助人们解决宇宙观、人生观方面的问题,“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许多思想精华富有吸引力,对穷人和罪人还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宽容,无愧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sup>①</sup>。所以无论上智下愚僧俗贵贱,礼佛一向是社会各层次人士共同的事业。当今世界上依然有60%即25亿人口信仰宗教的根本原因殆即在此。

佛教存在的合理性,是因为于世有补。佛教本身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综合文化的载体,梁启超、弘一法师等贤哲曾概括总结佛教的历史作用,高度评价佛教对中国文化、哲学各方面的重大影响。确实,如果没有佛教,中国的思想文化艺术乃至伦理观念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而这样子的中国传统文化曾是我们国家民族强大凝聚力之所在。这便是佛教存在的历史理由。再说,借助佛教的传布,国内外许多民族的思想哲学、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天文历法、科学技术得以沟通交流。丝绸之路何尝不是一条宗教之路,佛教之路?法显、鸠摩罗什、义净、玄奘、鉴真等一大批高僧又成为世界历史上开拓中外交通、传播东西方文明的伟大先驱。一代代高僧对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外关系发展的积极贡献,也平添了佛门的活力和生命力。

历史地看宗教,我们应承认宗教的作用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也有保守的消极的一面。由于宗教一般都提倡诚实俭朴,乐善好施,用戒条自律,神职人员和教徒受到宗教精神和慈悲、向善思想长期熏陶,一般都能与社会犯罪无缘,因此,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尊重。新加坡和港台教育界一些人士主张开设宗教教育课,训

<sup>①</sup>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练学生自律能力,成为更好的守法公民,是想借重宗教的教化作用了。

在宗教将长期存在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应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力,努力倡导弘扬宗教的进步作用。我们更应该研究人们寄托于宗教的理想愿望,努力建设一个少烦恼、无烦恼的有情世界,通过僧俗各界共同努力,把一个平等、自由、合理、慈悲的天国建在人间,让宗教理想世界的合理内涵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我想,对于佛教东渐以来流传两千年至今盛况不衰的历史反思,会有裨益于现代社会和精神文明的革新建设。

(原载《法音》1994年第2期)



## 《隋炀帝新传》前言

### 愿天下人还他公道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有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笔者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按愚意，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我所以认定隋炀帝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却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徵，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几十年，他还是更多地被当作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



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原稿 1989 年 7 月完成于九华山，后记 1994 年 5 月补于西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9 月出版）



## 《武则天本传》前言

### 题外的话：无字碑不肯泄露天机挑战史学家

武则天是一个富有历史魅力的名字。一千三百年来，人们对她是非曲直的争论喋喋不休，褒美和贬谥的用语，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另一个人物能使历史学家们有如此相悖的评价。矗立在乾陵唐高宗述圣记碑旁的那块武则天的无字碑，好像就是有意要挑逗起这场争论而一字不镌。这真好极了！给历史留下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显然比杜撰一个结论去让人们记诵，更有价值。

经验表明，对任何一个经历复杂的重要历史人物，要在“盖棺”时“论定”是办不到的，更何况是这么一位中国正统王朝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历史不止是胜利者的宣传。在我国以史为鉴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一切不合后来统治者需要的历史都被改写过。既然不知自渺茫幽冥的远古时代的哪一天起，华夏的大地和天穹上已结结实实镌刻下了“男尊女卑”四个大字，青史就再容不得一个有成就的女皇帝堂皇公平地留驻。虽然她曾空前绝后地在孔孟之道已经流传千年的文明古国里脱颖而出，但历史的迷雾和那段本来就充满了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历史，使我们今天已实在难明其真面目。要澄清被恣意夸大和渲染过的史实，洗去泼在她身上的污水，恐怕要比

清除敦煌壁画上的千年烟尘污渍更难。同时,作为一个在后宫争宠的昭仪和占据皇位可以滥施淫威的女帝,武则天的性格也有独裁君主残忍荒暴的一面,要鉴别诠释这类充斥于史书小说的材料,给她以切实的揭露批判,全面评价其政治,亦绝非易事。

史学家们正确地认定了自己的首要任务:逐个找出被篡改的史实,一一加以纠正,将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不言而喻,哪怕只是澄清一个很具体很细小的问题,也要花费极大的功夫。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说:“无疑,历史知识的这种真实性或许是一种理想”,但“至少,历史总该是为接近于真实而作出的最严肃、最有步骤的努力的成果”(伊雷尔·马鲁)。

笔者并不敢抱把武则天生平许多事情说对和说清楚的奢想。武则天的历史魅力就在于她已是一个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完全看透的历史人物。人们常常习惯在持褒、持贬或有褒有贬的史家间徘徊选择自己的立场观点,其实不妨先来花气力做一点摹写、复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有趣尝试,在更多地了解她、理解她的基础上去思索和争辩,考验知识,收获智慧,增长撩拨历史迷雾的能力。

三十多年来,武则天这个使人魂牵梦萦的题目耗去了我不少的心力,而我乐此不疲的原因,是至今还有许多疑点需要用自己鄙陋的理解去弥补有关史料的不足和歪曲,尽管连武则天皇帝原来的名字是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现在也无人能说上来,我还是想在本书中对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疑问和争论作出自己的回答。令人鼓舞的前景是,她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据信是没有被盗掘过的陵墓——乾陵存世,就像一张没有亮出的底牌,当这座文物宝库终有一天被打开的时候,一切关于她的无知妄说将受到无情的奚落,而研究家们的真知灼见被新史料证实时将大放异彩。相信自陈寅恪以下,从汪篔、林语堂、郭沫若到熊德基、雷家骥,从菲茨杰拉德、崔瑞德到原百代、气贺泽保规,20余部武则天传记和约400篇专论的作者,每一位潜心研究过武则天的学者,无不热切盼望自

已能嗅到“思想——人间最美丽的花”放出的令人心醉的芳香。

(《武则天本传》是在 1964 年大学毕业论文基础上写成,三秦出版社出版 1986 年 6 月,1987 年、1992 年、1993 年重印。1998 年 9 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



# 《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导言

## 礼仪之邦的辉煌和困惑

礼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交往相处时,应按各自身份遵循的行为规范。仪,朱熹训为礼,两者相通,仪侧重体现礼的外在形式,使礼更具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礼仪作为一种文化的积累,凝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定式,在中国古代还纳入了政体结构和教化程式,体现着统治的秩序,制造过大一统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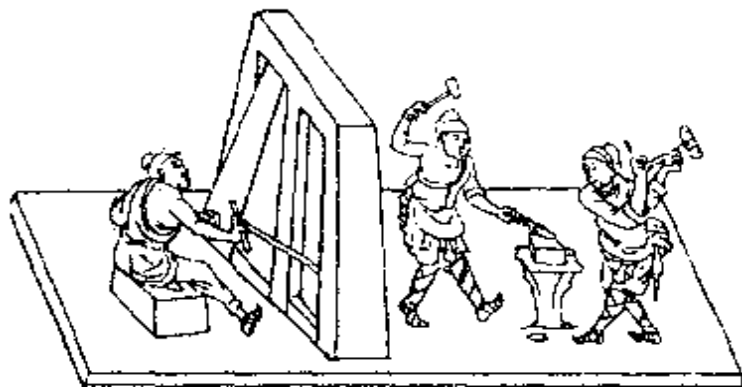
礼借政权的提倡和观念的共识,赋予帝王、宗教、宗族和家庭以皇权、神权、族权、父权和夫权(间或为女权),无孔不入地进入社会生活,实现礼教与刑法相辅相成的社会功能。两者的区别是礼更多依靠道德的灌输形成自律,在舆论制约下,尽量通过每个人的自我规范和自我控制起作用。因此,传统的中国礼仪,具有政治性、道德性、宗法性、民族性、普及性和自觉性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等级性、压迫性、欺骗性和虚伪性的阶级内容。是把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文明的和野蛮的规矩糅合在一起,驾驭着社会生活,构成素称“礼仪之邦”或“礼义之邦”的传统中国及其文化的一大特色。

本志拟寻本溯源,对礼仪的起源和沿革作一历史回顾,展示制定礼仪的理论依据,并对传统的官颁五礼作比较系统和尽量切实

的介绍,借以取得对闻名于世的中国礼仪文化的批判认识。

礼仪本应是体现人们相互尊重,实现相互沟通的美好纽带,但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礼仪成了从平民百姓到贵族官僚甚至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不堪其苦的负担,为了社会表面的和谐稳定,使人们生活得屈辱痛苦。讲起其中的道理来,言之者振振有词,闻之者木然从命,无不在对礼仪之邦的一片赞歌声中陶醉,是礼教吃人的呐喊也惊不醒的陶醉。这是我们这个欠缺人道的礼仪之邦留下的一个历史困惑。应该借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给予批判总结,让历代礼仪文明中大量被专制主义政治湮没的思想火花重现辉煌。我们相信并期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沟通人们心声的新礼仪成为生活的艺术和享受时,人人都活得尊严自在的中华民族,便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升华。

(1995年8月11日完稿于西安。《中华文化通志》全书101卷于1998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索 引

## 一 画

一夫百亩 4, 381, 382  
一行 439, 443

## 二 画

二王后 18, 133  
二圣 253  
二张 264, 274  
二牛抬杠 385  
十事要说 277, 284  
十恶 451  
十二事 255  
十二大将军 17, 124  
十六国 11, 30, 31  
十六院 432  
七家 16  
七大奇迹 187  
八王之乱 8, 34  
八姓 16, 134  
八柱国 17, 124, 129, 130  
人 115, 117  
人口 4, 6, 53, 54, 261, 377, 380,

386, 391, 393

人权 24, 77, 117, 340, 424, 504  
人文环境 105  
九品官人法 9  
九品中正制 19, 135, 443  
九品混通 15

## 三 画

三国 8, 33, 34  
三长制 11, 14  
三方起兵 143  
三教 34, 38, 40  
三纲五常 423  
三岛一 81  
于谨 127, 129, 132  
于志宁 129, 133, 138  
于也非 57  
土地所有制 2  
士人 1, 22, 24, 37, 132  
士大夫 442, 476  
士族 2, 10, 13, 16, 21, 131, 132, 134  
下品 10  
大犁 4, 13, 55  
大姓 4

- 大族 5,7,8,9,11,13,16,17,55  
 大尺 348  
 大运河 116,172,186,190,192,  
 429,477  
 大斗拔谷 160,181  
 太食 22  
 大云经 49  
 大师 76,78,104,114,117,120  
 大矢透 81  
 万俟丑奴 124  
 万绳楠 479  
 上品 10  
 上柱国 175,176  
 上官仪 251  
 上官婉儿 251  
 小犁 13  
 小尺 348  
 小农 2,3,20,40,44  
 小农经济 373,383,387,443,445  
 小野妹子 178  
 山东 30,132  
 山东人 18,20  
 山东士族 17,18,135,136  
 山阳侯 189  
 山本达郎 86  
 千金公主 143  
 广通渠 189  
 门阀 10,15,17,18,23,37,40,131,  
 174,254  
 门阀社会 2,11,15  
 门阀制度 9,17,20,34,123,136,  
 253,459  
 门阀政治 10,17,42,134  
 门阀经济 14  
 义净 469  
 义成公主 157,179  
 女娲 423  
 马嵬事变 66,301,305,307,338  
 马周 228  
 马可·波罗 418  
 马克思 118,341,384,474  
 马雍 60  
 马长林 71  
 马驰 75  
 马小红 71  
 乡论 9  
 乡饮酒礼 25
- 四 画
- 元从禁军 126  
 元从功臣 249  
 元欣 127  
 元岩 145  
 元载 326  
 元结 280,378  
 元昊 417  
 无字碑 108,482  
 天府之国 190  
 天经宫 148  
 天策上将 200



- 天帝 255  
 天后 255  
 夫差 189  
 专制主义 1, 3, 305, 339, 340, 482  
 开元礼 26  
 开元之治 131, 255, 262, 273, 276  
 开元天宝盛世 21, 392  
 井 404  
 王权时代 2, 120  
 王莽 7  
 王导 10  
 王羲之 10  
 王猛 31, 32  
 王俭 24  
 王肃 25  
 王通 31, 38  
 王弼 35  
 王思政 129, 130  
 王世充 225  
 王皇后 17, 21, 108, 130  
 王孝通 439  
 王缙 326  
 王守澄 335  
 王归长 337  
 王夫之 65, 203, 209  
 王国维 46, 49  
 王永兴 62, 97  
 王寿南 89, 98  
 王士立 362  
 王小甫 21, 22  
 王超 70  
 王育民 72  
 五礼 25, 26, 481  
 五德 26, 27  
 五行 27  
 五胡 16, 23, 25  
 五胡乱华 8  
 五姓 16  
 五王政变 265, 274  
 五代 2  
 五季 23  
 屯 370  
 韦挺 227  
 韦后 270, 275, 282  
 韦嗣立 394  
 韦处厚 396, 400  
 太平公主 264, 275, 276, 282  
 历史 1, 22, 32, 73, 104, 109, 110, 113, 117, 120, 316, 476, 478, 479  
 史学 110, 117  
 区种法 407, 408  
 区田 407  
 日本 58, 98, 178  
 日野开三郎 53, 94, 99  
 日比野丈夫 87  
 中世 99  
 中古社会 2, 12, 42, 183, 378  
 中古时代 20, 133  
 中古史 20, 29, 64, 122  
 中华民族 28, 482  
 中央集权 1, 2, 3, 9  
 中尉 333, 335, 336

- 内藤虎次郎 78,99  
 内藤乾吉 395  
 贝冢茂树 86  
 仁寿宫变 145,149,151  
 仁智宫 205  
 仇士良 336  
 仓 378  
 仓廩 63  
 公田 369  
 公廩田 372  
 乌廷玉 71,89  
 牛耕 4,13  
 牛李党争 48,67,68  
 牛僧孺 67,68  
 牛致功 65,74  
 牛志平 75  
 手工业 386,387  
 毛泽东 383,388  
 毛汉光 98  
 气贺泽保规 12,479  
 长安 191  
 长城 171,180,187  
 长恨歌 310  
 长孙晟 130  
 长孙无忌 17,19,21,131,198,  
 251,252  
 长孙皇后 131,198,203,338  
 氏族志 19,135,249  
 计帐 15,378  
 卞孝萱 89  
 六镇起兵 17,122,123  
 六条诏书 18  
 文化 23,24,30,32,42,75,424,  
 425,454,476,481  
 文化史 23,74,113,441  
 文学 439  
 文献历史学 52,116  
 方清 69  
 方积六 72  
 方义兵 106  
 户籍 3,15,49,100,393  
 户等 62  
 户调 15  
 户税 61,398  
 火药 439  
 心态 429,437  
 心态史 23,32  
 邓拓 50,114  
 邓广铭 58,62,97,114  
 邓文宽 472  
 孔子 23,29,45,417,423  
 孔庙 29  
 孔明 33

## 五 画

- 邗沟 189  
 节度使 21  
 正朔 26,30  
 正统 30,31  
 玉华宫 231

- 玉田是博 100  
 古贺登 100  
 古正美 101  
 术士 147, 265, 271, 443  
 世族 9  
 东汉 5, 8, 9  
 东晋 10, 34  
 东丝绸之路 167, 178  
 东南 414  
 石勒 25, 30  
 布目潮飒 65, 86, 94, 100, 329  
 北魏 11, 15, 31, 155, 339, 423  
 北周 126, 141, 143, 362  
 北方 22  
 北伐 10  
 北门学士 255  
 占田制 14  
 卢贲 143  
 卢开万 73  
 田令 11, 12, 14, 58, 175  
 田赋 18  
 田庄 8, 9  
 田余庆 10, 89, 114, 120, 169, 186  
 田廷柱 72  
 四镇 262, 263  
 四大发明 440  
 四海大姓 16  
 四姓 16  
 四善 235  
 史学 44, 46, 51, 105, 109, 116, 119  
 史学理论 111, 112  
 史德 113  
 史才 113  
 史识 113  
 史念海 63, 90, 91, 93, 95, 96, 97, 189  
 代役 398  
 代田法 406, 419  
 代田仓 419  
 外戚专权 338  
 外山军治 85, 107  
 尔朱荣 132  
 尔朱天光 124  
 生态 63, 191, 385, 419  
 生产力 4, 5, 12, 20, 56, 383, 384  
 生产关系 383, 389  
 生产结构 383, 384, 389  
 白渠 190, 371  
 白居易 286, 461  
 白鸟库吉 99  
 处罗可汗 157, 163  
 乐平公主 143, 435  
 汉学 22  
 汉化 24, 28, 29  
 汉高祖(刘邦) 3, 7  
 汉武帝 3, 5, 153, 164, 165  
 汉文帝 4  
 汉光武帝(刘秀) 7, 8  
 礼 17, 25, 424, 425, 481  
 礼仪 1, 3, 422, 481  
 礼义之邦 424, 425, 481  
 礼仪之邦 23, 169, 422, 425, 481

- 礼仪文化 23, 24  
 礼仪制度 26  
 礼乐 23, 26  
 礼法 36  
 礼学 423  
 玄学 34, 38  
 玄中寺 456, 457  
 玄武门之变 65, 115, 198  
 玄奘 278, 439, 443  
 宁可 54, 69, 88, 89, 95, 97, 372, 375, 387  
 宁欣 72  
 永徽之政 19  
 加藤繁 78, 99  
 弘一 474  
 奴隶 4, 59  
 奴婢 6, 11, 12, 23, 75, 135, 174, 372  
 台参 68  
 丝绵 378  
 丝绸之路 155, 166, 171, 415, 446, 474  
 圣德太子 178, 460  
 圣母神皇 259  
 司马迁 116, 504  
 司马懿 35  
 司马光 31, 170, 182, 293, 400, 430, 433  
 民族 21, 75  
 民主 41, 340, 438  
 皮日休 197  
 辽东之役 180, 183, 196, 244  
 边令诚 303
- 六 画
- 地 54  
 地税 61, 378, 398  
 地主 12, 13, 383  
 扬州 23, 182, 194, 435  
 扬州起兵 258  
 吉藏 466  
 寺院 63  
 寺田 372  
 寺户 63  
 老子 4, 325  
 考古 48, 63  
 考据 44, 46, 51  
 考察历史学 52, 116  
 西晋 8, 34  
 西魏 124  
 西域 156, 163, 166, 182  
 西突厥 157, 162, 262  
 西嶋定生 100  
 西川正夫 59  
 列宁 383  
 成吉思汗 418  
 夷夏 31  
 夷狄 32  
 贞观之治 230, 273, 281, 392, 478  
 光明寺 463  
 光火大贼 396

- 光化公主 155
- 吐蕃 22, 58, 262, 307, 326, 417, 446
- 吐谷浑 75, 133, 153, 165
- 吐鲁番 60
- 吐突承璀 335
- 吕思勉 52, 84, 88, 95, 204
- 吕振羽 114
- 回纥 315, 417, 419
- 曲辕犁 13, 21, 55, 385
- 曲笔 222
- 竹林七贤 36, 37
- 乔伟 70
- 朱敬则 108
- 朱全忠 338
- 朱希祖 49, 138
- 朱雷 60, 94
- 朱伯康 56
- 朱健 59
- 传统文化 24
- 伏羲 423
- 伏允 155, 157, 165
- 任育才 86
- 伊吾 166
- 伊本·考尔大贝 182
- 伊雷尔·马鲁 479
- 华心论 32
- 自由 1, 4, 110, 475
- 自田 59
- 自耕农 6, 13, 15, 21, 54, 115, 384, 395
- 自然经济 3, 44, 187
- 自然环境 63, 105
- 向达 74, 97, 114
- 行卷 442, 443
- 后门阀社会 2, 21
- 全汉升 98
- 全海宗 100
- 名教 37
- 名士 9, 34, 35, 36
- 多利思比孤 98
- 匈奴 28, 129
- 刘渊 28, 30
- 刘裕 10, 131
- 刘昉 141
- 刘武周 224
- 刘文静 209, 211
- 刘黑闳 204
- 刘知己 255, 287
- 刘敬同 416
- 刘晏 337
- 刘季述 333
- 刘克明 335
- 刘煦 400
- 刘盼遂 49
- 刘志坚 73
- 刘恩惠 72
- 刘俊文 70, 92
- 刘运承 67, 68
- 刘太祥 71
- 刘驰 407
- 齐陈骏 54, 362, 368
- 齐涛 73

- 齐勇锋 72  
 衣冠户 23  
 庄田 395  
 庄园 8  
 关中 126, 190, 405  
 关中本位政策 16, 48, 137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17, 18, 19, 20, 48, 108, 114, 122, 124, 126, 131, 132, 133, 134, 137, 140, 176, 227, 253, 259  
 汗血马 163  
 江南 58, 136  
 江陵之破 17, 132  
 池田温 100  
 汤用彤 74  
 宇文泰 17, 18, 20, 122, 123, 124, 127, 132, 133, 137, 138  
 宇文护 127, 129, 132  
 宇文导 124  
 宇文述 146, 150, 157  
 宇文融 54, 395, 396, 398  
 安乐公主 270, 275  
 安禄山 22, 301  
 安史之乱 68, 295, 297  
 许敬宗 217  
 许道勋 65, 74  
 农业 55, 388  
 农民 2, 12, 42, 69, 383, 387, 399  
 农民战争 184, 224, 386, 424  
 农奴化 5, 6  
 那波利贞 100  
 阮籍 36, 37  
 阴谋史学 51, 110  
 阶级 117, 137  
 阶级社会 482  
 阶层 137  
 孙吴 33  
 孙思邈 439  
 孙达人 54  
 妇人 75, 135, 174, 197  
 牟发松 63  
 驰道 172  
 巡狩 156, 179
- 七 画
- 麦克·哈特 145  
 进士 23, 232, 442, 443  
 进士科 20, 38, 135, 175  
 均田制 12, 49, 53, 55, 57, 58, 100, 117, 387, 392, 397, 399  
 抑佛 227  
 杜预 189  
 杜如晦 133, 201, 208, 219  
 杜甫 39, 115, 297  
 杜佑 53, 393  
 村上专精 461  
 杨忠 126, 129, 138  
 杨勇 145, 152  
 杨丽华 143  
 杨素 145, 146, 149, 151  
 杨玄感起兵 176, 177, 224

- 杨文干兵变 202, 205, 206  
 杨贵妃 294, 300, 307, 309, 310, 320  
 杨国忠 66, 304, 306, 307, 309  
 杨瑒 396  
 杨绹 326  
 杨炎 61  
 杨志玖 52, 67, 68, 84, 96, 97  
 杨宽 55  
 杨廷福 70  
 杨鸿年 72  
 杨际平 57, 58, 59, 60, 70, 73, 392  
 杨希义 65, 66  
 杨根相 90  
 杨权 63  
 劳动生产率 3, 4, 21, 373, 377,  
 380, 381, 388, 445  
 苏绰 18, 133, 366  
 苏威 133, 366  
 苏和鸣 102  
 李悝 3, 4, 373, 374, 405  
 李斯 121  
 李陵 416  
 李暠 138  
 李安世 12  
 李熙 138  
 李天賜 138  
 李虎 126, 127, 129, 130, 138  
 李弼 127, 129  
 李穆 143  
 李德林 143  
 李密 129, 176, 224  
 李靖 133, 165, 227, 229  
 李勣 19, 21, 137, 228  
 李淳风 439  
 李建成 201, 204, 222, 328  
 李元吉 201, 213, 222  
 李恪 334  
 李承乾 329  
 李忠 250, 329  
 李弘 108, 256, 322  
 李贤 108, 116, 256, 330  
 李重俊 331  
 李重福 334  
 李成器(宪) 276, 290, 331, 336  
 李成义 276, 290  
 李守礼 276, 290  
 李瑛 331  
 李瑁 336  
 李倓 313, 315, 319, 321, 335  
 李永 332  
 李成美 333  
 李裕 333  
 李恽 335  
 李悟 335  
 李湊 335  
 李溶 336  
 李皋 402  
 李敬玄 136  
 李林甫 292, 297, 301, 306, 336  
 李光弼 303, 304, 313, 315  
 李白 22, 39, 299  
 李辅国 66, 307, 308, 320, 322, 338

- 李泌 311,337  
 李希烈 403,404  
 李吉甫 67,439  
 李德裕 67,68,337  
 李逢吉 67  
 李宗闵 67  
 李商隐 295  
 李翱 39,40  
 李埏 97  
 李季平 75  
 李培浩 52  
 李树桐 65,85,86,87,90,98  
 李必忠 74  
 李斌城 76  
 李文澜 61  
 李春润 55,401  
 李伯重 57  
 李雪华 72,73  
 李晓路 68  
 李俊恒 71  
 李翔 73  
 李莉 71  
 李志贤 101  
 李约瑟 75,436,440,444  
 赤土 178  
 孝 36,216,318  
 严耕望 78,86,91,98  
 束世澂 61,62  
 两税 61,397  
 两税法 12,21,61,62,392,398,399  
 两税户 372  
 连树声 117  
 步 361,381  
 吴晗 114,121  
 吴承洛 57  
 吴枫 52,70,74,84,89,106  
 吴慧 56  
 吴宗国 21,70,71,74,76,94,95,  
 115,214  
 吴丽娱 73  
 岑文本 228  
 岑仲勉 49,52,58,62,67,76,84,  
 173  
 私田 59,60,62,369  
 秀才 18,135  
 何汝泉 21,70,71  
 何敦华 65  
 何灿浩 67,68  
 何忠礼 71  
 佃农 6,76  
 佃客 21,395  
 佃食 395  
 伯希和 101  
 佗钵可汗 172  
 佛教 31,103,278,455,471,474  
 佛图澄 11,278  
 兵制 7,18,21  
 兵役 15  
 兵募 22  
 余秋雨 454  
 谷 405  
 谷霁光 70,72



- 谷川道雄 91, 94, 100  
 狄仁杰 108, 273, 398  
 亩制 4, 381  
 亩产 56, 369, 380, 381  
 库 63, 378  
 汪篔 41, 53, 55, 58, 64, 88, 92, 97,  
 114, 137, 223, 390, 393, 397, 479  
 沙钵略可汗 143, 172  
 沙畹 101  
 沈从文 117, 118  
 沈起炜 85  
 宋 2, 441  
 宋学 23  
 宋璟 108, 255, 273, 275, 280, 283  
 宋申锡 335  
 宋祁 400  
 宋家钰 57, 58, 65  
 社会 75  
 社仓 366  
 启民可汗 157, 179  
 良史 113  
 张骞 155  
 张衡 146, 150  
 张丽华 430  
 张婕妤 203, 220  
 张亮 19, 137, 201, 207, 230, 241  
 张玄素 137  
 张柬之 265, 275  
 张行成 129  
 张易之 264, 274  
 张昌宗 264, 274  
 张说 275, 284, 290  
 张九龄 255, 332  
 张良娣 312, 319, 322  
 张广达 72, 74, 97, 102  
 张弓 63  
 张国刚 21, 68, 70, 72  
 灵渠 188, 193  
 迟乃鹏 73  
 陆知命 170  
 陈氏(宣华夫人) 145, 431  
 陈子昂 108, 255, 287, 416, 419  
 陈玄礼 66, 300  
 陈庄 69  
 陈黯 423  
 陈藏器 439  
 陈寅恪 16, 20, 26, 27, 30, 32, 46,  
 48, 66, 67, 74, 78, 83, 86, 87, 90, 96,  
 97, 105, 114, 115, 122, 137, 138, 198,  
 209, 212, 213, 479  
 陈垣 49  
 陈梦家 382  
 陈仲安 69  
 陈明光 73  
 陈振 70  
 陈伯岩 52  
 陈衍德 63, 64, 73  
 邵循正 114

## 八 画

- 环境 116, 120, 504  
 武川系军事贵族 17, 122, 126  
 武士護 131, 248  
 武则天 20, 21, 66, 74, 106, 114, 115, 117, 131, 133, 137, 149, 192, 248, 282, 309, 320, 321, 330, 392, 396, 400, 478, 479  
 武韦之乱 337  
 武周 108, 266  
 武举 262  
 林邑 178  
 林语堂 479  
 林干 75, 97  
 林天蔚 85, 87, 98  
 林立平 56  
 枢密使 333, 335, 337  
 苻秦 31  
 范祖禹 205  
 范文澜 52, 62, 68  
 郁贤皓 76, 106  
 转运使 70  
 虜 126  
 尚钺 121  
 明经 18  
 明堂 25  
 晁鸾 456, 457  
 忠臣 33  
 罗织 274  
 罗振玉 46  
 罗香林 98  
 罗杰伟 76, 104  
 国史 43, 68, 199, 237  
 季羨林 96  
 和余 378  
 和雇 398  
 使职 21  
 金宝祥 61, 62, 76, 88, 97, 195, 196  
 金旭东 71  
 金铎敏 100  
 朋党之争 67, 388  
 周公 23, 339, 422  
 周礼 423  
 周闵帝(宇文觉) 126, 129  
 周武帝(宇文邕) 19, 126, 133, 135, 140  
 周宣帝(宇文赧) 130, 133, 140  
 周静帝 140, 143  
 周一良 114  
 周伟洲 75  
 周建国 67  
 周东平 71  
 周殿杰 69  
 净土宗 448, 455  
 府兵制 17, 21, 398  
 府户 123  
 郑国渠 190, 370, 405  
 郑译 140, 141  
 郑注 335  
 郑纂 378  
 郑振铎 46

郑学檬 53, 54, 58, 64, 93  
 郑胜强 70  
 郑英德 74  
 法琳 139  
 法然上人 459, 465, 468  
 河北起兵 17, 123  
 河阴之变 17, 132  
 泽田瑞德 107  
 泾原兵变 403  
 宗 15  
 宗族 4, 5, 8, 14, 56  
 宗主 14  
 宗主督护制 14  
 宗教 469, 473  
 宗法贵族政治 2  
 宗室起兵 259  
 官制 18, 20, 70, 175  
 官户 23  
 官奴 150  
 实录 43, 67, 199  
 实际寺 463  
 袄教 49  
 房玄龄 133, 201, 208, 219, 231  
 房遗爱 247  
 房瑄 299, 315  
 建安文人 33  
 居延城 416  
 居延海 417  
 氏族 17  
 姓氏录 21, 254  
 始毕可汗 180, 210

经学 34, 40  
 经济 21, 47, 63, 69, 105  
 经济史 20, 53, 55, 63, 64, 393

## 九 画

括户 8, 21, 55, 394, 399, 401  
 括客 396  
 契丹 262, 263  
 春秋笔法 110  
 柳述 145, 146, 149, 150  
 柳奭 131, 251  
 柳芳 126  
 柳宗元 439  
 政权 77, 117  
 政治 105  
 政治史 64  
 胡化 24, 28  
 胡风 24  
 胡服 165  
 胡椒 326  
 胡耀邦 421  
 胡如雷 58, 59, 65, 67, 74, 97  
 胡戟 56, 74, 94, 95, 106  
 胡乐 223  
 胡思庸 61  
 胡国然 67  
 胡沧洋 71  
 封建 50, 117  
 封建化 6

- 封建制 3  
 封建礼教 149  
 封爵 176, 323  
 封禅礼 254  
 封伦 204, 209  
 封常清 302  
 南朝 30  
 南北朝 5, 6, 8, 19, 30  
 南方 22, 31, 54, 64, 131  
 南方士人 20  
 南方士族 17  
 南朝士族 11  
 南诏 22, 58  
 南选 22, 254  
 南官说 439  
 茶 425  
 茶文化 425  
 荫 20, 176  
 荫户 5, 63  
 荣新江 93, 94, 95  
 赵过 406  
 赵贵 127, 129  
 赵翼 122, 340  
 赵吕甫 60, 67  
 赵克尧 65, 74, 93  
 赵文润 73, 74  
 赵和平 61  
 战国 3  
 勋官 20, 49, 135, 137  
 勋田 59  
 贵族阶级 20  
 贵族政治 99  
 香积寺 466  
 种族 32  
 科举 18, 22, 38, 67, 70, 117, 135, 175, 255, 262, 423, 442, 443, 444  
 科举官僚政治 2, 21, 40, 42  
 科学 22, 438, 439, 443, 444  
 科技 22, 75  
 选举制度 175  
 信史 110, 111, 116  
 侯景之乱 17, 124, 132  
 侯莫陈悦 124  
 侯莫陈崇 127  
 侯君集 217, 228  
 侯绍庄 59  
 段成式 439  
 段连勤 75  
 皇帝 2, 40, 482  
 皇帝制度 3, 120  
 皇帝时代 120, 504  
 皇嗣 328, 336  
 皇权政治 10  
 皇权主义 2  
 皇泰主 341  
 皇甫湜 67  
 律令时期 99  
 律量俞 343  
 俞纲 94  
 逃户 21, 53, 54, 55, 108, 114, 392, 394, 398, 399, 401  
 独孤信 124, 127, 129, 140

- 独孤皇后 140,141,147,151  
 饶宗颐 98  
 帝制时代 2  
 帝王思想 2,339  
 度田 8,14  
 姜伯勤 63  
 洞贼 395  
 洛阳 20,23,171,191,207  
 祖逖 10  
 神策军 338  
 宦官 22,67,68,69,293,302,333,  
 337,339  
 宦官世家 69  
 宫崎市定 86,87,99  
 客 5,6  
 客户 54,392,395,399  
 突厥 32,50,75,115,133,143,172,  
 179,206,209,262,416,419  
 突厥文 49,153  
 郡姓 16,126  
 郡县制度 3  
 费正清 444  
 垦田 5,53,58,377  
 姚思廉 433  
 姚崇 108,255,273  
 姚澄宇 70,71  
 姚大中 88  
 贺拔岳 124,132  
 柔然 122,133,172  
 统一 3  
 耕地 53  
 耕三余一 373,375,383,388  
 秦国 2  
 秦汉 3  
 秦始皇 3,189,476  
 袁晁 69  
 袁英光 74  
 袁纲 71  
 盐政 63  
 哥舒翰 303,304  
 晋元帝 10  
 晋阳起兵 64,199,210  
 贾后专权 34  
 贾思勰 13  
 贾耽 439  
 贾宪保 70  
 顾祖禹 153  
 顾颉刚 27  
 夏侯玄 35  
 原百代 107,479  
 莫高窟 445  
 柴德赓 114  
 党锢 33  
 党争 22  
 党项 75,154,396  
 恩格斯 340  
 钱穆 50  
 铁 262

- 铁口犁 3,5  
 铁器牛耕 2,4,55,373,389  
 铁勒 156,416,417  
 铃木俊 82  
 租调制 15  
 租庸 278  
 租赋 279  
 租粟 378  
 租额 366,372  
 俸禄 327  
 徐连达 65,71,72  
 翁俊雄 54,55,397  
 凌烟阁功臣 212,228,246  
 部曲 8,21,174  
 部曲佃客制 63  
 部田 60,61  
 郭象 37  
 郭衍 146,150,176  
 郭元振 417  
 郭子仪 303,304,313,315,326,335  
 郭沫若 52,85,106,112,114,478,483  
 郭琦 96  
 高欢 30,31,124  
 高颖 143,170,367,430  
 高士廉 19,136  
 高阳公主 247  
 高力士 66,293,295,307,308,338  
 高仙芝 303  
 高丽 58,196,262  
 高昌 163  
 高敏 421  
 高明士 422  
 高世瑜 72,74,75  
 资课 61  
 唐 42,454  
 唐律 70,99,229  
 唐尺 49,348  
 唐量 354  
 唐衡 357  
 唐亩 360  
 唐里 360  
 唐史 43,44,46,47,48,52,78,96  
 唐宋变革论 20,40  
 唐中叶变革论 20  
 唐高祖(李渊) 18,19,64,65,115,123,129,134,135,138,144,198,203,221,224,430  
 唐太宗(李世民) 17,19,20,32,39,64,74,108,115,117,130,133,135,136,137,144,165,192,196,198,221,224,230,231,367,398,435,442,443,476  
 唐高宗(李治) 17,108,116,149,196,253  
 唐中宗(李显) 108,257,266,269,275,398  
 唐睿宗(李旦) 258,267,275,282  
 唐玄宗(李隆基、唐明皇) 20,74,116,137,191,270,276,282,292,294,297,301,305,308,310,317,318,332,336,338,392,398,399

唐肃宗(李亨) 66,299,305,306  
 308,312,316,317,318  
 唐代宗(李俶) 313,320,326  
 唐德宗 403  
 唐顺宗 336  
 唐宪宗 134,335  
 唐穆宗 335,339  
 唐敬宗 335  
 唐文宗(李昂) 134,333,336  
 唐宣宗 134,337,340  
 唐昭宗 333  
 唐长孺 6,15,51,63,64,67,70,  
 78,87,88,90,92,93,96,97,114,  
 392,400  
 唐耕耦 59,62  
 差遣 21  
 消费 386  
 酒文化 314  
 浮户 396  
 流民潮 10  
 流人 404  
 流求 178  
 悟真寺 178,469  
 宿白 97,114  
 陶冶 66  
 桑田 12  
 桑枣 369,404  
 桑蚕业 388  
 桑原鹭藏 99  
 继往绝可汗 263

## 十 一 画

堀敏一 100  
 捧书生 107  
 职事官 49,177  
 教科书体 112,117  
 菲茨杰拉德 107,479  
 乾陵 112,266,478,479  
 菊池英夫 87  
 萧后 127  
 萧琼 127  
 曹操 33,35,189  
 曹植 35  
 曹尔琴 64  
 曹贯一 57  
 黄巾军 8  
 黄巢起兵 46,69,117  
 黄永年 65  
 黄盛璋 54  
 黄烈 88  
 黄约瑟 63,91,93,98  
 惠能 279  
 盛唐 20,197,305,378,397,445  
 辅璆琳 302  
 常田 60,61  
 常何 66,220  
 常万生 74,106  
 崔浩 15  
 崔瑞德 78,90,103,137,201,479  
 铜甌 260

- 犁 5, 13, 55  
斛法 363  
族姓 15, 16  
商业 23, 167, 385, 387  
商品经济 3  
商胡 155  
商鞅 387  
商鞅量尺 342  
章仇太翼 147  
章群 75, 84, 98  
庶 136  
庶族地主 397  
庾季才 141, 143  
阎文儒 55  
阎万石 55  
阎守诚 72, 73  
梁武帝 30  
梁守澄 335  
梁启超 474  
梁方仲 6, 53  
尉迟敬德 217, 229  
隋 167  
隋唐 32  
隋平江南 17  
隋末农民战争 17, 184, 197  
隋文帝(杨坚) 18, 19, 31, 123,  
126, 130, 133, 135, 138, 140, 145,  
153, 170, 189, 191, 196, 340, 362, 379  
隋炀帝(杨广) 18, 19, 20, 116,  
117, 129, 130, 133, 135, 145, 153,  
167, 169, 170, 183, 186, 429, 476  
婚姻 23, 25, 75, 134, 423, 425  
绞机 442
- 十 二 画
- 博士论文体 112, 117  
颉利可汗 214  
斯坦因 103, 303  
韩非子 340  
韩愈 39, 40  
韩国磐 52, 57, 62, 72, 85, 87, 88  
彭神保 64  
彭志筠 411  
募兵 21, 22, 210, 302, 398  
葛荣 124  
葛剑雄 391  
葛承雍 63, 66, 95  
粟 370, 378, 409  
赋役 63  
最 235  
景教 49  
黑城 415, 417  
程千帆 70, 442  
程宗才 65  
程志 69  
税 399  
策论 443  
傅奕 218  
傅仁钧 439  
傅乐成 84, 87, 98



傅璇琮 71  
 傅玫 13, 55  
 储君 305, 328, 337  
 御道 172  
 锄耕 4  
 鲁迅 445  
 鲁才全 55  
 敦煌 446  
 敦煌学 46, 100, 102  
 敦煌遗书 46, 49  
 曾我部静雄 99  
 善导 448, 458, 468  
 普利布兰克 53  
 道安 455  
 道绰 458  
 温国寺 463  
 渡边信一郎 12  
 割据 22  
 寒族 137  
 谢元鲁 71  
 谢和耐 102  
 禅宗 279  
 编户 13, 123, 367, 394

## 十三画

瑞特 91  
 鼓城阁之变 181  
 雷家骥 107, 479  
 蓝文徵 50, 83, 96

蒙文通 56  
 鉴戒史学 44, 46  
 鉴真 444, 463  
 徭役 15, 398  
 鲍晓娜 60, 62  
 滨口重国 99  
 窦建德 225  
 窦毅 130, 143  
 窦氏 143  
 窦焯 130  
 窦威 130, 134  
 福安敦 49, 103  
 褚遂良 126, 131  
 辟举 175  
 殿试 21, 262

## 十四画

墟聚 404  
 酷吏 260, 268, 269, 274  
 嘉量 342  
 蔡氏(宣华夫人) 147, 150  
 裴世清 178  
 裴矩 156  
 裴寂 203, 210  
 裴炎 108, 257, 258  
 鲜卑 14, 15, 28, 31, 123, 126, 132  
 133, 423  
 谭嗣同 424  
 谱牒 23, 136

嫡长子继承法 338

熊德基 116, 479

缪钺 85, 97

十 五 画

慧远 456

鞠伯雅 163

墨敕斜封 289

颜之仪 141, 142

蕃将 75

稻谷 480, 409

黎仁凯 54, 392

黎杰 87

摩尼教 49, 102

羯胡 133

翦伯赞 52, 56, 114

十 六 画

薛延陀 75

薛举 224

薛仁果 224

薛贻康 70

霍去病 116

霍俊江 58

默啜可汗 262, 275, 417

儒学 23, 24, 34, 38, 40, 423

十 七 画

戴胄 19, 137

戴逸 119

戴密微 78, 102

鞠清远 48

十 八 画

藩镇 22, 39, 67, 68, 69, 316, 338

魏晋 6, 8, 32

魏孝文帝 11, 16, 25, 27, 29, 30

31, 123

魏徵 19, 39, 137, 168, 182, 186

203, 227, 430, 437, 476

魏礼 103

二 十 画

籍外田 396

二 十 一 画

露田 11

## 后记 告别隋唐史

终于快熬到可以退休的岁数了,每念及此,心里便比较轻松起来,就像古人“老免”一样,完成了对国家的一份责任义务,可以卸去服役的劳苦,放浪形骸,享受人生去了。这个时候,我想有个自我总结,看这一辈子,是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子孙,主要是对过世的和在世的老师们,有个交待。

先想做的是学术方面的总结。自从四岁时进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中)附属的幼稚园起,到二十七岁离开读本科和研究生一住九年的北大,不间断的二十多年全是名校的学习生活,花费了连树声老师、汪篔老师等许多老师的无数心血教下的我,能否对他们有所交待呢?于是决心自己来做这个还历纪念。先把所学隋唐史专业方面的一些论文结集出版。内容一仍其旧,只作个别文字调整。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康德集团出版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特别是责编郭媛小姐的费心和李贵仁先生抱病精心校对,使这本集子能顺利出版。今后如果有条件,还想把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人物传记、敦煌吐鲁番学和吐鲁番地区规划研究、中国礼仪文化研究、《册府元龟》与《唐会要录》陆续修订,纳入文存出版。当然这条件二字,说来容易,实际难得。一位本系的退休教授曾仔细计算过,他一生拿到的工资总数才是七万多元人民币,我也多不了什么,而出这么一本集子的花费是要半世的工资的。好在现在电脑提供方便多多,打字留一孤本文存还是可以的。无论出

一本或七八本,且存这么个想头罢。只是跟我蒙难受屈的娇妻弱女,又会因此而继续埋怨下去了。

一直使我不安的,是在北大待过以后深知做个北大人之不易。能够自我宽慰的是自问此生总是努力的,该说的话,能做的事,都尽量说了,做了,且做到了不自量力的份上。当然做事在人,成事在天,想得多,做得不少,成的却很少。努力过,奋斗过,没有灰心过,就不计较得失成败了。自古以来,历史上的人们如果都是知道有成功的把握才去做,就不会有做事的人了。所以无论在内蒙古煤矿的十一年,还是在谁都不愿去的那地方的一年,我都未敢懈怠学业。

就说在那内蒙古荒僻的戈壁沙漠中的矿上,副食店里经常只有盐和海带两样东西卖的日子里,我还是天天挑灯夜读。靳树森师傅上完夜班路过,看到这情景,担心地说:“老胡把身体熬坏呀!”好在有工人师傅的爱护接济,我毫发无伤地坚持过来了。

归队时,带着一次次从银川五十本五十本地买的笔记本,写满了读书心得和资料。可到这时,我只剩下二十个工作年头了,治史自然不敢奢望成器,只能做一点算一点。我当然明白,老路走下去,今后更不会有什么出息,再在全面关注国内外研究动向的基础上考虑自己怎么下笔也太累。隋唐史的研究不妨就此打住。

改弦易辙的计划是转向心仪已久的一件司马迁未及做的事——为老百姓立传。我的心愿是让成千上万个平凡的也必有亮点的曾辉煌过的普通生命长驻青史,寄托对至爱亲朋的哀思,也给后世的史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留下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急于早日将编印这套《昨日星辰》的计划付诸实施,于是有了这一本小结过去的文存。

要检验的是自己带着时代关怀习史和使学术著述大众化两方面,是否有些许可取之处。至于我力主的评价历史要用环境的或人权的标准,和用皇帝时代及前后皇帝时代作中国历史分期的两

论,不知何时能听到公允的批评。

知我罪我,听天由人。是为文存。

2000年3月6日于陕西师范大学三过书屋

